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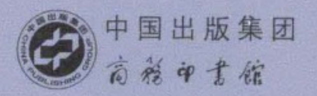
意大利简史

——从史前到当代

〔意〕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 著　沈　珩 祝本雄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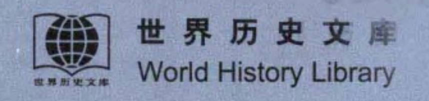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http://www.c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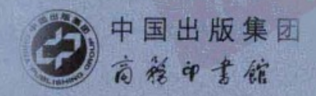


意大利简史

——从史前到当代

〔意〕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 著　沈　珩 祝本雄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Sommario Della Storia D'italia: Dai Tempi Preistorici Ai Nostri Giorni
Luigi Salvatorell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简史／（意）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9996-7

Ⅰ．①意… Ⅱ．①萨… ②沈… ③祝… Ⅲ．①意大利—历史 Ⅳ．①K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667 号

责任编辑 杜廷广
装帧设计 熊 熊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45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

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译本前言

经过数年艰辛，终于能将《意大利简史》中译本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作为本书的两名译者，我们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就像是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在国内的出版业中，介绍意大利的历史文化的书籍可谓不少，有涉及某一人物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文化现象的；国内读者对意大利的情况也有所闻，所知，或知之甚多的。但迄今为止，却缺乏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简明而深刻的历史著作，可以使读者无须费很多时间，花许多工夫，便能轻捷而愉快地周游意大利的全部历史时域，并能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出清晰的思绪，从世纪更替中得出合乎理性的结论，进而对中西文化、历史事件和活跃在各个时期的主角们做出有趣的对比。我们经过多年的寻求，反复的比较，最后选定了由意大利最具权威的史学家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编著的《意大利简史》。该书的特点恰恰符合我们的上述愿望，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书中的优点越来越明显，每每令我们感叹作者化繁为简和驾驭史料的非凡的能力。

《简史》的时间跨度，上起意大利半岛地理位置的形成，下止于1967年意大利的大选，中左政府的组成，融数万年于一瞬；史书所涉，凡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洋洋洒洒，林林总总；活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无一遗漏，如同轴线贯穿其中。作者弘扬伟大，指斥渺小，将

各代君王、教皇的自私、可耻行径暴露无遗。在他的“太史公”笔下，历史上伟大的益发伟大，光辉的愈加灿烂，丑陋的更显出丑态。不管意大利在历史上是多么的四分五裂，备受外国统治和奴役，但作者反复强调一个基本事实：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意识，到处一致、普遍存在，永不湮灭，意大利终究会统一的。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是意大利著名史学家，林琴科学院院士，生于1886年，卒于1974年。大学毕业后在公共教育部任职；1916年离开教育部去那不勒斯大学任教，主讲教会史；1921至1925年为都灵《新闻报》政治主编，开展反法西斯运动；1925年后离开报社从事学术研究。1942年参与创建反法西斯的“行动党”，1946年“行动党”解体后，一直为《新闻报》撰稿。萨尔瓦托雷利博学多闻，精于欧洲史和教会史，写了许多材料丰富，有独到见解的著作，主要有：《民族法西斯主义》、《国际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1700年到1870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复兴运动的思想和行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意大利》、《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史》、《意大利简史》、《欧洲史概述》、《战后教廷政策》、《法国革命迄今的教会和国家》，等等。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国内各译本的译名的不统一，同一历史名人，有多种译法。为了规范化，我们尽可能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历史词典》中的译法，在该词典中查找不到的，则按意语发音规则译出。

本书能得以出版，是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分不开的。这无疑是为关心意大利史的读者和中意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大贡献。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翻译中，译者虽然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多赐教、批评。

译者

1993年5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征服

1　地理形成和地理环境

意大利半岛是在第三纪形成的。早在上古地质时期在海底形成的阿尔卑斯山概貌和某些形成一系列群岛的半岛地区，在始新世四个时期的第一时期，既已各就其位。上述部分在上新世（第三纪的最后一个时期）相继露出水面，连成一体，于是形成了意大利的阿尔卑斯-亚平宁骨架；然而，像波河平原那样的广大地区仍没于海中。第四纪，火山爆发和冰期现象才出现平原。继冰期之后，形成了目前的气候和动植物。

意大利半岛是地中海三大半岛的中间一个，位于东经七度至十八度和北纬四十七度至三十八度（如包括西西里则三十七度）之间。形状狭长，从西北到东南长约一千二百公里；陆地边界线长约一千九百公里，海岸线约四千二百公里，如果包括岛屿，约为八千五百公里，海岸线虽漫长，却不如希腊半岛那样犬牙交错，斗曲蛇行，且多良港。大陆部分与中欧接壤，而半岛及西西里部分以其伸延窄长的体态几抵非洲大陆（从前与大陆是连成一体的）。其东岸与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西有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相守，与伊比利亚半岛遥相对应。大陆部分（波河流域）为一长方形大平原，交通便利，水源充沛，适于耕

种，商贾往来，各城郭间四通八达，村镇辐辏。半岛部分狭长，又缺乏便于交通的中间城镇，使得亚平宁山和大海之间极其狭窄，缺少空间，尤其临亚得里亚海的那部分，更是局促。亚平宁各山隘关山阻隔，孤村散居，与世隔绝；河流短促，水流细而湍急，土地干旱，不宜农业生产。

阿尔卑斯山把意大利和欧洲大陆一刀切开。然而，为数众多的横断山口为北部、东北部、西北部的交往提供了通道；不过，阿尔卑斯山内陡峭外平坦，由北而南比之由南而北更易，也即是说，由邻国人意大利易，由意大利进入邻国难。

2　原始文明和原始人群

迄今经过查实的意大利人类生命的第一个证据是在奥特朗托地区发现的。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也即粗旧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意大利居民生活于洞穴里，周围常有巨型厚皮动物（象、犀牛、河马）出没；后来，这些厚皮动物在欧洲逐渐消失。几乎在整个意大利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痕迹（各岛上未找到其遗迹）。在罗马附近找到的萨科帕斯托颅骨，一种“原始人”或称尼安德特人头盖骨，就属于这一时期，离现代人（智人）还很远，与类人猿十分相近。不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级人类，在阿雷佐发现的奥尔莫人颅骨即属此类。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分布在意大利三个地区（北部、中部和南部）和各岛上：奥特朗托地区（罗马内利洞穴）和利古里亚最西端（在格里马迪市镇的巴尔齐·罗西）遗迹尤丰，我们在那里找到石器、骨器以及粗糙雕刻和祭祀死人的痕迹。几乎没发现任何陶器。格里马迪人属尼格罗人种（黑人）；除上述人种外，我们还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高级人种，克罗马农人（古人）和马耶拉人种——地中海前期人种之一。

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或磨制石器时代）在整个半岛和各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了游牧和制陶，一些人认为，

游牧和制陶是外来入侵民族引入的；另一些人认为，尽管受外来的影响，还是当地经年累世渐进所致。我们还发现各种不同的人种，有颅骨较长的，也有颅骨较短的。利古里亚人——史书谈及的意大利古老民族之一——可能属于新石器文化时期；与有史时期不同，这一民族分布于意大利广大地区；西库里人——以后各时期西西里的居民，或者（据另些人说）埃利米人——西西里岛上的最古老的居民，也许和利古里亚人相近似。这种利古里亚人大概属于所谓地中海人种。某些人倾向于认为利古里亚人是更近些的人种，是青铜时代人，也许讲印欧语。

纯粹新石器时代遗迹在意大利极罕见；在发掘出磨制石器的同时，有铜器存留，于是有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说法（或者正如今天有些人喜欢称之的新铜器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石器、铜器和制骨业，陶器饰以彩绘，可以说萌发了艺术的倾向。宗教祭祀更趋发展。这一时期的遗迹在整个半岛和三大岛都有出土。在普利亚遗存有很有特色的史前巨石文物，亦即石室、冢墓（做神龛用的横竖石条）。在撒丁岛，开始用石块垒成平顶圆锥状建筑物，这一建筑形式继续到青铜器时代，止于有史时期。茅屋取代穴居，集而为村，围以石墙，护以深壕。墓冢相比邻。商业交往日益频仍，开始了采矿活动。讲究装饰，出现了造型艺术。许多人士认为，这期间有了第一批雅利安移民，或者原始意大利人。西库尔人和拉丁人可能就属于这些人。

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建在湖上或沿湖土台上的草屋，草屋围以栅栏。湖上草屋一直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远离水域的沼泽地上出现的抹泥草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后者渊于前者，但大大跨前一步，其房屋群范围大，排列规则，形成城市雏形。住在湖上草屋的居民和泥屋居民，都从事农业种植，烧制新型陶器，至少后者实行火葬葬礼，而不是如前期居民那样实行土葬。

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认为，湖上草屋居民和陆地泥屋居民代表古意大利人蜂拥移民的第一批核心（先锋），他们离弃印欧原始群体，越过北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伦巴第和艾米利亚北部一直推进到

海峡。今天，这一观点已被放弃，因为与湖上草屋和陆地泥屋居民同时代的，还有一系列印欧人，他们也是古意大利人（在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器时代），足迹已遍及半岛全境：西边，靠第勒尼安海山坡一带为更古老的非印欧人（埃特鲁斯人）；更南边，在拉齐奥，为非古意大利的印欧人，即拉丁人（原始拉丁人），他们近似西库里岛民；东南山坡，即现今的普利亚一带，居住着另一些非古意大利人的印欧人——梅萨比人——他们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来自伊利里亚）。在意大利大陆西北，居住着古意大利人中最古老的利古里亚人，他们是非印欧人，其足迹甚至远至普罗旺斯海岸；在东北一带，活动着另些印欧人——威尼托人，其生活范围直达伊斯特拉半岛。由此推断，首批古意大利人迁徙不是由北而南，而是自东向西，主要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伊斯特拉）。今天，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也不排除（我这么认为）部分移民也可能来自北方。其实，最近已被人广为接受的另一见解认为，一次性的大量移民涌入的看法也许行不通，最好采用多次的、同时的或前后相间的移民看法，尽管如此，这一看法不应迫使人们（正如某些人打算的那样）认定移民是对我们称之为土著人的简单“渗透”。印欧移民分两期进入意大利则是无可争辩的，原始拉丁人或拉丁-西库里人为最古老的移民代表。土著人的存在，拉丁人和古意大利人之间又自始至终存在着语言和种族的明显区分，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观点。

埃特鲁斯人同拉丁人、古意大利人之间的差异更加明确，前者和后者也不存在我们在拉丁人和古意大利人之间找到的相似之处，尽管主要是在语言上的差别，而且文明也迥异。

自古迄今，关于埃特鲁斯人之“谜”——首先是因为我们尚不能破译其语言，肯定不是印欧语——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埃特鲁斯人属于来自小亚细亚，尤其是来自吕底亚的居民。长期以来，这种解释颇占上风。这一论点主要是依据利姆诺斯的一块著名碑文，碑文的文字特点与埃特鲁斯文极近似。

第二种解释：埃特鲁斯人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面，代表湖上草屋居

民和泥屋居民，他们作为先头部队滞留在第一批夺取的位置上。

第三种解释：土著人（就其相对意义而言）。而今，我认为这后一种解释影响更广，肯定会取胜，因为它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截然分开。第一阶段为原始孤立阶段，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按古已有之的习惯名称——第勒尼安阶段；第二阶段是名副其实的埃特鲁斯阶段，这时土著人已有可观的发展，已和其他种族，甚至半岛以外的民族发生关系，互相影响；嗣后，经由陆路和海路大肆扩张，形成人们习惯称之为的埃特鲁斯帝国。此词不确切，因为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埃特鲁斯国，即使是就其极松散的邦联形式而言；埃特鲁斯人只不过是些死抱各自特性的群体而已。

继青铜器时代，是铁器时代。在意大利领土上，从皮埃蒙特到普利亚广泛地分布着代表这一时代的废墟。所谓的维拉诺瓦（在波洛尼亚附近，那里发掘出一极具代表性的墓葬）文明的废墟，尤为重要。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也有铁器时代的发现。这一时代划分为四个阶段，起于公元前九世纪，止于公元前六世纪。这样，我们完全进入有史时期。维拉诺瓦和铁器时代的其他北方部落文明体现在实行火葬；相反，皮切诺以南另些部落实行土葬。在亚平宁西部，维拉诺瓦文明波及台伯河北岸的拉齐奥，而在河南岸我们发现了铁器文明的另一种类型，称“拉齐奥”类型，其特征是，先期施行火葬，随后火土葬混合。在罗马的帕拉蒂诺、埃斯奎利诺、奎里纳莱山丘上和古罗马广场遗址上发掘的墓穴，即属于这种拉齐奥文明。

大约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希腊哈尔基季基人在西西里建立了纳索城，科林斯人兴建了叙拉古城，于是开始了希腊在西西里的殖民活动。纳索城人创建了卡塔尼亚城。叙拉古后不久，可能又在现今的那不勒斯附近破土筹建库迈城。嗣后，库迈又建了赞克莱城（即墨西拿）。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半岛东南沿海的殖民化。这期间建成了梅塔蓬图姆、锡巴里斯、克罗托内、洛克里伊壁犀斐里等城。根据传说，塔兰托似乎建于公元前708年，也有人认为，该城大约成形于希腊殖民化初期，由斯巴达人所建。公元前七世纪下半叶，在西西里还

出现了塞利努斯城；公元前六世纪初，有阿格里琴托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于那不勒斯海湾先后出现迪切阿尔基亚（波佐利）和内阿皮利，或称“新城”（之所以称为“新城”，因为它离“旧城”“帕莱波利”很近，后者或许就是帕尔泰诺佩）。

腓尼基人很快步希腊人后尘。公元前七世纪时，腓尼基人在马耳他境内浪迹。西西里的巴诺莫（巴勒莫）和索龙托渊源于腓尼基人。公元前六世纪，西西里西海岸属迦太基人——定居于非洲的腓尼基人。撒丁岛上的腓尼基殖民都市最古老（公元前八世纪）：南海岸的卡拉里斯（卡利亚里）和西海岸的塔罗斯均由腓尼基人兴建。公元前六世纪时，我们可以说迦太基人或者布匿人，而不应统称为腓尼基人。

3 意大利史前人种概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公元前650年前后的意大利人种分布图。意大利西北部（今天的皮埃蒙特、利古里亚，直至阿尔诺河的托斯卡纳西部）生活着利古里亚人。在威尼斯居住着属伊利里亚人的威尼托人。自波河北至阿尔诺河广大地带，翁布里人杂住于利古里亚人和威尼托人之间。埃特鲁斯人活跃于阿尔诺河到台伯河一带；台伯河以东以南，翁布里人（直至亚得里亚海）、萨宾人、拉丁人在那里生息繁衍。在阿布鲁佐亚平宁山一带居民是由各支萨贝利人（萨贝利是意大利古称）组成，其中数萨谟奈人最为杰出。古意大利语主要分成两支：托斯卡纳语和翁布里亚语。从拉齐奥南部至半岛最南端，聚居着奥斯坎-萨贝利人、沃尔西人、奥隆奇人、坎巴尼亚人、卢卡尼亚人、布鲁齐人。在普利亚，散居着另一种伊利里亚人——雅皮吉人。希腊殖民者定居于意大利南部海岸，西西里大部也为其所霸占。然而西西里西部则为腓尼基人（后为迦太基人）的天下，而西库里人和西坎人坚守其中部。

希腊文明和埃特鲁斯文明占主导地位，我们在希腊城市和埃特鲁斯城市中也找到了更发达的政治形式。我们认为埃特鲁斯文明大多源于希腊文明。尽管如此，也存在着某些纯古意大利文明成分，“卡皮

斯特拉诺武士”巨雕就是其典型代表。具有宗教礼仪特点的“伊古维翁铜表”（公元前三——前二世纪）是更为重要的文物。西切利奥蒂人和伊塔利奥蒂人（定居于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或大希腊的希腊人后裔的称呼）的文明与希腊本土文明相差无几。其基本形式仍是城市；纵使形成更广阔的国家，仍是一种城市的集合体。看来在伊塔利奥蒂城和西切利奥蒂各城尚无国王君临天下（在意大利诸城亦如此），那时古意大利人用梅迪克斯[1]这一公用名词来尊称所有的政府首脑。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土地贵族总揽大权；尔后，豪门贵族与其相抗衡，欲争高下。这些阶级的政治地位因城而异（在克罗托内，土地贵族占绝对优势；在锡巴里斯，商人独领风骚）；这导致成为大希腊历史的基本特征的各城间的争端。锡巴里斯和克罗托内之间的对立尤为著名。贵族霸权时期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抗已成普遍现象，平民力图获取法律面前的平等（从而把立法归因于三位传奇人物：在洛克里的扎琉科库斯、在卡塔尼亚的卡龙达斯、在叙拉古的狄奥克莱斯）和参政权。正如在希腊，同贵族的对抗有助于“僭主”的产生，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僭主”横行于西西里各城市（传说阿格里琴托的法拉里斯因施用烧红铜牛的刑罚而臭名昭著）。在意大利南部，“僭主”政治没有发展余地，这要归因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在梅塔蓬图姆和克罗托内出现的以其创始人、导师、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为崇拜偶像的毕达哥拉斯教团。

大希腊是昌盛文化的发源地。前面已提到的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30年居留在克罗托内。希腊另些哲学家来到伊塔利奥蒂诸城，如色诺芬尼和巴门尼德抵达埃利亚城。稍后，在希腊意大利土壤上诞生了自己的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时，阿格里琴托的恩培多克勒提出“四要素”理论，他同时也是医生和自然主义者（那时克罗托内医学相当发达）；同一世纪，埃利亚的芝诺继续埃利亚学派。这一学派认为，思想是静止的（变化是感觉的蒙蔽），存在是唯一的，而克罗托

---

① 梅迪克斯：地方行政长官。——译者

内的菲洛劳斯继承毕达哥拉斯学说，他把世界理解为一种算术关系的总称。宗教运动不起源于大希腊，但那里富有神秘唯灵论色彩的俄尔甫斯教极为流行，该教旨在把人们的灵魂从躯体和灵魂的轮回中解救出来。当地的文学创作活动种类繁多。抒情叙事诗人西切利奥蒂人斯特西科罗斯（公元前六世纪），吟唱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到意大利的行程。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迈加拉希布利亚城的埃庇卡摩斯创作了多利安喜剧。下半叶，叙拉古的索福罗尼乌斯（索福克勒斯）发表了再现西西里平民和农夫生活的滑稽剧。同世纪的修辞学大师莱昂蒂尼的戈尔加斯也是西西里人，他把修辞学与所谓的诡辩哲学结合起来，无愧于诡辩哲学最非凡的大师。与戈尔加斯同代的普洛塔戈拉寓居锡巴里斯附近的图里。

艺术，特别是西西里的宗教建筑艺术，开放出绚丽多彩、光艳照人的花朵。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公元前六世纪初，在塞利努斯、阿格里琴托、叙拉古出现了第一批简陋的寺宇；公元前六世纪时，大兴陶立克式大型寺庙建筑，这些建筑在大希腊、塔兰托、波西多尼亚（或者帕埃斯图姆）也有发现。随着建筑业的兴盛，雕刻装饰也应运而生，塞利努斯的排档间饰尤为著名。公元前五世纪，建筑和雕刻继续演进，尤其到了下半叶，形式变得更为精细，标志着拟古主义向古典主义的过渡（塔兰托的德梅特拉）。公元前五世纪末，克罗托内产生了伟大画家宙克西斯。陶器装饰画十分流行。工业艺术在陶器皿上有广泛的应用；货币上，特别是在西西里诸城货币上的艺术装饰，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这样，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在希腊文明中占有很大分量。希腊文明的主要特点在于精神世界的自主的高度发展，它深入研究探讨精神志趣和理想，政治制度类型，艺术和科学方法，理性思辨，无偏见的科学研究，作为市民活动的国家，美的崇拜，达到个人高度完美的形体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这一切均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埃特鲁里亚地区围以城墙的城镇，也是集体生活的基本核心。我们尚不清楚维拉诺瓦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受

希腊城市的影响。在埃特鲁斯各城，执政的是选出的国王，或者有任期，或者为终身；贵族阶级成员被称为卢古莫尼[①]。那里有了部落和氏族的萌芽组织：在曼托瓦存在着三个氏族，每个氏族分成四支。其联邦倾向比在大希腊和西西里更为强烈。直到罗马征服前，历史上的埃特鲁里亚一直维持着十二城市的联邦体制；所说的十二城市，只是概而言之，也许与实际不大相符。也不必夸大其联结的坚固性，而且宗教因素多于政治因素：每个城市不仅维持着内部的充分自主权，对外的政治独立，并有权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然而，在埃特鲁斯各城，保持原始家族团结的意识是相当清晰的。

埃特鲁斯文明自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进入鼎盛期，大部分渊源于希腊，人们认为，其文明只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做了某些外在的技术上的改动，其精神实质原封不动。丰富的碑文所记载的表明埃特鲁斯文字迄今仍是个谜。以贵族-富豪社会生活为特点的埃特鲁斯生活主要从古墓出土的塑像、浮雕、丰富的艺术制品（大部分源于东方）和壁画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当时的壁画绘画技巧虽仍沿用希腊的，但对阴间景象的描绘却取材于埃特鲁斯高度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埃特鲁斯宗教不同于希腊，其偶像为恶魔，面目恐怖可憎，尤喜以祭品的肝脏来占卜凶吉，这与古代东方的预卜极其相似。埃特鲁斯文明首先体现在建筑（拱形的使用）和公共工程（道路、排水渠）中。

4　埃特鲁斯的扩张和罗马的起源　希腊人　迦太基人　古意大利人

公元前七世纪，埃特鲁斯商业突飞猛进，商业的繁荣导致攻城略地和殖民占领。往南，埃特鲁斯人先是在拉齐奥（在阿尔代亚、拉努维奥、安齐奥、韦莱特里、奇尔切伊）站稳脚跟；其后，指向坎帕尼亚，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和公元前600年之间，建成卡普亚城。在西地中海，与迦太基人结盟，插足科西嘉。往北，攻占费尔西纳（即后

① 卢古莫尼：埃特鲁斯语，意为首领、王子。——译者

来的波洛尼亚城），随后将殖民扩展到整个波河平原。向北扩大殖民地晚于向南约一个世纪。除费尔西纳外，意大利北部城市曼托瓦和梅尔蓬（梅迪奥拉努姆）确为埃特鲁斯人所建。那里是否出现过十二城联邦，尚无定论；坎帕尼亚区是否有过，也令人怀疑。

罗马起先是游牧人阿尔巴隆加人的殖民地，位于帕拉蒂诺山丘上，其起始年代大约和“罗马的建立”（公元前754年）的传说中所说的差不多。或许是萨宾人在帕拉蒂诺对面的奎里纳莱上营造了另一居处，两者连成一片。拉丁人在帕拉蒂诺早就开始了建房造屋，先后造成了切尔马卢斯村、帕拉图阿尔村和韦利亚村，这三个村庄后又同埃斯奎利诺山上的法古塔尔村、奇斯皮乌斯村、奥皮乌斯村以及七小山（以便不同后来的七丘相混淆）联盟中介于中间的奎尔奎图阿尔村连成一体。所谓的前几位国王搞的国体——三百元老组成的元老院、三十个行政区域、三个部落——是不符合时代的；所谓的其前期对外征夺至少大部分也应被认为是荒唐的。尽管如此，下面情况应认为属实：在位于卡沃山上的朱庇特庙的拉丁神圣同盟里，罗马第三任国王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摧毁阿尔巴隆加之后取而代之。神话还将主要宗教制度的建立归功于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利乌斯，其传说与罗马城创建者罗慕洛斯同样盛行。罗马七小山联盟建成后，与奎林纳莱和萨宾的维米纳莱合并，而坎皮多利奥建成卫城，成为扩大的联邦的宗教中心。不过不少人认为，没有坎皮多利奥的参加，七小山联邦就不存在。

有人认为，从神话中的罗慕洛斯（显然该名来自罗马，罗马此字的词源仍不明确）到安库斯·马基乌斯为王政时代第一阶段内，罗马为萨宾人所统治，这种说法还解释了拉丁都城阿尔巴隆加毁灭的原因。继萨宾时期后可能是埃特鲁斯时期，即第一、第二塔克文治理下的埃特鲁斯王朝，在这两任国王的统治下，罗马在拉齐奥确立其至高无上的主宰权。罗马从来不是埃特鲁斯城。在第一和第二塔克文（有些人认为这二任国王为同一个人）期间，罗马正值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神话把罗马的初期建设和第一道城墙归功于他，他也代表对埃特鲁斯统治的第一次反抗。无论如何，埃特鲁斯文化对罗马文明的起

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宗教、家庭构成、武装力量、度量、商业准则、语言和字母上。束棒[①]也起源于埃特鲁斯。在王国时期，希腊的影响和埃特鲁斯的影响水乳交融，相映成辉，因为希腊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埃特鲁斯文明里。

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当埃特鲁斯人同迦太基人结盟，发动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海战，并在科西嘉的阿莱里亚大败来自福西亚（现今的马赛）的希腊人（公元前540年?）之后，埃特鲁斯的占领似乎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实际上，这些攻城略地寿命极短，因为仅是单个城市或一些城市的雇佣兵进行的，他们之间缺乏互相配合。大约公元前525年，来自库迈的希腊人重创埃特鲁斯人；公元前506年，库迈人协助拉丁人于阿里齐亚惨败埃特鲁斯人，这一败北标志着埃特鲁斯在拉齐奥统治的完结。公元前五世纪初，在僭主希伦统治下的叙拉古人挥戈北上，无疑对埃特鲁斯帝国野心和其盟友迦太基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他们夺取了岛的整个东海岸，并在希梅拉全面击溃迦太基军队（约公元前480年）。其弟希冷于公元前478年继承王位，把对埃特鲁斯人的战斗推向半岛，于库迈附近击败其舰队（公元前474年）。从此，埃特鲁斯的制海权江河日下，走向没落。

然而，希腊人并没抓住埃特鲁斯没落的有利时机来巩固并发展其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正当应该和迦太基人算旧账并清算土著人的反叛时，他们内部意见相左，各持一端。希腊相邻城市间的纷争祸及锡巴里斯，使这座由克罗托内于公元前510年建造的城市毁于兵燹。希冷亡后（公元前466年），在叙拉古爆发了民主革命，导致西西里诸城摆脱叙拉古的桎梏，重新确立其独立。这场革命也波及意大利南部，公元前460年，在克罗托内和梅塔蓬托，毕达哥拉斯教团的贵族政府被推翻。即便在民主革命之后，叙拉古照旧在意大利水域推进其行动，大约公元前452年进犯厄尔巴岛、托斯卡纳海岸和科西嘉岛。但是，在西西里，叙拉古还要应付西库里人要求摆脱希腊统治并企图建立一

① 束棒：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束棒中有一柄突出的斧头。——译者

个由杜克提乌斯治理的自己的王国，但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60—前440年）。

在意大利大陆，古意大利人卢卡尼亚人远比西库里人幸运。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他们建立起邦联体制，占据了大约八千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南部意大利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公元前五世纪，萨贝利部落的扩张对希腊文化构成更严重的威胁。萨贝利人乃山野之民，好战成性，直到罗马占领前在萨宾和萨及奥一直维持落后的政治社会组织状态，即以自然村落群为组织形式，奥古斯都时期在中亚平宁的某些地段仍保持这一组织形式。萨贝利人冲出他们栖息的山地涌向拉齐奥和坎帕尼亚平原，直捣利里河谷；将翁布里人从亚得里亚海沿海一带赶走，入侵普利亚，使雅皮吉人无立锥之地；作为反击，雅皮吉人把矛头对准塔兰托的希腊人，将其击败（公元前473年或公元前471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萨贝利人和卢卡尼亚人对希腊人施以重压。萨贝利人在公元前438年（据另一史料是在公元前424年）夺取卡普亚，公元前421年占领库迈，建立坎帕尼亚国或奥斯坎国。

大约公元前444年，雅典建立图里城以取代锡巴里斯，向那不勒斯派遣大量殖民移民。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推行的种种活动无助于希腊文明的再度兴起。雅典向多里安人的叙拉古扩张，从而酿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公元前415至公元前413年，雅典浩浩荡荡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迦太基人趁希腊人衰落之机，在西西里大肆扩张，于公元前409年攻占塞科努斯，公元前405年夺得阿格里琴托。叙拉古在大狄翁尼西乌斯的率领下起而反叛，于公元前405年他成了该城僭主。他发动多起战争反对迦太基人，由于他忙于征服西西里诸城和试图向意大利扩张，未能将战争打到底。在意大利，希腊诸城结盟对抗卢卡尼亚人，但无法阻止其前进：公元前400年，波塞多尼奥斯落入他们的手中。大狄翁尼西乌斯非但不支持希腊人，还同卢卡尼亚人结盟，在埃勒波罗（或者斯蒂拉罗?）击败希腊人（公元前389年）。建安科纳城，在亚得里亚和伊萨设定居点，以图称霸北亚得里亚海；同高卢人（下一章讲到）结盟，同威

尼托人建立关系，远征托斯卡纳海岸和科西嘉，图谋统治第勒尼安海。这一好大喜功的政策将叙拉古的元气消耗殆尽，使之无力把迦太基人逐出西西里。一场新的战争非但没有驱走迦太基人，甚至把直至普拉塔尼的整个西西里西部拱手让给迦太基人（公元前 382 年）。随后，大狄翁尼西乌斯在大希腊重开战事，攻占克罗托内（公元前 379 年），紧接着又向迦太基开战，但未决胜负。大狄翁尼西乌斯死后（公元前 367 年），其子小狄翁尼西乌斯继位，但他无力控制局势，叙拉古长期陷入混乱；公元前 343 年，提摩勒翁从中干预，恢复自由政体，从而结束混乱局面。提摩勒翁于克里米索战胜迦太基人，进而从僭主和其同盟者手中解放西切利奥蒂诸城。与此同时，古意大利居民继续向意大利南部扩张；大约公元前 350 年，布鲁兹人建立同盟，联邦首都选址科森扎，希腊领土逐渐缩小。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塔兰托多次呼吁从希腊祖国向意大利派遣首领（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穆斯三世、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莫罗索斯、斯巴达的克雷尼莫），但这些首领都无所作为。

5　布匿战争前罗马内部的政治生活

罗马王政时代的没落（传统日期是公元前 510 年）与埃特鲁斯在拉齐奥统治的终结，大体同时发生，这两者或许是有联系的。但是普尔塞纳传说揭示，在共和国初期埃特鲁斯在罗马仍占优势。共和国第一阶段，罗马城的力量似乎有所削弱，与半岛的文化发展相隔绝：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影响近于消失。

和在希腊、意大利一样，罗马王政时代的解体，总是伴随着贵族的胜利。在第一共和国时期，罗马分为贵族——形成各种家族集团，即有着共同的血统的“氏族”——和平民。贵族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而平民从人格上是自由市民，但不参与国家管理。门客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但不具备明确的政治面貌和政治作用（也许来自平民），他们是一群属于这一贵族家庭或那一贵族家庭的人们，既受他们保护，又为他们服务。贵族和平民联合于“库里亚”（地区，地区设地区大

会），各“库里亚”集结成“部落”。起初部落为三，每一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战时，每个部落有义务提供步兵和骑兵。商议公共事务的全体市民会议形成公民大会；范围较窄的会议为元老院，起初只由贵族独占；元老院操纵决策大权。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出三名具有行政权的长官，任期一年，最初被统称为大法官。后来，这三名大法官的作用有了区别，其中一名仍保持原称，负责司法管理，另两位易名为执行官，统率大军，驰骋战场、处断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事务（另有人认为，大法官为后来所设）。政法官有权召集会议以及为公民大会提出法律和其他决策方略。危机时刻，设独裁官，有特殊权限，但任期最多不超过半年。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直至公元前三世纪头几十年，罗马内部历史就是一部平民反对贵族、要求改善经济状况（小所有者对富裕贵族的债务日益加重）、争取政治权和公民权平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率领平民的是“平民护民官”。起初，各部落的首领理应当平民护民官，而各部落的民众被划分到罗马郊外农村（按照一种替代以村为单位的古老行政划分的组织形式）。护民官后来又从当地农村首领转变为城市政法官，成为平民的官方代表和保护人。初始，好像有这一身份的护民官只四人，尔后一直增至十人：其权力基础在于“代民请命”权，基于该权，他们能延缓政法官法令的执行，推迟民众大会的召开，使元老院决定搁浅。其人格不可侵犯。

在护民官的率领下，平民为公民平等发起了第一次战斗，获得了编纂习惯法权利，而直到那时为止，它一直是由贵族擅自编造的。编纂工作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十人政法官组成的特殊政法机构，其任期为两年（公元前451—前450年），从而产生了“十二铜表法”。不久，平民获得了同贵族通婚权（公元前445年），“有执政官权限的军事护民官”被接纳进新的政法机构（公元前444年），并不时被选举到执政官的职位上。

高卢焚烧事件后进行的军事改革，导致产生一种基于财产调查的新的组织形式。市民按财产多寡依次分为五个阶级，每一阶级拥有数

个百人团；赤贫者（无产者）为第六阶级，无服兵役义务。为军队输送骑士的百人团高居各阶级之上，而步兵从其他百人团抽丁。由监察官组成的专门机关编制市民花名册和各阶级之注册。这种以百人为单位的体制有利于人民大会，标志着国家的根本变革，因为用包括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财产所有的调查代替了以（贵族）血统为标准的划分方法。然而较富有的阶级仍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拥有数量较多的百人团，而每个百人团为一单位可投一张选票。

平民获得政治平等后，被允许担任所有职务，其中包括执政官职务（公元前366年），霍滕修斯法的颁布（公元前287年）为其取得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该法规定，平民在部落集会上所做出的决议与百人团会议上的决议有同等效力。尽管如此，罗马共和国仍保留着贵族政治的性质，因为元老院和执政官仍握有领导权。事实上，后者——不能是其他人，因为他们是无报酬的——继续从高等阶级中挑选。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贵族阶级，一般贵族和上升到高层的平民的混合物。

6　罗马在拉齐奥霸权的形成

看来这些内讧非但没有削弱罗马国，反而刺激其对外扩张行径，因为就在内部纷争的同时，罗马确立了其统治，开始了王政时代的最后时期。不是经久不衰的、独一无二的统帅，而是在共和国自由范畴内形成和持续发展的一个政治阶级，给罗马带来了活力和幸运。首要的成果是在拉齐奥地区其他拉丁城市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取得首先归因于罗马城的天时地利和繁荣的商业。公元前五世纪，对罗马来说，是个充满了边境骚扰、烽火连天的时代。城东北，同萨宾人干戈相加；南边，同埃魁人、沃尔西人争斗不息。罗马人、拉丁人和赫尔尼基人结盟对抗，战争告捷，将敌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版图，另些敌对城市被迫进入拉丁同盟。旋即在台伯河以北，罗马同埃特鲁斯人交战，在几公里外的维爱，两军陷入苦战，打得异常激烈。公元前四世纪初攻陷该城，这对罗马国的扩张具有重大意义，因拿下维爱

后，罗马国的面积达二千二百平方公里。

促使埃特鲁斯另些城市纷纷抛弃维爱城的原因是其内部危机加剧，贵族颠覆了君主政体，接着又忙于和平民阶级较量。但是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应归因于高卢人的入侵。源于印欧血统的高卢人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四世纪初占据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区后，长驱直入，穿越西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占领波河流域，制伏埃特鲁斯诸城。因苏布雷人定居于梅迪奥拉努姆，塞诺马尼人驻守布雷西亚，费尔西纳为博伊人所占，该地后更名为博诺尼亚。塞农人从波河地区向意大利中部推进，几抵亚平宁东的安科纳，向西越过埃特鲁里亚，于阿利亚河附近击败罗马人，攻克并焚烧了罗马城（公元前 387 年）。罗马人付了一大笔赎金后，才从残余的废墟里得以苟延残喘，罗马人得救还应感谢迫使塞农人撤回其要塞的其他一些原因。城市惨遭高卢人焚烧后，才修起了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也许以前就已存在），并完成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军事改革，变埃特鲁斯方阵为由支队组成的波浪式前进的三阵线。

摧毁罗马一开始就激起各拉丁城市的同仇敌忾：图斯库卢姆加入罗马国。大约公元前 368 年，成为各城市反高卢典范的罗马，高举大纛，重建在其霸权下的拉丁同盟，把许多沃尔西城囊括进去。在拉齐奥南部籍没的土地上设置罗马部落，同萨谟奈及卡普阿订立联盟使罗马确立了对拉齐奥的绝对优势。由法莱里亚、塔尔奎尼亚和塞雷掀起的埃特鲁斯反叛也归于失败，塞雷作为自治城并入罗马。高卢人的多次侵凌也被击退。

称霸拉齐奥后，罗马面对的是包括彭特里、考迪尼和赫彼奈的萨谟奈邦联，该邦联辖地从奥尔托纳到加尔加诺的亚得里亚海岸和从阿马尔菲到西拉罗间（塞莱）的第勒尼安海岸，总面积为一万八千至二万平方公里，因此，就其广度而言，是意大利第二政治实体，仅次于埃特鲁斯联盟，但地广人稀。萨谟奈部落实行农业、牧业和军事民主：土地所有者基本平等，极少有无产者和奴隶。但是由最高政法官管理的邦联，其约束力很脆弱。邦联寻求对外扩张，抵达利里河谷，进入

坎帕尼亚，与早先定居于此的同一血统的但很大程度上已希腊化的当地居民（见第 4 节）相遇。其中卡普亚因有坎帕尼亚联盟而最强。坎帕尼亚人依恃罗马-拉丁同盟，于是有了第一次萨谟奈战争；战争失利，萨谟奈人放弃夺取卡普亚计划，卡普亚转而加入罗马-拉丁同盟。然而，现在，拉丁人重新更激烈地对抗罗马人，因为罗马人越来越表现出目空一切，以主人自居，拉丁人与坎帕尼亚人结盟兴兵讨伐。在西努埃萨和明图尔诺之交的特里法诺罗马大胜（公元前 340 年），于是解散拉丁政治同盟，只让其作为宗教联盟存在，并同各拉丁城市分别调整关系：某些城市变为罗马盟友（蒂沃利、普雷内斯特），另些城市划归罗马国，保留内部自主权。坎帕尼亚人必须割让其一部分领土，降格为无政治权利的罗马公民，只有卡普亚一部分贵族被准予有政治权利。

7　征服意大利半岛

罗马人通过一场战争逼迫希腊的那不勒斯加入其联盟——那不勒斯是希腊在意大利中部的商业中心，同意给予有利的条件（公元前 326 年），从而加强了其在坎帕尼亚的地位。征服那不勒斯挑起第二次萨谟奈战争。战争中罗马人同其在萨谟奈背后的普利亚盟友（阿尔帕尼人）建立了联系。尽管罗马人在福切·高迪内惨败（公元前 321 年），但却占领了卢切拉，巩固了其在普利亚的地位；萨谟奈在拉齐奥发起反攻，于泰拉奇纳和丰迪之间的劳图莱获胜（公元前 315 年），却动摇不了罗马国的总体实力。后来罗马人洗刷前耻，凯旋利里，沿亚得里亚海山坡大筑要塞，孤立萨谟奈人。

然而，意大利另一些人赶来援助萨谟奈人，于是开始了某些人称之的（未免太早了）意大利独立战争。公元前 312 至公元前 304 年之间，萨谟奈人、赫尔尼基人、埃特鲁斯人和翁布里人一起向罗马人开战。公元前 306 年，罗马人击破赫尔尼基联盟：阿拉特里、费伦蒂诺、维洛里被迫加入罗马联盟；阿纳尼完全变为其属地。公元前 304 年，萨谟奈人要求媾和。这时，罗马及其联盟的领土已达二万七千五百平

方公里，其中八千一百平方公里为罗马国领土；这两个数字之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罗马霸权增长之速。公元前300年，萨谟奈人同翁布里人、高卢人、萨宾人、卢加尼亚人结成更广泛的联盟，再次举兵。然而联盟缺乏领土和政治的协调性，背叛变节层出不穷；而罗马自治城、殖民地和多数盟友仍忠诚于罗马。此外，罗马人同马尔西人、马鲁奇尼人、彼利尼人、费伦塔尼人、维斯提奈人、皮琴蒂尼人结盟，于是萨谟奈在北方、西方和东方三面受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于森蒂努姆（萨索费拉托）重创联盟。公元前290年，萨谟奈人要求议和，接受同罗马结盟，保留其领土，但领土如今已陷入罗马及其盟友领土的四面包围之中。同年，罗马人征服萨宾人，吞并其大部领土。公元前284年，埃特鲁斯人和塞农人于阿雷佐战胜罗马人，可是次年他们在瓦迪谟内湖（巴萨诺）一带被征服：埃特鲁斯人和博伊人要求媾和，卢加尼亚人被迫臣服。起自阿埃西斯（埃西诺）止于卢比孔河的塞农领土被吞并，在这一带设立高卢塞农殖民地。

于是，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一个疆域辽阔、雄心勃勃的国家。这是两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这一夙愿后，罗马人向意大利南部迅猛推进，势如破竹，各城邦纷纷北面称臣，这因为希腊各城邦远不如中部意大利的古意大利人民那么骁勇善战，那么团结一致。出于对海上愈益增加的商业利益，罗马对大希腊的兴趣日渐浓厚。早在公元前311年，罗马已设置监制和装备舰只的专门官员；在南拉齐奥和蓬扎岛设海港和滨海殖民都市。公元前348年和公元前306年，同迦太基人签订了商业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条约。同迦太基人修好，可作为在同希腊意大利交恶时的保障。在西西里，叙拉古在僭主阿加佐克利斯（公元前317或公元前316年执政）的统治下重温霸权政治，攻伐岛上其他希腊城邦和与之结盟的迦太基，并将那些城邦置于自己管辖下，从而获得国王称号（公元前305年）。他大力支持伊塔利奥蒂人反对卢加尼亚人和布鲁兹人。阿加佐克利斯死后（公元前289年），叙拉古复归自由，失去对西切利奥蒂人的统治。这时，半岛各希腊城邦由于布鲁兹人和卢加尼亚人的进攻处于危急之中。图里要求

罗马鼎力协助攻打卢加尼亚人，罗马痛快应允（公元前282年）。于是罗马在雷焦和洛克里市民的要求下派军驻守。

罗马一直推进到海峡，同大陆希腊城邦中最大的城邦，怀抱着称霸野心的塔兰托发生冲突。公元前281年，战争爆发，按照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见第4节），塔兰托向希腊君主伊庇鲁士的皮洛士王求援。国王匆匆赶到，于公元前280年在赫拉克莱阿附近的西里平原战败罗马人。在萨谟奈人和卢加尼亚人的大力帮助下，皮洛士国王向罗马逼近；罗马同埃特鲁斯人媾和，使两翼安定，于是安然无恙，皮洛士只好后撤。罗马人乘机追击，于普利亚的阿斯科利（公元前279年）再次败北，但胜利者亦损兵折将颇多。应叙拉古和阿格里琴托之邀，皮洛士从意大利泥潭拔足，驱兵直下西西里攻击迦太基，捍卫这两城，战事捷报频传。然而，他和其盟友渐生嫌隙，于是返回意大利。在贝内文托被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遂放弃半岛（公元前275年），狼狈逃窜。卢加尼亚人和萨谟奈人被迫返回罗马联盟，丧失其一部分领土；各希腊城邦也以较优越条件入盟。波西多尼亚成为罗马殖民地，更名为帕埃斯图姆。公元前270年和公元前264年之间，罗马人数度远征雷焦的坎帕尼亚人、皮切尼人、雅皮吉人、埃特鲁斯人、沃尔西人，轻易得手。这时，罗马国的版图又向外延伸，连同盟国的领土，从比萨、里米尼一直伸展到墨西拿海峡：罗马国占地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盟国十五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三百万，其中十分之一弱的男性成年罗马公民适于服兵役。

8　罗马意大利的体制

这样，整个意大利半岛或全受制于罗马，或以政治联盟的形式同其结盟。意大利其名（“牛犊的土地”）最先仅指半岛的终端，尔后逐渐扩及整个南意大利，现在泛指整个罗马意大利，或半岛意大利。

罗马为半岛意大利选定的组织，正如我们反复说的，应分为罗马国和与其结盟的国家。前者由下列部分构成：（1）罗马固有领土以及随后兼并的领土，全部领土划分为三十五个部落，四个城区和三十一

个农村；(2) 自治城；(3) 集市及广场；(4) 殖民地。第 (1) 项领土即罗马城和我们所说的城郊，尽管其范围广大（尽量保持地理上的紧凑性），大部分兼并的领土是公地，属于罗马国库。随着时间的推移，除这种纯粹而简单的领土兼并外，各城市民社团也被接纳进来，但各城仍保留其个性；尽管市民已变为罗马公民，却无政治权利（无选举权之公民）。之所以说它们是“自治城”，因为其居民负有公民的义务，而不享受全部权利（好像在拉齐奥的某些更古老的自治城从一开始就享有充分的公民权）。自治城保留其由全体公民选举出的政法官，以处理较低级的事务（建筑、警察）；司法大权却牢牢掌握在罗马大法官手里，或者由代表他的行政长官代其处理（这里也有人认为有一些自治城——当然为数极少——享有自治司法权）。自治城居民有权同罗马人通婚和通商。通过一些措施，政治权利迅速扩大到许多自治城。

另些土地并入罗马国，保留其行政上的个性，但不建立市民社团。农村民众通过商业关系和行政事务聚合于一个中心，即市场，也被接纳进来。从政法上看，市场属于某些大行政区。广场类似于市场，只是广场是罗马执政官新近专门设立的中心，大都处于其修筑的军事道路沿途。

殖民地是罗马公民的村社，按照专门法律，村社安置于一部分被兼并的土地上，其成员均分土地。成员们拥有罗马公民的全部权利，为行使其权利，他们加入一个农村部落；司法大权掌握在各行政大区。殖民地政府由类似政法官领导，但较之祖国的政法官（大法官）更简单些。

凌驾于上述所有领土之上的，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国家政权，与罗马结成联邦的国家保留其国家个性，正是凭借这一个性，他们才能同罗马签订条约。此外，一部分盟约，也是最少的一部分，是在平等条件下（平等条约）订立的。那就是相互承担义务：互不侵犯、不给侵略者以假道之便，在自卫战时以全部兵力互相援助。不平等条约缔约国与其称之为盟国，倒不如叫做罗马的保护国。在这些国家中，联邦

成员国理所当然与罗马并肩作战，然而却没有权利为自己作战。它务必向罗马提供兵员（或者可能的话派遣战船）。这些联盟立誓的目标是“保卫罗马人民的崇高威望”。联邦部队由盟国招募、装备和供养，并在各自的指挥部指挥下作战。罗马在盟国享有特殊的驻军权；与这一权利相应的还有接受人质权。罗马当然在外交上代表联邦。联邦成员国之间不得交战，在发生纠纷时，由罗马仲裁。形式上，其内部保持充分自治权；实际上却不然，罗马横加干预，要么是呼吁，要么干脆强人所难。当然，在每一个联邦成员国安置一亲罗马党（大都是贵族党），使各项法度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联邦成员国，至少是古意大利国家如法炮制，建立罗马类型的政治机构。罗马也处理联邦各个国家间的对外贸易。盟国铸币权因罗马不允许其在对外贸易结算中使用各自货币而名存实亡。在一些情况下，禁止联盟成员国和罗马之间通商和通婚。另一方面，联邦成员国公民有权加入罗马殖民地，并从那儿获得土地；他们除了可与罗马通商外，一般来说还可同罗马公民通婚。还允许个人以某种条件获取罗马公民称号。一般而言，允许拉丁人有权在某种条件下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无须获特殊司法许可。于是，在罗马和联邦成员国之间逐步形成经济和家庭的紧密关系，在各个国家里慢慢形成了罗马公民核心。

“拉丁殖民地”可视作联邦国家的特殊类型，或视作这些国家与并入罗马的社团之间的某种中介东西。早先，殖民地是由拉丁同盟建立的，这样在殖民地移民中可能有作为联盟的其他城市公民的罗马人。拉丁同盟解体后，罗马继续为自己建立一些殖民地；当时这些殖民地由非罗马人的拉丁人组成，并作为罗马殖民地，遍及整个意大利。它们通过永久性条约与罗马联结在一起，享受同罗马公民婚媾和通商权。此外，还享有充分的市政自主权。在第一阶段，其体制几乎是罗马体制的翻版（执政官、大法官、监察官）。

就罗马为半岛意大利设置的组织而言，不能断言是一个古意大利邦联（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邦联意味着一系列主权国家由联邦性的互相约束统一在一起。然而，这里是不同国家和罗马之间的双边条

约：也即是每一个国家同罗马单独签约（也不是以平等的条件），而这些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同盟关系。同罗马缔盟的后果是，城市间的古老联盟从政治上消失（拉丁同盟、埃特鲁斯联盟先后消失），仅作为宗教联盟存在。

以这种联邦组织形式，罗马旨在获致的首要结果是掌握一支防卫和进攻的辅助部队为自己所支配，用于自固和作为对外政策的筹码，阻止一个能在意大利欲与之争雄称霸的强国的形成。截止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拥有三十多万自家军、四十多万盟军。罗马在联邦领土上大肆修筑道路，从这一头直到那一头横贯整个领土，从兼并的土地上开始，延伸到盟国的土地上，这给盟军带来巨大的军事利益。最大一条，也是最著名的一条，是阿皮亚路（起自罗马，直达卡普亚，止于布林迪西），修成于公元前四世纪末。

罗马意大利“西马基亚”[1]，其结果超出了罗马原先打算的直接的明确的目的：它导致意大利民族的统一。罗马联邦或保护国，给予半岛以外部安全（当罗马的统治扩大到阿尔卑斯山时）与内部和平安宁；当交通有了保障和四通八达时，商业和工业才蓬勃发展起来。于是才有了各种意大利人的大混合和文化大同化。于是整个意大利半岛走向了统一文明：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以罗马文明为主，大量吸取古意大利的各种成分；在文学艺术方面，以希腊文明为主吸收各种本地的素材。夺取坎帕尼亚以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不仅在上述文化领域里，而且对世风的影响也变得更加强烈。

---

① 西马基亚：希腊语，意为城市间同盟条约。——译者

第二章　帝国崩溃前的罗马意大利

9　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意大利　北部意大利的征服

在罗马霸权下，意大利出现统一后，接着就是向地中海沿岸扩张并征服的时期。扩张和征服是通过下述战争实现的：第一次（公元前264—前241年）和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1年）布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前197年）；亚洲战争（公元前191—前189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前168年），先是瓜分而后（公元前146年）吞并马其顿；阿哈伊亚战争，毁灭科林托（公元前146年）并将希腊缩小为一个行省；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摧毁迦太基；西班牙战争，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事件的高潮是摧毁努曼提亚（公元前133年）。结果是，统治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只有一个强国——罗马：在东方，塞琉古的叙利亚和托勒密的埃及作为受控于罗马的二等强国存在了若干时间。

所有这些战争的发动和政治军事领导纯粹是罗马的事情，意大利其他国家和人民只是为了对联邦做奉献而参加战争。所有这些帝国活动的政治-领土成就不允许他人染指：增设的西西里、撒丁、马其顿、阿哈伊亚、非洲等行省，直接受制于罗马；这些行省为罗马人民的公有财产。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征战和夺地给整个意大利带来了政治、

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好处，对地中海的商业和人口扩张，不仅使罗马获益，也使意大利各国受益匪浅。此外，同期内，在半岛的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半岛统一大业继续深化。

第一次布匿战争，标志着罗马建成了航海强国，各联邦成员国鼎力合作，对航海强国的形成起了特殊的作用；大部分军官和开始时全部划船奴隶均来自这些联邦成员国，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允许皮切尼人和萨宾人获得公民权，形成了最后两个部落，从而使罗马公民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大。西西里、撒丁岛和科西嘉的被占——后两个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几年后占领的——使各岛统一于意大利军事体系内（而不是统一于政治、行政系统之中）：前两者极大地增强了罗马西马基亚的海军战略地位，对半岛的粮食供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西里和撒丁跌为行省，其一部分领土变为公地，其余的缴纳赋税（理论上规定纳十分之一的所得，实则是任意抽取）。这并未阻止在这些地方保持或建立联邦城（叙拉古）和罗马自治城。

作为反击，第一次布匿战争导致向山南高卢的进一步扩张。受到战争损害的罗马小所有者（因缺乏耕种者）涌入瓜分皮切尼和塞农高卢的土地；博伊人和因苏布雷人认为受到威胁，入侵埃特鲁里亚，从而爆发新的高卢战争，战争持续好几年，以罗马人大获全胜而告终。公元前 222 年，罗马人于克拉斯蒂迪姆（卡斯特焦）大胜，夺取米兰，建筑从罗马至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乌斯大道（稍后续修埃米利亚路直达皮亚琴察），建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殖民地。

汉尼拔入侵，头两年战绩辉煌，战争愈益频繁（从特雷比亚河到特拉西梅诺湖，从特拉西梅诺到坎尼）。这一入侵严重地考验了罗马意大利组织的坚固性。不仅仅是这一组织外的高卢人和利古里亚人竞相援助汉尼拔的军队，而且拔下坎尼城后，邦联的一部分，尤其是南部意大利诸城——几乎所有的萨谟奈人、卡普亚人、卢加尼亚人、布鲁兹人，稍后还有塔兰托和另些希腊城市纷纷倒戈，背叛联邦。卡普亚的倒戈最为严重，因为它已是意大利第二大城。然而，反叛土地上的城堡仍牢牢掌握在罗马人手中，中部意大利的邦联核心仍效忠罗马。

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独立精神（或者正如卡普亚那样的高傲精神）的振奋和对罗马臣属地位的憎恨，另一方面对所谓解放者的疑虑和对非洲统治的厌恶，两者互相制约、相互抵销。一般而言，在古意大利各城市，元老院向着罗马，人民支持迦太基。在西西里，叙拉古转向迦太基一边；长期围困后（公元前213—前212年），城又被攻陷；卡普亚亦如此（公元前211年）。对于重新臣服的城市，罗马给予严厉的罚惩，大肆杀戮。卡普亚（凡参与反叛的罗马公民尽行杀死）被剥夺一切自主权，甚至祸及城市生存：贵族被砍头，大部分市民被卖掉，许多土地被籍没。叙拉古得纳贡：阿格里琴托市民被当做奴隶卖掉，代之以亲罗马的西西里人；三万塔兰托人以奴隶身份被贩卖。也许正由于这种压迫，造反有扩大之势：公元前209年，十二个拉丁殖民地拒绝提供兵源和缴纳税收；埃特鲁斯人密谋反叛，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的志愿者纷纷支援阿斯德鲁巴。公元前204年，十二个殖民地降格为无选举权的自治城。战争胜利结束时，在意大利南部大量籍没土地。在西西里的大量籍没土地促进了大庄园的发展，给意大利富豪带来了极大的好处。随着大庄园的发展，居民锐减，岛上经济条件恶化，奴隶成倍增加，这为后来的奴隶战争埋下了根由。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意大利北部几乎全部被罗马人征服。主要抵抗来自利古里亚人，他们为高卢人所逼，向东南方向移动，威胁托斯卡纳诸城，直达阿雷佐。同他们的斗争相当艰苦，还因为这期间交叉着同高卢博伊人和因苏布雷人的较量。博伊人和因苏布雷人首先被征服：公元前189年在博伊领土上建成了博诺尼亚拉丁殖民地。为了制伏利古里亚人，将整个整个部落迁走，正如亚述人在先前东方所做的那样；这样阿普阿尼人被转移到贝内文托。结果是直到同马赛毗邻的海岸全部被征服。在整个公元前三世纪内（我们不知何时），古意大利商人已经建成了热那亚商站。在东北边境，罗马人制伏了高卢卡尔尼人，他们越过同名的阿尔卑斯山，定居于伊松佐河的入海口附近（大约公元前183年）：借此机会，元老院向山外高卢人派出大使，告知他们，阿尔卑斯山这边的全部领土均为罗马人民的公地。后又攻陷

西伊斯特拉半岛，建阿奎莱亚殖民地（公元前181年）。公元前177年，征服整个伊斯特拉半岛。

10　罗马-古意大利社会内部变革　文化

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一系列掠夺性战争引起了罗马-古意大利社会的深刻变革。直到那时为止，这种社会主要是由小土地所有者组成，他们每个人只注意自己的农场，死抱着家庭习惯和传统生活内容不放。由于连年战争，田地荒芜；由于廉价的外国农业产品侵入，小所有者纷纷破产，逐渐集中于富豪之手下，这些富豪在被战争和掠夺鼓励起来的工商活动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为战争供货、经营运输、公共劳务、掠夺动产和籍没土地、开采矿物、承包税收，使动产资本和投机活动飞快增加。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意大利商船队涌入东方，和希腊及亚洲的商船决一雌雄。意大利农业，从小所有者过渡到大所有者，从粮食种植过渡到葡萄、橄榄、水果、蔬菜种植及放牧。

在这时期产生了一种拉丁艺术文学。前五个世纪，罗马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诗歌，宗教的、世俗的，用农神体写成的韵文（不清楚其韵律是数量上的，抑或是重音上的）。圣歌是舞蹈祭司团和阿尔瓦尔兄弟会的圣歌，所谓下流诗的内容充斥着粗俗的放荡的玩笑和痛骂。一些山歌就是以这些粗俗的歌词编织而成的。散文用之于记述典礼、法律（如十二铜表法）、历书、执政官和政法官大事记。其他古意大利人也有类似的创作，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著名的伊古维翁铜表属于翁布里亚宗教法。所有这些都不是艺术文学，有别于拉丁文的古意大利文尚未达到这一高度，因为古意大利语被拉丁语的扩张逼到方言的窘境。相反，受希腊文化影响形成了拉丁文学或罗马文学。首批作家从大希腊来到已成为半岛中心的罗马。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塔兰托的希腊人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将《奥德赛》译成农神体诗，代表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第一部悲喜剧。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坎帕尼亚人内维乌斯除翻译希腊悲剧外，还以罗马生活为题材创作其他悲

剧，写政治讽刺喜剧，尤其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位描写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民族英雄史诗的作者。出生于阿普利亚，生活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圈子里的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更有才气更独特的作家。他用六音步诗写了十七本编年史，从罗马的起源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同时，对民间山歌做了文学润色。给我们时代留下完整作品的第一位拉丁作者是喜剧家普劳图斯，翁布里亚人，比恩尼乌斯年长，创作了一系列喜剧，其情节仿照希腊剧情，但充满意大利风趣。非洲血统的特伦提乌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朋友，他把罗马喜剧推上文学的完美境地；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另一位朋友卢齐利乌斯（公元前180—前103年），出生于下拉齐奥，他比贺拉斯更早，为罗马讽刺诗立下了汗马功劳。散文尤其注重记述历史演变：费边·皮克托和辛西乌斯·阿利门托首先用希腊文撰写第二次布匿战争史；其后马库斯·普奇乌斯·加图用拉丁文在《起源》一书中广泛地描写了意大利诸城市的历史，他也是第一位拉丁文演说家，是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一位杰出人物。面对向希腊文化大开绿灯的西庇阿圈子，加图带头反击涌入罗马-古意意大利社会内的古希腊文化，然而反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和文学一样，希腊哲学和宗教也广泛影响罗马。原始的罗马宗教与希腊的拟人的、人格化的、纯美的面貌不同。罗马神灵同时具有抽象和实用两重性，因为每一种特殊环境，每一个行动和行动的时机、每一类事物，都有其专门的神：埃杜卡或者波蒂纳是教孩子吃喝的神，福古卢斯是看门神，布博纳是护牛神，埃波纳是护马神，西尔瓦努斯是保护牧人的神，梅尔古留斯是保护商人的神，拉里和佩纳蒂是护家神。每一个男人有其保护神，家庭、城市和罗马人民也都有其守护神。和平、忠诚、自由、胜利、幸运也都精神人格化。自然之神不仅本身代表自然，而且更代表其同人类的关系，尤其是农业之神（农神、酒神、谷神、爱神）。

希腊的渗透导致罗马宗教双重的变革：引入像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狄安娜）这样的希腊神灵；希腊诸神同化于民族神灵，于是后者

取得了前者的拟人的、美学-文学的特点。宗教同国家紧密结合，宗教和宗教行为渗透到公共生活中，国家监视家庭宗教信仰。祭祀仪式者在引导众神灵发挥其保佑和激发罗马国家的作用；在罗马宗教中，官方的祭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有众多的祭司从事祭礼：大祭司，其首脑为大祭司长，主持全部祭祀，占卜官预测凶吉，舞蹈祭司是马尔斯和基林努斯的祭司，卢佩奇是牧神的祭司，阿尔瓦利是求五谷丰登的祭司。

11　经济-社会危机　农业法和古意大利动乱

罗马-古意大利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突出表现于奴隶起义或者“奴隶战争”，起义中下层公民站在奴隶一边。公元前 138 年，西西里的奴隶战争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其中掺杂了一种要求独立的意识的觉醒。

在罗马，沦为下层公民的中产阶级动乱的结果，是重新提出农业法案，这项法案早在头几个世纪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中就已提出。其内容是从国家公地里拿出一部分土地分给无地的人，为此目的，要求让出或占用有利于大地主的公地。平民家庭出身的早已上升为贵族的提比里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 133 年被选为平民护民官，他提出一项法律，按照该法，任何公民不得拥有超过五百尤杰罗[①]的土地，每个成年儿子再加一百五十尤杰罗，至多一千尤杰罗。该法实施后，剩下的那部分土地将以不可转让的地产名义分给贫苦公民，每年缴纳年税。尽管大地主拼命反对，新法仍被通过，由一专门委员会开始施行。保守的贵族采取“直接行动”，提比里乌斯被一伙武装暴徒杀害。法律虽存，却未被付诸实行。提比里乌斯的兄弟盖尤斯·格拉古重新提起农业法案，并将该法与一个更为广泛的意大利民主纲领结合起来。

结成联邦的古意大利民众——这部分人迄今所控制的土地远比罗

① 古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千五百平方米。——译者

马直接控制的意大利领土要多得多——因被挤出罗马国政府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其政治组织与罗马的酷似：各个古意大利国家中为首的是大法官（相当于执政官）、财政官、监察官、营造司各两位，有时还有人民护民官。通常罗马不干预其内部行政。可是在对外关系上和共同利益上，其法制机器则无能为力，因为这两个方面都由不属于其列的至高无上的罗马国家裁定。老自治城都获得全部公民权；但从公元前188年起不再建立新的自治城，从公元前241年起也不再成立新的部落。甚至那些利用其特权，享有罗马或罗马殖民地年俸津贴的拉丁人也从名单上一个一个被勾销。于是最古老的拉丁殖民地弗雷吉莱拿起武器要求取得罗马公民权，但被镇压，降为村级待遇（公元前124年）。

盖尤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被推选为护民官，他设法使农业法案再次生效。此外又通过了小麦法，允许罗马市民以低于市价购买小麦；还通过一项司法法案，在大部分法院里，用骑士（也即是从首批加入百人团中挑选出的骑士，见第5节）代替元老院议员。这是企图以建立大联盟来与元老院寡头政治相抗衡。照他的想法，联盟应加以扩大，吸收古意大利人进来。公元前122年，盖尤斯·格拉古再度当选，他提议给予拉丁人以公民籍，同时将拉丁权利让与其他古意大利人。然而，新提议遭到罗马平民的抵制，这出于他们狭窄的妒忌心，妒忌别人也拥有他们的特权。公元前121年，盖尤斯·格拉古未被当选；在执政官武装力量和他的支持者间的冲突中，其支持者被打散，他本人遭杀害。

凯歌高奏的罗马寡头政治在非洲努米底亚反朱古达国王的战争（公元前111年）中仓皇败北，名望大损。败局的结果是将一位“新人”——也即迄今为止在国家中没有一官半职的平民——抬上执政官的宝座：他就是盖尤斯·马略。他出身于阿尔皮诺骑士团家庭，他赢得了战争，当选为民主派首领。他被委任迎击日耳曼族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第一次入侵，大获全胜，从而加强了他的地位。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丹麦和今日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南下，穿过高卢区，接

近意大利边境，重创罗马人。意大利朝野震惊，尽管法律上马略已逾期，但仍再次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五年（公元前104—前100年）。他第一件事是改组罗马军队，进行新的编制，实行招募制。也从赤贫者中招兵，给予薪俸，延长服役期，从而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这样，军队里多有“老兵”，他们训练有素，富有经验，不过军队也就成了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一个特殊阶层，一个个人的工具；这一改革为共和国的垮台埋下了祸根。马略于公元前102年在阿奎亚·萨克森提亚击败条顿人，公元前101年于韦尔切利击败辛布里人，他作为祖国的救星受到万众欢呼。

12 社会战争和第一次内战 罗马国家的市政变革

公元前100年，马略当选第六任执政官。护民官阿普勒乌斯·萨图尔尼努斯提出分割从辛布里人手里夺取的波河以北土地和废除西西里、非洲、希腊和马其顿殖民地的农业法。古意大利老兵应加入这些殖民地，其中一些人将获得罗马公民权。这在罗马引起了同贵族的猛烈冲突，马略最终站在了贵族一边，攻击萨图尔尼努斯。萨图尔尼努斯被杀，其法律被废除。贵族马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重提民主计划，要点有二：分配公地和授予古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古意大利人支持德鲁苏斯。他用一些暴力强行通过其提议，可是元老院宣布其无效，德鲁苏斯被害，其支持者遭迫害（公元前91年）。

奥斯坎-萨贝里血统的古意大利人对大庄园急剧发展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怨声载道，遂脱离罗马联盟，成立联邦国，定都于佩里尼人国家里的佩斯卡拉河边的科尔菲尼乌姆，取名意大利卡。这就是意大利民族形成的起点。联邦的首脑机构是由五百人组成的元老院，行政权授予两名执政官和十二名大法官。公元前90年的第一次战役，起义者占上风；翁布里人和埃特鲁斯人也威胁要站在起义运动一边。于是罗马根据尤利乌斯法（由执政官卢西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提出）允许仍效忠的联盟国家获得公民权，根据普劳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由护民官普劳齐乌斯和帕皮里乌斯提出）赐予在六十天内提出要求的古意大

利人以公民权。然而，新公民只应在三十五个部落中的八个部落里登记；由于只对部落投票，这就大大减少了其分量。在执政官庞培·斯特拉博的提议下，拉丁公民权给予山南高卢民众。采取上述措施后，成功地维持了尚未反叛民众的忠诚，并使许多反叛者放下武器。公元前89年底，诺拉、萨谟奈、卢卡尼亚和布鲁齐奥仍在反抗，坚持完全独立于罗马的计划。萨谟奈人反对罗马最为坚决，他们声称要捣毁狼窝。同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提在东方搅得罗马不得安宁，置罗马统治于危险之中。他入侵小亚细亚，得到惨遭罗马总督和收税人剥削的民众的声援（公元前88年）。在他的鼓动下，一天之内尽兴杀戮在亚洲的古意大利人，八万人死于非命。米特拉达提气势汹汹地杀入欧洲，侵占马其顿和希腊，同意大利起义者建立关系，公元前87年当选为执政官的卢西乌斯·科尔内留斯·苏拉受命率部迎战。

与此同时，在罗马城内，民主派和贵族派剑拔弩张，互为仇敌。民主派提议把新公民意大利人平均分配到所有的部落，罢免苏拉的战争指挥权（他支持贵族），将指挥权交给马略。正包围诺拉的苏拉移兵罗马，夺取之，从而开创了这类事件的先例。民主派仓皇逃跑，其法律被废除，护民官和民众大会的职权受到限制。随后，苏拉起程前往东方（公元前87年）。民主派又时来运转，有了出头之日：新执政官科尔内利·秦纳和马略在古意大利人，尤其是萨谟奈人的支持下，入主元老院：苏拉的法律被废止，其财产被籍没，对其支持者施以血腥报复。公元前86年，马略第七次当选为执政官；刚上任不几天，即病故。

苏拉完全战胜米特拉达提，逼其放弃夺取的全部土地，凯旋荣归意大利（公元前83年），发动反对秦纳和小马略领导的一贯得到萨谟奈人和卢加尼亚人支持的民主派的战争。苏拉战胜所有对手，成为罗马城和国家的主人，居终身独裁官之高位（公元前81年）。民主派和古意大利人被投入监狱，遭放逐——在罗马第一次使用这一刑罚——，捣毁城市，没收由其首领分给士兵的土地。埃特鲁斯和萨谟奈的人口遭致命打击。国家通过一系列寡头政治改革得到重建：限制护民官权

力和民众大会立法权，全部司法权回归再次成为政府主人的元老院。公元前79年，苏拉放弃独裁官，次年病故。

罗马贵族的复苏存时极短。几年后，苏拉的体制改革被一刀斩尽：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领导复兴民主大业。古意大利人彻底获得在三十五个部落的公民地位。建立了大量的新自治城和新殖民地（正是苏拉本人开始了这一工作）。迄今为止罗马人未能系统地促进城市的建立和市政的建设（相反，他们不时加以破坏），而现在，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半岛意大利形成了具有市政权的城市网络，属于城市管辖的有村庄、城堡、农村土地，还包括迄今是罗马人民的公地。广场和市场也转变为城市。新老自治城和殖民地统一改组，设立元老院或市政议会和选任的执法官——在殖民地和某些自治城称两执政（或两头政治），大部分自治城称四执政（或四头政治），除管理权限外，执法官在一定的权限范围内还有司法权（不包括任何国家事务和一部分私人事务）。这样停止了行政长官职务，然而某些城市仍保留过去行政长官理政的行政公署之旧称，同样，在名义上也保留着各类广场、市场、殖民地，但除原意有所差别外，无实际区别。

这样，罗马城已由城市国家转变成管辖许多城市的只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区分的真正国家。意大利市政的这种变革是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完成的，大部分工作应归功于他。他发表公告给予波河以北的城市以罗马公民权。他死以后，这一公告仍有效用。代表制机构却没有革新：政治权利仍只在罗马公民大会上行使。事实上，大部分意大利公民被排除在外，没有组成起义的古意大利人原先所企望的那种联邦——民族国家，而只有这种国家才有可能拯救自由的人民共和国和形成意大利民族。

13　新的国内战争和帝国的建立　奥古斯都时代

波及意大利全境的城市整修巨大工程是在共和国的最后几次内战的厮斗声中完成的。斗争是如此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既有政治因素，

也有社会因素。前者是因为各对立的阶级和集团之间为夺取权力而彼此恶斗，后者是因为深刻的经济变化引发出层出不穷的骚乱，穷人、失业者、渴望发财致富和升官求荣者，一起被卷入大潮，被这一变革推上大舞台，尽情地表演。据统计，在共和国的最后五十年内，不下五十万人在意大利因内战引起的再次分配土地的浪潮中获得了土地。土地的再分配，是因为获胜的党派没收战败者的土地，并将其分给本派成员，首先分配给南征北战效尽犬马之劳的士兵。

这种土地的分配，并不意味着出现直接耕种的小农。掌握土地的大部分老兵以有产者的身份居住在城市里，将土地租给他人种植。在许多情况下，新所有者很快负债累累，结果不得不转让出土地，从而形成了大地产者。与这种大地产和大富豪紧密相连的，是奴隶劳动大规模地替代自由劳动：帝国战争的主要结果是奴隶成倍增多。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奴隶战争”——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大量的农村无产者投入其麾下，然而战争败于马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之手。

历次国内斗争的政治解决办法只能在罗马由聚集于民众大会的罗马居民来决定。这种有实权的实体，名义上威加意大利全境，实则只不过是个虚架子、徒有其表。其成分大多为无地无业的游民，靠公共施舍（那时在罗马时兴以优惠价或免费向人民提供食品）和私人布施度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居心叵测的头子们和权势炙手可热的人手中操纵的工具，被利用来搞政治骚乱，在民众大会里拉选票，使武功卓著的军人所强加的东西成为最后立法。在军队服役的，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公民；不寓居罗马的意大利人正是借助他们来捞取个人利益和达到往上爬的渴求。

人民主权由庞培和克拉苏恢复，但这并不标志着愈益趋向保守昏庸的元老院贵族和越来越富有煽动性的民主派（处于两者之间的是骑士，这些人总是视其利益多寡而左右摇摆）之间的明争暗斗得到和解。平定地中海的猖獗海盗，彻底制伏米特拉达提和为罗马掠夺塞琉古的财产后，庞培在西至幼发拉底河的整个东方确立了罗马霸权（公

元前67—前62年)。与此同时，罗马的社会下层贫民在冒险精神十足和放荡不羁的贵族卢西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的率领下，掀起反叛，要求社会革命。喀提林的暴乱轻而易举地为执政官马库斯·图卢乌斯·西塞罗所剿灭（公元前63年)；埃特鲁里亚，由于该地的农业和商业资本经济结构，由于为支付内战而在该地大肆搜刮民财，成了贫民起义的发源地，喀提林募集的军队在该地被击溃，他自己也身首异处（公元前62年)。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致力于恢复民主事业，他具有杰出的政治才干，采用更加谨慎的手段和抛出较为节制的意图。他是马略的亲戚，秦纳的乘龙快婿，于公元前59年当选为执政官。他与重返祖国的庞培和豪富克拉苏订立君子协定，组成所谓的“前三头联盟”。卸任元老院后，他依然获得高卢行省（山南高卢和纳尔榜南西斯，相当于现今的普罗旺斯，是几十年前夺取的）政府首脑之职，并维持达十年之久，以此为基地，于公元前58年和公元前51年并吞全部高卢。这是罗马帝国至关重要的扩张，从而使整个西部罗马化，决定性地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的中央地位。这位行省总督从中获得巨利，他用这笔巨大财富资助其在罗马的派别，还将高卢军团变成自己的近卫军。然而，庞培极力向罗马元老院献媚，借以扩大势力；在克拉苏于出击安息人的那次不幸的东方远征途中丧生后（公元前53年)，两位独裁官公开决裂。罗马权贵公然站在庞培一边，反对恺撒，定他以叛逆罪（公元前49年)。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公元前48年关键一仗——法萨卢斯战役)、非洲，恺撒的军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流亡中的庞培在埃及遇刺身亡。于是胜利者君临天下，自封为终身独裁官，自封皇帝头衔（意指军事最高指挥)，意欲在其王冠下（至少在意大利以外）实现一统天下，从而平等地改组帝国各部分。残余的共和派分子把他当专制君主加以诛灭（公元前44年3月15日)，却不能篡取权力；作为被诛的独裁官的右臂，马库斯·安东尼和其继承者养子盖乌斯·屋大维之间正为争权大动干戈，屋大维为自己取名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

达的“后三头联盟”（与前一个不同，这次是正式建立的）摧毁了元老派，大量流放其成员，西塞罗是受害者中居官最显耀者；公元前42年，在菲利皮剿灭刺杀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其后，清除雷必达后，安东尼（在东方称王）和屋大维（他以罗马精神的保卫者和代表自居）反目，三头联盟解体。这时，安东尼驻守东方，在埃及与女王克娄巴特拉同床共枕，寻欢作乐。屋大维在亚克兴角大败安东尼（公元前31年），占领并吞了埃及，成为帝国的唯一主宰。这样，罗马仍作为帝国的中心，防止了预料中的而又激进的罗马帝国东方化，保证了西方罗马化的继续。屋大维毫无阻拦地让元老院和人民通过一些决议，着手实行体制改革：他以共和国的形式（行省总督权、护民官权等）集最高权力于一身，元老院只作为技术-行政合作者，照管一部分行省。公元前27年，他被授予“奥古斯都”尊号，这一尊号遂成为其专有名字，意谓他个人是神圣的，凛然不可侵犯的，他又获得皇帝美称（原先这一称号是用于褒扬战功显赫的将军的），这一尊号符合他权力的实质基础，因他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而元首（即共和国的首席政法官）这一官方名字最好不过地指明其权力的正式性。

早在后三头联盟时期，山南高卢既已合并于意大利。这样，意大利的边界已延至阿尔卑斯山，除西部东部阿尔卑斯山的某些地段外。东北边疆由奥古斯都划定在伊斯特拉的阿尔萨河。他把意大利划分为十一个区（包括罗马共十二个区）：坎帕尼亚（包括拉齐奥）、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卢卡尼亚和布鲁齐奥、萨谟奈、皮切诺、翁布里亚、埃特鲁里亚、艾米利亚、利古里亚（直到波河和特雷比亚河）、威尼斯和伊斯特拉、波河以北高卢（直到阿达河）。这些地区，只是用来为统计表搜集行政资料，似乎别无他用。

内战和奥古斯都时期，是罗马文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就其语言和对古罗马文明的意识而言，现可以使用罗马文学这一名称了。就语言而论，先在非希腊意大利，其后也在希腊意大利居统治地位，埃特鲁斯语和其他口头语言逐渐消亡。古罗马文学就是意大利文学，因作品

出自于意大利各地的作家，他们几乎没有人出生于罗马，但其作品有时还把罗马的伟大及其各种命运也作为整个意大利的财富来加以讴歌和吟咏。在此期间，尽管古希腊文化有着广泛而决定性的影响，但罗马文学也能从个人和新颖的作品里找到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罗马文学在历史文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就杰出：萨宾人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公元前35年卒），一位以格言式的简洁手法写作的作家，为我们记述了喀提林谋叛和朱古达战争；尤利乌斯·恺撒以朴实而精练的语言写下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帕多瓦人提图斯·李维（卒于公元17年）用他那雄辩之笔记录了卷帙浩繁的《罗马史》（《建城以来史》），浓墨重彩讴歌共和国的高尚道德和伟大业绩。西塞罗具有罗马人的、政治家的和世俗的雄辩秉性，他的成就登峰造极；他还是位最伟大的希腊哲学文化的宣传家，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论文。在诗歌领域里，出现了新颖的抒情诗，尽力抒发个人情感和幸福。维罗纳人卡图卢斯（公元前54年卒?）就属于这一类型的诗人。其后，出现挽歌体诗人，他们是拉齐奥人提布卢斯，阿西西人普洛佩提乌斯（两人均卒于公元前18年），苏尔莫纳人奥维德·纳索，后者著述颇丰，然而独创性略逊，他以六音步诗写下了著名的神话诗《变形记》。卢克莱修·卡鲁斯（公元前55年卒）的《物性论》是一部最为独特的训世诗，它以磅礴雄壮的气势表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理论。曼图瓦诗人普布柳斯·维吉尔·马罗（公元前19年卒）在其长诗《农事诗集》里，完美而细腻地抒发其感情，他还为罗马贡献了《埃涅阿斯记》，一部杰出的民族颂歌，有着丰富的人情味。与维吉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是维诺萨人贺拉斯·弗拉库（公元前8年卒），他俩同是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的好友，贺拉斯的佳作有《歌集》、《讽刺诗集》和《书札》，这三部诗集涉及各种主题，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有道德的、爱国主义的，也有个人的；其文藻表现力强，其精神介于道德说教和怀疑论之间，其形式雅丽而高贵。

并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罗马文学的独特性造就了罗马天才的特殊倾向，导致了罗马城市政治上的伟大性，具备了所谓的实用性，不

像希腊文学那样重思辨，爱幻想。的确，政治和社会功利在罗马文学中占有很多篇幅，但罗马文学也向我们展示了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发展。在卡图卢斯，在挽歌体诗人，在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诸人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种表达心灵的能力，一种内心的深刻的反省，一种自然意识的流露，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的手法。至于所说的罗马文学的实用性，其实它首先是道德风尚：义务感、正义感、对公共和个人美德的崇敬、普遍的伦理观。这种人伦精神统治着本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如西塞罗、李维、维吉尔、贺拉斯，也统治着随后的作家塞涅卡和塔西佗，形成了这一时代的真正的伟大性。

公元前一世纪起，罗马的建筑有了飞跃的发展，那是罗马人的艺术杰作；实用性的公共工程，如道路、桥梁、水道、庙宇和剧场，都是那么宏大、杰出，气概非凡。在建筑中，罗马人受到希腊和埃特鲁斯极大的影响。公元前二世纪，在罗马耸立起巨大而恢宏的大理石建筑物，如庞培元老院、庞培剧场（第一个石块建筑）、艾米利亚长方形大会堂、朱利亚大会堂。雕塑和绘画不那么重要；雕塑中，偏重现实主义的雕像。这两者首先是使用于装饰艺术。

14　帝国头两个世纪的意大利

由奥古斯都创建的帝国制度天长地久，绵延达五个世纪之久，而从未完全中断过共和政法性质，首先从未变成正式的继承制，当然也从未达到真正的有机体制。名义上元老院选举新皇帝；实则，在多数情况下，其选择只不过是一种认可前任皇帝指派的亲属的形式，或者是一种批准对禁卫军（皇帝私人卫队）或各行省罗马军团的宣布的形式。人们可以将直至三世纪中叶的皇帝排列成某几个系列（几组过渡性的存时极短的皇帝略而不计），从中可以看到，古意大利贵族接替了罗马贵族，行省的贵族接替了古意大利贵族。直至公元 68 年是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尼禄）；从 69 年到 96 年是弗拉维王朝（韦伯芗、提图斯、图密善）；从 96 年到 192 年是养子或安东尼王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

皮乌斯、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康茂德)；其后是塞维鲁王朝(193—235年)。再后是所谓军事无政府状态和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新王朝。

随着帝国时期的到来，意大利特殊的自主的政治生活可能性逐渐缩小，而公元前一世纪形成罗马意大利国家的演变部分地实现了这种生活。民族国家的胚胎尚未成熟发育之前，便胎死在形式上是两头政治（元老院和皇帝)，实质上是越来越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的万国一统天下里。从帝国第一阶段起，民众大会——出于上述原因，它总是市民大会，而不是民族大会——也丧失了法律上的任何权力。全体意大利公民参与公职——受元老院和皇帝委任——和步入元老院及骑士团，变得愈益广泛。在弗拉维王朝时，意大利贵族的地位明显优越于罗马贵族，因后三头联盟和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大批杀戮罗马贵族。与意大利贵族平起平坐的，还有外省籍的贵族，后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罗马-意大利公民对他们在帝国获得的特权地位极为妒忌，这种地位使他们享有威望，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好处，但不能有机地自主地参加政府工作。因此，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在给予各行省人民以公民权问题上极小心谨慎，而克劳狄刚向相反方向一摆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卓有成效的运动便对准了他。意大利的抵抗不能持久。韦伯芗通过各行省城市化，将公民权范围扩大，因为各城的政法官均已取得公民权。在安东尼王朝时期，公民权的发放越加频繁，以至于到了卡拉卡拉时代，公民权扩大到了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这种政治-司法的演变，反映在由帝国法令权威性地调整和发展的罗马法的演变上。在帝国统治下，罗马法传播到东方，由于该法的固有能力和罗马的政治统治，甚至用之来处理私人关系；然而，罗马法受希腊法的影响，其编制工作有来自东方的法官参加。该法发展成带有普遍意义的万国法，并受到希腊关于自然法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葛派）的渗透。

各行省参与罗马文化工作是与意大利同各行省在政治-社会上的平等相对应的。在帝国的头两个世纪里，罗马文化已从意大利文化发展成西欧文化。在诗歌领域里，与意大利人叙事诗人西利乌斯·伊塔利

库斯，叙事抒情诗人帕皮尼乌斯·斯塔提乌斯，讽刺诗人佩尔西乌斯、朱韦纳尔、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尔（前两位是伦理主义者，对帝国社会持相当尖刻严厉的态度，第三位在其小说《萨蒂利孔》中以现实的公正无倚的代表自居），并驾齐驱的还有西班牙人卢坎和马提雅尔，前者以叙事诗的形式在《法尔萨利亚》（又称《内战记》）中记叙了最近的历史和政治，后者是擅长写讽刺短诗的天才。另一位西班牙人塞涅卡（尼禄的大臣）是写哲学-道德散文的大师，也是悲剧作家。在历史写作方面，意大利人塔西佗独领风骚，他是杰出的帝国社会人物描写家和伦理学家，在其著作里表达了对提比略、尼禄和图密善宫廷暴政的精神反叛。写作科学散文的有老普林尼；书翰写作的有小普林尼；在文学教授方面，首推另一位西班牙人昆良体，而非洲人阿普列乌斯为我们留下了冒险小说《变形记》。在艺术方面，罗马建筑在帝国时期成就辉煌，和希腊建筑相比，它风格独特，运用拱门、弯顶和大圆顶。罗马和帝国的典型建筑有阿格里帕万神庙（其圆顶是在哈德良时期耸起的），提图斯拱门、图拉真石柱、安尔尼石柱、卡拉卡拉温泉，稍后，有马克森提乌斯（或称君士坦丁）大教堂。从尤利乌斯·恺撒到图拉真，帝国在罗马建起了一系列帝国广场。雕塑了大量皇帝和名人的半身胸像和全身像，连私人家宅也装饰以壁画（庞培城最具典型性）。

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平等是顺理成章的，它本身就代表着帝国的强盛，对于意大利来说，除了失去徒有其表的威信外，并无什么损失。不再仅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帝国组成了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领导之下的具有行政自主特征的城市网络。这些城市在地区辽阔、民族众多的大整体里还缺乏一个有效组织；它们还要观望一下，在孤立的自治城的圈子里，越来越富裕，越来越锦上添花的城市生活是否仍能维持下去。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的经济繁荣达到极点，意大利各城度过了其黄金时代，城市有产者大兴土木，楼馆耸立，殿宇峥嵘，竞夸豪华。城市政府掌握在大富豪手里，他们居官并不为了发财，无俸禄可言，相反还按照传统向市镇慷慨捐赠。帝国初期，城市化扩大到

阿尔卑斯山一带：在克劳狄统治时期，阿恼尼人并入特里邓图姆（特兰托）。在奥古斯都时，西西里实际上属于意大利，就像阿尔卑斯山南边一样；然而，没有普遍授予公民权，但允许主要城市获得罗马自治城权和拉丁殖民地权。撒丁的条件比西西里的远为落后，科西嘉更不如撒丁，那里土著成分仍占统治地位。

帝国在各行省进行了行政建设，维持了和平与秩序，从而给东方带来了经济的起飞，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而内战期间古意大利难民对西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于是，古意大利的生产和商业丧失了其垄断和一家独霸的地位。在西方，葡萄和橄榄种植面积的扩大形成了同意大利的强大竞争；由于中产者遭受沉重打击，从而促进大地产者对中产者的兼并，意大利的葡萄和橄榄的生产条件每况愈下，大地产者重又致力于粗放型的谷物种植。于是，在意大利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成批增加。从图密善（81—96 年在位）以来，为刺激意大利葡萄的生产，采取了不利于西方行省的保护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没有发挥长远效力。三世纪结束前，意大利葡萄生产彻底毁绝。土地所有权向农业贵族手中集中的过程，在帝国的第二个世纪里加快了步伐，这一过程不仅使农民，也使城市有产者蒙受损失。涅尔瓦和图拉真企图支持和发展小农经济；早在哈德良时代，有迹象表明，这一努力令人沮丧。尽管如此，有损于小农而重振大地产的努力不应被理解为是使用奴隶生产的大地主的全面胜利。相反，在二世纪时，再次掀起向佃农而不是向小农分配小块农田的运动。毫无疑问，早在安东尼时代，意大利人口即呈减少之态。有人把主要原因归咎于移民，因意大利人在各行省更易谋生。在二世纪，古意大利工业和商业一蹶不振，而各行省的工业和商业却蒸蒸日上；古意大利商人在东方销声匿迹，而到西方来经商的东方人则络绎不绝。

这时，地方财政发生危机，结果中央财政也危机四伏，也出于越来越大的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的需要，帝国权力干预城市内部生活也日趋严厉。图拉真通过“监护人”在意大利开创了同各行省一样的对市政财政的控制；哈德良设立“税收助理”。意大利各城市在司法方

面所享有的在市政和中央间没有中介人的特权也开始减弱。哈德良把半岛划分为四个司法区，并为每个区配备一名具有执政官官阶的法官。由安东尼·皮乌斯废除的这一措施，又由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使之生效，并维持下去。这些法官接替的是罗马法院的职权，而不是市政法院的职权；然而，城市政法官很快成为其下属。从图拉真开始，各城市内活动着的皇帝特使，起先是出于特殊和临时的使命，尔后变为常设。

上述事态之先，罗马-古意大利人军队的数量大为削减（部分归因于皇帝政策，部分归因于意大利人口的渐减）。从韦伯芗时期起，各军团在意大利招募的士兵逐渐减少（而在禁卫军里意大利士兵仍占优势），以至于图拉真的部队主要是由各行省抽丁组成——那时是从有产阶层里招兵——也有一小部分意大利北方的士兵。塞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 年在位）也削减禁卫军里的意大利人，代之以各行省的士兵；其结果是，许多失业的意大利青年沦为角斗士或匪盗。又是塞蒂米乌斯·塞维鲁下一道敕令，撤销了在意大利不驻扎军团的特权。上述种种情形导致外国军队占据意大利，并愈益随心所欲地摆布皇帝。还是在塞蒂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帝国政策首先用重税繁徭，用强制性公债，用货币贬值，来盘剥压榨人民，为自己的军队搜刮必要的钱财，从而以薪金和特权来赢得军队的支持，使军职成为民职的基础。

15　帝国末期　意大利沦为行省　天主教会和教皇国

塞蒂米乌斯·塞维鲁死后不久，开始了所谓的军人无政府时期。三世纪中叶战火连天，帝国穷兵黩武，武装到了牙齿：军队主宰一切，高级政府官僚多为行伍出身。由于意大利人从军队里绝迹，从军的除非意大利人外，还有野蛮人（来自农民阶层，尤其是多瑙河沿岸国家的农民阶层），这意味着意大利人失去了参政的任何可能，完全成为政治活动的对象。元老院和意大利高层阶级对这一状态深为不满，愤愤不平；因而意大利起而反叛马克西米努斯，其军队的远征又为阿奎

莱亚的反抗所阻止，他本人也战死城下（238 年）。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无济于事，在安东尼世纪里执掌政府的阶层，不只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大部分人被尔后的皇帝和其军队有计划地加以屠杀。在这种情景下，卡拉卡拉将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212 年）（除那些不属于任何市民阶层的劳动者之外），但对于意大利的政局无所裨益，因为罗马公民权已毫无价值。

愈加独裁的军事君主制以及由于走马灯似的暴力地更换皇帝，再加上觊觎皇位者之间兵刃相加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使各城的自主权化为乌有。通过设立“监察官”，帝国官员干预城市行政事务已属惯常和层出不穷。三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监察官似乎是唯一的一位官员。很可能是，塞蒂米乌斯·塞维鲁首次制定有关市政法官负责替国家收取税收的规定，也是他首次把公共服务和慷慨捐赠变为强制制度。职业行会对于国家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其他劳役愈加重要，正变为强制性的国家机构。因此，其组织和作用有明确规定，并得照章办事。皇帝趁机巧取豪夺，损害各城利益。

对三世纪里的意大利经济状况，我们尚无专门资料，很可能是，帝国普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在意大利表现得更为集中，更加迅速。菲利普（244—249 年在位）时期，翁布里亚匪盗肆虐；伽利埃努斯（260—268 年在位）时期，西西里爆发农民起义。意大利土地上，也内战频仍，造成了一系列后果；意大利复又受蛮族威胁，确切地说，受日耳曼人入侵之威胁。帝国除了一小块土地外，放弃了对其统治，而日耳曼人却从多瑙河那边向不远的意大利北部边境压迫过来。在一段时间内，侵略颇有吓人之势，以至于奥勒良皇帝（270—275 年在位）被迫修筑罗马城墙，用他的名字命名为奥勒良壁垒。

政治经济衰落的同时，文化也呈颓势。三世纪时，意大利的文化田园一片荒芜，相反，这期间新出现的基督教迅猛传播。如今，古老的罗马教已是垂死之物：只作为国家的祭祀仪典和传统活动。对皇帝的崇拜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既是一种罗马国家的政治荣光的体现，又是一种在帝国时期对奥古斯都就已表现出的将其作为人类神灵

和救星的君主的东方式顶礼膜拜。在帝国时代，层出不穷的宗教由东方传播而来；与希腊-罗马多神教不同，它们拥有世界性，旨在保证人死后的幸福。在五花八门的宗教里，基督教以其理性和人伦的高超，并以其组织的力量独占鳌头，力克群芳。由神父和副主祭辅助的主教在城市大建教堂，许多地区，在一些较为重要的教堂周围，集结了一批小些的教堂，它们之间保持着联系。在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教堂网络。初期，基督教就在意大利的南方和罗马广为流传：一世纪中叶，在罗马已经存在一个十分活跃的基督教团体。这一团体享受着特殊的威信和权威，因为人们还铭记着两位主要使徒的讲道和殉道，并把其主教作为彼得的接班人，同时它又起源于帝国首都的教会。稍后，基督教在意大利北方发展起来。从三世纪中叶起对教徒部分的偶然的——在罗马，在尼禄时期迫害是血腥的——最后是普遍的迫害，并未能阻止这一新的宗教的胜利和迅速扩大。

三世纪末，皇帝克劳狄二世和奥勒良着手重建帝国（268—275 年），以避免帝国走向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和落入蛮族之手的厄命，尔后，戴克里先（284—305 年在位）从制度上、组织上加以调整；君士坦丁大帝（306—337 年在位）又继续这一工作。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的重建者再将首脑变为“多米努斯”（意即“主宰”），将罗马帝国变为具有东方神权政治强烈色彩的专制官僚君主制度；这一变化使意大利丧失了在帝国享有的任何特殊性，从税收开始，与各行省一律平等。帝国进行行政区域新划分，设若干大行政区，为首的是禁军行政长官，大行政区下设行政区，其长官为代理行政长官，行政区下是行省，长官是行省长官。意大利是意大利大行政区的一个行政区（其行政长官驻守米兰，为帝国在西方的新址），其他行政区是伊利里亚区和阿非利加区。意大利行政区是奥古斯都意大利最广大的一个行政区，包括北起阿尔卑斯山的科蒂安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的腊埃提亚地带以及三个岛。意大利分成的各行省（这和奥古斯都时期的地区有所不同，在四世纪数量有所增加）并非全都置于意大利的行政长官之下，而只是北方的所谓的“粮食省”，因为必须从这些省份里征收贡物，以供皇帝

宫廷之用。相反，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各行省，即所谓的“城市省”或“郊区省”，被置于官署在罗马的“城市代理行政长官”之下，其贡物输往罗马。四世纪时，郊区意大利部分被列入粮食区，显然，这是为了增加宫廷的财力。罗马在城市行政长官的治理下，保留自己的行政权，元老们保留城市的司法权；元老院几乎只是作为一个市政议会存在。君士坦丁堡，帝国新都城（330 年）——系由君士坦丁所建——变得最为重要，这标志着东方对西方有着决定性的稳固的优势，标志着罗马帝国演变为拜占庭帝国。

当时，帝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至少在纸上）官僚等级制度。直接受制于各省地方长官的意大利诸城，失掉了任何自主权。尽管那里仍有市政议会或元老院，但其成员只不过是办些收税的杂差而已。经济生产萧条迫使国家加重征税，反过来又使生产更趋衰竭。戴克里先制定的纳税制，规定每一个区应缴纳一定的税赋，由地方当局摊派。由于大地产主有权有势，税的重担主要压在佃农头上（大地产者也对他们收税），一部分压在小农身上。从小农中选拔什长，他们用他们的财产担保替监察官负责为市政抽税。沉重的负担使他们自然而然想方设法逃避职责，但法律又使这一职务为强制性的、世袭的；正如工匠一样，他们参加职业团体，也是强制的、世袭的。又如驻防军人的儿子只配当兵，佃农的后代永远和黄土地绑在一起，或者永远为“农奴”。

这时，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机构——天主教会。在君士坦丁时期，天主教会得到司法上的充分承认，并享有各种特权。四世纪时，变为国家的唯一得到承认和允许的（除了犹太教的特权和给予为帝国服务的野蛮的异教徒以特别宽容外）教会。狄奥多西皇帝（379—395 年在位）以后，异教和邪教被视为对国家的犯罪。基督教会组织通过和世俗组织更紧密的结合而完善；每一个帝国行省的主教各组成一个都主教区。教会行省又围绕几个超级都主教区结成更广泛的单位（并不是有规律地符合世俗的行政区），其中较大的称牧首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不大重要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召

集一个或数省的主教开会，讨论较重要的事务；包括帝国所有教会的大公会议（由皇帝宣布）又称普世会议。即使在教会以外，主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整个西方）也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列举米兰主教圣安布罗焦为例，他是在四世纪后二十五年内任主教的，在此之前，他曾出任包括狄奥多西在内的一些皇帝的顾问和监察官。

在西方，唯一的牧首是罗马主教，正因如此，稍后，大祭司或教皇成其特殊头衔。他不但自己要求最高荣誉，而且还要求对全体天主教教徒的最高领导实权，因为他是作为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而耶稣正是把关键权力（也即是解除或捆紧信徒的意识）和放牧基督教羊群的鞭子托付给了他。教皇利奥一世（440—461 年在位）是位能量极大的人，他确定了这些原则。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敕令（445 年）承认他对整个西方教会拥有主宰权。这样，罗马取得了在宗教和教会方面的重要性，但逐渐失掉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罗马主教也成为中部和南部意大利的唯一的都主教，他下属有数不清的主教团；而北部意大利的主教辖区数量较少，在五世纪分裂为米兰主教区，阿奎莱亚主教区和拉文纳主教区。

罗马历任主教在神学斗争中支持东正教理论为合法的理论的讲话，有助于加强其统治地位。四世纪进行的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讨论中，他们全力支持圣子耶稣基督之完美神灵说（在 325 年的尼西亚普世会议上宣布的），反对认为圣子比圣父低一头的阿里乌教派，并使这一学说大获全胜。在五世纪展开的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关系的基督教义争论中，他们反对聂斯脱利派，该派似乎支持基督的人性，不赞成其神性；他们也反对优迪克派及其更缓和的形式，即耶稣一性论，该派旨在从相反方向将基督的人性融合于其神性之中。在卡尔西顿第四次普世会议上（451 年），利奥的既不混合也不分离的“双性论”取胜。然而，在反对帝国所在地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立志要与罗马教会争雄的倾向方面，他未能同样获胜。这次普世会议支持这一倾向，承认其对色雷斯、亚细亚和本都教区的最高权力，居全部教会中的第二位。

基督教会的重要性，在文化领域里也确立下来。帝国末期，文化

大幅度地变为教会文化。世俗文化越来越变为学究文化，精神上贫乏的文化。四五世纪时，重要的世俗作家甚少，没有任何人是意大利的。古老的文学文化在高卢人中比在我们中间更为发达。相反，新的教会文学——大量地吸收经典修辞学，以革新和改编的形式继续各种类型的文学，发展和保护古老文化遗产——正如在意大利之外一样，以各种形式也在意大利人中植根繁衍：主教的布道或“讲道”（维罗纳主教圣芝诺、布雷西亚的圣高登斯、拉文纳的金口圣彼得、都灵的圣马克西穆斯）；注释论文、伦理-苦行论文、教理论文（圣安布罗焦、圣哲罗姆）；赞美赎救宗教仪式，宗教节日和殉道的圣颂（圣安布罗焦、圣保利诺·迪诺拉）。在教皇达马苏斯的提议下，圣哲罗姆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稍后，这一新译本称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经典的官方文本。当时最负盛名的教会作家，是非洲人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他对哲学-神学思想，对中世纪整个西方的宗教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狄奥多西死后（395 年），帝国行政（从戴克里先以后几乎已习惯）分裂为东部（都城在君士坦丁堡）和西部，已成定局，尽管形式上仍维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东部内外条件都优于西部，占有明显的优势。野蛮人主要在西罗马帝国攻城夺地，西罗马帝国的防务力量和对抗外来威胁以及内部邪恶的能力日益减弱，其有效统治愈益削弱。几乎整个高卢、西班牙、非洲被蛮族所占领和统治，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作为帝国“联邦成员”定居下来的，也即是形式上承认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和对罗马公民的司法权。由于旧帝国的沉重税赋而引起的不满和不信任，民众对蛮族的统治是被动地接受，或许还有些好感，直到奥多亚克时代，意大利仍未被永久地占领：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哥特人入侵——其后果是都城由米兰转移到拉文纳——占领罗马（410 年）；阿提拉率领下的匈奴人侵入到波河一带（452 年）；盖塞里克的汪达尔人占领罗马（455 年）（汪达尔人已占领非洲，又占领西西里和撒丁岛，在意大利沿海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西罗马帝国的后二十年，无能的皇帝走马灯似的替换，但均掌握在蛮族军事长官里基默尔之手；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对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行使最

高权力，他反复任命其西部同僚。被任命的皇帝中的一个叫尤利乌斯·内波斯被继里基默尔为军事长官的奥雷斯特斯所废，但他仍留在达尔马提亚。奥雷斯特斯让军人宣布其年轻的儿子罗慕洛为帝（475 年 10 月），罗慕洛为自己取名为奥古斯都，或者如民众称他的奥古斯都。拥戴他为皇帝的蛮族军人（赫鲁利人、西罗人、土尔奇林基人），要求奥雷斯特斯让出一部分意大利土地，以便驻军，正如其他蛮族在意大利外所做的那样。奥雷斯特斯予以拒绝，于是他们宣布其首领奥多亚克为王，他可能是西罗人。奥雷斯特斯死守帕维亚不出，后城被攻破，毁于大火，他幸能脱逃，但于皮亚琴察被杀。拉文纳也表示归顺。罗慕洛·奥古斯都被流放到坎帕尼亚，食宿无虞。同他关在一起的有其他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人们习惯把 476 年作为旧世纪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

第三章　东哥特人和拜占庭人

16　奥多亚克政府和西奥多里克的成就

西罗马帝国山河破碎——丧失不列颠、非洲、西班牙、高卢，把伊利里亚（巴尔干半岛）让与东罗马帝国——使得意大利与世隔绝，成孤立状态，于是又开始获得了其杰出的民族个性。当奥多亚克入主意大利时，意大利和西罗马帝国几乎有着同一边界。高卢的罗马民众和西班牙的罗马民众已经脱离出去，同意大利民众无关系，他们开始同日耳曼入侵者迅速融合。其结果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与共和国后期一样重又变为同一名词。同化并不意味着罗马人被吸收于意大利人中，而是正相反。意大利人是罗马人，也即是帝国的属民，或者正如人们还在说的，是“共和国”的属民。帝国的理想不仅仍旧存在，而且还存在着法律概念：不仅对于罗马人，而且对于蛮族人来说，意大利仍是帝国的一部分。奥多亚克、西奥多里克在法律上自认为也是帝国的代理人。高卢和西班牙脱离帝国后，罗马民众渐与日耳曼驻军融合，随后出现一个新的民族，而意大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从476年8月起，奥多亚克成为意大利的主宰，服务于帝国的蛮族军队拥戴他为王。他指挥军队击败并杀掉奥雷斯特斯，废黜罗慕洛·奥古斯都。然而，奥多亚克只是蛮族之王；为了解决其在罗马人中的地

位，奥多亚克要求罗马元老院派一使节去君士坦丁堡，请求皇帝芝诺（474—491 年在位）批准他以贵族尊严代表唯一的皇帝治理意大利。开初的回答不那么痛快；可是至少在事实上芝诺削足适履，顺应形势。于是奥多亚克以贵族和皇帝在意大利的最高官员统治罗马人，但不行使皇帝的特殊权力——颁布法律和铸造金币。

罗马行使的中央和行省的行政管理以及罗马市政管理仍完整无损，仍由罗马人根据罗马法执行。关于经济，奥多亚克务必满足蛮族军人提出的土地分配要求。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把一个世纪来在帝国许多地区发生的有利于加盟的野蛮人的一切事情扩大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蛮族军“客人”在其驻地已占用三分之一的房屋，现在这种办法又扩大到土地上，起先，只是暂时借用，随后据为已有。

奥多亚克信奉阿里乌教，其蛮人亦多为阿里乌教信徒。不过，他不过问罗马教会的事情，听之任之。他站稳脚跟后几年（484 年），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西乌斯向皇帝芝诺提议颁布通谕，赞成与一性论和解，否定卡尔西顿会议，于是有了所谓的阿卡西乌斯分裂。奥多亚克绝不愿卷入争论，但要从罗马和拜占庭的不和中火中取栗，坐收渔利，因这一分裂助长了罗马人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的潜在反感。

从领土上看，奥多亚克主宰整个意大利大陆和西西里以及尤利乌斯·内波斯死后（480 年）的达尔马提亚。西西里是以偿付赋税的办法由盖塞里克归还的。奥多亚克听任西哥特国王欧里科于 480 年夺取普罗旺斯，因此，意大利在这一面的边境收缩到原来的地理边界。后来（484 年）向诺里克（相当于不包括蒂罗尔在内的现今的奥地利）远征，讨伐向边境用兵的鲁吉人，击败他们后，没有占领该地。东北部没有屏障，意大利几乎是敞开门户，西奥多里克可以长驱直人。

帝国并未放弃重新确立其对整个意大利的更直接的司法权，而不是奥多亚克那种事实上独立的代理权，作为帝国联盟成员而早已驻扎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东哥特人的新领土需求与这一企望一拍即合。东哥特人的首领是西奥多里克，他出身于阿马里血统，童年作为人质在君

士坦丁堡生活过若干年，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经过一系列亲仇交替的事变后，他确立了作为蛮族首领和帝国军事政法官的双重地位。他同芝诺达成协议，要把意大利从奥多亚克手里夺走。他于488年秋举兵，得到鲁吉人的协助，其首领腓特烈投奔于他。于萨瓦击败格庇德人后，489年夏，越过意大利东部边界，于伊松佐河战胜奥多亚克（8月28日），于维罗纳入主意大利北部（9月底）。奥多亚克于拉文纳闭城不出。意大利民众分为两派：一部分仍效忠奥多亚克，另一部分——包括罗马元老院——承认西奥多里克为皇帝的使者。奥多亚克发起反击，开初节节胜利，但好景不长，490年8月11日于阿达河畔再次被击败，重又被困于拉文纳，一困就是三年。后签订一协定，其确切条款不得而知；按照协定，西奥多里克率兵入拉文纳城，以叛变罪斩杀奥多亚克（493年3月），其同伙及支持者悉数问斩。东哥特人拥戴他为王。

17　西奥多里克政权

和奥多亚克不同，西奥多里克是以帝国的正式委任而名正言顺地占有意大利的，但也许其权力界限未予确定。他也利用罗马元老院的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以便最终确定其地位；但新皇帝阿那斯塔西乌斯一世（491—518年在位）对他颇有敌意，只是几年之后（也许是在497年）才达成一项协定。皇帝送给西奥多里克红袍和其他皇室标记，那是奥多亚克归还君士坦丁堡的；以这种举动正式承认他为皇权在意大利的最高代表。于是，他任命全体官员，包括一位执政官，颁布规章制度（但不是法律），铸造钱币（金币除外），一般地执掌执法和司法最高权力。与此同时，他应人民的要求，登上东哥特人之王的宝座，统率蛮族军队。整个制度基于这种二元性。机构和人事方面的民事管理仍沿用罗马旧制，军队绝对是东哥特人的，通过军队，哥特民族仍由自己的首领和法庭管理自己。哥特人的特权在于，在哥特人和罗马人间的诉讼里，由哥特法官（也即军人）加以裁决，罗马人只出一位助手加以协助。相反，即使对于哥特人，也仍使用罗马法，个人和家

庭关系除外，但就在这些关系上，其制度也深受罗马影响。军事组织亦然，尽管只信任哥特人，但至少在高级阶层其体制和名称仍沿用罗马旧制。

在高级政府中，除由罗马人占据的罗马官职外，还有专为国王个人服务的哥特人，形成一种王室会议。省（罗马）行政管理由国王通过哥特巡视员来监督；通过巡视员，国王（这一名称是由罗马人和皇帝本人封的）行使其最高庇护权，任何臣民均可借助这一庇护权。因此，二重性不是绝对的；罗马和哥特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然而，人种、语言和教派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西奥多里克的个人方针并不是旨在融合两个民族，而是让他们简单地和睦相处，互相服务：哥特人用武器捍卫意大利，意大利人用其土地维持哥特人的生活。国王的意图是，罗马文明应成为哥特人自己的文明。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形势介于罗马-蛮族新王国和帝国直辖的各行省之间。那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它既可以回复到帝国行省的状态，也可以是完全自主和建立于罗马-野蛮人融合之上的崭新的国家形态。

西奥多里克又把三分之一的土地分配给哥特人。然而，这尚未把奥多亚克分封的那一部分土地计算在内，因为分封的领土的大部分早在奥多亚克时，已因前主人死亡或加以剥夺而转到新主之手。尽管如此，由于东哥特人远比奥多亚克军人多，理所当然要从意大利人民手中夺取更多的土地。从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新的分配土地没有造成太多的不满，这归因于被指定从事这一工作的罗马贵族利贝利乌斯的才干和正义感。哥特军队不是平均分布于意大利各地，多数驻防于北部和东部，以便更靠近边境和国王所在地。西西里，几乎整个意大利南部和拉齐奥没有哥特殖民化。对让出的三分之一以外的土地，仍继续课以先前规定的土地税，以维持蛮军生活。

总而言之，经济社会状况没有任何变化，仍以大地产者为基础实行严格的阶级区分。仅仅是，在以罗马人为大多数的高级阶级里，出现了少量哥特人。税收仍维持帝国的做法，罗马人和哥特人同样有份儿；或许后者千方百计利用其势力逃税漏税，转嫁给前者。罗马大地

产者也感受到了一个比日暮途穷又与己无关的帝国更强大更倾向于保护小农和佃农的势力的作用。推行有利于下层阶级的经济政策的迹象是哥特政府极力维持谷物的低价。

西奥多里克政府初期，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极其悲惨，其源出于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战争和伴随而来的蛮族入侵，其中有勃艮第人，他们一直劫掠到艾米利亚一带。西奥多里克在主教们，尤其是帕维亚的主教圣伊皮凡尼乌斯的帮助下，致力于使人民脱离苦海；伊皮凡尼乌斯还到勃艮第去赎回身陷为奴的意大利人。

经过最初的几年后，经济开始复苏，公共秩序的稳定有助于这一复苏。社会安全极好，同时代人均羡慕不已。西奥多里克尤其在拉文纳和罗马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失业有所缓和。国王花费巨款修复罗马古建筑，并继续实施帝国的传统做法：免费施舍生活必需品，或压价出售。恢复庆祝传统的竞技活动。公元500年，他亲自访问罗马，受到元老院、教士和人民的盛大欢迎，欢呼他为新的图拉真。这个词本身就表明罗马思想和帝国思想仍是多么强烈，这种思想也反映在西奥多里克的某些钱币上，上面印有他戴头盔的头像并书有“不可战胜的罗马”。

西奥多里克时代，在文化领域也是帝国时代的继续。西奥多里克统治期间，拉丁文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兴旺，他的某些官员在拉丁文学方面名列前茅。最出名的有塞维里努斯·博提乌斯和元老院议员卡西奥多鲁斯。前者官至执政官，是研究古哲学的大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向其同胞传授古哲学的精髓，他的一些著述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作为教科书。除了哲学外，他还从事天主教神学的研究，但其方法是偏于哲学性的（下面要讲到他最著名的著作《哲学的慰藉》）。后者是西奥多里克的秘书，头衔是“神圣宫廷财政官”，他专为西奥多里克草拟信函和政令，爱用华丽而晦涩的修辞文笔。他也官至执政官，西奥多里克死后，为禁军行政长官。为支持西奥多里克的政策，他撰写了哥特人的历史，赞扬哥特人民和阿马里血统。他还撰写了一部编年史，起自世界的开端，止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后来，退出政界后，编写了

《圣经》注释和一种宗教学及世俗学的百科全书。

除了罗马和拉文纳外，米兰在这一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了西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文化中心。米兰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恩诺迪乌斯（后为帕维亚主教）。他的创作（雄辩演说词、短诗、书信集）大都具有世俗特点，修辞极华丽。他写的西奥多里克之颂词和圣伊皮凡尼乌斯的传记，对研究那一时代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在宗教方面，西奥多里克保持奥多亚克的方针不变：充分尊重罗马教会的自由和特权，不做任何改宗和不采取任何有利于哥特宗教的措施。由于他信奉阿里乌教，他不想在宗教事务方面要求皇帝的代理职务，像在俗务方面一样。因而，注重教会和国家的区别以及教会的独立。同时，由于阿那斯塔西乌斯皇帝和教皇格拉西乌斯一世（492—496 年在位）之间的冲突加剧，满脑子浸透教士权利和罗马教会权力的教皇，声明罗马教会在宗教事务上高于帝国；但西奥多里克却没有感到教会的这种独立会给他带来什么政治损失。格拉西乌斯继承人阿那斯塔西乌斯二世死后，在罗马爆发了裂教，举行了教皇的双重选举：支持同君士坦丁堡签订协议的劳伦提乌斯和叙马库斯（498—514 年在位）。为此，罗马教会自己要求拉文纳做出决定：西奥多里克宣判赞成由大多数人推选出来的叙马库斯。叙马库斯的对手到国王那里指责他行为不端和滥用教会财富，于是西奥多里克只得再度干预；暂时中断叙马库斯的职务，把这一争端交由他于罗马召集的意大利宗教会议决断。面对叙马库斯不承认宗教会议拥有裁决权，大会声称无力裁决高于所有的人的罗马主教问题，并恢复叙马库斯之职（501 年）。这样，会议放弃确立国王承认的针对教皇的最高权力。劳伦提乌斯一派在罗马武装抵抗几年，最后西奥多里克决定干预，迫其接受宗教大会的裁决。

18　同帝国和法兰克人的关系　政权危机

在对外政策方面，西奥多里克遵循两个方针：同帝国维持友好关系；在形式上作为属国的范围内，借助同西部其他蛮族国家的友好关

系保证自己对君士坦丁堡的足够的强大。他对蛮族国家极力充当一种威严的调解角色。他以联姻结盟来实施其西部政策。他将一个妹妹嫁给汪达尔人的国王特拉萨蒙特（由于西西里岛不再给他们付税）为妻，将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勃艮第国王冈多巴德之子西吉斯孟德，将另一千金许配给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然而，克洛维对阿拉里克二世发动的战争（507 年）打破了西部平衡，战争的结局是，西哥特高卢的大部分领土落入胜者克洛维之手。于是，西奥多里克进行干预，通过其摄政官治理西哥特王国，撤掉阿拉里克二世年幼的儿子阿马拉里克。皇帝阿那斯塔西乌斯企图联合克洛维共同反对西奥多里克，但西奥多里克由两个方向采取措施击破这一企图。他早已占据诺里克和潘诺尼亚，这时又占领普罗旺斯；于是部分地重建西部帝国，这是他的政绩，与帝国无关。然而，他的这一政策在意大利之外没有获得久远的结果，而在意大利也没有巩固住他的地位，相反，却分散了他从事其历史性任务的精力，那就是建成一个自主的意大利国家。同时，克洛维在高卢却实现了这样的任务。

当时，西奥多里克的政策好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达到其顶巅。他同皇帝阿那斯塔西乌斯恢复了正常关系。阿那斯塔西乌斯继承人查士丁（518—527 年在位）批准西奥多里克选择西班牙哥特人欧塔里科作为他的接班人，把女儿阿马拉珊萨嫁给他。这样，在意大利人民的眼中，西奥多里克政府仍是帝国的属国，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一旦消除争执，这个政府会更加有效。争执之消除是查士丁的，或者说是实际掌权的侄子查士丁尼的功绩。由于教皇何尔米斯达斯与帝国和东方教会达成协定（519 年）——根据协定，后二者放弃阿卡西乌斯案——，裂教活动结束；帝国宫廷和教皇罗马之间的关系从而非常融洽。这时许多意大利人又转向君士坦丁堡。达成由西奥多里克赞成的宗教协定后的最初几年，没有出现政治骚动。然而，哥特国王反而能够将其统治扩大到南高卢，那时勃艮第王国由克洛维的两子之一吞并。这一王国的灭亡使西奥多里克夹在愈益强盛的法兰克王国和重操西方政策的帝国之间，成孤立状态。当非洲的希

尔德里克国王（523 年）开始执行亲天主教和亲拜占庭的政策并中断同拉文纳宫廷的关系时，这种孤立状态就更加重了。

西奥多里克和意大利之间因新的政治局势而产生了潜在的仇视和怀疑，接二连三地指控罗马贵族中的显要人物犯有叛变罪行。第一个被指控并判以死刑的是贵族阿尔比诺斯；随后是当时的学者博提乌斯，也以参与叛变罪被起诉，判处流放意大利北部，处死于流放地（524 年或 525 年）。在判处和死刑执行期间，他用散文和韵文交替的手法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哲学的慰藉》，书中哲学思想给他以愉悦，使他认识到物质是空的、精神才是高尚的，是自身的主人。博提乌斯的岳父叙马库斯也被处死。罗马元老院的大部分元老被制伏，宣布判决；罗马贵族和哥特政权之间已出现深深的裂痕。

由政治冲突引出宗教和约的破裂。查士丁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采取措施反对阿里乌教徒：西奥多里克出面保卫他们，迫使教皇约翰一世前往君士坦丁堡为其游说。教皇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他返回时没有带回西奥多里克所企望的全部东西，他被国王拘禁于拉文纳；几天后（526 年 5 月）愤死，被作为阿里乌教的一位殉教者。在选举新教皇中，西奥多里克一反过去教会政策，断然干预。据传，他曾草拟一道敕令，要求天主教会服从阿里乌教派，但是猜测中的敕令尚未出台之前（也许根本没有这一敕令），他就于 526 年 8 月 30 日于拉文纳寿终正寝。

早死者欧塔里科和阿马拉珊萨之子阿萨拉里克继承其王位。母亲阿马拉珊萨摄政，继续推行旧政。同罗马人民和教会重修旧好，获得拜占庭对其新政府的确认，委任卡西奥多鲁斯为首相。可是军队内群起反对她的亲罗马方针，阿马拉珊萨只得放弃其子接受罗马教育。但她成功地控制住政府；可是儿子夭折（534 年），她认为必须在哥特高级贵族中寻找一位支持者，于是她下嫁表兄西奥达哈德。他是托斯卡纳的大地产者，似乎支持罗马方针，潜心于钻研学问。阿马拉珊萨自认为能控制全权；但西奥达哈德暗地攫取权力，把她流放在博尔塞纳湖的小岛上，后派人刺杀之（535 年）。

19　帝国再次并吞意大利

当查士丁尼一世（527—565 年在位）即皇位时，早已大权在握，这时着手实现他的罗马-基督教帝国的民事、军事及教会复兴计划。有两条道路供他抉择：复兴帝国西部的权力，或者集中力量于欧、亚洲东部。拜占庭帝国的真正使命是在第二条道路上，查士丁尼却选择了第一条路，而走这条路对帝国来说尚缺乏有利的环境和必要的力量。这样，他准备摧毁在意大利的哥特政权（这一政权因哥特贵族和罗马贵族之间不能达成谅解而大受其害），而又不能以任何永久的和现成的形式来替代之。

在民事方面，查士丁尼的罗马化首先体现在编纂罗马法典这一浩大工程上；完成这一巨大工程，他获得历久不衰的成果，其重要性影响着整个西方后来文明。在特里波尼安主持下的法学家委员会收集和整理全部现行法律条文，编成《查士丁尼法典》一书，编纂法律手册《法学总论》，并把帝国前三个世纪的最有权威的法律学家的精辟论述编成《法学汇编》。这三部巨著组成《罗马民法汇编》，直到今天，它们仍是研究法律的基本材料。出版工作从 529 年延续到 534 年。

尽管查士丁尼致力于这项伟大的罗马工程，但在他的统治下，却已开始描绘出帝国的希腊化和东方化的蓝图。他本人在《查士丁尼法典》以后颁布的《新律》中，使用希腊文；半个世纪之后，希拉克略（610—641 年在位）时期，希腊文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皇帝本人采用希腊名称“巴西莱乌斯”（拜占庭皇帝）来替换罗马头衔。这样，在经过“帝国末期”这一过渡时期后，真正诞生了拜占庭帝国；然而，这一帝国继续被叫做“朝圣罗马之国”，继续自认为而且在意大利还被认为是古罗马的继承人，并继续以这一名义干预意大利事务达五个世纪之久，对其文化产生了某些有益的影响；但从整体上说，阻碍了意大利生活的正常发展。

贝利萨里乌斯将军征服汪达尔王国（533—534 年），从而开始了查士丁尼梦寐以求的西部复兴计划。杀害阿马拉珊萨后不久，查士丁

尼借机出兵干预，矛头直指西奥达哈德。贝利萨里乌斯乘胜从非洲渡海踏上西西里，毫无困难地夺取之（535 年），因为哥特驻军寡不敌众，而罗马大地产者纷纷宣布归顺他。南部意大利大都无力抵御，帝国士兵穷追猛打，一直兵临那不勒斯城下，守军闭门不出。城被久困；一朝攻陷，则惨遭劫掠。西奥达哈德没有增援该城，被哥特军队罢免，他从罗马逃往拉文纳的途中被击毙。新王维蒂吉斯骁勇善战，一方面准备武装抗击，同时为使其当选合法化，娶阿萨拉里克之妹马塔孙塔为妻。他暂时撤退到拉文纳；在教皇西尔维留斯的带领下，罗马人即请求贝利萨里乌斯入城，于是他于 536 年 12 月进入罗马。

537 年春，维蒂吉斯向罗马调集重兵，包围贝利萨里乌斯于城中。贝利萨里乌斯依恃坚固的城堡和优于哥特人的军事技术，顽强抵抗；一年后，维蒂吉斯只得撤围，率众返回拉文纳。中部意大利，除某些要塞外，也从哥特人手中失落。在北部，哥特人向法兰克人求援，许以普罗旺斯。法兰克人来到后，大肆蹂躏、杀戮，其中一支部队援助维蒂吉斯之侄子乌拉亚，攻打米兰，城中居民求助的拜占庭人从热那亚匆忙赶到，法兰克-哥特军力占压倒优势，米兰被迫投降，城池被夷为平地，生灵涂炭，或被贩卖为奴（539 年）。米兰的繁华盛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过去的记忆。这一局部胜利并未给残留在拉文纳并被贝利萨里乌斯围困的哥特王朝的命运带来什么好处。维蒂吉斯投降，贝利萨里乌斯也在哥特首都重建帝国政府（540 年）。

哥特武士的核心力量仍驻扎在北部意大利。经过希尔迪巴特和赫拉里科两朝转瞬即逝的统治后，哥特武士紧跟智勇双全的巴杜伊拉，他的诨名托提拉（“仙人”）更是家喻户晓。他好像熟知哥特军队和意大利民众之间达成默契的基本政治问题。刚刚恢复的拜占庭行政管理取消了意大利人所拥有的自主权，并让意大利人尝到了拜占庭的横征暴敛的滋味。托提拉利用这一事实大做文章，宣扬哥特政权对帝国政权的优越性。上层贵族，即大地产者，出于传统和切身利益仍站在拜占庭派一边；哥特国王在下层民众中找到了多数听众。他尤其对佃农开恩，免除他们给那些因赞助帝国派而被他没收土地的主人交付劳役

地租。除了从主人那儿获得自由的一定数量的奴隶参加哥特部队外，他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加强。他的军力日渐消耗，帝国的部队却从君士坦丁堡那儿得到新的补充。

几年来，帝国行动一贯迟缓，没有做好充分的供应，派出攻打托提拉的贝利萨里乌斯因而兵力不足，未能阻止其前进。那不勒斯和罗马重新落入哥特人手中，贝利萨里乌斯虽能短时打回罗马，于城中坚守一阵；但终归不得不放弃意大利（548 年）。托提拉夺回罗马（550 年）。除了某些要塞外，他在几年内称雄意大利，成为专制独裁者。然而，当朝廷宦官侍卫指挥官纳尔塞斯拥重兵进入意大利，托提拉却束手无策，不能或不知如何才能阻止其前进。他们沿威尼斯的沼泽海岸推进，攻至拉文纳，由那儿取道前往罗马。在翁布里亚-马尔凯一段的亚平宁山脉山口，也许在斯凯贾和瓜尔多·塔迪诺之间，托提拉全军覆没，自己成为刀下之鬼（552 年初夏）。哥特人集聚南部意大利，拥戴新王泰亚斯；但是，在维苏威和拉塔洛山之间的平原上，于萨诺河滨，全军再度失败（552 年 10 月 1 日），泰亚斯阵亡。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的一支部落）在阿勒曼尼首领雷塔里和布蒂利诺的率领下入侵意大利（553 年），他们穿过整个意大利，所到之处，破坏殆尽；最后入侵者遭到瘟疫和纳尔塞斯军队的沉重打击（554 年），全线崩溃。至此，整个意大利又置于帝国政府之下。

20 拜占庭治理下的意大利

查士丁尼着手拟定专门法规，颁布《国事诏书》（554 年），使哥特统治向帝国复兴过渡。《国事诏书》承认直到维蒂吉斯的哥特法规法令；相反，取消被称做“暴君”或“篡位者”托提拉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因为其权力没有得到帝国的任何合法承认。这时，意大利又回到受君士坦丁堡统治的罗马大行政区内的一个帝国行省的地位。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不属于罗马大行政区。西西里直属于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私人领地；撒丁和科西嘉附属于非洲政府。地方政府首脑为君士坦丁堡委派的禁军行政长官；各行省的地方长官由世俗和教会

名流从地方贵族中选举产生。由于伦巴第人大举入侵，战争连年不断，这些地方长官的权力名存实亡，大权全部揽在帝国军队长官（或称“总督”）和其属员（或称“首领”）——指挥各行省的军队——的手里。“总督”是帝国的一种代理人，有点和奥多亚克及西奥多里克相似（至少从理论上讲），然而他们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总督”是临时的，得到皇帝的许可后可以撤换，而且不像蛮族国王拥有自己的军队。

各行省的地方长官的任务是征税和收税，这些税收沉重地压在人民的身上（只免除那些暂时的部分税赋）。财政和经济状况又回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前的状况，受益的是大地产者，受损害的是其他阶层的人民。

二十年的哥特战争造成无法描绘的惨景：饥馑和瘟疫使人口减少十分之一，田园荒芜，小农不复存在。像罗马、米兰这样的大城市遭到可怕的打击，据传，托提拉第一次占领罗马后，城里有三个月绝无居民。

除拉文纳和那不勒斯少数几个城市外，在这一时期内旧市镇组织所剩无几。城市各行政区销声匿迹，罗马元老院也不复存在，在战争后期，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早被哥特人可怕地大批杀戮。这时，各城市里主教是空前重要的人物，围绕在他左右的，是主教堂和堂区的教士。《国事诏书》除了给予主教参加行省长官的选举外，还正式授予其以监督和保护民众中最弱者的一些公共职能；然而，其权威和有效干预大大超出官方权限。

主教们都是大地产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其拥有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大农业主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当城市走向衰微时，形成了以大田产为中心的庄园“别墅”或“庭院”，构成了经济生活的中心。庭院以及周围的土地由所有者通过其官员直接管理，奴隶和佃农为其卖命。其余的土地由佃农以不同的条件耕种，但其中一个共同特征是，佃农应将所获的一部分献给主人，这样，他们就和土地捆在一起，其整个经济生活从属于农庄主庄园。庄园为所有居住在庄园的人组织——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词说，规划——必要的服务：磨面粉、

烤面包、生产装饰品、衣服和工具。铁匠、木匠、裁缝均居住于庄园的土地上，或者至少为他们干活。此时庄园在很大程度上已替代了城市。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给自足制度，但不应理解为是某种单一的，法律上有约束力的东西。城市生活从未完全中止，城市的自由职业阶层也没有过渡到从司法上从属于大地产者的地位。然而，可以设想，罗马时期的手工业行会这时几乎绝迹。

对于帝国复兴大计，军事防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和财政一样，拜占庭政府在意大利主要关心的是军事防御，但很快就证明这一工作无法完成。意大利边界缩小到阿尔卑斯山，甚至在山的南坡。边境县城由戍边军守卫，戍边军一部分由机动部队组成，一部分由当地武勇（慢慢地从戍边生活中产生了城市生活）组成。防守中心是军营或城堡，首领是军官；军官之上，是军事政法官。戍边士卒除了领取国家俸禄外，还拥有赠给他们的小片土地，或从小农那里强迫借贷。至于机动部队或中央部队，再度征服意大利的初期以后，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再在意大利部署常驻部队。当形势紧急时，随时随地招募，例如蛮族人侵巴尔干半岛和波斯，威胁东部边境时所做的那样。

帝国重新夺取意大利加强了意大利和拜占庭之间业已相当紧密的文化联系。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宗教和艺术。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时好时恶的关系，这时变得亲密而持续（罗马教皇仍保留其驻帝国的使节）。东方僧侣在罗马人数众多，他们有自己的寺庙和教堂。东方圣祭、仪式和礼拜活动渗透到意大利宗教生活中。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庭艺术的黄金时代，其艺术也扩及到意大利。在意大利，罗马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方艺术流派的影响。在长方形教堂（由柱子分割成中殿和配殿，尾部是半圆形的后殿，后改成拉丁十字形耳堂）中央上方加上极其复杂拱形结构的大圆顶。在雕塑中，浮雕成平面状，采用粗线条的装饰性——象征性图案，替代以往的人物形象。在绘画中，尤其在镶嵌画中，庄重严肃和强烈色彩风靡一时。罗马艺术固有的强健的造型和肖像表现所经历的这种深刻变革与当时

的宗教热不无关系，因人们为逃避现实的穷苦和灾难，越来越向往另一种世界，越来越对宗教心驰神往。

在意大利（无法完全分清哪些是罗马艺术的继续，哪些是新的艺术），直到整个五世纪，可以说在罗马第一种艺术占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既体现在建筑中——圣玛利亚大教堂，修复于五世纪，以及那时刚建起的圣萨比纳大教堂——，也体现在装饰中。令人赞叹不已的圣普登齐亚纳教堂镶嵌画（400 年）仍闪耀着罗马文化的光辉；圣科斯马和圣达米亚诺教堂（526—530 年）镶嵌画也是一流的，已具有某些拜占庭风格。在拉文纳，东方影响的渗透更强烈、更早，这在由瓦伦提尼安三世之母加拉·普拉西狄亚主持修造的灵堂中（440 年），便能看得分明，其色彩叫人叹为奇迹。圣阿波利纳列·诺沃大教堂是西奥多里克同时代的建筑，但长长的墙壁上的两行美妙绝伦的男女圣像却是拜占庭初期的。同一时期的圣维塔莱教堂呈希腊十字形，上有大圆顶，教堂中的半圆形后殿上粘有著名的镶嵌画，表现查士丁尼和妻子西奥多拉及其令人尊敬的随从，整个气氛充满着帝国的庄严和豪华。稍后，在拉文纳附近的圣阿波利纳列教堂的镶嵌画，仍属于六世纪，它是各个时期以来水平最高的宗教绘画之一。

21 三教士会裂教 本笃会隐修制度

尽管拜占庭宗教热忱和艺术大量渗透到意大利，但是，恰恰是在教会方面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很快结怨。所谓拜占庭的皇权教权主义与罗马教廷独立于世俗权力以及拥有的根深蒂固的最高权威的传统发生了冲突。同一宗教感情，就有深刻的差异：在东方，神学思辨和玄义吸取占上风，而在西方，伦理教育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尤为重要。意大利对拜占庭帝国的独立精神就隐藏于（或开始于）这种教会-宗教的对抗之中。

罗马主教再也不像在哥特时代那样受到一种与帝国统治教会的渴望不相干的势力的保护，他很快觉察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皇后西奥多拉积极参与帝国的政治-宗教事务，全力支持耶稣一性论者，发现教皇

西尔维留斯不如其愿，跟她唱反调，于是下令贝利萨里乌斯以大叛徒罪将其逮捕，免其职，流放外地。替代他登上教皇宝座的副主祭维吉里（537—555 年在位），曾作为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对皇后十分信赖。然而，维吉里一旦身居教皇要职，也常忤皇帝而行，同查士丁尼发生冲突。尽管查士丁尼和妻子不一样，并非耶稣一性论者，但他也确信务必设法把温和的一性论者引进到帝国教会里去。为此目的，他发布敕令，谴责五世纪的三位教士（莫普苏埃斯蒂亚的西奥多、居比路的西奥多莱和埃泽萨的伊巴）犯聂斯脱利教罪，即对抗耶稣一性论的异教罪，而卡尔西顿普世会议曾既往不咎，甚至为他们三人恢复名誉。所说的三教士会敕令，按热烈拥护卡尔西顿普世会议的人——西方人，首先是意大利人，对卡尔西顿方式表示满意，满足了他们想在基督身上看到人伦人性的需要——的看法，是对普世会议的一次打击。教皇维吉里拒绝皇帝判处三教士的要求，于是他被遣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教皇屈服了，颁布判处令（548 年）；但是西方各教会起而对抗。他只好收回成命，在一段时间里和皇帝闹得很凶，于是皇帝也不反对对其施以暴力。意大利教会极力从远处支持教皇，呼吁法兰克进行干预。皇帝于君士坦丁堡召集大公会议（553 年，第五届普世会议），与会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方主教，会议宣布对三教士会的谴责，中断同教皇的关系，教皇坚持反对谴责。最后维吉里赞同谴责（553—554 年），于是重被派往意大利，途中在西西里便一命呜呼。

其继任者贝拉基一世（556—561 年在位）也是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后由查士丁尼任命为教皇；他以后的几任教皇虽没有被皇帝任命的荣光，但在宣誓就职前，均须等待皇帝或拉文纳总督的批准，这样，罗马教会就受制于皇帝。贝拉基尽管有帝国做后盾，但他务必克服重重困难，以便取得罗马城的承认，原因还是由于他同意对三教士会的谴责，因而被怀疑是反卡尔西顿普世会议精神的。在其教区范围里，他仍然能力挫反对派，可是，在米兰和阿奎莱亚范围里，也即在整个北部意大利，他未被承认。这就酿成了三教士会裂教，把意大利

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宗教区域。在贝拉基一世的第一位继承人约翰三世（561—574 年在位）时，罗马和米兰的关系已有所恢复，但在米兰教区里并非没有任何抵抗；在阿奎莱亚的土地上（即威尼托和伊斯特里亚）其主教已获牧首头衔，裂教仍一如既往，长期存在。六世纪末，格列高利一世使其同罗马恢复了某些交往；他死后若干年，拉文纳总督在格拉多力主选一非裂教者为阿奎莱亚牧首。然而，在受控于伦巴第人的土地上，又抬出另一位牧首，于是从那时起，在阿奎莱亚形成两个牧首并存的局面。

由于各种政治事变，意大利教会已处于危急关头。为加强宗教生活，在官方组织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它将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本笃会禁欲生活。这是最有效力确立罗马——蛮族的西方对拜占庭东方自主的一种形式。

早在四世纪，东方的禁欲主义在西方就不乏欣赏者和模仿者；在五世纪出现许多寺院（普罗旺斯的寺院有几个颇有声名），那里的僧侣极力使东方的寺院生活适应西方的需要。只是在六世纪上半叶，由一位意大利僧侣本尼狄克（又译本笃）·迪努西亚（也许生于 480 年和 490 年间；卒于 546 年以后），创立了一套自主的其重要性可与东方的寺院制度相提并论的西方寺院制度。他出身于翁布里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在罗马攻读，但很快放弃了学业，过隐居生活，以求拯救其灵魂。他在苏比亚科隐居了一段时光，圣名远扬，后成为不少（传说十二个）由他建立的隐修院院长。后同某个俗间教士有了龃龉，迫使他离开隐修院，迁徙至坎帕尼亚，在蒙特卡西诺山上建一规模宏大的隐修院（可能是 529 年，但不可考），那是中世纪最大的隐修中心之一。蒙特卡西诺山隐修院存世不长，圣人谢世数十年后，隐修院为伦巴第人所毁，八世纪才修复。但圣本尼狄克的影响却因其隐修院规章而名扬天下。

规章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虽不是文学作品，但文笔娴熟而遒劲，其内容与先前的东西方规章不无关系，甚至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在其规章里是否大量吸收先前的“规章条例”，也许这些“规章条例”也

是圣本尼狄克在苏比亚科时编写的。但该规章却富有独创精神。它并不企图进行与世隔绝的特殊的苦行生活，以求达到自身的完美，而是制定广大宗教团体现实生活的纪律，因而也是普通人的准则。其基本特点是社会性和克制性。对僧侣的膳食、服装和睡眠并未加以过分严格的限制。与当时一个佃农或生活条件低劣的人的生活相比，蒙特卡西诺制度还算相当优越的。对僧侣的经常性圣事活动做合理安排：圣事时间里（晨课、日课第三时等等）集体祷告，以及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除了在寺院里每天的必要的体力劳动之外，当劳动力不足以应付农事时，他们还须直接从事田间种植。蒙特卡西诺的建立本身就堪为物质建设和农业开垦的典范。团体的首脑就是院长，由团体自己选出。隐修院院长的权力是绝对的，但行使权力时要有节制性，要有仁爱之心，一切照规章办事，在一切重要事务上，要听取会友的意见。

圣本尼狄克没有建立一个宗教修会：他的规章是对蒙特卡西诺的僧侣的，每个团体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从七世纪起，圣本尼狄克规章十分普及，作为模范。前哥特大臣卡西奥多鲁斯于540年从公务中退身，在卡拉布里亚修建了本笃会式的隐修院——维瓦留姆隐修院。维瓦留姆隐修院的特殊之处在于，规定修士须系统地学习（收集和抄写手稿），这在圣本尼狄克规章里没有规定。卡西奥多鲁斯还为他的僧侣编著了他第二时期的著作。维瓦留姆在这方面影响着初期的本笃隐修院：总体上说，卡西奥多鲁斯的寺院制度被本笃会寺院制度所吸收。七世纪初（612—614年间），从法国前来意大利的爱尔兰修士圣高隆班在皮亚琴察西南修建了博比奥隐修院，当蒙特卡西诺归于破败时，博比奥的香火却极为旺盛；圣高隆班的规章异常严酷，其皮肉之刑是本笃会所不知的，但这种规章很快在博比奥隐修院以及圣高隆班于法国建立的寺院里为圣本尼狄克规章所取代。本笃会寺院制度借助大约六百名前往英国向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而在那里扎下了根。这样，一种唯一的，尤其适合当时社会的寺院制度在整个西欧传播开来。本笃会隐修院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

隐修院为振兴经济生活做出了贡献，佃农纷纷涌入，那儿待遇好，更安定，有保障。应该指出，本笃会寺院制度在意大利之外发展得更加迅猛，更加自主。我们这里，城市或郊区的小寺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继续占上风，它们多控制在主教手中，几乎只从事圣事仪式。

第四章　拜占庭意大利和伦巴第意大利

22　伦巴第人的入侵和意大利的分裂

东罗马帝国的武装干预破坏了由哥特人为意大利建成的旨在抵御新的入侵的防御体系，并阻止形成法兰克或西哥特类型的新国家，可以预见，在这样的新国家里，拉丁成分，更恰当地说，意大利成分最终会取得优势。我们可以很快看到帝国在采取这一消极做法后，已无法为防御和重建意大利采取积极的做法。

查士丁二世（565—578 年在位）继其舅舅查士丁尼一世之位——仍由军队和元老院选举皇位继承者，但在正常情况下，已崩皇帝的亲戚有优先权——从意大利政府召回纳尔塞斯，据说是应意大利人之呼吁而召回的，因他的苛捐杂税压得意大利人喘不过气来。他前脚走，伦巴第人后脚侵入；据说，伦巴第人是受失宠官员的唆使而大举入侵的。他们早已谙熟意大利，其一支部队曾参与纳尔塞斯讨伐托提拉之役。这一民族长髯飘拂，长发披肩，由此人称伦巴第人（伦巴第，意为长胡子）。他们是日耳曼民众，二世纪下半叶定居多瑙河中游。奥多亚克瓦解鲁吉人后，他们乘虚而入，占据多瑙河北岸，随即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然后越过蒂萨河。托提拉时期，他们与帝国结盟，帝国允许他们定居潘诺尼亚和诺里克。那里，遇到乌拉尔-阿

尔泰民族阿瓦尔人的进迫，于是将潘诺尼亚让给他们，在国王阿尔博英的率领下，同其他蛮族民众——其中萨克森人是坚强的核心——一起向意大利运动。

568年春，阿尔博英从上弗留利深入意大利，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入侵者尚未到来，大部分威尼托居民逃之夭夭，避难环礁湖；阿奎莱亚牧首也弃城而逃，亡命格拉多。占领维琴察和维罗纳后——帕多瓦还控制在帝国手里——在曼托瓦，遇到沼泽和抵抗，无法下手，阿尔博英只得先取米兰。569年9月，米兰失陷。帕维亚坚持三年，后终被攻克。不久，阿尔博英也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572年）。伦巴第议会在首都帕维亚召开，选克莱菲为王，他继续奉行掠夺扩张政策。克莱菲被一奴隶所杀（574年），未选出其继承人，被占领地为各公爵瓜分一光，各自执掌一独立公国。伦巴第占领者从几乎全被占领的波河流域以楔形队形向拜占庭领土逼进，一直推进到卡拉布里亚。于是，帝国控制的许多领土成为边缘地带，一般而言，伦巴第的占领缺乏坚实的领土基础。初期，伦巴第人很少占领海岸，从未拥有舰队。

与哥特人不同，伦巴第人的占领不是以皇帝授权的名义，而是同帝国处于交战状态；在其占领地里，对“土著人”行为残暴，哥特-拜占庭长期战争，已经制造了人间悲剧，这又是雪上加霜，从这时起，意大利真正开始了中世纪时期。初看上去，这种划分也不是那么完善。东哥特人发现因要维持同帝国法律上的关系而使其对意大利的权力受到限制；而伦巴第人发现其权力却受制于未完全占领意大利。取代罗马-哥特内部对抗的是拜占庭-伦巴第的外部冲突，这种冲突在新入侵者所控制的意大利内部也有反应。现在，意大利国家和领土的统一自罗马共和国以来，第一次被打破，直到攻破庇佑门[①]意大利再也没有统一起来。一部分仍为帝国行省，在另一部分里，建立与阿尔卑斯山北边相似的罗马-蛮族王国，虽没有被紧邻的要求行使其权力的帝国完全阻止，也至少被推迟和被阻挠；同时，在被占领土上的罗马

① 1870年意大利军队从庇佑门攻入罗马，从此结束分裂状态。——译者

意大利民众中存在着——至少在某个时期内——一种思想，认为意大利迄今从法律上仍属于帝国，这也推迟和阻挠了上述王国的建成。事实上，由于被占领的方式，罗马民众在伦巴第人面前，处于听任胜利者摆布的战败者地位；初期，在这种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遭到苛刻的待遇。一些大地产者遭杀害，其土地被伦巴第人全部籍没；据我们手头所掌握的有限材料，另些人作为进贡人分别隶属于征服者，他们必须缴纳其田亩所获的三分之一，生活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中。

君士坦丁堡政府要应付东方之需，无力向意大利派遣必要的兵力以夺回失地，却为意大利的频频告急而一筹莫展。于是欲借助法兰克人打击伦巴第人，这就糟上加糟。克洛维死后，按照遗产划分准则，墨洛温国家被子弟们划分成许多边界不定的王国，这些王国有时部分地，有时全部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主要有：奥斯特拉西亚或东法兰西（也包括日耳曼领土）、纽斯特里亚或西法兰西（相当于今天的法国北部）、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亦包括普罗旺斯。尽管四分五裂，各法兰克王国之间争斗不已，但它们仍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伦巴第人不敢等闲视之。伦巴第人在勃艮第几番掠夺性入侵后，法兰克人予以反击，从而占据西阿尔卑斯山山谷入口（苏萨、奥斯塔），这样，意大利边界开始出现缺口。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同拜占庭人结盟，率重兵南下北意大利（584 年），而拜占庭人于波河中游发起攻势，但伦巴第人向法兰克国王许以重金，劝其收兵。

于是伦巴第首领们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必须统一起来，遂着手恢复君主制，选举克莱菲之子奥塔里为王（584—590 年在位）。每位公爵让出其所握有土地的一半给国王，作为国王的地产。君主制恢复的同时，也制定了内部调整同罗马人关系的原则，于是罗马人生活得更有保障、更优裕。尤其归还了教会部分籍没的土地。这一新方针的标志是奥塔里也取名为弗拉维乌斯，以后各届国王均保持了这一名字，它表明伦巴第国王以某种方式自认为是帝国在意大利的继承人和接班人。

奥塔里对罗马属民采取的怀柔政策并没有立即改善同帝国的关系，

反而激起了希尔德贝尔特再次干预意大利。奥塔里迎头痛击，高奏凯歌，还成功地打击了帝国军队。按传统说法，他胜利地推进到雷焦-卡拉布里亚。他娶巴伐利亚大公之女狄奥多琳达公主为妻，并信奉天主教。狄奥多琳达可在伦巴第人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起平衡作用。丧夫之后，嫁给奥塔里的继任者都灵公爵阿吉卢尔福（590—616 年在位），公爵继续奉行前国王的政策：对内，制伏某些敢于反叛的公爵，巩固实权；对外，同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兰克人签订长期和约，这也因为法兰克诸王国互相厮杀，局势混乱所致。阿吉卢尔福比其前任更仇视帝国意大利，兴兵进犯，围困罗马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 年在位）同他签订停战协定，捐一大笔钱作为代价。不久以后，又成功地同帝国签订另一协定（598—601 年）。停战协定到期后，阿吉卢尔福重开战端，将拜占庭从意大利波河流域赶走，先后占领克雷莫纳、曼图瓦、帕多瓦。随后签订一系列和约并休战。同帝国开始相安无事，尽管在四分之三的世纪里，多次武装较量：帝国——忙于应付东方事务，先是跟波斯人，后跟穆斯林阿拉伯人，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632 年）向外大肆扩张——深知已无力收回失地，伦巴第王国也不愿将夺城掠地继续下去，尽管还不时扩大其地盘。

从七世纪初起，伦巴第人的扩张活动有所间歇，这与他们逐渐改信天主教有关；改宗一完成，扩张行为也完全停顿达几十年之久。改宗始于阿吉卢尔福时代，由于其妻狄奥多琳达之故，他与教皇格列高利建立关系，此举有助于改善天主教士和伦巴第人的关系。阿吉卢尔福与狄奥多琳达之子阿达洛阿尔多按天主教仪式受洗礼（603 年）。尽管阿吉卢尔福没有改宗，但不阻止他人改宗，并采取弥补措施以支持教会和主教。

阿吉卢尔福死后，天主教随着阿达洛阿尔多登基（615—626 年在位）盛极一时。他统治期间，同帝国和睦相处。但伦巴第人改信天主教的只是一部分，因而阿里乌教派和天主教发生冲突。阿里乌教徒把阿达洛阿尔多赶下台，由阿里奥瓦多取而代之（626—636 年在位）。他是都灵公爵，狄奥多琳达和阿吉卢尔福的女婿。阿里奥瓦多死后，

其妻冈德贝加改嫁，同罗特尔（636—652 年在位）结婚，他是布雷西亚公爵，信奉阿里乌教。他于帕纳罗彻底击败总督艾萨克，把伦巴第人的统治扩大到热那亚和利古里亚东西海岸。狄奥多琳达的侄儿阿里佩托（653—661 年在位）开始了巴伐利亚天主教王朝，王朝被贝内文托公爵格里莫阿尔德（662—671 年在位）王国所中断，人们还不清楚他信奉天主教或阿里乌教。格里莫阿尔德此时必须抵抗住拜占庭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领土收复企图，这次是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御驾亲征，他渴望在意大利恢复皇帝宝座。皇帝所采取的战术与迄今为止总督们所采取的战术不同，他从南方发起攻势，包围贝内文托，但遭惨败，被迫放弃初衷（663 年）。这时，希腊人也丧失萨伦托半岛。格里莫阿尔德死后，阿里佩托开创的王朝由其子佩尔塔里托以及其孙库宁贝托继续。这两个朝代中（671—700 年），伦巴第人皈依天主教，阿奎莱亚裂教终结——由库宁贝托于帕维亚召开的教区会议上完成的。[大约 680 年] 伦巴第王国和帝国签订和约。

23　伦巴第意大利和拜占庭意大利的境况　罗马教会

伦巴第国家首脑是国王，由自由民议会和军队一致选出。保持王朝连续性的原则，在选举中影响颇大。赋予国王以行政、司法和军事最高权力：颁布法律（敕令），用埃里巴诺[①]召集军队，宣战和媾和。议会协助国王订立法律和决定重大国策。国王对寡妇、孤儿、外国人，总而言之，对凡是缺乏相应保护的人给予特殊保护（蒙迪乌姆）。他让宫廷优秀的高级官吏（元帅、总管、宫廷大臣）来执掌政府，这些人大都是从加辛迪（特殊阶层）中挑选出的，是国王的左右手。有证据表明，罗马人也参与王室高级行政机关。

在伦巴第人统治时，行省的划分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国，在大多情况下，大公国基于城市（仍未消失）及其周围领土的行政区域。然而某些边境大公国的范围与原行省无异，例如弗留利大公国、

① 征召军队的一种法令。——译者

特伦托大公国，尤其是斯波莱托大公国和贝内文托大公国。公爵是国王任命的王室官员。正常情况下，是终身的。假如他犯有严重的过错，也会被废黜的；然而，由于他同当地伦巴第人的关系盘根错节，又广有地产，故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再说公爵之职多半世代相沿袭。于是就形成了大公国势力过强，王室软弱无力的局面，大公国时常犯上作乱，不是它们之间就是同外国列强签订条约，这是导致伦巴第王国覆灭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斯波莱托大公国和贝内文托大公国，地处偏远，本身就是两个国家，一会儿是国王的盟友或者陪臣，一会儿又反目为仇。

尽管如此，在局部区域里，国王并不缺乏直接采取行动的基础。这是因为王室在那儿拥有土地，由被称为“加斯塔尔迪”的王家田庄管家管理，他们握有类似大公的权力；区别在于，他们更紧密地从属于国王，其权力是暂时的，经国王批准，可以撤换。随着岁月流逝，加斯塔尔迪的权力从王家地产扩及到国王征服的或准备接受国王管理的城市。此外，这些王家地产大部分被王家官吏，或被教会和隐修院所侵吞，其结果是王家财产减少，（在后种情况下）意大利人民获益。

伦巴第人的社会由自由民、半自由民和奴隶构成。前者起初全是有产者，同时也是武士，他们的名字阿里马尼（军人）正源于此。后来，沧桑变化，世易时移，幸运也轮到许多不握有土地的人身上，他们也成为自由民，尤其是应召入伍的加辛迪（后来由于赐予王家土地，他们也变为有产者）。半自由民具有人身自由，但受土地所有者的保护，他们可以耕种有产者的土地，但不能抛弃之，其境况类似于罗马佃农。奴隶分为许多等级和各有所司：负责管理的奴隶专管主人的房产和直接由主人使用的土地；耕种农场的奴隶；放猪奴隶（特别是伦巴第人养的猪）；一般从事农业的奴隶。总之，伦巴第人的土地结构与罗马的并无差异。拥有地产的罗马人处于半自由民地位，因为他们得纳贡。这也不排除在初期以后，罗马人被承认为自由民，其等级可属受国王保护的外国人一类。也许土著民众能利用罗马法来处理其内部事务。在伦巴第第一部法典——《罗特尔敕令》（643 年）中，

规定了这些等级差异，法典是由国王以“其首席法官即公爵和加斯塔尔迪”的名义颁布的。敕令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完全符合伦巴第基本制度。占主导的条文是“圭德里吉尔多”原则，也即被杀者或受伤者应由其原犯以金钱作为赔偿，赔偿的多寡依其社会等级而定。

拜占庭意大利被划分成许多部分，它们或者有脆弱的联系，或者一点联系也没有（除海道以外），其中一些部分犹如伦巴第大海中的小孤岛。从最北开始，依次是：

（1）威尼斯——缩小到沿海和威尼托环礁岛——和伊斯特里亚；

（2）总督管辖地，包括莫德纳以南除外的艾米利亚地区，以及总督所在地拉文纳；

（3）与前一地区相邻的彭塔波利（五城联盟），地处马雷基亚和埃西诺河之间，分为海滨彭塔波利（里米尼、佩萨罗、法诺、西尼加利亚、安科纳）和粮区彭塔波利（直到亚平宁山脉的内部地区，包括乌尔比诺、福松布罗内、耶西、卡利、古比奥），一条防线（佩鲁贾、亚梅利亚、奥特里科利）把彭塔波利和下述地区联结起来；

（4）罗马大公国，包括台伯河以北的图希亚和河南的坎帕尼亚（来自田野一词），直至特拉奇纳；

（5）那不勒斯大公国，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加埃塔，与罗马的坎帕尼亚毗邻；最大的核心是孤立的那不勒斯，与古马和阿马尔菲隔开；第三部分也是一个孤立部分，塞勒以南，有佩斯托和阿格洛波利；

（6）卡拉布里亚或奥特朗托，直到七世纪末，缩小到萨伦托半岛的终端，有莱切、奥特朗托和当时与布鲁齐奥联合的加利波利；

（7）布鲁齐奥，现名为卡拉布里亚，如所说，岛屿不属于意大利范畴。

拜占庭意大利通称罗马尼亚（与伦巴第相对），从而引出罗马涅一名，罗马尼亚一名尤指总督所在地。

拜占庭意大利的这种划分和各部分相互脱节，有利于地方自治，而各种政治-社会的深刻变革也有助于自治生活的发展。拜占庭意大利缺乏中央机动部队，而用地方部队防御整个广阔边界——拜占庭和伦

巴第边界交错一起——使地方武装拥兵自重。地方武装和土地占有相辅相成：土地所有主提供士兵，并指挥他们。也有这种情形，调防到某防务地的军士也能获得土地。当地城堡和民军小队的指挥官，大多是土著人，下属亦多为土著人。这样土地贵族也成为一种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些城市武装（拉文纳部队、罗马部队），他们攫取大部分实权，其结果削弱了帝国政府，这些武装部队多次搞反政府活动。八世纪初，拉文纳发生有组织的叛变，斗争持续好几年。

在罗马，政治权力和代表机构逐渐集中到教皇之手——他由一群教士官吏和世俗官吏辅政——，其统治基础是教会最高权力、大量田产以及作为圣彼得继承人的宗教权威。为数日趋众多的人来教皇墓地朝拜和西方人民对圣彼得的崇拜，有效地提高了罗马教皇的威望和保持了罗马的普遍意义。此外，教权和俗权集于主教之手，这并非是罗马特有的现象。在拉文纳，大主教也占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占有大量地产也有助于提高其威望；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主教必然要同世俗大地产者进行较量。在富有而文化发达的那不勒斯，正酝酿着一种城市新发展，即把拜占庭大公转变为地方行政官，把大公的权力与主教的权力临时合在一起。

在帝国最高权力下，这种地方发展的一个独特而又特别幸运的事例，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地区的这一名称是指沿海及环礁湖未被伦巴第人占领的狭小地区。野蛮人入侵时，陆地上的一些民众开始向这些环礁湖各岛逃跑。匈奴国王阿提拉入侵时如此，哥特战争时，法兰克进犯及伦巴第占领期间，均如此。居民从阿奎莱亚、孔科尔迪亚、阿尔提诺、帕多瓦转移到格拉多、考尔莱、托尔切洛、马拉莫科。大主教所在地从阿奎莱亚迁到格拉多，使环礁湖产生了一名宗教首领，这有着重大意义。躲避入侵后，居民开发新居地上的自然资源，发展渔业和盐业贸易；为促进贸易，他们同大陆保持关系，同时在大陆沿海也留有土地。这里也组成由自己军官指挥的地方武装，修筑城堡，出现土地军事贵族阶层；除贵族阶层外，很快又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商业阶层，后者正是从前者内部产生出来的。

在意大利企图摆脱拜占庭自主发展时，教皇和主教的权力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中，而且对教会本身，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圣格列高利（590—604年在位）出任教皇，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开始。他无所不至地专横地干预意大利主教事务，尤其干预他的教区范围内的主教事务，监督其行政管理和纪律，同时极力修复由于伦巴第人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连年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圣格列高利十分重视对分布于意大利内外各地的罗马教会财产的管理，他任用各地教堂主管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处理教会和俗世间的全部事务。他用这些财产的收入援助特别是罗马人民的需要，这样担负起真正的政府作用（如罗马从阿吉卢尔福的包围中解放出来时那样）。经常同拉文纳的总督发生冲突，有时也同皇帝翻脸，但对皇帝总的来说还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到的。教皇同君士坦丁堡发生直接冲突，是因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自命为“埃古梅尼科”（普世之衔）而引起的，圣格列高利斥之为篡夺其他主教权力。他还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教会及君主保持关系。然而，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后面的几位继承人，都未对前两个国家的教会行使真正的管理职能。但在英国却截然不同，教皇圣格列高利向盎格鲁和撒克逊派出一批教士宣讲福音，直接促进那里建立英国教会，因而英国教会同罗马保有密切关系。圣格列高利的活动涉及教会的一切方面，尤其关注罗马礼拜仪式的改革和圣乐的发展（格列高利圣咏），所有这些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教皇的威望。尤其是他著书立说留诸后世。特别是《对话录》，讲述了意大利新近发生的神奇事件，他的书是整个中世纪的必读之物，促进了中世纪的宗教热忱。除《对话录》外，还应提到另外两部著作：《主教法规》，一个完美的主教指南，其中明确规定各教会长老除了苦修虔诚外，还应做到的具体活动；《伦理丛谈》，对《纳伯记》从伦理上和寓意上做广泛的诠注。圣格列高利的文学作品标志着拉丁文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即越来越向通俗形式发展。

七世纪，在圣格列高利时代，罗马教会同帝国发生了多起甚为严重的冲突。皇帝希拉克略愈益倾向同耶稣一性论者达成谅解。他颁布

敕令（638 年），确认耶稣身上只存在一个意志，即人性意志被神性所吸收。这种所说的《一志论》——教皇霍诺里乌斯一世（625—638 年在位）对此并无恶待——被以后的教皇继任人，特别是被马丁一世断然拒绝，他也不接受对君士坦斯二世在《教士规范诏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的建议。在拉特兰大公会议上（649 年），这两个帝国御札受到谴责。于是，教皇马丁一世被指责为反叛总督奥林皮奥的共谋，遭捕获，被解往君士坦丁堡，判处流放，死于流放地。为了削弱罗马教皇的势力，君士坦斯二世宣布拉文纳大主教独立（自治）。可是延至君士坦丁四世（668—685 年在位），人称波戈纳图斯（意即长胡子）时，新皇帝抛弃父皇的宗教改革。第六次普世会议（680—681 年）宣布，鉴于同教皇取得一致，承认基督两志论，会上还谴责了教皇霍诺里乌斯，罗马也接受了这一谴责；同时，皇帝还撤销了有关拉文纳自治的法令。波戈纳图斯的继任人查士丁尼二世时，争执重起；查士丁尼二世于君士坦丁堡召开（692 年）新的普世会议（在皇宫的圆顶大厅里举行），会议有关纪律的法令未被罗马采纳。于是查士丁尼二世命令逮捕教皇塞尔吉乌斯一世；拉文纳和彭塔波利的军队起而反叛，攻击皇帝代表，支持教皇。

24　俗权以及拜占庭和伦巴第统治的终结

这样，八世纪初，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交织着四种因素：伦巴第王国、帝国、教皇国、地方自治。前二者既安宁相处，又互相排斥；它们又都同第四者相对立；教皇在这三者之间巧妙周旋，应付自如，越来越倾向于变为一种地区自治权力。教皇更多地憎恶伦巴第王国；和地方自治运动关系不错，因为他可借用它们，若它们打算搞什么意大利帝国，教皇国就怀疑它们，反对它们。他攻击拜占庭，因它干涉教会事务，阻止成立主教公国；然而，却支持帝国保持形式上的至高无上权，这样便可阻止国家主权的形成，以免形成一些更近更有力威胁罗马的主权国家。

拜占庭新王朝的元首利奥三世，人称伊索里亚（717—741 年在

位），要重振帝业，想把意大利也纳入其中，于是他遭到意大利其他三种政治因素结成的临时联盟的反抗。他企图在意大利改组税收体制，这激起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在位）的抵制。在与总督的斗争中，教皇不但得到罗马军队的支持，而且也得到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伦巴第公爵们的支持。当皇帝（从726年以后）想强迫实行旨在反圣像的宗教改革（圣像破坏之争）时，被称之为“意大利革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皇帝发起的这场改革，在东方遭到强烈的反对，但还有一些拥护者，在意大利遇到的全是敌人。意大利人民的宗教感情同仇视拜占庭统治、崇拜教皇决定交融在一起。格列高利二世谴责圣像破坏之争，请求意大利人不要追随之，他还亲自鼓励罗马军队奋起反抗。罗马的帝国元首被罢黜，在彭塔波利和威尼斯，由于地方部队的干预，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现在地方部队扮演极其重要角色，造成了城市新生活的“起源”。在威尼斯地区，首次任命独立于驻伊斯特里亚的拜占庭元首的共同首领或元首（执政官）。在拉文纳，总督保罗在叛乱中丧生。伦巴第国王卢乌特普兰德（712—744年在位）——在他统治下的王国，正处于巩固和灿烂的时期——也支持宗教起义，借机重振在伦巴第权杖下的意大利统一计划：进兵总督所在地和彭塔波利，逼近罗马。格列高利二世号召各地居民忠于帝国——他仍拒绝圣像破坏之争——反抗伦巴第国王，阻止其前进，迫使他把占领的苏特里归还给罗马教会，而不是给帝国的官员。教皇凭借反叛王权的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公爵来对抗国王。卢乌特普兰德于是一改过去同意大利人和教皇结盟政策，同拜占庭总督欧蒂基奥结盟；两者联合围困罗马。卢乌特普兰德成功地制伏了两位反叛的公爵，于是拜占庭总督重新确立其在罗马、拉文纳和威尼斯（该地仍保留一位服从拜占庭最高权力的地方首脑）的拜占庭权力。在图西亚一场反皇帝运动也在罗马军队的帮助下被扑灭。

新教皇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在位）在两条战线上继续斗争：一条战线是反帝国以求教会独立，一条是反对伦巴第王国以求政治独立。在第一条战线上，斗争的结果是，教皇受到沉重损失，帝国

抄没教皇在南意大利的财产，革除其在这一地区（实际上，是仍受帝国控制的部分）和已并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伊利里亚教会司法权。卢乌特普兰德再度迫近罗马大公国，又停滞不前，不知是出于宗教顾虑，还是缺乏明确的政治计划，一段时间内他曾入至拉文纳，但总督请求教皇说服威尼斯，从那儿得到舰队帮助，将国王赶出拉文纳。各种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阻碍了任何重整意大利统一的企图。教皇扎迦利（741—752 年在位）虽然同卢乌特普兰德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有利于罗马大公国的停战协定——作为交换，放弃援助反叛的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公爵——并迫使国王也和总督签订停战协定，但形势仍依然如故。卢乌特普兰德死于 744 年，他统一意大利的宏图大业未能如愿，良机已失，机不再来。

当时，教皇国首要的利益是建立俗权统治；在教皇心目中，世俗君主和教会首领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这时拜占庭对于教皇的政治活动已不再是那么可怕的敌人了，因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741—775 年在位）——利奥三世之子和继承人，狂热的反圣像派——已对意大利事务毫无兴趣。真正的危险来自意大利的自治运动，它能使之变为地方帝国；来自图谋统治整个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国。不排除这两者有可能合为一股。教皇国凭着其政治艺术的正确直觉，认为用半岛之外的权力来替代深深扎根于半岛的意大利王国是有利可图的，因而他试图用法兰克人对付伦巴第人。格列高利三世曾向铁锤查理做过试探，但徒劳无益；铁锤查理是墨洛温王朝最后几任国王的神通广大的宫相。这时，时过境迁，教皇终于能同查理的继任人，也即加洛林新王朝缔结联盟。

铁锤查理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同罗马教会发生关系，这是由于在日耳曼传播了福音和建立了教会组织，在法兰克由其虔诚罗马教会的大主教卜尼法完成了法兰克教会改革。后来，当矮子丕平独自执政时，想正式登上王位，改朝换代，于是请求教皇扎迦利的批准（751 年）。他如愿以偿，大主教卜尼法为其涂圣油。那是教皇第一次充当法官和王位分封者。

教皇号召法兰克人崇拜圣彼得，促成法兰克-教皇联盟，这一联盟及时地扑灭了伦巴第人新的暴乱。卢乌特普兰德的第三位继承人阿斯托尔福国王于751年最终占领总督所在地，进入拉文纳。这时他自认为是帝国在意大利的皇权继承人，欲对罗马施行最高统治权。事实上，罗马大公国是独立的，其最权威的政法官——与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大公不相上下——是教皇。斯特凡二世（752—757年在位）前往法国，会晤丕平，丕平允诺保卫罗马教会，保卫罗马人民并让伦巴第国王将其权力和被占领土归还给圣彼得。作为交换，教皇给丕平及其两个儿子作为法兰克国王和“罗马贵族”抹圣油（754年），授予这最后的尊严时，教皇俨然成了皇帝。同时他还给予法兰克国王在罗马一个未确定的职权，因罗马公爵已去世。丕平视教皇如罗马大公国，总督辖地和彭塔波利的元首，但不过问这些土地同帝国的关系如何。教皇的俗权产生了。

丕平在相距极短的时间内发动两次远征，战败阿斯托尔福，将其包围在帕维亚城中，迫使他允诺并立即开始把总督辖地和彭塔波利交给教皇（756年）。阿斯托尔福很快死去，继任人原图西亚大公狄赛德里奥同教皇保罗一世（757—767年在位）为归还事宜发生冲突。对于其俗权，教皇颇有其竞争对手。在总督辖地，拉文纳大主教切望成为主教大公；在罗马大公国，世俗贵族图谋摄其大权。

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保罗一世时（有人指出大约晚于五十年），罗马教士一手炮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惠赐书”，而所说的惠赐一事后世已被认为是虚假的。它取材于相当古老的神话，讲到君士坦丁的麻风病是教皇西尔维斯特治好的，并受其洗礼。按照“惠赐书”说，为了感谢受洗礼，君士坦丁许给教皇西尔维斯特执掌罗马、意大利各行省和西方世界的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其京城迁到拜占庭后，认为地上的皇帝行使在天上的皇帝——基督已确立基督教领袖的地方——的权力，是不合适的。这份伪造的文献是一种政治-宗教宣言，以此来为教皇的俗权辩解，也是为捍卫教皇俗权的不断扩大，为教皇同法兰克王国的紧密协定和脱离帝国权力，进而为教皇行使帝国权力

辩护。

保罗一世死后，罗马混乱迭起，参加骚乱的，不但有当地的教会和世俗各派，还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独立的斯波莱托的伦巴第人。于是，不正常地出现了两位教皇，后又都遭废黜，直到斯特凡三世（768—772 年在位），才恢复平静。在斯特凡三世期间，狄赛德里奥同法兰克王国关系是友好的。在法兰克王国，继丕平王位的是其两个儿子查理曼（后称为查理大帝）和卡洛曼，他们分别娶狄赛德里奥的两个女儿德西德拉塔（或称埃尔门加达）和杰尔贝克为妻。771 年底，卡洛曼去世，查理曼控制整个法兰西王国，清除侄子，致使他们同母亲投奔外祖父狄赛德里奥。查理曼休其妻埃尔门加达，和伦巴第王国反目。狄赛德里奥试图请求新教皇阿德里安一世（772—795 年在位）加冕卡洛曼之子为王。新教皇却全力支持法兰克派，于是狄赛德里奥出兵入侵罗马大公国。在伦巴第贵族内部形成两派，一派支持法兰克国王，另一派为斯波莱托的伦巴第人，同教皇站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王国和伦巴第王朝之间的最后较量就不可避免，其结果也可想而知。查理曼绕过敌人的设防，经苏萨山谷进入意大利，伦巴第军队还未同他交战，便溃不成军（773 年）。狄赛德里奥坚守帕维亚城，次年投降，被流放到一个法兰克的修道院。其子阿代尔基即位，于维罗纳抵抗一阵后，逃往君士坦丁堡（774 年）。查理曼被全体伦巴第人拥戴为王。774 年的复活节，他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隆重欢迎，他向教皇确认丕平的惠赐。

第五章　法兰克意大利　封建混乱　罗马-日耳曼帝国

25　查理大帝和教皇　西方新帝国

伦巴第王朝的废除并未导致王国的覆灭，只是并入法兰克王国而已，并由法兰克王朝替代之。几年后，查理大帝派其子丕平到帕维亚作为其摄政，教皇又立丕平为罗马国王（781年）。在伦巴第王国的名字旁，很快使用了意大利王国的名字，而且后者最终代替了前者。除伦巴第成分外，法兰克成分渗人城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土地界限虽原封未变，但按法兰克习惯，用伯爵替代公爵。伯爵以下是百人队长官和代理，替代伦巴第的斯古尔达西和加斯塔尔迪；但这后两个名词在意大利仍在使用。除法兰克官员外，当然还有一些得到国王赐予伦巴第王国土地的私人（见第26节）；在意大利除伦巴第贵族外，法兰克人通过这两条途径，也形成了法兰克贵族，而意大利人仍是从属于这两者的臣民。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各自继续使用自己的法律，正如意大利人或罗马人使用罗马法律一样。

在中部意大利，斯波莱托大公国作为查理大帝的伦巴第王国的一部分继续存在；教皇多次试图在那里确立最高统治权，但未获成功。主要由总督辖地彭塔波利和罗马大公国构成的教皇国本身，作为罗马

人贵族隶属于查理的最高权力之下。在南方，受教皇统治的，只有在伦巴第公爵治理下的贝内文托大公国，这些伦巴第公爵如今改用“伦巴第大公”头衔。他们从属于查理国王，但随后游移于承认法兰克最高统治和拜占庭最高统治之间，事实上保持独立。相反，那不勒斯更多地倒向拜占庭一边（由于其所处的海滨地理位置），然而该城及其周围的地方实质上是自主的，由当地公爵治理。基于过去签订的临时协定，罗马教皇仍对贝内文托要求行使其权力，教皇阿德里安一心一意扩大罗马教会的俗权，并从查理大帝那儿取得对占据卡普亚和某些其他城市的认可，然而，这些城市实际上仍掌握在贝内文托公国手里。拜占庭帝国除了在那不勒斯行使最高权力外，还控制着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特玛（军区）——这一名称是指从希拉克略（见第 19 节）以后拜占庭帝国划分的新的军事单位。

加洛林王朝的成就对意大利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大利王国被并入一个版图更广阔的其重心在意大利之外的帝国范畴内，意大利的自主和统一的可能性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伦巴第占领期间，意大利一分为二，在法兰克统治下，分裂成更多的块块。在北部意大利有王国，中部有教皇统治区和斯波莱托大公国，南部有拜占庭意大利，它本身又分裂为好几块，还有伦巴第意大利，它很快也四分五裂。这样，一部分意大利较大地从属外国，另一部分自治进程加快，然而伴随着的是分崩离析，从而阻碍了强大的稳固的国家的形成。

阿德里安一世的继承人、教皇利奥三世（795—816 年在位）比其前任教皇更加受制于法兰克帝国。一部分罗马贵族起义，指责他通奸和发伪誓，宣布废除他（799 年），迫使他逃往法兰克宫廷。查理恢复了他的教皇职位，800 年底，他本人亲往罗马。在在座的主教们宣布罗马教廷不受任何人判决的原则之后，教皇于圣彼得大教堂宣誓要洗刷对他的指责，其敌人因而受到判处。罗马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有必要加强和明确其同法兰克国王的关系，需要确立符合时代思想的、符合国王和教皇对罗马权力的、符合罗马脱离拜占庭皇权的根本法则。800 年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时，罗马人民一齐高呼“查理，

上帝加冕的最虔诚的奥古斯都，伟大的和平的皇帝，万寿无疆，胜利”，教皇为查理加冕，向他下跪表示崇拜和敬意。

于是西方帝国恢复，但形势暧昧不明，法律行为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新的帝国理应是罗马帝国的继续或恢复——即替代君士坦丁堡帝国——而罗马帝国的基础是在人民，在元老院和在军队中。如果人民在圣彼得的欢呼能够被认为是符合这种根本需要的话，那么教皇的加冕则代表一种新成分的干预，但它同前者的关系尚不明确。新皇帝理应是罗马的真正的君主，理应是教皇本人的俗权君主；事实上，利奥三世以跪拜行为承认他是这样的皇帝。但同时，是教皇决定授予皇帝之爵，他才是皇帝皇冠的加冕者，因而也是监护者。因此，查理大帝对800年圣诞节仪式所表示的不悦，正源于此。在其建立之初，新西罗马帝国就萌发了教皇国和帝国之间为争夺基督社会的最高统治权的未来冲突的幼芽。

另一个暧昧之处是新政治机构的领土范围。虽然我们习惯称之谓西罗马帝国的恢复，但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毫无顾忌地自诩为罗马皇帝。所以其职位就包含着统治万国的奢望，正如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职位那样。这里产生了新旧帝国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皇帝和没有皇帝头衔的西欧其他诸君王之间不确定的地位。当时，这第二种困难尚未出现，因为法兰克帝国已是西欧唯一大国。早在罗马赐予头衔前，帝国的存在就已是有目共睹的，完全不取决于这种赐予；正是这一现象造成这一新事物的另一深刻变态，其法律头衔和形式中心同其真正的权力起源和领土基础没有一点协调之处。查理大帝真正的帝国不是来自800年圣诞节举行的罗马授职仪式，而来自其先人和他自己的文治武功。他将其统治的疆域从北海拓展到南意大利，从易北河、多瑙河扩大到大西洋和埃布罗河；帝国的核心是法兰克王国，而非罗马意大利；法兰克-加洛林“帝国意识”早于800年的加冕仪式，实质上并不取决于这一加冕。

对于意大利来说，帝国的创立只不过是确认和巩固了法兰克攻城略地的果实。意大利所维系的外国国家披上了罗马帝国这一法律头衔

和历史特权的外衣。恢复罗马帝国的梦幻迷惑着意大利人，使其忘却真正的处境，忽视本身的民族问题。从法律上讲，他们是帝国最高权力的授予者，因为帝国的所在地是在他们之中；但是，实际上，因为帝国的实力是在意大利之外，这就确定了意大利仍附属于外国统治。拜占庭立刻做出反应，又将其野心对准意大利，并恢复其真正的干预。西罗马帝国的重心及其至关重要的利益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不可能倾其全力于意大利统一事业，尽管仍抱着统一的空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西罗马帝国局限于意大利疆界内，这时它的力量仍不足以统一半岛，尤其是不足以应付地方势力的发展：北部和中部的封建主义，教皇俗权统治，南方的大公国和城市公国。

在查理大帝——新帝国的创建者——时代，意大利在帝国活动中退居次要地位。查理认为征服萨克森人或者镇压阿瓦尔人远比同贝内文托大公国搞好关系重要得多。在南部意大利以及东北沿海一带，尤其是对威尼斯，法兰克的行动显得软弱无力。在这两片土地上，法兰克帝国遇到拜占庭帝国的猛烈攻击，在后者看来，法兰克帝国是不合法的。查理大帝同皇帝尼斯福鲁斯（802—811 年在位）交战；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谁对威尼斯拥有最高主权。当拜占庭和伦巴第在意大利的统治没落时，威尼托环礁湖岛所形成的邦联，在地方公爵的治理下，继续不断发展其自主生活。然而邦联维持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依属，并同它保持商业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威尼斯公爵总是作为皇帝新封的官员在行使权力。随着法兰克在北部意大利统治的确立和威尼斯内部纷争，尤其是公爵与格拉多牧首间的冲突，威尼斯逐渐形成了法兰克党；在新世纪初期，这个党似乎稳操胜券。可是拜占庭的一支舰队迫使威尼斯举手投降，甘当东罗马帝国的属民，于是意大利国王丕平发兵远征环礁岛（810 年）。威尼斯奋起抵抗，在此情况下，早已从埃拉克莱阿（在陆地上）迁到马拉莫科的政府所在地又迁到里沃阿尔托（或称丽都），威尼斯城就是在其周围形成的。最后，威尼斯人被迫承认法兰克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812 年两帝国于阿奎斯格

拉纳缔结和约，法兰克帝国承认威尼斯为拜占庭帝国的附庸。相反，伊斯特里亚被并入由查理大帝设置作为伦巴第王国一部分的边境省弗留利，以保卫东北边境，抵御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

通过该和约，西罗马帝国承认东罗马帝国在南意大利的占领地。这样，西罗马帝国放弃从北部和南部来据有整个半岛。查理大帝被拜占庭于阿奎斯格拉纳承认为皇帝；不久以后，东罗马帝国又否认其对西罗马帝国的承认。

26　法兰克体制　封建主义

帝国正式建立未曾触动受制于丕平国王的代理政府之下的伦巴第王国的体制。地方政治行政区域仍由伯爵管理；在某些边境地区，即边境省（马尔凯，原为德语），许多伯爵集合省长权力之下，省长也可能是一位伯爵。正如公爵或者伦巴第的加斯塔尔多，伯爵集俗权和军权于一身。其两项主要职责是行使司法和招募那些必须服兵役的人参军，并在战争中任指挥官。第一种职责，是每年至少召集两次隆重的伯爵议会——所谓的“审案会议”。通常情况下，伯爵是在一个助理团——助理一词在意大利称为“法官”，在阿尔卑斯山北称为“西比尼”——的协助下进行审判。主教、寺院住持和所有直接依附于国王的人员，免予伯爵判决。伯爵以下是子爵、代理及百人组组长，作为他的副手，管理下一级地方区域。部队招兵是按照地产进行的：每个土地所有者也是军人，必须与其奴仆——假若有的话——一起参战。兵役是沉重而费钱的，得抛弃自己的土地，支付大部分生活费用；因此，允许较小的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组成小组，这样每一小组只需派出一名兵士。

伯爵和相应的边境省省长直接受国王或者代表宫廷伯爵的中央权力的领导。国王或宫廷伯爵有时召集王国的显贵举行议会——类似伯爵议会的审案会议——那是政治司法最高机构，议会所做出的决议对整个王国都有效。王国议会之上是帝国大议会，查理大帝时，帝国大议会在春天举行，会上颁布的法律（查理大帝法规）对整个帝国有

效。查理大帝法规代表扩大国家的干预权，减少私刑，保护人民中最弱的成分（寡妇、孤儿、穷人），调整和发展经济生活及人民的福利，增加宗教生活和教育等诸多措施。

为适应这些加强中央政权的措施，查理大帝时代继续发展法兰克的分封和豁免体制（伦巴第王国也开始了这一工作）。其结果适得其反，导致了封建社会的建立。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为了在王朝斗争中争取自己的党羽和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不惜以临时占有权的办法慷慨分封王国土地，临时占有权即简单地使用这些土地，实际上这些土地常常变为使用者自己的遗产。与这些分封密切相连的还有种种特权，从而削减政府对这些土地的权力，而受封者受惠。加洛林王朝继续这一惯例，将分封土地与服兵役紧密联系起来，受封者须承担这一义务。在分封者（领主）与受封者（陪臣）之间确立一种特殊关系：陪臣关系，即一种个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国君和属民之间的公法关系）。为此，陪臣必须忠诚于主人，坚定地为主人服务；而主人必须保卫、帮助陪臣，为其主持公道。查理大帝和其继任者不但分封土地，而且还许以同这些土地相连的私有和公有权利：捕鱼权、打猎权、过路权、海关权，最后还授予真正的政府职能（伯爵职位，边境省省长职位）。分封的土地或权利叫做采邑，被分封的人叫封建主。这样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官员变为陪臣，而君权依赖于这些陪臣的忠诚。如官员不转变为陪臣，那么官员的权力，即由他所代表的君权，也日趋缩小，或化为乌有，原因是授予了居住在其行政区域里的陪臣以种种特权。给予陪臣土地豁免权，开始时，意味着免除其某些公共负担（赋税，政府的劳务）；尔后国家完全放弃了在这些拥有豁免权的土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力。处于陪臣疆界内的自由民，如果不是由于大封建主或其代表，所谓的“律师”的介入，王家官员不得对其起诉或不得接受其上诉。

这些自由民的数目迅速减少。为得到保护，为逃避公共劳务，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将其财产让予大封建主，而后又从他们那儿以分封的形式重新得到这些财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领主等级制度，有豁免

权的封建主对自己土地上的陪臣、佃农和奴隶直接行使司法权。于是，领主法庭展开了与朝廷官员法庭的竞争，尽管领主法庭与朝廷官员法庭一样，均允许向王家法庭上诉。

与司法和财政管理方面发生的变化相类似，在军队组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国王的陪臣有服兵役的义务，这是受陪臣关系约束的；而陪臣的陪臣对他负有同样的服役义务。国王及其官员的直接募兵权受到削弱，几乎被侵消一空。

在形成世俗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形成教会封建主义。尽管从铁锤查理开始的加洛林王朝把大量教会土地改为俗用，教会大地产又通过新的捐赠而恢复。查理大帝及其继任者们向教堂和寺院分封大量的土地和许以豁免权。主教和寺院住持开始变为大领主，同伯爵和边境省省长并肩参加王国和帝国的议会。作为补偿，加洛林王朝有权干预对主教和住持的任命，这在墨洛温王朝已成传统。尤其是查理大帝，自认为是法兰克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表现于教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而且也表现于理论方面，他的这一做法毫无异议地得到教会的承认，至少也得到教皇的默许。他在教会方面成立的组织远比在民事方面的组织要坚固而划一。整个帝国被划分为二十个大主教区，聚集着帝国领土上的所有主教。在意大利，罗马主教、拉文纳主教、米兰主教、阿奎莱亚主教和格拉多主教为大主教。主教至少有权监督其教区的每一个宗教机构。农村教堂大部分是地主和领主的私人建筑（“主保”教堂），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神甫，但必须由主教授予职权，受主教管束。通过领主私人权利和教会权威的这种结合，教会堂区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从任命修道院院长起，修道院内部生活都是独立的，但受主教的监督。加洛林王朝赞成在隐修院里遵守本笃教规，特别是遵守由修道院院长本尼狄克·迪阿尼亚内（821 年卒）所进行的改革。主教必须首先致力于精神方面的职责，世俗事务应指定教会律师负责；他们必须视察和主持教区会议。加洛林王朝规定所有的神甫必须受最起码的宗教教育，懂得一点礼拜仪式和教会法典，经常做祈祷和一般地行使司铎职责。

27　经济和文化状况

加洛林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土地所有制。在自给自足的大所有制和初期的封建主义之间相互沟通，互惠互利。在大所有制中，仍划分主人直接经营的土地和某种以实物地租形式出租的土地。在第一部分中，大部分土地为森林或牧场，其余土地用于种植小麦和主人及其家庭所必不可缺的其他作物。出租的土地耕作认真细致。它主要是教会大地产的土地，那里条件较好，较安全。查理大帝时，农业种植方式及其种类有了一定的发展。要指出的是，在意大利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小所有者，因而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自由民。

然而，若把这种经济解释为是由许多封闭的互相之间不发生关系的组织所构成，则大错特错。自给自足的组织并不能满足其全部成员的一切需要，也无法证明——甚至最好应排除——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非农业活动在每个自给自足的组织中都存在着并满足了其需要。在自给自足经济范畴之外，肯定存在着非农业活动之间的联系，存在着城市手工业活动。不管哪种活动形式，均属于一种封建组织，这种组织，我们可以把其叫做政府性组织，主要满足其他一些与经济不太密切的需要。事实上，政权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已从城市转移到城堡，更普遍的是转移到大封建领主的住地。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机关——尤其是公证处——，几乎看不到旧城市组织的踪迹。但总还存在着主教区，它到处插手俗间事务；同时还普遍地存在着城市经济活动，尽管其组织形式十分原始。

尽管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商业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在九世纪，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增加。在波河平原上，大部分通过水路航运，威尼斯和直至帝国中心的大陆之间的产品贸易尤为发达，威尼斯是从东方进口商品的，尤其是奢侈品。由于这种贸易，威尼斯多次从法兰克国王那儿得到特权。由于这种商业交往，家庭的陈设和个人的服饰也变得精巧细致起来。在城市和贵族老爷的“别墅”里，有很多贵金属制品。除了大商业活动外，还有城郊和寺院旁的地方市场。整整一个世

纪的安宁大大促进了意大利王国经济的振兴和人口的相应增加。

人们还谈到——不乏某种程度的夸张——加洛林王朝在文化方面的复兴。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文化有了某种发展。由查理大帝在宫廷建立的一种学院，成了文化的中心，参加者有帝国最有学问的人，学院的院长是盎格鲁-撒克逊教士阿尔克温。其著述（当然是拉丁文）不仅涉及神学，还涉及逻辑学、语法学、伦理学。他还主持了一宫廷学校；根据查理大帝法规，在每一个天主教教堂和每一个隐修院里，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不仅培养俗间教士和隐修教士，而且也培养俗人。在那些学校里，按照晚古的传统，教授七门自由艺术，它们分为两组：三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文化手段是图书馆，一般设在修道院内，修士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图书馆抄写手稿。

伦巴第的许多有名作家，参加了这一文化运动，尤其参加了加洛林学院的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是保罗·迪孔（卒于800年前），他写了很多书信体诗和诗歌，尤其写了著名的《伦巴第史》，该书是他在蒙特卡西诺隐修院写的，是关于伦巴第王国主要的有文字记述的历史资料；著作讲述生动、简洁，具有艺术价值。查理大帝宫廷中的其他伦巴第作家有：彼得罗·达比萨和保利诺·达奎莱亚，他们作为语法学家尤其值得珍视；后者后来成为阿奎莱亚牧首。一般而言，修士对文学创作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编年史》中（然而在意大利我们对此掌握的材料极少）记录了最重要的事件，他们写下了圣徒传记，即写下了圣人、主教、修道院院长、传教士等的传记，传记中充满了感化人的令人惊叹的内容。总而言之，在意大利，文学水准还是相当低的，大大低于法国水平。罗退尔皇帝法规（见第28节）明确地谈到意大利人中熄灭了的研究热情；为了加以弥补，法规规定在意大利王国的一些城市里（帕维亚、都灵、克雷莫纳、维罗纳、维琴察、奇维达莱、佛罗伦萨、费尔莫）必须为附近的居民修建一所公立学校。我们不清楚，这一规定执行情况如何，很可能大多是纸上谈兵。

人们更有理由谈到加洛林王朝艺术的再度繁荣。查理大帝在阿奎

斯格拉纳和另些地方大兴土木，搞了很多建设；下令在整个帝国修复和兴建教堂、隐修院、宫殿。在伦巴第时代，意大利在艺术方面几乎是拜占庭的一个省，尽管罗马传统没有完全湮灭。镶嵌画十分活跃，在罗马仍保留着壁画艺术，例如八世纪时装饰在罗马广场的圣玛利亚·安提瓜墙壁的壁画。在罗马，继续在石棺上雕刻历史故事画，而在拉文纳这种雕刻更为流行。画中装饰性的富于象征寓意的线条胜过对人物的塑造。浮雕日益减少，可以说人物圆雕已消失。特别是在小型艺术里（金银首饰），蛮族艺术的渗透显而易见，例如，蒙扎主教堂的某些珍宝，估计是狄奥多琳达王后时代的（其中有铁制王冠）。这些蛮族艺术当时也深受东方艺术的影响。卡斯泰尔塞普里奥（瓦雷泽）的圣玛利亚教堂的壁画完全是独特的；然而令人神往的，也许出于一位东方艺术家之手，但具体日期不详（七世纪至九世纪）。九世纪时，意大利的建筑也有某种复兴。某些重大的教会建筑，或部分建筑可能追溯到加洛林王朝，例如米兰的圣安布罗焦教堂的半圆形后殿和北拉齐奥的图斯卡尼亚的圣彼得教堂。著名的神话般的“科莫工匠建筑学派”也许甚至可以追溯到伦巴第王朝末期。九世纪初，在罗马又流行用镶嵌画作为装饰性宗教艺术：圣塞西利亚教堂、圣普拉塞德教堂、多姆尼卡的圣玛利亚教堂。米兰圣安布罗焦教堂里的贴以金银箔的祭台正面，是九世纪上半叶的贵重文物，可能出于一个叫沃尔维尼奥之手。828 年，圣马可的遗体运往威尼斯，随后建造圣马可大教堂，这样威尼斯成了一个拜占庭艺术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往后，当地的艺术名流纷纷涌入威尼斯。

28 路易二世 南方的穆斯林

查理大帝去世后（814 年 1 月 28 日），其子路易（虔诚者）继位，意大利没发生任何变化。810 年丕平卒，他的儿子贝尔纳多作为代理国王即位。但是，817 年路易整顿帝国，分封其子职位和封地，贝尔纳多认为他的权力受到了损害，于是起兵反叛叔叔。叛乱被迅速平息，他被处以烫瞎眼睛的酷刑（拜占庭帝国的刑罚），死于受刑中（818

年）。王国某些世俗和教会大人物的自治倾向促进了这次反叛。这时路易将意大利授予早已参与帝国事务的长子罗退尔。和父亲一样，罗退尔在罗马由教皇帕斯加尔一世为其再行加冕（823 年）；他通过颁布“罗马建制诏”（824 年）重新确定帝国对罗马的主权，诏书中规定在罗马派驻代表帝国权力的常设代表，强迫罗马人民和尚未举行就职仪式的当选教皇宣誓效忠皇帝。

路易（虔诚者）和其子之间以及罗退尔同其兄弟之间的不和及内战，对意大利的命运未造成很大的影响。继父位的罗退尔（840 年）因《凡尔登条约》（843 年）被迫同兄弟秃头查理（法国划属于他）、日耳曼人路易（日耳曼划属于他）瓜分帝国，他除拥有帝号外，还得到了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从地中海到北海的一条狭长地带。罗退尔将其首府置于阿奎斯格拉纳，再也没回到意大利，而将意大利委托长子路易二世管理。路易二世于 850 年登基为皇；父亲去世（855 年）后，他成为唯一的皇帝。

这样，先是在罗退尔，后在路易更长时间的统治下，帝国和意大利王国极其紧密地连在一起，可以说，在前者死后，它们的领土也合在一起，因路易在阿尔卑斯山北只不过统治着很少的地方。路易二世时，帝国的尊严和威望实际上服务于意大利王国。他当政时，意大利王国的名字比伦巴第王国当初的名字要响亮得多；这好像表明，与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贵族相比，地方成分有了某种加强，也表明统治特权阶层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开始了一种种族-社会的融合。

在真正所说的意大利王国，路易二世的权力维持了三年之久，未遇到任何挑战。此外，他作为皇帝对贸易行使罗退尔建制诏授予帝国的全部权力。因而，他在罗马拥有的权力比其前任和继承人都大得多。但他并不能消除教皇公国里的纷争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源，相反使教皇公国里封建分裂进程又增添了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间的矛盾。因此，教皇国作为地方权力的力量极弱；但仍保持着万国教会元首的尊号。这在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 年在位）身上看得很清楚，他满脑子浸透着教权独立于俗权并高于俗权，教皇国是教会中最高权力的思想。

他成功地制伏了受路易二世支持的拉文纳大主教的独立自主企图；在法国教会事务中，维护《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见第29节）；在路易兄弟洛泰林基王罗退尔二世的离婚一案中，面对加洛林君主重申其权力。

路易二世比加洛林王朝先后各君主更关心南部意大利，正是因他一心一意要把整个半岛统一在其权力之下。在南部，在其祖先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弃置不管的情况下，他所面临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贝内文托大公国在其前两位大公阿里基和格里莫阿尔德的治理下，曾十分强盛。九世纪上半叶，大公的权力已为地方总督（伯爵和加斯塔尔迪）的权力和某些较大城市的自主倾向所削弱。此外，贝内文托大公国有很多其他国家同它竞争南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仍附属于希腊人——九世纪上半叶他们毫无生气，而那不勒斯、加埃塔、阿马尔菲，这些海滨强大城市，在东方帝国名义上的统治下自行其政。贝内文托大公既不能同它们和睦相处，又无法制伏它们。尤其同那不勒斯公爵争斗激烈而频繁；主要祸根是坎帕尼亚平原。西卡尔多大公死后（839年），贝内文托大公国里西科诺尔菲和拉德尔基同室操戈。西科诺尔菲得到萨莱诺的帮助，因该城受益于海上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可与贝内文托一比高低。两人都求助不久前才定居于西西里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

七世纪起，非洲穆斯林就开始侵入西西里。九世纪初，占据突尼斯的艾格莱卜人的阿拉伯王朝又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在反叛的拜占庭军政首领欧费米奥·墨西拿的随同下，远征队于827年在马扎拉登陆，831年攻陷巴勒莫；以后，攻占活动放慢节奏。843年墨西拿失守，859年，西西里岛中部最坚固的阵地埃纳失陷。这时，希腊人只困守在包括叙拉古在内的东部一狭长地带，而叙拉古于878年也沦陷，另一城陶尔米纳直到902年才缴械投诚。

西西里的穆斯林（非洲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混合体）刚一立足岛上，便作为各交战中的地方政权的后备军和雇佣兵登上半岛。那不勒斯第一个征召他们攻打贝内文托。他们又参

与拉德尔基和西科诺尔菲之争，在普利亚站稳了脚跟，随后占领塔兰托和巴里。紧接着成为第勒尼安海的一大威胁，他们蹂躏海岸，向罗马逼进，一直兵临罗马城下。地处城墙外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惨遭破坏（846 年）。那不勒斯同加埃塔和阿马尔菲结盟以保卫第勒尼安海，或者至少保卫那不勒斯海湾；教皇利奥四世（847—855 年在位）用围墙把特拉斯台伯围起来，称做“利奥之城”。

还在罗退尔在世时，路易二世根据他的命令，于 847 年向南意大利的萨拉森人发起征伐，并击败他们。他在南方期间调停了拉德尔基和西科诺尔菲争端，支解了贝内文托大公国：前者得到贝内文托及萨尼奥和普利亚，后者分到萨莱诺及坎帕尼亚的伦巴第土地，卢卡尼亚和北卡拉布里亚。在萨莱诺统治区中的卡普亚很快独立，这样在原先一个大公国的地方，出现了三个伦巴第大公国。

大约二十年后，路易二世再次向萨拉森人发起新的更大规模的讨伐（867 年），从他们手中夺取普利亚的许多要塞，封锁巴里，于 871 年才将它攻克。他多次企图同拜占庭就拜占庭舰队同法兰克军队搞联合行动达成协议，均未成功，因为两帝国之间对立无法消除。这一对立因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之间的冲突变得更错综复杂，更尖锐。两教会的冲突也未能因 843 年最终停止圣像破坏运动而消除。到尼古拉一世时，君士坦丁堡最有才能的牧首佛提乌未得到罗马承认，冲突发展成佛提乌裂教（867 年）。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持续冲突也归因于仍在执行的利奥三世（见第 24 节）所采取的反罗马措施。

路易二世作为高高在上的主宰，插手各大公国，激起他们的反抗。贝内文托的一次反叛，使他落入阿代尔基大公手里（871 年）。他发誓不予报复，才获释。之后，他在北部意大利招募新军，请教皇解除他的誓约，挥军南下，进入遭萨拉森人入侵的坎帕尼亚。萨拉森人于卡普亚附近被击败，不得不解除萨莱诺之围：两城臣服于路易二世。

相反，贝内文托只承认东帝国皇帝巴兹尔一世为其君主，巴兹尔一世也派出一舰队支援该城。路易二世因分身阿尔卑斯山北部事务，

回到意大利北方；875 年去世，无男性后裔。

29 末代加洛林王朝 封建主义全盛时期

路易二世去世后，意大利王国失去其地方君主，而皇帝的尊号成了阿尔卑斯山北部法、德加洛林人角逐的目标。此时教皇约翰八世（872—882 年在位）挺身而出，试图充当君主角色，插手帝国皇位和意大利国君的问题，左右半岛事务，同时加强教皇在地方的权力。教皇（反对德国加洛林的奢望）同法国国王秃头查理达成协议，并在罗马为其加冕皇帝（875 年圣诞节）。秃头查理放弃帝国对罗马的一大部分主权，以支持教皇，好像还把斯波莱托公国和南意大利的土地赠送给他。但是，约翰八世因其力量不足，未能抗衡罗马公国的贵族和抵御支持他们的斯波莱托公爵。从罗马皇帝那儿，他没有获得任何支援以驱逐大肆掠夺罗马郊区的萨拉森人，也无法鼓动大公们和南部城市一起向萨拉森人发起有效的攻势。当时，萨拉森人反而占据了加里利亚诺，引起意大利中部的恐慌。

秃头查理死于 877 年。其侄子卡洛曼（日耳曼人路易之子）早已从德国出动，欲同他争意大利王国；这时伦巴第被承认为意大利王。约翰八世搞阴谋，妄图反对他，但遭米兰大主教、伦巴第巨头之一安斯佩尔托的坚决抵抗。可是，卡洛曼中风瘫痪，被迫返回其巴伐利亚王国，两年后病逝。其兄弟胖子查理，施瓦本国王受理其全权，登基为意大利国王，并由约翰八世加冕为皇帝（查理三世，881 年）。他受到斯波莱托公爵、一位法兰克血统的强有力领主圭多和其他贵族富豪的反对。由于德国兄弟和法国侄子全部丧生，胖子查理被承认为加洛林王朝的全权统治者。884 年，帝国形式上恢复其大一统的局面，实际上，原先的强权已不复存在。胖子查理既不能对付诺曼底人以保卫德国和法国，也不能帮助意大利抵御萨拉森人，也不能确立其最高权力来对付封建主。在特里布国务会议上（887 年 11 月），由于卡洛曼的私生子阿努尔夫·冯克恩滕领导的德国贵族起义，他只好退位（887 年），不久后（888 年）死去。于是日耳曼、法兰西、意大利封建阶级

各自选择自己的国君。

约翰八世雄心有余而力量不足，其政策完全失败，于882年的一次起义中丧生。在罗马和罗马公国，地方贵族空前强大，他们通过各种分封，大量掠夺教会领土。总督辖地——拉文纳大主教在约翰八世时，不断反对教皇权力——如今仍不服教皇权力。由教皇促成的不稳定的地方联盟，从未有效地顶住几乎威胁到罗马城门的萨拉森人；约翰八世曾想借助拜占庭，在教会问题上采取温和的态度（承认佛提乌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但东方皇帝巴兹尔一世（867—886年在位）仅仅出于帝国利益对南部意大利采取了有力的收复失地的行动，而加洛林皇帝并不与其争夺土地。拜占庭人在巴里站稳脚后（876年），随后进入卡拉布里亚攻打萨拉森人，又于普利亚攻击萨拉森人和伦巴第人。于是先后建立了卡拉布里亚省和伦巴第省（普利亚），两省于970年合并，受“意大利的卡特帕诺（总督）”管辖。拜占庭属下领土上的主教区，均属于君士坦丁堡；卡拉布里亚聚住着许多希腊教士（七世纪末最著名的教士是圣尼洛，是洛萨诺附近圣阿德里安隐修院的创建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而普利亚则对希腊文化表现出很大的抵制。在普利亚，早在十世纪上半叶，自主精神造成多起土著反叛，伦巴第大公国也加入进来发起攻击。滨海城市（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同拜占庭人却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利用这种关系来制约伦巴第人。

早在九世纪，拜占庭政治影响在罗马已有表现，一个希腊派开始形成，以此对抗法兰克派或德国派。更北的威尼斯，继续承认东罗马帝国的至高无上权力，是一座拜占庭文化城市。

在意大利王国，路易二世去世后，出现王位空位期，使封建制全速发展。秃头查理对意大利封建主的分封不少于法国封建领主，并以条约确保。由于这些分封（或称盗用），大封建主俨然行使起国王的全权（司法、招募和指挥军队、修筑城堡、征税，甚至铸造钱币），有时，他们互相串通，监督君主手里仅存的一点权力。国王、官吏和臣民，被领主、陪臣及陪臣的附庸取代；对于后一种人，君主无直接权威，只能通过领主做中介。土地分成无数大小不等的封地，其中仍

保存着十分可怜的自主地，不受封建依属约束，所有权完全属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为首的是国王，而最后一个等级是普通的将士，即一领主的贵族陪臣（有时不掌握土地）。在中介等级中，有陪臣同时又是领主。这样，其等级排列就是：大陪臣或大公（公爵、侯爵、伯爵、主教、寺院住持），其次是陪臣（在法国是男爵，在伦巴第是军政长官）和次陪臣。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一封建社会里，分封土地，互相承担义务，中断封建关系等一整套复杂的规定和礼仪均遵循惯例，而不是按照书面的法律。采邑从分封起就是终身的，如果不是由于“不忠”而被收回，后来趋于变为遗产。秃头查理大量承认大采邑可作遗产继承。采邑所有者也可以将它卖掉或馈送；继承人、买主、受赠者继续其陪臣关系，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在世俗和教会封建制下，还有小农（农人），他们可能是自由人，也可能是奴隶，不管是哪种人，一辈子劳作于土地上，不服兵役，无权结社，也不享有其他公共权益。他们对耕种土地的主人负有一系列义务，这些义务被不恰当地称为封建权利。其中某些义务是农民必须用钱或实物偿付的地租，另些则是劳役地租。除一般义务外，还有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义务，如主人亲临耕地，改变采邑所属关系，主人的长子结婚等。还有垄断：农民必须使用主人的磨粉工具磨面粉，在其炉子里烘烤面包，等候出售粮食，不至于同主人的出售发生竞争，等等。司法权也是收益来源，因判处刑罚，一般是主人收取罚金。

封建司法大部分基于习惯法，其基本原则是每一个阶级均有其特殊的法庭：农人由主人的家庭法庭审理，陪臣由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组成的封建法庭审判，教士由主教法庭或寺院法庭审判，城市自由民由伯爵法庭审理。判决是通过取证、宣誓、决斗、神明裁决后做出的。通过证人或证书的获证，来自罗马诉讼程序；宣誓来自蛮族的诉讼。对于贵族来说，决定诉讼的自然方式是决斗，决斗也是德国制度：被告不是用证据来为自己辩护，而是向原告或证人挑战决斗。他也可以通过代表来格斗（假若对手是女性）。不仅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可通过决斗来定罪。对于非贵族和未找到代表为其格斗的人，解决办

法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检验法，一般情况下是火的考验（把手伸进滚烫的开水里或握紧火热的铁块）。

九世纪末，意大利存在着侯爵或公爵辖地，弗留利侯爵领地；意大利或伊夫雷亚侯爵领地，其领土包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托斯卡纳侯爵领地，其首府在卢卡；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好像被分为斯波莱托边境省和卡梅里诺边境省。意大利边境省在中世纪中叶也分成：先是在东北部出现伊夫雷亚侯爵领地，后出现阿莱拉莫侯爵领地（其名来自创建人阿莱拉莫，其领土起于蒙费拉托，止于利古里亚）以及皮埃蒙特中部的苏萨或都灵边境省。

教会贵族得益于封建主义的发展，绝不次于世俗贵族。从那时起，教会贵族以对抗伯爵和侯爵权势的面目出现；而历代国王已经表现出依靠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倾向。君主们（如赐予其他世俗领主那样）也赐予主教以特殊的公共权力。九世纪，就有拥有伯爵权力的主教，称之为伯爵-主教。除主教外，大隐修院院长权力扩大，小农纷纷投奔他们，以求保护。主教加强其城市驻地和乡下城堡的防卫能力。为了防卫，主教和寺院院长指定了一些陪臣，将其部分土地分封与他们。这样，高级教士全面进入封建等级制度，拿起武器，与世俗无异。意大利王国中势力最强的主教，有米兰主教和拉文纳主教，他们利用大主教或大主教教区的尊严，成为其他许多主教的首领。在寺院中，最大的寺院是萨比纳的法尔法寺院和坎帕尼亚的蒙泰卡西诺寺院，这两大寺院，都直接受皇帝保护。重要的大寺院还有艾米利亚的诺南托拉寺院，沃尔图诺的圣温琴佐寺院，阿布鲁齐的卡绍里亚寺院，后者是由路易二世创建的。

教会尽管受到封建割据的支配，但仍保持着比世俗社会更为强烈的统一性；正是教会，依靠神灵所孕育的宗教信仰，依靠握有同超自然世界沟通手段的教会组织，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督普世社会的思想。把信徒逐出教团，褫夺由圣事构成的超自然恩典源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最严重的不幸；因此，教会用绝罚作为其统治权力的强有力武器。由于尘世的生活隶属于永恒的生活，整个人类落入教会的控制之

下，教会上升到包括君主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公私行为的最高审判者。这样，它就从宗教的极狭窄的范围扩大到道德和政治的范围。教会法典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法律的共同源泉，可以说是唯一的共同源泉。查理大帝创建了一个由他直接领导的国家教会；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解体，这一教会也同时瓦解；原是国家对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现在是教会对国家有着广泛的深刻的影响。人们形成一种倾向，认为教会统治集团是基督社会的真正代表和最高组织，它高居于无力维持世俗社会统一的世俗权力之上。

这种倾向与教会内部大主教权力——在法兰克帝国内实质是查理大帝的御用机构——，与主教和低级教士的权力之间的内部冲突，是相吻合的。前者更易倾向于寻求国家的支持（如拉文纳大主教），后者热心于自己的独立和一般意义上的教会独立。主教和低级教士自然而然地把眼光瞄准罗马教皇，因其最适于遏制大主教和对付世俗权力，对付其占据教会土地和地产（这也是各寺院十分感兴趣的一点）。这一派的杰作是编辑以《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为名的教会法典。因为其作者名无人知晓，于是给起了“伊西多尔·麦尔卡托尔”的名字。《教令集》包括大量全是臆造的教皇书信或谕旨，旨在以教皇的最高审判权对抗大主教、省教务会议和世俗权力的最高审判权。这一著作大约于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法国，但很快流传于整个西方。

由于主教们居住于城市，履行教会职能，从而保证了城市的重要性。在其行政管理活动中，除教会成员外，也接纳世俗成员。

30　“独立的意大利王国”

从胖子查理的废黜（887 年）到鄂图一世登基为帝（962 年），是“独立的意大利王国”时期，因意大利王国不再受制于、从属于外国统治（例如在加洛林前一些皇帝的统治下）。路易二世时曾有过类似的独立，但现在情况不同，意大利国王是地道的土产，是由意大利大封建主选举产生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从其中选出的。正因如此，“意大利”国王的权力比起加洛林国王的权力要弱得多。这是一种封建本

位主义的表现——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封建本位主义——而不是意大利民族个性的第一次胜利，类似在加洛林帝国解体时法国和德国那样。意大利王国的大封建主是法兰克或伦巴第血统。此外，意大利王国和帝国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正是在罗马，也即在意大利王国的边境附近，授受帝位；每个意大利国王，自然打算夺取它，期望从中得到对属下的封建主有更大权力和威望，并以合法头衔对罗马和教皇国（从属于帝国，而不从属于意大利王国）以及南部意大利（这里只有西罗马帝国皇帝才能抗击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干预）行使最高主权。

胖子查理的继承人中，德意志国王阿努尔福取得优势，因而要求其他新国王像臣服一个帝国的代表那样臣服他。在新国王中，有弗留利侯爵贝伦加尔，他是加洛林王朝的母系后裔，原先是支持日耳曼加洛林的意大利派首领，当时在帕维亚加冕为国王（888 年）。斯波莱托公爵圭多起来反对他，圭多不仅觊觎意大利王国的王位，而且抱有称帝的野心。圭多得到法国人的支持，在特雷比亚河战斗中获胜，也在帕维亚加冕为国王（889 年）；而贝伦加尔在意大利北部仍被承认为国王。圭多设法让人承认其子兰伯特为王位辅助者，以保证其继任王位。在加洛林帝国瓦解中出现的诸多王国里，国王是在没有明确准则的情况下由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组成的议会选举出来的，但选举的原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亲属关系和承认在位国王儿子为其所立的继承人。后来，圭多由教皇斯特凡五世在罗马加冕为皇帝（891 年），新教皇福尔摩苏斯封圭多之子为王（892 年）。

斯波莱托王朝将自己的公爵政治传统与路易二世的传统融为一体，企图统治整个意大利，即包括罗马和南方。在南方，它反复插手，反对萨拉森人，确立对伦巴第大公国的最高统治地位。贝伦加尔和教皇福尔摩苏斯请求阿努尔福进行干预，反对斯波莱托王朝。前者请求阿努尔福的干预，是为了重新取得意大利王国，哪怕是屈从于德意志国王的至高无上权力之下；后者是因为一个直接统治中部意大利的皇帝能够将他窒息而死，因而宁愿要一个更远的皇帝。也即是说，世俗的利益迫使教皇避免在意大利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权力，迫使教皇

从外部请他人来反对这一权力的形成，正如为反对伦巴第的最后几朝国王那样。阿努尔福直下意大利，受到大部分领主的欢迎，圭多只得撤退到斯波莱托；但阿努尔福不能一直推进到罗马，因为道路已被托斯卡纳侯爵切断（894 年）。在第二次征讨兰伯特——只因父王之死（894 年）而单独作战——的远征中，终抵罗马，战败斯波莱托军队后攻陷罗马，阿努尔福由福尔摩苏斯加冕为皇帝（896 年）。他突染重疾，被迫离开意大利；于是贝伦加尔（他被阿努尔福完全搁置一边）同兰伯特达成协议，取得直到阿达河的意大利东北部。反德派也在罗马获胜，福尔摩苏斯的尸体从墓中掘出，受大公会议审判，然后抛入台伯河。兰伯特在教皇的同意下称帝，并力图同教皇一起处理教宗大公国的事务。

898 年 8 月，兰伯特死去，身后无嗣，于是贝伦加尔被承认为意大利唯一国王，但不能统治中部意大利，也不能去罗马接受皇帝加冕式。这时地方贵族在罗马全面取胜，其中最杰出者要数西奥菲拉克图斯和其妻子西奥多拉及两个女儿西奥多拉和玛罗齐亚。玛罗齐亚嫁给斯波莱托和卡梅里诺侯爵阿尔贝里科。北部意大利，贝伦加尔被匈牙利人的入侵弄得焦头烂额。匈牙利人是九世纪末活跃于名为匈牙利地区的乌拉尔-阿尔泰人，他们严重地威胁着日耳曼和意大利。他们的一次远征（899—900 年）于布伦塔河击败贝伦加尔，随后，又多次进犯。在平原上其势不可阻挡，只能凭借城堡和城市作抵抗，这迫使各城修建自己的城墙，或者重新修复城墙，常常是由主教出面主持这些工程。匈牙利人由意大利北部进犯中部。就在遭匈牙利人入侵的同时，中部不时遭到来自南部，尤其是来自加里利亚诺的萨拉森人的侵扰。

意大利桀骜不驯的领主们，特别是托斯卡纳的阿达尔贝托侯爵和伊夫雷亚的阿达尔贝托侯爵，挑动普罗旺斯（或内汝拉勃艮第）国王路易三世与威信扫地已十分软弱的贝伦加尔作对。路易在帕维亚戴上意大利王冠（900 年），于罗马又戴上帝国皇冠（901 年）；然而大领主们不服，只得让位于贝伦加尔，撤回阿尔卑斯山以北，许诺不再返回。然而他不信守诺言，被贝伦加尔俘获，眼睛被刺瞎，遣返普罗旺

斯（905年），以后不再离开那儿，于是贝伦加尔统治长达二十年之久，未遇敌手；但由于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他的实权甚少。与斯波莱托王朝不同，他未对南部采取积极的政策。在这些年内，教皇约翰十世（914—928年在位）——由西奥菲拉克图斯家族推举，他也是一位刚毅而有首创精神的人——，斯波莱托的阿尔贝里科侯爵与南部各国和拜占庭人结盟，将萨拉森人赶出加里利亚诺（915年8月）。联盟没有维持多久，也未取得其他明显效果。加里利亚诺胜利后几个月，仇视贝伦加尔的托斯卡纳侯爵阿达尔贝托去世，贝伦加尔也就能够来到罗马加冕为皇，但他既未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又未能促进更广大的事业。

意大利的大领主们从邻国的诸多国王那儿遍寻一位能对抗自己国君的对手，自己又能不服从任何人，终于找到了上勃艮第的国王鲁道夫。他越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圣伯纳德山口，南下意大利，于阿尔达河畔的菲奥伦佐拉击败贝伦加尔（923年）。贝伦加尔曾请匈牙利人援助，他们烧毁帕维亚，一路不管对手，直抵南部意大利。贝伦加尔困守侯爵领地，于维罗纳被一陪臣所杀（924年）。托斯卡纳侯爵圭多和伊夫雷亚侯爵的遗孀埃尔门加达，请求异母兄弟普罗旺斯的乌戈（维也纳伯爵）前来支援，以对抗孤军奋战的鲁道夫；他们还得到约翰十世的援助。鲁道夫不与乌戈交锋，作为补偿，他从普罗旺斯取得某些权力，有利于两个勃艮第的合并。乌戈在帕维亚加冕（926年）。几年后，其子罗退尔协助执政。乌戈是一位刚毅果断的人，奉行旨在征服封建阶级的政策。在主教领地、修道院和世俗采邑，安插忠于他的勃艮第人；在将近二十年时间内，牢固地控制着北部意大利。他从异母兄弟兰伯托手中夺走托斯卡纳；打算于罗马确立其统治。他娶阿尔贝里科·迪斯波莱托和圭多·迪托斯卡纳（兰伯托的兄弟）的遗孀玛洛齐亚为妻。玛洛齐亚这时是罗马的绝对主宰，她废掉约翰十世，并置他于死地，同时，推举其子为教皇，称约翰十一世。刚刚于罗马庆祝乌戈和玛洛齐亚的结合时，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乌戈的罗马人大起义，起义的组织者是玛洛齐亚第一个丈夫之子阿尔贝里科（932

年)。乌戈被驱逐，玛洛齐亚和约翰十一世被投入苦牢，阿尔贝里科将罗马公国名义上置于教皇主权之下，并自封为罗马大公和元老，统治罗马达二十二年之久（932—954 年)。根据我们的判断，他维持了内部秩序和维护了国家真正的独立；他还关心教规改革。乌戈国王多次妄图夺取罗马；但他只能控制斯波莱托和亚平宁山那边的教皇领土。阿尔贝里科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建立关系，用希腊势力来对抗法兰克对罗马的野心。然而，乌戈国王同拜占庭也保持良好关系：其一女嫁给拜占庭王子，一支拜占庭舰队参加乌戈对驻扎在普罗旺斯的弗拉西内托并践踏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西班牙的萨拉森人的征讨。但乌戈未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他反而指望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各山口的萨拉森人作为盟友，以反对阿尔卑斯山边境可能发生的有损于他的举动。乌戈不大放心伊夫雷亚王朝，他设法捉拿贝伦加尔——阿达尔贝托和埃尔门加达之子——侯爵，侯爵逃走，避难日耳曼，受鄂图一世的保护。后越过阿迪杰山口返回意大利（945 年)，随身带领一小股德军，地方领主云起支持他，乌戈和罗退尔尽管名义上仍是国君，但不得不把实权让给他。乌戈返回普罗旺斯，死于该地。不久以后，罗退尔也去世，贝伦加尔二世和儿子阿达尔贝托在帕维亚加冕为王（950 年)。

31　罗马-日耳曼帝国

萨克森公爵鄂图一世从 936 年起即位德意志国王，势力与日俱增，在西方基督世界里占主宰地位。他按加洛林传统，冀图在意大利称王并攫取帝国。贝伦加尔二世给他提供了插手意大利的机会。先是乌戈国王时代向他发出的求援，后是罗退尔的遗孀阿德莱德遭到迫害，逃到鄂图一世那儿请求庇护，而意大利有一派力量也准备请求日耳曼国王的援助，以对抗伊夫雷亚王朝。鄂图一世借口解救阿德莱德并为她报仇雪耻，带领大军穿越布伦纳罗南下，被大领主抛弃的贝伦加尔被迫退往伊夫雷亚山中。鄂图一世于帕维亚被拥为王，娶阿德莱德为妻(951 年)，他还企图前往罗马，但由于阿尔贝里科的反对，他的图谋失败了。

回到日耳曼后，鄂图一世同意分封意大利王国的贝伦加尔二世和阿达尔贝托为其陪臣；但他从他们那儿夺走维罗纳和阿奎莱亚（包括伊斯特里亚）两边境省，并入巴伐利亚公国——稍后又转给卡林齐亚公国——，于是打开了意大利的大门。贝伦加尔重掌政权后，极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报复其死敌。鄂图一世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派其子利乌多尔夫征讨贝伦加尔，但其子猝死（957 年），讨伐中断。贝伦加尔得以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特别是迫害与他作对的主教。其子阿达尔贝托由于对总督领地的司法权而同教皇约翰十二世（955—964 年在位）发生冲突。教皇约翰十二世是阿尔贝里科之子，他集精神和世俗权于一身。教皇抛弃父辈的传统，求助鄂图一世，这样开辟了鄂图一世通往帝国宏图的道路。鄂图一世亲自直驱意大利，贝伦加尔无法在广阔的战场上阻止住他，于是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帝国皇冠（962 年 2 月 2 日）。从这时起，开始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和帝国皇帝的统一，建成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谁被选为德意志国王，谁就为意大利国王和头顶帝国皇冠。然而，在意大利王国，一个时期中，仍保留着国王由大领主们选举。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两顶王冠虽统一在一起，但各王国仍保留其本身的法律和习俗。

鄂图一世发布御旨，确认加洛林王朝给予教皇的惠赐。事实上，教皇的统治权仍局限于罗马公国；尤其在总督领地，长期以来，皇帝行使直接主权。在罗马，皇帝重新确立由罗退尔罗马建制诏（参见第 28 节）规定的最高宗主权；教皇和罗马人向他宣誓效忠。不久，约翰十二世心生怨艾，因为皇帝许给他的土地没有全部兑现，于是与居留在蒙泰费尔特罗的圣莱奥城堡的贝伦加尔暗中勾结。鄂图一世回到罗马，确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帝国权威：召开大公会议，会上废除约翰十二世，选举新教皇利奥八世，并强迫罗马人宣誓，从此以后在未预先得到鄂图一世批准的情况下，不能选举教皇（963 年）。这时，在罗马，皇权和地方自治之间开始一系列的斗争：在自治派中，教会分子和世俗分子合为一股，其中以土地贵族为主的世俗分子占优势，他们渴望把教皇抬上皇帝的宝座。反德派也企图依靠拜占庭。鄂图一世

离开后，约翰十二世复辟；他死后，罗马人自食誓言，选举本尼狄克五世（964 年）。鄂图一世返回，利奥八世又复位，后约翰十三世继承（965 年），这次得到皇帝的认同。一次新的反帝国起义被严厉地镇压下去。至此贝伦加尔二世投降，被流放日耳曼。其子阿达尔贝托企图反叛，未获成功。

现在，着手解决南部问题。鄂图一世运用加洛林的传统做法（还有斯波莱托的传统），力图确立在南部各国的最高主权，替代拜占庭。他得到卡普亚和贝内文托大公潘多尔福（所谓的“铁头”）的支持，还将斯波莱托和卡梅里诺赐予铁头。这种人为的结合，只维持了一个短时期。同东罗马帝国皇帝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谈判失败后，鄂图一世多次入侵意大利南部拜占庭领土，但不能夺取城堡。他同福卡斯的继承人约翰·齐米斯西斯签订和约，根据和约，承认卡普亚和贝内文托属于西罗马帝国的最高君权，其余的归东罗马帝国所有。鄂图二世——已登上帝位——和希腊公主狄奥凡婚配（972 年），这样两帝国之间结下婚姻联盟。同年，萨拉森人被赶出费拉西内托的普罗旺斯基地。

在意大利王国，鄂图一世继续其在日耳曼推行的一种支持主教损害世俗封建阶级的政策。这种方式，只不过沿袭了由加洛林王朝开始的、在所谓的意大利王国时代加强了的一种发展进程。大量政府权力逐渐转入主教手中，主教大多替代了城里的伯爵权力，但与伯爵不同的是，他们长年累月住在城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正式授予伯爵的权力（主教-伯爵）；在另些情况下，他们事实上行使这些权力。这样，伯爵权力收缩到乡下，当时称之为伯爵领地（现意为城郊）。这里还要排除有豁免权的教会土地。这种状况对城市生活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事实上，忙于教会事务的主教，要求最杰出的市民与其代表（律师或子爵）一起参与城市行政管理。这样，市政生活开始复苏。

早已协助其父管理帝国和王国事务的鄂图二世（973—983 年在位），在父亲死后多年被日耳曼事务缠身，无暇他顾。其时，在罗马以克雷申蒂家族为首的反帝国派和以图斯库卢姆伯爵为首的亲帝国派

之间，为争夺该城和教廷统治权而争斗不休。980 年，鄂图二世南下意大利，确立其在罗马的权力。随后，挥师意大利南部，夺取了对不断侵扰西西里的穆斯林分子的决定性胜利。这期间，西西里（从 947 年起）由凯勒卜人的世袭酋长统治。实际上，凯勒卜人是法蒂玛王朝最高统治下的一个自治部落。法蒂玛王朝继艾格莱卜王朝统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还夺取埃及，并把首府也迁移到埃及。凯勒卜人打垮了卡拉布里亚的拜占庭人；鄂图二世对他们的攻击也不利，尽管得到卡普亚大公的支持，在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惨遭失败，勉强生还（982 年）。次年，鄂图二世死于罗马。

儿子鄂图三世（983—1002 年在位）年纪尚幼，由母亲狄奥凡和祖母阿德莱德掌权。他于 995 年亲政；翌年，来到罗马。当时罗马当权的是焦万尼·克雷申蒂，他坐镇莫莱·阿德里亚纳，该地从阿尔贝里科时起就变为城堡。他未抵抗皇帝。因教皇位空缺，皇帝任命其亲戚格列高利五世为教皇，这是第一个德国教皇。鄂图三世走后，克雷申蒂重新掌权，鼓动人民赶走教皇，打算在东罗马帝国的庇护下恢复古老的共和国。因而推选卡拉布里亚的一位希腊人焦万尼·菲拉加托为教皇，即约翰十六世，为拜占庭所接受。鄂图三世赶忙扑灭骚乱：克雷申蒂被绞死，教皇约翰被俘，砍掉手足（998 年）。

这一次鄂图三世未远离罗马，并在罗马设立永久性行宫，意在真正恢复古老的帝国，在臣服于他的教皇支持下，作为最高首脑，在罗马从俗权和神权两方面来统治罗马-基督社会。他建造拜占庭式宫廷，给其官员取希腊-罗马名，命令法官按罗马法办事，一心想把各民族的不同因素吸收进普世的罗马文明中。将整个天主教会置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下，是鄂图三世这些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格列高利五世死后，法国人热尔贝由鄂图三世抬上教皇宝座，意味深长地名为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 年在位）。鄂图三世的这一计划自然得到新教皇的拥护。登上显贵的教皇宝座之前，他已是大名鼎鼎的理论家，身居几个教会显职，其中有拉文纳大主教之职。教皇和皇帝打算进行教会改革，为此，鄂图三世同高级僧侣人士，尤其是意大利的高级僧侣，诸如圣

尼洛和圣罗穆埃尔德建立关系。这些构想和政府的有关举措未能在德国人中间寻得支持，因为德国人认为皇帝忽视了日耳曼人的利益。罗马民众也没有被皇帝的美梦征服。1001 年，罗马爆发起义，鄂图三世弃城而逃，终未能返回罗马城。鄂图三世派兵围攻罗马时，于奇维塔卡斯泰拉纳附近的帕特诺死去（1002 年），兵士们好不容易才把他的遗体运到德国。

第六章　教皇国与帝国初次交锋 诺曼人进入意大利南方

32　伦巴第和意大利南方的新格局

十一世纪初叶，意大利出现了新生活的诸多征兆。封建社会里，部将或称小陪臣，即握有由大陪臣，尤其是教士分封的大量土地的阶层，其社会地位举足轻重。一般而言，部将以土著意大利人或意大利化的外族人（伦巴第人）居多。除占有分封的土地外，他们往往还在城里操某项职业。于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意大利王国的、特别是波河平原上的大小城市，与南方城市并驾齐驱，开始商贾云集，买卖兴隆。

鄂图三世无嗣。卒后，德国举行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参与竞选者不乏其人。亨利二世（1002—1024 年在位）获胜（作为皇帝应为一世，但仍按王室世系称号）。他也属萨克森家族，是鄂图大帝的重孙。其时，意大利阶级暴动又起，暴动者要求如同意大利王国独立时期那样，推举一位当地王位候选人，于是发动了上述的土著骚乱。世俗诸侯对鄂图皇帝偏袒主教的政策早就怀恨在心，趁此机会选举伊夫雷亚侯爵阿尔杜伊诺为王（1002 年）。早在鄂图三世时，阿尔杜伊诺与附近的主教们素来不和，但他得到部将们的鼎力支持。新王上任伊始，

意大利王国的主教们便群起而攻之，与德国关系密切的大封建主卡诺萨的侯爵们也站在主教们一边。他们频繁上书亨利二世，于是亨利在1004年南下意大利，于帕维亚加冕为王。在其逗留意大利期间，他平息了帕维亚市民暴乱。面对强大的德王，阿尔杜伊诺只得退居自己的领地，伺机反扑。德王刚一离境，他卷土重来，行使其王权；实际上，德国王教派劳而无功。1013—1014年亨利两次南下。阿尔杜伊诺避其锋芒；待其离去后，挥戈反击，起初他节节胜利，后遭灭顶之败，一病不起，只好隐退于弗鲁吐阿里亚修道院，1015年病逝。其党羽坚持战斗，但历时极短。

第二次南下时，亨利二世经意大利北部直下罗马。鄂图三世病故，后掌管罗马大权者为焦万尼·克雷申蒂，其父被鄂图处死；焦万尼卒后，图斯库卢姆伯爵举其家族一员为教皇，号称本尼狄克八世（1012—1024年在位）。亨利二世刚一到达罗马，即承认本尼狄克；本尼狄克也加冕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14年）。亨利在罗马镇压了一起人民暴动，而后起程回国。本尼狄克八世不仅在处理宗教事务上手段果断，在处理俗务上也毫不手软，与穆斯林斗争铁面无情，斗争中，意大利王国的热那亚和比萨两城积极支持他，向科西嘉和撒丁两岛源源不断输送武器，因而两城开始确立其海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南方，特别是在普利亚，反希腊统治的土著反叛此起彼伏。1009年，由梅洛（一位伦巴第血统的贵族）领导的起义从巴里城蔓延到整个普利亚区。贝内文托和萨勒诺城（坎帕尼亚区的两个重镇）的亲王惶恐不安，认为普利亚区各城的独立运动矛头是针对其政权的，因而联合希腊总督，将起义镇压下去。梅洛向教皇求救。教皇原本与希腊在南部意大利的统治不共戴天，出于教会利益，同意派遣一支诺曼人的雇佣兵予以支援。梅洛乘机发动反希腊暴动。起初小有胜利，最后在卡内地区全军覆没（1018年）。这时连卡普亚和萨勒诺也承认希腊的最高统治。

梅洛逃亡德国，客死异乡。在梅洛和教皇的鼓动下，亨利二世第三次南下意大利（1021年），这次一举攻克坎帕尼亚，进驻贝内文托

城。但其攻势在普利亚的希腊城堡下受阻，加之部队中痢疾蔓延，迫使他退兵。教皇和皇帝在帕维亚共同主持主教会，会上制定了教会改革措施，而后亨利返回德国。实际上，亨利在意大利的权力时断时续，比起三个鄂图皇帝，他所遇到的抵抗更为猛烈。

亨利二世死后，康拉德二世即位（1024—1039 年在位）。于是，德国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法兰克尼亚王朝或称萨利安王朝。康拉德二世时，意大利局势依旧动荡不定，分为教会派和世俗派。教会派由米兰大主教阿里贝托·丁蒂米阿诺领导，积极支持康拉德。世俗派先求助于法王罗贝尔，后投靠阿基坦公爵威廉五世。起初威廉替其子接受意大利王位，后因不敢出面反对主教而退位。斗争中，与米兰对峙的帕维亚起而反康拉德；米兰城仍随其大主教支持康拉德。康拉德南征意大利，在米兰加冕为意大利王。他攻克帕维亚，反对他的世俗封建主纷纷倒戈，其中有托斯卡纳侯爵。他在罗马由本尼狄克八世的兄弟教皇约翰十九世加冕为皇帝（1027 年）。这次，德国人和罗马人于罗马混战一场，打得惊心动魄。

康拉德虽由教会派扶上意大利政权的宝座，但与萨克森家族不同，他并不全仰仗主教。为对付世俗贵族和僧侣贵族的强大势力，他力求利用其他因素来加强王权。为封地的继承权正与大诸侯打得难解难分的部将，便可为其所用，为了将他们牢牢拴在自己身上，康拉德重申部将应先效忠国王，后效忠自己的诸侯原则。伦巴第区的大封建主与小陪臣间矛盾尤为突出。米兰大主教阿里贝托为巩固其权力竭力反对小陪臣，剥夺其封地。这一阶层揭竿而起。阿里贝托在大陪臣和城市有产者的支持下，将其对手赶出米兰城。这些人联合其他地方的小陪臣，在坎波马洛地方大战阿里贝托，阿里贝托被迫撤回米兰。

双方均上告到康拉德二世，于是他再次南下意大利（1036 年）。因康拉德与阿里贝托早有摩擦，故而在帕维亚召开的帝国国务会议上谴责并逮捕了他。但大主教设法逃回米兰，并得到全城的拥戴。康拉德率军包围米兰，大主教阿里贝托组织民军，由牛拉祭车引导，作顽

强抵抗。康拉德无法攻陷米兰城，他发布的废黜阿里贝托以及任命新主教的圣谕成为一纸空文。但这场斗争却带来一项重要成果：康拉德于 1037 年颁布新法，规定男性亲族可世袭包括小陪臣封地在内的一切封地，除非在调解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纷争时以及上诉皇帝的情况下，否则任何人的权利不应被剥夺。新法的公布，使大封建主权势丧失殆尽，濒临解体，同时却推动了小封建主向独立的小农转变。

亨利三世（1039—1056 年在位）二十二岁即位。他对教会的虔诚远胜其父。即位后即与米兰大主教阿里贝托和解。不过现时的大主教却遭到其在康拉德时期的主要支持者城市有产者的反对。米兰人民拿起武器赶走了阿里贝托和其他贵族（1040 年）。人民领袖为兰佐内，身系贵族世家；小贵族与城市有产者于是开始融为一体。大主教和贵族在城外封锁米兰，历时三年之久。最后，米兰人打算向亨利求援，亨利提出派一支德国部队进驻米兰，负责维持秩序。有鉴于此，斗争双方自己达成协议（协议条款我们不详），城外的人重返城里。米兰这个“城市国家”就是从社会各阶层达成的这一协议开始，不断发展起来的。

城市国家在伦巴第区刚刚萌芽，冒险精神十足的诺曼人即在意大利南方将声势可观的地方力量网罗在其麾下，酝酿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

在康拉德二世第二次南征意大利，解除米兰之围后，旋即把注意力转向已陷于极端混乱的意大利南方。其时，希腊人与伦巴第人各公国间战事正酣；而伦巴第人各公国间亦你争我夺，并与那不勒斯公国关系恶化。诺曼人各帮派乘机插足其间，为各方效劳，开始夺取了一些领土统治权。梅洛反希腊时的得力干将诺曼人拉伊诺尔福如法炮制，从那不勒斯公国获得阿韦尔萨城，使之成为其伯爵领地（1030 年）。阿韦尔萨城成为来自诺曼底各帮派云集的中心，而欧特维尔三兄弟（威廉、德罗戈内、翁弗雷多）麾下的其他诺曼人帮派均被萨勒诺的瓜伊马罗四世招募于帐下。

应蒙特卡西诺皇家寺院的求援，康拉德二世南下讨伐威胁罗马郊

区的卡普亚城的潘多尔福四世，攻陷该城，并把该城赐予瓜伊马罗（1038 年）；同时确认阿韦尔萨伯爵领地为拉伊诺尔福的御赐封地。康拉德在南方的活动仅此而已。一场流行病迫使他退回北方，不久离开人世。诺曼人继续参加地方斗争，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应邀参与普利亚土著人反对希腊人的起义，希腊人败北，所征服的土地被瓜分。阿韦尔萨的拉伊诺尔福分到西博托和加加诺山两地；威廉·德欧特维尔（外号"铁胳膊"）成为瓜伊马罗最高统治下的普利亚伯爵，伯爵府邸设在梅尔菲城。亨利三世御驾亲征意大利南部（1047 年），承认诺曼人所取得的地位，但从瓜伊马罗手中夺走阿韦尔萨和梅尔菲两块伯爵领地，册立为帝国封地，并把卡普亚归还潘多尔福。卡普亚和萨勒诺两城互为死敌，相拼不下，诺曼人坐收渔利。当阿韦尔萨的里卡尔多威逼卡普亚城时，继任梅尔菲伯爵的德罗戈内（他是威廉的继任人）的翁弗雷多占领了萨勒诺。德欧特维尔几兄弟之一罗伯托（狡猾者）已侵入卡拉布里亚区。贝内文托城为免受诺曼人的侵扰，投靠教皇利奥九世（1051 年）。

为对付变得如此强大的诺曼人，意大利组成了一个联盟。曾经反叛过希腊人的普利亚人，现在却与他们结为一体，连教皇也与希腊人明来暗往。恰在此时，罗马与拜占庭的宗教冲突又起狼烟，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大搞裂教活动，从而使关系彻底破裂。不过，利奥九世收罗到少许乌合之众，拼凑成一支军队，以讨伐诺曼人。在贝内文托和普利亚交界处的奇维塔，这支杂乱的军队在阿韦尔萨的里卡尔多以及狡猾者罗伯托的痛击下，顷刻溃不成军（1053 年 6 月 18 日）。教皇成了阶下囚，数月后才获释。继任翁弗雷多的狡猾者罗伯托（1057 年），在其兄弟罗杰的支援下，继续攻城略地，并自封为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与此同时，阿韦尔萨的里卡尔多也占领了卡普亚。罗伯托继续其掠夺行径，把希腊人全部赶出大陆，1071 年攻克巴里城。卡拉布里亚也被征服，并被罗伯托和罗杰两兄弟瓜分。罗杰伯爵在罗伯托的支持下征伐西西里，进攻萨拉森人，1072 年攻克巴勒莫。至此，几乎整个西西里臣服于罗伯托的最高君权下。

33　宗教改革和叙爵之争

正当意大利北方城市自治初步确立，南方独家统治开始替代因两个帝国的统治和干预而形成的层出不穷的地方政权之时，罗马却相反，由于亨利三世对教皇国的改革横加干预，罗马-日耳曼帝国的权力在罗马大有加强之势。但是，由于亨利三世的干预打着为宗教谋利益之名，力量发展的结果却损害了帝国政权和教会封建势力，大大有利于教皇国，从而引起了教皇国和帝国间的巨大冲突，却为发展城市国家和最终建立诺曼人国家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教皇约翰十九世一心埋头经营图斯库卢姆家族自家之阴私。死后，侄子本尼狄克九世继任（1032 年），时虽年轻气躁却远不止自称的十二岁。以克雷申蒂家族为首的反图斯库卢姆家族集团竭力把他描绘得一无是处。本尼狄克九世有恃无恐：他与作为保皇派图斯库卢姆家族的天然保护人的康拉德二世签有牢固的协议（1038 年）。本尼狄克被起义浪潮轰下台（1044 年），西尔维斯特三世当选为教皇（1045 年）。不久，西尔维斯特三世被迫逊位，还政于本尼狄克。面对强烈反对，他不得不把教皇职位让给格列高利六世（1045 年），并索以赔偿。格列高利六世原是位神甫，素有美名，颇受教会改革派的爱戴。然而当人们获悉这笔私下交易后，群情激昂，否定了他任教皇的合法性，并要求皇帝出面干预。1046 年 12 月，亨利三世在苏特里召开大公会议，废黜西尔维斯特和格列高利。不久，在罗马的一次主教会议上，亨利又废黜了本尼狄克，并提名选德国王教克力门二世为教皇（1046—1047 年在位）。克力门二世为亨利加冕为皇，罗马人授予他罗马贵族称号，并有权提名教皇人选。采用此种程序，其后三届教皇均为德国人所独占：达马苏斯二世（1048 年在位）、利奥九世（1049—1054 年在位）、维克托二世（1055—1057 年在位）。

亨利三世任命教皇的主旨是复兴教皇国的宗教性以及教会改革，教会改革事业因之受到几届教皇的青睐。宗教改革运动始于十世纪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建于910 年）。隐修院建立了一系列下属寺院，

形成了本笃会的一个特殊支派。十一世纪初，隐修院院长奥迪龙的出现标志着克吕尼影响达到了顶峰，也影响到意大利和罗马。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寺院改革的机构。除圣尼洛引进的希腊教会的隐修制度外，还有两个本笃会的改革团体：圣罗穆埃尔德在阿雷佐附近卡马尔多利寺院内建立的卡马尔多利会（1012 年）和圣焦万尼·瓜尔贝托在佛罗伦萨附近瓦隆布罗萨寺院内成立的瓦隆布罗萨会（1038 年）。这两个宗教团体都积极主张推行全面的宗教改革。

初时，改革运动仅限于隐修生活，其目的是要求隐修院生活更纯洁，更遵守本笃会的规则。这一宗旨触及到俗、教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要使隐修院摆脱主教势力，直属教廷；另一方面要保卫隐修院的财产，防御世俗老爷，总之要使封建势力局限于其自身范围（社会和世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运动发展到整个教会，旨在恢复苦鞭生活（对俗间教士，主张他们要在宗教团体内过合乎教规的生活），摆脱世俗影响。这一运动还竭力反对鬻卖圣职（国王和诸侯盛行按物资酬劳分封圣职），反对教士结婚或姘居。四世纪西方就开始禁止教士结婚（这与东方不同），但实际上许多人阳奉阴违，并未认真执行。

反对买卖圣职的斗争易于发展成一场反王权的斗争。王室握有大量高级圣职，王权大多依靠这些高级教会封建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冲突没有公开化，这主要归功于亨利三世。此人是虔诚的信徒，与克吕尼的乌戈过往甚密。他摈弃圣职买卖，把教会改革视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亨利三世扶植的几任教皇均召集大公会议，公开谴责买卖圣职，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教皇中利奥九世最为杰出：他领导改革运动，巩固教廷权力，密切各教会与罗马的关系；虽与亨利三世关系良好，但他首先关心的是教会与教皇国的利益。运动日益扩大，最激进的一派甚至把由俗人出任的普通圣职也一律看做是圣职买卖，并开始感到，皇帝任意安排教皇实乃是对教会自由的侵犯。亨利三世英年早逝，其子亨利四世年幼登基，这有助于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罗马改革派和教廷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是罗马隐修士希尔得布兰德。根据传说，他生于索亚纳附近，在罗马阿文蒂诺山上的圣母玛利

亚克吕尼隐修院中长大成人。利奥九世授予他红衣主教之职，在以后几任教皇的教廷中其影响日增。维克托三世卒后，蒙特卡西诺寺院的高级教士腓特烈被选为教皇，即斯特凡九世（1057—1058 年在位），这次不是由皇帝提名的（后要求德意志摄政予以承认）。斯特凡家族和帝国不共戴天，和洛林的戈弗雷多为兄弟关系。他的死引起罗马贵族的强烈反响，遂将本尼狄克十世扶上台。然而，希尔得布兰德得到德国摄政的赞同，在锡耶纳选举佛罗伦萨主教杰拉多为教皇，即尼古拉二世（1058—1061 年在位）。洛林的戈弗雷多已与托斯卡纳侯爵博尼法齐·迪卡诺萨之遗孀贝亚特里切结婚，这片侯爵封地由他管辖。这时他进军罗马，把尼古拉二世扶上宗座。1059 年 4 月在拉特兰宫举行的主教会议颁布法令，规定今后教皇应由枢机团选举，应取得教士和人民的赞同。由于教廷改革派和保皇派间达成妥协，国王亨利及其继任者个人拥有的权利一般来说被保留了下来；但从罗马贵族算起的地方势力理论上已丧失一切权利。

从这时期起，枢机团作为教皇国王要管理机构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起初，人们把组成主教区的高级教士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因而枢机团是协助主教的机构。罗马枢机团的组成为：枢机司铎（罗马城各堂区教堂的主祭）、罗马七个教区的枢机助祭（助祭职位始于基督教初期，地位仅次于主祭）、郊区主教区（如奥斯蒂亚、阿尔巴诺等）的枢机主教。枢机团的这种组成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前两类已无原来的职能，而远离罗马的教区主教亦可进入枢机团。当然，地方贵族对枢机团的组成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起着极大的作用。

1059 年的主教会议还针对教士姘居采取了若干措施，并颁布命令，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俗人那里接受任何管理教会的职务。虽然这些激进措施在德国和意大利遭到公开的反对，但教廷却在托斯卡纳侯爵和诺曼人中赢得有力的支持者。

尼古拉二世越俎代庖，取帝国权力而代之。在梅尔菲大公会议上（1059 年），他承认罗伯托（狡猾者）为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和

未来的西西里公爵，承认里卡尔多·达韦尔萨为卡普亚亲王。作为回报，这两位诺曼亲王发誓效忠教皇（他根据教会最高权力或以君士坦丁惠赐书的名义成为王位的分封者），并保证为所占的教廷财产支付年税，保护教会权利和地产，支持实施选举教皇的新规定。

罗马教皇国不仅与南方诺曼人联合，而且还和伦巴第区的一些人民运动结盟，这些运动把反教会封建势力的“自由民”和某些性质不明的社会动乱引向对宗教的虔诚。某些主教被逐，那些鬻卖圣职和娶妻的神甫被处死。米兰成为这场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的革命的中心，为反对买卖圣职和姘居，一个被敌人称做“庶民党”的党组织应运而生，其领袖人物有：安塞尔莫（后为卢卡主教和教皇）、阿里阿尔多以及兰多尔福和埃尔伦巴尔多两兄弟。被教皇开除教籍的米兰大主教圭多被逐并放弃大主教职位。大主教职位的继任由一位王室候选人（买卖圣职者）和一位庶民候选人来竞争。这样，在大主教出缺的情况下，米兰城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并使其自治臻于完善。从此，在意大利北部城市中，教皇任命的改革派主教和皇帝任命的反改革派主教间争斗不休，不论站在哪一派，这些城市都能火中取栗，获得巨大的行动自由。

尼古拉二世卒后，希尔得布兰德举卢卡主教安塞尔莫为教皇，即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 年在位），在卡普亚的诺曼人扶持下登基。然而罗马贵族与伦巴第区的主教、德意志宫廷结盟，另立帕尔马主教卡达洛为教皇，号称霍诺里乌斯二世。不久，德意志摄政放弃霍诺里乌斯，在曼托瓦召开的主教会议上承认亚历山大二世（1064 年）。亚历山大二世继续致力于教会改革，多次重申其对德国王教的权力，并在米兰主教继任问题上与亨利四世的顾问们意见相左，于是对他们处以绝罚。

亚历山大二世故后，教士和民众违背 1059 年法令，欢呼由红衣主教选出的希尔得布兰德为教皇，称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 年在位）。此举实际上宣布皇帝废黜格列高利六世为非法。新教皇的思想（他所著的《教皇玉言》一书作了明确的概括）全面发展了《伪伊西

多尔教令集》所持的观点和尼古拉一世推行的政策。格列高利认为：教皇为万国教会之至尊，是废黜、赦免、调动主教之主宰；唯教皇有权召开大公会议；其他教会之重要事务均应呈报教皇裁定，教皇之钦定为终审，唯教皇能修改其他一切人的决定；教皇不受审判；教皇可以废黜皇帝，可以解除臣民对不公正君主的效忠誓约；罗马教会无过失可言，罗马教皇因圣彼得的功绩而被视为圣人。这些思想并非格列高利个人理论上的成就，而是他欲重申教会传统权力。他积极干预主教选举，监督和批准教士和人民的选举，不时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也会出尔反尔推翻这些选举；大量革除和清洗不相称的主教。他充分利用教皇特使，对地方教会行使全权，因而派遣特使成为罗马集权的最好形式。他尽力与多数国王建立封建的陪臣关系，除南方的罗伯托（狡猾者）外，还和西班牙、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王建立了这类关系。

格列高利七世随即开始支持教士独身生活，反对买卖圣职的斗争。为此派遣特使前往德国，但遭到强烈反对。于是，格列高利企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075 年四旬斋教务会议上，他宣布世俗叙爵权为非法。这一声明的后果可能会使一大批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封建主摆脱王权。但是，格列高利没有立即就此颁布通谕，表示愿与国王达成一项协议。亨利四世却走得更远，册封意大利中部和米兰（那里的庶民统治已被打倒）的主教，以替代罗马承认的主教。为此，教皇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1075 年 12 月），以绝罚、废黜相威胁。作为回答，亨利四世及其德国和伦巴第的主教宣称希尔得布兰德为非法教皇（1076 年 1 月）。于是格列高利在 2 月罗马教务会议上判处亨利绝罚，废其王位，解除臣民的效忠誓约，禁止臣民服从国王。这是教皇第一次授权自己废黜一位君王。

德国反亨利四世的贵族与教皇结盟。德国诸侯会议决定，假如一年内亨利的教籍不被恢复，则不再承认他为国王。为免遭打击，亨利四世忍辱赴卡诺萨负荆赔罪（著名的“卡诺萨屈辱”，1077 年 1 月），这才取得格列高利七世的释罪。其德国仇敌并未就此罢休，选举施瓦

本公爵鲁道夫为王（1077年3月）。于是，内战爆发。直到1080年格列高利七世才出面干预，绝罚和废黜了亨利四世，为鲁道夫加冕。亨利进行反击，在布雷萨诺内教务会议上（1080年6月）封拉文纳大主教圭贝尔托为敌对教皇（克力门三世）。不久，敌手鲁道夫战死疆场。亨利即刻南征意大利，其拥护者早已击败马蒂尔德，打通前往罗马的通道，将罗马围困。三年后，罗马市民脱离教皇，亨利四世方能入城（1084年3月），立克力门三世为教皇，新教皇也加冕亨利为皇帝。格列高利七世匿于圣安杰洛古堡，向诺曼人罗伯托求援。早先，罗伯托与教皇有隙，其后他重新得到教皇授爵，这时因担心假如亨利得胜将对其不利，因而驰援罗马。亨利四世和克力门三世撤出罗马，诺曼人入城后大肆烧杀。在罗马人的咒骂声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格列高利只好跟随罗伯托撤离罗马，逃往萨勒诺。1085年5月25日死于该地。其传记在谈到这段往事时，记载着他临终前的一句名言："我热爱正义，憎恨罪恶，为此我奋斗终身，死于流亡。"

在罗马，敌对教皇重新就职，皇帝派和教皇派的斗争方兴未艾，愈演愈烈。亨利四世尚能主宰德国，控制那儿的局势。但在意北部他却遭马蒂尔德·迪卡诺萨的抵制，伦巴第区不少城市（米兰、皮亚琴察等）第一次结成反皇帝同盟，拥戴反父王亨利四世的长子康拉德为王（1091年）。并非所有的伦巴第城市反叛亨利，某些城市摆脱马蒂尔德的权势，转而投靠亨利。亨利四世终于制伏逆子，摆脱困境，然而终难维持其在意大利的统治。1093年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进驻罗马，并于1096年赶走敌对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凡为国王所授职之主教，若无买卖圣职之行为且毅然脱离敌对教皇，则一律予以承认之。此招极灵，大部分主教纷纷向他靠拢。1100年克力门三世卒，教会分立渐趋平息。此时，亨利四世的次子领导德国反对派，反抗父王，这给亨利以致命一击。他以背叛罪将父王下狱，迫其逊位（1105年末）。亨利四世设法逃至列日，作顽强斗争。1106年8月愤死于列日。

现在只剩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唯一君王。他仍需与教

皇作激烈的较量。1110年他率领浩荡之师出征意大利，与教皇帕斯加尔二世（1099—1118年）缔结《苏特里条约》，其中规定：教会应归还自查理大帝以后从王室取得的一切封地和特权，而国王应放弃叙爵权。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政教分离的一种形式；总之，又回到了教会改革初期时的设想。但条约遭德国王教疯狂反对，无法执行。亨利五世于是将教皇投入狱中，以自由选举高级教士为交换条件，迫使教皇同意国王拥有叙爵权且加冕亨利五世为皇帝（1111年4月）。教会内部，由于格列高利派强烈反对上述让步，帕斯加尔获释后即拒不执行之。在继承已故女伯爵马蒂尔德（1115年卒）的遗产问题上风波又起。马蒂尔德将其领地全部遗赠给教会；但按当时的法律，这种安排仅对自由地有效，封地只能传给亲戚，如无亲戚，则归还国王。亨利五世因而声明遗嘱无效，收回马蒂尔德的财产。这一新的冲突助长了意大利王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但促进了城市自治。

亨利五世和加利克斯特二世（1119—1124年在位）一致同意把神职叙爵权和世俗叙爵权分开（这一做法在法国神学界最为盛行），终于最后解决了叙爵之争。《沃尔姆斯条约》（1122年9月23日）（第一个这类条约）裁定国王放弃授予主教或隐修院院长代表教权的牧杖和权戒的叙爵权，但保留授予代表俗权的权标的叙爵权，即可授予封地和财产。在德国，国王叙任必须先于主教任职仪式（实际上主教任职仍由国王左右），在意大利和勃艮第国王叙任在任职仪式之后。在罗马范围内，皇帝放弃一切有关教士职位和教会地产的权力。选举应按教规进行；但在德国，选举应有皇帝或其特使出席，选举发生分歧时，皇帝有权干预。关于皇帝对教皇选举的干预，条约避而不谈。1123年举行的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西方第一次，罗马教会第九次普世会议）批准该条约，再次谴责买卖圣职和教士姘居行为。

34　教会情况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骑士制度

《沃尔姆斯条约》虽为妥协之物，但这场叙爵之争依旧削弱了帝国，加强了教会，尤其是教廷。斗争过程中，教皇对不少西方教会的

内政大加干预，确立其最高权力。王室叙爵权遭致削弱，从而避免了国家教会形成的危险，使教皇摆脱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按规定主教应由教士和人民选出，但在整个十二世纪内，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加选举。主教的选举为教区内教士会的少数几个人所垄断，对此，罗马教廷也动辄干预。

叙爵之争以及论战性文献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教会法典的发展，这又是教皇加强权力的一种表现和手段。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教会法典汇编（有卢卡主教安塞尔莫编的、红衣主教狄乌迪蒂编的、夏尔特尔主教伊沃编的）。这些汇编均确认教皇颁布的法规高于一切。这一准则到十二世纪中叶由波洛尼亚大学教会法教员加马尔多利会修士格拉蒂安编写的《教会法合参》加以正式确立。《教会法合参》通称《格拉蒂安教令集》，是一部渊博的、规范的教会法著作。

隐修院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组织——勃艮第西多修道院中的西多会，它始于叙爵之争，建于 1098 年。在圣贝尔纳·德克莱沃（1090—1153 年）领导期间，该会达到鼎盛阶段。此人创建的明谷隐修院已成众星捧月之势。西多修士遵守一共同规定：承认西多修道院院长为会长；下设许多分会，各分会均以其寺院创建者为领袖，并保留一定的自主性。针对世俗化的克吕尼修道生活，西多会的主导思想是恢复本笃会生活：劳动、饱受贫穷、远离尘世。西多会的寺院均远离居民中心，建于不毛之地；西多会修士在统一领导下，采用大农业企业的精耕细作法开垦这些不毛之地，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活动盛行于阿尔卑斯山北边，特别在德国。意大利也不乏光辉的例子，如米兰附近的明谷隐修院。初期，西多会的隐修生活主要是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抗。修士们通过劳动自给自足，并坚持脱离世俗生活，不当封建陪臣，不受封建管辖。不过这一现象很快消失；随着地产和权力的扩大，西多会也逐渐为周围世界所同化。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提高了教廷的威信，有助于教皇在叙爵之争中获胜。当时在东方，土耳其塞尔柱突厥人已横扫西亚，威胁君士坦丁

堡，觊觎巴勒斯坦。教皇乌尔班二世重新抛出格列高利七世所梦寐以求的设想，制订整个基督教西方反穆斯林圣战的宏伟计划，并在皮亚琴察大公会议上，特别在克莱蒙大公会议上对此大肆鼓吹（1095年）。数千人热烈响应教皇的号召，振臂高呼："这是上帝的意志。"他们向教皇宣誓要武装朝拜圣地，解放基督陵墓；佩戴红布十字，以表决心。不少布道者到处传布教皇的御旨，其中要数亚眠的隐修士彼得最为卖劲，因而最为著名。从圣地生还的朝圣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如何惨遭穆斯林的虐待，这无异于在本已昂扬的东征激情上火上浇油。这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参加者达三十万人之众，除教皇特使阿代马洛·德皮外，并无最高统帅。主将除低地洛林公爵戈弗雷多·迪布廖内——他曾被误认为十字军统帅外，还有诺曼人罗伯托之子博希蒙德、侄子坦克雷迪。途中，十字军与拜占庭人多有争夺与不和，他们越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占领尼西亚，于多里莱奥击败弗里吉亚的伊科尼奥苏丹，攻陷安条克。博希蒙德在此建立安条克公国。由于分裂、开小差和瘟疫，十字军大量减员，但最后终于到达耶路撒冷城下。其时，耶路撒冷刚被埃及的法蒂玛从土耳其手中夺得。十字军围城一月后，于1099年7月15日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居民。戈弗雷多获圣墓护卫者称号，接管耶路撒冷。他的继承者均封为王，耶路撒冷王国按封建制分封一系列诸侯国（安条克、埃德萨、的黎波里、推罗等）。

继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来陆续不断地发动了多次十字军，本书还将叙述其中主要的几次（传统说法有八次，这仅指最著名的而已）。十字军形式上是一种宗教活动，是一种许愿性质的武装朝圣，其最高领袖和组织者是教皇。同一般朝圣者一样，对凡参加十字军者，教皇均赦免其所犯下的罪过。促成这一巨大运动的原因多种多样：宗教热忱，光荣战死后能获得永生的希望，中世纪尚武好斗的性格，乐于冒险，大量流浪者寻求谋生，贪恋发财和权势。我们还可看到，十字军复苏了欧洲在十一世纪初进行的旨在加强东西方关系的那些活动。十字军还与和平的贸易文化关系紧密结合，从而大大加强了东西方各种

形式的交往。

意大利在军事上对十字军贡献微薄，但担负着大量运送十字军的任务及尔后开展的贸易活动。从这一方面讲，十字军对意大利一些滨海共和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在叙利亚地区各基督-拉丁国家建有重要殖民地，拥有巨大特权。

十字军与中世纪中期另一独特现象——骑士制度——紧密相关。骑士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各因素的推动下，人们对武器的使用、贵族职能的看法有了一个转变。

在所有封建国家里，贵族共同的法律、理想和荣誉使他们成为一个具有相同风尚的尚武集团。在德国，其风俗由来已久：在众武士面前庄严地举行授武器仪式。舞枪弄棒、骑马格斗成了贵族的特权，战士、骑兵与贵族为同义词，骑士是贵族的总称。佩带武器是进入贵族社会的首要条件，所以在佩带武器之前，每个人都应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姿态。因此，年轻贵族或在祖传城堡内习武，或作为马夫和随从拜另一贵族为师学艺。大约十八岁至二十岁艺成，被授予骑士称号。起初仪式较为简单，后来越来越庄严复杂。教会也参与其事，谆谆教导骑士应负起宗教和道义责任。其过程大致为：教堂“武装值夜”，忏悔和圣礼，对新骑士的训诫，宣誓遵守职责（正直、忠诚、保护教会、扶持弱小），最后是武器祝福仪式和佩带武器。这完全是一种军事洗礼，由有关教父主持。骑士制度规定，所有骑士不管国籍和贵族等级如何都是兄弟，都应服从同样规定，享有同样权利，负有同样责任。这样，武艺和贵族等级道义化了、理想化了，起到了遏制滥用武力于强暴、抢劫、复仇的倾向。

教会关于“暂停私斗”的呼吁也起着同样的制约作用。“暂停私斗”作为一项宗教义务，规定在某些日子里放弃任何格斗，如星期天，每星期的下半个礼拜，四旬斋。但它并没有成为一条普遍的原则，仅是一些主教提出的地方性创议，主要盛行于法国。

骑士制度主要盛行于法国。意大利封建主义发展较慢，且不普遍，很快走向衰落，因而骑士制度在意大利既非自发形式，亦不十分重要。

到中世纪晚期，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骑士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这时的骑士制度仅仅作为一种反常现象而苟延残喘，是游手好闲者与抢劫者所惯用的一种伎俩，它与起源时教会和道义上所承认的骑士制度大相径庭。

第七章　城市国家和王国

35　城市的没落和崛起

如前所述，叙爵斗争已从各个方面增强了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自治生活。帝国业已削弱，教会封建主义遭致严重打击，人民挺起了腰杆，他们将主教、大封建诸侯，甚至皇帝的某些特权夺为己有，他们的声音分量十足。从无后嗣的卡诺萨家族起，大部分公侯政体已解体。1100 年左右的叙爵斗争期间，在意大利北部先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大的城市国家。

从古罗马自治城的消亡到城市国家的建立，足足经历了五百多年。其间，意大利城市作为法律实体、行政组织和社会政治力量所经历的事情，至今仍不清楚，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可能永远是个疑团。毋庸置疑，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意大利古罗马自治城，两个世纪来早已名存实亡的独立行政组织，终于完全消失，至多只剩一些登记文件的下级职员——书记官。拜占庭统治区是如此，伦巴第人统治区更是如此，这里罗马帝国居民是不准参加政府的。但是，不应认为自治城的消亡就意味着城市已无任何价值，城市与周围农村已毫无区别。主教仍居城内，其管理机构仍由城市教士主持。农村教区相继成立，大地主、大封建诸侯在其领地上建起无数私有教堂，各种大小寺院也大

多建于城外，尽管其发展甚速，但这些都无法抹掉主教区的重要意义。一些大寺院，其重要性已赶上甚至超过主教区，在其管区内已行使主教区的职能；实际上它们已发展成为城市。这种现象国外甚于意大利。

中世纪初期，宗教生活内容丰富，活动范围远比今天广泛，因此主教区的存在及其重要地位足以使城市拥有一种非宗教性的生活和组织。由教士、城市显贵和人民举行的主教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城市行政活动。此外，伦巴第人的公爵和皇室总管一般住在上述所说的城内（住有主教的城市），本身就赋予城市以某种重要性。到法兰克人时期，这一情况仍维持了一段时间。

几个世纪以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地位以及封建主义的形成造成城市生活贫乏化。工商业活动已收缩到各个互相封闭的地区内；正如我们在第 20 节内所见到的那样，这时的经济活动大多集中在大地主的庄园或乡村住宅周围，城市手工业者也来此谋生和定居。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给自足的、相互割据的经济从未成为独一无二的经济形式；城市经济生活从未中断，外向型生产以及与外地的贸易往来也未停止过。

不过，封建主义造成的政治和行政上的损失甚于自给自足经济给城市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权力落入农村封建老爷手中而形成的豁免制度剥夺了城市应有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城市居民虽在个别方面仍有一些权力（如在司法系统里担任助理法官等，见第 26 节），但已无权参与封建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大封建主的附庸。

在封建制度下，城市生活能得以继续，城市地位能得以维持，尽管是极其有限的，其主要因素是主教区的存在。主教已成为大封建主。国王和皇帝都乐于赐予他们最高权力（不少于世俗贵族，甚至更多，尤其在鄂图时期）。与世俗封建主不同，主教居住在城里。君王赐予他们以特权，等于给他们不同程度的城市统治权，有时甚至还封以伯爵称号和职位（见第 31 节）。主教既要行使这些职能，又要完成宗教任务，只有广泛利用俗界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如十一世纪的米兰）主教下设一个由城市显贵参加的委员会，主持日常俗界事务，实

际上就是城市行政管理。这一类委员会非常接近于城市国家的执政官委员会。

至少从九世纪中叶以来，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民众的品格随处显露峥嵘，恢复其原有的光彩。这种品格既不同于主教权势，也有别于伯爵权威，有时在司法争端上甚至与主教意见相冲突。这种品格表现于城市公共财产的管理上，也体现于居民区的行政组织之中。这种新的素养与当时出现的另一种运动不无关系，即“部将”地位提高，摆脱了大诸侯，变成了独立自由的小地主。

加洛林王朝时期，意大利经济生活，特别是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王位竞争者间的战争和野蛮人的侵入引起了部分逆转，但仍保持发展的势头。以后几个世纪经济更是大踏步前进，城市人口也相应增加。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的侵袭促使各城市加高城墙或构建新的城墙，周围居民也纷纷进城避难。除古老的城市外，拜占庭-伦巴第时期各政权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古堡、一些诸侯宫廷和封建城堡都占有一定地位；其中大多数后来发展成城市。十一世纪经济普遍复苏，十二世纪因十字军东征而突飞猛进。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从未中断，尤其是“香料”（香料、药品、调味品等）贸易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香料一般由威尼斯和其他海滨城市输入意大利，再经波河平原进入中欧。此时，大量成品（丝织品、地毯、呢绒、金银织物）及西方工业建设和生产所需的原料（大麻、亚麻）从东方涌来，这些东西一般用金子支付或抢劫而来，尤其是在十字军初期。北欧也占有一定的贸易地位：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西北部进口某些工业原料（皮革和毛皮）和食品（咸鱼），出口香料和制成品以做交换。这些贸易大部分也是经波河平原和威尼斯进行的，如：从伦巴第区经布伦纳罗山口去日耳曼国家；经蒙塞尼西奥和圣贝尔纳多两山口进入法国和勃艮第。除中世纪初保持下来的地方市场外，还出现了不少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大集市。例如十二、十三世纪著名的香槟集市，大部分由意大利各大市场汇集而成。

这样，货币流通势不可挡，以至于大大削弱了地主的地位，同时

促进了土地和财富的流动，推动了社会各阶级的变迁和融合。经济上衰落的地主和诸侯只好变卖土地和封建权益，而大发横财的“部将”和工商业家乘机大量买进。以意大利城市为主体的一系列机构的建立有利于这种新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人士在城内建立各种同业行会，有师傅和学徒的，有老板和工人的。这种行会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垄断着各种经济活动。它们保护、捍卫会员的利益，救济会员的生活。可以认为城市国家时期的行会和帝国末期的行会间的连贯性问题终于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解决。所以也不能排除在一些意大利城市中某些残余的古老行会的因素对建立新行会起了一定作用。经济发展和社会斗争使行会层出不穷，且性质各异。除了大的行会外，又出现了小行会；原因一方面归因于不同的经济职能，再者因为生产过程中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渴望组成不同于企业主的自己的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板和工人间有关工资的争执不断出现。这种新现象属于第二阶段，以后再谈。

较为特殊的是商业组织和机构。商人联合起来，保护会员，避免竞争。这种团体首先在意大利发展成为共同事业、共同分红的资本联合会。同时还出现了大量一直延续至今的附属性组织和机构：存货的货栈；代表总公司的分公司；进行汇兑、储蓄和借贷的银行；不需用现款支付的汇票等。

36　城市国家的形成和机构

城市人口激增，经济实力增强。初期，工商业并不占主导地位，对城市国家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小地主和部将，他们虽在农村中有小块封地和土地，但居住在城里，有时还和大地主一起从事工商业活动。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城市主教区行政人员、官员和主教代表（子爵、律师等）。初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实际上是由不同成分形成的大杂烩，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也依次排列。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各城市国家内（法国南部、佛兰德、莱茵河畔各城）工商业很快取得优势，而其政治发展较晚，成就较小。在意大利，这些不同成分在共同的城市生

活中地位平等，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个新的意大利人民阶层，几个世纪后这一阶层又从历史的客体成为历史的主体。在伦巴第时期，至少在伦巴第后期以及法兰克时期和封建时期，的确不能说土著意大利居民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伦巴第和法兰克统治者都是外国人，他们在定居意大利后还长期保留着与意大利不同的民族意识。只要回忆一下十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卢乌特普兰德（他是一位主教，不是世俗诸侯）对定居意大利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做的明确对比就够了。他认为罗马人的民族意识绝对低劣——可以说这是现代日耳曼种族主义的先兆。世俗国家权贵和封建权贵都是伦巴第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教会权贵大多也是外国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在上层贵族中占优势；伦巴第人主要是中小贵族。1000 年左右，伦巴第人与罗马人似乎已相互同化，称为“意大利人”，而德国人或条顿人却成为外国人和外国统治者的杰出代表。由于城市的增加，城市国家的形成，这一外国贵族阶层虽未完全消失，却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在城市，也是由于城市的发展——马上可以看到在乡村市镇中也是如此——意大利民族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据优势，彻底同化了外国分子，再次掌握了自己的国家。城市国家的本位主义并非民族瓦解现象，而是民族自治的重建。

在意大利语中，“城市国家”原意为“共同利益”。此名盖出于上述各种成分在城市居民中取得主导地位并对城市行政起一定作用后联合起来，摆脱城市老爷的统治，捍卫自己的集体利益之故。城市国家诞生之初本作为私人协会，但其成立又担负部分城市的行政管理，因而又演变成公共机构。城市国家最初并不废除主教、伯爵等的封建权势；而是用限制它、反对它来与之竞争，施展挖其人员，夺取职能的计谋，使全城、全区居民服从自己的权力，以求达到消灭它的目的。主教曾在最大程度上与城市居民保持行动一致；但到了决定性的时期——有人认为，对意大利北部各城市国家来说大约在十一世纪末——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

城市国家为了确立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

恢复了在野蛮人时期及封建时期解体了的国家集权。城市国家还不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但也不再是司法权和特权、国家权力和豁免权的混杂物，也不再是名目繁多的阶级和集团的集合，更不是封建时代特有的公法和私法、私有权和君权的合并；有人谈到城市国家的支离破碎，这是因为他太看重表面的统一，而不剖析它的竖截面。确切地说，城市国家是一个在各方承认的权力和规定的严格约束下将不同社会成分组合在一起的统一体；而先前各社会成分按各自的章程办事，制定各自的法律，实施各自的司法权。

这只是随着时间而逐步形成的最高纲领，但它从未彻底实行过，因为特权阶级从未完全消灭。城市国家的生命，可以说是一场首先与封建制，其次与教会的司法和豁免特权的持续斗争。居住在城外的封建主被迫宣誓效忠，让出土地，迁回城内。在与主教的斗争中，抵制教会绝罚的办法是：城市国家当局禁止市民与主教府建立任何关系。

如果说城市国家竭力确立自己的高于俗教权力的最高权力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完全的独立自主——即当今国家的绝对主权（中世纪时期人们并不懂得这一概念）——，说得更确切些，并不要独立于任何上级权力。城市国家承认皇帝在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承认意大利国王。可以说，在与君王的关系中，城市国家取代了大封建主，并与大封建主一样根据时间和地点或多或少摆脱了一些义务（兵役、税收和各种差役，承认王家最高司法权）。和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城市国家相比，在意大利，这种摆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它导致了意大利王国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的城市国家，它们把自己的疆域扩展到郊区和附近城市，从而给现代国家奠定基础。

这种扩张使城市国家间以及城市国家与俗教大诸侯间处于敌对状态。真正的城市国家与农村城市国家最先发生冲突。在郊区，一场与城内相同的运动也在逐步开展：农村居民区建立了独立的摆脱了封建势力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农村自古以来已有初步基础：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郊就有村镇，以后取代村镇的是农村教区或堂区。教区居民常在教堂前的广场上集会，商讨事务；有时召开几个教区的联席

会议，就像古代更多的村镇一起举行平民会议和市场会议那样（见第8节）。繁荣的市场对这种会议的举行广有裨益。有时伦巴第人的驻军（见第23节）也可形成较远农村的这种组织的核心。封建诸侯的城堡也成了平民组织和解放的工具，因为诸侯呼吁周围群众奋起保卫城堡，许诺赐予土地或其他特权作为酬报。农村城市国家实质上是耕作者协会，旨在保护他们，使其摆脱封建奴役。其成员有：自由土地上的小地主、小封建主、佃农。其中主力是佃农，他们已摆脱了封建奴役和差役；如果说这种封建差役还没有全部废除，那么过去的实物税和劳役制也已改为固定的货币税。摆脱封建义务这一过程具有重大意义，现今从许多意大利地名仍能看到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城市国家（也有君主和大诸侯）亦多次设立庇护区，城郊奴隶可移居该区，成为自由人。

人们在谈论城市国家时，通常把它说成是一种民主机构。若与先前的政治社会制度相比，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认为（这样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全城居民都参与了公共事务的管理，初期更谈不上。最初的城市国家掌握在出身门第、社会地位和财富都与众不同的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主要是城市贵族（以小贵族为主）和大有产者或称“肥人”，主体还是城市贵族，当然也不乏失败的旧阶级代表，如主教、主教顾问、帝国代表。这些肥人很快取得优势，形成新的权贵。他们不仅握有现金，还大量购进土地，因而完全代替了旧贵族。到了晚期，我们才看到小人物纷纷登上舞台。小人物可以理解为小业主和伙计、学徒这两个阶层中的小手工业者。较为特殊的是手工业者，当时他们还难以建立自己的行会组织。争取参与城市政府的斗争（今天可以说是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斗争）是城市国家生活的主题之一。不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各个集体或阶层；所谓阶层是各个行会的总和，而各个行会又都在为自己争取权利。除经济行会外，还有军事行会，一般来说就是城市各区的军事组织，它们召集市民，在军事首领的指挥下维护公共秩序或上阵抗击外敌。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在其军事征伐时，常以牛拉祭车为中心，部队集合于其周围。各贵

族家庭也组成协会，称为贵族集团。

城市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机构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市民会议，即所说的议会，民众大会或市民群众大会。市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执政官，通过城市国家章程和宣战及议和。为处理日常事务，下设一些小型的专门委员会，向城市执政官提出建议，协助其工作。执政官实施日常的行政权、管理权和司法权，并在战场指挥部队作战。执政官这一官衔是沿用罗马时期的旧称，以缅怀古罗马帝国，用以激励罗马帝国子孙意识，这种意识是促进意大利民族复兴和城市国家市民意识的特殊因素。帕维亚于1084年、米兰于1097年、科莫于1109年、波洛尼亚于1123年、皮亚琴察于1126年先后选出执政官。执政官除由议会选出外，也可抽签决定；但某些团体也有权在最高执政委员会内派驻代表。

37　中部和南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　威尼斯

总的来说，城市国家的发展，意大利北部早于意大利中部。在托斯卡纳，马蒂尔德统治时期为城市国家酝酿期；马蒂尔德女伯爵去世后为决定性发展期。1123—1125年，佛罗伦萨与过去统治它的菲埃索莱开战并征服了该城，从而确立了自治权。1138年佛罗伦萨才有执政官，而卢卡则不然，早在1080年后不久就设立执政官；几世纪来卢卡一直是托斯卡纳侯爵首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与卢卡同时，比萨也出现了执政官，但比萨的城市国家体制发展过早；和热那亚一样，由于航海活动，比萨城市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地方有所差异。早就从事贸易，与萨拉森人海上较量，总之，所有的海上活动必然使这两城摆脱封建制度，促进城市制度的过早发展，因而遭到诸侯们和皇室的抵制。早在亨利二世时期，即十一世纪初，两城已联合抗击萨拉森人。这场斗争构成早期热那亚和比萨城史的主要部分。关于这场斗争，在比萨流传着各种传说，其中，淑女钦齐卡·德伊西斯蒙迪的故事最为动人，说她领导的比萨抵抗萨拉森人的战斗总是凯歌高奏，所向披靡。十一世纪初，萨拉森人确实不断攻

击比萨城。1016 年，热那亚-比萨同盟把西班牙的穆斯林首领穆萨（或称穆塞托）逐出撒丁岛，从而取得第勒尼安海的霸权地位。不久，为争夺科西嘉和撒丁岛的最高统治权，两城反目为仇。撒丁岛分成四个行政管辖区或称四个"王国"。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比萨确立了自己在岛上的权力，不少比萨贵族举家迁居于此。

这两个滨海城市，尽管道路略有不同，但也步出了封建的意大利王国世界。其差异在于其他意大利的滨海共和国没有经历封建阶段。最突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威尼斯长期与拜占庭保持形式上的从属关系，其执政官从君士坦丁堡皇帝那儿得到显贵的头衔，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高级官员。这种从属关系纯粹是形式上的，并不影响威尼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缔结协议，并取得除拜占庭给予的贸易特权之外的贸易特权。威尼斯的主要特点是在东西方间架设桥梁，是意大利和东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因而其发展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方。威尼斯的贸易扩张与航海能力的提高，与夺取地盘有着紧密的关系。威尼斯首先瞄准由斯拉夫人和萨拉森人占据的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此，先得夺取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制海权。早在十世纪上半叶，在伊斯特拉侯爵（属于沙林蒂亚公国，从 1077 年起属阿奎莱亚牧首区）的参与下，威尼斯与伊斯特拉各城缔结了协议，确立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势力。执政官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991—1009 年）应达尔马提亚各城的邀请去协助抵御克罗地亚人的进攻，因其名义君主拜占庭皇帝已无能为力，从而确立了威尼斯在那里的统治权。

威尼斯成了城市国家运动的局外人。中世纪初期最后的几个世纪里，威尼斯内部生活的特点是新权贵商人代替了老权贵地区行政长官。封建主义在威尼斯无人知晓。威尼斯的这种发展交织着执政官与权贵们的冲突，因执政官渴望拥有继承权。帕尔蒂恰科家族、坎迪亚诺家族和奥尔塞奥洛家族均通过执政官把其子女安插于政府内而形成一些地方性王朝。贵族的反对不时发展成公开的暴动，他们废黜和杀害执政官。随着奥尔塞奥洛家族的垮台（1026 年），贵族派开始压倒王朝

派：扶助和监督执政官的谋士团成为常设机构，一些家族的执政官职位的继承权亦被取消。

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上从北到南的扩张，必然会与萨拉森人和拜占庭人遭遇。威尼斯采取联合后者反对前者的策略。萨拉森人在南部意大利的统治被消灭后，诺曼人即取而代之。于是威尼斯和拜占庭帝国又一致共同对付诺曼人（见第 39 节末），并签订了对其在地中海东岸诸国开展贸易和建立殖民地极为有利的协定（1082 年协定及相继签订的协定）。

威尼斯最初的发展与坎帕尼亚区的滨海城市极其相似：那不勒斯、加埃塔、阿马尔菲等。这些城市的自治、贸易、繁荣和海上力量也都是在名义君主拜占庭帝国的庇护下取得的。这些城市没有建立封建政权；在其政府中也存在着贵族派和王朝派之争。但是，与威尼斯及意大利王国其他城市国家不同，这些城市的独立自治进程受到诺曼-施瓦本王朝的制止；诺曼-施瓦本王朝征服了这些城市，只给它们一些地方豁免权。

在意大利南方的内地城市，特别在普利亚各城（巴里城），由于贸易的发展也出现了富裕的有产阶级，也建立了类似城市国家的组织。但这些城市比滨海城市更早被诺曼人征服，类似的发展也遭遏制。

38　新文化

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昌盛，而且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在这一方面最有特色的是营造业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艺术，首先是建筑艺术的兴起。城市国家新生活的第一中心是大教堂，大教堂并非纯宗教性的，而是全体市民的，人们在大教堂前和大教堂内举行集会，讨论最重要的事务，庆祝城市生活中最隆重的活动，如执政官宣誓，对牛拉战车和军旗的祝福式。

反映西方新兴民族成熟的新艺术取名为罗马式艺术，这既是为了指出这种形式是与罗曼语或称新拉丁语的形式并驾齐驱，比肩而立，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它摆脱了拜占庭的传统而与一些罗马传统相联姻，

但不应夸大这种摆脱，因为拜占庭艺术与罗马艺术之间联系甚紧，而且不排除罗马艺术也受到东方的影响。无论如何绝不应把罗马式艺术看做是对古代艺术形式的一种模仿；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新颖的创造。罗马式艺术产生于十世纪末，十二世纪是其最光辉灿烂时期。

罗马式教堂与古罗马大教堂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它自己的结构特点。木结构的平面屋顶改为砖结构的拱顶，起初是半圆柱或半圆形拱顶，后发展成交叉拱顶（由两个交叉的半圆形拱顶构成）。主殿和配殿（或称耳堂）形成一个拉丁形十字（纵长十字）；交叉点上面常是一个圆屋顶（这是拜占庭传统）。各殿由圆形拱门分开，采用扶垛（不是柱子）来支撑，扶垛是柱形的，如果是交叉拱顶，那么扶垛就是拱顶肋的延伸。门窗上的框缘采用圆拱结构，正门上更为复杂多层，下由几根小柱子组成的支柱支撑。外部没有柱廊，而是在正门上饰以华丽的缘饰，在两边和后面由突出的小拱顶和小柱头汇聚成的许多小平面和小梁上也饰以各种饰物。这方面发展极快，不时花样翻新。大门、外面拱廊和柱头一般用大量的奇兽怪人装饰。建筑艺术发展的同时，雕刻艺术也有发展，但重大作品问世较晚。

在意大利（尤其是中部和南部），由于受古罗马大教堂这一类古建筑的长期影响，罗马风格不太盛行。所以还保留着无拱有柱教堂以及以中殿为主的建筑，特别是洗礼堂。罗马式建筑在北部非常盛行（称“伦巴第建筑”），如：米兰的圣安布罗焦教堂，其前半部建于十一世纪下半叶；帕维亚的圣米凯莱教堂，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在古老的大教堂遗址上重建，还有圣彼得教堂和圣泰奥多罗教堂；科莫的圣塔邦迪奥教堂建于 1095 年。意大利北部罗马式建筑的杰作是莫德纳大教堂，建筑师兰弗兰科于 1099 年开始建造；维罗纳的圣泽诺教堂就是以莫德纳大教堂为蓝图按照自己的建筑意图建造的，并于 1117 年地震后重建；帕尔马大教堂也于地震后重建。

在托斯卡纳，古代长方形大教堂的影响还相当严重。佛罗伦萨有圣米尼亚托教堂，始建于 1018 年。该教堂建筑欢快活泼，正面（后面

于本世纪中叶建成）装饰光彩华丽，给人一种心旷神怡、朝气蓬勃的印象。佛罗伦萨洗礼堂，其圆顶呈八角状，可能建于老洗礼堂原址上，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主持了揭幕式。比萨主教堂是一绝妙的创造，始建于1063年，一直到十二世纪末方始竣工（由建筑师布斯凯托开始，正面由拉伊纳尔多建造）。这是一种长方形教堂建筑，有圆顶十字形耳堂，正面上部有拱廊，十分宏伟。这一建筑把早期基督教传统、东方的影响和罗马式新风格融于一体。装饰之华丽、绘画之精美几乎可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相媲美。主教堂旁还建有洗礼堂（1153年）和倾斜的钟楼（1174年），两者都有拱孔和拱廊。比萨的建筑风格在托斯卡纳特别流行：卢卡建造了众多的罗马式教堂。翁布里亚区罗马式建筑的主要作品是1140年建成的阿西西的尼鲁菲诺双层大教堂（焦万尼·达古比奥建造），十三世纪末又建成三角形顶饰。

十二世纪上半叶罗马新建筑不多，多为改建：位于特拉斯泰韦雷的圣玛利亚教堂，宽敞、明亮、庄严。在罗马，长方形大教堂的传统占绝对优势，但在一些建筑装饰方面，十二世纪已有伦巴第影响（阿德里安四世时期的圣约翰教堂和圣保罗教堂的背面）。受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典型的钟楼建筑（科斯梅丁地区的圣玛利亚教堂、圣约翰教堂和圣保罗教堂），这种钟楼呈长方形，又高又窄，被墙上镶嵌的各色大理石和多层圆拱小窗点缀得熠熠生辉。彩色大理石镶嵌工艺是一种建筑装饰流派，称科斯马蒂工艺，十二、十三世纪流行于罗马和拉齐奥区，处处可见采用这一工艺的建筑物（讲道台、尊座、大门、地板等）。绘画方面依旧保持罗马传统，其中除抄袭拜占庭风格外，还盛行较自由的罗马风格，圣克力门地下教堂最新（十一世纪）绘画表现尤为突出。

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在普利亚出现了一个受伦巴第和比萨巨大影响的罗马风格派，体现这一派风格的建筑物有巴里的圣尼古拉教堂、特罗亚大教堂和特拉尼大教堂。在西西里，艺术是随诺曼王国的最终形成而发展的，在后面要专门论及。

这里有必要单独谈一下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圣马可教堂是在圣

马可的骨灰搬迁后盖起的教堂遗址上修建的，是1043年后，在多梅尼科·孔塔里尼执政时期，一批东方艺术家根据君士坦丁堡圣徒教堂（查士丁尼时期）图案建造的杰作。教堂呈希腊十字形（正十字形），十字形四个耳堂都是圆屋顶，交叉处也是圆屋顶。圆顶间的大拱弯由圆拱门联结的扶垛支撑，起平衡作用。到处都是镶嵌的彩色画。各具形式的建筑部件汇集成一幅绝妙的五彩缤纷的图案。教堂外部的正面和装饰具有罗马风格。

城市国家的新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不如在艺术上成就斐然，但文学较为直接记录时代大事。与法国不同，十一、十二世纪的意大利仍盛行拉丁文学，罗曼语言文学只有少许迹象。但文学已不再限于写圣徒传记故事和进行神学辩论，而开始描述当时的大事，主要描述新生城市国家的最初功绩。如修士多尼佐内用六音步诗赞美马蒂尔德女伯爵的生平事迹，一些无名氏作者用诗篇歌颂比萨人1088年远征非洲的伟大胜利以及1115年征服巴利阿里群岛的成功。一位无名的科莫诗人也描述了十二世纪初爆发的米兰-科莫战争。文学的全面发展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

前面已说到代表教会权力，尤其是教皇权力的教会法规的发展。那时，罗马法再次兴起，并以某种方式形成与教会法规相竞争的局面。这一现象代表了世俗精神的又一重要突破。罗马法一开始就完全独立于神学、独立于教会法规和教会传统，就其性质而言有助于确立不同于教会权力和封建自主权力的中央集权。罗马法也从未完全被日耳曼法所取代：在查理大帝王朝及以后几代王朝所承认的各种私法共存的体系内，还常有一些私法公开宣称是根据罗马法而非根据伦巴第法、法兰克法等制定的。意大利中部和罗马更是如此，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地方。十一世纪末罗马法研究是通过哪条道路开始的尚不清楚，但它受到一些公国和城市国家的支持则是无疑的。形形色色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生活促使人们到古代法律学中寻求规定和制度。这一新学科的中心是波洛尼亚城，这不仅给该城带来极大荣耀，而且使该城成为新文化的发源地。中世纪第一位伟大的罗马评注家伊尔内里乌斯（1125年

卒）就在波洛尼亚执教，以后许多人步其后尘。在与罗马教会斗争中，亨利五世在法律上也常要听取他的意见。

古老的科学传统在阿拉伯科学的影响下日趋完善。在意大利，这一传统仍保留在享誉欧洲的萨勒诺医学院里。

新的经院式哲学和神学开始于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圣安塞尔莫·达奥斯塔（1033—1109 年）和彼得罗·隆巴尔多（见第 47 节）对此多有贡献，但前者主要在法国和英国活动。

39　西西里王国

亨利五世去世后爆发的皇位危机有利于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发展和意大利南方诺曼国家的建立。亨利五世无后嗣。以亨利姐姐之子施瓦本公爵霍恩施陶芬的腓特烈和他的弟弟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为首的一派支持继续执行撒利克家族的帝国政策。但以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家族为首的反对派获胜，选举撒克逊公爵苏普林堡的罗退尔（罗退尔二世，1125—1138 年在位）为皇。其竞争对手是康拉德。

教皇霍诺里乌斯二世宣布支持罗退尔。康拉德在意大利北部蒙扎城由米兰大主教加冕为王，又一次掀起反教皇的斗争（1128 年）。由于伦巴第区多数城市反对康拉德，他不得不返回德国。罗退尔一俟在德国站稳脚跟也即南下意大利，处理罗马和南部事务。

在罗马，霍诺里乌斯二世驾崩后（1130 年），大贵族弗朗吉帕内家族一派和新近发迹的、得到人民支持的、皈依了的犹太人皮耶尔莱昂内家族一派顿生冲突，教廷内新（主要是法国人）老分子互相撞击，两种冲突交织导致双重教皇选举，选出两个教皇：英诺森二世和阿纳克莱图斯二世。阿纳克莱图斯出身皮耶尔莱昂内家族，他在罗马旗开得胜，英诺森只好避难法国。特别由于圣贝尔纳（见第 34 节）从中游说，英诺森得到了天主教界的普遍承认。而意大利南方新君主罗杰二世却宣布赞成阿纳克莱图斯二世。

罗杰二世是罗杰一世之子，西西里之征服者，其父 1101 年去世后他继承该岛的统治。消灭诺曼人普利亚支系罗伯托（狡猾者）（接着

又消灭了另一支系安蒂奥基亚亲王）后，他把诺曼人在大陆上所有领土纳入西西里版图。对1127年实现的这种统一，教皇霍诺里乌斯二世极尽反对之能事，继续执行查理大帝时期延续下来的教皇政策，其目的旨在确立罗马教廷在南方的绝对优势和直接统治。为反对罗杰，霍诺里乌斯二世既采用政治武器——地方自治，又使用精神武器——绝罚。但这两种武器均未奏效，霍诺里乌斯二世只得顺应潮流，把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封与罗杰；这样做也意味着重申教皇对南方的最高主权。霍诺里乌斯二世去世，教廷分裂，罗杰二世宣布支持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并以西西里王位相许（1130年9月）。西西里王国的建立侵害了帝国夸耀的对意大利南部所拥有的权力，破坏了罗马教廷的政策。这就促使罗退尔二世既为教皇利益又为帝国传统与罗杰二世开战。

罗退尔二世第一次南下（1132年），兵力尚嫌不足，所获亦有限，甚至在罗马也无力夺取由皮耶尔莱昂内家族占据的利奥城和圣安杰洛古堡。但英诺森二世被请回拉特兰宫，在宫中加冕罗退尔二世为皇（因无法进入圣彼得教堂）（1133年6月）。此外，教皇还赐予罗退尔二世一部分马蒂尔德女伯爵的自由地（封地早已落入帝国之手，无人反对）。鉴于这次加冕，教廷大肆鼓吹神圣罗马帝国已成为教皇的陪臣。然后罗退尔二世放弃进攻罗杰，返回德国。罗杰二世乘机征服了南方的叛臣和叛城，迫使卡普亚和那不勒斯承认其最高统治权，从而完成了统一大业。英诺森二世只好重新逃离罗马，躲入支持他的比萨城。当时热那亚因与罗杰二世争夺阿马尔菲也支持英诺森。

1136年，罗退尔二世在征服施瓦本后率领大军第二次南征意大利。制伏伦巴第区的几起抵抗，然后进入意大利南方。那里的诸侯重新反叛罗杰二世。同时比萨人从海上攻入阿马尔菲，进行大肆抢劫和破坏（1137年）。但是，皇帝在普利亚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德国军队不适应南方气候，对这场只有利于教皇的战争心怀不满，不愿继续征战，使得教皇和罗退尔二世之间又出现政治分歧。罗退尔二世退回阿尔卑斯山北边，不久与世长辞（1137年12月）。

罗退尔二世生前已指定巴伐利亚公爵亨利（骄傲者）为继任人。

亨利是韦尔夫家族族长，萨克森、托斯卡纳、斯波莱托以及马蒂尔德的财产早已分封与他。但在选举中，施瓦本的康拉德取胜（康拉德三世，1138—1152年在位）。这样，康拉德三世和亨利之间大动干戈。最后形成了两派：韦尔夫派和施瓦本派，后称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从施瓦本的威伯林根城堡衍生而来）。由于教皇国与施瓦本家族的冲突，这两个名词专指教皇的拥护者和皇帝的支持者。

康拉德三世先是内战缠身，后又投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远离意大利，意北部城市国家因之得以自由发展，南部西西里王国得以最后建立。在教皇竞争中取胜的英诺森二世，在与罗杰二世的军事斗争中却连遭大败，并被俘。1139年7月27日签订《米尼亚诺条约》，教皇把西西里王国作为教廷陪臣分封与罗杰二世。贝内文托乃属教皇。

南方王国终于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这个王国里的有着不同宗教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拉丁教、希腊教）的种族（罗马人、希腊人、伦巴第人、萨拉森人、诺曼人）相互影响、相互同化。这种多民族的状况有利于国王行使最高裁判权。罗杰二世不取消各族和各地的风俗习惯，但王权高于一切。他建立一个公职团（法官等）作为其职员，而不是作为陪臣，直属于国王。他们管理王家财产，行使国王权利，执行最高司法，而封建主或城市行政长官只享有低级司法权。大案仍由国王判决。西西里王国因建立了这套国家官僚机构而走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前头，只有诺曼人的英国除外。王家这套官僚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穆斯林是有贡献的，因而从未受到诺曼王的迫害。如前所述，过早建立君主国家（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阻碍了南方城市国家的发展。

在穆斯林的统治下，西西里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工业、农业、商业十分发达，人口不断增长。在诺曼王的统治下，这种发展持续不衰。罗杰二世的宫廷豪华排场；国王为重大的艺术活动推波助澜，使基督教前的、拜占庭的、阿拉伯的艺术风格与一些罗马风格互相融合，互相调和。一些杰出的纪念性建筑物把巴勒莫装饰一新，如王室小教堂和马尔托拉纳教堂，两者都用辉煌的镶嵌工艺加以装饰（在马尔托拉

纳教堂镶有为罗杰二世加冕的基督）。

强大的南方王国的建立自然导致它向巴尔干半岛和非洲扩张。在巴尔干半岛，西西里王国与拜占庭帝国对峙交锋。早在1081年，罗伯托（狡猾者）就围攻过意大利通往巴尔干半岛的要塞都拉斯，其目标是占领伊庇鲁斯和阿尔巴尼亚。亚列克塞一世·康尼努斯皇帝全力反击，他还得到威尼斯的大力支持——给威尼斯不少特权和酬报（见第37节）——因为威尼斯决不允许这个强国与它同时控制奥特朗托海峡两岸。罗伯托被希腊-威尼斯舰队击败，但陆上在法尔萨利亚却大胜拜占庭军队（1081年），攻陷都拉斯（1082年）。因亨利四世南征（见第33节），罗伯托必须收兵返回意大利，战役中断。当时，1147年，罗杰二世恢复扩张政策，舰队司令克里斯托杜洛占领科孚岛，劫掠希腊海岸，攻陷科林托，破坏第比斯丝厂，把许多工人带到西西里，使这一工业在西西里落脚生根。为反对罗杰，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康尼纳斯向威尼斯贿以新的特权以换取援助，于是成功地收复科孚岛，击败诺曼人舰队（1149年）。然而，与西方皇帝康拉德三世的联盟却毫无成果，康拉德一心想远征意大利，讨伐西西里王，却总是纸上谈兵，未付之实施。罗杰二世先下手为强，挑动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起来反对曼纽尔一世，联合法国路易七世和巴伐利亚的韦尔夫家族反对康拉德三世。

胜利巩固后，罗杰二世率领军队直指非洲穆斯林人，占领了从的黎波里（1146年征服）到邦角一带的非洲海岸。早在1091年马耳他已成罗杰一世的猎获物。

40　罗马城市国家

这时期罗马也建成城市国家。早在叙爵斗争之时，罗马人民已在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夹缝中挺身而出，确立了自己的权利。所说的罗马人民，不单是大贵族，还有与大贵族并肩而立并与之作对的小贵族及有产者（大部分是工匠，小部分是商人）。在其他城市国家里，这些阶级接替了主教的政权；罗马亦然，至少部分取代了教皇的权力。

教皇英诺森二世统治末期，教皇禁止摧毁蒂沃利，罗马人因此举旗起义。罗马城市国家起初的特点与北部城市国家一样，企图征服市郊及邻近一些小城市。这次暴乱的结果，是在坎皮多利奥议会中成立了人民政府（1143 年）；领导政府的委员会名为“神圣元老院”，一个介于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名字。教皇卢修斯二世企图攻占坎皮多利奥，未成；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1145 年 2 月）。圣贝尔纳出面调解，无效；其继承人尤金尼厄斯三世只得从维泰尔博迁往法国。

罗马城市国家最大的困难是既要直接与皇帝打交道，又要与教皇正面周旋，因两者都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万国教会的领袖也是罗马主教，城市国家运动很容易触动俗教两权间的微妙问题。现在，出现一种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倾向，即剥夺教士的地产和俗权。这一倾向的主要捍卫者是布雷西亚的神甫阿纳尔多。他在法国曾师事于被教会谴责的勇敢的思想家彼得·阿伯拉尔多门下。阿纳尔多宣扬教士应恢复简朴贫困的生活，应放弃任何地产，专心从事于精神世界的使命。他先从诞生城市流亡法国，又遭教会谴责和圣贝尔纳的反对，被逐出法国，转而投奔罗马。1147 年成为罗马新人民政府的精神领袖，从而坚定了他渴望已久的复兴古罗马共和国的意志。尽管尤金尼厄斯三世宣言反对他，但他在罗马的地位不可动摇，影响极广。

41　红胡子腓特烈重振帝国

鉴于皇帝罗退尔二世未能在意大利有效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其继承人康拉德三世根本没有在意大利露过面，半岛上的自治进程就有可能沿着两条路线继续前进，得到巩固：一条是北方的城市国家，一条是南方的统一王国。各城市国家，其情况也千差万别：一些较强的城市，出于安全原因、土地需要和控制主要贸易通道的愿望，不仅将其统治扩大到郊区，而且还向邻近中小城市延伸。如米兰征服了洛迪和科莫——前者是波河的重要入口，后者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重要通道。同时，克雷马和托尔托纳结盟与克雷莫纳、帕维亚为敌。帕维亚因被剥夺了首府地位而与米兰不共戴天。这样开始形成了各种城市国家敌

对集团。大致可以说，每个城市趋于与邻城为敌，与邻城的邻城结盟。

在伦巴第地区，由于封建主已被迫屈服于大城市国家，封建主义已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皮埃蒙特和威尼托两地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皮埃蒙特确有一些相当繁荣的城市国家，如阿斯蒂，但大封建领主仍占优势，主要有蒙费拉托侯爵，其次是萨沃依伯爵和萨卢佐侯爵等。在威尼托，与维罗纳、帕维亚这样重要城市国家并存的还有一个大封建领主政权，即其驻地在奇维达莱的阿奎莱亚牧首政权，担任牧首的一般是德国人，他坚定地支持帝国，保证帝国军队在意大利东部边界通行无阻。一般来说，威尼斯尚未参与大陆事务，除非为了捍卫其贸易特权。在托斯卡纳和斯波莱托公国，封建主义和帝国管辖权仍很巩固，因这两个地区内的马蒂尔德财产已成为帝国的一个特殊基地。

一个皇帝，只要抱定恢复鄂图王朝和撒利克王朝统治意大利传统的宏愿，他就不愁找不到后备力量和支持的基础。这位皇帝就是施瓦本的或霍恩施陶芬的腓特烈（1152—1190 年），又名“红胡子”。他是亨利（骄傲者）姐姐之子，又是康拉德三世之侄，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这种家族关系有助于他在两个势不两立的王朝间发挥调解人的作用。骄傲者亨利之子狮子亨利重新得到帝国的谅解，特别在德国北部获得首要地位。他的一位叔叔韦尔夫六世分封到托斯卡纳、斯波莱托和马蒂尔德的财产。红胡子腓特烈给予其竞争家族以极大的甜头。自己因此而巩固了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直接统治。他娶勃艮第伯爵贝娅特丽克丝为后，这样在德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巩固基地；又因他起用本地王室官员（部长）为辅佐，对这片土地尽可高枕无忧。腓特烈善于对大小俗教封建主行使王权；他充分利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承认他在德国的权力，积极参与主教的任命，在他统治下德国教会具有明显的民族性质，在国王和罗马教皇间，它更听命于自己的国王。

腓特烈一世加强其在德国的权力，旨在实现其帝国王义理想，这种理想部分是继承了从查理大帝（腓特烈谕旨敌对教皇帕斯加尔三世谥他为圣徒）开始的各代皇帝的遗志；部分是取之于复兴的罗马法。

根据罗马法，皇帝为万国之至尊、绝对权力的代表，罗马人民曾假设性地永远委托皇帝代表其全部权力。所以红胡子自认为世界之主，欧洲各地的君王都应由他来分封权力。他有效地维护了对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和丹麦的最高主权，也企图凌驾于被他叫做行省王的法王和英王之上，要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的最高权力，当然这种权力并非真正的司法管辖权。

首先应在意大利实现这一帝国计划，主要从三个方面下手：其一，对已习惯于自己行使王权或君权（选举行政长官、征收专利税及其他税收、行使和平和战争的权利，等等）的北部城市国家，必须设法迫其屈服；其二，对在南方建立了独立于帝国的王国的诺曼人，必须清除其篡权行为；其三，必须对教皇国实施皇权，这不仅涉及教会行政，也涉及依附教廷的意大利中部，首先是帝国所在地罗马。

但是，红胡子一开始却与教廷结盟，根据缔结的协议，教皇保证加冕他为皇帝，并协助他清除其反对派；红胡子允诺支持教皇声讨城市国家罗马及西西里王国。反对西西里王国正是双方利益的吻合点，因为教皇对那位如此非常迫近罗马的君王恨之入骨，正是他使教皇对南方怀有的领土野心落空。

1154 年 10 月，腓特烈一世第一次南下意大利，随身只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帕维亚他被加冕为王。在皮亚琴察附近的龙卡利亚营地，他召开帝国会议。会上，封建主要求制裁城市国家，小城市国家要求制裁大城市国家，特别是米兰。皇帝宣布，未经皇帝允许的一切封地变迁均为无效，收回自亨利四世和五世以来被篡夺的一切皇权。这两项决定击中了伦巴第各城市国家的要害，但目前还是一纸空文，因腓特烈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只能侵扰米兰郊区，攻占阿斯蒂和基埃里并把这两城归还蒙费拉托侯爵，摧毁托尔托纳。为了皇冠，他还移兵罗马。在维泰尔博会见教皇阿德里安四世（1154—1159 年在位，英国人，是至今登上宗座的唯一英国人），双方签订协议，一致反对阿尔纳多和罗马城市国家。阿尔纳多被俘，遭处决，同时腓特烈拒绝罗马奉献皇冠，并用粗暴的语言拒绝罗马城代表古罗马讲话的要求。1155

年 6 月，腓特烈在圣彼得教堂由教皇加冕；但他只占领了罗马的利奥城，而且很快同教皇一起撤离罗马。他欲进军南方，但一向认定无益而阻止这次远征的德国诸侯拒绝随其南下，他只好作罢，放弃这一行动。北上之前，腓特烈进攻不愿进贡、不愿提供粮草的斯波莱托，将之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抵达意大利北方后，腓特烈公布对米兰的判决令，宣布取消米兰拥有的一切君权（即制币权，将制币所迁往克雷莫纳），并逐出帝国：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剥夺米兰的一切法律地位，禁止其他城市与米兰交往，米兰直接受其支配。不过，由于米兰的强大，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纸空文。1155 年 9 月腓特烈返回德国。

腓特烈南下意大利的当年，西西里王国罗杰二世之子威廉一世（1154—1166 年在位，绰号“坏蛋”）继位。更确切地说，由于他手下权力炙手可热的部长马约内·迪巴里舰队司令残酷镇压了普利亚的贵族暴乱，因此人们对他怀恨在心，将“坏蛋”这一侮辱性称号加诸国王。酿成这次暴乱恰值腓特烈南下之时。卡普亚亲王罗伯托也是暴乱的参与者。他们不仅求助于德国皇帝和教皇，还求助于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康尼纳斯。这正中曼纽尔一世下怀，他计划乘机收复意大利南方，拜占庭军队登陆普利亚，煽动暴乱，占领巴里、特拉尼和布林迪西（1155 年），直插中亚得里亚海的安科纳。由于红胡子南征未成，两帝国部队没有会师。腓特烈回德前与拜占庭使者就联姻计划开始谈判，但毫无结果。威廉一世乘机率大军从西西里赶到普里亚，火速扑灭暴乱，收复布林迪西；拜占庭人在海上又被诺曼舰队击败，康尼纳斯被迫缔结和约（1158 年）。在此之前，教皇已与西西里王重归于好，签订了《贝内文托条约》（1156 年 6 月）。教皇同意把包括卡普亚和那不勒斯在内的整个王国分封与西西里王，这实际上承认西西里王拥有凌驾于西西里岛各教会之上的教廷特使权力，即副教皇的权力（又称西西里君主国）。但是罗杰二世征服的非洲属地却丧失殆尽。

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单独与西西里王缔结协议，从此与皇帝不和。造成两强冲突的原因还有其他，特别是腓特烈在德国的宗教政策。

1158 年 6 月，腓特烈率领大军第二次南下，这次，他得到意大利

大封建主和那些与米兰及其盟友不和的伦巴第地区城市国家的不断支援，如帕维亚、科莫、洛迪和克雷莫纳。这样，皇帝轻易地征服布雷西亚，重建洛迪，制伏米兰（9 月）。米兰被迫呈请皇帝批准其任命的执政官，并放弃对洛迪和科莫的最高主权。

腓特烈召开第二次龙卡利亚帝国会议（1158 年 11 月），着手彻底解决各城市、各诸侯与帝国的关系。他求教于波洛尼亚罗马法教师，伊尔内里乌斯的学生布尔加罗、马丁诺、戈西亚、雅各布和乌戈，以便确定哪些是君权，即在管理城市和领地上哪些权力属于国王，哪些属于皇帝。根据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帝国的权力是不受时效约束的。不论城市还是个人，如果没有皇帝封的真正爵位，就是行使君权，即使是古老的权利，都是无效的。任命执政官、行使司法、制造货币、收取通行税、安置公爵、侯爵和伯爵封地等均应上奏帝国。同时决定修改所有封建权利，确定一个真正的爵位所拥有的权利，禁止私下开战、禁止缔结城市同盟和建立贵族集团。这一切帝国会议没有人提出异议。米兰大主教最热烈拥护皇帝的绝对权力。

决定一经做出，腓特烈立即开始付诸实施，派出自己的执政官（或称特使、民政官），管理伦巴第各城。米兰根据先前缔结的协定要求有权任命执政官，驱逐皇家官员；其他城市如法炮制，抵制皇帝。腓特烈诉诸武力，先围攻米兰的忠实盟友克雷马城（1159 年 7 月—1160 年 1 月）。克雷马城顽强抵抗，后被迫投降。为绳之以皇法，红胡子采用了他喜爱的方法，将该城夷为平地。

42　反帝联盟　莱尼亚诺战役

帝国与伦巴第城市国家开始决战时，帝国与教皇国的关系也发生了破裂。腓特烈旨在巩固其在意大利北部的权力这一事实，本身就应引起教廷的深思；而现在皇帝公然在教会领地上直接采取行动：行使君权反对主教，要求在意大利主教的选举问题上行使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所规定的权利，确立在教廷领地和罗马城内的权力（根据查理大帝和鄂图皇帝的传统）。阿德里安四世对此愤然抗议，断然向西西里王

和伦巴第各城靠拢。教皇去世时（1159 年 9 月），冲突已迫在眉睫。教皇故去后，进行了双重选举：大部分红衣主教选举教廷派领袖红衣主教罗兰多·班迪内利，称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 年在位）；其他人宣布红衣主教奥塔维亚诺（属图斯库卢姆的孔蒂家族，施陶芬家族的亲戚）为教皇，称维克托四世。腓特烈以皇权名义召开帕维亚大公会议，要求大会解决这一问题。亚历山大三世宣布大公会议无此职权。大公会议承认维克托，德国和意大利北部一部分城市支持他。伦巴第反帝城市国家，西西里王、法国和英国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三世处腓特烈以绝罚，解除其臣民对皇帝的效忠誓约（但无结果）。皇帝命令其部队攻占教会领土，迫使亚历山大三世逃往热那亚，后辗转逃到法国（1162 年 1 月）。

皇家军队（有诺瓦拉、科莫、洛迪和克雷莫纳参加）和米兰（布雷西亚城支持）的战争在伦巴第仍在继续。在 1160 年 8 月的两场战斗中皇家军队惨败，米兰立即着手重建克雷马城。第二年，腓特烈纠集意大利许多城市和诸侯的众多兵力，在大量德国援军的支持下，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与米兰人展开了一场野战，将米兰城团团围住。米兰在饥饿和无援的情况下于 1162 年 3 月 1 日无条件投降。腓特烈命令摧毁米兰城，由科莫、诺瓦拉、帕维亚和克雷莫纳四城执行。米兰居民分散到四个郊区。至此，伦巴第地区已无任何抵抗，龙卡利亚议会通过的法律得以全面实施。各城均由皇家最高行政长官管理；一些忠于皇帝的城市，如克雷莫纳等，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执政官。皇家最高行政长官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不久各城民怨沸腾。

现在皇帝的目标是战胜教皇，征服南方。战胜教皇甚为困难，腓特烈不能考虑用武力迫使整个天主教界接受敌对教皇维克托四世以及他的继承者帕斯加尔三世（1164 年）和加利克斯特三世（1168 年）。这时在德国正在形成一个支持亚历山大的派别；亚历山大三世也于 1165 年 11 月与罗马城言归于好，返回罗马。

至于西西里王国，腓特烈一世于 1163 年夏末第三次南下意大利远征南方。热那亚和比萨本应支援他。但这两城正为撒丁岛大动干戈，

战火扩展到了托斯卡纳。卢卡与热那亚结盟反对比萨，佛罗伦萨倾向比萨。皇帝非但没有得到两城的援助，相反处境甚为尴尬。后来皇帝染病，且势单力薄，只好推迟远征计划。腓特烈失去征讨南方的有利时机。其时威廉一世正面临一场深重危机，他却忙于对付米兰无暇他顾。威廉一世的大臣马约内被一贵族所杀，全岛为之狂欢（1160 年 11 月）。谋杀者博内洛在巴勒莫谋叛，抓获国王，宣布威廉一世的幼子罗杰为王。但人民不支持谋叛者，教士也站在国王一边，保王党取胜，救出国王。在动乱中罗杰被杀（1161 年 3 月）。威廉平息了西西里和大陆上的暴乱；失败了的贵族纷纷逃往腓特烈皇帝处。几年后，威廉一世的儿子威廉二世（好人）在其母亲的监护下继位（1166—1189 年）。一段时间后，王国形势渐趋平静。

皇帝在意大利北方的统治不再那么巩固。1164 年 4 月，维罗纳边境省（后称特雷维索边境省）的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索各城结盟（称维罗纳同盟），得到威尼斯的支持，因威尼斯与皇家大封建主阿奎莱亚牧首结怨。更南一点，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康尼纳斯仍住于安科纳。

1166 年末，腓特烈再一次南下意大利。他于洛迪城召开会议，会上伦巴第各城提出一些徒劳的抗议；随后腓特烈进入艾米利亚，加强统治，围困安科纳。这时，伦巴第各城暴动又起，为首的正是亲皇派克雷莫纳城。该城与布雷西亚、贝尔加莫、曼图瓦结盟（1167 年初），米兰也参与其事，达成协议。这一协议是伦巴第联盟最初的核心，后在贝尔加莫和莱科间的蓬蒂达修道院内修订完善（1167 年 4 月 7 日）。联盟第一件事是重建米兰。征服安科纳后，腓特烈认为急需干预罗马和意大利南方事务。他占领利奥城，在圣彼得教堂由帕斯加尔三世第二次加冕（8 月 1 日）。腓特烈还与罗马城市国家达成协议；他就职元老院，任命城市行政长官来代表皇帝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亚历山大三世避难于贝内文托。时正值瘟疫流行，皇家军队十损其一，征剿南方的打算落空。同时，皇帝几乎被所有伦巴第城市所抛弃。蓬蒂达联盟与维罗纳联盟合并，组成伦巴第联盟（1167 年 12 月 1 日），有效期

二十年。参加联盟的有：威尼斯、特雷维索、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曼图瓦、克雷莫纳、贝尔加莫、布雷西亚、米兰、洛迪、皮亚琴察、帕尔马、莫德纳、波洛尼亚和费拉拉。签约各城有义务共同防御各种侵略，特别反对那些企图向他们提出比从亨利五世到腓特烈帝国初期更高要求的人。腓特烈转道蒙费拉托和萨沃依伯爵领地，到达苏萨。1168 年 3 月苏萨城暴动，腓特烈兵败，乔装一番后经蒙切尼西奥山口北逃。腓特烈深居德国达六年之久，照料其在那儿的切身利益。

其间，伦巴第联盟力量大增，加之教皇、西西里王和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直梦想东西方两个教会、两个帝国的联合）联盟的大力支持。亲帝城市诺瓦拉和科莫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参加联盟，入盟的还有一些封建主，如伦巴第的皮安特拉泰伯爵和卢尼贾纳的马拉斯皮纳侯爵。此时，米兰已从废墟上崛起，由于人口膨胀，新建的城墙也扩大了范围。与联盟对抗的只有蒙费拉托侯爵和帕维亚。为对付他们，联盟于 1168 年在塔纳罗河和博埃米达河的汇合处建一新城，叫亚历山德里亚城，城名缘于教皇之名，而帕维亚人以“茅草”城讥之，因建筑匆忙，许多房顶盖以稻草。这样帕维亚和蒙费拉托也不得不入盟。然而，威尼斯因厌恶联盟成员之一曼纽尔皇帝而退出联盟。安科纳落入曼纽尔之手，使威尼斯寝食难安，此外，曼纽尔还扎根达尔马提亚。当红胡子派其总理大臣马贡扎大主教克里斯蒂安率军前来意大利围攻安科纳时（1173 年），威尼斯派舰队参与其事。安科纳英勇抵抗，后由罗马涅援军解围。威尼斯并不执意靠拢腓特烈；相反它与西西里和解，反对曼纽尔皇帝，迫他签订和约。

1174 年秋，腓特烈再次南下意大利，路经支持他的萨沃依伯爵领地。科莫、皮安特拉泰、帕维亚和蒙费拉托相继归顺于他，意大利中部已被克里斯蒂安的军队掌握，老公爵圭尔夫（见第 41 节）也把他的封地让与皇帝。罗马仍敌视教皇，将其拒之于城外。腓特烈焚烧苏萨城，征服阿斯蒂，围困亚历山德里亚。围困持续到 1175 年复活节前一周，被围者才突围成功，联军开到托尔托纳，腓特烈不得不解除围困。但是，联盟领袖并非摆开决战阵势，与皇帝缔结蒙泰公洛停战协

定完事（1175年4月），把争端交给一个仲裁委员会去解决，同时双方遣散部队。

有教皇参加的谈判破裂。伦巴第各城可以迅速重新集结部队；腓特烈的主要兵力却必须从德国开来。狮子亨利本可于附近的巴伐利亚驰援他，却袖手旁观。不过德国其他大贵族迅速赶来。腓特烈与援军会合于科莫湖畔，联合科莫人一起沿着提契诺河南下，向帕维亚和蒙费拉托靠拢。这次，米兰人在少数盟军的支持下封锁了提契诺河和奥洛纳河间的山口，1176年5月29日战斗在莱尼亚诺爆发。在德国骑兵的冲击下，盟军一直退却到牛拉主祭车附近。守卫主祭车的精锐部队，又称敢死队，突然投入战斗，其他盟军及时赶到，帝国军队因兵力不足而全线溃败。代表新欧洲的伦巴第城市国家终于战胜了封建帝国的旧世界。

43　联盟解体　西西里王国臣服施瓦本家族

联盟没有乘胜追击，一是不完全信任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内部还不一致；更主要的，是精神状态欠佳（前一年已有所表示）。他们主要意向是取守势，不背叛帝国权力，甚至希望取得皇帝的谅解和认可：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意大利人民政治自治发展不彻底的主要因素。这样，腓特烈才能赖在意大利不走。为分裂联盟，腓特烈与教皇谈判。在阿纳尼签署预备性条款（1176年10—11月），承认亚历山大三世，同意交回罗马教会在英诺森二世时期所拥有的君权（即领土权和司法权）以及当时的马蒂尔德的财产，不向罗马派驻帝国的行政长官，放弃对罗马的实际统治。

《阿纳尼协定》标志着联盟破裂的开始：克雷莫纳和托尔托纳单独与皇帝媾和。联盟和西西里王一起在威尼斯与教皇商谈和约（1177年7、8月），结果只达成停战；于是教皇中止对联盟的支持，与皇帝达成协议，在圣马可广场的拱廊下向皇帝颁布免罚令并把马蒂尔德的财产让与皇帝十五年。返回罗马后，亚历山大三世又和罗马媾和，承认罗马元老院，条件是元老院臣服他，归还圣彼得教堂和其他教廷权

力。1179年3月在拉特兰召开大公会议（十一届世界圣公会），解决教皇选举问题，规定当选教皇应获红衣主教团三分之二的选票（这一规定至今仍有效）。皇帝对教皇任命的确认权终于被废除。

与联盟的和谈没有很快结束。其间，腓特烈在德国加强了实力，搞垮了狮子亨利并把他逐出帝国。伦巴第联盟遭到孤立，内部更不团结。联盟一手建造起的亚历山德里亚城无条件臣服皇帝；为讨好皇帝改名为切萨雷亚，假设只是在这个时候城市方经皇帝的特许正式建成。

1183年6月25日皇帝与伦巴第各城在科斯坦扎缔结和约，皇帝恩准联盟存在，赐予联盟各城在城内和部分郊区拥有君权，同意各城自选执政官。但执政官必须由皇帝授职。皇帝保留上诉一级的司法权，由其在意代表行使；皇帝驾临意大利时，一切御用开支均由各城负担。每十年各城应重新宣誓效忠皇帝。这是腓特烈要求集权统治和各城要求完全自治间的一次妥协。不久，城市自治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但各城市国家从未达到（也不想达到）完全独立于帝国的地位。

《科斯坦扎和约》后，红胡子在意大利的地位明显加强。在伦巴第，他尊重他所承认的各城自治权，但又善于插手各城间的争端，善于维护友谊和皇权。他与米兰建立了特别友好关系；在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下意大利时（1184—1186年），与米兰缔结了同盟条约。腓特烈与米兰一起反对克雷莫纳，牺牲克雷莫纳来促进重建克雷马；同时他也赐予米兰一些城堡。在皮埃蒙特、托斯卡纳和罗马涅，红胡子派驻其代理人和官员，企图通过一种帝国官僚机构来维护其最高权力。

但是，腓特烈在其最后一段时期获得的最大成就是与西西里国王达成的协议，给其家族带来王国的继承权。促成这一协议的，也许是威廉二世与东方帝国之间的重开战事。1182年，君士坦丁堡人民在他们的居民区内大肆屠杀拉丁族人，作为报复，三年后，威廉二世的部队攻陷塞萨洛尼基，杀得血流成河。威尼斯较倾向于君士坦丁堡，以便遏制西西里王国的海上力量。这样诺曼王国与德意志帝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把王朝唯一合法后裔、罗杰二世的遗腹女、三十岁的康斯坦

斯许配给皇帝十八岁的长子（1184 年）。

施瓦本家族以这种方式完全弥补了其在意大利北部所遭受的损失；整个王朝是个人取得的。伦巴第各城市国家本应对皇帝在意大利获得这一新的强大基地深表关注，但它们丝毫不予重视。相反，几届教皇均忧心忡忡，害怕有被两面夹击之危险，因而取敌对态度。腓特烈依然在米兰为亨利和康斯坦斯举办婚事；亨利还在米兰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称切萨雷，于是意大利并入帝国（1186 年 1 月）。除克雷莫纳外，意大利各城均派代表参加婚礼，因此克雷莫纳被逐出帝国，一些土地被皇帝割据，最后不得不屈服。这时，皇帝与教皇乌尔班三世再度断交。亨利与罗马城市国家结盟，侵入教皇国。教皇与罗马城市国家断交多年，远处罗马之外。1187 年耶路撒冷被土耳其塞尔柱突厥人攻陷。教皇克雷芒三世愿与皇帝和解，但要求腓特烈率兵东征。于是就有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红胡子死于西里西亚（1190 年 6 月）。克力门三世又和罗马城市国家言和（1188 年），这样罗马城市国家和教皇的关系相同于伦巴第各城市国家和皇帝的关系。

1189 年 11 月威廉二世亡故，一地方实力派反对亨利继承王位，要求诺曼王朝非婚生子莱切伯爵坦克雷迪即位。于是坦克雷迪被选为西西里国王，并得到克力门三世的承认。1190 年末亨利六世（1190—1197 年在位）南下意大利，力求与意大利北部许多城市国家及大诸侯结盟，其中与热那亚和比萨结盟特别重要，因其舰队是亨利六世南征的宝贵支援。罗马人因亨利准其摧毁图斯库卢姆城而迫使教皇切莱斯廷三世为亨利六世加冕（1191 年）。加冕后亨利旋即进军王国，包围那不勒斯。这时瘟疫突起，迫使他从那不勒斯撤退。在德国，圭尔夫派在英国的支持下（出于亲戚关系）重操干戈，很有可能夺得优势。但是英王理查（狮心王）从圣地归来落入皇帝之手，亨利六世强迫他按自己的条件签订和约，因此圭尔夫派屈服。于是亨利再次南下意大利。其时坦克雷迪已于 1194 年 2 月去世，其子尚未成年（威廉三世）。这次亨利征服了王国并施行铁腕统治。威廉三世被俘，遣送德国。1194 年 12 月 25 日亨利六世在巴勒莫加冕为皇。

施瓦本家族早已控制了帝国，在意大利中部、北部确立了帝国的地位；现在一下子又成了南方的直接统治者，夺得了意大利境内的一个军事大国，也是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大国。看来征服全意大利已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目标，而且为期不远。为达此目的，必须加强意大利中部的力量，它是通往西西里王国和通往意大利北部及德国的要冲。于是亨利六世着手在意大利中部巩固和发展父王设立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帝国官员都求助于帝国派驻某些地区的最高代表，如：拉文纳公爵、安科纳侯爵马昆德·迪安魏勒尔；亨利之弟、托斯卡纳侯爵施瓦本的菲利普；斯波莱托侯爵康拉德。为更好地巩固在本家族中的权力，亨利六世本想宣布自己继承德国王位，但为避免诸侯的谋叛作乱，同意选王子腓特烈·罗杰为王。亨利六世的帝国王义政策也转向东方。1196 年他再次南下意大利，借口为十字军东征做准备，目标却是大举讨伐希腊帝国。西西里民族党谋反，惨遭镇压。不久，亨利六世于 1197 年 9 月 28 日猝死于墨西拿，享年三十二岁。当时，他之死消除了德国帝国欲推迟甚至阻止年轻意大利民族政治发展的危险。

第八章　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　贵族与平民

44　英诺森三世

亨利六世的过早去世中止了帝国从巴尔干到西西里的统一大业，动摇了其基础。在德国，施瓦本派无视小腓特烈的当选，另选他的叔父施瓦本的菲利普。归尔甫派用狮子亨利之子布伦瑞克的鄂图来对抗菲利普。这场争端还具有国际性质：英国理查一世支持鄂图（理查是鄂图的叔叔），而理查的敌人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赞成菲利普。

据当时一位编年史家兼诗人说，在意大利，所有的人和教皇一样，都对这位专制君主的死拍手称快。米兰和布雷西亚、曼图瓦、维罗纳、特雷维索、诺瓦拉、维尔切利的联盟于1198年续约三十年。在托斯卡纳，亨利六世死后，以佛罗伦萨为首的各城（仍亲帝的比萨除外）结成广泛联盟，规定未经共同协议不得服从任何一个皇帝、国王、公爵或侯爵。施瓦本的菲利普历尽艰险始能逃出托斯卡纳。在斯波莱托公国、安科纳边境省和罗马涅地区，亨利六世安插的德国官员也被统统赶走，各城纷纷要求自治。新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充分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英诺森原名塞尼的罗退尔（孔蒂家族），当选教皇时年仅三十八岁。他特别重视教会法规的原则和神权理论，力求在任期内尽可能确立教廷对主教和各地宗教机构的权力。英诺森三

世认为，教皇是基督在尘世的代表，是彼得的接班人，彼得又是主把他留在尘世管理教会和世界的，因而教皇握有两把宝剑，一把是他直接使用的精神宝剑，一把是他委托君王使用的世俗宝剑。在君王违反神律的情况下，教皇有最高控制和指挥权。君权源于人类，其尊严来自教皇的权威，犹如月亮因太阳而发亮一样。帝国的权力和教士的权力都融合于宗座的最高权力中：正是教皇国把帝国从希腊人手中夺回并赐予德国的。

英诺森三世深信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地区性基地以便行使其全球性权力。他力求在意大利中部，首先在罗马建立一个有效的、广大的教皇统治区。在罗马，他力促该城总督（先前是皇帝的代表）和元老院宣誓效忠，任命一元老院议员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时而替代集体的元老院。在拉齐奥以外的斯波莱托公国、安科纳边境省和罗马涅区大搞收复活动（用他的说法），加强教皇权力，他不仅提出教皇的古老权力，还引用亨利六世的遗嘱（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作为法律证书。但是，同意驱逐德国人的那些城市，只部分承认他的统治。在托斯卡纳，他更难实现按马蒂尔德遗嘱提出的要求；托斯卡纳联盟只接受教皇的一种含糊其词的庇护，即呼吁民族意识和意大利利益，用他的话说："教皇必须更多地考虑国家而不是其他。"在西西里王国，受到太后康斯坦斯支持的民族党也起来反对德国人。康斯坦斯承认教皇的封建统治，替其子腓特烈放弃帝国，缔结政教协定，放弃诺曼王行使的广泛权利（见第 41 节）。康斯坦斯不久寿终（1198 年），腓特烈（1194 年生于杰西）即位，由英诺森摄政。摄政期内英诺森三世竭尽庇护之职，仍无法平息内外显贵的反对和混乱的争斗。两滨海共和国（比萨和热那亚）也从中插手，火上浇油，因为它们在西西里有着极大的贸易利益（它是去东方的中途站），且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马昆德是德国人承认的腓特烈的监护人，他放弃意大利中部赶来王国。英诺森三世则支持一位法国封建主坦克雷迪国王之女婿布里安伯爵加尔蒂埃以对抗之。坦克雷迪国王使教皇派在普利亚取得优势；但马昆德在比萨的支援下不仅征服了西西里的大部分领土，还虏获了国王。马昆德

死后（1202 年），西西里形势更加混乱；最后王国总管大臣巴勒莫大主教乱中取胜。在大陆上德国伯爵迪波尔多·达切拉仍握有实力，布里安伯爵兴兵讨伐未果，却战死疆场（1205 年）。在英诺森三世摄政的最后几年内，王国形势出现了一定的稳定。

英诺森三世自认为有权监督德意志国王，即帝国皇帝的选择，干预德国的双重选举，希图改善教皇国的地位。他宣布反对菲利普，支持鄂图。后来鉴于菲利普实力超过鄂图，英诺森不得不与他谈判。1208 年菲利普因私仇遭暗杀，鄂图四世才得到公认。无论在教会管理上，还是在对意大利俗权的要求上，鄂图给予教皇极大的让步。但是，一旦来意大利加冕为皇（1209 年）后，他便提出帝国对意大利中部，对圣彼得的财产，对西西里王国及其占领的大陆部分的一切权利。英诺森三世宣布对他处以绝罚（1210 年），解除臣民对他效忠的誓约，鼓动托斯卡纳联盟和伦巴第联盟反对鄂图，伙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支持腓特烈为德意志王的候选人。腓特烈答应教皇和西西里显贵绝不把德意志和西西里两个王位合并，之后前往德国，在马贡扎加冕（1212 年）。这时，鄂图从意大利返回德国，在中欧和西欧展开广泛的斗争。1214 年在利拉附近的布汶战斗中，他被法王击败，退缩于布伦瑞克的封地内，于 1218 年死去。1215 年腓特烈二世第二次加冕，事前他重申鄂图给教皇的特许，同时还承认教皇对科西嘉和撒丁拥有最高主权。

这一时期意大利北部分裂成两大派——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这两派已开始站住了脚跟，并与地方斗争中对立的城市集团结合在一起。归尔甫派以米兰为首，继续与克雷莫纳、帕维亚、蒙费拉托侯爵为敌。在维罗纳边境省和罗马涅地区敌对两派也斗争不断，参与其事的有埃切利诺二世和阿佐·德斯泰侯爵，前者是吉伯林的首领，后者为归尔甫的头子。1215 年在托斯卡纳的佛罗伦萨第一次出现这两派——甚至可能佛罗伦萨首先使用这两个名字，它们始于贵族间的私仇——，时值佛罗伦萨城市国家正把其权力扩展到大封建主身上，如卡森蒂诺家族。归尔甫派的鄂图与教皇做着较量，教皇极力支持吉伯林的腓特烈，

各派组合混乱，令人目不暇接：米兰忠于皇规，支持鄂图，帕维亚就站在腓特烈一边；在维罗纳边境省，阿佐支持腓特烈，埃切利诺拥护鄂图。鉴于米兰从中阻挠，腓特烈二世无法从热那亚途经伦巴第返回德国。面对拉特兰大公会议的恐吓和教皇的绝罚威胁，米兰也不改初衷。这一时期与米兰站在一起的还有：萨沃依伯爵、克雷马、皮亚琴察、洛迪、维尔切利、诺瓦拉、托尔托纳、科莫、亚历山德里亚；另一阵营有：阿斯蒂、帕维亚、克雷莫纳、帕尔马、雷焦、莫德纳。维罗纳和费拉拉的两派斗争已转入城内。埃切利诺与圣博尼法乔争斗于维罗纳城，而埃斯泰侯爵在费拉拉与萨林圭拉一决雌雄。

45　城市国家的发展

从亨利六世去世到腓特烈二世取得最后胜利的二十年，是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城市国家事实上摆脱帝国统治的决定性的二十年，也是城市国家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的极其重要的二十年。

在皮埃蒙特（这一名字首先出现于十三世纪上半叶，指波河、圣戈内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极狭小地带），封建主义势力强盛。最大的封建主要数蒙费拉托侯爵，他统治着波河和塔那罗河、博尔米达河上游之间的大片土地（其地盘与其他各类领地犬牙交错，这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与侯爵领地毗邻且常与其反目的大封建主是萨沃依伯爵，据说他属勃艮第世系，该世系于十一世纪初由奥斯塔和莫里内（位于伊泽尔山谷）之伯爵亨伯特一世（白手）算起。萨沃依伯爵之子奥多内与都灵女侯爵阿德莱德联姻（见第 29 节），从而在皮埃蒙特获得大片领地，后大部分领地丧失。红胡子时期，族长亨伯特三世（美男子）遭帝国放逐而死，亡故后其家族领地大减，处境艰难。其子托马索一世（1233 年卒）被腓特烈二世任命为帝国在皮埃蒙特的代理，家族的命运之光重放异彩。除这两大家族外，还有一批小封建主，如：萨卢佐侯爵、切瓦侯爵。1200 年左右城市国家运动也在皮埃蒙特迅速兴起，主要有：都灵、阿斯蒂和亚历山德里亚（该城直到十八世纪还被看做伦巴第区的城市）。阿斯蒂与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贸易

十分活跃。

托斯卡纳的城市国家正在发展之中；艾米利亚和马尔凯地区的一些较小地方，城市生活也十分繁荣。在艾米利亚首推波洛尼亚；在马尔凯地区是安科纳，十二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德里西称它为基督教世界大都市之一。在翁布里亚，佩鲁贾最强盛，它靠近托斯卡纳并与其关系极密；其次是阿西西、福利尼奥、斯波莱托、泰尔尼和托迪。在拉齐奥北部维泰尔博城正在崛起。

不应认为南方出现的城市国家萌芽会因诺曼王国的建立而立刻消失。半岛南部一些城市国家在封建诸侯的包围下仍很活跃。1208 年英诺森三世在圣杰曼努斯隐修院（卡西诺城）主持大会，教皇与这些城市国家商谈，要其支持腓特烈。这些城市业已任命其执政官，力求用自己的司法权代替封建主的司法权，并进行城市间的战争。在西西里，城市国家的自治权更大了。大城市国家有巴勒莫、墨西拿、卡塔尼亚、西拉库萨；还有一些小的城市国家，如尼科西亚、卡尔塔吉罗内、皮亚扎·阿尔梅里纳。

由于人口绝对值的增加，由于郊区贵族老爷和劳动人民因政治和经济原因大量涌入城内，整个意大利的城市在扩大，城墙在扩展。封建主义被不断地、广泛地清除：封建主屈服于城市国家，宣誓效忠，把住所迁进城内；不仅如此，家臣和奴隶在城市国家的促进下，在政治经济的推动下纷纷脱离封建主。家臣成了自由市民。服劳役的农奴和佃农变成用现金支付佃租的农户。

但是，封建主义在皮埃蒙特以外的地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仍遗留下不少封建的孤岛，尤其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区、托斯卡纳-罗马涅的亚平宁山区和卢尼贾纳山区。这时，在意大利，老的政治社会形式并非彻底消亡，新的也未完全取而代之；各种形式或并存或重叠。封建主不但干预各城市内部的争端，而且还干预城市间的斗争，俨然以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自居，执归尔甫和吉伯林两派的城市联盟之牛耳。尤其在一些小地方，封建主、主教、城市国家三权甚至融为一体。就是在封建主义已消亡的地方，不等于贵族已消失，也不等于各阶级

达到彻底平等。城市国家原意是市民团结。1200 年左右，这种市民团结正分裂为各种敌对集团。这时贵族阶级在加强，除了为建立城市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批城市贵族外，又新添了不管是强迫还是自愿迁入城内的郊区贵族以及贵族化了的有产者家族。城墙内、居民区内、设防的宫殿内，贵族集团蓬勃发展，渴望夺取城市的统治权。因经济发展而日益强大的富裕有产者加强自身的组织（商社），希望有自己的官员参加政府。由于技术经济分工更细，由于小手工业阶层或正如今天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出现，除了现有的行会外，又冒出另外一些行会，从而有大、中、小三种的区分。这时至少有三个阶级在相互争斗。不过，十三世纪初主要还是两个政治力量在对抗：贵族或骑士（城市国家军队中的骑兵）和平民或步兵；大有产者站在贵族一边反对小资产者也好，小资产者又被骑兵拉过去反对大有产者的代表步兵也好，都是在这个范畴内的。这些政治力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形成了国中之国：骑兵城市国家、步兵城市国家。

原来的城市国家采用各阶级和各派别集体领导方式，即比例代表制。内部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一方把另一方驱逐出城，使原来集体领导的城市国家危机四伏。人们企图用独一领导机构来替代集体领导以解决危机，即委托一个局外的、处于各派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城市国家采用之，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最高行政长官是由城市居民而不是由外来势力授职的。最初，最高行政长官不定期地同执政官交替行使权力，或与执政官同时执掌大权；后来干脆全部接替之。然而市民审议团还存在，由于行会代表参政，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审议团。起初，城市主教还不时被授予最高行政长官之职，这既是由于他斡旋各派得心应手，也是由于各方都自然而然地要他从中仲裁。后来常常从外面聘请最高行政长官，以便尽可能保证处事公道。该员一般是从贵族阶层中挑选，因贵族阶层中容易找到训练有素的乐于应聘的人物（由于贵族经济危机，获得这一职务对许多贵族来说等于获得一谋生的手段），又因为当时掌权的有产阶级分裂成不同派别，而贵族属于另一阶级，便受青睐。最初时而两个或几个最高行

政长官互为竞争，因为各派势力均任命各自的行政长官。

这一时期另一个长期斗争的敏感点是教士和城市国家的关系。产生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全部或几乎全部剥夺主教的伯爵权力，斗争结果总是主教俯首帖耳。就在剥夺爵位权力后，主教（还有其他教士团体，如教士会、隐修院等）仍留有对城内外封地和陪臣的权利。城市国家先前开展的肃清封建主义的活动现在也指向教士团体。但教士的免税权和设立特别法庭或教士法院的特权仍旧有效，它与封建主义不是没有关系，但有原则区别，不会像封建主义那样被消灭。城市国家绝不会反对豁免原则，但竭力缩小其范围，向教士征收特别税（即直接税），并设法在俗人的民事诉讼中以及较严重的刑事诉讼中要求教士尊重城市国家的司法权。俗教间层出不穷的并且习以为常的冲突盖起源于此，结果往往是主教，甚至教皇宣布对城市国家处以绝罚和褫夺圣职；城市国家一般与其断绝世俗往来，严重时把教士驱逐出城。

城市国家虽分裂成各种敌对派别和各种对立组织，但绝不放弃建立独一权威的理想，相反却在大力加强真正的权威意识，用立法加以表现。地方自治第一阶段仍采用城市兴起初期沿用的，内容有所增加的习惯法，但其范围和意义略有变化，因为取消了一些对特殊集团或在特殊情况下有效的规定（它因得到外部势力的承认或指示才具有普遍意义），代之以确立市民和官员至高无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心。城市国家章程的起点仅是一些要点或条款，包括执政官的宣誓程式。后逐渐补充进一些有关城市国家的结构、公共生活乃至民法规定。十三、十四世纪是立法全面展开时期。

凡有章程无法律规定的地方，罗马法就是众人的现行法或共同法，任何因人而异的法律差别均被取消。如果说上个世纪罗马法阻碍了城市国家的发展（因对帝国权力的理解太刻板），现在皇帝已承认城市国家的体制，罗马法的兴起反而有助于城市国家：坚定了制定共同法的思想，深化了罗马的体制和司法，使其服务于更为丰富、复杂的经济生活，而古老的伦巴第法、法兰克法或封建立法和习惯法均无济于事，不被搬用。

46 意大利的复杂性和意大利的统一性

城市国家一方面企图通过内部斗争建立城市机构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与附近的城市国家开战。各机构权力相当，又无一个真正有力的上级领导，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城市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原因前面已谈过（见第41节）。它们的政治经济生活越扩大，之间的敌对行动和不友好行为就越错综复杂，从而形成了各种对立的城市同盟和联盟。由于联盟的产生，人们在实际上和思想上感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原则、一种可以依靠的上级力量。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也内含这类斗争的性质：与帝国一致还是矛盾，哪一个社会成分或哪一个家族在城市生活中占优势。特别要指出的，相互对立的各大城市参与归尔甫派或吉伯林派，其结果自然导致各小城市随大城市结盟组合。对于中世纪两大组织——教会和帝国，意大利人民在城市国家繁荣时期采取了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深感兴趣，紧密联系，因感到这两大组织都与意大利息息相关，同时又生出无穷的矛盾。为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归尔甫和吉伯林两派的斗争远非一般城市间的地方斗争可比。归尔甫派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干涉意大利事务；吉伯林派却体现了俗间反对教会干预世俗事务。两派均未达到出色的结果，但由于这两种思潮，意大利历史和思想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具有普遍意义，意大利也就成为当时欧洲历史的思想中心。

这里需对城市国家时期意大利历史做一基本看法，它也适合于执政团制度和公国时期的意大利，尽管环境不同，但性质一样。意大利城市国家有意实现内部统一，并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提出完全自治、完全独立的问题。意大利各城市从未敢于、也未感到有必要向帝国重申自己完全的、绝对的独立，并以人民主权和民族独立来对抗帝国权势。如果与法国相比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十分明显。在法国，国王就是国家首脑，不言而喻就是“本国皇帝”，绝不隶属于尘世上的其他政权。由于各城市国家以及以后各公国均未达到

这一政治和民族觉悟的境界，帝国思想和罗马传统就起着主导作用。意大利历史早已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这一实际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作用。法国国王可以宣布自己是“本国皇帝”；在意大利就没有一个能同样行事的国王，更没有一个国王能与德意志国王和帝国皇帝平起平坐——不是从理论而言，而是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言。于是帝国代表他们行使统一原则，而在其他国家行使统一原则却是本民族的君主制和王朝。与帝国相对立的教皇国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愿祈求帝国权力，甚至被迫与其战斗的人把教皇国奉为他们的思想依托和支持。帝国和教皇国因其本身的普遍性以及与意大利生活的差异性，它们是无法尽到人们期待的那种职责的。事实上，意大利城市国家对这两股势力一会儿是祈求，一会儿是反叛，视情况而定，反反复复。既然要求这两股势力负担这一职责，它们也就这样做了，于是他人就不会再挺身而出行使这一职责。这要追溯到意大利团结的破裂和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自治的意大利王国那个时期，要追溯到六世纪到九世纪在意大利发生的那些特殊事件。从那时起半岛上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国家，而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战胜其他国家。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成了意大利的优势，奠定了意大利承担起欧洲使命的基础，但又阻碍了意大利国家的统一。瑞士和荷兰建国的邦联原则本可成为意大利走出死胡同的一条出路，这一原则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也已得到广泛的、反复的应用。到了城市国家时期，城市的多种多样，利益的错综复杂，同时又缺乏划定区界的自然条件，这一切均阻碍了邦联原则的发展，使意大利政治生活动荡不安。要完全分裂，意大利显得太统一；要统一或简单的步伐一致，它又显得太分散。

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民族已不复存在；民族的概念与国家概念不应混淆，更不应与统一国家的概念相混淆。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以及以后的执政团制度和公国所形成的政治核心并不像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那样互不相干。有人认为城市国家时期谈不上是一段意大利历史，意大利只有米兰史、佛罗伦萨史、比萨史等，这样就不需去弄清意大

利城市国家间的关系（尽管处于战争状态）和同时期法、英和法、德关系间的差别。但唯有这种比较方可看到意大利政治史是一现实，是不可否认的。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完全懂得它们属于一个民族。城市国家各有其内部政治生活，它们之间又相互斗争，但还存在着血缘、语言、文化、家庭生活、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统一性，又存在着联结各城市国家生活的紧密关系。

也不应夸大城市国家间战争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战争频繁不断，但并不那样激烈和残酷。这种战争有时常达数年，多为小规模的入侵，但一般是伤亡少俘虏多，况且俘虏很快被赎回。而城市内部斗争却要激烈得多，这应了一条有名的规律：近邻和熟人间要比远亲和陌生人间更容易相互憎恨。城市各派都据守在作为堡垒的石建大楼和塔楼内，这样的城市结构也避免了大量杀戮。斗争结果往往是：一派逃出或逐出城外，但受到邻近古堡和城市的接待，并很快得到宽恕，返回城内（至少在初期）。不管在城内还是城外，和平还是比战争来得容易和迅速。不和的后面就是和解，和解又酝酿新的不和，然后又和解。要求和解与和平总是在人们思想中占首先地位。就是在对手之间也谈不上深刻的思想分裂，更谈不上像今日各对立民族和对立阶级间的思想分裂。各城各派的争斗只是为了一些具体的、狭隘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由于思想和信仰矛盾这一精神顽症。热爱城市并非一种狂热行为，各派的公开主张亦非无误的教规。精神生活不局限于本派本城的狭小范围内；除政治活动外，还有经济活动、家庭生活、艺术和宗教。尽管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市民常进行内外争斗，但他们的感情和信仰还是相同的。宗教和祖国、骑士荣誉和家庭美德、艺术和诗歌，对这一切有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解。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在物质上几乎四分五裂，而精神上却完全团结一致。

47　十三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和文学

这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兴盛再次证明，连绵不断的战争并未引起多大的严重后果。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建筑业的繁荣；根据

文化和文明生活紧密相关这一时代特点，艺术（十二世纪上半叶还是罗马风格）必为其服务。不断兴建和修缮大教堂，大教堂不仅体现宗教生活，而且更体现市民生活。1190 年克雷莫纳大教堂揭幕，始于 1167 年的八角洗礼堂也在其旁建成。维罗纳大教堂于 1187 年完成，1200 年左右更辉煌的圣泽诺教堂拔地而起。圣多尼诺镇的主教堂——这个小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光辉的罗马风格艺术作品——始建于 1207 年。卢卡大教堂于 1200 年初重建，圣米凯莱教堂于 1143 年完成内部装修，十三世纪进行外部大理石贴面。十二世纪下半叶皮斯托亚用雕刻饰面装饰圣约翰·福尔奇维塔斯和圣巴托洛米奥两教堂。在安科纳，建于 1177 年的圣奇里亚科主教堂以其中央圆顶结构展现了拜占庭的风格。意大利南部继续流行普利亚建筑风格，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初建造了比通托和鲁沃两大教堂。在西西里，罗杰二世时期的政府建筑仍光耀后世；1185 年巴勒莫主教堂揭幕，1176 年蒙雷亚莱大教堂建成。

这时民间建筑也开始蓬勃发展。新建城墙的城门和城楼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如十二世纪下半叶米兰的“新门”和科莫的城楼。十二世纪末维罗纳建造了市政大楼，十三世纪前几十年米兰营造了法院大楼。

十二世纪下半叶到十三世纪初，罗马风格的雕刻在意大利已达鼎盛时期。这时的雕刻并非为雕刻而雕刻，也并非与世隔绝，它与俗教建筑联系紧密。如莫德纳大教堂、圣多尼诺镇大教堂、维罗纳的圣泽诺大教堂等的各种雕像装饰；米兰法院大楼正面的最高行政官奥尔德拉多骑马雕像。大教堂的雕刻常把自然景色、人类日常生活与福音书上的故事、使徒传说糅在一起，形成按岁月、按行业的系列作品。十二世纪上半叶主要的雕刻家有维利杰尔莫和尼科洛。1200 年左右，帕尔马人贝内代托·安泰拉米名噪一时，有早期意大利的米开朗琪罗之美名，他的作品深刻表现了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

十二世纪是拉丁文学空前繁荣的时期，作品不再是古老的烦琐重复形式，也不是为应时需要而粗制滥造，而是一种新的精神和道德生

活的恰当表现。在法国，拉丁文学遵循当时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法国文化倾向，大都是神学、哲学和注释作品。在意大利也产生了一些具有这类文学特性的作品。彼得罗·隆巴尔多（约1100—1160年）可以说从法律上对教义做了整理。他生于诺瓦雷塞，就学于波洛尼亚和法国的兰斯和巴黎，后任巴黎圣母院主教学校教授。在巴黎开始从事写作并升为主教。他的四本《判例书》是教义的系统阐述，还列举了从《圣经》和历任教皇口传教义中推演出的例证。他的雄辩克服了不少难点。这一作品更大程度上属于法国文化，而不属于意大利文化，它广泛流传，引起不少评论。与此完全相反并与意大利宗教生活紧密结合的是卡拉普利亚的西多会修士焦阿基诺·迪菲奥雷（1201或1202年卒）的作品，它是一种表现先知思想感情的强大流派。主要著作有：《旧约协和新说》、《新约启示录解释》、《四个福音派信徒》。焦阿基诺通过对两部圣约书的寓意性的注释，主张全面改革教会，使其完全超俗，并预示一个新的时代——圣灵时代——即将来临。焦阿基诺的作品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到十二世纪下半叶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影响了方济各会运动（见第49节）。十三世纪初，托马索·加洛·迪韦尔切利广泛传播伪丢尼修·阿雷奥帕古斯的神秘主义学说，并与法国圣维托雷学派的神秘主义相结合，为过渡到圣波拿文都拉学派和德国神秘主义学派做准备。英诺森三世所著的《冷漠的尘世》一书仍未超出共同的神修学，圣安东尼奥·达帕多瓦的布道纲要也未超出基于寓意的教士修辞学。法官阿尔贝塔诺·达布雷西亚（卒于1246年后）所著的《仁慈的诸神》已超脱神学文学，进入精神文学；他还著有用智德教育世人的《真诚的慰问》一书和《雄辩与沉默》。

意大利在其他方面，尤其在史学方面的文学作品较富有特色。从世界起源开始的编纂工作从未停辍，如戈弗雷多·迪维泰尔博（原籍德国，是红胡子和亨利六世同时代的人）的诗篇《先贤祠》：克雷莫纳主教西卡尔多的止于1212年的《历代志》；还有止于1217年的《新编历代志》。这些作品中有关近期的或当代的事件记载颇多，流传甚广。直接涉及当代题材的诗编有戈弗雷多的《腓特烈伟绩诗》（六

音步组诗），尤其是无名氏的《腓特烈一世伟绩》长诗，歌颂了1152—1160年所发生的史实；还有贝尔加莫的一位修士的作品，他是保皇派，通晓古体史诗，熟读维吉尔的叙事诗。这些作品格式严密，韵律和格律完满无缺。关于红胡子时期在伦巴第发生的事件，《史实颂》中有了生动的叙述，诗作者是洛迪的两位贵族奥托内·莫雷纳和阿切尔博·莫雷纳，由一位无名氏继续完成。但是，这时期的各城市国家里，盛行写作叙述城市国家史实的编年史篇所有编年史中最著名的是卡法罗（1100—1163年）所著的《热那亚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存放于热那亚档案馆，许多人还写了续编，成了一部真正的官方史书。在意大利南方，乌戈·法尔卡多写了《西西里王国传记》一书（1154—1169年）；一位与亨利六世有交往的教士彼得罗·德博利在他所著的《高尚的奥古斯都》长诗中，讴歌皇帝征服西西里王国的伟绩，诗中极尽赞美之能事，成为一篇修辞华丽的名著。萨勒诺的主教罗穆埃尔德二世以广泛和重要的史料写成的《编年史》，讲述了红胡子时代的史实和威廉二世（好人）的黄金时期（罗穆埃尔德为威廉加冕并代表威廉出席1177年威尼斯和会）。这些作品对史实兴趣强烈，对政治角色描述真实。作家在描写和赞扬本城和本城历史时，这种个人兴趣显得更为突出。例如十二世纪上半叶贝尔加莫的莫塞著的《贝尔加莫志》；1150年左右罗马编纂了一部有名的著作《罗马奇事》，书中描述罗马城的情节和讲述罗马的传说交错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无意于编写阿尔卑斯山北边和地中海对岸盛行的十字军编年史。

文学方面，较重要的要算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盛行于意大利的写作修辞学。佛罗伦萨人恩利科·迪塞蒂梅洛的挽歌《论命运的变易及哲学的慰藉》是伦理与古代文学传统（主要是博提乌斯）相结合的产物。

十三世纪上半叶——比其他拉丁语系国家稍晚一些，因为相比之下意大利的拉丁传统更有活力——在意大利出现了通俗文学。圣方济各·达西西的《天地万物赞美诗》（人们通常称之为《太阳赞美诗》）是最老的不朽作品之一，该作品是他对宗教十分虔诚的典型表现。同

时期，在腓特烈二世宫廷中出现了第一个模仿普罗旺斯诗歌的意大利诗派，即西西里诗派。

48　大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兴办大学以及中世纪知识界中重新燃起钻研古代哲学和科学的浓厚兴趣，成了十二世纪的中世纪文化革新的实质内容和特色。意大利在这两件大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学起源于大批求学于名教师的学生，不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多是俗人。起初，每个地方一般只有一个系或院，如巴黎的神学院、布洛尼亚的法学院、萨勒诺的医学院。这三个院与艺术系（包括自由七艺和哲学）联合组成总学院或称大学。学生自己组成社团，至少在初期学生还自己挑选教授和校长；但后来这些教授和校长享有一种特权，连学生的校外生活也加以管束。这些社团最初是私人性质的，但教会、国家、城市国家很快插手其中。尽管教会当局对大学横加控制，尽管从属于天主教教义的神学处于教学首位，但大学仍向文化世俗化迈出了一大步。大学不再是教士掌握的学校，而是世俗职业教师和学生联合的产物。除神学外，与古典传统重新联结起来的种种非宗教科学在大学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首推法学。布洛尼亚企图垄断法学教学，禁止教师到其他地方讲学。但莫德纳、帕多瓦、比萨、罗马、佩鲁贾相继开设法学院，随后扩大成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建于1224年，它与上述大学不同，源于王室，是腓特烈二世创办的（见第51节）。在意大利，法学院（与医学院一样）一直受到特殊的敬重。在布洛尼亚，继伊尔内里乌斯四位高徒（见第41节）之后，又派生出两个派别——保加利亚派和戈西奥派。十三世纪初，阿佐内（1230年卒）在布洛尼亚享有盛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没有阿佐（内）保驾，去法院也白搭。"佛罗伦萨人弗朗奇斯库斯·阿库索斯（1182—1260年）收集了所有有关法律的注解——依然是评论原著的主要形式——，编成《通俗注释》一书。

罗马法的对手——教会法典在意大利仍广为应用。当时编纂了一

些《格拉提安教令》的增补本，收集了历任教皇的教令。这种文本的官方编纂工作是英诺森三世和霍诺里乌斯三世指示进行的，到格列高利九世时已收集教皇教令达五本书之多（1234 年），并作为法律的最高准则送到布洛尼亚。《格拉提安教令》的评注和编纂工作同罗马法的评注和编纂工作一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萨勒诺医科学校编写了有关古典文献的手册、译文和评注，出版了外科学和药理学等著作。但萨勒诺并没有保住医学教学的垄断地位。在霍诺里乌斯三世时期，布洛尼亚就已办了一所欣欣向荣的医科学校。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崛起对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使中世纪的西方展现出一个独立于基督启示和神学的新思想世界。十三世纪头几十年，亚里士多德哲学遭到教会极力反对，可是很快两者又逐渐靠拢、言归于好。最终，亚里士多德哲学进入了共同的神学哲学思想范畴。但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当时文化和思想习俗中出现理性主义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是从拉丁译文中熟悉起来的，这些译又或是从阿拉伯语译文转译的，或是直接从希腊语译出的。从事转译工作的主要是一批在西班牙托莱多学习的医生，其中一位名叫杰拉多·迪克雷莫纳（1187 年卒）的意大利人最为积极。他不仅翻译了不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翻译了一些科学和医学文献，如：中世纪医学经典著作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最重要的天文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的阿拉伯-拉丁译文可能也出自他之手，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起因论》（起初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译解则非他莫属。

从希腊语直接翻译的工作大部分是在西西里进行的。十二世纪中叶，卡塔尼亚副主教恩利科·阿里斯蒂波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西里也从希腊语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比杰拉多·迪克雷莫纳的译文要早）以及欧几里得的作品。在曼弗雷德王朝时期，巴尔托洛梅奥·达墨西拿翻译了据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伟大的士气》。十二世纪中叶还有三位意大利学者从事希腊语翻译：一位是上

面已提到过的莫塞·迪贝尔加莫，一位是翻译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雅各布·迪韦内齐亚，另一位叫布尔贡迪奥·迪比萨，他翻译了两位希腊神甫（约翰·克里索斯托莫和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也翻译了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希腊医学经典著作。

49 宗教状况 异教 方济各会运动和托钵修会

世俗因素和理性主义在新文化中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脱离宗教，更谈不上仇视宗教，而只是使宗教在习俗上和等级制方面更具自主性。意大利历史上，没有一个世纪能胜过十二、十三世纪的宗教虔诚，但其宗教热与中世纪初期的大相径庭。与昔日一样仍坚信上帝；因为人们又有了生活的乐趣和行动的愉悦，就感到在日常的生活和活动中上帝更靠近了他们。人们像先前一样祈求上苍，不过是在更漂亮的教堂里举行更豪华的典礼。人们祈求和尊崇玛利亚和圣人，其热情不减当年。然而，与其把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圣人视作生灵万物的救世主，毋宁看成是日常生活和工作劳动的助手和伙伴，去教堂不是为了寻求超脱生活的方法，而是寻求继续生活、颂扬生活的力量，宗教信仰成了一种道德，一种实际生活。僧侣式的谦逊、苦修的美德固然可敬，俗人的谨慎、刚毅、公正亦令人引以为荣，它激发人们的善与美，是城市和社会生活的导师。

虽然人们仍把教士看做超自然力量的传递者，但对其态度愈益冷漠，批评日增。教士不再像先前那样扮演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当之无愧的解释者；而今精神生活因信仰和道德、宗教仪式和现实生活、社会和宗教融为一体而变得绚丽多彩。低级教士没有职权，文化程度低，备受占有大部分堂区教堂的世俗保护人的压迫，有时也受主教的剥削；他们满怀积怨，反教权运动在他们中间反响强烈。高级教士的精力又集中在复杂的、繁重的财产管理上，消耗于主教与教士会（其中个别教士侵吞教会财产，不过教士生活）、世俗教士与修会教士神职、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间的斗争中。他们很少从事本分的主教工作，就是在每日千篇一律的装腔作势的布道中也是一派胡言，咀嚼陈腐的中世

纪初期的精神和形式，宣扬神性超凡的僵化概念，鼓动人们用苦修方法超脱恶魔统治的世界。在他们的讲话里听不出上帝的父爱、耶稣基督的仁慈。新一代人所从事的信心十足的活动在这些布道中得不到相应的慰藉和满足。即便永远生气勃勃和永远有益的基督精神在其布道中还残剩着一点，终因教士的道德行为而常常显得软弱无力。红胡子的将军（见第42节）美因兹大主教克里斯蒂安携带的家眷虽属例外，但姘居之风并没根除。身穿俗衣、留长发的教士比比皆是，放高利贷，无恶不作；一些僧侣卷走教会团体的钱财逃出寺院寄居于宫廷。英诺森三世曾说过，民众的罪过来自神甫的罪过；他已从蒙泰卡西诺那样著名的寺院中嗅到散发出的恶臭。

当时的修会既无助于缩小教士和民众间的距离，也无助于消除相互敌视。这些修会也拥有无数地产，尽管寺院的地产远比世俗教士的地产收益少，大部分财产又徒有虚名，实际掌握在陪臣手中。这些地产虽是集体的，但仍引起不良的印象，还和俗人、私人、各城市发生不少利害冲突。新成立的修会，特别是西都修会（在意大利没有阿尔卑斯山北边普遍），其修士过着艰苦的生活，信仰弥坚，语言生动而诚恳；然而这些修士很快也世俗化了；再者，他们生活在乡村修道院内，深居简出，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很难与他们接触。即便是一个举止端庄、循规蹈矩、颇受敬重的修士，在民众眼里，他依旧是贵族，因而比起世俗教士来，民众对他们更疏远、更陌生。

十三世纪上半叶教士与城市国家间的争端已是司空见惯，从而加重了民众对教士的批评和冷漠。城市国家针对教士特权采取了司法、经济和军事措施，教士针锋相对，动辄以精神惩治，处以绝罚，禁止参加宗教活动相威胁。起初这种褫夺圣事、禁止宗教活动的做法尚能使信徒思想备受压抑，令社会生活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不过，当这一类的惩治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时，也就越不管用了，同时也引起人们更大的反抗。他们向当地教士施加压力，迫其不执行这类禁令；有时执政官和最高行政长官也采取报复措施，禁止市民与主教、神甫交往。当时，人们已从原则上谈论民权和教权的界限，教会中俗权和

神权的区分以及教会地产的道德后果和法律基础；抱怨君士坦丁给教皇西尔韦斯特的惠赐；对教士留恋尘世和俗行纷纷提出尖锐批评，社会上流传着不少讽刺罗马教廷的吝啬和贪婪的笑话。诸如：在罗马上帝不是三位一体，而是四位一体，“皇帝的东西应属于皇帝”，要基督向彼得付税，耶稣及其弟子的贫穷，等等传说。

所有这一切与刚刚出现的科学精神以及早期的文化世俗化不期而遇，正好说明异端运动何以屡屡奏效。针对教士摄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柄的仇视活动，早由阿纳尔多·达布雷西亚（见第40节）从原则和理论上做了阐述，并与认为圣事效果的大小取决于神甫的道德情操高下的一学派不谋而合（这一学派产生于叙爵之争时期，罗马教廷发布反对姘居的法令之后）。阿纳尔多被杀害后，阿纳尔多分子仍在四处活动。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类似阿纳尔多派的瓦尔多派，他们对《福音书》中崇尚的神贫、谦逊、传教的理想与当时教会现实的尖锐对立深表不满。他们取彼得罗·瓦尔代斯或瓦尔多作为派名，遂自成一派。瓦尔代斯本是里昂富商，酷爱《圣经》，常手不释卷，笃信福音的神贫乐道，决然把万贯财产施舍给穷人，同几个同伴一起仿效使徒，开始布道（1177年），苦修，受穷，诵读《圣经》。小集团自封为里昂贫民会。世上多有其追随者，以朋友相称。瓦尔多派无视不准布道的禁令，终被处绝罚（1184年）。他们的追随者为保留天主教徒之名纷纷悔过。运动波及意大利北部，出现伦巴第贫民会。他们与瓦尔多派不同，遵循更激进的学说：不承认由可卑的神甫进行宗教活动的有效性；单独成立宗教团体，从事自己的圣事活动；拒绝天主教仪式，拒不崇拜圣人和圣像，否认人的苦难，反对赦罪。

这种激进主义受清洁派的影响。清洁派起源于东方，渊源于公元三世纪末出现的一种伟大宗教——摩尼教。摩尼教严格信奉二元论，认为世界是两种对立的原则——光明和黑暗——作生死搏斗的舞台。摩尼教遭国家严厉镇压，但并没有消失殆尽，在亚洲又派生出了七世纪的保罗派和十一世纪的鲍格米勒派。后来拜占庭皇帝把这些人输送到巴尔干半岛，他们又在保加利亚广为宣传他们的思想。由于贸易交

往、十字军东征等，这种思想传入西方，产生清洁派。清洁派把世界上的生活看做是善与恶的斗争，为战胜邪恶需要极严格的苦修（斋戒、素食、禁欲）。这种苦修只有“纯全信徒”才能做到，而占绝大多数的一般信徒不受此束缚。成为“纯全信徒”要举行“摩难”仪式，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这是清洁派承认的唯一圣事。这是永久拯救自己的必要手段。有些人接受此仪式后自饿而死。一般信徒只是在临终前接受这一仪式。“纯全信徒”组成清洁派教会的各种品级：主教、司祭、副司祭等。清洁派不承认《旧约全书》、天主教圣事、圣人、圣像、寺院；也反对誓约、战争、死刑、俗权。这一运动动摇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础，又难镇压，因信徒仍属天主教教会。

清洁派在法国南部发展迅猛，十二世纪下半叶该派取名阿尔比派（因起源于阿尔比城）。十三世纪初，英诺森三世对其进行讨伐，空前野蛮地劫掠南部法国，特别是普罗旺斯。曾经是吟游诗人讴歌咏唱的贵族老爷的巍峨豪华宫殿被洗劫一空。意大利北部，通常是在城市国家地区，清洁派也有很大发展。十三世纪头几十年，教会文件中重弹反异教徒斗争的老调子。这场斗争中，罗马教廷得到帝国的支持：腓特烈·巴巴罗萨决定取缔异教徒，腓特烈二世批准实施死刑。城市国家当局起初并不十分积极，他们在感情上同情被迫害者，甚至抱有好感，精神上讨厌教士，反对教会的裁判权。但是，时间一长，他们改变初衷，也参与迫害。直到今天，在米兰法院正面墙上还能看到最高行政长官奥尔德拉多的颂词：“清洁派务必斩尽杀绝。”对异教徒一般用火刑，腓特烈二世和格列高利九世常用此刑执行死刑。

教会握有对异教徒诉讼和判决大权，只把判处死刑的人移交世俗当局执行，形式上遵守“教会厌恶流血”的教规。为便于镇压，教会成立一个特别机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的主旨是执行教会的裁判权。宗教裁判所始于十二世纪末，第四届拉特兰大公会（1215年）上制定了对异教徒起诉的许多规则，但直到法国图卢兹大公会才最后决定建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庭仅是主教们行使裁判权的机构；后来格列高利九世改为直属教皇的一个机构（1231 年），从此它几乎全

由托钵修会（见本节），尤其是多明我会独霸。这里也体现了教皇的集权。宗教裁判所的诉讼程度不同于常规的程序。有时不向被告公开证人的名字，不允许聘请律师，采用酷刑逼供（从1252年起）。表示悔过者可免一死，但往往处以终身监禁；顽固分子则没收其财产——最初只有一部分后是全部财产落入教会手中——并如前所述，由世俗当局施以火刑。

宗教裁判所的活动波及全社会：要求俗界积极参与，检举揭发，组织监视委员会，执行死刑。非宗教性的兄弟会，尤其是第三会（见本节）到处追捕异教徒。但俗界，特别是行政当局，对宗教裁判所的活动是有所反抗的。

反异教徒的斗争，在当时意大利的一些拉丁语文学著作中已有反映。例如：前清洁派主教博纳科尔索于1190年前后著书《异教徒生活》反对其教友。又如：两位伦巴第的多明我会修士也描述了对异教徒的诉讼，一位叫莫内塔·迪克雷莫纳（1235年卒），一位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拉涅罗·萨科尼（1259年卒）。

尽管全速开动镇压机器，到处腥风血雨，但十三世纪头几十年在意大利——意大利之外也一样——反对官方教会的运动仍如火如荼，迅猛异常。如果不是新创立的宗教精神组织（部分原因与出现不同思想运动的原因相类似）大大地缩短了教会与民众间的距离，如果不是使一些具有强有力的并在人民中有巨大影响的新生力量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人们也许要怀疑这场反异教徒的斗争是否真有成效。

方济各会产生于类似瓦尔多派初期的那种思想倾向。方济各·达西西（1181年或1182—1226年）生于富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内之家，青年时代过着无忧无虑的快快活活的幸福生活。后因目睹宗教发生深刻危机，便毅然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因袭耶稣基督，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到处流浪传教，过着清贫生活（1209年）。他传教的主题是：爱天主爱他人，抛弃敌意和仇恨，鄙视财富。传教取得巨大成功，追随者迅速增加。方济各会运动非常类似瓦尔多派，但对教会俯首帖耳十分顺从，从未有过反教会的念头。因而教会很容易地掌握了这一运动：

与其放任自流，对教会产生危险，不如支持之，为己所用。方济各给同伴（他谦逊地称之为小兄弟）规定一条极其简单的戒律：走符合福音教义之路。遂得到英诺森三世的赞许，虽表面上他对此很少过问。起初，方济各只打算建立一个自由自在的教团，无集体财产，不行圣事仪式，到处流浪传教。后出于形势所迫以及教廷，尤其是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多斯蒂亚的（后为格列高利九世）出色的工作（得到方济各会修士埃利亚的支持，此人大有政治家的气质，脑子里有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方济各虽持反对态度，还是将教团改组成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修会，其会规为霍诺里乌斯三世所批准（1223 年）。改组后方济各会修士不再云游四海，而是聚居在以总司祭为首的等级森严的修道院内；生活不再像方济各最初设想的靠劳动，而是靠化缘（因此得名托钵修会），靠别人的施舍。方济各卒于 1226 年 10 月 3 日晚，断气后身上很快出现“圣痕”，这更激起民众的崇敬。格列高利九世立即顺应民众的情绪，于 1228 年追谥他为圣人。在埃利亚修士的主持下，在他的陵墓上建起一座壮丽的教堂，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圣地之一，也是意大利新艺术的一个中心。

方济各会在其创始人在世时已开始向整个欧洲发展，他去世后还在继续加强。从一开始修会内部就形成两派：一派（灵修派）严格要求过清贫生活；另一派倾向于以更多的变通去适应世俗生活，要求修会从事所有教会活动，包括神学教学。焦阿基诺会（见第 47 节）与第一派观点一致，认为圣方济各是精神王国的先驱，其修会（还有多明我会）是这一王国的主要工具。直到 1260 年，盼望已久的精神王国终于出现。是年在意大利宗教界鞭笞苦行修士大行其时，他们成群结队，纪律严明，流浪四方。以后，期待上天启示，盼望“天使教皇”，渴望教会改革等心愿仍在激动人心。当时在意大利盛行的这种鞭笞苦行修士的活动具有世俗兄弟会的性质。

与方济各会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方济各女修会——圣克拉雷安贫会，由名门闺秀圣克拉雷创建。她是方济各同乡，受方济各影响，走上新的生活道路。最后，圣人在世时还成立另一个行教团体，收容在

俗教徒，称方济各第三会，该会在方济各会外围（参见清洁派信徒和瓦尔多派贫民会）有着较广泛的影响。

与方济各会同时，另有一个大托钵修会——多明我会，由西班牙一位隐修院修士圣多明我于1215年所创。其宗旨是反对阿尔比异端派及异教徒。该会在传教活动和神学研究均比方济各范围要广，开始仅在巴黎大学，很快就发展到各主要大学。两个修会都有自己的教授在讲授神学。多明我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场所——宗教裁判所。起初它们采用奥古斯丁会的规章（因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追溯到圣奥古斯丁）；1220年正是圣多明我本人模仿方济各会把该会改成托钵修会。

这些修会对民众生活影响极大。与先前的修会不同之处是，它们置身于世俗社会，其修道院一般设在城市内，在自己的教堂内行使教区教务（其教堂可与大教堂媲美，并推动了宗教建筑的发展）。这两个修会都直属罗马教廷，获得种种特权，可以说是教皇的特种部队。

另外，还有两个托钵修会，在意大利也颇为盛行，但其重要性次之：一是加尔默罗会，建于1247年，起源于前一个世纪巴勒斯坦加尔默山上的隐士：另一个是奥古斯丁隐修会（1256年），与奥古斯丁会吏会不同。

50　意大利在地中海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意大利文化尚未影响欧洲。法国的科学和文学在这一时期均处领先地位。然而，意大利经济向外发展已相当广泛、迅速。

首先，意大利农业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居首位。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起了有力的作用。耕作方法得到改善，到处兴建水利工程，大量开垦荒地（不仅是西多修会的功劳，而且也是世俗政府所创议的）。无数农民成了自由耕作者，反封建压迫的信心因之增强。这一切使农民更乐于耕作，劲头更足，收获益丰。这时，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农业已具有相当正规的耕作形式，精耕细作，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田园风貌。

这一时期，意大利成了欧洲贸易中心。欧洲贸易是通过地中海向东西、南北发展的。意大利地处地中海东西海域之间，起着欧洲中转的桥梁作用。意大利的舰队和商船队控制了地中海，取代曾经称霸一时的阿拉伯-穆斯林人的海上统治，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海盗行径。威尼斯应列榜首。它把布匹和香料从东方运到西方和北方。此外，还运来两种生活必需品：小麦和食盐。威尼斯从西西里、北非、黑海等地弄来小麦，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再出口。威尼斯甚至企图垄断波河平原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小麦，至少企图控制和压低小麦价格。这种做法遭到这些城市的反对，有时还大动干戈，兵刃相加。食盐，威尼斯首先取自自己的泻湖，同时还从伊斯特拉半岛、达尔马提亚、拉文纳附近的切尔维亚、西西里、的黎波里、俄国南部运来，而后供销意大利内陆和阿尔卑斯山北边。

从贸易利益出发，威尼斯共和国展开频繁的政治活动，签订各种协议，确保其贸易特权（如减免关税、建立仓库、保证安全等）。这一贸易政策主要针对拜占庭帝国。威尼斯在那里有不少直接管辖的领地（真正的殖民地），它类似近代欧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殖民地或在土耳其、埃及和中国的租界。对此希腊反应强烈：破坏、劫掠、甚至诉诸战争。但是，威尼斯往往能在那里恢复自己的事业。

意大利另外两个大滨海城市比萨和热那亚，到十一世纪末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十字军东征开始后，两城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活动不亚于威尼斯。这三个城市的舰队担负输运兵员，监视穆斯林舰队，确保海洋安全。为此，它们在东方基督教国家享有重大特权，而威尼斯除了在拜占庭帝国早已拥有的种种特权外，又大捞了一把。在基督教徒占领的叙利亚海岸城市，这三个共和国不仅取得了进行贸易、建立仓库和码头等特许权，而且还巧取了由自己法官管辖的整片整片土地。

在英诺森三世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在地中海的霸权及其向东方的扩张达到了全盛时期。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是埃及，因当时圣地掌握在埃及苏丹手中。征讨埃及需经海路。包括博

尼法乔·迪蒙费拉托侯爵在内的十字军首领要求威尼斯提供一支舰队，威尼斯则提出得到一笔巨款并共分战利品的要求。十字军无法筹集这笔商定的款子，于是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1192—1205年在位）表示威尼斯可以放弃这笔款项，但十字军应帮助再度征服扎拉。扎拉海盗十分猖獗，严重危害威尼斯的利益，而威尼斯要控制达尔马提亚海岸又必须掌握扎拉。英诺森三世曾企图劝说十字军放弃进攻一个基督教城市，但扎拉还是被围，被攻陷（1202年）。教皇对威尼斯处以绝罚。尽管如此，十字军又进一步决定性地转变矛头，指向拜占庭帝国，这是解决拜占庭帝国与十字军、东方人与拉丁人，甚至希腊与威尼斯之间传统矛盾的唯一办法。威尼斯执政官丹多洛正是十字军转攻拜占庭帝国的有力促成者。十字军舰队首先讨伐君士坦丁堡，扶植废黜了的皇帝艾萨克二世安基卢斯及其儿子亚列克塞为同朝皇帝（1203年）。这虽如愿以偿，但要拜占庭皇帝兑现诺言——其中包括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的统一——时，民众揭竿而起，杀死两位皇帝，拥戴誓死反拉丁派的代表亚列克塞五世为皇（1204年1月）。拉丁人又围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城被攻克。希腊人遭到残酷屠杀，城市遭肆意掠夺。威尼斯人趁火打劫，夺得了著名的镀金青铜四马双轮战车，此物仍耸立于圣马可广场的正面。十字军本要拥立丹多洛为帝，但他执意不受。于是，弗兰德的鲍德温被拥为新的拉丁皇帝。帝国各行省被十字军首领瓜分一光，成为封建属地。蒙费拉托的博尼法乔分得萨罗尼克王国。分给威尼斯一片相当于整个帝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威尼斯没有全部占有这些土地，但不久又夺得另外一些土地。这样威尼斯的领地计有：都拉斯、爱奥尼亚海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些海防要塞、埃维亚岛、爱琴海上大部分岛屿、克里特岛、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科港口、色雷斯半岛的许多要塞以及君士坦丁堡八分之三的土地。其中部分领地名义上还算是威尼斯政府的属地，实持上已分封给贵族。不过，这些领地往往依旧实施宗主国的法律，保持宗主国的习俗，还与宗主国进行贸易。在君士坦丁堡代表威尼斯的是大使或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一类的职位），并由一个小议会和一个大议会

辅助之，其中法官处理民事、刑事案件，财政官负责财政，大法官主事调解税务纠纷。拉丁教会等级最高的牧首也是威尼斯人。但是，希腊教会拉丁化的企图因民众反抗而告失败，且两个教会之间，也可以说东方的希腊和西方的拉丁之间因之形成一道深渊。拉丁帝国本身又夹在独立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之间，处境维艰，腹背受制。萨罗尼克王国也于1222年被希腊征服而灭亡。

在克里特岛，土著抵抗威尼斯的统治达数年之久。占领者把没收的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赠拉丁教会，一份交国家，第三份再分成数百个小封地。岛上政府设一位公爵，辅以数名顾问、财政官和大法官，还有一位步兵统帅和一位骑兵军官。

这些广大的东方领地使威尼斯在黑海、俄罗斯、亚美尼亚的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在特拉布松，威尼斯建立一个重要殖民地。它又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发展同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瓦拉奇、塞尔维亚、匈牙利的贸易关系。十三世纪初，威尼斯还扩大同亚洲和非洲的穆斯林的贸易往来。1219年同伊奥尼亚苏丹缔结贸易协定，1229年又同阿勒颇苏丹签订贸易协定。在埃及，威尼斯取得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限制关税、建立特殊法庭等特权。当然，这些特权与它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基督教叙利亚所拥有的不可同日而语。1251年同突尼斯缔结条约，在突尼斯各城建立自己的租界。

在西地中海，热那亚和比萨仍处敌对状态。热那亚统治着科西嘉——这种统治是岛上无数诸侯之上的最高执政团——并不断与比萨争夺撒丁岛。撒丁岛的法官（见第36节）都是比萨的陪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有时还和热那亚联合。撒丁岛最早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分封给比萨的，从1165年到1175年两城为争夺撒丁岛爆发战争。皇帝出面缔结《帕维亚和约》，双方各占该岛一半。1187年战火又起，但因十字军东征迫在眉睫，教皇进行干预，促使双方于1188年重签和约。

热那亚在西地中海的活动南至非洲海岸，西达西班牙沿海，并与西班牙的基督教徒国王联合共同抗击穆斯林。从这些国王那里，热那

亚获得一些类似意大利滨海城市在东方获得的那种租借地，数量当然要少得多。这样，十二世纪上半叶热那亚占有阿尔梅里亚（分封给一热那亚贵族）和三分之一的托尔托萨（卖给巴塞罗那伯爵）。后来，卡泰罗尼亚海军崛起，成了热那亚海上劲敌。

51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于 1194 年 12 月出生于杰西（安科纳），年始十八岁，便第一次加冕为德意志王。他机智敏捷，思想开阔，受过严格教育，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比大部分同代人要广阔、自由得多。对伊斯兰世界，虽有些微怀疑和不信任，但能取宽容和开明的态度；在习俗方面，表现出更为随便，超越了中世纪在理论上能容忍的程度。在政治上却采取极权主义；与封建主的权益，城市国家的自由，自认为基督教社会最高领导的教会的特权和权力常发生冲突。

腓特烈生长于意大利，一生大部分时间居留在意大利。他把西西里王国作为他谋取意大利和帝国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他无暇过问德国事务，因而德国大部分贵族摆脱了国王权势，发展自身权力。腓特烈还做了各种明确的让步，助长了德国的封建割据。然而，在西西里，他极力实施他的政治理想，近似于法国革命前后的那种极权国家。与教皇发生第一次冲突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法度体制上。1231 年颁布梅尔菲宪法，其中收集一些诺曼法律，并塞进了极多的腓特烈法律条文，它系统地表达了腓特烈的政治思想。在这部宪法中，腓特烈祈求天赐的、无限的帝国权力，竭力给王国涂上一层集权的、官僚的色彩。封建主义减弱了，城市国家的发展制止了，影响消除了。意大利南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即落后）日益明显，其影响延续至今。教会也屈从于王室的司法和税法，几乎无权管理在俗教徒；教士除宗教事务外不能求助于罗马，不能以任何名义购置地产。王国的行政机关等级森严，深不可测：最高机构是由一个大执法官主持的最高法院；还有一个审计院，负责财政。各省行政和司法首脑是执法官；一部分财务和民政由王室行政长官负责。处理杂务的是地方长官。官

僚集权制首先服务于国家高度垄断的、严厉的税收制度；而国家的目标是发展军事：建立一个中央军事机构，发展陆军和海军。为推动和控制文化，根据腓特烈的计划，创建了那不勒斯大学（1224 年），并禁止臣民就学其他高等学校（萨勒诺大学除外，因办得较好）：与中世纪的文化普遍性以及前一个时期大学自发发展相比，这些均是文化民族化和国家化的一些新规定。腓特烈创建那不勒斯大学，梦想招引被他取缔的布洛尼亚大学师生；但命运不佳，十年后那不勒斯大学不得不改组。总的说来，在腓特烈统治下很难说王国文化比诺曼时期有所提高。然而，宫廷里汇集了意大利、希腊、犹太和伊斯兰教的学者，恢复了阿拉伯著作的翻译工作（见第 48 节）。腓特烈二世本人对科学有着极其广泛的兴趣。他的宫廷也是通俗诗歌的发源地（见第 47 节）；他也常与儿女们一起作诗。在艺术方面，腓特烈时期没有产生类似诺曼时期那样有价值的作品。但是，建筑甚为发达，从建筑学来看，也甚为重要，主要集中于王家城堡（最大的一座是普利亚的蒙泰城堡）；某些建筑把古建筑同西多会的哥特式（见第 63 节）融合一起，而其雕刻装饰却完全模仿古代艺术。

腓特烈二世曾允诺教皇把西西里和日耳曼两个王位分开，允诺进行一次东征。为使第一个诺言落空，腓特烈让其子亨利加冕为罗马王（1220 年）；至于东征，他一拖再拖。为实现在意大利，尤其在西西里王国的事业，他手头有更重要、更紧急的事要办：征服地方势力；剥夺一些大封建主的权益；驱逐在西西里有贸易、有领土特权的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征服萨拉森人，在普利亚的卢切拉建立军事驻防地（享有宗教自由和行政自主权）。腓特烈没有和英诺森三世的继承人霍诺里乌斯三世（1216—1227 年在位，名琴恰·萨维利，腓特烈的家庭教师）断交，这要归功于教皇相当平和的性格。1220 年，腓特烈由霍诺里乌斯加冕为帝国皇帝，教皇允许他保持西西里的统治，但要其履行东征诺言。腓特烈仍一再拖延，促使教皇采取较强烈的态度，威胁要处以绝罚。这样，腓特烈才于 1225 年答应两年后出征。

腓特烈二世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事务兴趣甚于东征。在罗马涅地

区，除教皇国外，腓特烈二世仍行使其管辖权，任命一位伯爵为该地区的首脑；在各城市的争端中，他竭力维护其最高权威。而与其对立的几届教皇却几次企图收回马蒂尔德家族在艾米里亚和伦巴第地区的土地，反对一些诸侯和城市。在维罗纳边境省区，埃泽利诺家族和圣博尼法乔家族的冲突仍在继续，并牵涉到维琴察和维罗纳两城。在皮埃蒙特，阿斯蒂在热那亚的支援下与亚历山德里亚开战（1225 年）。萨沃纳和阿尔班加两地企图摆脱热那亚，直接顺服皇帝及其代理人萨沃依的托马索，但仍被热那亚征服。佛罗伦萨征服了卡森蒂诺的贵族阿尔贝蒂伯爵和圭迪伯爵，并于 1222 年击败比萨。伦巴第各城市国家，害怕腓特烈二世，续订联盟（1226 年），以维护《康斯坦茨和约》。腓特烈二世实施报复，剥夺它们根据和约享有的特权，逐出帝国。经霍诺里乌斯三世的调解，和约按现状重新生效（1227 年）。

同年，霍诺里乌斯三世去世，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 年在位）继任，他的性格完全不同于前任。在教皇威胁性的规劝下，腓特烈二世终于从布林的西起航东征；不过，他旋即返航，因军中流行病蔓延。为此格列高利宣布（9 月 29 日）对其判处绝罚。教皇采取这一措施的另一个原因是腓特烈在西西里建立的教权政府。腓特烈通报各君主替自己辩护，并于 1228 年再次东征。在巴勒斯坦登陆后，他没有动用武力；通过外交途径与埃及苏丹签订十年停战协定，使耶路撒冷回归基督教徒，并在那里加冕为王（1229 年）。此时在意大利，格列高利乘机废除帝国和西西里王国臣民效忠腓特烈的誓约，教皇军队同时入侵那不勒斯地区。腓特烈赶回意大利，教皇军队狼狈逃窜。教皇在缺乏伦巴第各城市国家的足够支持，而德国各君主仍效忠皇帝的情况下，被迫在圣杰尔马诺缔结和约（1230 年 7 月 30 日），同意维持现状，撤销绝罚令。其时，埃米里亚两派城市之间争斗正酣：主要是归尔甫派的布洛尼亚与同帕尔马、克雷莫纳结盟的莫德纳之争。教皇和皇帝缔结和约后，这场冲突也得到调解。伦巴第联盟支持的亚历山德里亚和蒙泰费拉托侯爵支持的热那亚之间的斗争也得到仲裁。在维罗纳或称特雷维佐边境省，埃泽利诺三世继承引退过修道生活的父亲，

成为吉伯林派首领，与特雷维佐城联合反对帕多瓦，而帕多瓦得到阿佐·德斯泰和阿奎莱亚牧首的支持。

腓特烈二世摆脱教皇的牵扯后，致力于加强在意大利王国的权势，并在拉文纳召开帝国会议。联盟国家拒不参加，并封闭阿尔卑斯山各山口。会议于1231年至1232年召开，参加者甚少；于是各城市国家被取缔。腓特烈开始与埃泽利诺建立紧密联盟，埃泽利诺打着腓特烈的旗号夺取维罗纳。紧接着在特雷维佐边境省爆发吉伯林派和归尔甫派的全面战争。新托钵修会教士从中调解，虽然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就，但转瞬即逝。作为布道者和调解人的方济各会修士圣安东尼奥·达帕多瓦（1231年卒）在特雷维佐边境省享有盛名。1233年8月在维罗纳附近的帕夸拉地方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城市国家的代表、贵族、高级教士以及从威尼托、伦巴第、埃米里亚蜂拥而来的人民群众。会上，多明我会修士焦万尼·达维琴察极力斡旋，终于缔结了和约。但和平只持续了两个月。

为城市国家联盟与皇帝之争，教皇再次出面调解，格列高利九世裁决维持现状（1233年6月）。但是，城市国家仍取敌对态度，支持皇子亨利背叛父亲。这一举动未成。教皇支持皇帝，皇帝又帮助教皇反对罗马城。亨利1235年投降。平定这次暴乱后，腓特烈二世于1236年再次与伦巴第联盟开战。其盟友埃泽利诺成了维琴察和帕多瓦之主，力量大增。不过，在他占领的城市里贵族的抵抗和谋叛活动频繁不断，他采用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加以镇压。一个个人独裁的执政团政权产生了。1237年11月27日，与吉伯林派军队联合的德国军队在贝尔加莫地区的科尔泰努瓦重创联盟军队。联盟军的牛拉主祭战车为皇帝所俘，作为战利品送到罗马，保存在坎皮多利奥宫。这一举动是向教皇和所有君主宣告，公正的审判官上帝是尊重帝国的权益的。许多城市国家屈服了。第三年在维罗纳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大会，皇帝收到许多城市国家的致意，其中有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两城。但是胜利是表面的，并非真实的：米兰和其他城市仍在战斗。胜利后不久，腓特烈二世妄图包围布雷西亚城。因教皇不再进行调解，腓特烈重新与教皇国开战。

针对腓特烈节节胜利，格列高利九世担负起各城市国家保护人的角色。皇帝拒绝教皇干预，扬言要定都罗马。接着，腓特烈把撒丁王位授予其私生子恩佐（其时恩佐已与该岛部分土地的诸侯阿代拉西亚结婚），而教皇认为撒丁和科西嘉都是他至高无上权威的属地（见第44节），因此乘机再次与皇帝破裂。1239年圣枝主日，格列高利第二次宣布处腓特烈以绝罚，解除臣民对皇帝效忠誓约，褫夺所有皇帝行宫所在地的圣职活动。新的托钵修会成员以极大热情鼓吹反叛皇帝。教皇和皇帝的两个首席大臣展开一场宣传战，争取舆论。总的来说，舆论倾向腓特烈，不利教皇。

腓特烈二世企图直接用武力解决争端。他的部队经托斯卡纳（那里归尔甫派的佛罗伦萨、贝鲁贾正与吉伯林派的锡耶纳、阿雷佐开战）向罗马行动（1240年2月）。教皇得到人民支持，腓特烈被迫撤退。腓特烈也在加强自身的力量，某种程度上把西西里王国的集权组织形式扩大到意大利王国，建立由他的代表统治的区域制。这一企图昙花一现，因这仅是形式，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地方力量。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仍打得热火朝天：埃泽利诺在特雷维佐广施暴行；归尔甫分子在教皇特使的领导下夺取了费拉拉，阿佐·德斯泰因而取代了萨林奎拉；威尼斯人出于各种原因对腓特烈二世极为不满，正在攻打普利亚。于是，教皇召开大公会议，对争端进行判决。腓特烈禁止其属下的高级教士参加会议。一支西西里-比萨联合舰队击败护送高级教士去罗马的热那亚舰队（1241年5月），舰上的教士成了皇帝的阶下囚。1241年8月，格列高利九世故世，切莱斯蒂四世继任，在位仅半个月。教皇空缺达一年半之久。最后选出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他出身于热那亚吉伯林派的菲耶斯基家族。在位时把教皇政治发展到顶峰。腓特烈同他开始和谈，做出巨大的让步；由于教皇还想调解皇帝与伦巴第各城市国家的冲突，达成的协议破裂。在里昂举行的世界圣公会议上，英诺森四世对腓特烈做出终决（1245年7月17日）：宣布他是伪誓者、渎圣者、异端嫌疑犯、教会和帝国间和平的破坏者、作为西西里王应尽的封建义务的违犯者；废黜其一切显职；

禁止所有人顺服他；要求德国选民另选新王。至于西西里王位，教皇保留其决定权。腓特烈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做此判决；而英诺森四世极力维护这种权力，在致各国君主的信中，对教皇政治大加发挥，认为俗权必须服从神权。托钵修士受教皇之命到处鼓吹讨伐腓特烈以替代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这时在德国相继出现两个敌对国王；但这两位“神甫王”无法生根，支持者仅是一些神职人员。在意大利，虽有埃泽利诺支持皇帝，但归尔甫派仍非常强大，打败吉伯林派的帕尔马，取得重大胜利。于是，皇帝围困该城。其军队营房取名“胜利”，作为一座新城的创始，他欲摧毁老城帕尔马，由新城代替。帕尔马市民乘皇帝不在之际进行突围，击败围城军队，捣毁“胜利”军营（1248 年 2 月 18 日）。第二年，波洛尼亚人大获全胜，在福萨尔塔地方俘获恩佐王。从此恩佐一直被监禁，永无获释之日。腓特烈身边也出现变节行为和嫌疑犯：首席大臣皮耶尔·德莱维尼亚被捕并被处死（1249 年）。1250 年 12 月 13 日，腓特烈二世在卢卡附近的菲奥伦蒂诺城堡中道崩殂，其时他雄风犹存。腓特烈怀抱的征服整个意大利的意图远比任何一位前任要强烈、贯彻始终；他的死标志着这一美梦的彻底破灭。

52 施瓦本王朝的末代君王和昂儒王朝的建立

腓特烈二世在他的遗嘱中诏谕继续完成德意志和西西里两个王国的合并事业，其子康拉德执政（已于 1237 年被选为罗马王）。康拉德就位前，由皇帝的私生子塔兰托亲王曼弗雷德代理。英诺森四世返回意大利后，在归尔甫派的大力支持下，以上帝的名义把西西里王国收归己有，并派一名红衣主教赴西西里，授以全权。教皇还宣布废除腓特烈的一切法律，鼓动当地贵族和人民起来造反。曼弗雷德坚持抵抗，直到 1252 年。康拉德四世君临西西里王国，之后一切相当顺利。不久新皇死于巴西利卡塔区的拉维洛，享年仅二十六岁（1254 年）。有人臆测他是被曼弗雷德投毒致死。他之死，可以说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中断了德意志和西西里两王国的联系。他的儿子康拉丁年幼无知，从未

被拥为德意志王。在意大利南方仍然是教皇与曼弗雷德对峙局面。曼弗雷德聪明、刚强，是一个地道的意大利人。起初，他为康拉丁摄政，顺利地制伏了王国内的教皇党羽，这是因为新教皇亚历山大四世（1254—1261 年在位）的无能。后来，教皇对其处以绝罚。当时传说康拉丁已死，也是曼弗雷德所为。1258 年曼弗雷德加冕为王。出于斗争本身的需要，他依靠吉伯林派，极力扩大在意大利的影响。热那亚同他签订贸易协定；罗马城，在出身布洛尼亚家族的大法官、刚强的布兰卡莱奥内的领导下，制伏了贵族，并与曼弗雷德联盟；在托斯卡纳区，吉伯林派在锡耶纳地区的蒙塔贝尔蒂大获全胜，归尔甫派让出佛罗伦萨，由曼弗雷德的代表执政。在北部意大利，埃泽利诺·达罗马诺越益残暴，越益令人憎恨，结果使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结成同盟一致对他。埃泽利诺在阿达河畔的卡萨诺被同盟战败，受伤致死（1259 年）。他的死并不意味着吉伯林派的垮台，该派还有两位首领：奥贝托·佩拉维奇诺（克雷莫纳诸侯）和博索·迪多瓦拉（他们曾参加反埃泽利诺同盟），他们的上司正是曼弗雷德本人。曼弗雷德任命伦巴第、托斯卡纳、斯波莱托和马尔凯的代理，旨在建立一个与德国、帝国再无联系的意大利王国。他的执政团政体还扩大到东方，因伊皮鲁斯（君士坦丁堡落入拉丁人之手后建立的诸希腊小国之一）专制君主的女儿带来作为嫁妆的大片土地。他女儿康斯坦斯与阿拉贡的佩得罗的婚事又使其势力大增。

英诺森四世处心积虑要在欧洲一些宫廷中为西西里王国物色一个教皇候选人。几经失败后，终于与法王圣路易九世的兄弟昂儒查理建立了关系。昂儒查理靠婚姻成为普罗旺斯诸侯（该地名义上属于帝国），现法国人乌尔班四世教皇（1261—1264 年在位）重新把王位授予昂儒查理。后来，昂儒查理又把尼斯和皮埃蒙特的许多市镇收归己有，其势力自然扩大到意大利。最终他与乌尔班的继任人克力门四世（也是法国人，1265—1268 年在位）签订协定。查理允诺：王国为教会的封地，废除反教会自由（特权）的法令，把威廉（好人）的豁免权和特权让与臣民，既不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称王，也不充当德意志

王和帝国皇帝。后两条是预防措施，使霍恩施陶芬家族在教皇国的包围下无法恢复权力。查理抵达罗马，被胜利的归尔甫派拥为该城的大法官。他的军队经皮埃蒙特，入伦巴第，一路顺风到达罗马，沿途得到托雷家族（见第53节）、埃斯泰家族和其他归尔甫派的支持，而吉伯林首领抵抗甚微，据说吉伯林派内有人背叛。1266年1月6日，昂儒查理在圣彼得教堂加冕为西西里王，随后挥师意大利南方。2月26日在贝内文托与曼弗雷德相遇。曼弗雷德兵少将寡，王国的封建军队又脱离他的指挥，只有撒拉逊和德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无效。曼弗雷德大败，在绝望的搏斗中战死。

剩下的一个对手是施瓦本家族最年轻的康拉丁。康拉丁在吉伯林派的要求下南下意大利（1267年9月），他相信王国里很快就会出现对查理的不满情绪。康拉丁用吉伯林派的部队壮大自己的兵力，并向罗马开进。罗马居民起来反查理，赶走教皇，热烈欢迎康拉丁的驾临（1268年7月）。康拉丁的军队在阿布鲁齐的塔利亚科佐的战斗中，开始旗开得胜，但因掠夺战利品而兵力分散，终于被查理的后备队击败（8月23日）。康拉丁逃到罗马，其时罗马又为归尔甫派掌握，不得不又逃到安齐奥和泰拉奇纳之间的阿斯图，藏于吉伯林分子焦万尼·弗朗吉帕内家中。弗朗吉帕内把他交给查理。押解到那不勒斯后，康拉丁被昂儒人以叛逆罪判处死刑，于10月29日斩首。

施瓦本王朝最后时期，意大利在东部地中海的地位，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因威尼斯支持不力而倒台。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1204年后希腊的一个主要国家）在热那亚人的援助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重建希腊帝国（1261年）。他创立巴列奥略王朝，一直到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此外，巴列奥略并没有恢复帝国的所有领土，摩里亚（或称伯罗奔尼撒）和阿哈伊亚仍由法兰克君王统治；威尼斯还占有内格罗蓬泰、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但是，由于希腊帝国的重建，威尼斯同它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而失去了过去占有的有利形势。取而代之的是热那亚，它在君士坦丁堡拥有加拉提亚和贝拉两个营地，从而控制

了博斯普鲁斯。但是，没有多久威尼斯与巴列奥略言归于好，恢复了它在君士坦丁堡的营地和一部分特权。不过，威尼斯仍面临着与热那亚人的竞争。热那亚人已侵入黑海，在克里米亚建立了卡法和巴拉克拉瓦殖民地。热那亚人还和塞浦路斯王、埃及、非洲国家缔结贸易协定，建立货栈和营地。两个共和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海战，互有胜负。1270 年，热那亚和威尼斯及其盟友比萨间在克雷莫纳签订了五年停战协定，但没有解决它们间的根本冲突。



第九章　教皇国　昂儒王朝　执政团

53　执政团的起始

康拉丁倒台后，帝国处于“大空位”时期。德国举行了不少次相互对立的选举，但没有一个觊觎王位者能真正掌握实权。于是，意大利和帝国的政治关系中断了一段时间。由一人控制的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同西西里王国间现今的或者说潜在的联合彻底结束；北方王国和南方王国的联盟也无法实现，因为帝国和朝代不断更迭的西西里王国间处于或说得更确切些是回复到敌对状态，回复到亨利六世前的局面，而帝国本身也大不如前强大。新的昂儒王朝在意大利之外的政治和领土地位也无法与日耳曼王国以及帝国赋予施瓦本王朝的地位相比。这使意大利在地方独立自治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意大利南方王国与中部、北部在政治上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大致可以说，意大利各国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越错综复杂，这种联系就越加紧密。因此，西西里新王朝还是能够仿效曼弗雷德对吉伯林派的做法，领导意大利王国中的一派——归尔甫派——以图霸业。归尔甫派过去一直由教皇或通过其特使直接统率，现在又多了一位政治上有直接影响的首领，一个意大利国家的世俗君主与教皇一争高低。这样归尔甫派内部形成了两雄对立。罗马教廷一直

反对吉伯林派的统一，现在又要谨防由别人来完成意大利-归尔甫派统一的危险。此外，归尔甫派现今在一个特殊君主的掌握下，丧失了那种联合全国、反抗外国（日耳曼帝国）的民族本色，突出了内部的派系斗争。为此，教皇一旦支持归尔甫派（有时教皇也竭力站在两派之上），教廷就陷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不能自拔。

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不断进行内外斗争，给西西里新国王和教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干预。而这些斗争又使更多的城市国家屈从于一个大的城市国家，因此也促进了各城市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形成执政团政权。掌握执政团的常常是封建贵族。

伦巴第首推米兰强盛。其领土东起贝尔加莫，西至维切利，北起科莫，南至洛迪。米兰虽不是意大利第一个城市国家，也是首批之一，现在建立执政团政权又名列前茅。大约 1240 年，在伦巴第拥有大量封建财产的帕加诺·德拉托雷成了米兰民众派（由两个联合会组成：大有产者的“莫塔”联合会和圣安布罗焦工匠团）领袖，起来对抗城郊封建主所支持的贵族。其侄子马蒂诺继承后，仍取这一立场。腓特烈二世死后，外部压力减少，内部斗争加剧。为缓和斗争，1253—1256 年曼弗雷德的拥护者和亲戚曼弗雷多·兰恰·丁奇萨侯爵曾尝试过短期的执政团制度。但贵族与民众的斗争又同埃泽利诺家族（米兰贵族支持他）和反埃泽利诺家族之争交织在一起。战胜埃泽利诺家族后，马蒂诺·德拉托雷让反埃泽利诺联盟领袖之一的奥贝托·佩拉维奇诺任军政首脑（1259 年），为期五年；他本人仍掌握着民众派的领导权。1263 年其兄弟菲利波继承，宣布为终身民众领袖。他的手还伸到伦巴第的其他城市，并与昂儒查理结盟。1265 年，菲利波的一个亲戚，终身元老纳波莱奥内继承民众派领袖之职。

托雷家族成为伦巴第归尔甫派领袖后，吉伯林派的斯卡拉家族在特雷维佐边境省取代埃泽利诺，起来抗衡。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通过行会组织在维罗纳独占鳌头，出任“民众最高行政长官”。1261 年，最强大的行会——商会任命他为该行会的最高行政长官：也许是在 1262 年，他又任民众统帅。这样，外地人所任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城市

国家其他组织形同虚设，成为民众派的附属品。维罗纳这个民众-执政团制城市国家，在受到逃亡在外的归尔甫分子的威胁后，更靠向吉伯林派，拥护康拉丁。

这一段时间，热那亚的民众-执政团制度也有所发展。1257 年吉伯林派民众和贵族拥立古列尔莫·博卡内拉为民众统帅。1262 年贵族推翻了他，重立外地人为最高行政长官。但贵族又互相争夺，不断分裂。归尔甫派的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西家族与吉伯林派的多里亚和斯皮诺拉对抗。1270 年多里亚和斯皮诺拉取胜。之后，国家设立由贵族和吉伯林派出任的两个民众统帅和一个民众行政长官（又称“民众长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才使国家安定了下来。

在意大利中部最大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民众也以它的特殊组织形式站住了脚，并在政府中取得了优势，但没有采用执政团制度。腓特烈二世死后，佛罗伦萨的归尔甫派得到大商人或称“肥人”以及对大人物（大部分是吉伯林派分子）的极权极为仇视的“瘦人”的支持，战胜吉伯林派并把他们逐出佛罗伦萨。而后，佛罗伦萨实行所谓“民众第一”的新的民主制度（1250 年）。这一制度的基础是民军。民军共分二十队，其司令为民众统帅（外地人）。他高举城市国家旗帜，代表民众，反对大贵族，必要时也反对最高行政长官。他们甚至把贵族的钟楼五十庹以上全部砍掉。除民军组织外，还有十二元老，他们在城市政府中代表民意，在议会中提出法律建议。同时，他们也设法使大贵族在议会中处于少数。

蒙塔佩蒂战役后，吉伯林派返回佛罗伦萨，废除“民众第一”制度；但仍保留行会组织。贝内文托战役后，吉伯林派撤离佛罗伦萨城，民众已无法重掌政权。出兵的昂儒查理出任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六年。他任命其部队司令做代理。除国家机构（最高行政长官、议会和代替元老的十二“能人”）外，还有归尔甫派组织替代民众组织，对国家机构进行监督。归尔甫派组织的主要机构是“归尔甫派群众统帅部”，专门没收被判刑的吉伯林分子的财产。在这期间，昂儒查理还迫使普拉托、皮斯托亚、卢卡、沃尔泰拉等城与佛罗伦萨结成归尔

甫派联盟。

54 昂儒查理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样，昂儒查理为继续推行曼弗雷德的霸权政策，手中已握有几张王牌。教皇利用帝国空位，僭取在意大利的皇权，封查理为皇帝代理人（1268 年）。意大利北部，吉伯林派的头子博索·迪多瓦拉和佩拉维奇诺已丧失一切权力，归尔甫派重又得势。1269 年，佩拉维奇诺去世。同年，查理在克雷莫纳召开伦巴第城市国家会议，组成归尔甫派联盟，纳波莱奥内·德拉托雷占主要地位。在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地区，查理在一些要求他保护、抵御蒙费拉托和热那亚共和国的城市国家建立执政团统治。其时，蒙费拉托归“大侯爵”古列尔莫七世（1254—1292 年）统辖。大侯爵为壮大自己，掌握归尔甫派，也与昂儒查理结盟（1264 年）。果然，他掌握了皮埃蒙特和伦巴第西部一些城市的执政团，或者可以说至少夺得了这些城市的领导权。

古列尔莫侯爵和纳波莱奥内·德拉托雷成了伦巴第的两位领导人物，他们都反对昂儒查理的霸权野心。为此，古列尔莫七世投靠帝国，与德国或称“罗马帝国”的两位当选皇帝之一阿方索·迪卡斯蒂利亚之女结婚，以此获得帝国在意大利代理人的称号（1271 年）。尽管如此，查理仍有可能像在皮埃蒙特那样，联合那些向他求援的伦巴第小城（帕尔马、皮亚琴察、克雷莫纳、布雷西亚）来架空那些强国。但是，要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霸权，他务必把一切活动集中于半岛，而西西里王国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财力来支持其伟大的国际政策。

昂儒查理忽略了这一基本现实。他不仅继续推行诺曼和施瓦本的计划，甚至变本加厉，转而东征；实际上扩大贸易才是西西里王国在东方的真正利益所在。他允诺支持已废黜的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并把自己女儿贝雅特里齐许配给鲍德温之子菲利普·库尔特尼。通过幼子菲利普的婚事，使法国-希腊的阿卡亚公国臣服。他也获得作为耶路撒冷王后裔的权利。他成功地利用了其兄路易九世对十字军东征的热忱，促使他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中举兵讨伐突尼斯

（1270年）。讨伐途中，路易死于鼠疫，但查理率领热那亚人和西西里人及时赶到，迫使突尼斯苏丹宣布像在诺曼和霍恩施陶芬时代一样向他称臣，十字军东征自然就此停止。他还通过双重渠道与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室攀亲。

为在意大利内外推行霸权政治，查理需要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教皇，需要帝国长期空位。与此相反，教皇格列高利十世（1271—1276年在位）计划长期进行十字军东征，力图削弱可怕的查理政权。为此，他积极活动，以求结束帝国“大空位”。哈布斯堡的鲁道夫（1273—1291年）被选为德国新王。他出身于一个少有权势的家族，此时，不仅得到整个德国，而且也得到伦巴第主要执政团的承认。纳波莱奥内·德拉托雷被封为米兰城的皇帝代理（1274年）。此外，格列高利十世为阻挠昂儒的东方政策，在里昂大公会议（十四届世界圣公会）上力主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联合（1274年），由拜占庭帝国的复兴者米海尔·巴列奥略缔约，并实施了一段时间。在这次会上，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与教皇意见完全一致，保证充分尊重他的权利。会上还宣布了新的十字军东征，鲁道夫任十字军首领。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格列高利十世为促进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间缔结和约（事实上寿命不长）而奔波，其意是反击作为归尔甫派领袖的查理。在佛罗伦萨也签订了允许逃亡在外的吉伯林分子回城的协定，但查理使之成为一纸空文。在皮埃蒙特，蒙费拉托侯爵、阿斯蒂、热那亚、帕维亚（热那亚好几年来就反对昂儒查理）的结盟又推翻了昂儒的执政团统治。在伦巴第，乌尔班四世任命奥托内·维斯孔蒂为米兰大主教，托雷家族不予承认，因此维斯孔蒂率领流亡在外的米兰人，在德西奥大败纳波莱奥内·德拉托雷，进入米兰，被民众推举为执政官（1277年）。维斯孔蒂家族成了伦巴第反昂儒派的首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蒙费拉托侯爵仍处于优势，就连维斯孔蒂本人也曾把米兰的执政团托付给他。这时，“大侯爵”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扩大到都灵、维切利、米兰、亚历山德里亚。同时，伦巴第反昂儒联盟的城市（诺瓦拉、帕维亚、阿斯蒂和热那亚也参加该联盟）也任命

他为军事统帅。他的对立面是托雷家族的昂儒联盟，其成员有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帕尔马、莫德纳、波洛尼亚。

新教皇尼古拉三世（1277—1280 年在位）比格列高利十世更敌视昂儒查理。他迫使查理放弃托斯卡纳代理人和罗马大法官（罗马大法官由教皇自己担任）两职。他继续对意大利各城市执行调解政策，令红衣主教拉蒂诺·弗兰吉帕内在佛罗伦萨缔结和约（1280 年），把八个“能人”的席位给予归尔甫派，六个给予吉伯林派。他把皇冠授予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但鲁道夫没能来参加加冕礼。同时，尼古拉还不断扩大教会利益，从鲁道夫手中获得罗马涅和马尔凯的主权，并在罗马涅立一位伯爵为各地诸侯之首，迫使他们宣誓效忠教皇。尼古拉三世的目标是壮大自己的家族。传说他想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替他的侄子建立两个王国。

尼古拉三世死后，查理要挟维泰尔博秘密会议，敦促其产生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教皇。终于一名法国人当选，为马丁四世。马丁自任罗马大法官，指定查理为他的代理人；偏袒归尔甫派，利用再次出现的宗教冲突，绝罚东方皇帝。这时，在教皇和威尼斯的支持下，查理能同拜占庭对抗。当韦斯普罗起义风云突起时，查理又同教皇、威尼斯结盟，同时又和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伊皮鲁斯和希腊的亲王联合。

55 韦斯普罗战争 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的分裂

腓特烈二世的独裁政权及其苛刻的赋税政策导致施瓦本王朝的崩溃。教皇克力门四世要求昂儒查理把威廉二世时代的豁免权和特权归还给臣民——封建主或王城（即直属于王家的城市）。但是，要偿还转战征讨所欠下的债务，要向教皇缴纳年贡，要维持开展广泛外交政策所需的开支，查理急需钱用，因此必须施行施瓦本的税收制度，甚至变本加厉。再者，跟查理来西西里王国定居的法国人恣意掠夺土著封建主，新贵们又滥用权势，而几乎所有的政府职务均由法国人取当地人而代之。西西里的不满情绪更为高涨。那里，一些拥护康拉丁的

局部暴动被野蛮镇压，整个整个村镇被夷为平地。许多贵族被抢劫一空。此外，西西里人民不满于法国人对其妇女的那种放肆行为，因为西西里妇女已习惯于像穆斯林妇女那样关在闺房中。另外，昂儒查理建都于那不勒斯，而不在巴勒莫，这也使西西里感到其地位一落千丈。

西西里岛的不满情绪，曼弗雷德的女婿阿拉贡的佩德罗三世早已看在眼里，也许这种不满情绪正是他煽起的。他的朝廷收容了许多西西里王国的逃亡者，其中著名的有：曼弗雷德的心腹顾问焦万尼·达普罗奇达和巴西里卡塔贵族鲁杰罗·迪劳里亚。佩德罗三世与意大利的吉伯林派和东方皇帝结盟，准备征讨西西里；但声东击西，扬言攻打突尼斯。

1282 年 3 月 31 日，正值天主教圣灵节，西西里巴勒莫城举行起义。这次起义是人民自发的，并非出于佩德罗国王及其顾问们精心策划的阴谋。起因好像是法国士兵调戏西西里妇女。在一片“杀呀！杀呀！”的呼声中，巴勒莫城里的法国人被杀得一干二净。人民建立起城市国家政府，要求教会予以保护。起义浪潮遍及全岛，不到一个月，法国人被荡涤一空，大部被杀。各城市结成联盟，恳求教皇作为最高执政官保护西西里。但马丁四世拒绝这一请求，命令西西里臣服查理，宣布对西西里处以绝罚。查理包围墨西拿，但当地居民进行英勇抵抗，他们的抵抗歌曲传遍整个意大利。贵族站在这次革命的前列。西西里议会推举阿拉贡的佩德罗为西西里国王；于是，他从突尼斯来到西西里（8 月）。查理只好放弃西西里。教皇随即宣布绝罚佩德罗，发出禁止西西里参加宗教活动的命令，扬言要讨伐西西里。昂儒和阿拉贡之间发生“韦斯普罗战争”，首先是海战。英勇善战的舰队司令鲁杰罗·迪劳里亚在那勒斯海湾一举击溃昂儒舰队，俘获准备大举讨伐西西里的王储跛子查理（1284 年 6 月）。这样，昂濡派试图在昂儒查理的侄子法王菲利普三世（勇敢者）的支持下直接进攻阿拉贡。教皇废黜佩德罗国王（从英诺森三世起，阿拉贡就臣属教廷），宣布由菲利普三世的次子瓦卢瓦夏尔代之。法王入侵阿拉贡失败（1285 年）。同年昂儒查理和佩德罗三世相继去世。查理王位由查理二世继承（1285—

1309年在位)，不过，几年后他才获释。而佩德罗把西班牙的统治交给长子阿方索，西西里交给次子贾科莫。战争仍在继续。阿方索死后，贾科莫继承阿拉贡王（1291年)，并举行谈判，准备放弃西西里王位。1295年缔结协议，贾科莫把西西里奉还教皇，教皇把科西嘉和撒丁岛封与贾科莫。西西里人不接受这一协议，宣布贾科莫之弟腓特烈为西西里王并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连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的弟弟瓦卢瓦夏尔率领的一支庞大远征军登陆西西里（1302年)，也未能扭转战局。1302年签订《卡尔塔贝洛塔和约》，按约昂儒家族将西西里让与获特里纳克里亚王称号的腓特烈。但仍保持西西里王称号，待腓特烈去世后，西西里再归还给昂儒家族；归还的承诺没有兑现，阿拉贡-西西里新王朝自封为西西里王，与昂儒王朝相抗衡。从此出现了“两西西里”或“灯塔这边的和那边的西西里”一词，从此以后人们习惯称住在那边的昂儒王为“那不勒斯王”。

战争对两个地区都有重大的影响。在那不勒斯，昂儒各王因卷人战争不得不依靠封建势力，因而封建势力的力量大增，夺得许多直接隶属国王的城市（国有的或王室的)。结果削弱了王权和王朝本身。在西西里，建立了议会制度。议会起源于诺曼人，由贵族、教士和王城代表组成，它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批准税收，监督政府官员。这种制度大致上与英国的相似；至少在形式上一直保持到1812年。各朝国王都支持各城市的自由，以约束贵族的势力。尽管如此，封建主还是取得了优势，王权和各城市的力量被削弱。他们与封建主的斗争以及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摧毁了这个岛屿，使西西里逐渐走向没落。

韦斯普罗战争对意大利整个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先前，西西里与半岛的关系非常密切，现今关系逐渐疏远，最后落入一个非意大利强国之手（阿拉贡王国)。相反，那不勒斯从一开始便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意大利事务，然而现今也有些力不从心。诺曼人时期南方王国对地中海所起的影响现已销声匿迹；天主教在叙利亚的统治最终垮台，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见第57节)。

56 伦巴第和托斯卡纳

韦斯普罗战争期间，意大利中、北部各大城市的内外活动继续频繁进行。1282 年 12 月，米兰大主教奥托内·维斯孔蒂推翻了蒙费拉托侯爵古列尔莫七世（早在 1280 年他就失去了都灵，为萨沃依的托马索三世所割）的执政团，再次封为执政官。从此，在伦巴第展开了一场维斯孔蒂家族与蒙费拉托家族间的斗争，而托雷家族站在蒙费拉托一边。维斯孔蒂家族在斗争中站住了脚跟。1284 年大主教奥托内与鲁道夫王缔约；1287 年其重孙马泰奥（一世）被推举为民众统帅。米兰与帕维亚、阿斯蒂、热那亚、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布雷西亚等城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古列尔莫。古列尔莫得到帕维亚城逃亡者的支持，当了该城的执政官（1289 年）。但他在米兰搞的阴谋没有成功。尔后采用武力攻打米兰，结局也不佳。这时，亚历山德里亚城起来造反，逮捕了他（1290 年 9 月），把他关在笼子里一直到死（1292 年 2 月）。蒙费拉托执政团濒临解体：许多土地为阿斯蒂城所占，侯爵属地卡纳维塞城的一部分落入萨沃依或阿卡亚的菲利普手中，而蒙费拉托在科摩、诺瓦拉、维切利、亚历山德里亚和帕维亚等城的权力为马泰奥·维斯孔蒂所取代。古列尔莫的十五岁儿子焦万尼（1292—1305 年在位），为保持祖传的领地，只好原则上接受马泰奥本人为总督。成年后，他摆脱这种监护，夺回阿斯蒂占有的土地。同时，他企图用结盟的方式，在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对抗维斯孔蒂，但收获甚微。他死后无子，由希腊帕莱奥洛戈王朝的泰奥多·帕莱奥洛戈继承，此人系“大侯爵”之女维奥兰特与皇帝安德洛夸卡二世所生。

1294 年，罗马王阿道夫·德纳索（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的继承者）任命马泰奥·维斯孔蒂为皇帝代理人，从法律上肯定了他的权利。但是，蒙费拉托家族和托雷家族仍在反对维斯孔蒂。1302 年 6 月米兰发生骚乱，维斯孔蒂倒台，托雷家族返回米兰。现在轮到维斯孔蒂家族进行流亡战争。1308 年，圭多·德拉托雷出任终身民众统帅；这是建立执政团惯用的一种形式。

1277年10月，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在维罗纳遇害。其兄弟阿尔贝托自1269年起已出任商人首领；现被举荐为“维罗纳匠人和全体民众的统帅和加斯塔尔迪——领袖”，握有极大的行政、立法和军事权力。他与米兰的维斯孔蒂、曼图瓦诸侯皮纳蒙泰·德博纳科尔西结盟，抵抗帕多瓦、维琴察、费拉拉和莫德纳的敌对行动。不久，其子巴尔托洛梅奥参政，1301年继承父位。巴尔托洛梅奥故后（1304年），其兄弟阿尔博伊诺继承，并由最小的弟弟坎格兰德辅助。阿尔博伊诺还被立为商人的终身首领。埃斯特家族的执政团已扩大到维罗纳和米兰南部。费拉拉诸侯奥比佐·德斯特（见第51节）在莫德纳大议会中被立为世袭执政官（1289年1月）。一年后勒佐仿效莫德纳，也立他为世袭执政官。

热那亚内部形势日益动荡不定。1289年归尔甫派妄图推翻两个贵族统帅和一个民众长老；1291年热那亚采用外地人为统帅的制度；几年后，统帅职位又由当地人担任。十四世纪初土著统帅分裂为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两派，斯皮诺拉派占上风。1309年奥比齐诺·斯皮诺拉被举为热那亚终身军政首脑。

动乱以前，热那亚给了其敌手比萨城以致命的打击。前几个世纪，双方为争夺茅勒尼安海的制海权和两个大岛的统治权，大动干戈。结果比萨人在撒丁岛领先，直接占领了一部分土地。在阿尔博雷阿、卡利亚里、加卢拉和托雷斯四城，他们的权力已凌驾于法官之上。在科西嘉，既有撒丁式的法官，又有与大陆相似的封建制和城市国家制。热那亚在这里握有最高统治权。这促使比萨人又来干预科西嘉事务，从而爆发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一场战争（1282年）。起先，比萨人在科西嘉暂居优势，因为他们与威尼斯结盟（作用不大）。但是热那亚的舰队更为强大，更为精良，1284年8月6日在梅洛里亚礁石（里窝那对面）附近一仗，彻底打垮了比萨舰队。大约九千比萨人被俘，甚至有人这样说：“谁要参观比萨，去热那亚。”然而，战争还在继续；最后，比萨不得不放弃对科西嘉的任何要求，并让出撒丁岛的一部分领土（1299年7月）。

梅洛里亚一役后，比萨的陆上对手佛罗伦萨和卢卡在归尔甫旗帜下与热那亚结成同盟，且得到了托斯卡纳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这时，比萨的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德斯卡伯爵赶走了吉伯林分子，先出任最高行政官，后身为统帅。他与托斯卡纳同盟和好。但是，比萨的各大家族同大主教鲁杰罗·德利乌巴尔迪尼联合，推翻了乌戈利诺伯爵，把他投入监狱，最后他与亲属一起饿死在狱中（1288 年）。但丁在他的《地狱》最后第二篇中描述了这一惨案。比萨又成了吉伯林派的天下，并与阿雷佐结盟。这一联盟在坎帕尔迪诺被托斯卡纳同盟击败（1289 年 6 月）；1293 年比萨被迫签订《富切基奥和约》，允许同盟各城市国家的货物免税过境，不推举敌视同盟的人物为最高行政官或统帅。

红衣主教拉蒂诺和约（见第 54 节）后，佛罗伦萨的归尔甫分子很快恢复优势，“归尔甫派银行”又与他们站在一起；吉伯林分子完全被挤出政府。同时，行会在城市国家中处于显要地位，最高机构由大行会推选六名执政长官（六个区各一名），共十二名组成（1282 年），任期两个月。他们取代过去的十四“能人”。民众军事组织又重新建立，并产生了民众统帅。那些大人物或称“巨头”——没有确切定义的社会阶层，指强大的甚至被认为危险的家族，但不包括所有贵族，也不仅仅指贵族——因其特权危及民众利益而令人厌恶。于是贾诺·德拉贝拉针对他们发起一个运动，创立所谓的“正义制度”（1293 年），即：七个大行会、五个中行会和九个小行会组成一个联盟，成为政府和军事组织的基础。但是小行会不得参加执政长官的选举，这就奠定了大有产阶级的优势。对于一些血债累累的巨头，制定了极其严厉的刑罚和即决的诉讼程序，并株连其亲属。为捍卫新制度，特设“正义最高军事长官”一职，任一种特殊武装力量的司令。全部巨头登记入册，他们不能选为执政长官——只能由真正的匠人当选最高军事长官以及各行政长官顾问等职。几年后，这些大人物和贫民又联合起来，流放了贾诺·德拉贝拉（1295 年）；但新制度继续存在。建立这种反对巨头的立法机构，佛罗伦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家。

它是民众城市国家的一个特点。

这时，佛罗伦萨又发生了一场新的斗争：一方是切尔基派，参加者有贵族和吉伯林派的残余；一方是多纳蒂派，其背后主要是大商业有产阶级和银行家。邻城皮斯托亚也发生了白衣官员与黑衣官员的分裂，他们各自并入了佛罗伦萨的两派，因而切尔基派得名为白党，多纳蒂派为黑党。但丁就是一名白党成员。

57 威尼斯和热那亚

威尼斯没有支持比萨反对热那亚，对基督教在叙利亚统治的最终垮台也无动于衷。1244 年土耳其人应埃及苏丹的召唤，在加札消灭基督教军队，攻陷耶路撒冷。不久，马木路克雇佣军团首领拜巴尔斯取代了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并自封为叙利亚和安条克公国的主人。圣路易九世发动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浪迹天涯的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也被赶出的黎波里和阿卡。阿卡城的陷落（1291 年）标志着基督教在叙利亚统治的崩溃。继续进行十字军远征的设想已成泡影，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只考虑自家的事务，不愿再受基督教的理想所拖累，而十字军远征的主力即封建主义和骑士制度已趋没落。商业有产阶级以及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些代表地中海的意大利海洋强国认为目前照样可以与穆斯林君主进行贸易交往，签订贸易协定。

这一时期热那亚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扩张，为争夺海峡和黑海的势力范围与威尼斯发生了新的冲突。热那亚得到皇帝安德洛奈卡二世和塞浦路斯王的支持，确立了垄断地位；威尼斯则竭力要打破这一垄断，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殖民都市，以此与热那亚在卡法的殖民都市相竞争，威尼斯甚至与一位鞑靼君主进行了谈判。1293 年，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双桅战船偶然发生冲撞，导致双方重开战事。1294 年，热那亚人在小亚美尼亚沿海拉亚卓区域的一场大海战中大胜对手；1296 年威尼斯人火烧彼拉城，侵入卡法；1297 年热那亚人甚至掠夺了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最后热那亚舰队司令兰巴·多里亚在利萨附近的库尔左拉一举击沉威尼斯的安德烈亚·丹多洛舰队（1298 年）。但热那亚

人亦伤亡惨重。次年，马泰奥·维斯孔蒂从中调停，双方在米兰签订和约，结果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因在地中海遭到热那亚的对抗，圣马可共和国千方百计维持其在亚得里亚海的垄断：禁止武装船只进入海湾，征收所有商船的关税并强迫它们卸货于威尼斯。为使各船遵守这些规定，一支巡逻分队经常游弋于亚得里亚海，严重打击了意大利沿海和内地的城市，首当其冲的是生活必需品，如小麦和食盐。所以，威尼斯共和国与帕多瓦、特雷维佐、费拉拉、拉文纳、切尔维亚、波洛尼亚、安科纳等城之间的战争和互相骚扰连年不断。

控制伊斯特拉对威尼斯来说至关重要。十二世纪中叶，伊斯特拉第一次臣服威尼斯，对其夺取海洋垄断极为有利。威尼斯还于1267年、1270年、1278年、1283年相继在帕伦佐、契塔诺瓦、卡波迪斯特里亚、皮拉诺等地确立了领土最高统治权。但是，威尼斯与伊斯特拉边境省的阿奎莱亚牧首以及伊斯特拉统治者戈里齐亚伯爵发生冲突。大城市的里雅斯特建成城市国家后，被迫于十三世纪上半叶签订协定，服从威尼斯的海洋管辖权，成为威尼斯的保护国。的里雅斯特曾企图在阿奎莱亚牧首和戈里齐亚伯爵的支援下发动一次暴动，但战争的结果是的里雅斯特又一次屈服于威尼斯（1291年）。

共和国内部，贵族权力继续加强，执政官权力日渐削弱。多梅尼科·孔塔里尼执政时期（1043—1071年）管理国家收入的行政机构与执政官的行政机构分开，前者由圣马可检察署主持，检察署实际上是财政部，成员已增加到九人。十二世纪，贵族势力日增，到了十三世纪“大议会”的建立，其地位才巩固下来。“大议会”由四百八十人组成，每年选举一次。它有权任命执政官的选举人，但须通过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选举制度。除大议会外，还有由普雷加迪组成的小议会（普雷加迪一词意为被选者，是执政官请来协助他工作的），后成为元老院；另外，还有“四十人委员会”（因其成员的数目而得名），是一种高等法庭，负有政治、行政责任。执政官的选举，人民没有参加的权利，只有用欢呼来表示简单的承认而已。执政官就职时须向“国家

法令”宣誓，“国家法令”是一种宪章，它规定了执政官的权限，严格限制了其个人的举止行为。宪章的内容愈来愈广，因而专设一个委员会进行编写。

十三世纪末，威尼斯为建立寡头政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即建立所谓的“封锁大议会”（1297 年）。它规定，只有那些在过去有某个成员参加过议会和今后可能被接纳进议会的家族才有权参加大议会。事实上大议会经常纳新，其寡头政治性质丝毫未变。所以，这是一种包括几百个家族的寡头政治。

在巴耶蒙特·蒂拉波洛领导下，民众与富人密谋暴动，反对寡头政治。但暴动被镇压，蒂拉波洛外逃，其他人被处死刑（1310 年）。当时通过特殊途径第一次建立了政治裁决的司法机关“十人会议”；后来成为共和国的一个永久的、强有力的机构。

58　卜尼法八世　阿维尼翁教廷

十三世纪末——帝国空位，北方大执政团还在形成，那不勒斯王国在韦斯普罗战争后已筋疲力尽——图谋在意大利实行全面霸权的势力是卜尼法八世时期的罗马教廷。

尼古拉四世死后（1292 年），红衣主教团内部各派的斗争——昂儒派、教皇国独立派、修会派、科隆纳派——造成教皇空位达两年之久。为消除教皇长期空位的弊病，里昂大公会议（见第 54 节）规定把红衣主教隔离在一个地方，举行秘密会议；但这一规定很快被废除。最后终于选阿布鲁齐的隐士皮耶尔·达莫罗内为教皇，称切莱斯蒂五世（1294 年 7 月），建宗座于那不勒斯。但他缺乏经脸，完全为查理二世所控制。最后，他自认无能力胜任教皇之职，并“由于怯懦而放弃大位”（但丁《地狱篇》第三章）。他的继任者（1294 年 12 月）为卜尼法八世（1294—1303 年在位），罗马卡埃塔纳家族之后，他为人刚毅，谙熟宗教法规，满脑子权力意识，根据英诺森三世和四世的神权政治理论构思了教廷的各种权力，极力推崇尼古拉三世重用亲属，即壮大本家族的思想。为此，他与强大的科隆纳家族势不两立。但科

隆纳家族得到吉伯林派、西西里王腓特烈以及圣方济各会（见第49节）的支持。圣方济各会的诗人雅各布·纳达托迪（见第63节）曾用诗歌大骂教皇。卜尼法废除了贾科莫·科隆纳和彼得罗·科隆纳的红衣主教职位；他们则宣称卜尼法的当选为非法（因为切莱斯蒂辞职无效），要求召开大公会议（1297年）。这就是最早提出大公会议高于教皇的理论。因此，卜尼法对他们处以绝罚，大加讨伐，荡平其在帕莱斯特里纳的城堡，剥夺其财产（1299年）。

在西西里，他的政策没有成功。在托斯卡纳，他指责贾诺·德拉贝拉不够归尔甫化。黑白党之争中，他支持黑党，认为黑色是归尔甫派最鲜明的颜色，指定为西西里事务来意大利的瓦卢瓦夏尔为调解人（见第55节）。瓦卢瓦夏尔来到佛罗伦萨，流放白党分子（1302年），其中有但丁。但是，卜尼法八世并没有因此而在佛罗伦萨取得最高权威。

在德国，他想维护教廷审查王位选举的权力，不承认哈布斯堡或奥地利的阿尔贝特继承阿道夫·德纳索；后来，阿尔贝特宣誓效忠教皇（1303年），他才改变初衷。这足以炫耀为一大成就，却因遭到一位新的典型的世俗君主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1285—1314年）的强烈反对而大为减弱。

菲利普四世继续全力推行卡佩王朝时已开始的集权方略。他重用对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刻骨仇恨的法学家。菲利普还向教士征税，来维持与英王战争的财政支出。于是，卜尼法八世颁布了“世俗神职人员”通谕（1296年），禁止俗人向神职人员征税，禁止神职人员向俗人付税，违者处以绝罚。菲利普四世的回答是：禁止王国的货币出口（即禁止支付教廷的各种赋税），禁止外国人在王国逗留和做生意。意大利银行家首当其冲，而他们是教廷的财政支柱。卜尼法慑于压力发布新通谕，事实上等于收回成令。这样暂时与法国握手言和。与此同时，战胜科隆纳家族后，为使其胜利光昭日月，教皇宣布从今以后，每一世纪元年为“大赦年”；凡去罗马进行特定的宗教活动的人均可获得大赦。1300年隆重庆祝大赦年，是年民众云集，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教皇威望大增，财源如流。

不久，与法国旧恶重起，冲突甚烈。法王召开有教士参加的全国三级会议，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卜尼法在罗马召开大公会议，也有法国主教参加。会上，他发表了昭著的“至一至圣”通谕（1302 年 11 月）。通谕断言，教皇高擎两把宝剑，一把是精神的，一把是世俗的；前者由他使用，后者为他而存在。因此每个生灵，若要永恒地拯救自己，就得听命罗马教皇。菲利普在一次王室小协议会上谴责卜尼法为异端、恶棍，伤风败俗，要求召开全体大公会议。卜尼法为此决定给菲利普绝罚处分。但菲利普的掌玺大臣纪尧姆·德诺加雷抢先一步，在夏拉·科隆纳以及其他罗马贵族的帮助下，俘教皇于阿纳尼，并企图把他押往法国（1303 年 9 月）。阿纳尼居民解救了他。他回罗马后不久，于 1303 年 10 月去世。

继承卜尼法八世的是本尼狄克十一世（1303—1304 年在位）。他是多明我会修士，性情温良敦厚。其政策完全不同于前任，旨在保持意大利的安定，图谋与法国和解。但他过早谢世，未及实现其计划。接着举行了长时期的秘密会议，终于选出比斯开地区的波尔多（当时属于英国）大主教贝特朗·德戴戈特为教皇（1305 年 6 月），称克力门五世。他不到意大利而在里昂加冕，并把普罗旺斯地区的阿维尼翁城作为宗座驻地。该城原属于昂儒家族，后来卖给了教皇（1348 年）。教廷长驻阿维尼翁大约七十年（1309—1376 年），期间仅乌尔班五世短期回过罗马（1367—1370 年）。这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红衣主教大部分也是法国人。法王对教廷的政策（因此也对意大利事务）影响极大，可与帝国相争，甚至取而代之。天主教界，尤其是意大利的天主教界，称之谓“教会的巴比伦之囚”。阿维尼翁宫廷内生活奢侈，讲究排场，加上教廷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教廷在民众中声名狼藉。一时间，反教廷的苦行主义和唯灵论倾向以及吉伯林理论死灰复燃。

59　帝国的最后几次干涉

尽管克力门五世过于迁就美男子菲利普（宣布蹂躏阿纳尼城无

罪，取消圣殿骑士团），但是，奥地利的阿尔贝特死后，他抵制了法王要教廷支持其兄弟瓦卢瓦查理为皇帝候选人的企图。相反，选举者选（1308年11月）出身低微的德国封建主卢森堡的亨利为皇帝（亨利七世）。克力门五世随即同他谈判，允诺为其加冕。

1310年末，亨利七世应各方要求，进入意大利。但丁·阿利吉耶里对此热忱有加，充满幻想。他在《帝制论》一文中表达了吉伯林温和派的理论，主张帝国独立于教会，但教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因此虽独立仍须尊重和虔信教皇。由于亨利气质高雅、尊贵，他准备扮演有最高权威的全面调解人和组织者的角色，但丁对他寄予厚望。最初他要求许多城市一律召回被放逐的人，不管是归尔甫派还是吉伯林派；在米兰，他召回了维斯孔蒂家族，使之与托雷家族和解。但在同时，为了维护帝国权威的至高无上和公正不阿，他又在许多城市指定了帝国代理人（代理人并非个个合适），并要求人质和索取钱财。不久，米兰赶走了托雷家族，封马泰奥·维斯孔蒂为帝国代理人（1311年）。皮埃蒙特代理人一职却授予泰奥多罗·帕莱奥洛戈（见第56节）。维罗纳一职授予阿尔博伊诺和坎格兰德（见第56节）。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重开战事。布雷西亚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最后还是被皇帝所征服。整个伦巴第又动荡不安。亨利七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了伦巴第，来到热那亚和比萨。两城奉他为执政官。但佛罗伦萨紧闭城门，拒绝顺从，并与托斯卡纳各城结成同盟，执全意大利归尔甫派抵抗之牛耳，还鼓动继承查理二世的那不勒斯王罗伯特（1309—1343年）也起而攻之。罗伯特搪塞一阵后，决定反对亨利七世。他派人占领罗马城中的利奥城（梵蒂冈城）。亨利七世到达罗马后，不得不在拉特兰教堂加冕（1312年6月29日），而不是在圣彼得教堂。皇帝在几次进攻佛罗伦萨失败后，只得退居比萨。他宣布取缔罗伯特王国，与西西里王腓特烈结盟，并着手准备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这时，克力门五世一方面为了教廷的利益，一方面屈服于美男子菲利普的压力，中断与皇帝的关系，宣布谁进攻那不勒斯就处以绝罚。尽管如此，亨利仍向那不勒斯进军，但在锡耶纳附近的布翁孔文托溘逝（1313年

8月24日)。

亨利七世的远征并没有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相反表明了帝国在失去西西里王国这一基地后，不能不依赖一些怀有私心的、不牢靠的地方势力。当然也不能说这次远征对意大利总的政治形势毫无影响。但丁不仅在《帝制论》中，还在当时没有写完而已在整个意大利迅速传开的《神曲》中大加赞扬的帝国理想，现在又被亨利的远征复活。在政治实践中，因亨利七世授予意大利各执政官帝国代理人之职，帝国权益得到确认，从而促进了执政团的发展以及其政治法律地位的形成（见第61节）。

亨利七世生前和死后，伦巴第的武装冲突一直不断。一方是受吉伯林派支持的维斯孔蒂，另一方是曾把意大利北部的执政团委托于罗伯特王的反维斯孔蒂派。克力门五世，按照教廷在帝国空位时期摄政的新要求，任命昂儒罗伯特为帝国在意大利的代理人。1314年10月，德国举行皇位选举。由于党派矛盾以及选举程序长期不定，结果选出了两个人：一是奥地利的腓特烈，一是巴伐利亚人路易。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坚持维持摄政，等待德国的最后决定，并宣布废除已故皇帝任命的全部代理人。

马泰奥·维斯孔蒂也是宣判的受害者之一。他出自宗教的感情理解教廷这一判决，便放弃亨利七世授予的称号，但由民众推举为米兰总执政官。除了米兰，他还诉诸武力或因居民的顺服，夺得科摩、贝尔加莫、皮亚琴察、托尔托纳、亚历山德里亚和帕维亚的统治权。当然米兰在伦巴第必然占有越来越大的优势。马泰奥广泛使用德国雇佣兵，最有名的雇佣军队长是他儿子马尔科，另一个儿子焦万尼被米兰教士会选为主教，但教皇不予承认。现在维斯孔蒂的吉伯林派武装开始进攻赶走吉伯林派的热那亚，包围该城。昂儒罗伯特前来解围，与教皇一起成为该城的执政官达十年之久。意大利北部的战事从皮埃蒙特——这里罗伯特王又恢复了昂儒的势力——一直蔓延到威尼托（当时叫做特雷维佐边境省）。威尼托最强大的执政官是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当时他是维罗纳和威尼斯的执政官，后来又任帕维亚执政官

（1328年）。马泰奥在松奇诺召开吉伯林派首脑会议，会上任命坎格兰德为吉伯林派领袖，以此确保坎格兰德对吉伯林派的忠诚（昂儒罗伯特一直试图破坏他的这种忠诚）。埃斯特家族也站在吉伯林派一边，因为他们与教皇在费拉拉问题上有争执。1309年教皇把费拉拉托给昂儒罗伯特，威尼斯几次想夺回，没有成功；一直到1317年费拉拉才回到埃斯特家族手中。

亨利七世病故后，托斯卡纳地区的吉伯林派非但没有衰落，相反更为壮大。当时的领袖是比萨和卢卡的执政官乌古乔内·德拉法焦拉。1315年8月，他在蒙泰卡蒂尼地方大胜佛罗伦萨——该城把执政团交给昂儒罗伯特，为期八年——及托斯卡纳、翁布里亚、罗马涅的归尔甫派联盟的军队。不久，他又丢掉比萨和卢卡的执政官之职（1316年）。卢卡新执政官卡斯特鲁奇奥·卡斯特拉卡尼·德利因泰米内利后来又为皮斯托亚执政官，托斯卡纳的吉伯林派因而也由他统率。在佛罗伦萨，反罗伯特王的一派又占了优势。罗伯特在佛罗伦萨的执政官职位于1321年末期满，再也没有要求延期。

教皇约翰的侄子或者说儿子红衣主教贝特朗·德尔波杰托作为特使被派往伦巴第（1319年），他完全站在归尔甫派一边，甚至下令米兰人承认罗伯特为执政官。他令阿奎莱亚牧首帕加诺·德拉托雷支援伦巴第的归尔甫派武装。他公布教皇在阿维尼翁签发的敕令：处维斯孔蒂家族、米兰以及所有服从米兰的城市以绝罚，禁止他们参加一切宗教活动，没收个人的财产和奴隶，通令讨伐这些罪人，大赦那些参加讨伐者，等等。马泰奥死后，反对派取得优势，要求和红衣主教达成协议，其子加莱亚佐·维斯孔蒂（1322—1328年在位）被迫离开米兰，但很快又被召回，举为执政官。但是，特使的军队在继续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战争也在继续，吉伯林派占优势：卡斯特鲁奇奥成了皮斯托亚执政官，并在阿尔托帕肖一战大败佛罗伦萨人（1325年9月），虽然他们得到托斯卡纳、罗马涅和翁布里亚许多城市的支持。佛罗伦萨只好把本城的执政团托付于罗伯特王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查理，为期十年。查理派雅典公爵加尔蒂埃·德布里安为

其代理人并授以全权（1326 年）。不久查理去世（1328 年）。

加莱亚佐和其他意大利吉伯林分子投靠在德国战胜对手的巴伐利亚的路易，他派遣其代理人来意大利。当时（1323 年 10 月），约翰二十二世责令路易停止行使帝国行政权；不得支持教会的敌人，尤其不得支持维斯孔蒂，并在三个月内朝见教皇，以等待教皇的决定，否则处以绝罚。路易提出抗议，被教皇处以绝罚（1324 年 3 月），他上诉未来的大公会议，根据教皇对方济各会神贫的一个决定指控教皇为异端。

方济各会内部分裂成“住院”派与“灵修”派（见第 49、58 节）。克力门五世较倾向于“灵修”派；而约翰二十二世猛烈抨击它，使得一部分“灵修”派分裂出来，形成新的异端“小修士”派。此外，约翰与温和派也有矛盾，因为他宣布关于耶稣及其弟子一无所有的说法是异端邪说（1323 年）。

教皇剥夺路易通过选举得到的一切权利，对他的拥护者处以绝罚，禁止他们参加一切宗教活动。提议法王查理四世为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还是第一次），迫使选民重新选举。但是，路易不但有苦行派的支持，还有重新燃起的德意志民族感做靠山。因此，他提出关于教皇职位以及教皇与世俗政权关系的新理论。马尔西利奥·达帕多瓦（巴黎大学校长，医生）在让·迪冉丹（希安帕涅人）的协助下编写名著《和平保卫者》，于 1326 年献给巴伐利亚的路易。该书以人民和国家的权利的名义公开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它从人民主权原则出发，认为教会应是信徒自己的团体，所有信徒都是教会的主人；教会绝不应退化为教士专横的机构。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信徒的大公会议，只有大公会议才有权解释《圣经》。所有主教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处教皇以绝罚。教皇并非神职的最高权力，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赐给圣彼得比其他弟子更大的权力，圣彼得到罗马一说也是不确实的。低级教士也是自由的，不受主教约束。信仰不应强迫，更不应裁决。教会财产可用于公共事业。任命神职人员和监督教士的一切行动属于国王或皇帝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人民的主权）。皇帝可以废黜教皇，而不

是教皇废除皇帝。

对罗马天主教神权政治的这种极端反映只符合当时精神世界中的一些非主流的倾向，并不能代表某些强大的、有影响的政治派别的纲领。马尔西里奥的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很大影响。影响较大的还是英国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康姆。他主张教廷和帝国平等，教廷只管纯精神世界。十四世纪三个最有名望的意大利法律学家也讲授这一类的理论，他们是：奇诺·达皮斯托亚（见第 63 节）、巴尔托洛·达萨索费拉托（1314—1357 年）和巴尔多·德利乌巴尔迪（1327—1400 年）。巴尔托洛还专门为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法律学校编写了教材。与他们相抗衡的神权政治理论经奥古斯丁会教士阿戈斯蒂诺·特里翁福和方济各会修士阿尔瓦罗·佩拉焦之手发展到了顶点。他们认为教皇享有一切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而皇帝不过是他的陪臣。

1327 年春，巴伐利亚的路易进驻伦巴第。5 月 31 日圣灵降临节，三个被教皇处以绝罚的主教在米兰为他加冕为意大利国王。7 月他逮捕了加莱亚佐和他的两个兄弟卢基诺和焦万尼，可能是怀疑他们要和教皇谈判，也可能是加莱亚佐另一兄弟马尔科和堂兄洛特里西奥唆使的。接着，他在米兰建立一个贵族政府，派德国人为其代理人和最高行政长官。他还向米兰城以及所有吉伯林分子搜刮钱财。这些行为引起了普遍不满。路易路过托斯卡纳时占领比萨，但没有把该城交给垂涎已久的卡斯特鲁奇奥，仅封他为卢卡公爵。当时罗马发生暴动，反对担任罗马大法官职务的罗伯特王，因而路易进军罗马，建立一个民众政府，首脑为夏拉·科隆纳。

根据马尔西利奥·达帕多瓦的理论，路易在坎皮多利奥议会中要求民众承认他为罗马统帅、大法官和皇帝（1328 年 1 月）；他从夏拉·科隆纳手中接受了皇冠，也由两个被处绝罚的主教主持加冕仪式。教皇就此宣布对他进行讨伐。立路易为皇帝的民众议会以信异端、轻皇帝之罪废黜了教皇约翰，并在路易的提议下，罗马教士和人民选举方济各会修士彼得罗·达科尔瓦拉为教皇，称尼古拉五世（5 月 12 日）。尼古拉五世当选为教皇得到了路易的确认，反过来他又重新为路易加

冕。但他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皇，几乎不为人所重视。两年后他屈服于约翰二十二世，而罗马人早就在他之前已完全臣服于教皇约翰。

路易本想从罗马移兵那不勒斯，但因兵力和财力不足而作罢。卡斯特鲁奇奥离开路易，赶回托斯卡纳，皮斯托亚失守。他位居比萨执政官，收复皮斯托亚。不久离开人世（1328 年 9 月）。8 月，路易回师北上路过比萨和卢卡，废卡斯特鲁奇奥之子女为庶人，免除其贡税。1332 年春，返抵伦巴第。在此之前，他和维斯孔蒂家族已言归于好，并以一笔巨款为代价将代理人一职授予阿佐内（1328 年 8 月去世的加莱亚佐的儿子）。但是阿佐内在埃斯特家族的赞同下，想与教皇和解，对这个巴伐利亚人取敌视态度。路易便又转而进攻米兰。这一举动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不得不与阿佐内讲和，于 1329 年 12 月离开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意大利的土地。

路易和教廷间的斗争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对意大利事态已无实际影响。虽然德国君主和帝国议会一再要求日耳曼王冠和帝国权力独立于教廷（1338 年），教廷仍提议卢森堡查理为候选人，对抗路易（1346 年）。卢森堡查理是波希米亚王约翰之子，而约翰又是亨利七世之子。查理把费拉拉割让给教廷并宣布普罗旺斯（昂儒的领地）独立于帝国。1347 年路易与世长辞，查理被公认为帝国皇帝，1355 年来罗马受加冕之礼。

60 意大利地方主义的胜利

皇帝事实上已不再插手意大利的事务，但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归尔甫和吉伯林这两个名字在以后几个世纪内仍用来区别斗争中的城市以及每个城市中的各个派别。但伦巴第同盟、托斯卡纳同盟，在这两个招牌下相互作对的庞大武装集团松散了，解体了；同时由于各城市间，各大执政团政权间的敌对行动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集团。

那个巴伐利亚人刚一离开意大利，由贝特朗·德尔波杰托红衣主教代表教皇在伦巴第进行的反维斯孔蒂战争也告结束。收回绝罚的成

命。阿佐内放弃皇帝代理人的头衔，接受教廷代理人一职；对他来说，不管什么头衔，只要平安地占有米兰就满足了。他又重任米兰执政官。埃斯特家族也和教皇达成协议，获得费拉拉代理人一职（1329 年）。但是，一个新的德意志政权似乎要像帝国一样在北意大利站住脚跟并取得统治地位，不过这种局面时间不长。波希米亚王卢森堡的约翰（见第 59 节）在蒂罗尔早有利益，现又收到布雷西亚归尔甫派求援呼吁，该派受到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以及其他吉伯林派的威逼。于是，约翰来到布雷西亚，解放该城（1330 年 12 月），促成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和解。当时在伦巴第出现了一个势不可挡的运动：小城市已讨厌连年不断的斗争，希望得到约翰王的庇护，以抵御那些大执政官。约翰顺理成章成了贝尔加莫、克雷马、帕维亚、维切利、诺瓦拉、帕尔马、勒佐和莫德纳的执政官；他甚至还插足托斯卡纳，因卢卡愿归属他，以图摆脱争夺它的佛罗伦萨人和比萨人。阿佐内本人也认为举约翰为米兰执政官未尝不是好事，而他自己作为约翰的代理人仍可掌握实权（1331 年 2 月）。

这一权势有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北部，甚至超越意大利北部的趋势，并在这里建立一个德意志王国，这不能不引起强烈反应。约翰先是面晤教廷特使红衣主教波杰托，然后亲自去阿维尼翁，益发助长疑虑和恐惧。人们害怕国王与教皇达成协议，以便扼杀意大利各城市和执政官的独立；何况贝特朗·德尔波杰托（被教皇封为罗马涅伯爵、阿科纳侯爵）正在拼命扩大对罗马涅的统治。1332 年 8 月，阿佐内·维斯孔蒂、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路易吉·贡扎加（1328 年起为曼图瓦执政官）和埃斯特侯爵结成同盟，不久佛罗伦萨人和那不勒斯王也加入。波杰托攻打费拉拉，遭惨败（1333 年 4 月），接着一场全面暴动在罗马涅爆发。由于攻打阿佐内的战事毫无结果，约翰只好与同盟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退回德国（1333 年 10 月），从此不曾尝试重返意大利。翌年红衣主教也撤出意大利。

现在的问题是同盟者如何瓜分战利品，也即如何瓜分约翰王统治过的、曾留下过代理人的那些城市。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野心勃勃，

引起同盟内部的矛盾。他同其兄弟阿尔贝托在特雷维佐边境省、伦巴第、甚至托斯卡纳统治着不下十二个城市，如：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布雷西亚、勒佐、卢卡等；据说马斯蒂诺已准备了伦巴第王的王冠。为反对斯卡拉两兄弟又成立了另一同盟，参加者除维斯孔蒂、埃斯特、贡扎加等家族外，还有威尼斯（备受马斯蒂诺的某些经济措施之害）和佛罗伦萨，意大利境外还有蒂罗尔和卡林西亚执政官卢森堡家族。斯卡拉家族惨遭失败，丧失大量城池；帕多瓦为一变节同党马尔西利奥·达卡拉拉夺取，自领该城执政官；布雷西亚为阿佐内·维斯孔蒂所占；卢森堡查理拿下费尔特雷和贝卢诺两地。马斯蒂诺只好于1339年1月在威尼斯签订和约，规定特雷维佐割让给威尼斯，巴萨诺给马尔西里奥的继承者乌贝蒂诺·达卡拉拉。佛罗伦萨没有得到垂涎已久的卢卡城，仅占领卢卡的一部分土地。之后，马斯蒂诺又丢失帕尔马城（1341年），达科雷焦家族为该城执政官；因此马斯蒂诺只好把卢卡卖给佛罗伦萨；但比萨在维斯孔蒂、卡拉拉家族以及其他伦巴第执政官的支援下，包围卢卡，于1342年占领该城。

与斯卡拉家族没落衰败的同时，维斯孔蒂家族却如旭日东升。维斯孔蒂家族在加莱阿佐时期不太景气，但到阿佐内时期不仅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开始对外扩张，尤其在斯卡拉家族破败后。该家族终于成为意大利北部最强的国家首脑。阿佐内于1328—1339年统治着米兰、科摩、维尔切利、部分帕维亚、洛迪、皮亚琴察、克雷莫纳、克雷马、贝尔加莫、布雷西亚以及其他小城市。他对两个叔叔马尔科和洛特里西奥很不放心，1329年马尔科神秘地丧生。十年后，洛特里西奥率领圣乔治雇佣军团进攻米兰，于帕拉比阿戈（1339年2月）被阿佐内的另一个叔叔卢基诺击败并俘获，几年后才获释。六个月后（1339年8月）阿佐内去世。他生前竭力维持民众间、城市间的和平，保证各阶级的安宁、公正、经济繁荣、构筑古堡、架设桥梁、修建宫殿，以加强和美化国家，给人留下一个仁慈的、纯洁的、宽厚的、正确的形象。他无子女，米兰人选他的两个叔叔卢基诺和焦万尼为执政官。焦万尼是米兰大主教，他把政权让给其兄弟卢基诺。

在托斯卡纳，佛罗伦萨经历了一段内部混乱，外部力量削弱的时期。为卢卡耗资巨大，加重市民税收，却得而复失，引起市民的普遍不满，这对主要由“肥人”执政的政府危害不浅。在贫民和贵族的支持下，发生了圣克罗切广场议会事件。会上要求前军事统帅雅典公爵加尔蒂埃·德布里安为终生执政官的呼声雷动（1342 年 9 月 8 日）（见第 59 节）。大人物把新执政官抬到执政长官府中，公爵却把他们轰出官府，革职为民。不久，他重组执政长官团，吸收小人物参加，他宁愿依靠小人物，而不依靠贵族。不过，他取消了指挥民众军事组织的旗手，大量使用法国和勃艮第雇佣军。他的得力助手是民众统帅古列尔莫·达西西。在佛罗伦萨以外，加尔蒂埃任皮斯托亚、沃尔泰拉、阿雷佐（几年前佛罗伦萨人从塔拉蒂家族手中夺得）的终身执政官。他与比萨缔结了五年和约，规定卢卡仍归比萨，但佛罗伦萨可在比萨自由贸易。他与波洛尼亚、埃斯特家族、斯卡拉家族也签有协议。

被剥夺权力的“肥人”和贵族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不满情绪很快感染全体居民。其原因是：公爵部下对佛罗伦萨妇女行为放肆；为增加收入实行国家债务不付利息，增加新关税以及发行义务公债等财政政策；对那些敢于说几句反对话的人施以处死或致残的酷刑，其行为专制而残忍（古列尔莫·达西西是这一暴政的御用工具）。各阶级三次密谋叛乱，由于各阶级互不通气，谋叛均告失败，后来终于联合起来，在 1343 年 7 月 26 日公开暴动，托斯卡纳其他地方也起而响应。起初，公爵抛出古列尔莫和他的儿子（他们被愤怒的人民撕成碎块）以图安抚起义者，平息众怒。最后，于 8 月 3 日被迫投降，离开执政长官府和佛罗伦萨。

起义期间，选出一个十四人委员会，由七个大人物和七个贫民组成，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享有改革国家的全权。十四人委员会立即着手废除倒台暴君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法律。城市的各种职位分为重要的和次要的两种，前者（执政长官、执政长官顾问、旗手）均由贵族和“肥人”担任，而贫民只能担负后者。城市下分四区，每区可自己委任两个贫民执政长官和一个大人物执政长官，共十二名；而执政

长官委员会或称执政团只六名。大人物和“肥人”间协议没有维持多久，9月的一次民众骚动把贵族赶出执政团。民众团先是推举，后又打倒雅典公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提高参与意识，敢于挺身而出。他们拿起武器粉碎贵族的不断反抗。终于执政团重新分配名额：“肥人”二名，中间阶层三名，贫民三名。这种分配符合行会中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情况（见第56节）。正义旗手由三个阶级轮流担任。

这些年里，“肥人”的力量因某些银行家的破产而削弱，其中主要有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他们给英王以巨额贷款，由于英法交战（百年战争）难以收回贷款。而法国国王在雅典公爵的唆使下把没有获得法国国籍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和商人一律赶出法国。“肥人”绞尽脑汁对付贫民，他们解除外地人（其中许多是平民）的工作，并通过归尔甫派的统帅大量排挤吉伯林分子。对外，佛罗伦萨被迫实行收缩政策：承认皮斯托亚和阿雷佐独立；把彼得拉桑塔让给卢卡主教；与比萨达成协议，以巨额为交易让出卢卡。

目前，那不勒斯王国进入长期的、名副其实的衰落时期。起初，昂儒罗伯特在其统治之初还想利用以他为首的归尔甫派称霸意大利。当时，他还颇有实力：不仅掌握着南方王国、皮埃蒙特、普罗旺斯等地，一段时间内还是罗马、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执政官。不过作为三城诸侯转瞬即逝：在罗马，吉伯林派很快卷土重来；在佛罗伦萨，自从卡拉布里亚的查理故后，昂儒政权就此完结；在热那亚，1335年爆发的一场民众运动也断送了昂儒家族的统治。1330年后，昂儒在皮埃蒙特的统治也土崩瓦解，蒙费拉托侯爵火中取栗，趁机自肥。巴伐利亚人南征的失败没有导致罗伯特王称霸北意大利，而是巩固了各地大执政团政权，尤其是维斯孔蒂家族的权势。维斯孔蒂家族的发迹以及虽掌握在归尔甫派手中，但坚持独立自主的佛罗伦萨构成罗伯特帝国主义梦想的主要障碍。

除此之外，西西里战争也大伤其元气，耗尽力量。罗伯特王从未放弃收回西西里的打算。而阿拉贡的腓特烈王违反《卡尔塔贝洛塔和约》（见第55节），要求承认其子佩德罗为其继承人，并相继与亨利

七世、巴伐利亚的路易、维斯孔蒂家族以及其他吉伯林分子结盟；当然他也被教皇约翰处以绝罚。两主国间互有侵入，彼此骚扰沿海地区；罗伯特王还鼓动、支持西西里的流亡者和反叛者，但战争毫无结果，弄得两败俱伤。1337 年腓特烈故世，教廷宣布西西里应交还罗伯特王，但佩德罗二世仍继承王位（1337—1342 年）。佩德罗卒后，路易继承（1342—1355 年）。1343 年 1 月罗伯特王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他在世时，贵族利用他忙于外部事务，无暇内顾，趁机增强自己实力，使王室权力和良好的行政管理遭到破坏。辞世后，国内状态每况愈下。

第十章　维斯孔蒂家族　佛罗伦萨教皇国

61　执政团的性质

涉及许多地区，甚至波及意大利全境的归尔甫同盟和吉伯林同盟以及它们之间大规模的斗争现已销声匿迹；昂儒罗伯特的霸权政策也告失败。这标志着意大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执政团发展迅猛，意大利独立自治最后确立。

城市国家发展成执政团制度于十三世纪始于意大利北部，到十四世纪臻于完成，并扩展到意大利中部。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执政团共两家：一是伦巴第的维斯孔蒂家族，一是威尼托的斯卡拉家族。贡扎加家族的曼图瓦执政团介于两者之间，地位较弱。斯卡拉家族东面还有卡拉拉家族的帕多瓦执政团。伦巴第的其他一些城市曾有过一批贵族的临时执政团，后来均被大执政团吞没。波洛尼亚执政官属佩波利家族。皮埃蒙特的封建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城市执政团的性质，因为在蒙费拉托或萨沃依的古老封建领地上也出现了一些热衷于搞执政团的城市。在托斯卡纳，有卢卡、比萨和皮斯托亚的乌古乔内和卡斯特鲁奇奥执政团，以后还相继出现另一些执政团。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一样，也曾建立过临时的执政团，但它没有破坏城市国家的结构，也没有取消人民的自由。

建立执政团的渠道五花八门。有时，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或其他行政长官（特别是民众统帅和担负相当于民众首领的人）把临时职位变为终身职位；有时，两派斗争中胜利的一派推举自己的首领为执政官；有时，推举执政官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超脱两派或凌驾两派之上的首领。某些地方执政官是市民；另一些地方的却是外乡人。某个头面人物、某个古堡主或某个武装力量的统帅凭借武力，夺取政权，也不乏其例。即便如此，仍要求民众议会批准这一既成事实，以便使世人相信执政团所依靠的法制原则与城市国家无异：它是民众给的，也是民众意愿的体现。但是，表示这种意愿的方式至多是大议会上敷衍了事的欢呼，因大议会是在胜利一方的压力下召开的。民众授职外，还要取得皇帝的承认并受封皇帝代理人一职；在教廷土地上同样也要取得教皇的承认和代理人的职位（和城市国家的行政长官要取得承认一样）。为了具有更大的、更独立的权力，执政官们都乐于把这种授职看做是高于民众的任命。不管是民众授职，还是皇帝授职，一般来说执政团至少要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共和制的体制和法制。但它已无实质的内容，已丧失独立性。执政团就其本质和职能来看是君主专制。它依靠外籍雇佣军（参看下一节）。外籍雇佣军凭借执政官为了控制城市而筑造的城堡或古堡为其后盾。民众仍被排挤于政府之外，通常也无权参与政治生活。始于城市国家的已有几个世纪的政治教育发展进程，现已停顿，遭到破坏。政权的世袭制标志着执政团的君主体制已发展到全盛时期，这种世袭制也是既成事实，而后经过法律手续予以通过，当然也要由民众或皇帝加以批准。

除权力绝对集中外，执政团的主要特点是废除派性政府，即便是那些依靠一派的胜利而建立起的执政团也是如此。这样，执政团就有能力，也愿意对各派别、各社会阶级处事公正。贵族是最受执政团怀疑和打击的一个阶级。富有的有产阶级虽然失去了自由和政权，但在执政团治下却享受着更大的安全和社会安宁。贫民在城市国家时期并没有参政或很少参政，现在在执政团时期却得到了一些好处；由于失去权势的上层阶层的不满、骚动和阴谋，贫民成了执政团最可靠的支

持者。

从属于大城市的小城市和乡镇，从城市国家过渡到执政团制度中也受益匪浅。有时，大城市的执政官是依靠已掌握的权力来统治这些小城市的；有时，是大城市的执政官首先起来联合各地，并撇开各地居民自封为执政官。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领域广阔的执政团内部（有时几个执政官共管一个城市；有时一个执政官把他的执政团卖给另一个执政官）。总的来说，执政团在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在一个执政官的统治下几个城市的集结，两者并存的局面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几个城市集结于一个共同执政官的统治下，各地居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平等的。执政团制度正在成为由同一个人以执政官形式领导的各城市组成的统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领导的简单联合渐渐过渡到比较紧密的合并；各个地方自治逐渐让位于统一的体制和共同的地方长官，执政官就是通过这些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行使自己的行政管理的。统一的、集权的官僚政治正在开始形成，它凌驾于古老的选举制之上，或干脆取而代之。因而，就其广阔的领土和政府的组织而言，执政团代表了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城市国家是一城一国，现在是一个地区一国，其中央政府设立在一个大城市里，但它不再是这个城市的政府，而是整个领土的共同政府。

62　雇佣军团

随着执政团的建立，雇佣兵也大量增加，组建成雇佣军团。

城市国家初期，为进行防御性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一般采取按区分配名额的办法召募市民入伍，军队统一由城市国家行政长官指挥。这种军队不发军饷，士兵自备武器和粮草。军队由重骑兵（穿胸甲等）和轻步兵组成，主要是轻步兵；重骑兵花钱多，组建难，主要由封建主组成，而封建主只有部分隶属于城市。市民要经商，要做工，一旦应召入伍就遭了难。因此，城市国家的军队是临时性的，缺乏训练，装备不良，无法应付长期的、艰难的战争。而骑兵正在不断完善，日益加强，致使步兵更无法进行抵抗。

城市国家很快开始召募雇佣兵（士兵），封建主也应召入伍；他们有的为了赚钱，有的热衷于冒险。起初，雇佣兵仅是一些零零碎碎收集来的人或者必要时临时组成的一些小部队。后来，经常由外来的最高行政长官随身带来，或者由各城市从外面聘请来的军队统帅随身带来，形成军队的核心。慢慢地，市民几乎完全停止服役，而雇佣兵却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军团，由一头目率领。此头目当时叫做“雇佣兵队长”，由城市连同他的部下一起聘请来服役。这些庞大的军队经常从意大利的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所以称为雇佣军团。雇佣兵大部分是社会渣滓，他们凶狠，肆无忌惮，又因军饷少，发得晚，而变得非常贪婪。他们与路经的各个地方无任何精神上的联系，因此所经之处必遭其浩劫：抢劫、强奸、屠杀、苛捐杂税。在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里，雇佣军团已被严加管制或干脆彻底取消。但是，在意大利，因分裂成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它们之间战火连绵不断，雇佣军团就成了流动的、抢劫成性的“国家”，城市国家和执政官们对他们奈何不得，刮目相看。

雇佣军团一开始就由外国人组成并长期由外国头目统率，这也是造成雇佣军团破坏性的原因。由腓特烈王豢养的卡泰罗尼亚雇佣兵曾参加过韦斯普罗战争，又为签订《卡尔塔贝洛塔和约》效劳过，后建成军团，开往东方。由亨利七世、巴伐利亚的路易和波希米亚的约翰所带领的德国雇佣兵仍驻留意大利，组成一些仍不太大的军团，为许多意大利执政官所豢养，如：维斯孔蒂、斯卡拉、乌古乔内、卡斯特鲁奇奥等家族。后形成大型军团，立稳脚跟，独立行事，其统帅中，有两名维斯孔蒂家族成员——马尔科和洛特里西奥。这样，出现了“鸽子”军团（1335 年左右在托斯卡纳作过战，并把该地区掠劫一空）和圣乔治军团（由洛特里西奥率领）（见第 60 节）。大约 1340 年以后，整个意大利出现了一批外国雇佣军统帅，各自率领着相当大的雇佣军团，其中有：乌尔斯辛根公爵瓜尔涅里，“伟大军团”的首领，德国人，他穿着写有银字的“上帝和仁慈的敌人”的胸甲；前普罗旺斯骑士蒙德里尔，外号叫莫里亚莱修士；兰道伯爵；阿尼基诺·冯·

鲍姆加登；最后，尖嗓子约翰·霍克伍德，英国人，他的品德较高尚。

63　城市国家文明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大部分城市国家作为政体趋向没落的时候，恰好是意大利城市国家文明发展到全盛的时期。这部分归因于一种大家都熟悉的历史现象，可以称之为“延缓现象”，即政治经济活动之花需经一定时间后才能在文化领域里开花结果（有时也出现逆反现象）。但也要指出，这一阶段的意大利文明昌盛始于托斯卡纳和佛罗伦萨，因这里的城市国家仍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鉴于上述两种考虑，这种文明完全可以称之为城市国家文明。

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拉丁文学仍与国家生活紧密地、牢固地联系着。在神学哲学方面，过去意大利一直落后于法国。但到十三世纪中叶，由于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1225 或 1226—1274 年在位）和方济各会会长、红衣主教波纳文图拉·迪巴尼奥雷焦（1221—1274 年在位）崭露头角，意大利在这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反异教论》，特别是托马斯的《神学概要》——还有大量其他著作和小册子——因其论点清晰、稳健，很快成了经典著作。“托马斯主义”是一种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并夹杂有一些奥古斯丁学说和基督教的柏拉图哲学；它是当时天主教思想界主要倾向之一，后来成为迄今为止罗马教会的官方神学。《彼得·郎巴德〈教父名言集〉评注》（见第 47 节），波纳文图拉著，是一部题材非常广泛的作品。与托马斯的基督教理性主义相比，波纳文图拉更忠于奥古斯丁学说和柏拉图哲学，并带有一些神秘的直觉主义。在其他一系列的著作中，他还继承了维托里尼和托马斯·加洛的神秘主义(见第 47 节)，认为人类灵魂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等级才能到达上帝那里。

他们两人都热衷于新、旧约全书的注释，在这一方面也应提一下奥古斯丁会会长格列高利·达里米尼(1358 年谢世)。他们根据新、旧约全书的注释写下了不少布道经文，成了无数布道者中的两名成员。布道者中值得提到的是两位多明我会修士：乌戈·达普拉托(1322 年

卒）和比萨附近的巴尔托洛梅奥·达圣孔科尔迪奥(1347 年去世)。托马斯·阿奎那还留下一篇有关中世纪和基督教的政治理论的优秀论文，题名为《论君主统治》，但此文第二部分是托洛梅奥·达卢卡所写。奥古斯丁会修士埃吉迪奥·罗马诺(1316 年故世）也用同样的题目写了一本君主教科书。

在教会法规方面，因收集格列高利九世的教皇通谕（见第 48 节），造就了一批评论家；接着，在收集约翰二十二世的教皇通谕（见第 59 节）时，又出现了另一批评论家。这些教会法规评论家中最有名的要算焦万尼·迪安德烈亚·德尔穆杰洛，他是波洛尼亚大学教授，是彼特拉克的朋友。在法学方面，经罗马法学者的努力，民法仍优于教会法；这些学者抛弃过时的边注法，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对传统文献或做广泛的评注，或做较自由的加工。其中有波洛尼亚的小弗朗奇斯库斯·阿库索斯（1293 年去世）和奥多弗雷多·迪波洛尼亚（1265 年去世），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见第 59 节）三位名人：奇诺、巴尔托洛、巴尔多。波洛尼亚民众派领袖罗兰迪诺·德伊帕萨杰里（1300 年卒）编写了公证艺术手册，这本手册在城市国家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意大利受到特别崇敬的另一世俗学科是医学。接着就是丰富多产的文学。皮亚琴察的古列尔莫·萨利切蒂（1276 年故世）写了一本附有临床史的医学书，书名为《治疗概论》；教皇御医古列尔莫·迪布雷西亚（约 1300 年）出版了用经院式演绎法写成的《实用医学》；波洛尼亚的古列尔莫·瓦里尼亚纳（1300 年去世）在其所著的《医学秘密》一书中收集了不少偏方。

当时拉丁文学中空前流行的体裁是历史文学。其中不少是宗教和教会性质的文学。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吉内（卒于 1298 年，萨沃依附近的瓦拉采人）写的《金色的传奇》，是一本按教会年历排列的圣人传奇，为传奇文学之经典。托洛梅奥·达卢卡所著的《教会史》一直写到 1312 年，虽然（或许是因为）引用了众所周知的故事，却依然风行一时，人们争睹为快。世俗的历史作品，规模无可比拟，且更重要。当时相继出现了许多城市的编年史：《维罗纳城史》（直到

1278年），为帕里西奥·达切雷塔所著；《勒佐最高行政官回忆录》（1154—1290年）《热那亚城史》（至1297年），雅各布·达瓦拉吉内著；《一束花》，大约1336年以前的米兰大事记，加尔瓦内奥·菲亚马著；《威尼斯城史》（至1339年），安德烈亚·丹多洛执政官著。许多专门撰写当代大事记的作家的作品更重要、更生动、更真实，既是史记，又是艺术作品。这一类作品中有三部是写意大利南方的：《西西里史》（1250—1294年），吉伯林分子巴尔托洛梅奥·达内奥卡斯特罗著；《腓特烈二世及其后裔传》（1210—1258年），尼科洛·詹西拉著；《西西里大事记》（1250—1276年），归尔甫分子萨巴·马拉斯皮纳著。关于意大利北部的史著，方济各会修士萨林贝内·达帕尔马的《编年史》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史书之杰作。这部作品对政治和宗教社会做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描述，是同时期的作品不可逾越的。此外，较重要的还有：罗兰迪诺·达帕多瓦所著的《编年史》（约1180—1260年），此书提供了不少文献和诗歌；公证人费雷托·达维琴扎著的《意大利大事志》（1250—1318年）。文体优美、构思严谨的史志作品有：《奥古斯都史》和《历史》。前者是帕多瓦杰出的法学家和诗人阿尔贝蒂诺·穆萨托所著，写的是亨利七世南下；后者是米兰人焦万尼·达切梅纳泰所著，主要论述米兰和伦巴第的大事。

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探险活动，首先是出于宗教宣传，因此出现了一种描写遥远地区和人民的崭新文学，如：方济各会修士焦万尼·达皮安·德尔卡皮内所著的《蒙古史》。这一类作品中最杰出的是马可·波罗用法语写的《马可·波罗游纪》。

历史故事也采用拉丁语的史诗形式写出。红衣主教贾科莫·卡埃塔尼依据切莱斯蒂五世的生平事迹和卜尼法八世的当选史实构思长诗。但丁和焦万尼·德尔维尔吉利奥之间再次使用书信体这一经典形式互致诗信。上面已提到的阿尔贝蒂诺·穆萨托写下了二十篇书信体诗或布道经文。他亦是重振古典悲剧的先驱之一，著有着重描写同时期人物（埃泽利诺家族）的《爱瑟里尼斯》一书。这时期，既是拉丁文学巨匠亦是通俗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家有：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十三世纪中叶，是意大利通俗文学的全盛时期，并迅速赶上了法国北部和南部文学。因为通俗文学中消除了学者语言这一障碍，从而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表达当时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最初的意大利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法国文学和法国普罗旺斯文学的一种反映。所谓西西里诗派主要是模仿行吟抒情诗。腓特烈二世身边的一伙诗人就属于这一诗派，其中有：腓特烈本人、恩佐、皮耶尔·德莱维尼亚。西西里诗派传播到托斯卡纳，经圭托内·达雷佐（1294 年卒）等人之手诗风渐变，终于发展成波洛尼亚的圭多·圭尼泽利（十三世纪下半叶）和佛罗伦萨的但丁的朋友圭多·卡瓦尔坎蒂创立的“温柔的新体”诗派。此派创作出一种崭新的爱情抒情诗，其特点是细腻的心理分析，塑造理想的女性，特别是人物的感情非常奔放。但丁也采用这一诗风讴歌其青春年少。同时在民间出现了《赞美歌》，由方济各会和苦修兄弟会创作，最有影响的代表是雅各布内·达托迪（故于 1306 年）（见第 58 节）。在翁布里亚从一般采取对话形式的抒情赞美诗发展成戏剧和用俗语写的宗教剧。

但丁的老师，佛罗伦萨人布鲁内托·拉蒂尼受法国讽喻训世诗的启示，写出了《宝藏集简编》，随后又用法语编写了《宝藏集》一书，这是首批通俗百科全书之一，很快被译成意大利语。当时大部分意大利散文是阐述教育和道德的。法国其他形式的散文文学在意大利也广为传播，出现大量模仿之作，如：关于古代英雄小说，关于所谓布列塔尼英雄的传说，关于圆桌骑士的小说（西瑟、特里斯丹、朗斯洛等传奇国王）和一部分从法国小说和韵文故事中收集的短篇小说集（最著名的是《小小说集》）。

从十三世纪末开始，意大利文化发展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名列中世纪文化之首，并取法国而代之。十四世纪意大利文化，尽管大部分还是中世纪时期的文化，但就其内容和作者而言，都具有明显的非宗教性质；人们可以说，这是古代世界结束以来的第一批伟大的非宗教文化。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之所以能站在文艺复兴的前列，一方面归因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归功于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的再度繁荣。

从佛罗伦萨的历史以及亨利七世南下史中（见第59节），我们已知道了但丁·阿利吉耶里这个伟大的名字（1265—1321年）。但丁在《新生》和《诗集》两部著作中充分表现出他是“温柔的新体”诗派中的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其《神曲》给中世纪做了最深刻的总结，最成功地描写十四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风貌，充满了对和平与和睦的渴望，对正义的一腔热忱，对拯救意大利和人类的坚定信念。《神曲》从当时意大利丰富而又紧张的生活——从政治宗教一直到社会家庭、文艺科学——中吸收所需的各种营养。但丁用具有无限魅力的诗篇改变了政治和宗教、科学和历史的面貌。他的诗篇像雄鹰一样翱翔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文学之上。但丁在他的这部美妙绝伦的诗歌中，除了使用意大利语和欧洲其他语言中用之不尽的词汇外，还集中了所有描述自然的词汇，因此表达之深刻、感情之细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神曲》的变化万千、无穷无尽的描写里，前人业已使用的语言和诗行只是但丁赖以写作的工具，但他以其极大的创造力对其进行加工、提炼并发展之。蓦地，他将意大利的通俗文学提高到不低于古典拉丁语的水平，而大大超过了其他罗曼语文学。此外，他在《飨宴》一书中第一个用意大利语做哲学论述；他的《论俗语》是对罗曼语，主要是对意大利语做科学研究的；他另一部著作《帝制论》主要阐述吉伯林温和派反对教皇僧侣统治（见第59节）的理论，重申世俗政权应独立于教会的思想。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生于阿雷佐，其父是佛罗伦萨人。他的《诗歌集》继承了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爱情诗的遗产，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个性对这种诗加以改造，把它提高到极高的水平；他以极细腻的心理分析探讨了这些诗的内在感情；在这部《诗歌集》以及其他作品中，他还揭示了近代早期的思想与中世纪思想的矛盾。在拉丁语著作中，他开始从历史的、审美的角度，不是从中世纪的而是从现代的角度去理解古典文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文化。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也是一位古典文化造诣很深的作家。在《十日谈》中，他以独到的、纯世俗的艺术直感吸收了法国韵文故事（见本节）中的全部

题材，通过对日常现实的仔细观察塑造出一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世界，创立了一种仿效古代复杂的、华丽句子的意大利散文。

在他们的周围汇集有一大批水平较低的年史编纂家、小说家、诗人，其中最多的是托斯卡纳人。一部分人受上面三位作家的影响，另一部分人与中世纪传统难舍难分。这样，他们共同创立了意大利的文学语言。奇诺·达皮斯托亚（1337 年去世），白党分子，为“温柔的新体”诗派做了最后的、并非不成功的尝试。讽喻训世诗有：杜兰特的《花》是由法国名著《玫瑰花的故事》改写成二百三十二段的十四行诗；短诗《智慧》，可能是迪诺·孔帕尼的作品（见后面）；教理诗《辛酸》为著名星占学家切科·达斯科利所写，他自不量力地以此与但丁一争高低，1327 年死于火刑。锡耶纳的切科·安焦烈里，其诗风格独特，他写的滑稽诗主要描写自己的爱情和不幸的生活。他经常给但丁寄去一些带有挑衅性的诗篇，但其诗均具有现实主义和讽刺意义，有时还包含某些政治内容。政治诗水平也达相当高度，盛行于十四世纪中叶，以吉伯林分子法齐奥·德利乌贝蒂为代表，他要求建立一个意大利全民族的君主政体；他也是地理历史诗《世界命运》的作者，但丁也部分模仿过这部诗。许多政治诗人（特雷维索的弗朗切斯科·迪万诺佐、锡耶纳的西莫内·塞尔迪尼、又名萨维奥佐等）都希望意大利在吉安·加莱亚佐的统治下联合起来。

描写苦行主义的散文，十四世纪也非常盛行。它们是：收集有关圣方济各的动人传说的《圣方济各轶事》；多明我会修士多梅尼科·卡瓦尔卡·迪维科皮萨诺（卒于 1342 年）的《圣人传》和不少有关苦行主义的论文；另一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人雅各布·帕萨万蒂（1357 年去世）的《真正苦修的写照》；锡耶纳的圣卡泰里纳的书信和用对话形式写成的《神话》（见第 66 节）。短篇小说有焦万尼·菲奥伦蒂诺模仿薄伽丘写成的《懦弱的人》；佛罗伦萨的佛朗哥·萨凯蒂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收集到的无数饶有趣味的轶事。史书方面有白党分子迪诺·孔帕尼的杰出作品《编年史》，史书生动地叙述了 1300 年左右的佛罗伦萨历史；由另一个佛罗伦萨人焦万尼·维拉尼著的《编

年史》，仍按照一般编年史的传统从《圣经》中的“没有建成的通天塔”开始，但该书中心仍是叙述佛罗伦萨历史和当时所发生的大事。接着修史的是马泰奥修士和他儿子菲利波。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非常热爱拉丁文学。彼特拉克写了一首以英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主题的六音步诗《阿非利加》，颂扬古罗马精神。他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风格写了《田园诗集》，这是一部宣扬伦理、苦行的作品，其中以《我的秘密》或《可卑的天地》为主，诗章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神秘的中世纪人和强调尘世个性的现代人之间的内心矛盾。他还著有不少教育诗和大量的、极其重要的书信集。薄伽丘也用拉丁语写了不少教育诗，还有一些书信体诗文和田园诗。

如果说十三、十四世纪意大利艺术未曾超过通俗文学，但至少不低于通俗文学。当时意大利艺术是人民的宗教生活、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混合体，是人民生活的最高表现，又为人民所接受。十三世纪中叶，在法国盛行达一个世纪的哥特艺术传到了意大利。哥特艺术是真正的中世纪艺术，其中古老的东西已所存无几。它的基本特征是纵向线条，即：灵巧、高度和空间。这一倾向在建筑上和装饰上主要表现于高耸天空的尖顶和窗子、柱子的大量增加。其建筑内壁不太结实，为了支持拱穹的压力，在墙外砌上扶垛并加尖穹顶，这即是哥特风格的两个明显特点。在装饰上，它抛弃了罗马艺术中最爱用的那种奇异的图案，而采取写实手法，尤其喜欢采用花草图案。但是，哥特艺术的这些特点一般来说在意大利已不太明显；降低了高度，仍采用横向线条和坚固的内壁，很少使用扶垛、尖塔和尖穹顶。哥特风格主要是由西多会修士和苦修修士引进意大利的。在佛罗伦萨还保存有这一时期的不少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建筑：花城圣母玛利亚教堂，1296 年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1302 年辞世）奠基，完成于十四世纪；圣母玛利亚教堂旁边的钟楼，1334 年起始于乔托（见后面），但主要是由弗朗切斯科·塔伦蒂完成的；方济各会的圣克罗切教堂；多明我会的圣母玛利亚诺韦拉教堂。锡耶纳的大教堂也是意大利哥特风格的光辉古建筑。奥尔维耶托大教堂的哥特式正面是彩色装饰的杰作，但其内部仍

保持罗马风格，从艺术上看里面超过正面。

哥特风格也广泛应用于民间建筑上，尤其是应用于城市国家时期建筑的宫殿、大楼。十三世纪末，佛罗伦萨、锡耶纳和佩鲁贾的建筑最为优秀。腓特烈二世在南方的诸多城堡（如蒙泰城堡）是法国哥特风格的军事设施的显著例子。

同一时期内，法国的雕刻与哥特式建筑一样也有长足的进步，超过了罗马式的雕刻，其特点是：形式广泛，表达深刻，制作不拘一格，突出人物安详的性格。哥特风格的雕刻与罗马风格的雕刻一样，主要用于装饰教堂，以求达到教育目的。有些雕刻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宗教传说，将罪恶和美德人格化；有些是表现四季、农业劳动、艺术科学的作品。哥特时代的意大利雕刻也具有同样的主题和同样的作用。起初，以尼科洛·皮萨诺为代表的仿古派占优势，他是比萨圣洗堂布道台的创作者（1260 年）。他的追随者阿诺尔福·迪坎比奥（见前面）开始把古典风格与哥特图案结合起来。最有独创精神，最有才华的艺术家要算尼科洛的儿子焦万尼·皮萨诺（1320 年后去世），他完全采用哥特风格。其雕像姿态柔软，感情强烈（皮斯托亚和比萨的布道台以及一系列单独的雕像）。安德烈亚·达蓬泰德拉，又叫安德烈亚·皮萨诺（1348 年卒），为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创作了许多漂亮的浮雕。

意大利绘画最终摆脱了拜占庭的传统束缚，到 1300 年左右也达到了全盛时期。以彼得罗·卡瓦利尼为代表的罗马派着重研究古画中强烈的立体感和传统的协调表现形式。锡耶纳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杜奇奥·达博尼赛尼亚（1319 年去世），他从拜占庭传统中吸收了曲折的线条和装饰性的色彩，创作了一些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作品。杜奇奥之后，西莫内·马丁尼、彼得罗·洛伦泽蒂和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均是十四世纪初叶意大利绘画的骄傲。最后是佛罗伦萨派。十三世纪末大画家奇马布埃以他宏伟的场面、感人的动势而著称。但乔托（1267—1337 年）后来居上，超过了他（但丁在《炼狱》第十一章中对此有此定论）。乔托经历了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艺术训练，成为整

个艺术史上最有独创能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帕多瓦竞技场的小教堂、在佛罗伦萨的圣克罗切教堂以及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都留下了大量壁画，壁画的强烈立体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深刻的精神生活。他的艺术表达力可与但丁并驾齐驱。但丁和乔托的作品都是意大利精神生活最杰出的表现，并使其发展到顶峰。

在整整一个世纪——十四世纪内，乔托派不仅征服了佛罗伦萨，而且征服了整个意大利。但乔托派也受到锡耶纳派的很大影响。佛罗伦萨的乔托派中还应提到的有：塔代奥·加迪、安德烈亚·迪乔内，又名奥尔卡尼亚、贝尔纳多·达迪。托斯卡纳以外的画家要数维罗纳的阿尔蒂基耶罗、帕多瓦的瓜里恩托、莫德纳的巴尔纳巴和托马索。

64 维斯孔蒂家族和反维斯孔蒂联盟

维斯孔蒂·卢基诺（1339—1349 年在位）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但比阿佐内要严厉得多。为保持自己的权力，他变得多疑，特别对阿佐内的部长们和朋友们疑心颇重。这些人中有一位名叫弗朗切斯科·达普斯泰尔拉的人，与许多对公正不阿的卢基诺政府极为不满的贵族一起阴谋叛乱。阴谋败露后，大普斯泰尔拉及其同党一起被处死刑。从这以后，卢基诺的执政团政权再没受到干扰。

对外，卢基诺还把维斯孔蒂的统治扩展到阿斯蒂、博比奥以及帕维亚执政团的全部领土。在帕尔马他与埃斯特家族的奥比佐发生争夺，爆发战争（1345—1346 年）。参战的还有斯卡拉和贡扎加两大家族；战争的结果是，奥比佐把帕尔马割让给卢基诺。这一胜利后，托尔托纳、亚历山德里亚、阿尔巴、凯拉斯科以及皮埃蒙特和卢尼贾纳的其他一些小地方都自动臣服于卢基诺。

卢基诺卒后，其弟米兰大主教焦万尼出任政府首脑（1349—1354 年）。他是一个慷慨的执政官；爱护艺术和科学，与彼特拉克有着深交。但他也着意扩大维斯孔蒂的统治势力，并将其统治一直发展到罗马涅、托斯卡纳和利古里亚。波洛尼亚的佩波利家族，在教皇代表罗马涅伯爵的压力下，承认焦万尼为其执政官，但索取二十万费罗林金

币做交换（1350 年）。焦万尼从教皇那里获得代理人一职，又花去了十万金币。取得波洛尼亚，使维斯孔蒂握有托斯卡纳展开活动的基地。事实上，焦万尼立即着手与曾任过阿雷佐执政官的吉伯林分子塔拉蒂家族以及其他新近反抗过托斯卡纳各城市国家的封建主建立关系。当时，佛罗伦萨正与锡耶纳、阿雷佐、佩鲁贾结盟反对这些执政官老爷，并以武力征服了皮斯托亚（1351 年）。托斯卡纳同盟并无实力，因而于 1353 年与对手吉伯林派签订了和约；也不堪雇佣兵队长莫里亚莱修士手下的一群乌合之众一击，托斯卡纳的大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在内，都不得不向他缴纳巨额赎款（1354 年）。

维斯孔蒂征服热那亚之举很快在意大利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将伦巴第卷进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冲突之中，并把威尼斯与大陆政治紧紧地束缚在一起。

热那亚贵族内部分裂成归尔甫派（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两家族）和吉伯林派（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使该城不得不把自己的执政团政权托付给那不勒斯的罗伯托王，因为胜利的归尔甫派想从罗伯托那里寻求支持以便对付逃亡在外的、得到伦巴第吉伯林分子支持的热那亚吉伯林分子。内战也扩大到城市以外的领地和商业，因为其中一部分掌握在这一派的手里，另一部分又掌握在另一派之手。在罗伯托王的调解下（1331 年），两派重新和好，一起反对受教皇卜尼法八世（见第 55 节）的分封而占领撒丁岛的阿拉贡王，阿拉贡王的臣民卡塔洛尼亚人与热那亚人又是死对头和仇敌。不过，两派在城内很快重操干戈，这次吉伯林派取胜，昂儒在该城的执政团就此结束（1335 年）。于是，热那亚与阿拉贡媾和，不再反对阿拉贡对科西嘉岛的主权。

贵族间争吵不休，民众忍无可忍终于出面干预。1339 年 9 月，乘任命“民众长老”之际（见第 53 节），民众宣布由贵族西莫内·博卡内拉任执政官，为热那亚最高首脑。贵族与民众间又起风波，斗争使得执政委员会的组成不断变换，要么全是民众，要么是民众与贵族联合执政。这时，热那亚与威尼斯间战事爆发。威尼斯认定热那亚人买下希俄斯岛之举（1346 年）是对其贸易的威胁。威尼斯从阿拉贡王处

找到一盟友，即卡塔洛尼亚舰队。起先，热那亚人威风占尽；后来，在撒丁岛阿尔盖罗附近的洛耶拉一役，尼科洛·皮萨尼指挥的联合舰队全歼格里马尔迪所指挥的热那亚舰队。这样，热那亚前去投靠米兰大主教焦万尼的大执政团（1353 年），但要求规定尊重地方法律和行政长官的职权。

现在轮到米兰与威尼斯对抗。战争扩展到大陆，埃斯特家族、卡拉拉家族、贡扎加家族，后来还有斯卡拉家族一致与威尼斯结盟，共同对抗维斯孔蒂家族（1354 年）。开战之初，大主教焦万尼辞世（1354 年 10 月）。他的三个侄子（一个早死的兄弟之子）马泰奥二世、贝尔纳博和加莱亚佐二世都是焦万尼早已选定的继承人，瓜分了国家，但米兰和热那亚为共同所有。这时查理四世（见第 59 节）南下意大利，在米兰圣安布罗焦教堂取得王冠（1355 年 1 月）。反维斯孔蒂同盟妄图拉拢皇帝，恰恰相反，皇帝把代理一职封给了维斯孔蒂，当然维斯孔蒂又破费不少弗罗林，以资贿赂。同时，热那亚人在爱琴海的波尔托隆戈击败威尼斯舰队（1354 年 11 月）。同盟终于与维斯孔蒂达成停战。1355 年 6 月威尼斯和米兰、热那亚又签订和约。和约规定热那亚船只不得进入亚得里亚海，威尼斯的船只不得进入地中海比萨港到马赛之间的海域。翌年，在热那亚维斯孔蒂派与反维斯孔蒂派之间发生冲突（两派中都有贵族和民众参加）。以西莫内·博卡内拉为首的民众派取得胜利，重任执政官，免去贵族的一切公职。这样，后几届民众政府仍牢固地掌握在其继位者手里。当然民众内部各派之间不是没有公开的冲突和斗争。1378 年尼科洛·迪瓜尔科执政期间，贵族又重新获得一半公职。

在巴亚蒙特·蒂耶波洛阴谋推翻贵族政权后（见第 57 节），威尼斯也发生过几次骚乱，但并未动摇这一政权，相反却巩固了它。巩固政权的主要一步是正式建立“十人会议”（见第 57 节），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1335 年）。最后一次反对贵族政府是由执政官马里诺·法列罗阴谋策划的（也是出于个人的不满），他与民众密谋，企图建立与大陆执政团相类似的执政官个人权力（执政官的权力因寡头

政治的全面建立而被大大削弱)。“十人会议”发现这一阴谋，予以坚决镇压，法列罗被处死刑（1355年4月)。

威尼斯取得特雷维佐后，在意大利大陆上终于有了稳固的立足之地。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匈牙利王昂儒路易一世，以保住先前在达尔马提亚的滨海领地。扎拉城业已反叛威尼斯，投靠匈牙利王，但当时的匈牙利王尚无能力阻止威尼斯征服这座反叛的城市（1346年)。在最靠近伊斯特拉海岸地区也发生了卡波迪斯特里亚城的暴动（1348年)，但寿命更短。1355年与维斯孔蒂签订和约后，威尼斯直接与匈牙利开战；匈牙利王在卡拉拉的弗朗切斯科的支援下长驱直入，一直侵入到特雷维佐。特雷维佐虽作抵抗，但入侵者仍占领了威尼斯连通大陆的桥头堡梅斯特雷。达尔马提亚的特劳和斯帕拉托两城也起而暴动。威尼斯不得不于1358年签订《扎拉和约》，放弃在达尔马提亚所占的城市。

维斯孔蒂与伦巴第联盟停战期间，查理四世向托斯卡纳推进，佛罗伦萨同盟在其临近前夕解体。锡耶纳、沃尔泰拉以及靠近佛罗伦萨的圣米尼亚托纷纷臣服查理四世；在比萨，皇帝废除了甘巴科尔塔家族，自称执政官。佛罗伦萨也向皇帝宣誓效忠——无论是对亨利七世，还是对巴伐利亚，该城从未俯首称臣过——，皇帝则宣布承认佛罗伦萨的一切机构，不进驻佛罗伦萨城，也不派代理人进城。该城的执政长官和民众旗手还被任命为终身代理人。皇帝却从佛罗伦萨获得巨额钱财。

皇帝在罗马加冕（1355年4月）后，离开罗马（6月)，经意大利北部返回德国。早在这以前，他在托斯卡纳的执政团就已解体。在锡耶纳，贫民获胜，贵族失败。在比萨，贫民与老牌贵族共掌政府，而甘巴科尔塔家族仍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比萨——一直占有卢卡城——和佛罗伦萨的关系重又尖锐起来。佛罗伦萨竭力寻求自己的出海口，从锡耶纳人那里获得托斯卡纳沿海沼泽地带的塔拉莫内；同时禁止任何人同比萨做生意。这样，一场公开的战争爆发了（1362年)，村镇、田园深受兵燹之害。作战双方空前地投入大量外国雇佣军团。比萨人

招募鲍姆加登军团和尖嗓子霍克伍德军团，但佛罗伦萨人使用离间计，以重金贿赂鲍姆加登军团。最后，比萨银行家焦万尼·达涅洛与尖嗓子霍克伍德军团达成协议，轻而易举夺取了比萨的执政团，他本人被民众推举为执政官。他与佛罗伦萨媾和，和约对佛罗伦萨极为有利（1364 年）。同时，佛罗伦萨不断加强对瓦尔达诺地区，尤其是卡森蒂诺地区一些小城市及其贵族的统治，并进一步向外扩张，而后占领沃尔泰拉（1361 年）。

1356 年伦巴第战争重新爆发。这些年，佛罗伦萨隔岸观火，作壁上观。1355 年 9 月马泰奥二世身故；加莱亚佐二世和贝尔纳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西部归前者，东部属后者，随后米兰也被瓜分。反维斯孔蒂同盟得到三方面力量的支持而加强：焦万尼·维斯孔蒂·迪奥莱焦被派到波洛尼亚做代理人，他对同盟忠心耿耿；蒙费拉托侯爵焦万尼二世（1338—1372 年）；查理四世本人，因为维斯孔蒂在米兰让查理吃了闭门羹。皇帝任命蒙费拉托的焦万尼为伦巴第的新代理人，蒙费拉托在帕维亚的帮助下也出面反对维斯孔蒂，夺走阿斯蒂和他们在皮埃蒙特的其他领地。维斯孔蒂的军队围困帕维亚，但市民在奥古斯丁会青年修士雅各布·布索拉里说教的鼓舞下，顽强抵抗，在一次突围中摧毁了敌人的工事，将围攻者赶跑。在伦巴第东部，同盟使用兰道公爵的雇佣军团（见第 62 节），也旗开得胜。现在蒙费拉托侯爵从维斯孔蒂手里夺走诺瓦拉；最后热那亚（1356 年 11 月）也脱离了维斯孔蒂执政团政权。这时，联军——焦万尼侯爵不愿受兰道指挥而退出——在米兰和帕维亚之间被击溃。以后的两年中，同盟的几次野战均战绩颇丰，但维斯孔蒂的力量仍占优势。1358 年 6 月经威尼斯的调解，双方缔结了实质上维持现状的《米兰和约》。条约中没有提到帕维亚。不久（1359 年），该城被加莱亚佐二世占领。为此他与蒙费拉托侯爵重开战事。蒙费拉托侯爵雇用半野蛮的英国白色军团，并得到热那亚的支持。而贝尔纳博却妄图夺回在教皇特使阿尔博诺茨（见第 65 节）斡旋下由奥莱焦让给教皇的波洛尼亚。此次，意大利北部瘟疫流行（1361—1362 年），其可怕程度不次于 1348 年的那场灾难深重的

瘟疫；乔万尼·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见第63节）里提到那场瘟疫，读来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

65 科拉·迪里恩佐的冒险和教廷统治的暂时复兴

经阿尔博诺茨的努力，销声匿迹达二十年之久的教廷重又登上意大利的政治舞台。现在，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教皇势力不仅牢牢地恢复对原有教皇领土上的统治，而且还将其势力扩及整个意大利。

德尔波杰托红衣主教出走（见第60节），执政团和城市国家制度在他统治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自由发展。十三世纪在罗马涅建立的执政团继续存在：法恩扎有曼弗雷德家族；弗利有奥戴拉菲家族；拉文纳有达波伦塔家族；里米尼以及佩扎罗、法诺有马拉泰斯塔家族。在乌尔比诺和蒙泰费尔特罗两地仍由蒙泰费尔特罗家族统治。蒙泰费尔特罗家族在腓特烈伯爵时代，曾在一段时间内（约在1320年）将其势力向外扩张到安科纳边境省、卡利和雷卡纳蒂，甚至达到斯波莱托和阿西西。在马尔凯地区，卡梅里诺城执政官瓦拉诺家族的力量日益增长；为对抗蒙泰费尔特罗家族，他们投靠教皇，为其直接领导的政府争得教皇代理之称并取得安科纳边境省要职。

在翁布里亚——或称斯波莱托公国，虽早已没有公爵，只有教廷的地方行政官——城市国家制度还盛行。较大的城市国家是处于公国和托斯卡纳之间的佩鲁贾，由富裕有产阶级掌权。当然这里有产阶级与贵族、贫民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佩鲁贾是归尔甫派的天下，前面已提过它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本世纪中叶，佩鲁贾竭力向四周扩张，南面与福利尼奥、斯波莱托作战，并力求征服阿西西；北面为争夺卡斯泰洛、科尔托纳和蒙泰普尔奇诺三城同阿雷佐，特别是同锡耶纳争斗不休。

最为动荡的城市国家是罗马。贵族与民众矛盾重重，贵族内部分裂成奥尔西尼家族的归尔甫派和科隆纳家族的吉伯林派。形形色色的政权形式，或交替登台，或一起亮相：两名本城居民担任的大法官、外地人担任的大法官（最高行政长官的一种形式）——前两名法官是

由选举产生，后一种由教皇任命，但也有几次由民众选举——各区的统帅和民众统帅。意大利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之间、教廷与帝国之间的全面斗争，对罗马城也有很大影响。巴伐利亚人时期，吉伯林派与民众的联合政府倒台，昂儒的罗伯特重任大法官之职。但这并未阻止奥尔西尼家族与科隆纳家族之间严重折磨罗马城的斗争。由于教廷迁移，罗马丧失了获得大量财富的源泉，变得满目萧条，居民不足三万。传说圣彼得和拉特兰教堂野草丛生，成了牧羊场。

1337 年，民众要求本尼狄克十二世亲自执政，选他为共和国终身大法官、统帅和保护人，幻想以此促使教皇回到罗马，但希望幻灭。教皇仍按惯例任命两名大法官，共掌罗马城政府。1339 年的一次民众动乱，废除了两个大法官，依佛罗伦萨体制——为此专门请教过佛罗伦萨——选举十三个行会首领，其中一名任民众旗手和统帅。但教皇不予承认，民众被迫屈服。罗伯特王卒前不久（1343 年 1 月），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重新组成十三“能人”的民众政府。这次，新教皇克力门六世批准了这一变革，同时他被拥戴为罗马城的最高执政官。

在这种情况下，科拉·迪里恩佐作为使者派去觐见教皇，颇得教皇的好感。科拉·迪里恩佐本是一个小酒馆老板的儿子，从事公证职业。现被教皇任命为城市财产管理局的公证人。他是个天才，略通古典文化，极力颂扬古罗马和罗马帝国——他想象的罗马帝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众的政体——，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民众。他仇恨贵族，因他的一个兄弟死于贵族之手。好像他还自认为是亨利七世之子。从阿维尼翁回来后，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增，这也要感谢他所担负的公职。他与富裕有产阶级密反。1347 年（5 月 20 日）圣灵降临节那天，他召集民众于坎皮多利奥议会厅，组建新的民主政府，把斯特凡诺·科隆纳和其他一些老爷赶出罗马城。教皇驻罗马的代理人批准这次变革。在一次会议上，科拉“按照我主耶稣基督之意志”担任起罗马共和国行政长官一职。这是一个古典式的、民众的政府，同时又是一个神权政府；它应该成为世界复兴，尤其是意大利复兴的肇始；为此科拉致函教皇、国王、君主以及各城市，邀请意大利各城

市与罗马结成“神圣同盟”。但他仅仅得到佛罗伦萨、锡耶纳和佩鲁贾的响应和帮助。不久以后，他甚至以罗马民众代表自居传讯教皇和皇帝。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激发起不少人的巨大热情（其中就有彼特拉克），这反映了当时一种模糊的、不甚明确的意愿；但这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起初，罗马贵族装出服从新政府的样子，不久就在他们的坎帕涅领地上武装谋反。在罗马城下的一次交战中（1347 年 11 月），科拉战胜对手，斯特凡诺·科隆纳战死。但是科拉没有乘胜追击，至坎帕涅，却解散军队。于是，罗马城被围，城内饥馑遍地；为筹措款项，科拉向民众加征军税。教皇特使红衣主教贝特朗·德德乌斯与贵族结盟，威胁处科拉以绝罚，并以异端罪审判他。科拉被迫服从教廷的最高旨意，取消其具有皇帝权力的一切称谓。教皇并不轻饶，照样颁布判决训令；但在训令送达罗马前，贵族密反引起一场小小的动乱。鉴于民众支持甚微，科拉灰心丧气．愤然辞职（1347 年 12 月），隐退圣安杰洛古堡中。而后，他从古堡和罗马城遁逃，栖身阿布鲁齐，与“灵修”派（见第 59 节）隐士接触，以图实现其新的复兴美梦。最后避难于皇帝查理四世处，被皇帝押解到阿维尼翁教廷。教皇特使贝特朗在罗马重新设立两个大法官，恢复原来的政体。为安抚各派，复苏已瘫痪的城市，宣布 1350 年为教皇规定的大赦年（见第 58 节），把原规定一百年一次的大赦改为五十年一次。但是，大赦年一过，又天下大乱，出现各种各样的政体，一句话，处于无政府状态。

新教皇英诺森六世（1352—1362 年在位）看到教廷国家濒于全面崩溃，遂派红衣主教埃吉迪奥·阿尔博诺茨全权整顿国家。阿尔博诺茨是西班牙的一位显贵，从事宗教生涯前，曾与摩尔人作过战，是一位相当能干的政务活动家。1353 年 8 月他来到意大利，首先前往拉齐奥北部镇压当地豪强维科家族，因几代罗马行政长官均出自该家族（久已成为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故而人称维科行政长官。为此目的，阿尔博诺茨与罗马新的民众政府首脑弗朗切斯科·巴龙切利法官达成协议：在他的帮助下，阿尔博诺茨铲除维科行政长官。已和教皇和解

的科拉·迪里恩佐跟随阿尔博诺茨作战，在罗马人的要求下，阿尔博诺茨任命他为行政长官。科拉身负重任凯旋罗马（1354 年 8 月）。此时，他急需钱用，向掠夺了大量钱财的莫里亚莱修士（见第 62 节）的兄弟们借贷。后来，莫里亚莱到罗马索债，科拉将其逮捕，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此举使他声名狼藉，招致叛徒的恶名。但所获款项入不敷出，更何况很快与科罗纳家族重开战事，科拉追加各种苛捐杂税。此事以及其他专制独裁行为引起众叛亲离，民众疾呼："处死征收苛捐杂税的叛徒。"科拉再次丧失信心，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企图逃离坎皮多利奥宫；但被民众认出，将他处以死刑（1354 年 10 月）。于是，阿尔博诺茨任命了一位新行政长官。

一些小执政官和其他武装人员的参加，加之查理四世手下的德国人的帮助，阿尔博诺茨的力量大为加强；他打算从马拉泰斯塔家族开刀收拾罗马涅和马尔凯的一些执政官。马拉泰斯塔家族被迫签约，不过条约并不苛刻，只规定交出新近夺取的领地，里米尼、佩萨罗和法诺仍属马拉泰斯塔家族所有，但须缴纳年贡。阿尔博诺茨征服马尔凯的其他地方后，任命其侄子为当地主管。现在唯一的劲敌是弗朗切斯科·奥戴拉菲。除福尔利外，他还掌握着福林波波利、切赛纳、卡斯特罗卡罗和伊莫拉等地。奥戴拉菲顽强抵抗达数年之久；而法恩扎的曼弗雷德一触即溃，丢失了全部土地，除教皇封地巴尼亚卡瓦洛外，其余尽丧。阿尔博诺茨被召回普罗旺斯，不久又返回罗马涅。1359 年终于征服奥戴拉菲，只允许他临时掌管福林波波利和卡斯特罗卡罗两地。蒙泰费尔特罗家族也只有乌尔比诺和卡利两块领地，任该地的教皇代理。阿尔博诺茨还为教廷弄到了波洛尼亚（见第 64 节）。最后，他把矛头转向佩鲁贾：割取阿西西、瓜尔多和其他土地，迫使佩鲁贾屈服。

简言之，阿尔博诺茨按下述方针谋求建立教廷统治：消灭或尽量缩小地方执政团政权，尽可能把城市置于教廷的直接统辖下；同时，为确保这一统辖，他把各地的地方长官安置在受其控制的城市的要塞内（不少要塞还是他建立的）。为确保改革的成功，他颁布了一系列凌驾于任何地方章程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如：《马尔凯-安科纳宪

法》，其部分条款一直到十九世纪仍有效。

阿尔博诺茨红衣主教对罗马的影响甚微。科拉彻底垮台后，民众力量日益加强，老贵族被民众政府完全清除。红衣主教在外省进行的战争也有助于这一发展。现在教皇每六个月任命一个外地人为罗马行政长官，其作用类同于十三世纪最高行政长官。从1358年起，除了行政长官外，民众还按照佛罗伦萨执政长官的模式组成"共和国改革者"七人团，成为城市国家的真正首脑。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只能由小贵族和平民担任。同时还建立了一支按区组成的军队（弓弩手和盾牌手），由两名作为最高统帅的"旗手"指挥。军队的任务是维持公共秩序，保证司法判决的执行，镇压贵族老爷。但是拉齐奥的贵族们仍在抵抗。罗马城市国家——与其他大城市国家一样——几世纪以来竭力想征服周围地区，即坎帕尼亚地区，但从未如愿以偿。除贵族老爷的抵抗和教廷的干预外，还有不少城市在抗击罗马，如北边有维泰尔博，南边有韦莱特里。这几年罗马一直在与后者作战，后经阿尔博诺茨的调停，双方签订了和约。此外，阿尔博诺茨还准备承认罗马城市国家建立的新的民主制度。

66 教皇、维斯孔蒂和佛罗伦萨 教廷迁回和教廷大分裂

教廷重占波洛尼亚后，与维斯孔蒂家族发生了直接冲突。维斯孔蒂·贝尔纳博对教廷一向傲慢不敬、向神职人员强行征税——无视神职人员的豁免权。为反对贝尔纳博，阿尔博诺茨鼓动小执政官结盟，其中有：费拉拉侯爵尼科洛·勒佐执政官、贡扎加家族的费尔特里诺、帕多瓦执政官卡拉拉家族的弗朗切斯科、斯卡拉家族的坎西尼奥雷。一般来说，同盟在军事上略占优势，何况蒙费拉特侯爵在西面又进逼加莱亚佐，成功地插入米兰地区内。

但是，从整体上看维斯孔蒂的统治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经法王、匈牙利王和皇帝的调解终于签订和约（1364年）。和约对贝尔纳博来说，除了彻底放弃波洛尼亚、偿付巨额赔款（五十万费罗林金币）外，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加莱阿佐仍占有帕维亚、阿尔巴和诺瓦拉，

只有阿斯蒂归蒙费拉特侯爵。

这样，意大利出现安定的局面，重建教廷国家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在此情况下，英诺森六世的继任者乌尔班五世（1362—1370 年在位）打算把教廷迁回罗马。意大利人热情地鼓励他，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用雄辩的言辞说服他（见第 63 节）。他提醒教皇务必深明此举之意，否则基督要问他何以喜欢阿维尼翁而不喜欢罗马，彼得也会告诉他他虽然明知要死于罗马，还是回到了罗马（《你往何处去》传说）。1367 年 5 月乌尔班五世到达热那亚，经海路进入教廷国家，驻在维泰尔博。就在这里，阿尔博诺茨代表整个教廷国家向教皇表示致意。不久（8 月），阿尔博诺茨病故，这是教皇的严重损失。十月教皇在意大利万众欢呼声中进入罗马。可是，彼特拉克和许多人为半岛所期待的那种巨大好处并没有等到，盼来的却是战火重燃。罗马城市国家内倒有几年太平的、有秩序的生活。乌尔班五世任命了一个外地人为行政长官，还另组了一个范围更小的“城市财产管理局”三人团，代替过去的七人团，其权力与七人团一样。而“旗手”改名“执法者”行使权力。十二名区首领和行会执政官仍在议会和各理事会中占有席位。与此相反，在意大利北部战争重新爆发。1367 年 8 月乌尔班组成了一个新的反维斯孔蒂同盟，就其成员的数量和重要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同盟，其中有：教皇、皇帝、萨沃依家族、埃斯特家族、贡扎加家族、卡拉拉家族和匈牙利王路易。这一次维斯孔蒂争取到了斯卡拉家族，并招募了尖嗓子约翰的英国军团（见第 62 节）。

1368 年战争开始，查理四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南下参战。同时，教皇又一次对维斯孔蒂家族处以绝罚，号召全体基督教徒拿起武器反对维斯孔蒂家族。皇帝在前往罗马途中再次插手意大利中部事务，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丰厚。在比萨他撤了焦万尼·达涅洛执政官之职，任命一代理人，实际上政府很快又被“肥人”夺回。在锡耶纳，他也任命一代理人，当他从罗马返回时，那里的民众群起而攻之，值得庆幸的是，民众放他一条生路，他溜之大吉（1369 年 1 月）。于是，比萨的执政团被交给了皮耶罗·甘巴科尔塔。先前曾被阿涅罗执政官让

给皇帝的卢卡，后来以一笔巨款做交易，才被皇帝宣布为直属帝国，就是说卢卡获得了自由，其政府由以正义旗手为首的元老主持。本世纪末，归尔甫分子圭尼吉才成为该城执政官，执政达三十年。

同时，佛罗伦萨民众政府中“肥人”的力量日益加强，他们利用归尔甫派统帅，肆意谴责吉伯林主义（这对平民特别不利）。被谴责者，或者说被警告者，再也无法在政府中任职。这种滥用警告的办法最后成了一种谋利的源泉。在纯归尔甫主义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寡头政治，其头子是阿尔比齐家族；与之对抗的是支持贫民的里奇派。

在反维斯孔蒂战争中，皇帝却没有惊人之举，他很快签订了停战协议，接着缔结全面和约（1369年2月）。但是，由于贝尔纳博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已渗入到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损害了佛罗伦萨和教皇的利益，佛罗伦萨、教廷、那不勒斯王国、比萨、卢卡、波洛尼亚、埃斯特家族、贡扎加家族和卡拉拉家族重又结盟。贝尔纳博应付裕如，很快又缔结了一个新的和约（1370年11月）；不过，时隔不久战事重又爆发。在西面攻击加莱阿佐的不是蒙费拉特侯爵焦万尼（1372年3月故世），而是伦巴第的皇帝代理人萨沃依家族的阿梅代奥六世（见第67节）。

这样，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以及北部的一大部分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维斯孔蒂称霸的威胁。偌大的同盟也没有严重损伤对方的实力。尽管发生过几次地方起义，但维斯孔蒂家族仍牢牢控制着整个统治区。在维斯孔蒂统治下的城市内已无政治生活可言（只有贵族和个人的派别活动）：他们在那里建立极权制度，实行警察统治；独断专行，施行野蛮镇压（臭名昭著的加莱阿佐二世“四旬斋”，即对国家罪犯施以长达四十来天的酷刑），用恐怖手段使市民俯首帖耳。但是，他们保持各阶级之间的平等公正的政策，维持公共秩序和内部和平，从而繁荣了经济生活，他们也从中捞取大量钱财，用以维持军事力量和奢侈无度、挥金如土的生活。民众越来越被动、消极。社会生活更如死水一潭，堕落腐败。维斯孔蒂统治者却心满意足。再说联盟方面，缺乏团结，没有统一领导，力量不足，只有佛罗伦萨在同盟中还占有一定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优势。那不勒斯王国入盟只是临时的、名义上

的，因此联盟中主要强国就是佛罗伦萨和教皇。佛罗伦萨入盟是出于共和制对维斯孔蒂专制的真切的憎恶，出于挽救其在托斯卡纳的地位，甚至也是出于挽救其本身的独立，因此佛罗伦萨的参加不仅被其敌人维斯孔蒂憎恶，而且也引起其盟友教皇的警惕。

由于法国红衣主教的压力和其他原因，乌尔班五世于1370年9月重返阿维尼翁，12月在该地去世。随即又选了一位法国人为继任人，号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年在位）。他倾其全力于俗权，认为俗权是导致教廷重返罗马的必要基础，因为整个意大利都在不断恳求教廷迁回罗马，而他也有这一打算。代表这种愿望的有：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宗教幻觉相当灵验的瑞典公主布里吉达，以及锡耶纳平民卡特琳·贝宁卡萨或称圣卡特琳·达谢娜（1347—1380年）。卡特琳，由于她的圣名、高尚的宗教感情以及特殊的精神天赋，在某些阶层中享有很高威信，因之她也为当时的政治事务当顾问。

1371年，佩鲁贾发生贫民反对拉斯潘蒂家族的动乱，要求臣服教皇，教会的俗权因之得到进一步加强。派去的教皇特使在那里实行专制统治。无论佩鲁贾的教皇特使还是波洛尼亚的教皇特使都在阴谋挖锡耶纳、阿雷佐和佛罗伦萨的墙脚，以图扩大教廷在托斯卡纳的统治。整个托斯卡纳——佛罗伦萨、锡耶纳、阿雷佐、卢卡、比萨——加上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和那不勒斯王后乔安娜结成同盟，一致反对神职人员对世俗权力的欲望，鼓动教廷国家内部起来造反。阿尔博纳茨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的良好制度已岌岌可危；而教皇派出的地方长官仍在施行暴政，搜刮民脂民膏。造反的浪潮遍及各地：一部分地方建立起执政团政权，另一部分地方——主要是佩鲁贾和波洛尼亚——要求享有城市国家的自由（1375—1376年）。

格列高利十一世又转而反对佛罗伦萨人，他认为佛罗伦萨人怂恿结盟，煽动造反——他们还不断征用教会财产——，因而宣布处以绝罚，禁止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并劝说所有教会朋友没收他们的财产，让他们沦为奴隶。教皇派了一个最坏的家伙——日内瓦伯爵罗伯特红衣主教——领兵出征。他率领一支最野蛮的军队——布雷托尼军

队——，开始在波洛尼亚地区作战（1376 年）。佛罗伦萨人也在积极准备迎战，他们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长官机构，即战时八人团，民众称之为“八圣人”。教廷的谴责一开始就在罗马、那不勒斯、阿维尼翁以及（可能程度小一些）在法国、佛兰芒地区和英国给佛罗伦萨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一些君主和国王尽量利用这一机会逮捕佛罗伦萨商人，没收他们的大量财富。但是“八圣人”和佛罗伦萨全体民众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并得到了民众中的宗教人士的支持。

在这期间，教皇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意大利。1377 年 1 月格列高利十一世进入罗马。他与罗马城保持和睦关系，同意其建立共和制政府；还与曾建立过自己政权的维科行政长官言归于好，承认其拥有部分领地；与波洛尼亚也达成协议，该城接受教皇委派的一位代理人，而教皇方面同意保留该城原有的制度。切塞纳城起来反抗布雷托尼人，终于被红衣主教罗伯托制伏，该城百姓惨遭屠杀、女人被强奸、财物被掠夺，这一行径在意大利引起了公愤和厌恶。维斯孔蒂家族中，加莱阿佐第一个与教皇和解，随后贝尔纳博也倾向于和解，并接受教皇的要求，充当教廷与佛罗伦萨人之间进行调解的角色。佛罗伦萨人一直在顽强地进行战斗，并把教皇豢养的尖嗓子雇佣军团挖了过去。他们把大部分费用加在教士身上并勒令神甫无视褫夺圣职的禁令。锡耶纳的圣卡特琳也从中斡旋，一方面指责佛罗伦萨人顽固不化，另一方面天真地劝说教皇不要太关心世俗利益；但由于她极不慎重地依靠了归尔甫派作为对佛罗伦萨的警告，反而招来了佛罗伦萨民众的反抗；她的斡旋宣告失败。最后，因得不到托斯卡纳以外同盟者的支持，佛罗伦萨与托斯卡纳盟友一起同意参加在萨尔察纳召开的大会进行谈判。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贝尔纳博本人外，还有代表乔安娜王后、热那亚、威尼斯和法王的大使。但是，直到格列高利十一世去世（1378 年 3 月），大会仍毫无结果。

1378 年 4 月 7 日在罗马举行秘密会议，参加的十六个红衣主教中只有四个是意大利人。罗马民众害怕教廷重新迁走，于是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罗马人，至少是意大利人当教皇。”第二天，红衣主教们

选举了巴里大主教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为教皇，这是最后一个非红衣主教当选的教皇，取名为乌尔班六世。他是意大利人，但也是法国昂儒家族的臣民。起初罗马民众误认为罗马红衣主教泰巴尔代斯基当选；当真相大白后，没有反对，教皇得以顺利登基。尽管选举是在民众骚动的某种压力下进行的，仍获一致通过，完全合乎规定。红衣主教们也正常地出席了乌尔班登基和加冕典礼，参加了教皇主持的枢机会议以表示乌尔班是合法的教皇。但是，时隔不久，由于改良者过分热忱，新教皇又实行专横统治，十一个法国红衣主教和一个西班牙红衣主教大为愤慨，聚集于阿纳尼地方，宣布（8月）乌尔班教皇为篡位者，是在武力压力下选出的，并决定处乌尔班以绝罚。他们路过丰迪城，与三个意大利红衣主教一起选举切塞纳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日内瓦红衣主教罗伯托为教皇，称克力门七世（9月20日）。阿尔贝里科·达巴尔比亚诺所指挥的圣乔治意德雇佣军团在马利诺附近击溃法国教皇的布雷托尼雇佣军团（1379年4月），克力门七世仓皇跑到那不勒斯，求助其拥护者乔安娜王后，然后经海路到了法国（1379年6月），设宗座于阿维尼翁。这样就出现了阿维尼翁教皇克力门七世（1378—1394年在位）和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1423年在位贝德罗·德卢纳，西班牙人），同时在罗马又有教皇乌尔班六世（1378—1389年在位）、卜尼法九世（1389—1404年在位）、英诺森七世（1404—1406年在位）和格列高利十二世（1406—1415年在位）。

乌尔班六世当选的情形，同时代人并不太清楚，所以许多人自然会认为乌尔班的当选为非法。于是，基督教徒分裂成两个阵营，分别支持罗马教皇和阿维尼翁教皇，这就是西方教会大分裂（1378—1415年）。承认这个或那个教皇自然与各种政治原因有关。支持克力门七世的有：那不勒斯王国、法国、西班牙、苏格兰、萨沃依家族和一些日耳曼国家。帝国及欧洲其他地区承认乌尔班。两个教皇都颁布通谕，处对方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因此等于全体基督教徒都遭绝罚之罪。其结果是：信徒思想极端混乱，教士无视纪律现象日增，神职人员道德败坏日烈，教廷威信渐减。此外，基督教徒要同时供奉两个教廷，其

状况因教廷的重税而空前恶化。两个教皇大量分封，并竭力从封地的贡赋中捞取钱财。在意大利政治史上，教会大分裂的主要影响是：教廷国家的形成整整推迟了半个世纪，教廷称霸意大利的可能性完全消失。教皇与佛罗伦萨的战争也迅速结束，因为乌尔班六世匆忙放弃了前任大部分的经济要求。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维斯孔蒂和反维斯孔蒂派间的战争也偃旗息鼓多年。

67　意大利各国特殊发展的道路　意大利雇佣军团

吉安·加莱阿佐，又名维尔图（仁慈）伯爵（得名于其在香槟地区的封地维尔图斯）于1378年继任其父加莱阿佐二世，被文策斯劳斯皇帝封为伦巴第代理人，这引起其叔父贝尔纳博的不悦。吉安·加莱阿佐采取温和政策：废除或减轻刑罚；减轻税收；尊重教士；撤除在小城市专横跋扈的统帅；严格监督所有公务人员。自然，贝尔纳博的臣民内心向往这一政府，而最近几年，贝尔纳博性情变得越来越凶残，据说还想除掉侄子。吉安·加莱阿佐抢先一步：在米兰的一次会面时，突然逮捕贝尔纳博及其子女（1385年5月）。米兰城大议会批准了这一暴力行动，宣布维尔图伯爵为唯一执政官。是年十二月，贝尔纳博猝亡于狱中，也许是被毒致死。

我们来看看蒙费拉托和萨沃依是怎样参加伦巴第战争的。萨沃依家族在十四世纪分成两个支系，主要一支为萨沃依伯爵，另一支是其陪臣阿卡亚王子——他们已掌握了阿尔卑斯山南大部分土地，包括都灵。昂儒罗伯特王故后，萨沃依家族又获得了昂儒在皮埃蒙特的一部分领土，其中有库内奥。于是，萨沃依家族力量大增，成了蒙费拉托侯爵的对手，但是在约翰二世（1338—1372年）执政时期，后者仍占优势。1349年，约翰二世与萨沃依伯爵阿梅代奥六世（1343—1383年）——又名绿衣伯爵，因他通常着绿色衣服——之间达成协议，共管伊夫雷亚，但敌对状态并没因此而结束。绿衣伯爵曾一度与维斯孔蒂的加莱阿佐二世结盟，共同反对蒙费拉托，并在卡纳韦塞地区夺取了一些土地。这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政策，因为实行这一政策意味着要

冒使极其强大的维斯孔蒂家族在皮埃蒙特取得优势的危险。因此，约翰二世一死，绿衣伯爵立即加入反维斯孔蒂同盟（见第66节），以保卫其继承人。在这场战争中他大败维斯孔蒂家族的盟友萨卢佐侯爵，硕果累累。

阿梅代奥六世的祖父阿梅代奥五世曾远征罗迪，和马耳他骑兵团并肩迎战土耳其人（传说佩戴萨沃依王室最高骑士勋章——圣母玛利亚勋章——的项带上的 Fert，意即：征服罗迪的力量）。为了支持其堂兄帕里奥洛加斯皇帝约翰五世，绿衣伯爵仿效祖父，亦东征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一行动也许是想确立其在帝国的权力，但与蒙费拉托的帕里奥洛加斯家族（见第56节）的利益相冲突。这是一次一般性的、幸运的冒险活动，对东方的局势或对萨沃依王室政权均无长远的影响；不过此举提高了伯爵的威信。1383年，阿梅代奥六世谢世，其子阿梅代奥七世继承，称为红衣伯爵（1383—1391年）。由于尼斯居民不服昂儒第二王室的路易一世的统治，而甘愿臣服红衣伯爵，他遂不费举手之劳把尼斯及其伯爵领地并入他所控制的国家。

137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间又烽火连天。正是这场战火使威尼斯共和国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战争的起因还是在东方的老矛盾：威尼斯称霸塞浦路斯，热那亚人梦寐以求的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特内多斯岛落入威尼斯手中，在君士坦丁堡争夺势力范围。热那亚人除与卡拉拉人结盟外，还取得匈牙利王和阿奎莱亚牧首的支援；这两个外国大国在意大利东北边境上施加压力。威尼斯只能依靠塞浦路斯王、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和阿拉贡王的不太热情的友谊。战事遍及意大利和地中海。热那亚人在安齐奥港被威尼斯海军司令维托尔·皮萨尼击败（1378年）。威尼斯舰队夺取了卡塔罗以及达尔马提亚的其他海上要塞。但是，1379年，一支热那亚舰队袭击了在波拉停泊修理的皮萨尼舰队，夺走了所有舰只。逃出来的皮萨尼被投进威尼斯的监狱。热那亚人就此占领基奥贾，从而切断威尼斯与伦巴第的通道，并坐镇马拉莫科：威尼斯的腹地深受威胁。此外，匈牙利-帕多瓦联军包围了特雷维佐，该城进行顽强抵抗。但是威尼斯并未因此而丧胆：他们从东方

召回威胁佩拉的卡洛·泽诺分舰队，并由私人出资在威尼斯泻湖建一新舰队（允诺授予出资者以贵族称号）。新舰队的司令仍是获释的维托尔·皮萨尼。热那亚人在基奥贾受挫并被围（1379 年）。泽诺舰队也赶来紧缩包围圈。热那亚的几支援助部队救援未果。最后基奥贾投降（1380 年 6 月）。这时出现在热那亚的反倒是泽诺率领的威尼斯舰队——皮萨尼已故（1383 年 7 月）。但是特雷维佐仍被卡拉拉的弗朗切斯科紧紧困住，威尼斯人只好忍痛割爱，把它让给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经萨沃依伯爵阿梅代奥六世调解，1381 年双方缔结《都灵和约》。泰内多岛被抛弃，成为无人居住区；威尼斯放弃塞浦路斯保护国，与热那亚重签航海旧协议。和约也涉及希腊皇帝。威尼斯还被迫向匈牙利支付巨款，同时也限制匈牙利的贸易和航海。威尼斯与阿奎莱亚牧首商定，可给愿意归顺他的的里亚斯特城以自由，但保留威尼斯的某些特权。翌年，该城又臣服奥地利公爵——几年前他从戈里齐亚伯爵手中继承了整个伊斯的里亚地区——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但仍继续向威尼斯进贡，直到 1500 年。威尼斯与帕多瓦维持现状，盐业生意依旧。现在，卡拉拉家族为了特雷维佐正与奥地利公爵作战，结果公爵得到一笔赔款，才把特雷维佐让给了卡拉拉（1384 年）。继卢森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也来染指意大利事务，插足威尼斯。

威尼斯贵族政府日益巩固，执政官的权力大为削弱。民众议会已无任何意义，不再参与官员的选举，也很少举行会议。

热那亚的情况恰恰相反。1383 年，执政官瓜尔科与管理财政的特别行政长官意见相左，后者企图限制执政官的权限。民众趁机暴动，反对消费品税，以胜利告终。民众本身又分裂成“肥人”和贫民两派。贫民的领袖是安东尼奥托·阿多尔诺，他早已是瓜尔科执政官的竞争者。但“肥人”选举莱奥纳尔多·达蒙塔尔多为执政官，阿多尔诺派也准备予以承认。莱奥纳尔多宣布大赦，指定十五名贫民为执政官顾问，减少葡萄酒和肉类税收，还宣布了其他废除事项。在莱奥纳尔多执政时期，塞浦路斯王雅克蒙·德路西南割让法马古斯塔给热那亚。1384 年 6 月，莱奥纳尔多遭瘟疫暴卒。阿多尔诺顺理成章地继承执

政官之职。他一切遵守前任旧制，公正执法，热那亚城享受多年太平。

这几年佛罗伦萨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早在乌尔班六世签订和约前，党派冲突已相当尖锐；战争八圣与美第奇家族都站在里奇家族一边。阿尔比齐家族想一手遮天，独家主宰佛罗伦萨城，但遭到民众旗手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的断然反对。这一举动为贫民铺平了道路，他们在1378年7、8月间突然举行暴动反对大资产者和政府，要求采取有利于流放者和债务人的措施，要求为那些至今仍从属于行会的徒工建立自己的行会。梳毛工、梳理工、印染工都不愿意再从属于羊毛行会，要求单独组织起来，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体制。起义中，称为琼皮的梳理工表现最为突出。最后，贫民占领了执政团宫，宣布一名叫米凯莱·迪兰多的琼皮为旗手和执政官。他着手组织一个由"肥人"、中间阶层和贫民平分秋色的执政团政府，并企图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贫民所获实惠不太多，再举义旗。迪兰多动用手中的武装将贫民打倒。新行会被解散，贫民意志一落千丈，米凯莱·迪兰多的权力也丧失殆尽。历史车轮倒转，里奇派取得短暂优势后，"肥人"、归尔甫统帅以及阿尔比齐家族卷土重来，把持朝政(1382年)。

这几年内，那不勒斯王国也曾一度重登意大利政治舞台。早在昂儒罗伯特治下，王国已呈败象；到他故后，益发风雨飘摇，成朽木之势，贵族老爷极尽损害王权和居民权益之能事，以图扩大自己的权势。昂儒王朝各支系——匈牙利、塔兰托、杜拉佐——竞相拉帮结派，把一个王国搞得支离破碎，乌烟瘴气。王位由短寿的卡拉布里亚公爵查理的年少女儿乔安娜一世（1343—1381年）继承，由一监护委员会辅弼。她由祖父做主嫁给匈牙利王昂儒路易一世的兄弟安德烈亚，以便巩固其地位。但事与愿违，安德烈亚另有所图，一心想自己南面称孤，亲理王政。于是夫妇不和，加之安德烈亚举止粗鲁，而乔安娜生活奢靡，行为放荡，从而加重矛盾，彼此反目。这样就形成了两派——匈牙利派和那不勒斯派，后来由于昂儒家族两个支系的参与，那不勒斯派又细分为杜拉佐派和塔兰托派。教皇作为王国的最高执政官从中干

预，宣布由安德烈亚登基，乔安娜也表示同意。加冕前，安德烈亚在阿韦尔萨被谋杀（1345年9月），从各种可能情况来看，乔安娜是同谋。

这时，乔安娜主要依靠塔兰托的昂儒分子，并与其一名叫路易的结婚（1347年8月），封之以王爵，授之以王权。于是，王国内部塔兰托派与杜拉佐派阋于墙。这时，匈牙利王路易一世要求安德烈亚的遗腹子在他本人的监护下继承王位，公开指责乔安娜同谋弑夫之罪，并南下意大利，侵入王国（1347年底）。乔安娜与路易·迪塔兰托逃往普罗旺斯避难，杜拉佐派遭迫害。路易一世遣安德烈亚之遗腹子于匈牙利，幼儿不久夭殇。路易占领整个王国，留下一代理长官，返回匈牙利（1348年）。

与此同时，乔安娜贿赂阿维尼翁教皇一笔巨款，即被宣布无罪。1348年，她偕同丈夫路易荣归那不勒斯。战争连绵达数年，王国惨遭破坏。后来，匈牙利王路易一世准备缔结和约，路易·迪塔兰托由教皇特使加冕登基（1352年）。但是，王国的那些贵族老爷更加肆无忌惮，放浪形骸，相互厮杀，大动干戈，摧残着整个王国。另外，塔兰托派和杜拉佐派旧隙又起。尽管如此，乔安娜和路易还有暇他顾，干预西西里事务，因为在西西里王路易（见第60节）以及其弟腓特烈三世（1355—1377年）统治时期，岛上发生了以阿拉贡的韦拉斯科为首的卡塔卢尼亚人与又称“拉丁”派的基亚拉蒙特人之间的争斗。后者以路易·迪塔兰托为靠山；有一段时间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区承认这对昂儒夫妇为西西里王，他们两人亲自去墨西拿（1356年末）参加西西里臣民的臣从仪式。不久，腓特烈又恢复优势，1372年缔结和约，规定西西里仍属阿拉贡王室，但又作为那不勒斯和教皇的陪臣。

1362年路易·迪塔兰托辞世，乔安娜改嫁给西班牙的阿拉贡人贾科莫·迪马霍卡，此人既无王爵也无王权，多数时间寓住于王国之外。贾科莫亦亡，再嫁与鄂图·布伦瑞克，此人的情形与贾科莫类同。乔安娜的所有儿子不幸夭折，那不勒斯昂儒家族的最后一位男嗣是查理·迪杜拉佐，却定居匈牙利，与迄今仍敌视乔安娜的路易王一个鼻孔出气。后来，乔安娜被乌尔班六世的粗鲁举止所激怒，并在法王的

煽动下，宣布承认乌尔班的对手克力门七世（见第66节）。于是，乌尔班宣布她为裂教者、异教徒，剥夺其王权，并把王国赠送给匈牙利王路易。路易如今已年迈体弱，任命查理·迪杜拉佐为其代理人。

乔安娜为保护自己，收昂儒第二王室的始祖法王查理五世的兄弟昂儒路易一世为养子。克力门七世授之以王国。执政伊始，他立刻征服了普罗旺斯。但查理·迪杜拉佐抢先一步；由乌尔班教皇封位加冕。他在王国有许多拥护者，他们为他打开那不勒斯各城门（1381年7月）。女王乔安娜一世在“新城堡”进行短暂抵抗后投降。而后，王国出现一个支持法国昂儒人的派别，乔安娜与此有涉，查理派人将其一网打尽，尽行杀戮（1382年5月）。此时，昂儒路易一世率大军赶到，王国的贵族老爷纷纷加入。查理三世采取以逸待劳、伺机行动的战术，消耗敌人力量，顶住了敌人进攻，最后路易卒于比谢列（1384年），查理三世仍是王国的唯一执政官。

刚刚摆脱敌手，查理与乌尔班六世发生严重冲突。乌尔班是一个粗暴的、贪得无厌的家伙，一直在为自己、为家族，特别是为其侄子弗朗切斯科·布蒂洛争夺领地，实际上查理给了他大片土地。乌尔班来到王国，与查理发生公开对立。教皇被围于诺切拉；解围后，宣布判国王绝罚，把王国移交给教廷。这些并没有动摇查理的地位。然而，查理并没有着手巩固王国，而是跑到匈牙利去继承路易一世（故于1382年）王位；加冕后不久被刺。于是，昂儒第二王室的路易二世（路易一世的儿子）与少年拉迪斯拉斯展开了一场争夺那不勒斯王位的长期斗争。昂儒派又冒了出来，它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法国对意大利的影响和干预远比昂儒第一王室时期广泛得多。

十四世纪末期，外国雇佣军团和雇佣兵队长由意大利雇佣军及其队长取代。这些军队比较安定，比较守纪律，比较人道。雇佣军队长都是国家首脑。意大利的小执政官，小君主都热衷于从事雇佣兵队长这一职业。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这些雇佣军团几乎是意大利军队的唯一形式。它们不论在战术上或在战略上对战争艺术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十一章　意大利各公国的形成和斗争

68　吉安·加莱阿佐称霸

吉安·加莱阿佐成为维斯孔蒂国家独一无二的诸侯后（见第67节），制订了一项比其前任更为严密的扩张计划。为达目的，他首先离间可能的敌人。第一个目标是威尼托。他先与卡拉拉的弗朗切斯科（他已从奥地利公爵手中夺得费尔特雷和贝卢诺两地）联合，占领了斯卡拉家族控制的地盘（1387年）；而后，和威尼斯签订条约，瓜分卡拉拉的领地。弗朗切斯科·诺韦洛，因其父放弃帕多瓦而接管了该城，已向维斯孔蒂称降（1388年），维斯孔蒂不费吹灰之力将帕多瓦和其他一些城市据为己有；特雷维佐和切内达两地，根据条约归属威尼斯。

这时，吉安·加莱阿佐的目光转向意大利中部，他与埃斯特、贡扎加两家联合，进攻波洛尼亚，向佛罗伦萨宣战。佛罗伦萨城的阿尔比齐寡头政治空前加强（见第67节），对外搞扩张政策。1384年佛罗伦萨夺取了阿雷佐，为争夺蒙泰普尔恰诺同锡耶纳发生冲突。因此，锡耶纳与吉安·加莱阿佐联合。这样，加莱阿佐趁机插足托斯卡纳，煽动吉伯林派，获取锡耶纳的执政团政权。

弗朗切斯科·诺韦洛与佛罗伦萨达成协议，并在德国招募一批士

兵；亲自率军直指弗留利地区，在威尼斯人的鼎力相助下，几乎夺回了全部失地，其中包括帕多瓦（1390年）。相反，维斯孔蒂同佛罗伦萨的两个雇佣兵队长之间的战争进展顺利，法国人阿曼涅克伯爵在亚里山德里亚城下被维斯孔蒂的雇佣兵队长雅各布·达尔韦尔梅击败并俘获，另一名雇佣兵队长尖嗓子被赶出艾米利亚，他已无法保护托斯卡纳，抵御雅各布的入侵。1392年签订和约，规定卡拉拉重新占有帕多瓦，维斯孔蒂占有巴萨诺、贝卢诺和费尔特雷。佛罗伦萨与维斯孔蒂也商定互不干预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事务；于是锡耶纳重获自由。

鉴于其臣民和其他意大利政府仍取敌视态度，吉安·加莱阿佐认为应利用皇帝的承认，来巩固其广阔的领地。于是，罗马国王文策斯劳斯册封吉安·加莱阿佐为公爵，将米兰公国和帕维亚伯爵领地（1395年）封给他。这又促使德意志——帝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干预，作为平衡，他又谋求与法国查理六世结盟。在此之前，吉安·加莱阿佐已把阿斯蒂以及其他皮埃蒙特的领地作为嫁妆送给了与查理六世兄弟奥尔良的路易结婚的女儿瓦伦蒂娜，使法国人再次涉足意大利（1387年）。法王一直渴望获得热那亚执政团政府；其奢望与吉安·加莱阿佐的图谋相抵触，因此转而站在反维斯孔蒂一边。1396年9月他在巴黎与佛罗伦萨、费拉拉、曼图瓦、帕多瓦签约结盟。不久（10月），热那亚因内部纠纷迭起（从1390至1394年，四年间总计发生了十次革命），自愿臣服法王，但派别纠纷（直到布锡考特元帅出任该城总督）并未因此而缓解。布锡考特政府强而有力，大力整顿秩序，废除一些市民的主要机构，从而迅速扭转局势。这样，通过各种渠道（见第67节），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纷至沓来，干预意大利事务：按巴黎同盟规定，法国人在伦巴第又获得了一些领土。

吉安·加莱阿佐之所以能够顶住巴黎同盟以及以后出现的各种联盟，部分归因于他的外交手腕，但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罗致当时出类拔萃的雇佣兵队长，如：阿尔贝里科·达巴尔比亚诺、雅各布·达尔韦尔梅、法奇诺·卡内、卡洛·马拉泰斯塔。于是，他开始进攻贡扎加家族（1397年）。贡扎加家族得到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其他盟友的援助。

当时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一起代表以共和制原则对抗君主制度，以均势政治反对霸权政策的一方。维斯孔蒂则采取不触动曼图瓦的策略，并与之缔结停战协议（1398 年），接着签订和约（1400 年）。这样维斯孔蒂分裂了佛罗伦萨的意大利北部盟友，达到孤立它的目的。因此他又能把目标对准托斯卡纳。

在比萨，甘巴科尔塔执政团被雅各布·达皮亚诺废黜（1392 年）。吉安·加莱阿佐与其结成紧密联盟，但雅各布小心地保住了独立。他故世后，其子盖拉多以二十万弗罗林金币把比萨让给了吉安·加莱阿佐；但他仍掌握皮翁比诺和厄尔巴岛，其家族对这两地的统治达两个世纪之久。吉安·加莱阿佐重又获得锡耶纳执政团政权（1399 年），此外还夺得佩鲁贾、阿西西、斯波莱托和诺切拉。他还从马拉斯皮纳家族手中夺走卢尼贾纳，并在卢卡支持圭尼吉家族的反佛罗伦萨派，不久圭尼吉家族领卢卡执政官之职。

在德国，亲维斯孔蒂的文策斯劳斯被黜，由宫廷选帝侯罗伯特接替。罗伯特在卡拉拉人、佛罗伦萨人（这样佛罗伦萨转而采取尊重帝国的政策）以及教皇的怂恿下，南下意大利，矛头直指吉安·加莱阿佐，并宣布不承认其公爵之位。但是，当罗伯特的军队刚一冲人布雷西亚地区就遭维斯孔蒂军队的迎头痛击（1401 年），他只得掉头北逃，弃意大利而走（1402 年 4 月）。这时，吉安·加莱阿佐开始部署决定性的攻击。他断然击败波洛尼亚执政官本蒂沃利奥，被万众欢呼为该城执政官（1402 年 7 月）；又乘胜驱兵四面封锁佛罗伦萨，竭力争取威尼斯的支持，同时积极筹备一旦攻入佛罗伦萨即刻举行自称意大利王的加冕大典事宜。时值意大利瘟疫肆虐，他于 1402 年 9 月 3 日染疾暴亡，享年五十五岁。

吉安·加莱阿佐·维斯孔蒂在对外政策上大胆、精明，吉星高照；在内政管理上积极、公道、宽宏大量。他延聘著名法学家修改米兰的各种章程，汇编成一部法典。他启用有才干的人组成政府，管理国家，尤其是内政部，其第一任部长是一位威尼斯贵族卡洛·泽诺。在其他城市，他也大力加强和集中公国的行政管理，组成统一的、直属于他

的行政机关，并由上述中央政府协助领导。各地方行政长官和章程——对此进行了系统的修订——仍予以保留，但必须服从公国的官员和法令。他命令拆除各地执政官所建的古堡和城堡，未经其允许不得新建。他维护国家对教士拥有的权力，即有权任命神职人员，教廷只能加以确认；禁止接受未经其批准的教会采邑。他建设巨大的公共工程，促进工业、艺术和文化的发展。1386 年，他开始建造米兰大教堂，这才是在意大利真正可以称谓哥特式的宏伟古建筑。1396 年，他着手建筑帕维亚的切尔托萨大教堂，这也是一座相当辉煌的古迹，在其内部已可看到文艺复兴的艺术。他革新帕维亚大学，聘请当时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任教。他还创立一所绘画学院和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69　维斯孔蒂国家的危机和威尼斯陆上统治区的形成

根据吉安·加莱阿佐的遗嘱，长子焦万尼·马里亚继承米兰公爵爵位，拥有领地米兰、科莫、洛迪、克雷莫纳、布雷西亚、贝尔加莫、皮亚琴察、帕尔马、雷焦、波洛尼亚、锡耶纳和佩鲁贾。次子菲利普·马里亚为帕维亚伯爵（隶属公爵），其领地有：帕维亚、诺瓦拉、维切利、亚历山德里亚、托尔托纳、维琴察、维罗纳、特兰托海岸、巴萨诺、费尔特雷和贝卢诺。被承认为合法的私生子加布利埃莱拥有比萨、萨尔扎纳和卢尼贾纳地区的领地。三兄弟年幼无知，遗嘱要求成立以寡妇卡泰里娜公爵夫人（贝尔纳博之女）为首的摄政团，其成员有维斯孔蒂手下最杰出的雇佣兵队长阿尔贝里科·达巴尔比诺和雅各布·达尔韦尔梅；还有公爵的亲信侍从长官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瓦拉。

很明显，对维斯孔蒂强大深为忧虑的大国趁机进行报复。埃斯特家族、卡拉拉家族、佛罗伦萨和罗马教皇卜尼法九世结成同盟。同盟施用离间之计，争取到阿尔贝里科的反叛，这给维斯孔蒂以沉重一击。同时，在米兰发生了反对巴尔巴瓦拉和公爵夫人的动乱，因为他在公爵夫人的支持下企图独揽大权。两人被推翻，公爵夫人被捕下狱，不久卒于大牢（1404 年 10 月）。

其时，维斯孔蒂统治不断解体，而吉伯林派和归尔甫派，特别是归尔甫派在伦巴第崛起。伦巴第的许多城市出现或恢复了地方执政团政权。摄政团与教廷缔结条约，割让波洛尼亚、佩鲁贾以及翁布里亚的其他城市。锡耶纳赶走了米兰总督，与佛罗伦萨言归于好。加布利埃莱·维斯孔蒂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虽然比萨人作过抵抗，但是佛罗伦萨由于得到焦万尼·甘巴科尔塔的支持终于占领了该城，甘巴科尔塔也被封为民众统帅（1406 年 10 月）。

在威尼托，卡拉拉家族企图利用维斯孔蒂的衰落，壮大自己，但与重返维罗纳城的斯卡拉家族结怨。卡拉拉家族逮捕了斯卡拉家族成员，占领维罗纳。接着，又与威尼斯结仇，因为米兰已把威尼托全部领地让给了威尼斯。威尼斯向卡拉拉家族发动了一场毁灭性战争。维罗纳和帕多瓦被占（1405 年）；老弗朗切斯科和弗朗切斯科·诺韦洛被捕，于威尼斯处决（1406 年 1 月）。这样，威尼斯共和国取代各地执政官和维斯孔蒂家族，成为威尼托地区的主宰。此事至关重要：一方面威尼斯终于成了意大利大公国之一；同时，吉安·加莱阿佐时期显露出的意大利统一的迹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事实上，当时米兰之强可以一面威镇威尼托，一面震慑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中部——吉安·加莱阿佐的势力或已荡及，或将薄近这些地方。而威尼斯地处偏远，难于征服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同时精力过于分散，海外利益仍是其真正强大的基础。这些年来，威尼斯收回了扎拉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大部分是那不勒斯王拉迪斯拉斯（曾短期称匈牙利王）让出的；一小部分是奉献的。匈牙利王、帝国皇帝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德起而反对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弗留利和威尼托的扩张。弗留利的阿奎莱亚牧首统治区一直是帝国封地，而在威尼托地区帝国支持斯卡拉末代家族。但是战争（1411—1413 年）于他不利，最后签订了停战协议。

威尼托领地丢失后，维斯孔蒂国家在伦巴第也有解体的危险，一直忠于维斯孔蒂的统帅们开始自做打算，有些执政官趁机夺取维斯孔蒂的土地。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吞占布雷西亚；奥托博诺·泰尔佐侵占皮亚琴察、帕尔马和雷焦；法奇诺·卡内独得亚历山德里亚、诺

瓦拉、扎尔托纳，维切利归蒙费拉托侯爵所有，但他必须与萨沃依的阿梅代奥三世达成协议，因为阿梅代奥怀抱扩张野心。

在维斯孔蒂这片残存的领土上，各派、各雇佣兵队长间明争暗斗，都欲谋取霸权。雅各布·达尔韦尔梅战胜竞争者法奇诺·卡内后，企图在公国重整秩序和司法，但没有得到无能的、残忍的（甚至让他豢养的狗撕吞活人）焦万尼·马里亚公爵的支持。于是，雅各布离开被法奇诺·卡内、其他雇佣兵队长以及周围的执政官紧紧围住的米兰。焦万尼·马里亚与其弟菲利普·马里亚、萨沃依公爵以及热那亚的法国总督布锡考特结盟。威尼斯反对布锡考特，因他与斯卡拉末代家族以及卡拉拉家族站在一起，而这两个家族一直想返回维罗纳和帕多瓦。布锡考特一度占领了米兰，但背后的热那亚反戈一击，转而臣服蒙费拉托侯爵（1409 年 9 月）。不久，布锡考特在诺维遭法奇诺·卡内痛击，被迫逃离意大利。法奇诺·卡内由公爵任命为米兰政府首脑兼管帕维亚政府，并以全力改组国家，收复失地。在他身患重病期间，米兰贵族阴谋推翻公爵，趁公爵在圣戈塔尔多教堂做弥撒之际将他剪除（1412 年 5 月 16 日）。当夜法奇诺·卡内故于沉疴。菲利普·马里亚立刻娶寡妇贝娅特丽克丝·德滕达，从而占有其全部领地，进入米兰，封为公爵（1412 年 6 月）。

70　那不勒斯王国的扩张　西西里与阿拉贡联合

吉安·加莱阿佐·维斯孔蒂企图从北方称霸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却企图由南方称霸意大利。杜拉佐与昂儒的斗争直到 1400 年才以拉迪斯拉斯取胜而告终：路易二世离开王国，回到普罗旺斯。这时，拉迪斯拉斯跑到匈牙利去再冒风险，排挤路易一世的女婿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德（见第 67 节），并在扎拉加冕为匈牙利王。此时，昂儒派正好借他远离之机兴风作浪，其首领还是圣塞韦里诺家族。拉迪斯拉斯火速赶回，平定叛乱，严惩圣塞韦里诺家族及其他叛乱分子，没收其财产。

拉迪斯拉斯回到那不勒斯王国后，开始向意大利中部扩张，也是

为了夺取前沿阵地，防止昂儒家族卷土重来。意大利中部的教会国家目前又回到阿尔博诺茨以前的局面：除了留驻的或返回的执政官外（曼弗雷德家族在法恩扎，奥尔德拉菲家族在福尔利，达波伦塔家族在拉文纳，马拉泰斯塔家族在里米尼，蒙泰费尔特罗家族在乌尔比诺，瓦拉诺家族在卡梅里诺），新添了如福利尼奥的特林奇家族。格列高利十一世在其晚年曾任命过大法官为罗马城的行政首脑（有一段时间，杜拉佐家族的查理任过此职），同时保留罗马城的共和体制。从1383年起，“财产管理局”三人团和“旗手”重掌政府。后来乌尔班六世不顾民众的抵制，重又任命罗马城的大法官。

卜尼法九世（1389—1404年在位）来自那不勒斯托马切利家族，于1390年和1400年举办大赦年庆祝活动，乘机拼命捞取钱财以自肥。为此目的，他也在教会国家内分封许多执政官和共和制城市为其代理人；他们除缴纳年贡外，还不时要支付一定的款项。他采用这种办法不仅从税收中捞取了巨大好处，而且重新建立了教廷最高统治权。在罗马，几经周折，他终于废除了旗手，削去了手工业行会和弓弩手、盾牌手会社的政治权利。城市由任期六个月的、外地人担任的大法官以及“财产管理局”三人团管理，但均须服从权力不断增长的教皇。为了牢牢控制罗马，他修复并加固了圣安杰洛古堡，在梵蒂冈构筑防御工事；重建坎皮多利奥的大法官官，增设防御工事。在拉齐奥南部，卜尼法九世战胜丰迪·奥诺拉托。卡埃塔尼伯爵，几乎没收其全部领地，从而加强了教会统治。吉安·加莱阿佐故后，教皇从公爵政府收回了翁布里亚诸城市。

在与昂儒家族斗争中得到卜尼法九世承认和支持的拉迪斯拉斯成了教皇的忠实盟友，为教皇恢复统治，大力效忠，提供兵源。但是，只是在来自阿布鲁佐区米廖拉蒂家族的英诺森七世（1404—1406年在位）继承卜尼法九世后，那不勒斯王才开始确立其在教会国家中的权力。他作为仲裁人干预新教皇与罗马城市国家之间的纷争，使罗马获得较多较大的自主权；在罗马，他还努力争取一派的支持，希望成为该城执政官。他从教皇那里谋取到坎帕尼亚和马里蒂马两地（拉齐奥

南部）总督之职，任期五年；后来又获得罗马教会的保护人和旗手称号。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二世（1406—1415年在位）时期，一位威尼斯人科雷尔乘教皇忙于解决教会大分裂的谈判不在罗马之机，轻易地占有了罗马（1408年4月），并任命一名大法官为其管理城市。他把其统治区从罗马扩大到拉齐奥和翁布里亚。当时，格列高利十二世正忙于与教会中主张通过大公会议解决大分裂的一个派别进行斗争，无暇他顾，使他有机可乘。实际上，大公会议已在不附属于任何一个教皇的比萨召开（1409年3月），会议废黜两教皇，另选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后由约翰二十三世继承（1410年），这样就形成三个教皇并存的局面。格列高利十二世把教会国家的政府交给拉迪斯拉斯，以求支持，反对大公会议派。拉迪斯拉斯借口反对比萨大公会议，保卫真正教皇，进军托斯卡纳。

如同先前反对吉安·加莱阿佐称霸一样，佛罗伦萨与锡耶纳、大公会议派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昂儒路易二世结盟，共同抗衡拉迪斯拉斯霸权；当然，昂儒路易二世结盟是为了寻求支持，重新涉足那不勒斯王国，其时正是法国人布锡考特企图在意大利北部扩张势力的时候。同盟组织了一支军队，其中有两名雇佣兵队长：罗马涅人穆齐奥·阿滕多洛，别名斯福尔扎和翁布里亚人布拉乔·达蒙托内，又名福尔泰布拉乔。这两人日后注定要青云直上，官居要职。与联军刚一交锋，拉迪斯拉斯军队即溃败，只好撤退，罗马失守（一直到1409年12月）。失守后，罗马首先承认亚历山大五世，后又承认约翰二十三世。约翰于1411年4月进驻罗马城，格列高利十二世避难于那不勒斯地区。这时，路易二世进而侵入那不勒斯王国，在罗卡塞卡地方击败拉迪斯拉斯（1411年5月）。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这样使强有力的拉迪斯拉斯得以补充新生力量，反扑过来。路易二世只得撤离王国（7月），返回普罗旺斯。

约翰二十三世与拉迪斯拉斯讲和（1412年），任命他为教会旗手。格列高利十二世去里米尼的马拉泰塔家族那里避难。拉迪斯拉斯撕毁协议，派已投奔他手下服役的斯福尔扎占领马尔凯，自己亲自夺取罗

马城（1413 年 6 月）。约翰逃至托斯卡纳，后去波洛尼亚避难。拉迪斯拉斯重又侵入托斯卡纳，企图进军波洛尼亚，又是佛罗伦萨阻住了他，迫使他签订协议。由于拉迪斯拉斯生活荒淫无度，贪恋酒色，其生命于 1414 年 8 月 6 日过早凋谢，其姐乔安娜继承王位（1414—1435 年）。

虽然圣安杰洛古堡仍留在那不勒斯人之手，但那不勒斯在教廷国家中的统治已垮。相反，布拉乔·达蒙托内的力量在教会土地上崛起，成了翁布里亚许多城市，其中包括佩鲁贾的执政官。他借口为将来教皇看守城市，甚至占领罗马，下榻梵蒂冈（1417 年 6 月）；几乎随即被乔安娜二世派来的斯福尔扎赶走。

约翰二十三世在帝国皇帝西吉斯孟德的压力下召开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 年），会议宣布其权力高于教皇，废黜约翰二十三世，接受格列高利十二世的弃职书，废黜本尼狄克十三世，选举科隆纳家族的马丁五世为教皇（1417 年 11 月）。马丁五世几乎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承认，教会大分裂终于结束。

正当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妄图称霸意大利中部的时候，西西里岛开始脱离意大利大陆。1377 年腓特烈三世故世，其女玛丽娅即位；但阿拉贡王佩德罗四世不承认玛丽娅为正宗，把西西里的权力交给次子老马丁，而老马丁又传给其子小马丁。阿拉贡人与西西里人（更确切地说西西里岛上的阿拉贡派和西西里派）之间爆发战争。阿拉贡人获胜，女王玛丽娅被捕，押送西班牙，与小马丁结婚。小马丁于 1392 年在巴勒莫加冕为西西里王。但岛上的战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末。玛丽娅（1402 年）和小马丁（1409 年）相继故后，阿拉贡王老马丁宣布自己继承。不久他辞世（1410 年）。阿拉贡王室无嗣绝后，因此出现了一段空位和混乱时期，直到西西里人同阿拉贡人一样也承认老马丁姐姐之子斐迪南多·迪卡斯蒂利亚，于是阿拉贡王国和西西里王国联合（1412 年）。

71　维斯孔蒂公国重建　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斗争

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继承米兰公爵（1412—1447 年）后，

短短几年就恢复了维斯孔蒂在伦巴第的领土；部分通过谈判所得，部分以武力征服，因为他有幸得到一位骁勇善战的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布索内·达卡尔马尼奥拉的效劳。除亚历山德里亚和其他一些城市是贝娅特丽克丝·德滕达——后因怀疑不贞被他置于死地——作为嫁妆带来外，他又收复了洛迪·科摩、克雷马、维切利、皮亚琴察、克雷莫纳、贝尔加莫、布雷西亚和帕尔马，最后，于1421年夺得热那亚（这里已于1413年恢复执政官职位，废除蒙费拉特执政团政权）。至此，维斯孔蒂公国重建完成。夺取热那亚后不久，维斯孔蒂怀疑卡尔马尼奥拉不忠，遂与之绝交。卡尔马尼奥拉转入威尼斯，鼓动其反对公爵。当时，佛罗伦萨也在那里游说，因它曾企图阻止公爵在罗马涅地区的扩张，阻止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屡被维斯孔蒂的雇佣兵队长击败（1423—1425年）。

其时，威尼斯与西吉斯孟德皇帝、阿奎莱亚牧首重开战事，战果辉煌。费尔特雷、贝卢诺、乌迪内以及整个弗留利都落入威尼斯之手。阿奎莱亚牧首只得议和（1421年），仅能得到阿奎莱亚和几个古堡。接着，威尼斯向达尔马提亚进逼，拔扎萨拉后（见第69节），或诉诸武力，或施以压力又拔特拉乌、斯帕拉托和卡塔罗三城。从此，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威尼斯文明也在那里开花结果。威尼斯共和国进一步向南深入，占领多尔奇尼奥、斯库台和阿尔巴尼亚的其他海上要塞，加上1387年科尔富的归顺，终于实现了对亚得里亚海以及各海口的完全控制。

这时，威尼斯贵族政府内部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在夺得陆上领土的鼓舞下，务须一鼓作气继续向意大利扩张，改变一贯执行的安全和均势政策，推行强权和掠夺政治。另一种倾向认定，威尼斯的繁荣所系是在海上，放弃海上贸易利益，全力以赴从事陆地征战，卷入意大利政治纠纷，实为得不偿失之下策。

执政官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1423—1457年在位）主张第一种倾向。在他长期的任期内，这一倾向成为主流，通行无阻。1426年初，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埃斯特家族、贡扎加家族结盟对抗米兰公爵。

同年，萨沃依公爵阿梅代奥八世和蒙费拉托侯爵加入同盟。同盟总司令是卡尔马尼奥拉。米兰公爵曾设毒除他未遂。他轻取布雷西亚。教皇马丁五世从中调解，因米兰公爵回归他以罗马涅。当年12月签订和约，规定布雷西亚割给威尼斯，皮埃蒙特土地归萨沃依公爵。但维斯孔蒂拒不执行协议，战火又起。尽管维斯孔蒂军队拥有阿滕多洛之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佩鲁贾人尼科洛·皮奇尼诺这样卓越的雇佣兵队长，还是被卡尔马尼奥拉在布雷西亚地区的马克洛迪奥击溃（1427年10月）。卡尔马尼奥拉按当时的习惯释放了大部分俘虏，因而受到威尼斯人的怀疑。

在此紧急关头，公爵采取措施，把维切利割让给阿梅代奥八世并以其女许之，使他退出同盟（1427年12月）。教皇同埃斯特侯爵一起重新进行调解，在费拉拉会议上签订和约（1428年4月）。和约重申布雷西亚归属威尼斯，再加上贝尔加莫、克雷莫纳的部分地区。卡尔马尼奥拉恢复其在米兰地区的财产和封地。米兰公爵保证不再干预罗马涅和托斯卡纳的事务。

在领土上，佛罗伦萨人一无所获，因而听从雇佣兵队长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布拉乔的侄子）的劝说，试图征服卢卡。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派出一些佯称不再为他效劳的雇佣兵队长，暗地援助卢卡。卢卡遂得救，同时还摆脱了圭尼吉的执政团政权。于是佛罗伦萨求援于威尼斯，要求以毁约罪讨伐维斯孔蒂。威尼斯也因维斯孔蒂在布雷西亚归属上大要阴谋而怀恨在心，同意重开战事。但战争对维斯孔蒂有利。据认为卡尔马尼奥拉行动迟缓，作战不力；“十人会议”设谋逮捕他，以叛变罪告发他，严刑拷打，逼取口供，最后处以极刑（1432年5月）。仇视执政官福斯卡里的洛雷达诺派千方百计促成这一判决，而福斯卡里恰是卡尔马尼奥拉的主要支持者。1433年4月，主要经埃斯特侯爵的调解，重新在费拉拉签订实质上是维持现状的和约。米兰公爵再次保证不插手罗马涅和托斯卡纳的事务。

72　教会危机和教皇政策　对那不勒斯王国的争夺

1420年9月底，马丁五世在罗马就职，开始了教皇政策的新时

期。阿维尼翁教廷终止，教会大分裂结束，罗马教廷倾其全力于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俗权，并不急于解决“教会改革”中列举的诸多严重问题。而大公会议派认为极其紧迫，必须马上解决。他们认为教会如同人体，改革须从头部和四肢入手。至于头，最严重的弊病之一是教皇集权和税收制度，其结果是恶化经济，破坏行政管理（决策拖沓、便于捣鬼、易犯错误，等等），损害民族及地方的利益和感情。长久以来，罗马教廷已不是基督教美德的楷模。众教皇放荡不羁，讲究奢华，伤风败俗，贪得无厌，任人唯亲，早已有目共睹，长此以往，整个十五世纪必定有增无减。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公正地谴责了约翰二十三世的丑恶生活（有私生子）。

然而，引起怨声载道的不仅仅是罗马教廷，四肢比头更糟。高级教士，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高级教士，大部分是从贵族中选拔，而且大教堂神甫一职可以说专为贵族次子设立。这些人以及从他们中间挑选的主教并不热爱神职，他们过着世俗的，甚至不道德的生活。违反教规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人冒领几份教士俸禄，高级教士的住所远离驻地。当然，低级教士则另当别论，他们人数众多，缺知少教，且收入菲薄，生活清苦，因为修道院和教士会垄断了大部分教区，发给各教区神甫的俸禄少得可怜。姘居成风。各修会也已完全衰败：聚敛财富，生活奢侈，纪律松弛，苦修苦行的宗教热情极度低落；上几个世纪僧侣必修文明和文化教育课，现已寥寥无几。的确，在这一方面也有过几次改革和建立新修会的尝试，但无所建树。应当指出，圣方济各会的一部分“灵修派”因与约翰二十二世在神贫问题上有矛盾，而没有加入“小兄弟会”，最后还是屈服于教皇。他们组成“遵规派”，过着比较严肃的生活；就是在这一点上有别于圣方济各会的另一派“住院派”。但是，这两大派别只是在 1517 年才形成真正的修会。另一个弊病是修会教士（主要是托钵教士）与俗间教士间的矛盾。俗间教士抱怨修会教士与其争夺行使主教职能的权力，抱怨修会教士的特权侵害了本堂神甫和主教的权益。

意大利对教廷的批评要少于其他国家，因为教廷给意大利带来了

精神上的威望和经济上的繁荣。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在德国和佛兰德出现了神秘主义思潮（迈斯特尔·埃克哈特，扬·范鲁斯布鲁克），这一思潮使宗教个性论得以加强，世俗宗教团体（女修道会、男修道会和上帝之友）得以发展和增加。这一切为持不同政见的倾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异端运动有英国的威克利夫派（约翰·威克利夫）或称罗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约翰·胡斯，1415 年被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判处火刑，后成为当地民族英雄）。

关于教会改革，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强有力的措施，而把这一任务推到以后定期召开的大公会议去解决。但马丁五世只在帕维亚和锡耶纳召开过一次大公会议（1423—1424 年），参加人数很少，成效甚微。

相反，教皇马丁却着手按照意大利其他公国的模式和制度把教廷统治下的城市国家和执政团这个混杂物——至今一直是教廷的世俗领地——改造成真正的公国。在这一方面，过去的教皇做得比他们的世俗同事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教廷领土极其复杂，没有一个巩固的、可靠的中心；教皇不断更迭又使政府缺乏连续性；最后还存在着任人唯亲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一个采用选举制的没有王朝的王国中是违反国家利益的。他们越来越埋头于意大利政局，成为左右意大利政局的一个因素。从教皇马丁五世开始罗马才真正成为教皇领地，他把罗马大法官和“财政管理局”三人团贬为城市行政管理官员。他在马尔凯和罗马涅地区也恢复了教廷的主权。为此罗马涅地区的一个边缘居民区才能顶住维斯孔蒂家族的入侵。他为科隆纳家族本家亲戚广开门路，大行方便，使他们成为拉齐奥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派他们驻守翁布里亚和罗马涅各要塞。

教皇马丁也积极参与教廷封地——那不勒斯王国的事务。那不勒斯王国乔安娜二世行为不端，虽结婚两次，均无后嗣。王后的宠臣宫廷总管焦万尼·卡拉乔洛与军队总司令阿滕多洛·斯福尔扎之间不和，后者与教皇马丁五世商定，一致表示支持继承路易二世（1417 年卒）的昂儒路易三世。于是，女王收斐迪南·迪卡斯蒂利亚（见第 70 节）

之子阿拉贡和西西里王阿方索为养子，用他来反对王位觊觎者路易三世：昂儒家族与阿拉贡家族之争的后面潜伏着后来法国与西班牙为争夺意大利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布拉乔·福尔泰布拉乔是阿拉贡派的将军，斯福尔扎是昂儒派的将军，这两位雇佣兵队长互为对手，在王国争夺不休。在海上，卡塔洛尼亚-阿拉贡舰队也同时向老对手热那亚舰队开战，并攻击科西嘉岛。阿拉贡的阿方索战胜昂儒家族，于1421年6月开进那不勒斯。斯福尔扎与阿方索修好，于是阿方索的力量在王国政府中压倒女王。女王与养子间的关系破裂：她撤销阿方索的过继，转而过继昂儒路易三世（1423年6月），并得到教皇的批准。斯福尔扎和布拉乔又各为其主昂儒和阿拉贡卖命，但两人都在1424年不得好死：斯福尔扎淹死在佩斯卡拉河（1月）；布拉乔被打败，受了致命重伤，被昂儒的雇佣兵队长卡尔多拉俘虏于阿奎拉地方（6月）。阿方索因国事回阿拉贡，昂儒派又有几年时间大抖威风。卡拉乔洛重又执政，反对昂儒，与女王也发生冲突，最后被谋害（1432年）。1435年2月，乔安娜任命不久才继承哥哥路易三世的昂儒勒内为继承人后，就一命呜呼。

布拉乔一死，教皇马丁五世乘机废除了他在翁布里亚一些城市中建立的执政团，使这些城市直属教廷管辖。在马丁五世卒后（1431年2月）召开的秘密会议上，红衣主教们针对马丁的任人唯亲的政策拟订了一系列条款，要求新教皇遵守；同时红衣主教团也广泛插手教廷政务。自那时起，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经常拟订这类条款，出现了一种建立教会贵族立宪政体的倾向：至于是否遵守这些条款，从理论到实际均无保证，新教皇总是宣布这些条款对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教皇是没有约束力的。

新教皇尤金尼厄斯四世（1431—1447年在位）原是威尼斯的雇佣兵队长，上任伊始即与科隆纳家族开战，要求其归还前任赐予的土地。科隆纳家族与拉齐奥北部统治者维科行政长官结盟，并和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拉关系；而乔安娜女王以及佛罗伦萨、威尼斯支持教皇。这时，罗马发生反教皇谋叛，但遭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杀害。科

隆纳家族不得不在有利于教皇的条件下签订和约（1431 年 9 月）。

1431 年 7 月，在巴西莱阿大公会议上，教皇处境十分艰难，大公会议与教皇发生尖锐冲突。这时，正值西吉斯孟德前来意大利米兰夺取王位（1431 年 11 月），随后前往罗马夺取皇位（1433 年 5 月），他从中调解。相反，维斯孔蒂却借此机会在意大利中部恢复活动，首先离间刚为教皇效劳的雇佣兵队长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布拉乔的侄子）。于是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与科隆纳联合，1433 年 8 月自称为巴西莱阿大公会议的将军进军罗马，围城达数月之久。另一位维斯孔蒂的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公爵的授意下开进马尔凯，他也自称为大公会议的将军，因为米兰公爵自封为大公会议的代理。斯福尔扎从马尔凯侵入翁布里亚和拉齐奥北部。这时教皇尤金尼厄斯始向大公会议屈服（1433 年 12 月），他与斯福尔扎达成协议，任命他为安科纳教皇代理和教会旗手。于是，斯福尔扎脱离米兰公爵，在教廷国家的土地上替教皇与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作战。维斯孔蒂又派尼科洛·皮奇尼诺增援。被布拉乔围困的罗马城反叛教皇（1434 年 5 月），恢复旗手执政的共和政权。教皇化装仓皇出逃，由台伯河到达奥斯蒂亚，然后经海路去托斯卡纳。

其时（1434 年），佛罗伦萨-威尼斯联盟与米兰公爵间在罗马涅又爆发战争。米兰公爵进驻伊莫拉和波洛尼亚。联盟用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来对抗维斯孔蒂雇佣兵队长尼科洛·皮奇尼诺。维斯孔蒂支持卡拉拉家族从威尼斯手中夺回帕多瓦之企图促使威尼斯人处死了卡拉拉的马尔西利奥（1435 年）。1435 年 8 月签订和约，伊莫拉和波洛尼亚又归教皇。至于罗马，短短的五个月的共和制又被教皇政权所取代。

由于教皇的阙如，教廷政府由主教焦万尼·维泰莱斯基主持。此人后来成为亚历山德里亚牧首、红衣主教，但他更是一介武夫，非十足的神职人员。他大力恢复教皇在拉齐奥的权力，打击豪强，首先从维科行政长官开刀，彻底摧毁其领地，由奥尔西尼家族接替。牧首——正如人们称呼的——也征服了科隆纳家族，占领了帕莱斯特里

纳，没收了该家族控制的所有城市。他在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大肆烧、杀、抢、劫，不少城镇被夷为平地。

73 科西莫·德美第奇　阿拉贡的阿方索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其时，佛罗伦萨城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众派反对阿尔比齐寡头政权的谋叛（1400 年）失败后，阿尔比齐的权势更加强大。又一次被击败的民众派要人美第奇家族，部分遭流放，部分受到警告。于是，他们专心致力于贸易，尤其是银行金融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出任教廷银行经理的焦万尼·德美第奇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做成了几笔大生意。看来焦万尼和其子科西莫·美第奇已完全不反对阿尔比齐政权，寡头统治集团同他们重又和好——这要归功于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尼科洛·达乌扎诺所持的温和主义倾向——并赐以官爵。

共和国与维斯孔蒂之战败多胜少，战争的失利加重了民众的税收负担，因此寡头政权的威信一落千丈。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执意采取新的严厉措施，压制贫民，把民众不满情绪遏制在萌芽状态，并力争焦万尼·德美第奇的支持。焦万尼表示他愿给阿尔比齐大量贷款，以此来减轻民众的负担。于是，一部分“肥人”也向美第奇家族靠拢，美第奇家族的权势几乎可与阿尔比齐家族的权势争雄匹敌。

1429 年焦万尼故世，给两个儿子科西莫（长子）和洛伦佐遗留下万贯家产。美第奇家族由长子科西莫掌管。主张与美第奇家族和好的尼科洛·达乌扎诺辞世后，阿尔比齐家族内里纳尔多为首的极端派骄横一时。1433 年 9 月，抽签决定成立了完全有利于阿尔比齐家族的执政团政权；因科西莫在卢卡战争（见第 71 节）期间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关系而被控告为叛国罪，发配帕多瓦十年。在帕多瓦和威尼斯流放期间，他继续从事银行活动，同时又大力保护和资助文学艺术。1434 年 9 月重又抽签决定建立了有利于美第奇家族的执政团政权，这一次轮到阿尔比齐家族的头头遭受厄运，他们被起诉。于是两个家族间诉诸武力；新政权获胜。召科西莫返回，他的对手被统统赶

走。科西莫凯旋而归。从这时起，共和制形式虽依然如故，佛罗伦萨城最高决策人实际上非他莫属。

乔安娜二世谢世后，昂儒和阿拉贡之间又爆发敌对行动。教皇尤金尼厄斯四世要求那不勒斯王国归属教廷，并派维泰莱斯基进驻王国。开始，米兰公爵站在昂儒勒内一边。热那亚舰队——当时归属于维斯孔蒂——在蓬察岛与包围加埃塔的阿拉贡军队交火，大胜（1435 年 8 月）。阿拉贡的阿方索本人被俘并被押到米兰。但阿方索与公爵在米兰一拍即合，达成协议。于是，公爵命令热那亚派出分舰队辅助阿方索的军事行动。当时，热那亚早已对公爵积怨颇多，因为公爵不断地把热那亚共和国土地抵押给私人，从中捞取钱财；这次，这种不满情绪公开爆发（1435 年 12 月），共和国重获自由，恢复执政官政权。

热那亚又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结盟，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战火又起（1436 年），联盟将军斯福尔扎向皮奇尼诺发起攻击。教皇也加入联盟。最著名的战争是：佛罗伦萨-教廷联军于卡森蒂诺地区的吉安阿里之役击溃皮奇尼诺军队（1440 年 6 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占绝对优势。其时，公爵早已看出自己的雇佣兵队长各怀鬼胎，意欲让一些城市脱离米兰公国，建立自己的执政团，因此认为最好与斯福尔扎达成协议，通过他与联盟修好。斯福尔扎伯爵终于与公爵几次许诺给他的私生女比安卡结为伉俪，并于 1441 年 11 月缔结和约。和约基本上恢复先前的领土关系，但规定克雷莫纳作为比安卡的嫁妆送给斯福尔扎以及维持热那亚的自由。

教皇尤金尼厄斯四世出面干预，他既反对米兰公爵，也反对那不勒斯王国阿拉贡的阿方索，声明支持昂儒家族。但是牧首、现任（1437 年）红衣主教维泰莱斯基在王国的讨伐并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就，而且不得不从王国撤回。教皇怀疑他与米兰公爵暗中串通，在罗马逮捕了他。被捕时，维泰莱斯基在混战中受伤，后死于圣安杰洛古堡中（1440 年）。

遭教皇强烈反对的阿拉贡的阿方索与巴西莱阿大公会议进行谈判，使大公会议与教皇再次发生冲突。教皇解散大公会议（1437 年），在

佛罗伦萨和费拉拉召开新的大公会议（1438—1439 年），会上通过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间昙花一现的合并。巴西莱阿的神甫们废除尤金尼厄斯，任命萨沃依的阿梅代奥八世（见第 74 节）为教皇（1439 年），号菲利克斯五世，他是最后一位敌对教皇。列强或站在尤金尼厄斯一边，或保持中立。

阿方索在王国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他派兵包围昂儒家族占据的那不勒斯，经水渠入城，这条水渠也是九个世纪前贝利萨里乌斯进入那不勒斯的通道。这样，他成了该城的统治者（1442 年 6 月 2 日），昂儒勒内离开王国，教皇尤金尼厄斯与阿方索议和，同意他登基为王（1443 年 7 月）。

促使教皇尤金尼厄斯与阿方索修好的原因之一是阿方索同意援助教皇，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手中夺回马尔凯。政治态度经常出尔反尔的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斯福尔扎的丈人——早已开始反对斯福尔扎，他曾派其雇佣兵队长尼科洛·皮奇尼诺帮助教皇夺回马尔凯，因此斯福尔扎在马尔凯的地盘已大部丧失。现在公爵却又一次改变态度，说服开进马尔凯反对斯福尔扎的阿方索撤退，并与佛罗伦萨、威尼斯结盟支持斯福尔扎（1443 年 9 月）。尤金尼厄斯只好与斯福尔扎议和（1444 年 10 月），几乎把整个马尔凯割让给他。而尼科洛·皮奇尼诺却战死沙场。

和平是短暂的。里米尼执政官西吉斯孟德·马拉泰斯塔，虽是斯福尔扎的女婿，却把矛头对准这位岳父大人，原因是他从另一位马拉泰斯塔手中买走了佩萨罗。西吉斯孟德、教皇尤金尼厄斯、那不勒斯和米兰又组成反斯福尔扎联盟，而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波洛尼亚、热那亚站在斯福尔扎伯爵一边（1446 年）。这时，马尔凯地区发生了反斯福尔扎的暴动，斯福尔扎丧失在马尔凯地区的全部地盘；这次他决定放弃马尔凯。相反，米兰公爵却被威尼斯军队逼得走投无路。战争中，当斯福尔扎重新靠向其丈人和阿方索王一边时，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于 1447 年 8 月 13 日去世。早在 2 月尤金尼厄斯也已离开人世。

74　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洛迪和约》

菲利普·马里亚没有留下按照封建法律有权继承的后裔。不少人对继承权垂涎三尺，至少想从米兰公国捞取一些好处，其中有：米兰公爵的内弟萨沃依公爵卢多维科九世；蒙费拉托侯爵；奥尔良公爵，他是瓦伦蒂纳·维斯孔蒂后代，并占有作为伦蒂纳嫁妆的阿斯蒂（见第68节）；那不勒斯王阿方索，他依据的是一份有利于他的所谓遗嘱。最迫切、胃口最大的要算死者的女婿斯福尔扎，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提出更为有力的要求。此时米兰城起义，民众高喊"自由万岁"，宣布成立由二十四个"统帅和自由卫士"（六个区，每个区四人）领导下的"安布罗乔共和国"。科莫、亚历山德里亚和诺瓦拉加入米兰共和国；帕维亚和帕尔马要求自由；洛迪和皮亚琴察投靠威尼斯，威尼斯抖擞精神，欲称雄整个公国。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盘踞克雷莫纳，声称愿为安布罗乔共和国效劳，条件不算苛刻：若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布雷西亚和维罗纳，此两地应归属于他。他替共和国收复皮亚琴察，但不顾共和国的权益接受献给他的帕维亚的执政团政权。不久，他又轻取托尔托纳，但是共和国的另一位雇佣兵队长巴尔托洛梅奥·科莱奥尼为米兰夺回该城。1448年威尼斯人两次惨遭失败：一次是内河舰队在卡萨尔马焦雷的败北，另一次是在卡拉瓦焦地面战斗的失利。同年，威尼斯和斯福尔扎达成协议，一致反对米兰共和国，并规定以阿达河为未来的国界。于是，斯福尔扎几乎占领了阿达河和提契诺河之间的整个地区以及诺瓦拉、亚历山德里亚、帕维亚；1449年春，他开始封锁米兰城。这时，威尼斯却中途变卦，企图说服斯福尔扎放弃米兰和米兰公国的一部分领土。游说未成，转而与安布罗乔共和国结盟（1449年9月）。威尼斯要求盟友佛罗伦萨也反对斯福尔扎，但佛罗伦萨取中立态度。科西莫·德美第奇帮助伯爵，竭力促使佛罗伦萨毫不动摇地站在他一边。这时，米兰饥民高举义旗，打开城门，欢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入城，拥戴他为执政官（1450年3月25日），他断然不顾腓特烈三世皇

帝的反对，欣然接受米兰公爵之头衔。法国查理七世要求米兰归属奥尔良，他也提出反对，却属徒劳。

这时，旧联盟瓦解，新格局形成。那不勒斯与威尼斯联合；佛罗伦萨与米兰结盟。站在米兰一边的还有波洛尼亚和曼图瓦；反对米兰的有蒙费拉托、萨沃依和锡耶纳。在始于1492年的新的一轮战争中，法王在佛罗伦萨的坚决请求下，转而支持斯福尔扎，同时又帮助昂儒勒内反对阿拉贡的阿方索。勒内率部来伦巴第为公爵作战；后因与公爵不和，撤回阿斯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土耳其人的威胁（见第76节）促使威尼斯签订《洛迪和约》（1454年4月9日），按照和约，公爵从威尼斯手中夺得的土地只剩下吉亚拉·达达一块弹丸之地。佛罗伦萨参加和约；在斯福尔扎的创议下，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缔结了“至圣联盟”（1454年8月30日）。

始时，阿拉贡的阿方索对和约和联盟甚为不悦，但最终于1455年1月也跻身于内。教皇最识时务，率先入盟。联盟为意大利境内一切国家均保留一席之地。然而，和约并不真正可靠，联盟尽管屡次改组，亦不确实有效。但总的来说，意大利各国在这段时期内有了喘息的机会，并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和加强。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世纪末。

尤金尼厄斯四世的继承人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在位）为这一时期的安定、和睦，尤其是针对土耳其的严重威胁可谓心力交瘁。尼古拉五世名托马索·帕伦图切利，诞生于萨尔扎纳，出身低微；他能青云直上、位居至尊，主要有赖于他的伟大的人文主义理论和博大的修养；他又是文学艺术的坚定的卫护者。他决定性地平息了巴西莱阿的裂教。巴西莱阿的神甫（1448年6月迁到洛桑）废黜菲利克斯五世，一致选举尼古拉五世，然后解散。大公会议运动，形式上保留了下来，实际上已被击败。教会改革问题因此搁浅。

在教廷国家内，尼古拉五世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条不紊的行政管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重振因尤金尼厄斯连年征战而耗尽了的教廷财政，他利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金融活动。本来，1450年在罗马隆重庆祝大赦年会给教廷带来滚滚财源，岂料一场瘟疫使计

划落空。1452年3月尼古拉五世在罗马为腓特烈三世加冕，不仅立他为皇帝，而且——违反老传统——也立他为意大利王。这是在罗马最后一次举行的这一类仪式。1453年，斯特凡诺·波尔卡里谋叛破坏了教廷国家的安宁。此人是一个狂热的人文主义者，醉心功名；企图步科拉·迪里恩佐的踵武前贤，奋其余烈，复兴古老的共和制。举事定于1453年主显节；但就在事发前一天，败露风声，叛乱遭镇压，波尔卡里及其同谋被绞死。

腓特烈三世从罗马返回时封博尔索·德斯特侯爵为莫德纳和勒佐公爵（1452年）；几年以后（1417年）保罗二世又授予他费拉拉公爵尊号。这一类爵位的授封表明了意大利各公国的巩固，代表了它们的法律地位。西吉斯孟德皇帝在1416年就曾封萨沃依伯爵阿梅代奥八世（1391—1434年）为公爵。此后不久（1418年），乘阿卡亚分支的灭绝，阿梅代奥把萨沃依统治下的所有国家集于他一人之手；同时他又从维斯孔蒂那里夺得重镇维切利，并吞并了处于萨沃依各国之间或附近的一些封地或市镇，其疆土因此得以扩大。他还制定了一部法令大全，统一这些国家的体制。

第十二章　均势政治　文艺复兴

75　《洛迪和约》后的意大利

从《洛迪和约》（1454 年）到查理八世衰落（1494 年）的四十年，传统上被认为是意大利史上各国关系安定、和平的时期，也是各国内部巩固的时期。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意大利，从国家组织形式上看，似乎已达到了相当程度，最后形成了五大强国。这五强决定着半岛的命运，它们之间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均势，出现了一种邦联的形式，有时甚至结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联盟。

深入一步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首先，五大公国身边仍残剩着不少较小的政权，其领土犬牙交错，其中一些还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些政权中，有独立的共和国（热那亚、锡耶纳和卢卡），有较小的公国（萨沃依公国、费拉拉公国），有极小的公国（皮昂比诺执政团政权），还有小块的帝国封地（利古里亚海岸西段的菲纳莱侯爵卡雷托家族、马萨和卡拉拉的马拉斯皮纳侯爵），在某些地区还有大量微型的帝国封地（兰盖和卢尼贾纳地区）。另外，不少大国的附庸小国，主要存在于教廷国家内，那里除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外，在罗马涅、马尔凯和拉齐奥还有大量的执政团政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蒙泰费尔特罗家族的执政团政权，该家族于 1474 年被教皇封为乌尔比诺

公爵。

关于大国内部巩固的说法也应持谨慎态度。大国虽然采取了某些集权措施，但各城市和领土仍多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它们没有一个全民的政府，更没有形成如现代国家那样领土统一的国家。教皇统治区的状况更是如此，还远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家，也许一直到法国革命前亦不能算作一个国家。在这一地区内，政权既极端专制（一切都从属于一个选任的、但多数短命的君主个人意志），又极端软弱。佛罗伦萨国家内部情况令人棘手，下属各城不满情绪高涨，不时发生叛乱。在那不勒斯王国内部，君主与贵族间的内部冲突同阿拉贡和昂儒两家族间的矛盾交织一起，王室权力进一步削弱，“王家”城市（即非封城市）不断减少。米兰国家虽较为巩固，但首府米兰城内贵族各派间也动辄争吵不休。最为稳定的是威尼斯国家，一方面由于统治城市固有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因为它能够在其统治区内实行牢固的控制和公正的司法，同时又给地方行政相当程度的自主。

威尼斯政权有着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坚强有力的机构。拥有几个世纪世代相传的传统和甚至千年的共同信念，其海上霸权和经济优势声望卓著，最后还有一个众多的、不太闭关自守的、世代都关心参与政治生活的贵族阶层作为其政治基础。其他意大利公国（包括佛罗伦萨美第奇公国在内）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临时性质，它们的形成并非依靠一个古老王朝传统的威信和非凡的法律，亦非依靠人民自由地、有机地表达的意愿，而是凭借武力、要手腕和碰运气，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和思想基础。皇帝和教皇的授爵主要是一种法律形式，对君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并无很大作用。相反，这一类授爵意味着君主没有自主的权利，民众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民众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成了局外人，消极被动。而国家管理却变成君主及其官员的一种职业。各公国间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脆弱的，邦联也是极不巩固的。其平衡并非出于要求正义和和平的一致愿望，而是相互妒忌、相互猜疑的结果。我们还看到，在这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内，至少发生了四次战争，每次战争都会扰乱意大利的政治局面。

外国被摒弃于意大利事务之外也是极而言之。那不勒斯王国国门之外的西西里就与西班牙的一个国家联合。阿斯蒂属于法国君主奥尔良家族，它们还对米兰公国提出过要求。萨沃依公爵几乎成了法王的一个陪臣，他很少参与意大利生活，因此萨沃依公国并没有形成阻碍外国人的一道屏障。热那亚惯于接受法国的最高统治。不久将继承法国王位的昂儒家族一直觊觎着那不勒斯的王位。从这里人们已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外来国家将跻身于意大利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危险。但是，这仅是从时机而言，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意思上得出类似的看法：缺乏全国的坚决意志，一致反对一个外国大国占有一个意大利国家；何况这一类蚕食好像是个人性质的，它并没有触动被蚕食国家的特性。政治艺术在意大利相当发达，意大利统治者使用政治艺术的熟练程度和巧妙手腕在欧洲久负盛名。但他们的这种才能已堕落到自我炫耀、诡计多端的境地，缺乏高瞻远瞩的指导思想和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的兴趣只在于保持政权，尽可能地巩固其政权，并不把为政看成是人民和民族赋予的责任，一种真正提高全民的政治思想觉悟的使命。

76　意大利与奥斯曼土耳其人

土耳其在东方的扩张威胁着一些意大利国家的领土，威胁着整个半岛的贸易利益，甚至威胁着半岛本身的安全。面对这一威胁，意大利各公国暴露出政治眼光短浅，全国没有统一的政策。

十四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推翻了拜占庭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1354年起，土耳其人由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在随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他们横扫整个巴尔干半岛。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拼死抵抗，七百名热那亚人在查士丁尼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抵抗），从而结束了拜占庭帝国或“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和巴尔干各国均无法制止奥斯曼的入侵，西方世界也没有做出强有力的、一致的、连续不断的努力来赶走土耳其人，尽管

教皇，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加利克斯特三世和庇护二世到处奔走，鼓动征讨。其源盖出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宗教感情的淡薄致使基督教统一、团结的观念黯然失色。如今各国只顾一己之私利；西欧内部政治越来越活跃和复杂，各基督教国家的力量消耗殆尽。首当其冲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意大利共和国，它们的海上力量远远不足以对付这一强敌。他们遭到巨大的损失：热那亚人很快丢失了几乎所有殖民地（1453 年佩拉，1456 年因布罗、萨莫色雷斯岛和利姆诺斯岛，1462 年莱斯博斯岛，1475 年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威尼斯进行了较长的抵抗，但也遭同样的厄运。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威尼斯人曾与土耳其人签订过和约，但 1463 年土耳其人恢复敌对行动，占领了摩里亚半岛上的阿戈斯和其他土地。威尼斯的一支远征军曾夺回了阿戈斯并包围了科林斯，但在土耳其的一支庞大军队的攻击下不得不撤退。教皇庇护二世以巨大热情宣布远征，他本人亲临安科纳，威尼斯派出舰队，快抵安科纳时，教皇却在圣母升天节前夜陨落（1464 年），远征告吹。威尼斯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仍在继续，双方各有得失：舰队司令维托尔·卡佩洛夺回雅典城；一支威尼斯军队却在帕特雷城下全军覆没。1470 年一支强大的土耳其远征军，虽遭顽强的抵抗，仍夺取了内格罗蓬特城。

保罗二世撮合的意大利大国反土耳其联盟在 1471 年无所作为，其继承者西克塔斯四世的努力也白费力气。相反，土耳其人却两次侵入弗留利地区（1473 年和 1477 年），威尼斯共和国只得忍气吞声，屈从条件苛刻的和约（1479 年 1 月），除归还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并付出巨额赔款外，还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割让给土耳其。穆罕默德对夺取意大利一直垂涎欲滴，于翌年（1480 年 8 月）占领奥特朗托。那不勒斯王经过艰苦战斗终于收服了该城（1481 年 9 月）。1481 年 5 月穆罕默德谢世，意大利这才松了一口气，得以从面临的巨大危险中解脱。

近年来，威尼斯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即夺得塞浦路斯王国，最后一位塞浦路斯王路西南（法国王朝在这里统治达三个世纪）的遗孀威尼斯人凯瑟琳·卡尔纳罗把塞浦路斯政府让给威尼斯共和国，并于

1489 年正式逊位。这一成就部分地补偿了威尼斯所遭受的损失。

77 昂儒约翰从事的战争和新一代君主

为了封锁法国昂儒家族进入王国的通道，那不勒斯王阿方索企图把热那亚逃亡者阿多尔诺强行塞进热那亚政府，以便对抗当时的统治者弗雷戈索，从而在热那亚建立自己的权势。他借口受土耳其人的威胁，装备起一支庞大的舰队进攻该城。结果是：执政官彼得罗·弗雷戈索把热那亚执政团政权拱手送给法王查理七世。查理派昂儒勒内之子约翰接收该城（1458 年 5 月）。对于法国昂儒家族以进攻性的面目返回意大利，意大利联盟没有很快做出反应。而阿方索继续从陆、海两路进攻热那亚，并在陆地上得到逃亡者的支持。但是他的辞世（1458 年 6 月 27 日）中断了这一作战行动。阿方索亦称马尼亚尼莫（意为宽宏大量者），他对文人宽宏仁爱，因此深受他们的欢迎。然而他品行丑恶，加之连年征战繁税重赋，使他声名狼藉，民怨沸腾。

因阿方索无合法子女，西西里、撒丁与阿拉贡一起由其兄弟约翰接管。他将那不勒斯王国留给一个取得合法权的私生子斐迪南（费兰特），那不勒斯议会承认了他的继承权。但斐迪南遭到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继承者加利克斯特三世（1455—1458 年在位）的反对，此人出身于卡塔卢尼亚的博尔贾家族。加利克斯特三世全力扶持他的侄子，其中两个被任命为红衣主教（一名罗德里戈·博尔贾，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另一名比耶·路易吉，在俗教徒，任教会总管以及教廷国家许多城市的地方长官。教皇的同乡充斥罗马的世俗和宗座机关，他们实行专制统治，因此卡塔卢尼亚人在罗马已臭名远扬。现在，加利克斯特三世声称阿方索故后的那不勒斯王国（按过去的说法，即灯塔这面的西西里王国）应让给教廷，并请王位的觊觎者把他们的爵位呈报罗马，人们认为，他是想把王国授予比耶·路易吉。斐迪南对教皇的判决不服，求助下届大公会议。米兰和佛罗伦萨宣布支持斐迪南。1458 年 8 月 6 日加利克斯特三世卒，卡塔卢尼亚人的统治被打倒，比耶·路易吉本人逃到契维塔韦基亚，不久死于该地。

庇护二世（1458—1464 年在位）继任。他是锡耶纳一个逃亡贵族子弟，叫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著名文人、外交家，支持巴西莱亚大公会议，先后出任菲利克斯五世、腓特烈三世皇帝的秘书之职，其后擢任主教、红衣主教。他全力以赴，组织对土耳其人的讨伐（见第 76 节），加速罗马教廷与斐迪南的修好，承认他为那不勒斯王，而斐迪南允诺年年纳贡并归还贝内文托和泰拉奇纳。可是，在王国内部又出现一个新的昂儒党，由塔兰托君主奥尔西尼家族领头，这反映了封建贵族对王室政权的抗拒。该党召唤昂儒约翰前来王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支持斐迪南，他希望把一切外国势力，尤其是法国人的势力撵出意大利，因为法国人已从阿斯蒂和热那亚逼近米兰公国。尽管法王施加压力，庇护二世仍效法斯福尔扎，他的一个侄子与斐迪南的私生女结婚，并被封为塞萨-阿马尔菲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费了一番口舌，终于说服了佛罗伦萨亲法派保持中立。昂儒派本身拥有两名雇佣兵队长：雅各布·皮奇尼诺（尼古拉之子），他曾想成为教廷国家中的一位执政官；里米尼执政官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因其辉煌的建筑而闻名于世（马拉泰斯塔神庙，见第 79 节）。昂儒约翰和皮奇尼诺在普利亚地区的特罗亚被击败（1462 年）；皮奇尼诺与斐迪南达成协议（1463 年），后来斯福尔扎施加报复，逮捕皮奇尼诺，于那不勒斯问斩。西吉斯蒙德被迫屈膝于教皇及其兄弟多梅尼科·切塞纳。教皇只给他留下里米尼一城。切塞纳把切尔维亚卖给威尼斯，而威尼斯人几年前就占领了拉文纳。昂儒约翰也于 1464 年离开王国。

与昂儒战争相关的是争夺热那亚战争。热那亚人很快对法国的统治表示厌倦。他们在米兰的援助下终于在 1461 年摆脱了法国人，转而服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统治（1464 年）。斯福尔扎与法王路易十一世原是一致的，直到路易登基他们一直是朋友。

昂儒战争结束的当年，老科西莫故世（1464 年 8 月 1 日）。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权力已大为加强。他实行统治的工具是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由民众在当权派的压力下任命的，拥有任命地方行政官和国家政府的绝对权力。但他的某些拥护者也令他烦恼，这些人非常

强大，十分傲慢；第一号人物是富豪卢卡·皮蒂——皮蒂宫的建造者，至今此宫仍称为皮蒂宫。

科西莫的长子皮耶罗年届五旬，体弱多病（又名痛风病皮耶罗），少有男子汉气质。此人不听劝告，热衷于操持本家族的财务，拼命索回其父的放贷，逼债甚紧，多有得罪。结果出现了一个反美第奇党，但此党内部意见不一，卢卡·皮蒂一伙人企图取美第奇的执政团而代之，而另外一些人，像尼科洛·索代里尼，梦想重建一个真正的民众政权。美第奇派成功地离间了皮蒂，迫使其他头头，包括索代里尼在内，逃离佛罗伦萨。所有反美第奇分子都被排挤在地方政权之外，统统遭流放。皮耶罗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执政官（1466 年）。

一些逃亡者去威尼斯寻求支援。威尼斯共和国早已对美第奇家族甚为不满，因为美第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转而与米兰结盟。于是威尼斯解雇它的雇佣兵队长巴尔托洛梅奥·科莱奥尼，促使他去为佛罗伦萨逃亡者效劳，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援。这些逃亡者还雇佣了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和其他雇佣兵队长。1467 年 5 月他们开进罗马涅，并向佛罗伦萨进军。站在佛罗伦萨一边的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和那不勒斯王。在莫利内拉双方交锋（1467 年 7 月），战争未分胜败。1468 年 4 月签订和约，美第奇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固若金汤。从此以后，美第奇派在佛罗伦萨大获全胜：所有对手（卡波尼、斯特罗齐、皮蒂和索代里尼）均遭迫害，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杀害。1469 年 12 月 2 日皮耶罗去世——在他执政下，佛罗伦萨又征服了萨尔扎纳——其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继承，城市要人大会授予与罗马恺撒家族类似的“国家君主”称号。

1466 年 3 月 8 日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病故。他在继承问题上比科西莫更为不幸。其子加莱亚佐·马里亚（1466—1476 年在位）是一个专横暴虐、荒淫无耻之徒。他挥霍无度，常为金钱发愁，只得加重税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特别是他那种反复无常的粗暴性格引起了公众舆论的憎恨。为了更好地控制热那亚．他在那里大兴土木，建造防御工事，引起热那亚的反叛，但反叛遭镇压（1476 年 6 月）。在米

兰，两位贵族青年杰罗拉莫·奥尔贾蒂和吉安·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受家庭教师人文主义者尼科洛·蒙塔诺的影响，十分憎恨专制独裁。出于这种感情，加上个人的不满，他们就和曾遭公爵污辱的卡洛·维斯孔蒂密谋。1476 年 12 月 26 日他们在圣斯特凡诺教堂刺杀了加莱亚佐·马里亚。兰普尼亚尼当场被杀；几天后奥尔加蒂和维斯孔蒂事发，也被处以死刑。民众并没有起来支持刺客。于是，被杀者的儿子吉安·加莱亚佐毫无困难地继承了父业。吉安·加莱亚佐年尚幼，其母阿梅代奥九世的姐姐博娜·萨沃依摄政，并由曾为已故公爵效过力的国务秘书奇科（弗朗切斯科）·西莫内塔辅佐。摄政遭已故公爵的兄弟们反对，领头的是卢多维科（摩尔人）。

78 帕齐叛乱 费拉拉战争 贵族叛乱

庇护二世的继承者保罗二世（1464—1471 年在位）——一个姓巴尔博的威尼斯人——故后，新教皇西克塔斯四世（1471—1484 年在位）的任人唯亲政策又给意大利带来不少麻烦。此人姓德拉罗韦雷，出身于萨沃纳附近的一个普通家庭，任圣方济各会会长。西克塔斯四世也曾计划组织东征，但与过去一样毫无结果；之后，他埋首意大利政治事务。他的两个侄子，二十五岁的彼得罗·里亚里奥和二十八岁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均沾光，荣任红衣主教。彼得罗生活荒淫、丑恶，不久就一命呜呼（1474 年）；朱利亚诺独得六个教区及许多寺院，还有不少采邑。第三个侄子杰罗拉莫·里亚里奥，在俗教徒，分封于伊莫拉，与加莱亚佐·马里亚的私生女卡泰里娜·斯福尔扎结婚。还有一个侄子叫焦万尼·德拉罗韦雷，是费代里科·迪蒙特费尔特罗（1474 年封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女婿，任西尼加利亚地方的代理。佛罗伦萨一直把罗马涅看做是它的保险地带，因此洛伦佐·美第奇认为西克塔斯教皇的领土政策对佛罗伦萨是一种危险，于是以各种方式加以阻挠。教廷金融局因此罢去了美第奇家族的教皇银行经理一职，把此职交给帕齐家族。帕齐家族祖籍在瓦尔达诺地方，是佛罗伦萨豪富家族之一，与美第奇家族有世仇。但美第奇家族通过各级委员会已牢

牢掌握佛罗伦萨，并且越来越专横独裁。西克塔斯四世与美第奇家族重新发生冲突的起因是：教皇任命反对美第奇的弗朗切斯科·萨尔瓦蒂为比萨大主教，而佛罗伦萨不予承认。

于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集团：西克塔斯四世、杰罗拉莫·里亚里奥、锡耶纳和斐迪南王为一方，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为另一方。杰罗拉莫极力向教皇灌输必须打倒美第奇家族的思想，教皇声明赞成把美第奇家族赶出佛罗伦萨，并打算亲自接管该城。杰罗拉莫和帕齐家族密谋叛乱（即帕齐叛乱），参加者还有萨尔瓦蒂和其他一些人。1478 年 4 月 26 日，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做弥撒，当做到举扬圣体时遇刺：朱利亚诺被当场刺死；洛伦佐只受了点轻伤，躲进祭衣室才幸免于难。同时，萨尔瓦蒂企图占领执政团宫，没有成功。民众奋起，高呼“帕莱，帕莱”（美第奇军队），杀死叛乱者：萨尔瓦蒂大主教被吊死在执政团宫的一个窗户上。叛乱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镇压和报复；而洛伦佐却成了佛罗伦萨更加独裁的统治者。

西克塔斯四世抗议践踏教会豁免权、杀害大主教和教士，宣布对佛罗伦萨处以绝罚，禁止其参加一切宗教活动。于是，两联盟间爆发了战争。但洛伦佐突然中断战争，亲赴那不勒斯，说服那不勒斯王与佛罗伦萨重修旧好并结盟（1480 年 3 月）。此举成功的原因是那不勒斯王受到昂儒勒内的外孙洛林勒内企图卷土重来的威胁；奥斯曼的危险（劫掠奥特兰托，见第 76 节）也促使西克塔斯四世于 12 月媾和。

这场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米兰丧失热那亚，因为热那亚在斐迪南的怂恿下脱离米兰，恢复自由（1478 年）。斐迪南还和“摩尔人”及其兄弟巴里公爵一起密谋反对米兰公爵夫人和西莫内塔。两个斯福尔扎一起侵入米兰公国。“摩尔人”因其兄弟故世继承了巴里公爵，不久就与米兰公爵夫人修好，返回米兰。西莫内塔被捕，其职务由“摩尔人”接替（1479 年）。之后，西莫内塔被处死刑；公爵夫人被剥夺摄政权，不得不离开米兰。“摩尔人”独揽大权，成了米兰公国的监护人，国家的总督（1480 年）。

杰罗拉莫·里亚里奥在反对佛罗伦萨计划落空之后，于1480年底成功地占领了福尔利，并进而计划进攻那不勒斯王，其教皇叔叔对斐迪南也甚为恼火，欣然同意这一计划。为此他们两人紧靠威尼斯，允诺割让费拉拉，因费拉拉公爵与教皇早有旧恶，而威尼斯跟费拉拉公爵在贸易上钩心斗角。一场新的战争终于爆发（1482年）。热那亚和锡耶纳站在威尼斯、教皇一边；支持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和那不勒斯王的有米兰和佛罗伦萨。拉齐奥地区是主战场，那不勒斯人在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王储的率领下开进这一地区。当地的科隆纳家族是那不勒斯人的盟友；那不勒斯人的对头奥尔西尼家族是里亚里奥的挚友，他们竭力反对封建主那不勒斯王（见第77节）。1482年8月，教皇卫队在蓬蒂内沼泽地大败卡拉布里亚公爵。但由于其指挥官罗伯托·马拉泰斯塔死于疟疾，所以没有扩大战果。后来，西克塔斯四世认为威尼斯不断壮大于教廷不利，于是议和（1482年12月）。威尼斯与费拉拉的战争仍在进行。当卡拉布里亚公爵开进威尼斯领土时，威尼斯用舰队进攻那不勒斯海岸，攻陷加利波利。1484年8月签订《巴尼奥洛和约》，威尼斯人归还加利波利，但仍占据波莱西内地区并向费拉拉索得其他租地。

西克塔斯四世之继承者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一个姓奇博的热那亚人——时期，“任人唯亲”主要表现在重用教皇私生子，首先是弗朗切斯凯托·奇博。英诺森插手那不勒斯王国内部斗争：一方是贵族要求保持封建特权，另一方是斐迪南及其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特别可恨）努力加强王权。斗争无外乎是贵族反复呼吁昂儒人前来与阿拉贡人厮杀。税收加重、独占国库，这些更加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当时极力主张选举英诺森八世为教皇的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支持法国和昂儒家族，促使教皇与王国的贵族结盟。这些贵族老爷由萨勒诺君主安东内洛·圣塞韦里诺领头阴谋策划“贵族叛乱”。他们不仅与教皇结盟，而且与热那亚、威尼斯串通一气。联盟还求助于洛林勒内（见本节）。佛罗伦萨和米兰再次站在那不勒斯一边，反对这种颠覆意大利的计划（1485年）。

卡拉布里亚公爵又侵入教皇国家，这次与奥尔西尼家族联盟反对科隆纳家族。教皇因受到王家军队的压力，而国王又害怕勒内和法国人侵入，双方很快签订和约（1486 年 8 月），国王保证向教皇纳贡（西克塔斯四世时中断），并宽恕那些贵族。但是斐迪南并没有遵守诺言，他逐一戳灭反对他的贵族。教皇没有给儿子弗朗切斯凯托捞到任何好处，转身去讨好洛伦佐·德美第奇，要弗朗切斯凯托娶洛伦佐女儿马达莱娜为妻，并封洛伦佐的十六岁的儿子焦万尼为红衣主教。

绰号“高贵者”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当时把精力主要集中于确保意大利各公国间在维持均势和现状基础上的和平。这一做法也是为了防止外国侵入。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协议是这一做法的支柱。洛伦佐还争取到教皇参加协议。他本打算如法炮制，吸收因执行自私的扩张政策而受到怀疑的威尼斯加入，但这一步棋没有成功。英诺森和斐迪南间反而又出现新的破裂，教皇甚至宣布废黜斐迪南王位（1489 年 9 月）。由于教皇没有取得法王的援助，双方没有正式开战，而且在 1492 年 1 月又重新和好。之后，教皇也承认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的继承权。

79 文艺复兴的文化及其精神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各个政府因民众的成熟而处境孤立，同时文化日益脱离社会生活。中世纪意大利在其最光辉的阶段——宗教和城市国家——的传统价值，因宗教危机和政治危机而身价大跌，黯然失色。在文化界上层，古老的理想，虽未完全泯灭，但已不那么被人热爱，已不像过去那样充满生气，而摆脱传统束缚的、对社会生活漠然的个人发展和为文学科学而文学科学的倾向却应运而生，大行其道。这种思潮本身的含义就是破除对中世纪的迷信，消除中世纪的传统影响，改变中世纪的生活观念；它以崇古、复古的形式得以发扬壮大。

其实，崇古思想在意大利从未减弱。只不过中世纪完全是按照当时宗教、社会、政治——尤其是宗教——特点来研究、吸收、甚至改造古代事物的。现在完全相反，人们以一种完全自由的、摆脱了中世

纪理论、传统、权威的精神去看待古代，认为古代本身就是典型，就是楷模。文艺复兴的深远意义应从这一精神中去探索，因它使中世纪文化——涉及基督教教义、天主教教会、各城市、各王国、各阶级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传统的伦理风尚——解体，现代文化产生，使一切基本原则、一切信念岌岌可危。

这一时期，人们按照这种新的精神确实在了解古典作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可以说是数量上的）进展。这种精神更贴切地说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首先表现在挖掘古代手抄本，修正、译注经典著作。当时，一大批古典作家重见天日。西塞罗、普劳图斯、卢克莱修、斯塔提乌斯和昆体良的许多作品也被人发现。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先驱（见第63节），在他之后还有不少托斯卡纳人继续这一事业，如：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科卢乔·萨卢塔蒂（1331—1406年），教皇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莱奥纳尔多·布鲁尼（1370—1444年），以及罗马人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马尔凯人弗朗切斯科·菲莱勒尔福（1398—1481年）。重新兴起的希腊热与中世纪不可同日而语，规模空前，这再次反映出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尤其是在1439年宗教合并期间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不少希腊学者从东方来到西方，其中著名的有：乔治·杰米斯图斯（又名普列托）、枢机主教贝萨里翁（宗教合并中最著名的合作者之一）、德美米特里·卡尔孔狄利斯和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他们中很多人在意大利城市公开设坛讲授希腊语；他们的一些精明能干的意大利学生继承其事业，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1433—1499年）和焦万尼·比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

从本意上说，人文主义的专有领域自然是文学。在研究古人的同时，人文主义者意欲写出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一种形式上、内容上崭新的古典文学；这种文学所使用的拉丁语不是那种受俗语影响而变得不成样的中世纪拉丁语，而是真正古代的拉丁语。人文主义文学的特点，一般来说与文艺复兴一样，讲究形式；在不少情况下为了形式往往可以牺牲那些不适于形式的或效果不大的内容。人文主义采用了各

种各样的传统体裁：叙事诗、艳体诗、抒情诗、讽喻诗、演说词、书信体诗文、哲学伦理论文、历史、传记、自传。例如：菲勒尔福的《斯福尔扎家族》，作者用人文主义者惯用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手法，歌颂斯福尔扎及其他执政官的丰功伟绩；安东尼奥·贝卡代利（又名帕诺尔米塔，1394—1471 年）的《赫耳玛佛洛狄忒》，这是一本著名的讽喻短诗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庇护二世）演说集以及他的生平回忆录或称《评论集》（更重要、更新颖）；波焦·布拉乔利尼和瓦拉的伦理学著作；布鲁尼的《佛罗伦萨史》；福尔利的弗拉维奥·比昂多的《历史》，这是一部中世纪史，作者把中世纪看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批判精神；最后是焦万尼（或焦维亚诺）·蓬塔诺（1422—1503 年）的历史、哲学、语文学著作，特别是他的诗歌，此人生于翁布里亚，在那不勒斯宫廷里度过一生，他以一个真正诗人的素质讴歌家庭的感情、爱情的崇高、大自然的美丽。

通俗文学在意大利已被学者摒弃，代之以拉丁文学。而诗歌也有了新的开端：大约在十五世纪末费拉拉人泰巴尔代奥（1537 年卒）和塞拉菲诺·阿奎拉诺（1500 年故）用几乎是十七世纪的矫揉造作的笔法模仿彼特拉克抒情诗，使诗歌变得丰富多彩；佛罗伦萨人布尔基耶洛（1449 年卒）写的离奇的滑稽诗；宗教戏剧也有突破。真正有独创精神的诗人是高贵者洛伦佐，他把一些民间的东西文学化；特别是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安杰洛·波利齐亚诺（1454—1494 年），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用意大利语写作的诗人，他创作了华丽优雅的八行诗集《居室》。在散文方面，佛罗伦萨人费奥·贝尔卡里（1484 年卒）的《焦万尼·科隆比尼的幸福生活》，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1498 年辞世）的《名人生平》，萨勒诺人马苏乔的《短篇小说集》（1476 年）是模仿十四世纪风格的作品。同时出现了仿古散文，如：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的《但丁生平》、《彼特拉克生平》、《演说集》等；利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 年）的《家庭》；特别是那不勒斯人雅各布·圣纳扎罗（1458—1530 年）的《阿卡迪亚》，写于十五世纪下

半叶，是一部田园式小说（薄伽丘在《菲埃索勒的女神》中已采用这种体裁），这部小说中的田园短诗成为十六世纪文人常常模仿的楷模。

十五世纪文学最光辉的成果是骑士诗，它从民间文学（见第63节）发展到了艺术文学；如：路易吉·普尔奇（1432—1480年）在高贵者洛伦佐宫廷中写的《摩尔干提》，在这篇骑士诗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滑稽素材；斯坎迪亚诺伯爵马泰奥·马里亚·博亚尔多（1441—1494年）写的《热恋的罗兰》，作者把布列塔尼骑士素材与歌颂加洛林王朝诗歌融为一体，将爱情作为查理大帝十二武士丰功伟业的重要动力——这是意大利骑士诗的极其重要的创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不弱于其他领域，而且比文学更接近宗教和社会生活。

雕刻在再次掀起的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其作品表现鲜明、多样。代表人物有：雅各布·德拉奎尔恰（1374—1438年），著名的佛罗伦萨圣洗堂大门作者洛伦佐·吉贝尔蒂（1378—1455年），多纳泰洛（1386—1466年）及其两个弟子安德烈亚·韦罗基奥（1435—1488年）和安东尼奥·波拉约洛（1429—1498年）。多纳泰洛制作的帕多瓦的加塔梅拉塔雕像和韦罗基奥创作的威尼斯的科莱奥尼雕像成为文艺复兴中骑马雕像的两件杰作。狄赛德里奥·达塞蒂尼亚诺（1428—1464年）和米诺·达菲耶索莱（1430—1480年）的雕刻多为墓碑，其风格细腻优美；而贝尔纳多·罗塞利诺（1409—1464年）和安东尼奥·罗塞利诺（1427—1478年）两兄弟又把建筑上的宏伟气魄用于这些墓碑。德拉罗比亚三兄弟（卢卡最大）的彩釉陶器浅浮雕也颇有名气。

在绘画方面，贝亚托·安杰利科·达菲耶索勒（1387—1455年）擅长以原始主义手法虔诚地描绘圣母玛利亚及其他天使；其学生贝诺佐·戈佐利（1420—1498年）创作了单纯叙事体壁画。他们两人的风格仍比较接近于十四世纪。新的自然主义艺术创始于朝气蓬勃的画家马萨乔（1401—1428年）。他之后有：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1423—1457年）；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16—1492年），他是

绘画中应用空间协调、立体感、几何图形的创造者；韦罗基奥；安东尼奥·波拉约洛和多米尼科·吉兰达约（1449—1494年）。菲利普·利比（1406—1469年）及其子菲利皮诺又使自然主义的画面具有优雅的意境；而创新画家桑德罗·博蒂切利（约1444—1510年）擅长表现不平静的、忧郁的、透彻的内心世界。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建筑在复古道路上比其他艺术走得更远些，它断然抛弃中世纪形式，恢复古代艺术的图案和结构（圆拱和框缘）并加以吸收和改造，设计出一批轻巧、宏伟、使人感到清新爽目、朝气蓬勃的新颖建筑。例如在佛罗伦萨有米凯洛佐·米凯洛齐建造的里卡尔迪宫（约1440年）；贝内代托·达马亚诺和克罗纳卡建造的斯特罗齐宫；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年）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的老祭衣室、圣克罗切教堂内的帕齐家族的小教堂和圣斯皮里托教堂。布鲁内莱斯基还在阿诺尔福设计的哥特式的花城圣玛利亚教堂上面加了一个壮丽的圆顶。最刻板的古典派是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他是一个文人、科学家，具有多方面的才智。他建造的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神庙（见第77节）是一座典型的异教徒庙宇，不是基督教堂。曼图瓦的圣安德烈亚教堂也是他的作品。这座教堂只有一个半圆拱的、两旁没有祭台的大殿，是十六世纪末巴罗克式教堂的先导。

上面提到的所有艺术家都属于佛罗伦萨艺术风格，出身于托斯卡纳地区。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艺术之花在意大利许多地区绽开，部分是当地自身发展起来的，部分是从托斯卡纳衍生出来的。十五世纪末在罗马建成了两座宏伟的宫殿——威尼斯宫和坎切莱里亚宫。这两座宫殿都具有托斯卡纳建筑风格（设计者不详），简朴、结实、凝重，威尼斯宫还带有一些哥特式的结构和古堡式的风貌。圣阿戈斯蒂诺教堂和民众的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面也是同时期托斯卡纳人的作品。在佩鲁贾，阿尔贝蒂的弟子阿戈斯蒂诺·迪杜奇奥在建造圣彼得门时竭力仿效师傅的古罗马风格。圣贝尔纳迪诺教堂正面那优雅的装饰也出自他之手。达尔马提亚人卢恰诺·劳拉纳（1420—1479年）也是一

位一流的建筑师，乌尔比诺公爵府是他建造的，那不勒斯“新城堡”的阿拉贡阿方索凯旋门也许也是他设计的。

在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十五世纪大部分建筑还是哥特式的。在米兰，甚至出现了意大利最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米兰大教堂，是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创议建造的（见第68节）。半个世纪后，在佛罗伦萨人菲拉雷特（1400—1469年）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开始建造的大医院里，文艺复兴的风格就压倒了哥特风格。另一名佛罗伦萨人，前面业已提及的米凯洛佐设计的圣欧斯托尔焦教堂的波尔蒂纳里祭台更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伦巴第人焦万尼·安东尼奥·阿马代奥在贝尔加莫建造的科莱奥尼小教堂就完全采取了文艺复兴风格，而在帕维亚设计的丰富多彩的切尔托萨大教堂正面（见第68节）与教堂主体一样都是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混合物。

在威尼斯，公爵府朝小广场的正面及其卡尔塔门也是十五世纪哥特式建筑，是由焦万尼·博恩及其子巴尔托洛梅奥设计的。而另一位威尼斯人安东尼奥·里佐在建造这一宫殿的庭院时采用了文艺复兴的形式，不过缺乏作为新型建筑灵魂的建筑意识。在隆巴尔多建筑雕刻世家建造的极其漂亮的奇迹圣玛利亚教堂中，可能还是他们建造的行政长官老官邸中以及大运河上十五世纪的几座大楼（最美的是文德拉明-卡莱古）上，以装饰为特点的风格占了优势。

十五世纪威尼斯的博恩雕刻艺术世家以古风的优雅手法把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托斯卡纳风格融为一体。新颖、有力、雅致是安东尼奥·里佐雕刻的特点（如公爵府庭院内的亚当和夏娃雕像）。在墓碑建筑雕刻艺术方面，除托斯卡纳艺术家外（他们在托斯卡纳外也有许多创作）值得提到的有伦巴第人安德烈亚·布雷尼奥，他在罗马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有时和米诺·达菲耶索莱合作）；还有威尼托人里佐和隆巴尔多家族，他们在威尼斯的教堂内，特别是弗拉里教堂以及圣约翰和圣保罗教堂，都有他们的代表作。

十五世纪，特别在绘画方面，除佛罗伦萨画派（锡耶纳画派还保留着上世纪的古典形式）外，各地区画派蜂起，有些非佛罗伦萨艺术

家创作的画像也具有全国意义。如：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1428年卒）和维罗纳人皮萨内洛（1450年后卒），他们采用的哥特式线条带有自然主义的优雅和文艺复兴的刚劲。又如：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约1430—1479年），他起初学的是佛兰芒艺术，后又受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影响，专攻形体完整艺术和透视艺术。

科尔托纳人卢卡·西尼奥雷利（1441—1523年）是介于托斯卡纳画派和翁布里亚画派之间的一位画家，早年师从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后自成一派，作品注重感染力；弗朗切斯卡的另一位弟子梅洛佐·达福尔利（1438—1494年）也独树一帜，其作品动感强烈，朝气生动。本世纪下半叶的翁布里亚画派特别讲究优雅、意境，其代表人物有：贝内代托·邦菲利、巴尔托洛梅奥·卡波拉利、菲奥伦佐·迪洛伦佐。平图里基奥（1454—1513年）和彼得罗·佩鲁吉诺（1445—1523年）达到全国水平；拉斐尔正是后者的众多弟子之一。

威尼托地区，绘画艺术发展极为迅速，而且风格多种多样。中心是帕多瓦，设有斯夸尔乔内画室，大画家安德烈亚·曼泰尼亚（1431—1506年）就在此作画。他采用粗犷、清晰的线条，使画面结构更为有力，透视效果更为完美；这一画派受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以及佛罗伦萨画派的影响。威尼斯的绘画艺术摆脱了拜占庭的传统影响后，变得比其他地方更为活跃，先后出现了两代画派：维瓦里尼画派和贝利尼画派。后者要比前者进步得多，造就了意大利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焦万尼·贝利尼（1430—1516年）。与贝利尼一起的还应提到他的哥哥真蒂莱·贝利尼（1429—1507年）、维托尔·卡尔帕乔（约1500年成名）和奇马·达科内利亚诺（约1459—1517年）。

帕多瓦画派影响到艾米里亚和伦巴第。在艾米里亚产生了费拉拉画派，出现了三位大画家：卡斯梅·图拉（约1430—1495年）、弗朗切斯科·德尔科萨（1435—1480年）、埃尔科莱·德罗贝蒂（约1430—1496年）；在伦巴第最著名的是维琴佐·福帕（约1427—1516年）和贝尔戈尼奥内（约1500年成名）。

除人文主义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变革外，文艺复兴像思想的酵母影响着各个领域：宗教、哲学、科学、伦理学和政治。这种影响的共同的基本特点是精神独立和世俗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虽然形式上仍遵守天主教教义，但他们的宗教和伦理观念与天主教的传统观念已大为不同。他们不再听信教会学说，而是向往古代文化；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来世，而是看重今世生活，追求享乐，把享乐作为确立自己人格的工具：对自己感到骄傲，渴望得到荣誉——这是人文主义者的特点。

使古代思想服务于宗教信仰的经院哲学已完全衰落，人们开始直接学习古代作家本身，特别是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而产生了一种较为自由、较为大胆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汲取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它全然不顾教会的信条，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帕多瓦和其他地方任教的彼得罗·蓬波纳齐教授（1462—1525年）根据中世纪的二重真理论从哲学角度否定了灵魂之不朽，而在宗教上承认这种不朽性。相反，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或称新柏拉图主义者小组（柏拉图学院）的领导人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柏拉图著作的翻译者，柏拉图-基督教哲学体系的创始人）尊重和信奉基督信条，并力图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改造这些信条使其更具生命力。与他观点接近的还有比科·德拉米兰多拉，此人学识渊博，除了研究古典哲学外，还研究阿拉伯哲学和犹太教哲学。他竭力把基督教教义同其他许多哲学广泛地综合起来，因而人们怀疑他信奉正教。在科学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倾向，人们开始对自然规律进行研究。当时，这种研究大部分还是幻想性质的，只有到了培根、哥白尼和伽利略时代才又欣欣向荣起来。

由于对古代政治和国家的研究，人们更加反对俗间神职的权力和特权，尤其反对受教规约束的教士的权力和特权；要求建立专制政权，他们甚至认为不惜违反传统思想也应把国家利益看做是最高目的。所以洛伦佐·瓦拉猛烈攻击教士和教廷的统治，称之为“意大利遭受各种灾难的根源”。他采用抨击历史的手法，证明君士坦丁的惠赐是假的。但是，若说文艺复兴，尤其是人文主义共同的特征是反宗教，则

是不确切的，正如说人文主义有非基督的和基督教的分野，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背叛基督教；当时广泛地批评和疏远传统宗教并不一定反宗教；恰恰相反，而是要求具有一种新的、更为亲密的、更具个性的宗教感情。除了理性主义学派外，文艺复兴中还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在费奇诺和比科身上已可清楚看到。这种神秘主义也研究通神学和星占学。但是，并没有从这一学派里产生一种革新的宗教运动：民众完全作局外观。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标志着意大利继经济统治时期后进入了精神统治时期。人文主义学识和对古代的崇拜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已由移居到国外的意大利人和来意大利求学的外国人传播到德国、法国和英国。它在这些国家中造就了不少具有欧洲名望和影响的人物，如：德国枢机主教尼古拉斯·库萨（1401—1464 年），哲学家、科学家，曾提出一些新的设想；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9—1536 年），著有《格言集》、《愚人颂》（一本著名的讽刺作品）以及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全书》批注本。这部批注本对当时的教会情况进行了自由的、辛辣的批判，但他对宗教还是十分虔诚，主张用批判方法重新研究基督教教义并加以自由传播。

到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全面影响阿尔卑斯山北边各国的通俗文学。但当时已出现了一些征兆：法国人菲利普·德科明尼斯（1511 年卒）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强烈的政治感叙述了当时的历史；而早在一个世纪前，英国人杰弗里·乔叟（1400 年卒）模仿薄伽丘写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一书。意大利对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艺术的影响要更晚一些。除佛兰芒绘画艺术当时或比意大利还要早一些就采用了文艺复兴风格外，其他地区的艺术一直到十六世纪还保持着纯粹的中世纪风格，尤其是仍采用“鲜红的哥特式”建筑。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新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大的意义。1462 年以后活字印刷由美因兹城的约翰·古登堡（1468 年卒）工厂传播到整个欧洲。意大利是印刷术的第二故乡，当时在苏比亚科（1465 年起）、罗马、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开设

了印刷所。大约在1500年，威尼斯成了这种新技术的主要中心，阿尔多·马努齐奥（1515年去世）创办的出版社最为著名。这家出版社字体美丽，出版的可以对折的八开版本使用方便，所印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文献不仅印刷精细，而且这些文献是由一批受马努齐奥之聘到研究院工作的人文主义者专门对文献的手抄本勘对后确定的。到1500年已拥有一千多名印刷工人，印书三万多本。当时印刷的书现在称之为"古版本"，作为早期印刷术的代表。

过去，由于手抄本数量稀少，价格昂贵，文化得不到传播，成了少数人的财富；现在印刷术为传播文化、发展科学、宣传思想提供了既迅速又经济的手段。这样，宗教改革运动同文艺复兴的新文化一样也得到了印刷术的最有力的支援。

80　经济状况　地理发现

在经济方面，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并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已有长足的发展，但是意大利的经济仍然是繁荣的，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身又促进了意大利的贸易，尤其与法国、西班牙、德国的贸易来往空前频繁。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已从必须使用热那亚的船只来从事西地中海的贸易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自己组成了一支受保护法保护的强大商船队，商船队一直推进到地中海东部，部分地取代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在意大利内部，大国的形成消除或限制了地方壁垒，加速了贸易的发展。

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毛纺业由于英国毛料的竞争而失去了巨大的欧洲市场，这是因为英国毛料虽粗糙但价格便宜。可是，许多小市镇的毛纺业还是很兴旺。佛罗伦萨为适应形势也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相反，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丝绸业却十分繁荣，外国宫廷和一些达官显贵均喜欢使用丝绸。

如果说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工业出现了一些衰退的迹象，那么农业却蒸蒸日上。工业上积累的或不再使用的大量资金转移到农业上。当时大量伐林造田，增加小麦种植，兴修巨大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伦

巴第（马尔泰萨纳渠和毛拉运河）和皮埃蒙特。同时改进种植方法，实行精耕细作。广泛种植牧草又使畜牧业得到发展。此外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桑树、亚麻、大麻。

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经济出现异常繁荣期，可能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更为繁荣。但新的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和伟大的地理发现改变了这一状况，意大利对地理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地理发现又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因为新世界的发现给了传统科学一个沉重的打击。

诺曼人早已到达格陵兰岛，或许从这里又推进到拉布拉多半岛或更南。但是，人们已记不清这些航行，而且常与许多关于大西洋诸岛的传说混为一谈。后来，到了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特别是意大利人，才又恢复探险航行。加那利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绿角）诸岛的相继发现好像使关于更西边的土地的那些传说有了依据。但是，推动伟大发现的航行的动力并非出自科学上的求知欲，而是西欧人民感到有必要寻求一条直接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以摆脱意大利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企图实现这一计划的首先是葡萄牙人，他们在十五世纪已到达亚速尔群岛、佛得角诸岛、塞内加尔海岸和几内亚海岸。1486 年巴托洛米奥·迪亚士到达非洲最南端，为之取名风暴角，后来改为好望角。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于 1497 年 6 月起程前往印度的，他到了非洲东海岸的几个地方，最后终于在马拉巴尔海岸登陆（1498 年）。

早在这一事件以前就有人企图通过那条导致发现新大陆的航道到达印度。著名的佛罗伦萨物理学家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1482 年卒），从地球是球形、亚洲大陆向东延伸这些概念出发，得出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的理论。热那亚人克里斯托福罗·哥伦布（1451—1506 年）接受了这一理论并企图付诸实施。经过多年的航海和研究之后，他向葡萄牙提出提供实现这一计划的交通工具的要求，但一无所获。于是他转而求助西班牙，历经数年的交涉，度过无数困难时刻，终于使国王斐迪南和伊萨贝拉（见第 81 节）接受了他的建

议和条件（1492 年 4 月）。1492 年 8 月 3 日他率领三艘三帆船（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尼亚号）从帕洛斯港扬帆起锚，“向西航行，到达东方”，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10 月 12 日他在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或许叫瓜纳哈尼的小岛靠岸，哥伦布把它叫做圣萨尔瓦多。为了发现他认为的亚洲大陆，他又继续前进，到达古巴和海地（胡安和厄斯帕诺拉——小西班牙）。1493 年 3 月他回到帕洛港，受到盛大欢迎。

哥伦布第二次航行（1493—1496 年）发现了另外一些岛屿，第三次航行（1498—1500 年）到达大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海岸）。在第三次航行中，由于他不善于组织管理新土地而遭到不幸。弗朗切斯科·德博巴迪拉取而代之，并违反两国君的意志把哥伦布押送回西班牙。国君对发生的事件深表痛心，再次大发慈悲，给哥伦布提供了进行第四次航行的交通工具，但规定他的任务仅仅是去发现新土地。在这次航行（1502—1504 年）中，伟大航海家到达洪都拉斯海岸——还是不认识这块新大陆——接着又率队南下一直抵达达里安湾，企图在这里寻求一条通向更西方的海峡。总的来说，这次远征并不成功。回到西班牙，他发现自己无人理睬，早已被世人遗忘了。两年后，年迈体衰的哥伦布在巴利阿多里德城默默无闻地与世长辞（1506 年 5 月 20 日）。

然而，探险的热情日益高涨，新的土地相继发现。早在哥伦布在世之日，就有一批土地被发现：西班牙人胡安·德拉科萨和意大利人阿梅里戈·韦斯普奇尼于 1499 年承认了委内瑞拉海岸（“小威尼斯”）。1513 年华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通过达里安湾到达太平洋海岸。

大部分探险的目的是想通过新发现的土地找到一条通向印度的道路。然而，学者们早已开始承认阿梅里戈叙述其冒险事业的一些信件；其中一封于 1507 年公布，信中他以新世界的名字命名了那块横贯西南、阻碍通向印度道路的相当广袤的土地。德国地理学家瓦尔德泽米勒也许从中得到启发，给阿梅里戈宣布的那块土地起名为“阿美利加”。此名起初只限于大陆的西南部分，后来扩大到北部，因为发现

这两部分同属于一个大陆。

新大陆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地的开拓：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统治，但它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从中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实力。西班牙人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不仅遇到了野蛮的土著居民，而且也碰到了一些非常繁荣的王国——文明相当发达的民族。费尔南多·科特斯于 1519 年和 1526 年间推翻了阿兹台克帝国，占领了墨西哥；弗朗切斯科·皮萨罗和其他一些冒险家替西班牙征服了秘鲁，摧毁了当地的印加王朝（1526—1532 年），此外还夺取了智利。在这一段发现新土地和掠夺殖民地的时期内，一位为西班牙服务的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企图通过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峡进行第一次绕地球航行。在这次航行中，他死在被他发现的菲律宾（1519—1522 年）；但他的船只还是完成了这次航行。

葡萄牙以极大的热情去发现新土地、扩大占领地。在这方面它比西班牙动手早，并不断地与西班牙为敌。葡萄牙在美洲征服了巴西（1506 年被卡布拉尔发现）；在亚洲占领了波斯湾入口处的奥马兹（1508 年）、印度斯坦的果阿（1510 年）和马六甲，控制了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接着，葡萄牙人可能还发现了其他群岛中的一些大岛屿（在那里建立了农场）、马鲁古群岛和菲律宾，并一直到达日本。

英国和法国紧跟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不甘落后。一个为英国效劳的热那亚人焦万尼·卡博托（后入威尼斯籍）发现了拉布拉多半岛和赫德森湾（1497 年）。其子塞巴斯蒂亚诺进行了第一次向东北方向的航行，打算通过这条道路到达印度。另一个为法国服务的意大利人焦万尼·迪韦拉扎诺发现了圣劳伦斯湾；贾科莫·卡尔蒂耶尔考察了圣劳伦斯河，发现了加拿大（1535—1536 年）。但是，英法当时还没有花大力扩展殖民地。

伟大的地理发现，不仅使世界摆脱了中世纪观念的束缚，加速了精神的解放，而且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经济革命。最遥远的东方的产品通过海路源源不断涌来。欧洲的贸易中心不再是地中海国家，而是大西洋沿岸的国家，特别是葡萄牙。从征服地攫取来的贵金属使欧洲货

币充足，资金大量积累，地产贬值。继而是以土地为财富的封建贵族进一步削弱，仍旧以这个阶级为主体的国家逐渐没落，而那些有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由于财富的增加，其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因为那里有产阶级人数众多，会做生意，善于从新发现的土地聚敛财富和扩充力量。曾几何时，意大利几乎一直垄断了地中海的贸易，现在随着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意大利遭受着沉重的打击。

第十三章　外国入侵

81　意大利与欧洲列强

十五世纪末，现今法国的绝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西班牙各自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这两国君主都有雄厚的财力招募迄今仍实行的雇佣军，从而握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军事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步兵一跃而成了最重要的兵种。步兵中“瑞士军团”最为精良，系由瑞士联邦各国的军队组成。附近各列强争先恐后雇佣“瑞士军团”；因此联邦各国是否提供雇佣军便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事务。“瑞士军团”要求步兵服从统一纪律，给每人配备一支长矛，把每个队组成一支令人畏惧的进攻和阻击部队。所以从军事上说，哪个国家能经常弄到瑞士雇佣军（如法国）或哪个国家——如后来的西班牙——能在自己的步兵中采用新战术，哪个国家就能称雄一时。

战争艺术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火器的使用，当然这种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对火药的认识似乎很早很早，从十三世纪起西方已广为应用火药则肯定无疑。十四世纪出现第一批火器，但效用不大，使用也不方便；经过逐步的改进，到了十六世纪方被广泛应用。一些主要的西方大国用配备少数精良骑兵的雇佣步兵替下封建的和城市国家的军队，组成正规部队，并首先使用火器。于是，封建的和城市国家的这两种

军队已无足轻重，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因而被大大削弱。

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使其投人战斗，这是一个大国的利益之所在。当时，轻便火器和野战炮仅占次要地位。然而，攻击要塞的大口径火炮已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只有财力雄厚的政府才能配备这种火炮。在法国攻坚火炮的使用尤其广泛。

总之，意大利各国在军事上要比其他列强稍弱；然而，假如不存在产生这种软弱的内部原因（见第 75 节），假如消除了各政府间屡屡发生的旷日持久的争吵，这种劣势不是无法弥补的。与法国和西班牙不同，意大利分裂成五个大国和一大批小国。在这五个大国中，只有威尼斯勉强够得上强国之称，而恰恰是威尼斯推行一项更自私的政策。尽管意大利各国不断结盟、不断达成协议，但都不能持久，都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此外，我们已看到（见第 75 节）一部分外国人在意大利已站住了脚跟，另一部分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人意大利。十五世纪下半叶初，不少人曾预料到法国要对意大利进行干预。1481 年昂儒第二王室被消灭，法王接管普罗旺斯，继承对那不勒斯的权益。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在阿拉贡的斐迪南王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夫妇的执政下作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强国登上了舞台，对意大利跃跃欲试。

当时意大利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西方两大强国的政治方针。西班牙本可以在非洲夺得广大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占有了西西里，它几乎不能不关心意大利的命运，尤其是在另一个强国插足意大利事务的时候。法国的查理八世本来在完成王国自然疆界内的统一大业方面已千头万绪；他的头号敌人本应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勃艮第公爵继承人。但是，他却把弗朗什孔泰和阿图瓦两地还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其子菲利普；把比利牛斯山脉这边的土地鲁西莱和塞尔达尼亚交给阿拉贡的斐迪南；他还和英国达成协议。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在意大利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他不仅渴望获取那不勒斯王国，还做着帝国、十字军讨伐、征服东方的美梦。

1492 年 4 月 8 日，洛伦佐·德美第奇故后，意大利的政局每况愈下。继承佛罗伦萨霸业的是其子皮耶罗，就像祖父皮耶罗远不如曾祖

父科西莫那样，他的势力也远不如其父；而当时佛罗伦萨（形式上是共和制，实际上是公国）政府仍处于不稳状态，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反对派（萨沃纳罗拉，见第 82 节）不断骚乱。洛伦佐故后不久，与洛伦佐关系密切的教皇英诺森八世也谢世（1492 年 7 月 25 日）。加利克斯特三世的侄子罗德里戈·博尔贾收买了大多数红衣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年在位）。他深谙政治，能力颇强——就他当时在意大利执行的政策而言——，但他贪图享乐，酷爱钱财，生活放荡，不择手段提拔与罗马女人万诺扎·卡塔内伊生下的四个私生子女：切萨雷、焦万尼、约弗雷和卢克雷齐娅。切萨雷被塞到红衣主教兼瓦伦扎大主教的位置上；焦万尼当上了西班牙甘迪亚公爵；约弗雷娶卡拉布里亚公爵的私生女，从而获得作为嫁妆的斯奎拉切公国；卢克雷齐娅嫁给卢多维科的侄子佩扎罗执政官焦万尼·斯福尔扎。

82　查理八世南下　杰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亚历山大六世推行的极端任人唯亲的政策，构成意大利形势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卢多维科和国王斐迪南（或叫费兰特）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原因是：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女儿伊萨贝拉（嫡出的）嫁给吉安·加莱阿佐后，斐迪南要求加莱亚佐真正主持一直由其叔父卢多维科掌握的公国政府。卢多维科害怕那不勒斯王，当皮耶罗·德美第奇与那不勒斯王情投意合时，他心里惴惴不安。作为针锋相对，卢多维科与威尼斯、教皇结盟（1493 年 4 月）。但教皇与斐迪南的关系一直摇摆不定，联盟的基础因之并不可靠。此外，结盟之前，卢多维科业已开始走上一条与法国结盟的极其危险的道路。他与法国续订了过去的同盟条约（1492 年 1 月），并极力鼓动查理八世讨伐那不勒斯王国，向其保证在讨伐期间采取中立。鼓励查理进行讨伐的还有：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他与亚历山大六世关系已完全破裂，指望利用查理的讨伐使大公会议废除教皇；在背后策划搞垮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佛罗伦萨使节皮耶尔·卡波尼以及那些逃亡在法国的那不勒斯贵族老爷，他们的心情尤其迫切。但是，在查理八世动身之前，卢多维

科开始犹豫不决，企图拦阻和拖延讨伐。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一世去世（1494 年 1 月 28 日）。其子阿方索二世继承（1494—1495 年），教皇亚历山大即赐封王位并同他结盟，但阿方索二世在任卡拉布里亚公爵期间就遭致封建贵族的憎恨。

1494 年 8 月底，查理八世轻而易举地进入皮埃蒙特，一直推进到阿斯蒂。在帕维亚，他作为朋友受到卢多维科的欢迎，并且拜访了年轻的公爵。不久（1494 年 10 月 22 日）公爵与世长辞，他的死也许是卢多维科一手策划的。卢多维科全然不顾已故公爵的儿子，立刻宣布自任米兰公爵，并得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赐封。期间，法国军队节节胜利，经过利古里亚海岸和罗马涅，进入托斯卡纳。法国人夺取菲维扎诺后，皮耶罗·德美第奇旋即前往会见查理，同意把边界要塞（萨尔扎纳等）、比萨和里窝那交给法国，同时支付二十万弗罗林。这一丧权辱国的和约一经宣布，佛罗伦萨全城哗然，怒逐美第奇家族出城（1494 年 11 月 9 日），成立临时政府。查理闻讯赶到佛罗伦萨，市民拒不接受他提出的条约。皮耶尔·卡波尼作为谈判代表之一，当场把协议撕个粉碎，并向查理提出挑战："我们将敲响我们的警钟。"这句话成为千古名言。于是，法王减少索款，答应归还要塞。查理从佛罗伦萨转道锡耶纳，进入教皇国。亚历山大六世屈服。同意查理开进罗马——1494 年除夕之夜查理八世进入罗马——，教皇退居梵蒂冈，后退避圣安杰洛古堡。以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为首的一批红衣主教要求法王召开大公会议，以买卖圣职罪废除教皇。但是，查理八世宁愿和教皇谈判，因为教皇已同意法王在教皇国里可以自由通行，且保证其安全，还以人质相抵。这时，阿方索二世已察觉到自己已招致臣民憎恨，只好逊位于儿子斐迪南二世，人称费兰迪诺（1495—1496 年在位）。法国军事以咄咄逼人之势，加之那不勒斯王国内部反叛不止，军队时常哗变，斐迪南二世无法阻止法国的入侵。他只好携带家眷狼狈逃到伊斯基亚，躲进墨西拿。

1495 年 2 月 22 日，查理八世隆重开进那不勒斯，却没有从亚历山大六世那里获封王位。为对抗查理，卢多维科、威尼斯、教皇、西

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萨贝拉以及皇帝在威尼斯共同缔结"神圣同盟"。这样，意大利的命运开始受非意大利大国政策的左右。查理八世害怕被切断后路，急忙后撤（5月）。曼图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二世所指挥的同盟军队企图封锁查理的退路。1495年7月6日在福尔诺沃附近的塔罗山谷两军交火：战斗延而不决。最后，法军摆脱敌军，继续后撤，经过皮亚琴察和托尔托纳安抵阿斯蒂。联军没有追击，只是包围了奥尔良公爵占领的诺瓦拉城。卢多维科为重获该城，退出同盟，单方面与查理八世缔结协定。几天后，查理八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国（1495年10月）。在此期间，斐迪南二世得到著名统帅冈萨洛·德科尔多瓦指挥的西班牙军队的援助，击败法国军队，回到那不勒斯（7月），威尼斯人同时占领王国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阿拉贡人轻易地收复了曾轻易丧失的王国。1496年10月费迪南二世薨，无合法继承人，由其叔父腓特烈继承王位（1496—1501年）。

意大利强国之一的佛罗伦萨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仍忠于与法国的联盟。共和国最关心的事莫过于收复比萨，法国占领后，比萨挣脱佛罗伦萨，并得到威尼斯人的支持。在比萨事件中，查理八世态度暧昧，他之所以能得到佛罗伦萨长期的友谊，除佛罗伦萨的亲法传统外，还应归功于这样一种说法：他是上帝的工具，是用来惩罚教会和改革教会的。这种说法经由多明我会修士杰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传播开。他在讲道中激烈抨击当时的腐败现象，主张必须革新基督教会。萨沃纳罗拉于1452年生于费拉拉。多年主持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使这里成为托斯卡纳的修会改革中心。他曾预言，查理八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肯定无疑，但何时南下，尚难断定，预言查理必胜，美第奇必垮。正是这些预言，以及他严肃的生活、有力的布道，使他成了上帝的预言者，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被要求来领导全城的政治生活。

赶走美第奇后，佛罗伦萨在国家重整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倾向：寡头政治倾向和民主倾向。萨沃纳罗拉断然支持民众主权的原则，但实际上执行不力。当时（1494年12月）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九岁以上的

公民组成的大议会，其入选条件是，其祖先曾任过共和国三大职务（执政官、旗手、执政官顾问）之一。大议会又选举八十名四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类似威尼斯元老院那样的议会。萨沃纳罗拉还建议征收百分之十的土地税，以此解决财政问题；以开设当铺，来与高利贷作斗争。杰罗拉莫修士利用这些首脑机构实现其宗教思想和道德思想，使宗教和纯洁的风尚深入到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为此采用严格的纪律，甚至使用暴力和密探监视公民。这个神权政府最典型的表现是：杰罗拉莫修士在民众热情的欢呼声中宣布耶稣基督为佛罗伦萨王；狂欢节游行队伍在西尼奥里阿广场焚烧“无用之物”（妇女化妆用品；伤风败俗的、轻浮的书籍和绘画等）。

萨沃纳罗拉在布道中以放肆的语言抨击罗马教廷和亚历山大六世的举止行为。教皇吁请萨沃纳罗拉务必克制言辞，邀请他前来罗马以自辩，禁止他布道。萨沃纳罗拉对教皇的邀请不予理睬，也不服从其禁令。然而，他在佛罗伦萨的名望并非没有遇到挑战，除了忠于他的皮亚尼奥尼派外，又出现了主张寡头政治、反对美第奇的阿拉比阿蒂派、爱好享乐生活的坎帕尼亚奇派，以及当时还势单力薄的支持美第奇的比吉派或称帕莱斯基派。教皇突至的绝罚令（1497 年 5 月 13 日）大长敌人的锐气。但他全然不顾绝罚，宣布其无效。于是，罗马以褫夺圣职相威胁；在佛罗伦萨，阿拉比阿蒂派上台，组成执政团政府，禁止萨沃纳罗拉布道；而萨沃纳罗拉一直在期待着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以“买卖圣职、异教徒、对宗教不虔诚”等罪名废黜教皇。一位圣方济各会修士（圣方济各会修士与多明我会修士一向互相敌视）向他提出火焰考验的挑战，因为他曾断言不怕火焰，他一口拒绝；其追随者多梅尼科·布翁维奇尼修士自告奋勇替他应战。挑战者于是也委派另一名圣方济各会修士。执政团批准了这场挑战，着手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后因种种原因，火焰考验未付诸实行（1498 年 4 月 7 日）。萨沃纳罗拉的失败大长敌人威风，执政团迫他外出流放。好像他不愿服从，对手进攻圣马可修道院；经短暂抵抗，他被捕，同时落网的还有多梅尼科·布翁维奇尼修士、西尔韦斯特罗·马鲁菲修士。由两个教廷特

派员主持的最后审判，动用酷刑，并伪造供词，证明萨沃纳罗拉供认自己为骗子。三位修士被判处死刑，1498 年 5 月 23 日绞死于西尼奥里阿广场的十字架上，然后焚尸。

83 路易十二和博尔吉亚家族 米兰依附法国 那不勒斯从属西班牙

查理八世以二十八岁之英年早逝（1498 年 4 月），后继无人，由堂兄瓦卢瓦·奥尔良路易继承，称路易十二（1498—1515 年在位）。路易十二刚一上台，其野心立刻暴露。他自任两西西里王，又以瓦伦蒂纳·维斯孔蒂后裔（见第 68、74 节）之名自封米兰公爵，觊觎整个米兰地区。他和西班牙、威尼斯、教皇达成协议，全面拆散神圣同盟。切萨雷·博尔吉亚——在他兄弟甘迪阿公爵被暗杀后（可能就是切萨雷所为）离开教皇国家——接受法王赐予的瓦伦扎公国（因而得名瓦伦蒂诺公爵），并与纳瓦拉王的妹妹爱洛特·德阿尔布雷喜结良缘，许诺法国征服米兰后协助立国。既然与威尼斯结盟，路易只好把克雷莫纳和阿达河左岸（即阿达河的吉亚拉）让给威尼斯：为了扩大一小块领土，威尼斯执政团准许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驻扎在意大利，而且是驻扎在它本国的边境上。

卢多维科孤军作战，他唯一的朋友那不勒斯的腓特烈也爱莫能助。于是，他鼓动土耳其人反对威尼斯——这些年来，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也反复利用土耳其为其效劳。1499 年秋，土耳其人又一次侵入弗留利。8 月初，集结在阿斯蒂的法国人，在米兰流亡者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归尔甫”派领袖）指挥下，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亚历山德里亚和帕维亚，与此同时，威尼斯人也节节胜利，直达洛迪。公爵亡命德国，米兰城投降（9 月）；威尼斯人占领克雷莫纳。1499 年 10 月 6 日，路易十二隆重进驻米兰，任命特里武尔齐奥为米兰地方长官，之后返回法国。同时，热那亚也重归法国统治。

新地方长官的派性、政府的苛捐杂税、法国士兵的骄横，引起了米兰城的普遍不满，这使卢多维科重新鼓起勇气，雇佣瑞士军队，于

1500年1月5日返回米兰，并把法国人赶过提契诺河，夺回诺瓦拉。但是法王立即派兵增援，如法炮制，也雇佣一批瑞士人，利用这些瑞士人策反，鼓动那些为卢多维科效劳的同胞反戈一击。法国人重新占领公国（1500年4月），卢多维科被俘，押送法国，于1508年卒于异国。不过，路易十二不得不把贝林佐纳这块伯爵领地割让给瑞士各州。

关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归属问题，路易十二同另一个觊觎者天主教徒斐迪南进行谈判。根据《格拉纳塔协定》（1500年11月），对那不勒斯王国做如下划分：路易十二将占据那不勒斯和阿布鲁佐；斐迪南分到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有关这一瓜分，与教皇也签订了协议（1501年6月）。1501年春，法国人进攻那不勒斯王国的疆土。对协定一无所知的腓特烈王亲自替西班牙人打开卡拉布里亚要塞的大门，请求援助。后来，得知亲戚早已叛变，立即退居伊斯基亚，把王国让与路易十二，以此换得昂儒公国和终身年金（1501年9月）。

这时，瓦伦蒂诺公爵在法国人的援助下开始了计划中的罗马涅之举。教皇借口罗马涅和马尔凯的执政官没有向教会缴纳贡税，宣布剥夺他们的封地。其子奉命征讨，1499年12月占领由杰罗拉莫·里亚里奥（见第78节）的遗孀卡泰里娜·斯福尔扎英勇保卫的伊莫拉和福尔利两地。瓦伦蒂诺被封为教会最高行政长官后——他用教皇给他弄到的钱收买了十二个红衣主教——雇佣一批新的士兵，开始新的战役。首先占领佩扎罗和里米尼，然后征服由十六岁的少年阿斯托雷·曼弗雷德死守的法恩扎城，因签订体面条约（1501年4月），阿斯托雷·曼弗雷德才开城投降，不久后，被监禁于圣安杰罗古堡，终遭杀害。征服罗马涅后，他受封为该城公爵。切萨雷安排在罗马涅的行政长官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贵族老爷，强行恢复公共秩序。当切萨雷认为可以就此罢休，并企图将由此而引起的憎根完全转移到这位行政长官大人的身上时，即治他以死罪。这时，切萨雷·博尔吉亚又考虑向托斯卡纳扩张，首先是锡耶纳——属潘多尔福·佩特鲁奇执政团管辖——和皮翁比诺公国（属雅可布·达皮亚诺），对佛罗伦萨亦取敌视态度。但后来与佛罗伦萨人达成协议：佛罗伦萨同意不再庇护亚皮亚

诺。于是包括埃尔巴在内的整个公国被公爵的军队占领（1501 年夏）。佛罗伦萨为了自身安全，防范瓦伦蒂诺，与法王缔约（1502 年 4 月）。在此以前，博尔吉亚家族与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联姻。卢克雷齐娅与斯福尔扎的婚姻（见第 81 节）已解除；第二次与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阿方索·迪比谢列结婚，结果在切萨雷·博尔吉亚的策划下，她居然弑夫。现在卢克雷齐娅又嫁给埃尔科莱公爵之子阿方索·德斯特（1501 年 9 月）。

1502 年夏，切萨雷·博尔吉亚背叛乌尔比诺公爵朱多巴尔多·迪蒙泰费尔特罗，轻易剥夺他的公爵爵位，占领隶属朱利奥·切萨雷·瓦拉诺的卡梅里诺，绞死他和两个儿子，派其雇佣兵队长维泰洛佐·维泰利夺取佛罗伦萨人的阿雷佐、科尔托纳和圣塞波尔克罗。由于法王的干预，瓦伦蒂诺不得不把这些土地还给佛罗伦萨。后来，瓦伦蒂诺去米兰面晤法王（1502 年 8 月），续订和加强了同他的协定，这样他可以放开手脚，攻击一度受法国保护的波洛尼亚执政官本蒂沃利奥家族。瓦伦蒂诺公爵手下的雇佣兵队长大部分是意大利中部的小执政官，他们从这件事中悟出，帮助公爵等于为自己准备坟墓；于是他们在佩鲁贾附近的马焦内集会，决定暗中支持本蒂沃利奥家族、彼得鲁齐家族和朱多巴尔多公爵。一时，暴动的烽火燃遍乌尔比诺公国和卡梅里诺；结果博尔吉亚的军队被击败，乌尔比诺和卡梅里诺物归原主，似乎博尔吉亚已在劫难逃。但他退居伊莫拉后，争得路易十二军队的援助，并与佛罗伦萨谈判，与本蒂沃利奥及雇佣兵众队长达成协议，收复了失地。接着，他与雇佣兵众队长维泰洛佐·维泰利、奥利韦罗蒂·达费尔莫、保罗·奥尔西尼和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约会于西尼加利亚，众队长落入圈套，统统被他处死（1502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惨案一经传开，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小君主纷纷出逃；卡斯泰洛城和佩鲁贾顺利被占。在罗马，亚历山大六世获悉西尼加利亚事件顺利结束后，即逮捕老红衣主教奥尔西尼，几天后，奥尔西尼猝死，可能是被毒死的。死里逃生的奥尔西尼家族其他成员与萨米利家族结盟，加固帕特里莫尼奥古堡。公爵的军队在拉齐奥所向无敌，暴行累累。奥

尔西尼家族被迫签订停战条约。于是，切萨雷打算自领托斯卡纳执政官；为筹集活动经费，他投毒杀死巨富米基耶尔红衣主教，并以交付巨款为条件任命了一批红衣主教。

这时，法国和西班牙为那不勒斯王国瓜分后的边界问题开战（1502 年 6 月）。孔萨尔沃被迫退入巴列塔，那里又遭内莫尔公爵阿曼涅克·路易围困。许多意大利武士云集于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和法布里齐奥·科隆纳麾下，支持西班牙人。一部分被俘的法国人轻侮意大利人的勇武，为了决一雌雄，两国各出十三名斗士决斗。1503 年 2 月 13 日，决斗在两军阵前进行，结果意大利人大胜，全部俘获法国人。这一被称为“巴列塔挑战”的著名事件使法国人闻风丧胆。这时，法国的一支部队在塞米纳拉被西班牙的一支援军击败（1503 年 4 月 28 日），孔萨尔沃随即从巴列塔出击，在切里尼奥拉大胜法国人（4 月 28 日），内莫尔公爵被杀死。5 月 14 日西班牙人进入那不勒斯。

现在，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开始疏远法国。然而教皇病重，于 1503 年 8 月 18 日速逝，不像被毒致死的，很有可能死于疟疾。儿子切萨雷也病倒，已无力处事。秘密会议选举年迈多病的皮科洛米尼为教皇，称庇护三世。意大利中部的执政官乘机收复自己的领地；唯有罗马涅当时没有动作。二十七天后，庇护三世老死，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应召前来继承，取号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年在位）。为了当选教皇，他向瓦伦蒂诺许下一大堆诺言，事成后却无一践诺。瓦伦蒂诺在罗马涅的地产均被新教皇据为己有。

这时，一支法国援军向加里利亚诺河挺进。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几个月来屯兵两岸，互相窥测动静，直到 1503 年 12 月 29 日孔萨尔沃才断然渡河进攻，击溃法国人。溃逃中，跟随法国军队的皮耶罗·德美第奇淹死在加里利亚诺河中。1504 年 1 月 1 日法军最后一个据点加埃塔被拔，残余法军全部撤离那不勒斯王国。1504 年 1 月法、西停火，1505 年 10 月签订协议。根据协议，鳏居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与法王侄女热尔梅娜·迪富瓦结婚，热尔梅娜把过去协议规定属于法国的那部分那不勒斯王国土地作为嫁妆送给斐迪南。孔萨尔沃致力于整顿那不

勒斯王国，它没有并入西西里，而是与西西里一样作为总督辖区独立存在。

前来那不勒斯的孔萨尔沃废除瓦伦蒂诺公爵的爵位，把他押送西班牙。他越狱逃到纳瓦拉王处避难。1507 年，在一次替纳瓦拉王攻击一反叛者的战斗中战死。

84　康布雷联盟

外国干涉深刻地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局：那不勒斯和米兰两意大利王国已亡。佛罗伦萨在与比萨的长期交战中精疲力竭：击败威尼斯支援比萨的援军，取得坎皮利亚大捷（1505 年），并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建议下组建城市国家军队，这一切仍无助于结束这场战争。这些年来（1502 年）佛罗伦萨也设立了终身旗手职位，皮耶尔·索代里尼第一个担当此任。

在意大利只剩下威尼斯唯一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然而，威尼斯关注的只是扩大自己的领地，全然不顾关系到整个半岛命运之全局，从而引起意大利内部的普遍不满，激发外部贪婪的欲望。尤利乌斯二世——1506 年推翻了佩鲁贾的巴利奥尼政权和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政权后，不搞任人唯亲，全力恢复教皇的坚强统治——对威尼斯占领罗马涅极为愤怒。因此他赞同法国和帝国达成不利于威尼斯的协议。

1508 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本欲前来意大利举行皇帝加冕并行使对米兰的权力，威尼斯却拒绝其过境。作为报复，皇帝单独向威尼斯宣战。威尼斯司令巴尔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大败马克西米利安，挺进弗留利，占领波尔代诺内、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和菲乌梅，迫使皇帝求和。1508 年 12 月 10 日，马克西米利安与路易十二在康布雷缔结反威尼斯联盟，并建议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为联盟发起人。尤利乌斯二世于 1509 年 3 月正式参加联盟，4 月宣布处威尼斯共和国以绝罚。接着西班牙、英国、匈牙利、萨沃依、费拉拉、曼图瓦、佛罗伦萨也入盟。条约涉及彻底瓜分威尼斯国家在大陆上的领土，规定由皇帝将米兰授封给法国。佛罗伦萨买通法国和西班牙，两强国答应不再介入

比萨战争。于是，比萨于1509年6月投降。这一切努力都是为对付威尼斯的。面对强大的联盟，威尼斯临危不惧，不过，它也付出惨重代价，短短数月即濒临崩溃。派去迎战法国人的威尼斯军队在贾拉达达地区的阿尼亚德洛战败（1509年5月14日），短短几天内，胜利者占领了威尼斯在伦巴第的全部领地，同时，教皇侍卫队收复了罗马涅，费拉拉公爵夺回了波莱西内，曼图瓦侯爵索回洛纳托，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收复上年丢失的土地。西班牙人向普利亚的特拉尼逼进。在威尼托对共和国政府不满的人扬眉吐气，维罗纳、维琴察和帕多瓦高高升起皇帝的旗帜。

为讨好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威尼斯人主动放弃罗马涅和那不勒斯两地区的占领地，这时，两位君主因此表示愿意和共和国重新和解。于是，斗争矛头集中到侵入威尼斯的皇帝身上。威尼斯人收复了帕多瓦，击败并俘虏了曼图瓦侯爵吉安·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迫使马克西米利安撤除帕多瓦的包围，不久，又从其手中夺回维琴察、贝卢诺和弗留利；此外，他们重占波莱西内，威胁费拉拉公爵；但公爵的炮兵在波莱塞拉打垮了威尼斯派到波河支援其部队的舰队（1509年12月22日）。

尤利乌斯二世从威尼斯方面还取得亚得里亚海域内贸易和航行的自由权以及在共和国统治区内充分遵守教会豁免权，终于同威尼斯彻底和解，赦免过去的惩治（1510年2月24日）。尤利乌斯二世甚至与威尼斯、西班牙达成反法协议，把那不勒斯赐封给西班牙。鉴于费拉拉公爵站在法国一边，教皇认为机会已到，即宣布废除其爵位。把公爵领地并入教皇国家。处公爵以绝罚，教皇军队随即占领莫德纳（1510年秋）和米兰多拉（1511年1月）；攻打米兰多拉时，教皇亲自率军围攻，并以胜利者的姿态从突破口进入该城。但是，老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率法国人赶来增援，占领波洛尼亚（1511年5月），收回米兰多拉。战火也蔓延到教会国家的土地上。为反击尤利乌斯二世对费拉拉公爵及其盟友的惩治，路易十二召开全国教务会议，表示支持路易，赞成举行一次普世圣公会议（1510年）。在帝国和法

国的创议下，责成一红衣主教团于1511年在比萨召集该会，但会议又马上迁址米兰。于是，尤利乌斯二世在拉特兰宫也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1512年5月），并发布禁止比萨和佛罗伦萨参加宗教活动的命令，还与威尼斯、西班牙缔结反法“神圣同盟”，口号为“蛮族人滚出去!”（1511年10月5日）他召来了瑞士军队并寄予胜利的厚望。瑞士军队尚未到来前，年轻的、英勇的法国大将军加斯东·戴富瓦收复了叛城布雷西亚和贝尔加莫，对两城大肆屠杀，压迫同盟军队，在拉文纳战役（1512年4月11日）中惨败盟军。战斗之空前残酷在意大利还久未有过；加斯东本人阵亡。这时，盟军与瑞士人、威尼斯人会师，法国军队元气大伤，处于劣势。米兰地区和米兰城相继失守（1512年6月）；卢多维科之子马西米里亚诺·斯福尔扎被宣布为米兰公爵。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落入教皇之手，洛卡诺和瓦尔泰利纳为瑞士人所得。反教皇的圣公会议从米兰逃到里昂，从此销声匿迹。马克西米利安脱离法国，与威尼斯签订停战协定；热那亚也摆脱法国的统治。为惩治不愿加入同盟的佛罗伦萨，同盟派出一支部队占领普拉托，施以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美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1512年8月），索代里尼被流放，佛罗伦萨政府落入红衣主教焦万尼·德美第奇之手。

1513年2月21日尤利乌斯二世卒，选焦万尼·德美第奇为继承者，取号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法国与威尼斯协议企图反击。一支法国新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同时威尼斯人开进伦巴第。但是，马西米里亚诺·斯福尔扎的瑞士人在诺瓦拉彻底击溃了法国人（1513年6月6日），还侵入到法国；威尼斯人被迫撤出伦巴第，并在维琴察附近的奥尔莫惨败（1513年10月）。此外，早在1511年12月就与西班牙结盟的英国人在弗兰德平原的圭内加特也打败了法国人（1513年8月）。

路易十二正式宣布放弃里昂圣公会议，与教皇言归于好；同英国讲和，同西班牙停战。1515年1月1日路易十二去世，其继承人——表弟、女婿瓦卢瓦-昂古莱姆的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准备重新占领米兰地区。为保卫马西米里亚诺·斯福尔扎，西班牙、

皇帝、教皇再次与瑞士人联合。一支军队占据皮埃蒙特的所有阿尔卑斯山口；但弗兰西斯一世从一直被认为无法通行的阿尔真泰拉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绕过瑞士人，进入米兰地区。瑞士人赶到，在米兰和洛迪之间的梅莱尼亚诺地方向他大举进攻。战斗激烈异常，酣战两天（1515 年 9 月 13 日和 14 日）；瑞士人无愧于英勇善战，但最后，他们受到威尼斯骑兵的猛攻，又被特里武尔齐奥在兰布罗河上决堤放水所淹，只好有秩序地撤退。

这场战斗具有决定性意义。马西米里亚诺·斯福尔扎把公国割让给弗兰西斯一世，仅换得一份养老金；热那亚重归法国；西班牙、瑞士人、马克西米利安相继与弗兰西斯一世和解；马克西米利安放弃仍占据的威尼斯领土，威尼斯完全恢复大陆上的占领地。其中，第一个与弗兰西斯一世和解的是教皇，他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归还给米兰公国并保证把莫德纳和勒佐也还给费拉拉公爵。

利奥十世甚为照顾本家族利益，宣布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继承其叔父兼养父圭多巴尔多·迪蒙泰费尔特罗的爵位）无权继承乌尔比诺公爵爵位，而赐封给——征服公国后——侄子洛伦佐·德美第奇（皮耶罗之子）（1516 年）。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反抗失败，只得把公国让给教皇。然而洛伦佐不久去世（1519 年），利奥十世并公国于教会。这时佛罗伦萨政府由红衣主教朱利奥——在帕齐叛乱中被杀的朱利亚诺之子——执掌。利奥十世重新推翻佩鲁贾的巴利奥尼家族，废除马尔凯地区的许多小独裁者。

85　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　意大利臣服皇帝

法西和约（1516 年 8 月 13 日签订的《努瓦永条约》）是由西班牙新君主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缔结的。查理五世生于 1500 年，是菲利普（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勃艮第公爵大胆者查理之女玛丽之子）和乔安娜·拉帕扎（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之女）所生。于是，他从祖母那里继承了勃艮第的广大疆土，包括弗朗什-孔泰、阿图瓦和低地国家（差不多等于目前的比利时和荷兰）；从母亲那里又

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王朝（即西班牙），只是外祖父斐迪南故后（1516年1月），西班牙才真正归属他。拥有从北欧到南欧如此广阔无垠的领土是哈布斯堡采取高明的联姻政策的直接结果。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你，幸运的奥地利，婚姻是你壮大自己的武器。"

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故世（1519年1月）后，查理继承了哈布斯堡的奥地利领地——后让给弟弟斐迪南，由于婚姻关系斐迪南堂而皇之成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并当选为帝国的继承人（1519年6月28日），取号查理五世（1519—1556年）。法王弗兰西斯一世也做着皇帝美梦，结果落选，于是蓄意与哈布斯堡皇帝为敌。他以谋求欧洲均势为名寻找盟友，第一个目标便是教皇；但查理五世以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地为代价拉拢利奥十世，此外，还和英国达成协议。法国，这个欧洲最大的统一强国，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构成一种最大的威胁。

1521年弗兰西斯一世在意大利、低地国家和纳瓦拉发动战争，但作战不利。一支德西联军征服了伦巴第。胜利后不久利奥十世卒（12月1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乘机夺回乌尔比诺公国，巴利奥尼家族也返回佩鲁贾。继承教皇的是托尔托萨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取号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在位），他是荷兰乌德勒支人，查理五世的家庭教师。阿德里安六世从西班牙来到罗马后，首先确认了德拉罗韦雷的乌尔比诺公爵爵位，接着用与利奥十世截然相反的方针全力以赴，从事教会改革：厉行节制行政开支，忽视文人和艺术家。这一举措招致罗马宫廷和文人的怨恨与反感，加之任期短暂，经验欠缺，他的良好意图有花无果。对外他一直保持与皇帝的联盟，其继承者朱里奥·德美第奇，号克力门七世（1523—1534年在位），亦如此；但在教廷内部他恢复先前的方针。

1522年春，为法国效劳的瑞士人在米兰附近的比科卡地方攻打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指挥的皇家军队；但是，德国雇佣兵和西班牙步兵已达到甚至超过瑞士人的军事体制，因而稳操胜券。热那亚重新脱离法国，米兰公国也交给了马西米里亚诺的兄弟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连通常与法国结盟的威尼斯也与皇帝达成协议（1523年7月）。

不久，王家血统的权重一时的君主波旁查理背叛法王弗兰西斯一世，和其他法国贵族一起倒向查理五世一边；他接替科隆纳指挥皇家军队，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闻名于世的“清白无畏的骑士”巴亚尔在撤退中阵亡——并侵入到普罗旺斯（1524年春夏）；最后被迫撤出。

于是，弗兰西斯一世经蒙塞尼西奥进入意大利，重占米兰（1524年10月）。皇家军队退入帕维亚，后城被法国人围困。围城四个月后，一支援军到达，展开了一场野战（帕维亚战役，1525年2月24日），法军溃败，国王弗兰西斯本人被俘。

意大利各国此时才如梦方醒，明白最大最危险的强国是哈布斯堡，于是纷纷靠拢法国。英国也与法国和解（1525年8月）。威尼斯、斯福尔扎、教皇和摄政弗兰西斯一世之母路易丝·迪萨沃依之间不断商谈对策。他们企图用那不勒斯王位来拉拢皇家军队指挥官佩斯卡拉侯爵。他起初表示同意，后来却逮捕了阴谋的组织者斯福尔扎的总管杰罗拉莫·莫罗内，迫使公爵交出所有要塞（1525年10月）。不久佩斯卡拉死去。

弗兰西斯一世被押到西班牙，为获自由，签署了《马德里条约》（1526年1月14日），接受查理提出的苛刻条件。回法国后，即宣布条约无效，是逼迫之物。在科涅克他与克力门七世、佛罗伦萨、威尼斯、斯福尔扎缔结反皇帝“神圣同盟”（1526年5月22日）。但同盟者不善于采取有力的、敏捷的行动。弗兰西斯一世也没有立即干预意大利事务，意大利盟军司令乌尔比诺公爵不敢放手指挥战争，这也许出于对美第奇家族的怀疑。而皇帝军队有科伦纳家族、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为盟友；同时，蒂罗尔贵族乔治·弗伦茨贝格自己解囊雇佣了一万二千名路德教雇佣兵，开进意大利为皇帝作战。乌尔比诺公爵没有封锁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而是屯兵伦巴第平原，严阵以待，即便在这里，也仅仅是监视敌人动向，骚扰敌人而已。在波河流域戈韦尔诺洛地方的一次小规模接触中，盟军的一位最杰出统帅受伤，不久身亡，他就是二十八岁的焦万尼·德美第奇——老科西莫之弟弟洛伦佐幼子的后裔，其母是里亚里奥的遗孀卡泰里娜·斯福尔扎，后改

嫁——又名黑带子，其绰号源于以悼念利奥十世之死的黑带作自己的标记。

波旁查理指挥下的德西联军长驱直入，乌尔比诺公爵一直紧跟其后，挺进到罗马城下。1527年5月6日城破，由于波旁查理战死，罗马遭到最残酷的浩劫：劫掠持续了好几天。教皇躲进圣安杰罗古堡，乌尔比诺公爵和盟国袖手旁观，不予救援，而美第奇家族控制的佛罗伦萨政府亦被打倒（1527年5月）。克力门七世只好投降，退出同盟。

意大利的抵抗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弗兰西斯一世才派出一支由洛特雷克率领的军队开到意大利，占领热那亚（在为法国效劳的卓越的热那亚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帮助之下）、亚历山德里亚和帕维亚，接着围困那不勒斯（1528年4月），安德烈亚的侄子菲利皮诺·多里亚在萨勒诺海湾击败西班牙舰队。而后，安德烈亚·多里亚与弗兰西斯一世闹翻，遂投靠皇帝（1528年8月），热那亚才摆脱了法国人，获得自由；多里亚在热那亚建立起一个新的贵族政权。疾病使洛特雷克的军队大量减员，他本人也染病而死（1528年8月），其部队只得投降。法国新派的一位将军在帕维亚地区的兰德里亚诺败北，法国人被迫撤出意大利。

克力门七世与查理五世签订《巴塞罗那条约》（1529年6月29日）：教皇允诺查理五世登基为皇并赐封那不勒斯王位；作为交换，查理五世将让威尼斯归还切尔维亚和拉文纳，费拉拉公爵交出莫德纳和勒佐，使美第奇家族归政佛罗伦萨。弗兰西斯一世也和查理五世缔结《康布雷和约》（1529年8月5日），或称《“两贵妇人”和约》（因为该和约是由弗兰西斯的母亲路易丝·迪萨沃依和查理的婶婶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签订的）；法国放弃米兰地区〔和阿斯蒂〕、那不勒斯地区、阿尔托瓦和弗兰德平原的一切权利；查理五世同样放弃勃艮第的一切权利。

1529年11月，为安排意大利事务，查理五世来到波洛尼亚，先期到达的教皇和意大利的其他君主恭候于此。阿斯蒂划归萨沃依公爵查理三世；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以巨款买下米兰公爵爵位；威尼

斯要求和约，保证把拉文纳和切尔维亚还给教皇，把占领的那不勒斯土地交还查理；关于教皇要求费拉拉、莫德纳和勒佐一案交皇帝裁决。裁决于次年公布，结果对阿方索大为有利：莫德纳和勒佐作为帝国封地，费拉拉作为教会封地，仍赐封阿方索。1529 年 12 月 23 日，教皇、皇帝、匈牙利王斐迪南（见第 83 节）、威尼斯、米兰以及其他意大利君主缔结“永久同盟”。1530 年 2 月 22 日，还是在波洛尼亚，教皇克力门七世加冕查理五世为意大利王，14 日加冕为皇帝。至此，除佛罗伦萨尚余少许自由外，意大利完全沦为被奴役状态。

美第奇政府再次倒台后，佛罗伦萨又恢复到 1512 年以前的体制，旗手任期一年。萨沃纳罗拉精神在城里复活：耶稣基督再次封为佛罗伦萨王。第一任旗手尼科洛·卡波尼倾向与皇帝、教皇和解；但反美第奇的极端派在佛罗伦萨人多势众。教皇曾试探同佛罗伦萨达成协议，企图要求美第奇家族以私人身份返回佛罗伦萨，并非常有限地参政，但未获成功，因为佛罗伦萨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守约。

孤立无援的佛罗伦萨，为保卫自身的自由，准备战斗到底。他们雇佣佩鲁贾的马拉泰斯塔·巴利奥尼做统帅，在杰出的工程师米开朗琪罗的帮助下修建防御工事。1529 年 10 月，菲利贝尔·奥朗日和瓦斯托侯爵指挥的皇家军队出现在佛罗伦萨城下，月底开始炮轰。共和国只有一万三千正规军，许多部队还分散在各属地，无法抵挡四万皇家军队；但全体市民踊跃参战，他们中间甚至产生一位卓越的统帅弗朗切斯科·费鲁奇。

1530 年 2 月，皇家军队一度占领沃尔泰拉，后被费鲁奇夺回并顶住了敌人的多次攻击。可是，与此同时，恩波利失守，佛罗伦萨城被围愈烈，虽多次突围终未成功，其中 5 月 5 日和 6 月 20 日夜两次突围值得一提，这后一次突围，如果坚持到底，皇家军队可能被打败。巴利奥尼极力讨好教皇，意欲收回佩鲁贾，不希望佛罗伦萨取胜，佛罗伦萨人作战情绪越是低落，巴利奥尼迫使佛罗伦萨投降的图谋就越会成功。执政团政权命令费鲁奇收集散兵游勇，进攻皇家军队阵地，解救被围城市，至少输进补给。费鲁奇从沃尔泰拉进军里窝那和比萨，

然后于7月31日经过卢卡郊区转到皮斯托亚丘陵地带。似乎马拉泰斯塔·巴利奥尼向奥朗日透露了佛罗伦萨人的计划，答应不出击皇家阵地，这样奥朗日能集中大部分兵力对付费鲁奇。费鲁奇刚进入加维纳纳镇，就与皇家军队遭遇，奥朗日被歼，皇家军队被赶出该镇；后来，皇家军队又集合起来，包围费鲁奇的士兵，士兵拼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溃逃。费鲁奇带领少数士兵退守一家农舍，继续抵抗，一直战到遍体鳞伤，力尽而降，死于皇家统帅法布里齐奥·马拉马尔多之手，临终向他高喊："你是在残杀一个已死的人呀！"（1530年8月3日）

费鲁奇的失败和惨死给予佛罗伦萨致命一击。马拉泰斯塔提议停止战事，执政团却以号召市民踊跃参军作答。于是，马拉泰斯塔让出一堡垒予敌人，炮口对准佛罗伦萨城。在这种情况下，佛罗伦萨被迫投降（1530年8月12日）。佛罗伦萨人再度准许美第奇家族回城执政，把城市体制改革交由皇帝，"总希望保留其自由"。

临时政府大肆迫害美第奇家族的政敌和共和派，或放逐或处死。它本想保留一些共和体制，但教皇的计划仍旧得逞：他要求由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私生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建立专制政权。皇帝旨谕，封亚历山德罗为世袭公爵（1531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首脑；接着临时政府做出决定，确认亚历山德罗的爵位，取消执政团和旗手职位（1532年4月27日）。

86　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

从查理八世入侵到佛罗伦萨陷落，期间战火连绵长达三十五年，正是在这三十五年中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十六世纪有了全面发展，文学艺术结出了更为成熟的果实。典型的十五世纪人文主义的学术活动仍在进行，但与真正的文学活动相比已退居第二位；同时，通俗文学大大超过了拉丁文学，大量的、极其丰富的通俗文学作品表达了新的艺术思想，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特色。艺术愈益摆脱中世纪社会和宗教的精神束缚，走向现实世界完美的、光

辉的理想。旷古鲜有的艺术名家们创作出许多形式尽善尽美、无与伦比的作品。科学工作更为紧张、更有价值，它开始动摇了对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盲目崇拜，直接从古代的各种传统中吸取精华，探索新的道路。但科学工作还没有找到一种崭新的途径和方法，大部分仍保留着先验的、异想天开的纯理论研究，没有对事物进行实际的探索。文艺复兴必将对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更巨大的影响。

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仍占主导地位，其对外传播的范围远比十五世纪开始传播时广泛得多。这一时期内，意大利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尚未被外国和本国的奴役所窒息，的确是全欧洲文明的导师和传播人。意大利的文人、艺术家把他们的一些杰作带到国外和外国宫廷。在意大利文化的推动下，又由于有意识的模仿，许多国家的文化走出中世纪，开始向现代世界迈进。在科学领域，尽管意大利不占绝对优势，但也据有极为显著的地位。

上述特点并非指整个世纪，而是就这个世纪的上半叶而言。《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见第 88 节）和特兰托大公会议（见第 89 节）后，意大利的精神生活起了深刻变化：文艺复兴结束，达到顶峰的文学艺术逐渐衰落；这种情景仅限于意大利。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两个日子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们的文艺复兴非但不衰，相反正处于全盛时期，不再模仿意大利，而是努力创作更富于个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这一进步特点也表现在科学方面。

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古典文学、特别是拉丁文学的研究仍贯穿着人文主义传统。印刷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古代作家的著作可以较容易地、大量地印刷出版，这些书籍就成了当时研究工作的最好工具。阿尔多·马努齐奥（阿尔迪内）出版社以印刷漂亮、评注准确精当而著名，在整个十六世纪内，出版社由其儿子、孙子继续经营。

本世纪初，由于文学形式的研究几乎占据垄断地位，古典语史学的研究和学术探讨已寥寥无几，本世纪中叶才有了很大的恢复。佛罗伦萨的古代文献评注家皮耶尔·韦托里（1499—1585 年）是意大利十六世纪最伟大的语史学家，他在研究中采用了极严格的科学方法。莫

德纳人卡洛·西戈尼奥（1524—1584年）在研究罗马史和中世纪史时，不仅研究了作家的著作，还考察了古迹和碑文，查阅了档案资料。在科学研究古代语言的同时，对俗语也进行了研究。除了拉丁语的语法和词典外，还出版了第一批俗语语法和词典，重印了但丁《论俗语》的各种手抄本。在许多讨论中均批驳了俗语劣于拉丁语的偏见。这一方面最杰出的著作是威尼斯人彼得罗·本博（1470—1547年）的《俗语文体》。上述这些学术活动有助于意大利文学语言的最后巩固。

雅各布·圣纳扎罗（见第79节）是拉丁史诗的杰出学者，他按照当时的时兴以优秀的文体、丰富的幻想把基督传说和教义改编成《圣玛利亚分娩论》一书（1526年）。训世诗名著《梅毒或称高卢病毒》是维罗纳人杰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1483—1553年）所著，它反映了悲惨的现实世界。抒情诗，特别是哀歌诗，创作极丰，题材多样；风格最高雅飘逸的要算威尼斯诗人焦万尼·科塔（1510年卒）、安德烈亚·纳瓦杰罗（1483—1529年）和马尔坎托尼奥·弗拉米尼奥（1498—1550年）。以语言华丽、描写生动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有：科莫人保罗·焦维奥（1483—1552年），著有《历代史书》和其他作品；彼得罗·马尔蒂雷·丹吉埃拉（1459—1526年）写了《大洋之谜和地球新貌》一书，第一个描述美洲大陆的发现；还有一些人写了不少有关欧洲各国的史书。

但是，由于大量的、光彩照人的通俗文学作品的问世，拉丁文学的光辉黯然失色。骑士诗的绝唱是勒佐人卢多维利·阿廖斯托（1474—1533年）写的《疯狂的罗兰》，此人长期生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宫廷中。这部长诗以其文体之流畅、高雅、完美，描写之丰富多彩，心理刻画之深刻，形象之生动活泼，语言之风趣欢快，而成为文艺复兴艺术上脍炙人口的成果，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骑士诗仍受中世纪传统的影响，同时在文艺复兴的复古思潮推动下出现了按照古代准则和楷模写成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为其代表作，然而这部作品的主要精华也是取自中世纪的各种骑士故事；作者是伟大的、不幸的诗人托尔夸托·塔索（1544—1595年），他是文艺复兴

的最后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已使人们感受到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纪的来临。

彼得罗·本博将十五世纪末爱用的民间通俗体以及简练而又怪诞文风的抒情诗转变成纯粹的彼特拉克风格，这种文风风行整个十六世纪，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爱情诗；其形式工整，却大都因袭陈规，感情冷漠。名门闺秀维多利亚·科隆纳（1492—1547 年）、焦万尼·圭迪奇奥尼·达卢卡（1500—1541 年），其中首推另一位妇女帕多瓦的加斯帕拉·斯坦帕（1523—1554 年），其诗风表现出一定的真挚感情和独创风格；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的诗作与艺术同样铿锵有力（参见本节）。佛罗伦萨人焦万尼·德拉卡萨主教（1503—1556 年）革新了十四行诗的形式；托尔夸托之父贝尔纳多·塔索（1493—1569 年）模仿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歌采用了新的韵律。真正的十六世纪诗体是三行押韵诗节的寓意性讽刺诗（以阿廖斯托按照朱韦纳尔和贺拉斯的模式写的讽刺诗为主）；同时政治性和人身攻击的讽刺诗也呈兴旺之势，如：罗马的《讽刺诗》和彼得罗·阿雷蒂诺（1492—1555 年，他才华横溢，但品德低劣）的诽谤性短文。滑稽诗中也掺杂了讽刺成分，这方面最有才华的作家是托斯卡纳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1497 或 1498—1535 年）。这种诗成为意大利诗歌的一种体裁，它千篇一律，平淡无奇叫人生厌。用意大利语写的训世诗并不少于用拉丁语写的训世诗，诗作主要因袭维吉尔的《农事诗》，但质量要低劣得多，其作品有焦万尼·卢彻莱（1475—1525 年）的《蜜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1495—1556 年）的《耕耘》，这两位都是佛罗伦萨人；维诺萨人路易吉·坦西洛（1510—1568 年）的作品较新颖、诙谐。

文艺复兴对戏剧文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波利齐亚诺（见第 79 节）的《奥尔甫斯》采用世俗题材，神秘剧形式；而十六世纪的戏剧又成了希腊和拉丁悲剧（塞涅卡）或拉丁喜剧（普劳图斯和特伦提乌斯）的忠实翻版：采用同样的题材、情节、人物性格、手法；遵守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运动一律的规则。

第一个这类的悲剧是维琴察人吉安·乔治·特里西诺写的《索福尼斯巴》(1515年)。以后整个十六世纪，创作了大量作品，有的模仿希腊人(特里西诺、鲁彻莱)，有的因袭塞涅卡(詹巴蒂斯塔·吉拉尔迪·钦齐奥、斯佩罗内·斯佩罗尼)；一般说来，这些作品都刻意仿古，平平淡淡，没有生气。阿雷蒂诺的《奥拉齐娅》有某种新意和戏剧效果，堪称佳作。用俗语写的古典戏剧起始于贝尔纳多·多维齐·达比比恩纳的《卡兰德里亚》(1513年)，也有许许多多学者采用诗和散文形式。在这类作品中，模仿较为熟练自如，现实生活也为创作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重要作家有：阿里奥斯托、佛罗伦萨人安东弗朗切斯科·格拉齐尼(又名拉斯卡，1503—1584年)、詹马里亚·切基(1518—1587年)和阿雷蒂诺。最出名的是马基雅维利，他写的《曼陀罗花》是欧洲喜剧名著之一。模仿维吉尔田园诗创作出田园诗剧，杰出的有两部：塔索的《阿明达》(1573年)和费拉拉人詹巴蒂斯塔·瓜里尼的《忠实的牧羊人》(1590年)。

十六世纪最杰出的散文作品是历史著述。这些作品不再采用编年史的形式，断然挣脱中世纪神学概念的束缚，寻求用人的精神和活动来解释历史事实，探索其内在联系，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事件的规律和政治品行的准则。政治科学确实是文艺复兴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意大利十六世纪的重大荣誉之一。最出众的是两位佛罗伦萨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年)。一位在理论研究中有胆识、有才华、对祖国抱有崇高理想；另一位观察现实敏锐、不抱偏见。马基雅维利的《关于提图斯·李维乌斯前十卷罗马史的演说集》一书总结了罗马史中的一些政治原则，并与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作比较；他的《君主论》设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模式，根据该书，左右君主的唯一指导思想应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同时该书还大声疾呼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他的《佛罗伦萨史》从政治角度深刻地探究了书中叙述的历史事实的含义。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1492—1534年)一书中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半岛整个历史，试图细致地找出各种事件的真相和其真正的起因；在

其他著作中提出了他的政治生涯的准则。这两位杰出人物应位列其他政治学作家和历史学作家之榜首。

艺术史是研究历史的新体裁，起源于乔治·瓦萨里·达雷佐（1511—1574 年）所著《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雕塑家传》一书。

短篇小说创作甚丰，多为传统题材和手法，作品自由地以薄伽丘为模式描绘当时社会和个人的种种情态。值得一提的是十六世纪卓越的叙事文学作家和优秀代表马泰奥·班戴洛（约 1485—1560 年），他是薄伽丘之后一位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可以与班戴洛的短篇小说并驾齐驱的是曼图瓦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1478—1529 年）写的《侍臣论》一书，该书生动地刻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刻画了当时骑士的理想；而德拉卡萨在他《处世之道》一书中提出了文雅礼貌的处世准则。

总之，十六世纪意大利文学，一方面以骑士诗和短篇小说继承并结束中世纪的传统，又以文艺复兴的影响加以改造之；另一方面以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戏剧以及学术性文章为现代文学另辟蹊径。意大利文学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中世纪的旧形式日渐衰退，代之以意大利形式为模式的新形式。因宗教改革运动，德国断绝了同意大利的关系，因而德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一直推迟到十八世纪末。

在法国，克莱芒·马罗（1496 或 1497—1544 年）不仅写中世纪的体裁（叙事诗、抒情诗和讽喻诗），擅长写挽歌、讽刺短诗、田园诗和十四行诗；梅林·德圣热莱（1487—1558 年）公开模仿意大利的抒情诗，尤其模仿彼特拉克风格；最后，若阿基姆·迪贝莱（1525—1560 年）在《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1549 年）一书中明确阐述了新诗体的思想：在模仿古人和意大利人的同时革新他们的语言、风格、韵律和题材。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 年）本人以及“七星诗社”的其他诗人力图在其诗作中实现这种思想。弗朗索瓦·拉伯雷（约 1553 年卒）的小说《巨人传》知识广博、纵谈阔论、挚爱生活、对旧世界的讽刺辛辣，淋漓尽致，相当新颖，但仍浸透着文艺复兴的

精神。

意大利的韵律和诗体进入西班牙比法国早，也较完整。主要代表有：胡安·博斯坎（1493—1543年），人称卡斯蒂利亚的彼特拉克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年）和迭戈·德门多萨（1503—1575年）。

仿意抒情诗在亨利八世的英国同样大行其时，主要代表有模仿彼特拉克风格的托马斯·怀特（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1517—1547年）。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上半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全盛时期，古典成分与伟大艺术家的创作天才完美结合，产生了一批具有真正生命力的作品，创造了现代艺术。

文艺复兴的建筑，无论在宫殿的营造上，还是在教堂的建造上，造诣很深的有：乌尔比诺的多纳托·布拉曼特（1444—1514年），他在研究古罗马建筑的基础上成熟起来，具有很高的造诣，是圣彼得教堂的第一个设计者；乌尔比诺的拉法埃洛·圣齐奥（1483—1520年），继续设计圣彼得教堂并在罗马建造了不少宫殿；锡耶纳的巴尔达萨雷·佩鲁齐（1481—1536年），为罗马马西莫宫的设计者；佛罗伦萨人小安东尼奥·达圣加洛（1485—1546年，罗马法尔内塞宫的建造者）和雅各布·圣索维诺（1486—1570年，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图书馆的建造者）；维罗纳人米凯莱·圣米凯利（1484—1559年），在维罗纳和威尼斯从事建筑；最后，伟大的天才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1475—1564年），主要作品有圣洛伦佐教堂的新圣衣收藏室，佛罗伦萨的劳伦齐亚纳图书馆和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圆顶。

国外仍盛行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建筑难于流行。法国的某些宫殿和教堂的建筑就是这两种风格的混合物。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风格才占压倒优势。在德国，在更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在抵制文艺复兴风格，或为混合式建筑。

十六世纪的雕刻，如果没有米开朗琪罗，就会劣于上一个世纪。米开朗琪罗起步于仿古艺术，用大理石创作雄壮伟岸、力量饱满的雕

像，从而表现其极强的理想主义（如："大卫像"、"摩西"，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中的美第奇家族的石棺）和内心的紧张状态。他的绘画（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具有同样特性。无论是雕刻还是绘画，米开朗琪罗堪称一代宗师，其统治地位坚不可摧，影响着以后整个艺术传统。但在绘画方面，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其中有举世闻名的巨匠：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作者，他集雕刻家、工程师、自然科学家于一身，多才多艺，是文艺复兴中最全面发展的一位伟人；拉斐尔，他把完美的形式同优雅的意境、表现的效果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无与伦比的境地，他的画自然独到，画中古代和现代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梵蒂冈各室和凉廊的壁画、法尔内西纳宫的壁画、圣母像、基督显容像以及其他人像等）；安东尼奥·阿莱格里，又名科雷焦（1494—1534年），他作画线条柔和圆润，充满生气和活力（帕尔马大教堂的圆顶）。

在这两个世纪内，除了这些巨匠外，还形成各地方画派。伦巴第画派，此派深受达·芬奇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尔纳迪诺·卢伊尼（1530年卒）；艾米里亚画派，代表人物是弗朗切斯科·拉伊博利尼，又名弗兰恰（1517年卒）；翁布里亚画派，佩鲁吉诺和平图里基奥两位画家为此派代表。

然而，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是最大的画派。佛罗伦萨画派继承了十五世纪的绘画艺术，主要表现于人物造型讲究优美，线条富于表情，构图机巧瑰丽，达到形式和色彩上的高度协调，完美无缺。巴尔托洛梅奥·德拉波尔塔（1472—1517年）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486—1531年）为此派的佼佼者。威尼斯画派的特点是：形式多样、色彩鲜艳、格调明快、景色开阔、刻画精熟。除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名家外，当时的画家有：乔治·巴尔巴雷利，又名乔尔乔涅（约1487—1510年）；现代风景画创始人之一，老雅各布·帕尔马（约1480—1528年）；多产的、杰出的画家提香·韦切利奥（1477—1576年），在几乎整个十六世纪，他一直在从事绘画艺术，创作了大量的、

题材广泛的作品；洛伦佐·洛托（约1480—1556年）；保罗·卡利亚里，又名韦罗内塞（1528—1588年）；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1485—1547年），后来受米开朗琪罗的影响。米开朗琪罗画派对雅各布·罗布斯蒂，又名廷托雷托（1518—1594年）产生重大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动势、戏剧性的力量、大胆的革新均达到了惊人的效果。

国外，法国的绘画和雕刻多半模仿意大利风格。在佛兰芒，当地画派依然朝气蓬勃，但出现了一个完全受意大利影响的画派。在德国，仿意派终于战胜民族绘画艺术，十六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个卓越的画家：阿尔布雷克特·丢勒和小汉斯·霍尔拜因。

在人文主义发掘古代原始材料、追求各种知识的影响下，十六世纪上半叶科学也有了巨大的发展。直接学习古典文献以及促使人们走上新道路的那种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导致科学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自然哲学摆脱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枷锁，解放思想。但是，大部分自然科学还具有幻想的，甚至是神秘的性质，它们把宇宙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赋予每一事物以自身的生命和隐蔽的特性。当时，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才对医学的研究给予特殊的重要意义。科学家几乎都是医生，也有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师。然而他们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特殊的观察和极有价值的研究。

在这一领域里，意大利与外国差不多，并不占优势。除两个德国名人海因亨利希·科内利乌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1486—1535年）和菲利普·特奥弗拉斯特·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又名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年）外，伦巴第人杰罗拉莫·卡尔达诺（1501—1576年）也是当时大科学家之一。他发现世界的精髓是热，提出了一种近似于现代有关火的理论。在这类科学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化学元素。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离现代科学实验还相当远。但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一位在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面的天才，首先认识到科学实验以及科学实验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意义。

布鲁塞尔人安德烈亚斯·维萨里是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著有《人体构造》（1543年）一书；他虽不是第一个，但已广泛从事解剖，

从而开创了意大利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他的弟子克雷莫纳人马泰奥·雷亚尔多·科隆博第一个解剖活体狗，他写的《解剖学》一书阐述了西班牙人塞尔韦特（见第87节）已意识到的肺循环系统。

数学取得巨大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意大利人。杰罗拉莫·卡尔达诺，他继承了另一位高明的数学家和机械师尼科洛·塔尔塔利亚（1500—1557年）的工作。在他的《大衍术》一书中提出了解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代数方法，发展了“虚数”的概念。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科学著作——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问世于遥远的、还是半开化的普鲁士。哥白尼总结了前人的理论，简明地阐述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说。这样，他完全推翻了中世纪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地心学说。这一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路德讥笑它，梅兰希顿斥之为荒谬，违反《圣经》。

第十四章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意大利的支配者——帝国和教皇国

87　帝国和教皇国的关系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运动

使意大利丧失独立的查理五世-克力门七世协定，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是意大利史上的一块里程碑。随后帝国和教皇国龃龉不断，甚至还打过一仗。但是，除这一个别事件外，罗马教皇国从那时起放弃争夺意大利的政治霸权，仅满足于维持自己的教会国家，而帝国也不再反对教会国家。帝国现在比过去更无法在意大利进行直接统治，不过在前意大利王国领土上——不仅在蒙费拉托（见第88节），而且在费拉拉公国，在佛罗伦萨，以后还在锡耶纳——又重新确立了最高主权，并且比城市国家时期更牢靠、更广泛。西班牙在伦巴第的统治同样要经过皇帝的授封，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也要得到教皇的授封。中世纪最强的政权在西欧政治事务中无所作为，但在意大利反对地方自治和意大利各独立国家的斗争中却以最后胜利者自居，并在这些国家的精神和司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外国统治。

教皇国实际上已丧失对意大利的政治统治，但在宗教和精神领域内取得了补偿。十六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有的经过新教

革命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这场革命始于1517年，由路德发起；1555年在德国取得胜利，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胜利还要早一些）；有的至少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一方面承认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脑，另一方面又牢固地扎根于本民族的国土上并受本国君主的控制，如法国和西班牙。1516年利奥十世与弗兰西斯一世签订协议后，法国建立了自己的“法国教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均由法王任命（由教皇确认）；教廷对法国教会收入的征税权有明确规定，且极为有限；教皇的宗教裁判权亦是如此，一般来说，宗教诉讼全部在法国土地上而不是在罗马进行。在西班牙，国王对西班牙教会的权力极大，可用宗教史学家在谈及这一权力对使用“神俗一体政治”这一专有词汇来表达。

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有类似的情形——程度要轻得多——，因为威尼斯是半岛上仅剩的一个强盛的、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其他地区——包括西班牙统治区在内，尽管那里还有较多的限制和矛盾——，教皇国的宗教统治（当时对世俗生活影响极大）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反新教改革的斗争又大大地巩固和扩大了这种统治。

教皇国和帝国在这场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是它们取得协议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德国的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关于反对赎罪券的讲道；当教皇克力门七世在波洛尼亚为查理五世加冕时，这一运动已席卷德国大部，帝国的许多国家纷纷支持并自立为新教会的领袖。1529年，他们抗议施佩耶尔国会通过的一项他们不能同意的决定，从而取名“耶稣教徒”（或“新教徒”）。新教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只信仰耶稣基督（否定天主教活动及其一切信仰机构有救世价值），《圣经》是唯一信条（否定教会传统和教皇权力）。1530年后不久，法国人加尔文的说教开始在法国和瑞士盛行，他的主张更激进，更反教皇，其活动中心在意大利门口的日内瓦。

在意大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反，改革思想早已大量存在，不仅社会和文化界上层人物能接受，而且普通老百姓也能理解。神职人员（包括教皇和罗马教廷在内）道德上的颓废、宗教上的衰落

在文艺复兴时期极为严重，给传播改良思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对于这种腐败现象，萨沃纳罗拉曾试图反抗，他死后还有无数忠实的追随者在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普遍带有个人性质，只涉及个人信仰的改变，而不主张公开脱离旧教会，没有成立强大的组织。因为这类活动得不到各国的支持，又因为教皇驻在意大利，且主教和君主们对教皇一向格外虔诚，要成立这类组织谈何容易。西班牙人胡安·德巴尔德斯（1541 年卒）在那不勒斯做过这类宣传，但更大程度上带有感化性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加入他的小圈子里的有一些杰出的、有教养的贵妇人，如朱莉娅·贡扎加和维多利亚·科隆纳；由于后者的影响，运动也波及米开朗琪罗。这些俗人没有一个与教会决裂，然而路德宗的核心——为（只有一个）信仰辩护的原则——在他们中间还是起着主导作用。起来反抗的却是这一集团中的教士和修士，如：嘉布遣会会长、著名的深受欢迎的布道士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1487—1564 年）和奥古斯丁会神甫佛罗伦萨人彼得罗·马尔蒂雷·韦尔米利（1500—1562 年）。宗教改革运动在卢卡蓬勃发展，十六世纪中叶政府进行镇压，新教徒纷纷逃往日内瓦。另一个改革中心是威尼斯，因为威尼斯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其政府在宗教上持宽容、独立态度。在威尼斯国家宣传新思想的有：一些方济各会的修士，教皇使节卡波迪斯特里亚主教皮耶尔·保罗·韦尔杰里奥（1565 年卒）和世俗教徒贝尔加莫人杰罗拉莫·赞基。在伦巴第，宗教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克雷莫纳城成了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团体的典范，这在意大利实属罕见。皮埃蒙特只有切利奥·塞孔多·库廖内（1503—1569 年）等几个人在宣传新思想，但重要的是皮埃蒙特支持瓦尔多派（见第 49 节）在钱福兰主教会议（1532 年）上提出的加尔文式改革。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新教瓦尔多派教团遭反宗教改革派的血腥镇压。

在意大利天主教界——起初的性质很难区别于意大利的福音派——大约从 1520 年开始出现宗教革新运动；它表现极端虔诚并形成各种各样的修会，其中大部分的宗旨是对人民进行天主教教义的教育，如：

泰亚泰会（成立于1524年，创始人是圣加埃塔诺·达蒂耶纳和泰亚泰主教彼得罗·卡拉法），巴尔纳巴会（1530年），索马斯卡会（1532年）。嘉布遣会（1528年）是一个新的更刻板的圣方济各会，提出全面地、一成不变地恢复最初的教规。此会对人民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起初罗马教廷没有积极参与这一改革运动。阿德里安六世赞成之，但在位仅两年，且在教廷中没有人缘；克力门七世纯粹是一个文艺复兴式教皇，完全卷进政治事务；相反，保罗三世（见第88节）虽生活奢侈，任人唯亲，但接受改革派的影响，把改革派的领袖孔塔里尼、萨多莱托、卡拉法和英国人波尔选进红衣主教团。他们在教皇的命令下于1537年起草了一份大胆的改革计划。孔塔里尼和波尔，还有莫罗内（保罗三世也把他提升为红衣主教）等几名高级教士也受福音派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孔塔里尼企图与德国路德教达成协议，也告失败。相反，卡拉法使运动具有明显的镇压性质，促使教皇重组宗教裁判所（1542年），在罗马（罗马教廷）设立最高法院，对意大利的任何耶稣教派进行有力镇压。1542年是意大利耶稣教运动失败的关键性一年。奥基诺和韦尔米利逃到阿尔卑斯山北边。从此意大利改革派的一些重要人物纷纷逃往国外，大部分到处流浪，也有一些成了意大利流亡宗教团体的领袖。不过，耶稣教的宣传在意大利并没有停止。在威尼托地区正盛行再洗礼派，此派给成人洗礼，信奉精神内心的启示，否定国家、教会和任何外部的强制形式。另一耶稣教派是反圣三位派，此派虽同样激进，但却是唯理论的，不是神秘主义的，它像古代阿里乌斯教一样赞成上帝一位说，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此派内意大利人占优势。西班牙人塞尔韦特被加尔文用火刑烧死在日内瓦后（1553年），锡耶纳人莱利奥·索奇诺（1562年卒）和福斯托·索奇诺（1604年卒）成为国外的、尤其是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反圣三位派领袖，并在那里建立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教会——索奇诺教会。一般来说，逃亡在瑞士、德国、波兰等地的意大利改革者都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是他们（上述的索奇诺派例外）对其他改革派领袖和所谓“正统的”耶稣教会领袖进行批评，甚至反对。他

们之中出现了第一批支持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的人物（塞尔韦特案对他们是一大促进），但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不仅受到天主教会的反对，耶稣教会也不予承认。

为解决耶稣教运动造成的严重宗教危机，有人设想召开一次大公会议，阐明与罗马教会当局的分歧点，进行一个世纪以来普遍要求的宗教改革；正是由于过去没有举行这种会议才给宗教革命创造了适宜的土壤。为推动大公会议的召开，天主教改革派觐见皇帝，因为皇帝希望通过大公会议在德国恢复政教一体化。教皇国对大公会议计划的态度较为犹豫，害怕削弱自己的权力，尤其害怕复活大公会议高于教皇的原则。对付这种宗教局面，教皇和皇帝需达成一项持久的、紧密的协议，然而他们两人在意大利政策上总是争吵不已；此外，皇帝和法王也需真正和解，因为法王又叫“基督教化的”国王，被看做世俗基督教徒的第二领袖。意大利事务对他们的和解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教皇对意大利政策又是一个首要的因素。

这种政治、宗教错综复杂的局面，正是意大利从查理五世加冕（1530 年）到《卡托-康布雷齐条约》（1559 年）这段历史的特点。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威胁也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的复杂因素，教皇国和意大利对此都特别关注。谢里姆一世（1512—1520 年在位）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吞并了叙利亚和埃及（1516—1527 年）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土地，在东方有了巨大的发展。土耳其海盗海尔丁（我们称其为巴巴罗萨）取代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君主，接受苏丹的保护，成为地中海的一位统治者。谢里姆的继承人高贵者苏莱曼（1520—1566 年）占领罗得岛——耶路撒冷骑士团从这里转移到查理五世作为西西里王国的封地赐封给他们的马耳他——，征服几乎整个匈牙利——1526 年作为皇室遗产传给哈布斯堡家族——，进而威胁维也纳。1503 年土耳其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的和约在这一时期继续生效，根据和约，威尼斯放弃摩里亚半岛上许多要塞，包括最重要的梅托尼要塞。显而易见，如果土耳其征服奥地利，那也将是威尼斯共和国末日的开始。

88　最后抗击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霸权《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与查理五世和解后，克力门七世又重新向法国靠拢，把乌尔比诺公爵的嫡出女儿卡泰里娜·德美第奇许配给弗兰西斯一世的次子亨利（后因弗兰西斯一世的长子去世，他成为法王亨利二世）（1533 年）。克力门七世亡故后，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继承，号保罗三世（1534—1549 年在位），新教皇在法国和帝国之间更加摇摆不定。

法国和帝国重开战事的新因素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之死。他死后无嗣，米兰公国自然并入帝国版图。弗兰西斯一世要求把米兰公国赐封给其次子，遭拒绝，遂动用武力。他首先向忠实于皇帝的萨沃依公爵查理三世（似乎称二世更确切些）开刀。阿梅代奥八世（见第 74 节）去世后，萨沃依国家经历了一段持久衰败时期。如今，法国占领并吞该国（1536 年），从而在意大利夺得了一个巩固的基地。皇帝在热那亚舰队的帮助下，攻入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饥饿和疾病，加上马赛久攻不下，迫使皇帝撤退。

法王与土耳其结盟对抗哈布斯堡。1535 年查理五世讨伐突尼斯，获胜，重新扶植起被巴巴罗萨废黜的君主，自己占据古莱特和许多港口。1537 年巴巴罗萨劫掠那不勒斯海岸；这时正值教皇、威尼斯同皇帝结盟。巴巴罗萨进攻科孚受挫，但占领了属威尼斯各家族的群岛中的一批岛屿。为联合基督教大国对抗土耳其，为促进大公会议，教皇保罗三世亲赴尼斯，在皇帝和法王间进行斡旋，终于促成维持十年现状的停战协议（1538 年 6 月）。原订 1537 年 5 月在曼图瓦召开大公会议，后改在维琴察，但因种种困难未能举行，1539 年 5 月被无限期推迟。1538 年 9 月盟军武装力量在阿尔塔海湾入口处的普雷维扎与土耳其开战，但战事尚未见高低时就撤出战场（据说是由于敌视威尼斯的查理五世和他的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采取了两面政策）。土耳其重新控制了海洋。1540 年威尼斯同土耳其苏丹缔结和约，让出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以及莫内瓦西亚和瑙普利翁两城。1541 年查理五世讨

伐阿尔及利亚惨败。

在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开战期间，佛罗伦萨发生了一次危机，结果巩固了依靠西班牙的美第奇专制政权。亚历山德罗公爵行为放荡，生活骄奢淫逸，而不那么独裁，佛罗伦萨贵族成立了一个反对党，以对抗公爵，为首的是公爵的朋友菲利普·斯特罗齐。参加者除先前拥护共和制的流亡者外，又增加了不少力量。他们上书皇帝，请求恢复共和制度，但毫无结果；而皇帝却在这时大张旗鼓地庆祝其私生女玛格丽特与公爵的既订婚礼。常陪公爵戏耍的伙伴、才子加流氓的洛伦齐诺·德美第奇（属旁系）意欲除掉公爵，这也许出自追求荣誉，热爱共和，也许出自希望作为嫡出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取而代之。他引诱公爵落入圈套，在一名刺客的协助下把他刺死（1537 年 1 月 6 日），事后逃往威尼斯。民众没有行动；被害者的堂兄弟黑带子焦万尼（见第 85 节）之子科西莫被全城显贵——其中有圭恰迪尼——推举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首脑（1 月 9 日）。皇帝颁旨，指定他为世袭公爵，而辈分可能最近的洛伦齐诺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佛罗伦萨的流亡者集结少数部队，打入佛罗伦萨领土，在普拉托附近的蒙泰穆尔罗，被美第奇军队击败（1537 年 8 月）。许多首领落入公爵之手被处死；斯特罗齐在监狱中自杀（1538 年）。

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的尼斯停战协定尚未到期就被撕毁。查理五世把米兰地区赐封给自己的儿子菲利普（1540 年 10 月）后，弗兰西斯一世又同土耳其苏莱曼达成协议，对西班牙和低地国家施用武力（1542 年），但一无所获。然而，由于巴巴罗萨舰队的帮助，法国在地中海大抖威风。在欧洲一片抗议声中，法国与巴巴罗萨联合，包围了萨沃依公爵仅剩的最后一个城市——尼斯。尼斯城投降，但古堡仍在抵抗敌人的进攻，一支援军快要到达的时候，敌人才撤围（1543 年）。弗兰西斯一世看到与土耳其结盟引起了普遍的敌对情绪——在德国天主教徒同耶稣教徒联合支持皇帝反对土耳其——也发觉巴巴罗萨给法国沿海地区带来了不少危害，于是赠之以厚礼，将他辞退。巴巴罗萨撤退时所经意大利沿海地区均惨遭劫掠，损失严重，俘获数千

之众。陆上的战争益发激烈。1544 年法国人在皮埃蒙特的切雷索莱大战告捷，但在卢森堡和鲁西荣一败涂地。英国和帝国的两支军队进入法国，胁迫巴黎。1544 年 9 月签订《克列比和约》，法王放弃对米兰和那不勒斯的一切权利，但规定将米兰赠送给一位应嫁给弗兰西斯一世的第三子的奥地利公主做嫁妆。但弗兰西斯的第三子短命，查理五世占据伦巴第，法国将皮埃蒙特划归已有。

现在查理五世开始着手解决德国的宗教问题，以期巩固帝国权力。1545 年 12 月 13 日终于在特兰托召开大公会议。德国的耶稣教徒拒绝参加。皇帝决定对其施用武力，为此目的，与教皇秘密协议。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1547 年，因在施马尔卡尔登成立耶稣教同盟而得名），以皇帝大胜告终，他因而认为可以强行实施其宗教和解计划。可是，这时与教皇在宗教和政治上又出现了争执。大公会议的进程并不符合皇帝的意图，而且会址另择波洛尼亚（1547 年 3 月），并于 1548 年 2 月休会。这是因为教皇害怕得胜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以及在意大利政治事务上拥有的权势。

那时，想要改变事物现状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在卢卡——1532 年丝业行会的危机引起了一场“痞子”暴动——弗朗切斯科·布尔拉马基阴谋推翻寡头统治，组成托斯卡纳城市联盟，把宗教自由与公民自由连在一起（见第 87 节）。密谋败露，布尔拉马基被送到米兰处死（1546 年）。热那亚的菲耶斯基谋反最为严重。安德烈亚·多里亚年事已高，于是将掌握的舰队指挥权以及在热那亚拥有的巨大实权均移交给野心勃勃、专横跋扈的孙子詹内蒂诺。宽宏大度、深受人民爱戴的吉安·路易吉·菲耶斯基与詹内蒂诺在政治和私交上均不共戴天。菲耶斯基密谋与法国达成协议，策划推翻多里亚统治，改变体制。1547 年 1 月 3 日夜，叛乱爆发，詹内蒂诺被杀。正当叛乱者认为胜利在望时，菲耶斯基在港口跳越船只时不慎落水淹死。在此情形下，叛乱者被驱散制伏。

可以说，帕尔马-皮亚琴察公爵皮耶尔·路易吉·法尔内塞曾插手菲耶斯基的谋反。他是保罗三世的私生子，教皇为他特意封这两城为

公国（1545 年），尽管此举遭到红衣主教团的强烈反对。对此二城，皇帝仍拥有自己的权力，不批准这次授爵，当法尔内塞投靠法国时，皇帝对他更加敌视。保罗三世由于害怕西班牙权势，希望米兰地区转到一个意大利君主手中——最好是他家族中的一员——，如物色不到这样一位人物，就交给一个法国人。

皮耶尔·路易吉腐化透顶，但不乏治国之才。他在公国内部依靠民众来反对贵族，因而招致贵族的极端仇视，贵族密谋推翻他。1547 年 9 月 10 日公爵被杀。米兰总督弗兰特·贡扎加是这一事件的唆使者，事后他占领了皮亚琴察。帕尔马立已故者的儿子、皇帝的女婿（与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的遗孀玛格丽特结婚）奥塔维奥为城主。保罗三世即与威尼斯、法国商淡，但无具体结果。皇帝也要求帕尔马隶属帝国。

问题尚未解决，保罗三世驾崩，享年八十二岁（1549 年 11 月 10 日）。保罗三世一向对文艺事业慷慨赞助，他的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式的教皇国的结束。其时，政治绝对高于宗教，有时伴随着相当严重的精神现象。他之死也可以说是“极端任人唯亲”政策的终结，这种政策在教会领土上造成了一些由在位教皇家族统治的公国。虽然皇亲国戚以后仍然得到不少封地，但远不如以前那样重要。程度较轻的任人唯亲现象依旧，因为教皇一心一意扶助亲戚发财致富，使他们位列罗马公卿贵族行列，授予他们以宗教和世俗职位；教皇屡屡起用一位红衣主教亲戚（“侄子红衣主教”）任国务大臣——后称国务卿。

1547 年 1 月弗兰西斯一世谢世，其子亨利二世即位（1547—1559 年），他与查理五世又结怨。在意大利，继承保罗三世的是尤利乌斯三世（1550—1555 年在位）。为了争夺帕尔马公国，法国人和帝国开战，奥塔维奥得到法国人的保护，而反对奥塔维奥的新教皇和皇帝联合。后达成停战协议，帕尔马仍归奥塔维奥。但是，法国和帝国的战争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以及境外还在继续。在萨克森伯爵莫里斯领导下的德国耶稣教徒举行起义（1552 年 3 月）得胜，使 1551 年 5 月在特兰托重新召开的大公会议又一次中断（4 月）。亨利二世鼓动盟友苏莱

曼派舰队开进地中海，土耳其舰队占领勒佐后，在蓬扎一举击溃了西班牙军队。土耳其舰队本应与法国舰队一起进攻那不勒斯，但白白地等了好几天，法国舰队未到，其司令返回君士坦丁堡。企图占领那不勒斯失败后，亲法派鼓动驻有西班牙军队的锡耶纳反叛皇帝：西班牙驻军被赶跑，城堡被拆除，体制予以改革。亨利二世派兵支援该城。

亨利二世派菲利普之子、官至法王派驻意大利的摄政官、法国元帅的皮耶罗·斯特罗齐进驻锡耶纳，这使科西莫·德美第奇十分害怕，即派兵侵入锡耶纳的领土。锡耶纳英勇抵抗。为解除对该城的包围，斯特罗齐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进行野外作战。但是，兵力占优势的德美第奇军队在基亚纳山谷的马尔恰诺地方打败了斯特罗齐（1554 年 8 月 2 日）。锡耶纳继续抵抗，连妇女也参加防御，最后粮尽，被迫投降（1555 年 4 月 17 日）。根据条约规定，锡耶纳仍应保持自由政体——这仅是一纸空文。大约有两百家被迫移居外地，一些最勇敢的人跟斯特罗齐一起撤到蒙塔尔奇诺，建立一个小小的共和国，1559 年投降。科西莫从菲利普二世手中得到锡耶纳城和全部领土。但奥尔贝特洛、塔拉莫内、蒙特·阿尔真泰罗、埃尔科莱港和圣斯特凡诺港除外，因这些地方已成立了（1557 年）西班牙统治下的“驻军国”。卢卡早已成了罗马和西班牙打击的异教中心（见本节和第 87 节），同时又中了科西莫设的圈套，于是卢卡政府加强了对异教徒的镇压，保住了自己。

这期间，查理五世因疾病折磨和国事操劳过度，身体早虚，不堪负重，决意让位，意欲把国家交给一强有力的人物。他与耶稣教头面人物缔结《奥古斯塔和约》（1555 年 9 月 5 日）——规定路德教和天主教一样有权决定教徒的信仰问题——，又和法国签订《沃塞尔停战协议》（1556 年）。之后，他把低地国家、西班牙王位以及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传给儿子菲利普二世（1556—1598 年），但帝国的继承权没有传给儿子，而让给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希米亚王斐迪南（1556—1564 年在位）。查理五世隐退到西班牙的圣米斯托修道院，1558 年 9 月 21 日卒。

1555 年尤利乌斯二世病故，其后是只有几天寿命的马尔克卢斯二

世教皇，然后由宗教裁判所（见第87节）头子焦万尼·彼得罗·卡拉法继承，取号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他为意大利摆脱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统治进行了最后一搏。这位极其热心的天主教领袖鼓动土耳其反对匈牙利和西西里，促使德国耶稣教徒反对信仰天主教的皇帝，说服法王撕毁《沃塞尔停战协议》。当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巴公爵侵入教廷领土时，一支由吉兹公爵指挥的法军进入意大利，援助教皇。但是，吉兹公爵被那不勒斯击退，阿尔巴公爵直逼罗马。萨沃依的伊曼纽尔·菲利贝托率领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从低地国家侵入法国，在圣康坦地方大败法军（1557年8月10日）。吉兹公爵被召回法国，教皇不得不与西班牙签订和约（9月）。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元气稍为恢复后，两位君主身心交瘁，又都热衷于反对异教，这一切促使他们于1559年4月3日缔结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根据和约规定——这一和约就当时来说结束了法国王室和奥地利王室的长期斗争，使奥地利王室在欧洲暂居优势——，法国在意大利获得萨卢佐侯爵封地，但必须把祖传的领地、除一些要塞外全部还给伊曼纽尔·菲利贝托；西班牙保留伦巴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科西嘉属于热那亚；蒙费拉特属曼图瓦公爵，因曼图瓦公爵作为巴列奥略家族的后裔已于1536年从查理五世那里获得了这块土地；蒙塔尔奇诺归科西莫一世。此外，菲利普二世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已把皮亚琴察还给了奥塔维奥·法尔内塞。

89　特兰托大公会议和反宗教改革　耶稣会修士

虽然保罗四世对意大利政治事务的最后一搏遭到失败，但教皇国通过大公会议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宗教政策上取得了胜利。1562年1月大公会议再次在特兰托召开，1563年12月4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教皇特使的领导下进行的，意大利人和教廷派人数居多。

大公会议本想与耶稣教徒达成协议，但告彻底失败，一方面是由于耶稣教徒所取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大公会议完全按照天主教的理论来阐明所有有争论的教义问题。大公会议宣布圣传是信仰的基础，解

释这些圣传的唯一职能机关是教会当局，证实这些圣传的是信仰和活动；大公会议还确立了天主教的圣事制度。不过，主教派和教廷派间还是有斗争的：前者认为主教管辖权直接来自耶稣基督，后者认为来自教皇，争论没有结论。然而教皇权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大公会议是由教皇特使领导和控制的，且大公会议的结论和解释权又要提请教皇批准。会议还做出了一系列有关天主教改革的重要决定：废除宣扬赦罪的讲道；减少教廷的税收；禁止领取几份俸禄；强制规定主教住地；改善神甫状况；改革修会；开设神学院教育教士。

特兰托大公会议对天主教事关宏旨。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天主教的性质，出现了天主教与耶稣教不可挽回的分裂，并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使天主教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

天主教再兴首先表现于教皇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其精力主要集中于世俗事务，而现在所有教皇都关注本身的教会事务。这种转变还不彻底，也不坚定：任人唯亲仍有表现（见第 88 节）。总的来说，教皇国在宗教和道义方面的革新是持续不断的。然而其政治力量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分量上都不能与中世纪时期相比。就是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天主教的政治首脑也不是教皇，而是菲利普二世。但是教皇国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观点。保罗四世发布了（1559 年）一条通谕。根据教皇对其臣民和属国拥有全权的原则，通谕宣布废除异教徒的一切职位和权利，他们的财产谁占有就赐给谁。虽然西班牙王朝是正统天主教的楷模，但因执行“神俗一体”政治（见第 87 节），教皇国仍与它不断发生冲突。争端主要涉及西班牙王作为诺曼王（所谓“西西里君主国”）的继承人在西西里享有的一切特权。教皇国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也很难执行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定：是否传达有关纪律的训令要由世俗政府决定，这种传达特别在法国遇到很大困难和拖延。

然而，在意大利教皇可以把反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到底。最后一点耶稣教残余也被肃清。继保罗四世的是庇护五世（1566—1572 年在位），他在这方面怀有不可遏制的热情。受害者中值得提到的有：彼得罗·卡尔内塞基（1567 年卒）和阿奥尼奥·帕莱亚里奥（1570 年

卒）。教皇公布的（1564 年）定期修改的“禁书目录”用于控制任何一种非正统的理论，而罗马宗教裁判所及其在意大利各地的附属法庭用之于对异端派的镇压和物质惩罚。为了巩固宗教信仰和纪律，并使之统一于罗马教廷，教皇出版了罗马教理问答手册（1566 年）、修改后的日课经（1568 年）和祈祷书（1570 年）、人人必读的《教会法典大全》（1582 年）和拉丁语、俗语《圣经》（1592 年）的修订本。

对天主教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那些新建的修会，而不是教皇国的直接行动。这些修会的性质同古老的修道生活极不相同。中世纪末，托钵修会已在世界上开展了不少有益于教会的活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传教等），新修会恢复、加强了这些活动，并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苦修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此来发挥个人的全部力量，达到壮大教会和修会的目的。除上面提到的修会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奥拉托利会，由圣菲利普·内里（1515—1595 年）创办，其中有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参加；奥尔索拉会（1537 年）和撒肋爵会（1610 年），以教育妇女为宗旨；遣使会（1625 年），由温琴佐·德保利创办，主要向人民传教；仁爱会，由温琴佐·德保利和罗意斯·德马里亚克共同创建。耶稣会最重要，其他修会无法与之相比，它成立于特兰托大公会议前。

耶稣会由依纳爵·德罗耀拉创立（1534 年），他原是一位西班牙贵族军人。耶稣会于 1540 年获得保罗三世批准。该组织规定，所有会员应严格服从共同目标，放弃自身的个性，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修会最高领导为会长（终身的），拥有极其广泛的权力；会长以下为省会长（管辖修会各教省）；再下一级是教堂主管。会长严格控制整个修会，同时又受其助手的监督；会长由总会选举，某种情况下也可罢免，因而其权力受总会约束。总会主要由受戒者组成。受戒者是修会最高级别，只有四十五岁以上的少数几个人才能升到这一级别。除各修会的共同三愿（神贫、贞洁、朝圣）外，他们还宣布第四愿（无条件服从教皇），这也是耶稣会的特点。每个修士一进修会都要参加长期的培训班，学习俗事和圣事。除文化教育外，还用依纳爵所著《退省》

一书鼓励会士信仰上的创造性，培养会士极端虔城；《退省》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天主教界教士和教徒的虔诚准则。

修会最高宗旨是建立天主教教会的统治权，促进异教徒和邪教徒顺服和皈依。在天主教教义范围内，修会极力支持教皇的绝对权威和无误论（耶稣会士红衣主教贝勒明是反宗教改革运动重要神学家之一）。为此目的，修会要求尽可能左右对大学生的教育，尤其对其他阶级和王子们的教育，尽可能左右对异教徒和邪教徒的文化和传教工作，尽可能左右司铎职责，特别是忏悔，并向高层社会和各宫廷派出指导神修的神甫。在这一方面修会根据教义盖然说（其道德准则虽令人怀疑，但因得到公认的权威的支持而具有或然性，则允许其进行某种方式的活动），根据思想保留说（说法本身是错误的，但说话人的思想中已有改正），根据意向说（一种行动即使本身不合法，但其意图是好的，亦可允许），对道德忏悔者实施一定的宽容。

修会在拉丁各国、德国、荷兰发展极快。修会创办许多学院，学生众多，一般教徒也可人学受教育。著名的学院有：罗马公学（1551年）和日耳曼公学（1552年创办，校址也在罗马，其目的是教育德意志教士）。

90　勒班陀战役

勒班陀一役的胜利是教皇国和天主教世界的一大成就，有益于意大利和整个欧洲。菲利普二世继承父业，在非洲与土耳其人周旋，但收效甚微。1560年，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在杰尔巴岛海面被歼灭。然而，高贵者苏莱曼派出的一支讨伐马耳他的庞大远征军遭拉瓦莱特率领的、得到西班牙某些军队支援的骑士团英勇抵抗，讨伐失败（1565年）。

巴巴罗萨（见第88节）及其继任者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突尼斯地区，抗击了西班牙人，制伏了内地土著首领、阿拉伯和吉伯尔首领。土耳其在北非的统治使地中海形势变得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严峻。这些蛮族首领的战船也有长足发展，他们的主要港口成了海盗中心。

海盗船长组成一种行会，极其强大，如同一个国家。北非海盗在地中海一直横行到阿尔及利亚落入法国之手（1830 年）的前一个世纪。

苏莱曼的继任者谢里姆二世（1566—1574 年在位）王朝时期，土耳其同威尼斯的战事又起：土耳其人侵入塞浦路斯，攻陷尼科西亚，围困法马古斯塔。威尼斯向其他基督教大国求援，在庇护五世的有力推动下，教皇、威尼斯、西班牙、托斯卡纳、萨沃依缔结同盟（1571 年 5 月），一致对付土耳其。但盟国援救法马古斯塔的行动过于迟缓。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迪尼率领一支不到八千人的部队抗击一支强大的军队，奋勇消灭七万五千名围城的奥斯曼士兵后，不得不投降。后投降协定被撕毁，基督教将领惨遭屠杀，布拉加迪尼本人也被活剥。其时，在墨西拿集结了一支盟军，其中有：一百一十四艘威尼斯的双桅战船，由塞巴斯蒂亚诺·韦涅尔和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率领；八十一艘西班牙战船，由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十二艘教皇国战船，由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率领；三艘萨沃依公爵的战船，由安德烈亚·普罗瓦纳指挥；还有三艘马耳他骑士团的战船。船上载有两万士兵，半数以上是意大利人。最高统帅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堂约翰。在勒班陀海湾入口处两军交火。土耳其军由阿里帕夏指挥，拥有双桅战船二百零八艘，轻战船六十八艘。中路，韦涅尔和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登上阿里战船，阿里被杀，土耳其人全线崩溃；左翼，巴尔巴里戈亦大胜，但他本人阵亡。右翼，多里亚故意拉长战线；土耳其左翼趁机突破，在消灭基督教后卫部队（其中有马耳他骑士团的战船）后安全脱逃。此战，土耳其人损失惨重，伤亡达两万至三万人；作为奴隶的一万二千多名基督教桨手获解放，获自由（1571 年 10 月 7 日）。由于西班牙不愿为威尼斯的壮大而战斗，退出战争，由于土耳其舰队重新出现在爱奥尼亚海上，共和国不得不缔结和约。根据和约，共和国恢复在东方的贸易特权，但割让塞浦路斯，偿付战争赔款（1573 年）。拉古莱特也被土耳其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所以，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只是在时间上牵制了一下土耳其，奥斯曼人仍在南方威胁着威尼斯残剩的属地，在北方威胁着中欧。

第十五章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

91　该时期的诸特征　西班牙各国的形势

十二世纪起至十六世纪初这几个世纪意大利历史的特点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动荡不安；为数众多的政府和层出不穷的党派相互斗争。之后，随着西班牙的政治统治和教皇的精神统治的最终确立，意大利出现了在外国统治下的独裁专制政府和反宗教改革的教会政权，形势变得风平浪静，统治清而一色。意大利不再是创造欧洲历史的一个因素；即使那些仍旧保持独立的国家，在重大的国际政治事务上，在深受西班牙直接统治或者受西班牙操纵的半岛本身的命运上，其作用也受到极大的削弱。唯法国尚存在某种对抗这种优势的活动。因此，意大利诸国只具备着徘徊于一个和另一个强国之间的有限的能力。

在意大利这段历史时期内，并非一切全是消极的。各公国建政活动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在托斯卡纳和萨沃依国仍继续进行。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并为意大利保持了一点政治主动权。西班牙统治本身——其统治由米兰扩展到西西里并在半岛上占有绝对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角逐，使人感觉到确实存在着一个意大利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整个欧洲都是至关重要的。半岛各部分之间共同的民族意识非但没有泯灭，反而增强了。

《卡托-康布雷齐条约》后，意大利各主要国家是：

① 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公国（从阿达河到塞西亚）、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和普雷西迪国；

② 包括从塞西亚到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外的萨沃依在内）的萨沃依公国；

③ 威尼斯共和国，包括从阿达河到亚得里亚海、伊斯特拉半岛、达尔马提亚，直到拉古萨之间的领土，此外还包括塞浦路斯和克里特；

④ 热那亚包括与帝国封地呈犬牙交错状的利古里亚海岸东西两段和科西嘉；

⑤ 蒙费拉托侯爵封地和曼图瓦公国，尽管彼此领土相距遥远，却在贡扎加家族统治下联合在一起；

⑥ 法尔内塞家族统治下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国；

⑦ 埃斯泰家族统治下的费拉拉、莫德纳和雷焦公国；

⑧ 除了卢卡小共和国和普雷西迪国外，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统治下的托斯卡纳；

⑨ 教皇国。

除这些大国外，尚存在着我们业已知道的层出不穷的小国；直至法国革命前，这些小国才逐渐消失，这对于意大利的统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些小国有：德尔卡雷托家族的菲纳莱侯爵封地（于1598年转入西班牙），皮科·迪米兰多拉和迪孔科尔迪亚于1617年变为公爵；在教宗国，除了乌尔比诺公爵，这时还有法尔内塞家族统治下的卡斯特罗和（在拉齐奥的）龙奇利奥内。为了使人们对迄今尚存的意大利疆土如何支离破碎有一个概念，我们列举卢尼贾纳地区为例。那儿蓬特雷莫列属于米兰，萨尔扎纳属于热那亚，其余部分属于佛罗伦萨公爵或奇博家族；此外，那儿还存在着二十四个封建执政团，其中八个受托斯卡纳保护，八个受制于西班牙，八个直接依附于帝国。

联合于西班牙的国家，每个国家仍分别保留自己的行政权，维持着形式上的个性和地方机构，但这些机构享权有限，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机体，不能成为全体民众的代表机构。它们是一些相互斗争的，

因而有助于外国最高当局统治的阶级利益代表机构；外国最高当局的统治却是绝对的，没有遇到抵抗：不满和某些稀有的骚动一般针对地方当局，而不是指向西班牙王朝，王朝在那不勒斯王国使贵族完全归顺于西班牙，这是阿拉贡人无法做到的；现在，贵族对国王极其忠诚，还动用地方军队大张旗鼓地参与西班牙的征伐事业。

在米兰，设有路易十二建立的元老院，实质上是斯福尔扎的秘密议会的继续。查理五世再度赋予它以司法和行政职能（元老院是由议长、十四名法学家、七名来自伦巴第的七个主要城市的秘书组成）。还有财政局，这是维斯孔蒂和斯福尔扎统治下的公国政体的另一个残余物、它掌管国家的全部收入，裁决税务争议。此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议会和一个国务会。各阶级都有其代表，都有其特权；教会司法权也极难驾驭这些目的和界限含糊不清的体制；由大主教代表的教会司法权本可行使抽税，拥有法官、警吏、监狱，现常常与世俗当局发生冲突。

那不勒斯王国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由阿拉贡转入西班牙，新政权（除提到贵族的臣服外）当然也没有改善其境况。由教会、贵族和王室（后者代表直接受控于国王、不受控于封建领主的市镇——属于王族土地）三股力量构成的议会早已名存实亡，无任何效能。1642 年后，议会再没有召开过，而贵族议员继续在首都集会，其中还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总是议会和议员投票通过各种税收：这引起了人民对贵族的仇视，贵族被认为是这一沉重负担的同谋。直接税沉重地压在贫穷阶级身上；贵族和教士却不在其列。还有间接税，各阶层的人都分摊一些，但因其性质，自然大部分落到了不那么富裕的人头上。贵族将财政重苛压在人民和市政的身上，这种做法没有遭到政府的反对。每逢加冕、诞生或者涉及王室的事件，他们便大肆征收礼品以换取特权。残暴至极的赋税承包人对征税层层加码。1525 年，年入库为二百三十五万里拉，而到十七世纪中叶，达六百万里拉，可是国家的经济却越来越糟，受到高额税收、专营、禁止出口、货币贬值的困扰（全是王家政府在西班牙本国施行的体制）。几乎全部苛捐杂税落入承包

者和政府债权人的腰包，政府收入的一点点钱只能应付必需的花销。为了搞到钱，王国把绝大部分公产分封给教会和世俗绅士。在平民百姓之上，是与贵族和教士对立的有产阶级，该阶级主要是由法学家和律师组成，在那不勒斯尤为发展。西班牙政府为了刺激富有阶级的虚荣心，分封一大批贵族；新老贵族竞豪华比奢侈，使许多人家挥霍殆尽，门第破败；政府用金钱援助他们，以使他们效忠自己。王国的高级神职人员要求自立于罗马，受到了支持，但他们更加受控于政治权力。罗马的干预为王国认可书所遏止，因为要使罗马的法令畅通无阻，必须获得王国的认可书。王国指定一名特殊官员，即“大司铎”，来审查所有这些法令和涉及同罗马的教会关系有关的一切事务。

在西西里设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专门审理异教徒和类似犯罪行为的高级教会法庭，与罗马的那个法庭相类似，但依附国王），但由于当地的反对，这种机构既不能引入那不勒斯，也不能插足米兰。被分成教士、贵族和王室三股力量的议会的职权，实质上缩小到只为“赠礼”搞定期投票，虽然乘那些投票之机，人们也能表达些政治愿望。从1567年起，所谓“王国委派团”的议会代表制变为固定机构，成为捍卫贵族的工具。西班牙人垄断了谷物贸易，严重地损害了岛民的经济。

在撒丁岛也存在着一个由三股力量（或称斯塔门蒂-拉丁语）组成的议会，每十年召集一次会议，它握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洛古宪章》，一种地方古法典，即使在西班牙统治下仍具有效力。该岛分割成三百七十六个封地，几乎所有的封地隶属于西班牙领主，境况极其悲惨：贸易锐减，居民减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被塞进这里。

为了治理西属意大利，菲利普二世于1563年在自己身边建立了“意大利最高委员会”，委员会中除西班牙总督外，还有两名米兰人，两名那不勒斯人和两名西西里人。直至1674年马德里定期派遣巡视者，但他们实际上丝毫损伤不了总督们的大权。这些总督，时而是些惯战军人，而不是政府官员，时而是些贪得无厌和无能之辈，他们刚一踏上归其治理的国家，就公布法令或公告，以肯定其前任的法令或

修改它，其中包括宗教、经济、卫生、司法、粮食和货币等规定。凡是读过《约婚夫妇》的人都知道，公告多于牛毛，但只是废纸一张，这既是由于警察和司法的无能，也是由于存在着各种特权和各种特殊司法权。公共秩序混乱不堪，这加速了工商业的衰退和经济的恶化。

92　威尼斯　罗马　托斯卡纳　热那亚

自从商业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自从与土耳其人为敌，威尼斯共和国的繁荣便遭到最沉重的打击。土耳其人引诱英国人和荷兰人到地中海东岸去经商，让他们在那儿建筑房舍，在每一个集散地设立自己的领事馆。威尼斯在斗争中不能自持，徒劳地寻求办法，建立特别法官（例如“商业五贤”）。经济衰退波及市民生活：贵族放弃船运和商业，平静地享受陆地上所握有的资产；于是沉迷于挥霍无度，各种寻欢作乐，贪恋酒色之风有增无已，尤其是赌博，虽多次颁布严法厉令，终不能令其有所收敛。

十六世纪是威尼斯贵族政府最终转变为寡头政府的时期。国家的基本机体原封未动。人民会议，或称阿伦戈——从格拉多到卡瓦尔泽雷这个海滨城市威尼斯的全体居民的集会——自 1423 年已销声匿迹，就是举行集会也只是为了宣布新执政官的名字。大议会执行立法权和为其他的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任命新成员；大议会成员继续由注册入威尼斯贵族的家庭担任。由于 1506 年设立了金书（贵族名册），这种注册入贵族籍受到较严格的控制，金书中记录着贵族家族的生育和婚姻状况（编纂该书时记载有一千六百七十一个贵族）。正如人们所说的，由于“恩典”而跻身贵族阶层，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容易理解何以大议会的人数越来越少：在十六世纪初叶是将近二千，到了共和国末期减为一千二百。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并不掌握在大议会手里，而是掌握在被大议会选举出的人数有限的各委员会之手。人数最多的要数元老院，这个名字来自十四世纪末的古普雷加迪（见第 57 节），它原本是偶尔召开一次的会议，后变为定期的。开始时，这个机构由六十名成员组成，后增加了六十名，其后，通过特殊的发展，有时甚至达到

三百名。其职权范围是负责外交、贸易和军事。“四十人委员会”是最高法庭，分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也肩负有行政和政治权限。刑事“四十人委员会”或称“小议会”的三位首脑连同六名执政官顾问和执政官构成最尊敬的威尼斯执政团，十五世纪中叶官方文件正式采用这个名字，以替代威尼斯共和国的那个名字，这一更名象征着国家内部的变化。执政团召集和主持大议会，向它提交法律建议。几个世纪以来，执政官再也没有独自做决定的权力，他只是各议会和委员会的决议的最高执行者，但他首先是国家的庄严代表。他最大的权势在于主持各议会和委员会，在这些机构中，他有权在任何时候提出建议。最有实权的政治机构是由大议会每年任命的十人委员会，但必要时，十人委员会又可增加十人或二十人。但在1582年，大议会彻底取消十人委员会追加名额，并明确规定了十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些职权本来主要涉及危及国家安全的图谋不轨和贵族的犯罪；尽管千方百计限制十人委员会的职权，然而却通过了授予他们处理绝密事务之权的条款，十人委员会将国家的全部领导权摄于其权力之下。他们的另一个机构是三审判官，其独立自主性和重要性可与十人委员会相提并论。三审判官由十人委员会选举产生，并从1539年起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大约十六世纪末，他们取名为“国家裁判所”，由于围绕该机构人们编织出许多骇人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神话，使得该名字恶名远播，令人谈虎色变。其职责是对由其豢养的临时和自发的（也是匿名的）告密者告发的罪行加以秘密的迅速的调查，然后由十人委员会对调查的结果做出决断。大约到了1400年，出现了“智囊团”，该机构专门协助元老院工作，为其准备日常事务的报告和区别其轻重缓急。事实上，它负起了处理日常事务的担子，架空了元老院。“智囊团”分三个系统：“六大贤人”，研究和提出有关国家利益攸关的建议；“军事五贤人”，研究关于海军的问题；“陆地五贤人”，处理内政事务，特别是战争和财政事务。“智囊团”对提交元老院的所有问题可提出参考意见，为元老院起草政令和为执政官和执政团草拟信件。“智囊团”与执政团一起形成“全权智囊团”，由它来启开外国和

各省政府的信件，接见大使和其他政治人物，决定重大的行政或宗教争议。总而言之，它是共和国政府的最高机构。

于是，国家形成了寡头政治结构，更有甚者，数量极其有限的家族垄断了大部分职务。寡头政治变成了结党营私，把绝大多数贵族排除在处理公共事务之外，特别是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贵族。除贵族，或者大人物外，其余人均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在这部分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享有同等的民权，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其中又分中等阶级和小人物，前者是有产者，以自由职业、工艺美术、经商为生，形成“土生土长的公民”；被恩准给予威尼斯国籍的外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有了这个国籍，他们才能从业和发挥艺术才能。在中等阶级（其人数相当有限）之下，是小人物庶民，他们以船工、捕鱼为业（这两者对威尼斯十分重要）以及其他百工匠人。这一平民百姓在“尼科洛蒂”（尼科洛蒂和卡斯特拉尼是处于威尼斯两头的两个区域）“行政官员”中有自己的一个代表，而这种“尼科洛蒂行政官员”无任何政治权利，只不过享有阅兵仪仗队的某些特权和职能。中产阶级和平民在行会中，在经济和技术机构中，在具有宗教和慈善作用的善社或学校中结成一体（正如在意大利其他国家里发生的一样）。六个“大学校”为有产阶级所有。1732 年在威尼斯几乎有三百个善社。

受威尼斯统治的城镇被认为是附属地，而不被认为是在一个唯一机体中附属于首都的土地，它们不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每个城市保留其市政议会（在弗留利还有三级议会），他们的政体和体制还是封建的——威尼斯并不关心其领地的统一形式——但置于威尼斯总督（市政最高行政长官等等）的控制之下。

自 1530 年以后，威尼斯共和国在意大利的政策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旨在维持现状。它有千百种理由害怕哈布斯堡的强权，以致它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统治之间左右为难。因而它维持同法国较好的关系，但同时又不采取过分大胆的立场。西班牙和威尼斯之间的持续不和，即使是被掩盖了的，也使得对土耳其人的勒班陀战役收效甚微（见第 90 节）。以后，1573 年的和约被不断确认；共和国竭尽全

力维持同高门（指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良好关系。事实上，除了特殊事件外，和约一直维持到十七世纪中叶。

教皇国自保罗四世不幸的尝试失败后，在意大利政治中采取的消极态度比威尼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地位尤其微妙，因为它比意大利其他国家更加需要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平衡，而西班牙采取反宗教改革的原则立场迫使它高度重视这种平衡。此外，在教会领地上，罗马和马德里之间，或在意大利归属问题上的冲突变得频繁而严重（见第 89 节）。教皇作为尘世君主的软弱性与作为教会首领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因此，选择教皇总是出于后者的理由，而不是考虑教皇国的需要；天主教大国和意大利某些小国（托斯卡纳）极其强烈地干预这种选择。于是出现了一种有利于帝国、法国、西班牙，甚至葡萄牙的“专利”权，以此来反对这个或那个候选人，这种“专利”权一直延续到近代（1903 年反对拉姆波拉）。

在这个时期，教皇的活动全部倾注到反宗教改革和欧洲总的教会-政治事务之中。他们在管理世俗国家方面没有开展连续性的和有机的活动（这种活动因君主频繁更迭而弄得更加困难），因而这个国家成为欧洲情况最糟的。地方封建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盛，甚至还分裂为“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中央行政管理软弱无力，政令不通，尽管还抓住不少机会来缩小或取消市民的自由；财政——因支撑反土耳其人和反新教徒之举而日益恶化——亏空（大部分国库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政府靠出卖官爵自持）；社会纷乱不宁，匪盗横行，截止十九世纪仍是一个永不痊愈的顽疾。

十六世纪下半叶，继承圣庇护五世的是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 年在位）（见第 89、90 节），波洛尼亚人，本名布翁孔帕尼，尤利乌斯历的改革者，在罗马大力创办教会教育机构（耶稣会罗马公学，见第 89 节）。他为其私生子雅各布（在当神甫前生下的孩子）谋求封地，当然是在教皇国外，这标志着有限度地回复到任人唯亲的老做法；他改组教宗外交使团，增加教廷常驻使节的人数。由于盗匪猖獗，公共安全变得十分险恶，他遂离开教皇国。西克塔斯五世

（1585—1590年在位）原名佩雷蒂，马尔凯人，采取果敢措施以根除这一弊病，因其行动激烈严厉而永垂青史。他是方济各会会士，出身极其卑微，围绕他的形象，人们生出许多神话。但在西克塔斯教皇任期末，盗匪活动又有抬头之势。他在罗马大兴土木，宫阙楼阁拔地而起（西斯廷街），营建承前启后，装饰精巧细致，铺陈浮华，庄严肃静，画梁雕栋，人称为“巴罗克罗马”，这使他的名字流芳千古。他用圣部体制，一种由顾问帮助的红衣主教所领导的部级机构，来改组教廷的全部中央行政管理，今天大体上仍沿用这种体制。也是他把红衣主教的人数限制在七十名之内。在克力门八世（1592—1605年在位）——原名阿尔多布兰迪尼，诞生于法诺，其家庭发祥于佛罗伦萨，在其政府中厚用侄子红衣主教彼得·阿尔多布兰迪尼——时期，发生了对教会国来说极其重大的事件。阿方索二世死后（1597年），因无合法继承人，费拉拉要求教廷直接统治，而阿方索一世的私生子之子切萨雷保留了帝国的封地莫德纳和雷焦。费拉拉结束了其光辉的一页。在克力门八世统治下，发生了两起出于不同原因的著名审判：贝亚特里切·琴奇，因杀亲罪被判砍头；焦尔达诺·布鲁诺被判异教罪，于1600年处以火刑。

科西莫·德美第奇公爵的统治（1537—1574年），标志着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向托斯卡纳地区独裁国家的转变，众所周知，这一转变是继伦巴第足足一个半世纪后完成的。对此，不应理解为佛罗伦萨的地方特殊性和特权地位完全消失；但是，整个国家都配置了中央官员，也从各地抽调管理人员。托斯卡纳的一些老共和国，如卢卡，仍保持独立，它依靠西班牙和热那亚而免于被吞并。它由一个最高军政长官和九位长者组成的任期两个月的执政团，任期为半年的三十六人议会和由九十人组成的大议会治理。所有这些人皆由在任官员中选出，以便使城市政府事实上成为一个小型的寡头政治。

消灭和赶走了那些逃亡者后，科西莫一世用智慧和正义治理国家，只有在“国家最高利益”危急之际才使用独断专行的统治方式。他允许平民当面向他诉说冤情，亲自裁决，为其伸张正义。公共安全严加

保障，警察尽忠尽职，连宗教也严加监管，科西莫严厉反对新教的任何渗透，但又以自己的官员来监督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勾销债务，重振国家财政，修理渠道，疏干沼泽地，改善里窝那和波托费拉约港，帮助比萨恢复萧条的经济生活。以共和国近期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建立地方部队，以保卫国家，却使用德国和西班牙步兵担任其个人警卫。为保卫受野蛮海盗骚扰的沿海地区，他卓有建树，除了筑格罗塞托要塞和沿海设立瞭望台外，还在比萨设圣斯特凡骑士团，武装一定数量的帆船，以增援公爵的小小舰队。

科西莫被家庭的灾难苦苦折磨着，他的两个儿子焦万尼和加尔齐亚及妻子埃莱奥诺拉先后死于疟疾（1562 年），人们拿这些家庭悲剧编造种种骇人的神话，然而都毫无根据。不久，他将日常事务交给儿子弗朗切斯科处理（1564 年），自己只保留公爵头衔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569 年，庇护五世赐予他托斯卡纳大公的头衔，并于罗马加冕。费拉拉和曼图瓦两公爵提出异议，他们不愿落在后面，而一直认为佛罗伦萨为自己封邑的帝国和西班牙也反对教皇此举，认为教会权力干预俗权。困难局面持续了若干年，只是到了科西莫的继承人弗朗切斯科当政时，以一大笔钱使皇帝确认了大公封号（1576 年），才了结此案。

比起父亲，弗朗切斯科（1574—1587 年在位）则逊色得多。他实行暴政，身边全是阿谀奉承的贵族，脱离人民。一个名叫普奇的人同佛罗伦萨的另些名门望族一起策划叛乱，失败后，许多人遭砍头之祸，财产被籍没（1575 年），人们相信这大半是大公出于贪图钱财。大公同一位威尼斯贵族小姐比安卡·卡佩洛的联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和种种反对，但他还是娶她为妻。比安卡的一个兄弟在一段时间里执掌政府。国家陷于饥饿、瘟疫之中，盗贼四起，太平盛世为之一扫。然而，弗朗切斯科大公为里窝那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他建成了这个港口，并在原先简陋的城堡上创建了里窝那城。

继弗朗切斯科的是其弟费尔迪南多一世（1587—1609 年在位），他曾是枢机主教，后辞去枢机之职，娶洛林的克里斯蒂娜为妻，无视

西班牙国王联姻提议。与全盘西班牙化的弗朗切斯科不同，费尔迪南多面对霸权强国采取更为自由的立场，他靠近法国——一个女儿玛丽亚嫁给亨利四世——同威尼斯搞亲善关系。他也大力扶持里窝那，开放里窝那门户，接纳被西班牙流放的犹太人和因犯罪行为遭追踪的人。因而城市人口迅增，商业活跃。他开垦基亚纳河谷和马雷马荒地，疏浚阿尔诺河道。在他统治下，圣斯特凡骑士团从柏柏尔人之手夺得阿尔及利亚的希波。儿子科西莫二世（1609—1621 年在位）继续对西班牙执行较独立的政策。

与威尼斯同时，热那亚也因贸易改道而深受打击。早在威尼斯之前，它就失去了海外领地（自然，科西嘉除外）。相反，直到法国革命前，它一直维持着其独立，而在前几个世纪里，这种独立常遭破坏。1528 年由安德烈亚·多里亚颁布的政体是基于先前的“宾馆”体制之上的，“宾馆”是那些享有政治权利和担负公职家族的麇集体制。

先前，“宾馆”仅仅由贵族组成，只有一名平民；多里亚政体由二十三名贵族和五名平民组成。所有“宾馆”成员都应入相当于威尼斯贵族名册的公民簿，公民簿比贵族名册更开放，因为每年可以允许多至十位平民加入。然而，新老贵族之间保留着某些权利上的差别，老贵族是指圣卢卡团，新贵族即稍后所谓的圣彼得团。每年从公民簿中抽签产生大议会的四百名成员，大议会又如法炮制诞生百人小议会。两个议会讨论和通过法律。由八名总督辅佐的执政官行使行政权。执政官和总督任期二年，由两议会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向两议会提出法律草案和决定对外事务及战争。至于内政和政治警察，归“国家裁判所”管辖。“审查”团考查任期届满的地方行政官的政绩，监督政体的实施。

菲埃斯基谋乱后，这一政体被修改。大议会成员三百名由抽签产生，一百名由行政机构选举产生；小议会由大议会选出，不用抽签方式。1573 年，新贵族认为改革对己不利，起而谋叛，以取消改革；由詹内蒂诺之子，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领导的旧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新贵族。教皇、西班牙和帝国出面干预，要求由他们来裁决。1576 年

3月，宣布裁决，规定解散所有的“宾馆”，建立彼此不分新旧的唯一贵族等级。大小议会仍维持原有成员人数，由一个仅由三十人组成的袖珍选举团选出。在大小议会之外，再建立一个抽签和选举参半的十二“元老”的元老院。前执政官组成“永久检察”团。从那时起，政体不变，直至法国革命。自吉安·安德烈亚于1606年去世后，多里亚家族的霸权也随之丧失。

热那亚过去在地中海的领地只剩科西嘉，而且它已不再是共和国的一股力量，反而是一个负担，因为岛的条件落后，岛民不服热那亚的统治；而热那亚也从未对该岛进行有效的整顿，相反其官员和总督只是一味地盘剥岛民。在《卡托-康布雷齐条约》之前的几年内，发生了一起由桑皮耶罗·迪巴斯泰利卡或迪奥尔纳诺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暴动（1553年），这次暴动与法国-土耳其的行动合为一股，以反对西班牙及其同盟者热那亚。和约签订后，法国撤退，但桑皮耶罗继续抵抗，他得到柏柏尔人的援助和法国的暗助，后因家庭报复被刺身亡（1567年）。不满和混乱长期折磨这个治理不善的岛屿。

93 皮埃蒙特

《卡托-康布雷齐条约》，尽管规定将其国家归还给伊曼纽尔·菲利贝托（1553—1580年），却将都灵、基耶里、皮内罗洛、基瓦索和维拉诺瓦达斯蒂暂时留在法国人手里，以等待就法王提出的对萨沃依各国的拥有权进行研究。在了结这一悬案的谈判中，公爵之妻玛格丽特为公爵出力不浅，她是法王亨利二世之妹，聪慧异常，品德超群。1562年年底，法国将上述地盘归还给公爵，只留下皮内罗洛，又加上了萨维利亚诺和佩罗萨两地；法国占领期间，西班牙一直控制着阿斯蒂和桑梯亚，现仍不愿拱手交出。只是在1574年，伊曼纽尔·菲利贝托终于让法王亨利三世归还那些地方，这也迫使西班牙人从那两块土地上撤走。

公爵一心一意扩展领土，首先恢复萨沃依对日内瓦的昔日的主权，那里还没有受到宗教改革的渗入。为此目的，他期望在罗马的同意下建立一个天主教联盟。公爵本人早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种

情况下，他开始大举迫害宗教改革派，因在法国统治时期宗教改革派俯拾皆是；开始与基索内和佩里切山谷的瓦尔多信徒发生冲突。那些阿尔卑斯山山民英勇抵抗，有效反击其军事征伐（1560—1561 年）。公爵被倾向于容忍宗教的妻子所说服，签订《加富尔条约》（1561 年 6 月），给予他们在谷地宗教自由（当然也有天主教信仰的自由），在外面有思想意识的自由。稍后，为实施条款，还采取了欺压性的残酷措施；但总体上说，条约受到尊重。相反，对其他新教徒采取了取缔流放措施；但到后来，公爵也允许他们有信仰自由，禁止礼仪活动。

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极其关心改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条件，支持实施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宗教改革法令。同时保护国家在教会领土上的利益和主权。他获得格列高利八世对尼古拉五世在 1451 年的特恩（阿梅代奥八世辞去教皇位置时所得）的确认，因而教皇就任命主教和寺院主持事宜必须征得公爵的赞同；要得到其他圣职俸禄，也须得到公爵的许可。作为补偿，他必须放弃反对属民向罗马法庭的投诉；可是最终采用向元老院“起诉滥用职权”体制，以阻止教会法院的肆无忌惮。与托斯卡纳一样，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活动也受到了控制。

公爵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采取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形式。不再召集各国议会，事实上等于解散了议会，因为在法国占领期间议会完全退化变质。简化统一民刑立法和司法管理，在地方法官之上增设省法官，即省督；最高司法权授予由法国在都灵和尚贝里建立的两个议会，只是易名为元老院；对萨沃依章程做了全面的有机的修订；公布出来的那一部分用意大利文写成，同法文一起，意大利文成了替代拉丁语的官方语言。

随着诸国的消灭，公爵亲自或通过地方协定着手恢复政府财政。在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时，直接或间接税甚为沉重；全部岁入需谨慎小心管理，以便偿付大部分债务和建立储备基金。公爵全力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注重农业，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以特权或保护性措施建立或发展许多门类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直接参与瓦尔达奥斯塔的矿业公司的创立；改善交通。夺取邓达伯爵封地——保证了同尼斯的

交通——和夺取奥内利亚——使皮埃蒙特的领土有了海上出口——，除有利于领土的规划和扩张外，对上述各方面也极为有利。公爵甚至觊觎不满热那亚统治的萨沃纳，因热那亚窒息了它的港口和商业往来；然而公爵未能实现其黄粱美梦。他也企图改善货币流通和稳定货币。

武装是特殊关心的对象。伊曼纽尔·菲利贝托以有限的方式建立义务征兵制，每一个教会堂区征召一支队伍，由军士加以正规训练；还建立了地方骑兵队，但志愿参加。然而贵族不服兵役。这种地方招兵只为战时使用；除此之外，还有通常的职业兵团，一部分是在和平时期做卫戍部队，一部分在需要时由长期设置的队长招募。然而，职业兵主要也是在公国臣民中征募。

伊曼纽尔·菲利贝托也想到海军，建立一支小型舰队。几条舰只参加勒班陀战役，战斗中严重受创。为了发展舰队，他仿效科西莫，借助圣莫里斯和拉扎罗骑士团，又融合原有的骑士团并加以革新，建成新骑士团，然而骑士团未达到目的，舰队也一日不如一日。

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执政头几年希望建立天主教联盟，未成，转而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采取中立政策。在意大利寻求同威尼斯的亲善协议，可后者由于其新政策的消极性，只限于交换友谊而不许以形式上的义务。为保障边境安全、收复领土和战时招募军队，公爵竭力同瑞士人达成协定，不单同天主教各州（1560 年），而且也同新教各州达成协定（1567 年）。由于后面这些协定，公爵在接受日内瓦现状后，随即收复了日内瓦湖南岸（日内瓦斯和查卜莱斯）和热克斯镇。不断签订协定，不断完善条约，但萨沃依未能从中取得有利于它在国际方面活动的重要成果，因瑞士联邦已退出国际舞台。

94　国际政治重登意大利舞台　查理·伊曼纽尔一世

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法国由于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间的长期内战，一直未能腾出手来处理意大利事务。上述内战发展成瓦卢瓦家族末代国王亨利三世的继承人的争夺战（1589 年）。根据萨利克法，波

旁家族旁系纳瓦拉国王亨利（亨利四世）继承王位，可是，法国极端的天主教徒“联盟”不愿承认（教皇宣称他无资格继承）。这一“联盟”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他企图一箭双雕，在攻击新教的同时，统治和肢解法国。

伊曼纽尔·菲利贝托之子、查理·伊曼纽尔一世，于1580年继承父位，认为必须趁机打击法国和新教徒，扩张领土。他紧紧地投靠天主教-西班牙派（1585年娶菲利普二世之女凯瑟琳）。这些直接违反了萨沃依和意大利的利益平衡，不但与威尼斯的行为相左，而且也与托斯卡纳的费尔迪南多和西克塔斯五世的举止背道而驰。西克塔斯五世发表反对纳瓦拉亨利的决断后，保持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查理·伊曼纽尔占领了萨卢佐侯爵封地（1588年），法国曾以假定的同德尔菲纳托封建关系的名义消灭了侯爵，并多年占据之。他还妄图夺回日内瓦，战争持续了若干年。在米兰总督的帮助下，他还进入普罗旺斯（1590年），占领了好几个城市；可是后来亨利四世的军队把战争推进到阿尔卑斯山，侵入皮埃蒙特；战争旷日持久，毫无定局。亨利四世转向天主教，得到全法国的承认和克力门八世的宽恕，并同菲利普二世缔结了基于现状的《韦尔万和约》（1598年），和约也包括萨沃依。可是悬而未决的萨卢佐问题再度引起敌对状态。查理·伊曼纽尔和亨利四世间的最终和解一直拖到《里昂和约》的缔结（1601年1月17日）。根据该条约，亨利四世让出除卡斯特尔德非诺外的全部萨卢佐侯爵领地，同时取得罗讷河右岸的几块公爵土地（比盖、韦尔罗梅、热克斯）。就在缔结该条约之后，查理·伊曼纽尔一世还切望借助必将占据伦巴第的法国将领土大大扩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日内瓦、弗朗什、孔泰等）。由于在西、法之间采取平衡政策——实质上制定此项政策一方面出于自存之需，另方面也出于扩大领土之野心——，某些时候宫廷诗人把查理·伊曼纽尔吹嘘成意大利独立的典范，但既无足够的事实根据，他亦无这方面的打算。

一个看来会造成局势严重复杂化的问题，是威尼斯共和国和保罗五世（1605—1621年在位）主持的教廷之间的问题。保罗五世是个罗

马有产者，他用财富塞满了其亲戚的钱柜。这一争斗只不过是该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旷日持久冲突中突出的一例而已，它起因于威尼斯教会的政策，旨在尽可能置教士于国家控制之下。共和国重申一条法律，禁止教士购买土地，而且还逮捕了两名犯重罪的神甫。保罗五世要求废除该法，交还两名神甫；这一要求未被采纳，于是保罗五世判执政团以绝罚，禁止威尼斯举行圣事（1606 年 4 月）。共和国明令教士阶级置禁令于不理，少数不服从的宗教团体，尤其是耶稣会被驱逐，形成了唇枪舌剑的宣传战。斗争的主角威尼斯方面是圣仆会的保罗·萨尔皮（1552—1623 年），他支持新文化科学，不赞成教派分裂，切望恢复基督教会原来的纯粹性，他是法学家、政治家，罗马教廷的死敌，因而多次遭到暗算。争斗的双方，甚至西班牙驻米兰总督加紧备战；亨利四世扬言，假若西班牙攻击威尼斯，他将驰援。最终两强权言归于好，通过亨利四世的斡旋，冲突双方偃旗收兵。两名神甫通过特殊方式交还，但只交给法王的代表，而不是交给教皇的代表；应威尼斯政府的请求（1607 年 4 月），绝罚和禁止圣事两项命令一概撤除。

亨利四世又重新采取平衡政策以及向德意志的哈布斯堡扩张的政策。他同查理·伊曼纽尔一世达成布鲁佐罗（都灵附近）秘密条约（1610 年 4 月）。根据该条约，公爵在胜利时应获取米兰地区——除克雷莫纳留给威尼斯外——和蒙费拉托，并加冕称王。亨利四世也曾想过以此来获取萨沃依地区。可是不久（5 月 14 日）被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行刺身亡，摄政玛丽·德美第奇又同西班牙情投意合，亲密无间。

查理·伊曼纽尔一世在煞费苦心想同威尼斯和教皇建立联盟告吹后，不得不派遣儿子去马德里请求宽恕。曼图瓦公爵弗朗切斯科二世死后（1612 年），留下查理·伊曼纽尔之女所生的一小女，从而再次勾起家族对蒙费拉托的旧欲。他大举入侵，要求交出外孙女。死者之弟费尔迪南多放弃枢机之尊贵显荣，继承爵位，并受到威尼斯、托斯卡纳、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米兰总督出兵进攻公爵（1614 年），可是不断被击退。后缔结《阿斯蒂条约》（1615 年 6 月），规定双方裁军，并将蒙费拉托的争论留给皇帝处理；由于米兰总督不裁军，公爵

也就不实行协定，冲突又起。在意大利（更多的是文人墨客而不是政客）赞扬公爵维护意大利独立的声音喧嚣一时。

西班牙-萨沃依冲突如今又同奥地利-威尼斯冲突交织在一起。后一冲突归因于乌斯科克人，他们是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人，为躲避土耳其人，避难于达尔马提亚，从而在亚得里亚海进行海盗行径，并受到奥地利人的保护。共和国深受他们劫掠的祸害，封锁了乌斯科克人居住和出没的所有海岸。奥地利反对封锁，遂开战事（1615 年），攻伐频仍。威尼斯人曾一度占领了几乎全部戈里齐亚伯爵封地，而奥地利人反复入侵弗留利。面临米兰和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的威胁，威尼斯转而同萨沃依和荷兰结盟。查理·伊曼纽尔公爵再次入侵蒙费拉托，格拉迪斯卡第二次被威尼斯人包围，法国从中干预，以同西班牙结盟来威胁共和国，于是，达成《马德里和约》（1671 年 9 月），为此奥地利担保乌斯科克人不再骚扰劫掠。而蒙费拉托的争议仍留给皇帝解决。

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贝德马尔谋叛”可以被认为是西班牙-威尼斯冲突的反应。谣传说大使在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总督支持下，已成为服务于共和国的某些法国军官夺取威尼斯（或某些要塞）阴谋的同谋犯。这是相当低劣的吹嘘和告密，它与威尼斯对西班牙图谋（1618 年 5 月）的猜疑遥相呼应。

威尼斯同格劳宾登的瑞士同盟保持友好关系，格劳宾登人占据着位于米兰和奥地利之间的军事要冲瓦尔泰利纳。格劳宾登人为新教徒，瓦尔泰利纳却是天主教区：其居民颇感受压。1620 年 7 月 19 日，瓦尔泰利纳人揭竿而起，屠杀了落入手中的全部新教徒（“瓦尔泰利纳神圣屠杀”），米兰总督率兵攻入该地。于是，法国、威尼斯和萨沃依结成联盟（1623 年），重新确定格劳宾登对瓦尔泰利纳的主权；这一冲突有可能同不久前在德国开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有关。这时，查理·伊曼纽尔一世打算获取同西班牙联盟的热那亚、蒙费拉托和米兰。他同法国军队一起占领了位于菲纳莱和维拉弗朗卡之间的整个利古里亚海岸西段；可是西班牙援军

骤至，西班牙-热那亚人又回至塔纳罗河谷，侵入皮埃蒙特。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订立和约（1626 年 3 月），确定瓦尔泰利纳回到格劳宾登人治下，可保持自治政权，但只允许天主教信仰。查理·伊曼纽尔一无所得。

1627 年，温琴佐二世·贡扎加去世，无直接接班人，曼图瓦公国的最近继承人是法国旁系纳韦尔的查理·贡扎加，他受法国和威尼斯的支持，而西班牙喜欢瓜斯塔拉亲王费兰特·贡扎加。和约中被法国抛弃的萨沃依公爵这次同西班牙和好，后者许诺让出蒙费拉托的一部分。皇帝也反对纳韦尔，宣布曼图瓦和蒙费拉托封地空缺。法国要求继承者占据这些土地，可是查理·伊曼纽尔兴兵入侵蒙费拉托，他还妄图打击热那亚（瓦凯罗谋叛），而卡萨莱又被西班牙包围（1628 年）。路易十三亲领法国远征队在苏萨大败公爵（1629 年 3 月），后者遂同法国人订立条约；卡萨莱之围被解。次年，法军卷土重来，公爵和法国人冲突再起，法国人占领萨沃依，皮内罗洛、萨卢佐侯爵封地。作为反击，帝国军队长驱直入意大利，夺取曼图瓦（1630 年 7 月 18 日），肆意劫掠达三天之久。

7 月 26 日，查理·伊曼纽尔一世中风猝亡，扔下被频繁战争弄得破败不堪的国家。查理·伊曼纽尔的继承人，其子维克托·阿梅代奥一世（1630—1637 年在位），照样屡遭法国人的攻击，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又占领了卡萨莱。在凯拉斯科缔结了和约（1631 年 4 月），承认纳韦尔的继承权，而将特里诺·阿尔巴和蒙费拉托的其他地方划给萨沃依公爵。法国将占领地归还公爵，然而根据秘密协定，法国取得皮内罗洛和佩罗萨，从而有了进入意大利的通道。于是，法国重又抗衡西班牙在半岛上的霸权，全面打击哈布斯堡的强权。积极采取这一政策的是亨利四世之子、路易十三的最有权势的首相、红衣主教黎世留。萨沃依同这种对立立场密切相关，他们在毗邻的两强之间左右摇动，竭力不放过任何机会获得领土之利。最大计划是获取米兰，王位全系在此举上。为实现这一目的，唯一的道路将是与哈布斯堡作一彻底的较量。

当法国直接参加三十年战争，与瑞典并肩战斗，反对哈布斯堡时，这种可能性似乎指日可待。维克托·阿梅代奥一世同法国结盟，缔结《里窝利条约》（1635年7月11日），入约者还有曼图瓦和帕尔马。法国许诺把米兰地区给予萨沃依公爵（除克雷莫纳给曼图瓦公爵外），而皮埃蒙特的几个河谷割让给法国。其他意大利强国立场各异。威尼斯恪守一贯中立；莫德纳最终倒向西班牙；承继父亲科西莫二世的托斯卡纳的费尔迪南多二世（1621—1670年）设法劝导教皇建立一个纯意大利联盟，但未能奏效。当时教皇是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在位），佛罗伦萨巴尔贝里尼家族成员；在哈布斯堡和法国之争中，他采取中立立场，为和平而奔走，不接受西班牙的论点；西班牙认为，教皇应站在反法阵营一边，因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因此，他的政策总体上是更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其对手；实际上，制定这一政策的愿望是对抗西班牙的优势。

伦巴第战争中，萨沃依公爵在托尔纳文托（1636年）和蒙巴尔多内（1637年）的胜利，并未带来显著成果；帕尔马又退出了联盟。萨沃依同瑞士、威尼斯和教皇的关系也由于其实行的这种积极政策而遭损害。

95　意大利各国的局部冲突　那不勒斯和巴勒莫起义

1637年10月，维克托·阿梅代奥一世薨，幼子弗朗切斯科·贾钦托继位，他享寿极短，不久病逝（1638年），其兄查理·伊曼纽尔二世（1638—1675年）接位；维克托·阿梅代奥公爵的兄弟，红衣主教毛里齐奥和卡里尼亚诺亲王托马索反对其母、法国的克里斯蒂娜（路易十三之妹，称王室夫人）摄政。于是发生了一场由西班牙支持的“王侯分子”和法国支持的“夫人派分子”之间长期的灾难性的内战；公爵夫人既要拯救自己，又要抗击黎世留的入侵，解救国家，十分繁忙。1642年，各亲王同嫂子媾和，取得了某些城市的统治。然而，西、法之间在意大利北部的冲突仍在继续，而在中部意大利又爆发了另一战争：卡斯特罗战争。

乌尔班八世在教皇国史上以大搞“裙带关系”而著称。他不仅授予其家庭三名成员以红衣主教之职，使其家族变为豪富，而且还想为他们建立地方执政团政权。侄儿塔代奥成为帕勒斯特里纳君主。然而，由于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公爵（死于1631年）无男嗣，乌尔比诺公国落入教廷，后被籍没。巴尔贝里尼家族目标转向夺取北拉齐奥的由法尔内塞家族占领的卡斯特罗和龙奇利奥内这些较小的封地。教皇借口保护帕尔马公爵奥多阿尔多的债权者权利，占领了（1641年）卡斯特罗和蒙塔尔托；因此冲突加剧，教皇处法尔内塞以绝罚、宣布剥夺其一切封地。塔代奥·巴尔贝里尼进兵帕尔马（1642年）。然而，公爵得到了托斯卡纳——巴尔贝里尼和美第奇是其势不两立的仇敌——，莫德纳和威尼斯联盟的支持。塔代奥撤兵；教皇国军事极弱，不堪一击，巴尔贝里尼的军队溃散，法尔内塞紧追不舍，一直打过特拉西梅诺湖。由于公爵军队内部反叛，加之教皇军力增强，公爵——没有得到托斯卡纳的支持——后撤至帕尔马。次年（1643年），三强联盟公开向正在攻击托斯卡纳、翁布里亚和费拉拉地区邦联的教廷宣战：教皇军队企图进攻皮斯托亚，入侵莫德纳。法国从中调停，终于在威尼斯签订和约（1644年5月），交战各方维持现状，赦免公爵无罪，归还卡斯特罗。

不久（7月），教皇乌尔班八世去世，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继任教皇之职。他是罗马潘非利家族成员，受其嫂奥林匹亚·马伊达尔基尼管束。一开始他就相当仇视巴尔贝里尼家族，他占领了巴勒斯特里纳；后来，由于巴尔贝里尼家族受到法国的保护，他只好交还略地和职位。稍后，为卡斯特罗又同公爵拉努乔二世（奥多阿尔多之继承人）开战；这一次，法尔内塞陷于孤立，卡斯特罗被占领，遭捣毁（1649年），再没交还。

卡斯特罗小小的战争——是一种典型的无任何价值的战争，这是意大利各公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但同其他更无意义的地方小仗相比稍为好一些——如果说多年来震动了意大利各宫廷，那么它同法、西间的酷斗却无直接联系，也无任何价值。名为马萨尼埃洛的那不勒斯起

义则另当别论了。

在那不勒斯城，早就酝酿着不满情绪，贵族议员和人民代表所代表的人民之间敌对情绪日增。在奥孙塔总督统治时期，有一个那不勒斯法学家朱利奥·杰诺伊诺，以人民权利的要求者自居，并得到总督的支持，因总督想压制贵族，加强西班牙国王的权力。可是奥孙塔在马德里形象不佳，被召回（1620 年），杰诺伊诺被囚禁一个时期。然而他素志不灭，二十多年后，那不勒斯平民因总督阿尔科斯公爵制定的新赋税（1646 年 12 月），特别是水果税而举行暴动，这给他以良机，粉饰其计划。

杰诺伊诺暗中煽风点火；率先领导叛乱的是深得民心的青年鱼贩子马萨尼埃洛（又名托马索·阿涅洛）。1647 年 7 月 7 日，"我们不要税，西班牙国王万岁，不得人心的政府滚开"的喊声震天动地。王宫被践踏，牢狱被打开，反叛者被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在查理五世的假设特权基础上建立城市人民体制。总督参加谈判，接受种种要求，任命马萨尼埃洛为"最忠诚的人民统帅"（7 月 11 日）。可是马萨尼埃洛很快表现出精神失调，行为专断暴戾，任意砍掉这个或那个人的头。杰诺伊诺和新人民政府中的其他要人逮捕了他。潜逃后，在卡尔米内修道院被一伙谋叛者所杀（7 月 16 日）。死者受到人民，甚至凶手本人的颂扬。杰诺伊诺执政几天，同总督颇一致；可是 8 月的一次新的骚乱推翻了他（不久在押送西班牙坐监途中死去）。任命马萨大公为人民的总司令。此人也企图遏止运动，臣服西班牙。10 月，骚乱复起，大公被杀，武器商真纳罗·安内塞取而代之，宣布共和（1647 年 10 月 22 日）。

这时，出现了许多倾向。安内塞开始同法国谈判，法国宣布接受反叛者并给予保护。早在 1646 年，一支法国舰队驶入托斯卡纳水域，由萨沃依的托马索大公（现效劳于法国）指挥的部队登陆，攻击普雷西迪，觊觎那不勒斯疆域。另一个觊觎者是吉斯公爵洛林的亨利，他是第二代昂儒家族的后裔。吉斯来到那不勒斯，被选为"共和国公爵"（1647 年 12 月 24 日）。在他统治期间，暴乱蔓延到王国的四面

八方。

然而，卡斯泰尔诺沃一直留在西班牙手中，总督（一位奥尼亚特伯爵接替阿尔戈斯）坐镇于此，并受到西班牙舰队司令堂约翰（奥地利的菲利普四世的私生子）的扶持。安内塞本人任西班牙派首领、西班牙统治恢复后，公爵被革除（1648 年 4 月）。这时，安内塞因同法国派的逃亡者勾结，被绞死。西班牙不太费力保住了那不勒斯，因为法国首相马扎然（接任黎世留）不愿过分干预此事。此外，西班牙在内部一直得到反对平民的贵族的支持；然而，革命之后，西班牙又显出某种程度上支持平民反对贵族。

那不勒斯革命的同时，在巴勒莫爆发了另一次革命。巴勒莫哀鸿遍野，路有饿殍，迫使人民拿起武器。总督镇压了第一次骚乱，骚乱的发起者尼诺·德拉佩洛萨被处死。那不勒斯起义的消息传来，早就酝酿中的起义随之爆发，起义的首脑是金银匠人朱塞佩·阿莱西，他要求恢复佩德罗（阿拉贡的）时代的特权，在全岛取消赋税。总督和贵族拉拢腐蚀他不成，便散布谣言，污蔑他卖身投靠西班牙，以便激起人民的仇恨，在一次暴乱中被害。后来，当人民知道上当受骗时，想为他报仇，但又群龙无首，起义被镇压。然而和平时光短暂。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 1649 年年底，领头是两位雄辩律师安东尼奥·洛朱迪切和朱塞佩·佩谢；他们策划的谋叛被宗教法庭揭露，这是一个在西西里替西班牙政府卖命搞秘密警察活动的机构。于是他们被杀。

在普雷西迪，西班牙在托斯卡纳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法国远征军：法国人被赶出皮翁比诺和波尔托隆戈内，归还给阿皮亚诺的后裔卢多维索家族（1650 年）。莫德纳公爵转向法国一边，西班牙和法国-莫德纳之间在伦巴第和艾米利亚发生了小小的交战，萨沃依的军队也参与其事。最后，法、西缔结《皮雷内伊和约》（1659 年 11 月 7 日）——1648 年法国和帝国之间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意大利连绵烽火，那儿的一切维持现状。

卡斯特罗问题悬而未决。英诺森十世之继承人亚历山大七世

(1655—1667年在位)，一位名基吉的锡耶纳人，也不愿将卡斯特罗交还给法尔内塞家族，甚至公然籍没作为教会的财产。法国进行干预，同教皇发生冲突，起因是教皇卫队的科西嘉士兵和路易十四的大使之间在罗马发生多起事件，通过《比萨和约》(1664年2月)，教皇得到大量赎金，担保不籍没卡斯特罗（这从未发生过），并就侮辱一事向大使道歉。

这期间，经过长期的和平时期后，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旧怨复生，土耳其人进攻克里特。在漫长的战争中（1645—1669年)，土耳其人几乎很快控制了干尼亚，可是在整个克里特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其抵抗持续达二十一年之久，使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声名显赫。最初几年，威尼斯人握有制海权，阻止土耳其人向围攻部队增援，一支土耳其部队在吉福西亚附近被烧毁（1649年)；另两支，一支被拉扎罗·莫切尼戈毁于法罗斯附近（1651年)，一支被洛伦佐·马尔切洛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1656年）摧毁。拉扎罗·莫切尼戈在取得新胜利后，企图增强达达尼尔海峡兵力，以进攻君士坦丁堡，不幸，他为两岸的炮兵所杀（1657年)。于是土耳其人重新统治群岛。最后克里特守军减少到三千人，弹尽粮绝，城市被夷为平地，只得投降。十万土耳其人丧生。和平后两国贸易关系重又恢复。

96　反宗教改革文化和十七世纪文化

文艺复兴的结束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成熟，使意大利文化失去了在欧洲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地位。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尤其在西欧国家，由文艺复兴文明耕耘和肥沃的民族土壤之上产生的新文化，现在自主地朝气蓬勃地发展着，渐渐地成了主角，强有力地影响着意大利文化。外国文化独立自主的发展表现在各个方面：哲学、语言学、物理学、数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外国在科学上对意大利的影响要比文学艺术上更快更全面。无论是精神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直至十七世纪头几十年，意大利还保持着重要地位，可是在整个世纪内意大利的优势让位于外国。文学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

家的作品继续是评论和研究的对象，意大利语仍是有文化的人想要掌握的主要语言。可是，意大利新的文学作品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更无法同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闻名遐迩的伟大作家相匹敌，如法国的蒙田、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波舒哀、费奈隆；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在艺术方面，意大利，尤其罗马，是人们争相前来悉心学习和启示灵感的土壤：然而只是慕前辈导师之令名或风光和古典废墟而来，对新一辈的作者兴趣不大。在欧洲有声望有影响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寥若晨星；建筑仍保持最辉煌的地位，巴罗克风格仍风靡欧洲。

这时期初，意大利文学特点是出现“十七世纪文艺风格”，这一文风追逐矫饰的非自然的表现手法，正是通过其非自然性来引起读者的遐想。这不仅仅是意大利的现象，也是欧洲的现象：在西班牙出现了“概念主义”和“贡戈拉主义”，即来源于诗人路易·贡戈拉；在英国有“绮丽体”，出自约翰·利利的教育小说《尤弗依斯》（1529—1580 年）；稍后，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出现了“典雅风格”，该词来自社交沙龙的“雅妇淑女”。然而，在上述那些国家中，这种倾向压制不了生动的朝气蓬勃的力量，可是在意大利情形不同，它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

意大利十七世纪文艺风格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伟大天才诗人，那不勒斯人詹巴蒂斯塔·马里诺（1569—1625 年，由其名字演变出“马里诺诗派”）。他从十六世纪的田园诗里吸取表现形式和倾向，写出了“阿多尼斯”诗作和其他许多抒情诗。许多抒情和田园诗人步其后尘。相反，萨沃纳的加布里埃洛·基亚布雷拉（1552—1638 年）追随一种更淳朴的风格。他在恢复意大利各种尝试和仿效龙萨时，欲创造一种平达体抒情诗，并像龙萨本人一样，在玲珑的抒情诗方面取得成功。莫德纳的富尔维奥·泰斯蒂（1593—1646 年）主要仿效贺拉斯，而不是平托，他的道德和政治抒情诗不乏真情实感，尤其在那些写萨沃依的查理·伊曼纽尔的抒情诗，更是热情洋溢。在他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温琴佐·达菲利卡亚（1642—1707 年），他为维也纳的围困而写的

歌词名噪一时。他的史诗却沉沉无力，枯燥乏味，完全是千篇一律模仿《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之作。不过，莫德纳的亚历山德罗·塔索尼（1565—1635年）创作出英勇讽刺诗《吊桶的被劫》，作品风格新颖，具有艺术价值。阿雷佐人弗朗切斯科·雷迪（1626—1698年）的最著名的酒神赞美歌《巴库斯在托斯卡纳》，风格愉快而活泼。

这时期散文的创作十分丰富，成绩斐然，蔚为壮观。加利莱奥·伽利略一般以对话体的形式表述他的科学思想。甚至可以说他是意大利科学散文的创造者和现代意大利散文的创始人之一。政治散文、编年史和宗教辩论文等方面也不乏杰出的学者。旨在给反宗教改革以新方向的政治思辨活动从威尼斯人保罗·帕鲁塔（1540—1598年，《政治生活的完善》）的道德思想里获取法则和原则（此人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官方编年史家）；也是从皮埃蒙特人乔瓦尼·博特罗（1540—1617年）的《国家最高利益》吸取法则和原则。这一政治思想运动在洛雷托人特拉亚诺·博卡利尼（1556—1613年，自由的拥护者和西班牙的敌人）的讽刺文章《文坛报道》中初具形式。在温琴佐·博尔吉尼（1515—1580年）——佛罗伦萨起源的研究者——的《谈话录》中和在莱切人希皮奥内·阿米拉托（1531—1601年）的《佛罗伦萨史》中，写历史采用广博和批评的方针。雄辩家恺撒·巴罗尼乌斯（1538—1607年）的《教会通史》（从基督到十二世纪末）是用拉丁文写的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收集和整理了许多文献资料，这部著作是天主教徒反新教徒的主要工具。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1552—1623年）和罗马人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主教（1607—1667年）在他们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全史中，以完全对立的精神谈论反宗教改革的最重大事件；帕多瓦人恩里科·卡泰里诺·达维拉（1576—1631年）编述了法国宗教战争史；费拉拉人圭多·本蒂沃利奥（1579—1644年）写了荷兰宗教战争史；同时耶稣会士费拉拉人达尼埃洛·巴尔托利用热情的对话体叙述了耶稣传教士在亚洲的传教史。宗教性辩论文是最受十七世纪文体风格冲击的一种散文体，然后却产生了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保罗·塞涅里·迪内图诺（1624—1649年）。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戏剧，它有两个富有特点的体裁。第一个体裁是“即兴喜剧”，喜剧中的剧情或者“情节”是由演员本人根据传统台词即兴发挥的，各种典型人物重复出现于所有这类剧本中，产生了假面喜剧角色（潘塔洛内——商人，阿列吉诺——男仆，罗绍拉——女仆，布里盖拉——狡猾仆人等）。这一文体在意大利境内外的广大观众中颇受欢迎，可是慢慢退化为千篇一律的格式和低级无趣，粗鄙琐碎的玩耍。第二个体裁是“情节剧”，它是随着配有中世纪宗教复调音乐的独唱歌曲的兴起，以及“宣叙调”（歌唱朗诵法）的出现而诞生的。第一个情节剧是奥塔维奥·里努奇尼的《达夫尼》，由雅各布·佩里（1594 年）谱曲。这一体裁被作曲家克劳迪奥·蒙泰韦尔迪（1567—1643 年）和弗朗切斯科·卡瓦利（1600—1676 年）推向高峰；可是情节剧的诗篇很快屈从于音乐家的需要，在十七世纪就失去了任何艺术价值。

反宗教改革时期，首先标志着最纯粹的古典主义在意大利艺术中的胜利，但在其结构布局上——也是理论上——显得冷而严峻。伟大的理论家是两位最有名的十六世纪建筑师：雅各布·巴罗齐，莫德纳地区老家叫他维尼奥拉（1507—1573 年）和安德烈亚·帕拉迪奥·达温琴佐（1518—1580 年）。因此，巴罗克风格迅速发展，实际上只保留了文艺复兴的建筑结构。这一风格特别重视装饰，以装饰为其目的；它偏重弯线和虚线。在教堂内部——一般只有一个中殿和几个偏祭台——不遗余力地大肆进行巧饰，甚至盖住了建筑线条（“耶稣会风格”）。尽管如此，由于规模之宏大，图案之丰富，装饰和绘画之富丽，空间和远景布局之和谐，巴罗克式建筑仍有不少杰作。

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 年），诞生于那不勒斯，生活在罗马，圣彼得广场柱廊和罗马那沃纳广场的四河喷泉的作者，上学和居住在罗马，但不是生于罗马的罗马人。多梅尼科·丰塔纳（1543—1607 年，拉特兰宫）、卡洛·马德尔纳（1556—1629 年，罗马圣彼得教堂的正面）、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 年，罗马圣阿格尼斯和圣卡罗教堂）、威尼斯人巴尔达萨雷·隆盖纳

（1604—1682 年，威尼斯的永福教堂和庇萨罗宫），都属于这一时期。罗马的大部分最具有特色的建筑（圣彼得广场、那沃纳广场、拉特兰广场、奎里纳莱广场）属于这一时期，形成了罗马的风貌。

巴罗克建筑紧紧地与雕刻合为一体。这些雕刻一味模仿米开朗琪罗，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作姿态和虚伪之作。可是巴罗克和耶稣会风格在追求动势和宏伟的同时，也采用矫揉造作、优雅秀丽、图案奇特的手法，这对雕刻产生了极大影响。本世纪最伟大的雕刻家是贝尔尼尼。

在绘画中，米开朗琪罗的绘画占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同样也是有害的影响。一个新的绘画学派，折中学派，因为它竭力模仿文艺复兴时代的最伟大的画家。这就是三个卡拉奇（卢多维科，1555—1619 年；阿戈斯蒂诺，1557—1602 年；安尼巴莱，1560—1609 年）的波洛尼亚学派；多梅尼基诺（1582—1641 年）、圭多·雷尼（1547—1642 年）、弗朗切斯科·阿尔巴尼（1578—1660 年）等著名画家都属于这一学派。这一学派在构图和装饰方面表现出伟大的科学性，但实质上还是一种学院绘画。一位最富有天才的艺术家、伦巴第人米凯兰杰洛·阿梅里吉·达卡拉瓦焦（1573—1610 年）以一种勇敢的现实主义的绘画来与学院派作斗争；他的绘画明暗对比极其强烈，他用这种手法来处理传统的宗教题材，也画现实生活的事件。在本世纪下半叶，值得一提的画家有罗马各教堂的伟大装饰者巴奇恰（1639—1709 年）和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波佐（1642—1709 年），还有那不勒斯风景和战斗画家萨尔瓦托雷·罗萨（1615—1673 年）。佛罗伦萨人卡洛·多尔奇（1616—1686 年）绘画的圣像苍白羸弱，毫无生气。

十七世纪是科学突飞猛进的世纪，真正诞生了基于归纳法和实验法以及基于自然力学观念的现代科学，它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泛灵论科学。这一深刻的转变始于约翰尼斯·开普勒，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1571—1630 年）。他通过反复观察，确立了行星椭圆运动规律，打破了基于均力圆形运动观念的古天文学，创立了现代天文学。然而这一经验和将数学运用到自然现象的决定性胜利应归功于意大利比萨的加利莱奥·伽利略（1564—1642 年）。他以明确的概念提出新方法，

并神奇地运用于物理现象的研究，从而确定了第一运动定律，创立了作为基本物理科学的力学；在天文学研究中，也由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行星周围有了重大发现（土星环、木星卫星），重申了哥白尼体系，宣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变的有限天体世界理论的最终破产。他用非凡的散文体表述他的科学理论，主要有《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和《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36年）。可是罗马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哥白尼（1616年已被判处反《圣经》和异教徒罪名）体系（1633年），同时判处他永久监禁（软禁在家），这给意大利科学家的科学自由和首创精神以致命的打击。如果说伽利略的勇敢的学生们——如埃万杰利斯塔·托里切利（1608—1647年），气压计发明者，极有才华的水力学者——是在竭尽全力维护老师的科学方法和传统，那么创造新科学的基本事业是在意大利之外进行的，是由笛卡儿、莱布尼茨、尤其是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创始人——完成的。

这个时期内，科学和哲学继续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早在十四世纪业已深刻解体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式哲学，现又遭到新科学的致命打击。正是在科学领域内首先出现了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哲学，这一新哲学首先是自然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南方的三位意大利人：贝尔纳迪诺·特勒肖（1508—1588年）、焦尔达诺·布鲁诺（1548—1600年）、托马索·坎帕内拉（1568—1639年）。特勒肖以基于感性经验的哲学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以两个对立的有灵的物质——冷热——来替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和四要素理论。布鲁诺从哥白尼体系中得出最后的结论，肯定世界的无限性，将这种无限性同上帝的无限性联系起来，将神看做世界的精神（泛神论）。他确立了物质不灭和物质转化的原则，预感到惯性规律。坎帕内拉重申冷热两种对立力量的特勒肖泛灵论观念，他将这两种力量设想为爱和恨。他的政治乌托邦《太阳城》最为著名，该著作描绘了一种类似柏拉图式的理想社会，一种由科学指导、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的社会。

由于政治原因（反西班牙的阴谋）而不是宗教原因，坎帕内拉在狱中关押了三十年；布鲁诺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异端判处，他至死不

收回前言，在花市被活活烧死。囚禁坎帕内拉，施布鲁诺以火刑，判处伽利略，标志着意大利独立思辨的熄灭。意大利不仅失去了智慧的优势，而且走出创造欧洲文化的圈子，禁锢于纯学识或经院式论战之中。现代思想存在于、活跃于国界之外。现代哲学始于上面提到的笛卡儿；大约到了十七世纪末，意大利文化生活重新在哲学科学领域内活跃起来，但大部受笛卡儿主义的影响。而学识方面，其他外国人成了老师，尤其是法兰西圣莫尔会的本笃会修士（马比荣）。

97　路易十四的意大利政策　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

十七世纪末，意大利政治生活复苏，这是因为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重新过问意大利事务，意欲称霸意大利。这时法国顺利地结束了同西班牙的战争（1559 年），度过了所谓的投石党策划的人民和贵族起义的短暂危机，再次确立了其在欧洲可与西班牙、荷兰、帝国对抗的强国地位。

在同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冲突中，路易十四对意大利政策初露锋芒（见第 95 节）。路易十四同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 年在位）——科莫的奥代斯卡尔基，严格的教士，堪为道德典范，不能容忍任何的裙带关系——有过极严重的争执，有些是牵涉到法国教会、国王和教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高卢自由”），一个涉及教皇在罗马的世俗统治，因大使的庇护权已成为公共安全最严重弊端的源泉，取消庇护权已为其他强国所接受，唯独法国不予理睬。国王及其代表极其傲慢。法国大使被处绝罚，阿维尼翁和孔塔韦纳森被法国占领，国王呼吁召开大公会议（1687—1688 年）。亚历山大八世时期冲突被消除，法国放弃庇护权，归还被占领土。路易十四另些干预更直接关系到对意大利的总政策，更明确地与西班牙争夺在意大利的优势。1674 年，由于法国向西班牙所属的欧洲联盟开战，西西里城市墨西拿起义反对西班牙，要求路易十四保护。随后，在西西里水域法国人和西、荷发生了一系列海战，法国占上风。可是，当路易十四打算和平时，眨眼工夫撤出墨西拿（1678 年），从而置墨西拿于西班牙的报复

之下，只有几千市民躲避在法国军舰上免遭于难。起义者受到严厉惩罚，城市丧失所有的特权，从此衰败没落。

由路易十四同联盟缔结的《奈梅亨和约》（1678—1679 年），标志着他权力的顶峰。此时，他着手扩大地盘，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一系列的突然袭击。在同一天内（1681 年 11 月 30 日），占领了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和蒙费拉托的卡萨莱要塞，后者是在曼图瓦公爵同意下获取的。1684 年 5 月，热那亚遭到法国舰队的十天狂轰滥炸，因热那亚不听从，也不为西班牙建造帆桨战船的命令。执政官被迫前往凡尔赛请求宽恕。

热那亚失去了任何政治活力。萨沃依公爵对热那亚一直虎视眈眈，他采用外部进攻和内部策反相结合的策略。查理·伊曼纽尔二世于 1671—1673 年向它开战，战争毫无结果；路易十四从中调停，签订和约。同时，拉法埃莱·德拉托雷在萨沃依政府的赞同下，策划谋叛（1672 年），告吹。执政贵族封闭式的寡头政治加深了内部的不满情绪，因这种寡头政治很少接纳有名望的商人和地主新家族。

萨沃依公爵查理·伊曼纽尔二世（1638—1675 年），于 1648 年以童稚之年出任王位，只是在 1663 年生母死后才正式主持王政。其王国标志着皮埃蒙特的复兴和巩固时期。他十分注重军队，对人民的生活条件也甚为关切；尤其着手扩大和美化都灵，正是从他起，都灵才具有早期现代城市的外观。1655 年对瓦尔多教派进行残酷的血腥的迫害是最悲惨的一页，他们退隐山林，英勇自卫。新教强国——其中有克伦威尔的英国——出面干预，这场迫害才算结束。1663—1664 年迫害又起，程度不那么厉害罢了。

查理·伊曼纽尔二世之子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继承王位，母亲玛丽亚·焦万纳·巴蒂斯塔·迪萨沃依-内穆尔（萨沃依家族法国支系）摄政，臣服路易十四。在维克托·阿梅代奥真正主持政府（1684 年）后，这种臣服仍继续了好几年。公爵行宫处在皮诺罗洛和卡萨莱两法国要塞之间；路易十四为他制定法律，为之提供军队，迫使他再次迫害瓦尔多教派（国王于 1685 年取消由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

令》，该法令旨在保证法国新教徒的宗教自由）。在法国-皮埃蒙特的双重打击下，瓦尔多教派人英勇抵抗后，被监禁或放逐、驱赶出去（1686—1687年）；可是在1689年，其中一队人从沃州出发，穿过萨沃依所有山谷，完成了“光荣的返回”（1689年）。其后不久，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在同路易十四的战争中，又同他们重修旧好。

奥古斯塔联盟（帝国、西班牙、荷兰、英国）和路易十四之间爆发战争；开初，公爵与后者结盟，以换取米兰的一部分；可是国王要求维鲁亚和都灵要塞作保障。于是，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转而依附奥古斯塔联盟（1690年6月）。卡蒂纳侵入，蹂躏皮埃蒙特，在萨卢佐附近的斯塔法尔达打了一个大胜仗（1690年8月）。萨沃依和尼斯被法国占领（1691年）。帝国将军托马索之孙欧金尼奥·迪萨沃依-卡里尼亚诺-苏瓦松大公率援军赶到，维克托·阿梅代奥又占了上风，于库内奥大获全胜（1691年），侵入德尔菲纳托（1692年）。可是公爵身染疾病，居民进行游击战，法国人得到援军补充，迫使公爵重新翻越阿尔卑斯山。卡蒂纳在费内斯特雷莱——如今仍称该地为普拉·卡蒂纳——深挖战壕，重新发动进攻，在皮内罗洛附近的马尔萨利亚打了第二个大胜仗（1693年10月）。然而，1695年，法国人丢掉了卡萨莱，该地向曼图瓦公爵投降。公爵和国王举行谈判，签订《皮内罗洛条约》（1696年），法国将阿尔卑斯山这边的最后一个要塞归还公爵。由于盟国不愿承认这个条约商定的公爵在整个意大利取中立的立场，维克托·阿梅代奥将他的武装与法国的武装联合起来；于是帝国和西班牙支持这一条约结束在意战争（1696年），在海牙附近的赖斯韦克签订条约后不久，全面战争停止（1697年）。

在奥古斯塔联盟战争中，威尼斯共和国不站在任何一边，对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内，威尼斯顺利地恢复渡海作战，向土耳其人进行报复。1683年，同匈牙利起义者和路易十四达成一致后，土耳其向维也纳发起攻击，可是被围城市因波兰索别斯基国王所统率的帝国和波兰军队的胜利而解围（1683年9月12日）。威尼斯加入反土耳其联盟，其舰队司令弗朗切

斯科·莫罗西尼占领摩西亚、阿提卡、科林托海湾诸城，并受到伯罗奔尼撒的欢迎（1685—1687年）。然而，企图重新夺回克里特的行动失败。1694年1月，老莫罗西尼死于海战；于是，威尼斯人不再进行长期的征战，只维持海上霸权。同时，奥地利人将土耳其人逐出匈牙利并有所夺取。欧金尼奥·迪萨伏依太公在蒂萨河畔的森塔大胜（1697年）；法国联盟因《赖斯韦克和约》而解散后，土耳其签订《卡尔洛夫奇和约》（1699年），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斯拉夫尼亚交给奥地利；将摩里亚交给威尼斯，由于这个国家极悲惨的境况，这既是光荣的，又是负担沉重的夺取。

98 西班牙统治的崩溃和萨沃依王国

路易十四对意大利政策的最大目标是取代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西班牙的继承人问题为他达到此目标提供了良机。查理二世（1665—1700年）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最后一代，他既没有儿子，也无其他男性继承人。无论是法国的波旁，还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且不提其他较小的觊觎者，其中就有萨沃依公爵（属于凯瑟琳曾外祖母那一边）都要求继承，因为他们都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有着婚姻联盟。最后，查理二世用遗嘱提名路易十四的长子的幼子昂儒的菲利普为继承人，而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则提名大公查理的幼子为候选人，以对抗上述提名。路易十四接受提名孙子为候选人的遗嘱。这一提名也顺利地得到西班牙的承认，为菲利普五世。可是路易十四的某些举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不愿分裂成两个王室，而利奥波德一世同荷兰和英国在海牙结成联盟（1701年9月）。英国一贯反对法国，因路易十四支持信奉天主教的斯图尔特家族的复兴，反对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和安娜·斯图尔特两位新教君主，而汉诺威家族已被指定继承他们的王位。1702年5月，荷兰、英国和皇帝对法宣战。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握有意大利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与法国结盟（1701年4月6日《都灵条约》），入盟的还有曼图瓦的费尔迪南多·卡洛。

早在宣战之前，米兰地区已在调兵遣将，皇帝派遣军队要求收回

那块帝国封地，路易十四寸步不让，也派兵为西班牙捍卫该地。欧金尼奥大公通过维琴察地区挥军直下，猝不及防地捉住镇守阿迪杰河谷的卡蒂纳，并渡过阿迪杰河和明秋河（1701 年夏天）。维勒鲁瓦替代卡蒂纳，在基亚里也遭大公的沉重打击（1701 年 9 月 1 日），后在克雷莫纳被俘（1702 年 2 月 1 日）。在菲利普五世亲临战场的情况下，在雷贾诺的卢扎拉打了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1702 年 8 月 15 日），从而振兴了法国在伦巴第的命运。不满路易十四的萨沃依公爵却同奥地利坐在谈判桌上，因路易十四仍未下决心把米兰允诺与他。法国人发觉这一事件后，万拓姆解除了尚在其军队的皮埃蒙特人的武装，并囚禁了他们。尽管受到法国-西班牙军队的包围，公爵仍宣战（1703 年 10 月 7 日），并同反法联盟签订条约（10 月 25 日）。反法联盟答应让予他蒙费拉托、亚历山德里亚、洛梅利纳、瓦尔塞西亚和法国东部的许多省份。而法国人占领了萨沃依、苏萨、伊夫雷亚和维切利（1704 年）。

万拓姆一方面继续占领维克托·阿梅代奥的土地，另一方面又得对付回兵那儿的欧金尼奥大公，并在阿达河畔的卡萨诺（1705 年 8 月 16 日）和布雷西亚附近的卡尔奇纳托（1706 年 4 月 19 日）两次战败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万拓姆被召回法国；拉弗雅德指挥下的法国人包围了都灵（5 月）。在长达四个月的包围中，城市弹尽粮绝，处境极端悲惨；稍后不久，该城差点被突然占领，幸亏彼得罗·米卡做出慷慨的牺牲，拯救了全城。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在城外打游击，一直坚持到欧金尼奥大公的驰援。由于法国高级指挥官的愚钝，两人才能会合，在苏佩尔加山岗上他们谋划战斗方略——于是维克托·阿梅代奥许下一座教堂的誓愿，后按尤瓦拉设计建成——攻打沿途龟缩在包围圈里的敌军。都灵战役（1706 年 9 月 7 日）以法国人的全线崩溃而告终；意大利北部失守，1707 年 3 月 13 日向皇帝投降，撤退军队。维克托·阿梅代奥得到了卡萨莱和议定的其他土地。皇帝占领了米兰和曼图瓦（次年曼图瓦末代公爵谢世）；其军队破坏教皇中立地位，向那不勒斯地区——那不勒斯早就存在着独立分子-贵族党的运动，7 月 7 日叛乱又起，支持奥地利——进军，并占领之（1707 年 8 月）。

意大利各武装力量决定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在西班牙，菲利普五世在反对查理大公的斗争中坚持了下来。在父亲利奥波德和皇兄约翰一世（1705—1711年）去世后，查理本可成为小查理五世，把德国和西班牙的疆域联合起来；但这有助于英国、荷兰同法国的和解。根据《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根据《拉施塔特条约》（1714年），皇帝赞成《乌得勒支条约》——菲利普五世正式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任何权利；西班牙获得美洲殖民地，但将荷兰（几乎是现在的比利时）和除西西里以外的意大利领地割让给皇帝。此外，奥地利将曼图瓦并入自己版图。西西里归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并保留相应的国王称号；此外，他将卡萨莱和蒙费拉托其余部分、亚历山德里亚、瓦伦扎、洛梅利纳、瓦尔塞西亚一起并入皮埃蒙特。法国将费内斯特雷莱山谷和奥尔克斯山谷让给仍据有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一侧的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作为交换，他让出法国一侧的巴尔切洛内泰，承认在英国确立的继承顺序。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对于意大利来说，是相当明显的。取代西班牙统治的是奥地利统治；从行政角度看，奥地利统治较前者为优。在伦巴第，外国统治因曼图瓦的并入而扩大——标志着在消灭小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南方则恰恰相反，西西里实质上摆脱了外国的统治，即使稍后因撒丁岛代替了西西里的位置而使西西里摆脱程度减弱。萨沃依在皮埃蒙特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疆域，巩固了其统治，并解除了法国的一切占领。拥有王国地位的一个大岛并入萨沃依国，标志着其地位的极大提高，除奥地利之外，它已是意大利的头等强国。然而，如果不是一个岛屿王国，而是伦巴第置于萨沃依权杖之下，那么其成就将会大得多。

威尼斯共和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仍保持中立，但并不是说它的土地没有为外国军队的过境和用兵服过务，居民负担极重。1714年12月，由于反叛的门的内哥罗人避难于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威尼斯共和国又拒绝交出他们，于是土耳其苏丹向共和国宣战。共和国暂时不能指望任何欧洲大国的帮助，仍全力以赴进行抵御。摩里亚半岛

的希腊人，发现威尼斯贵族政府在宗教方面比土耳其政府更不宽容，极为不满，纷纷背叛，为土耳其的攻占提供便利。可是伊奥尼亚群岛上的居民则不然，他们奋勇抗击土耳其人。土耳其人采用速决战，征服了整个摩里亚半岛，后即前往包围科孚岛（1716 年）。

此时，威尼斯和奥地利之间重新结盟（1716 年 5 月），土耳其向奥宣战。战争引到匈牙利国土上，在小瓦拉几亚，欧金尼奥亲王消灭三倍于己的土耳其军队（1716 年 8 月 5 日）。几天以后，威尼斯人迫使围困科孚岛的土耳其人混乱撤退。奥地利打了几场胜仗后，土耳其人求和。双方签订了《帕萨罗维茨条约》（1718 年 7 月 21 日）。依约，威尼斯割让摩里亚半岛，但保有阿尔巴尼亚沿岸的伊奥尼亚、布特林托、普雷韦扎、马尔加和沃尼特扎诸岛；奥地利在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获地颇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等）。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

99　在意大利的波旁人　半岛新的政治格局

尽管西班牙在《乌得勒支条约》上签了字，仍不甘心失掉在意大利的统治区，更何况菲利普五世的第二位妻子，野心勃勃而又聪慧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梦寐以求为其儿子们在意大利建立诸王国。菲利普五世也奢求在法国当侄子路易十五（1715—1774 年在位）的摄政，甚至谋求继承王位，尽管他已声明放弃这么做。首相朱利奥·阿尔维罗尼·迪皮亚琴察（教士，后成为红衣主教），为实现这两人的企图绞尽脑汁，奔走效劳，出谋献策。西班牙的两次远征先后取得了撒丁岛（1717 年）和西西里岛（1718 年）。但英国、荷兰、法国和奥地利四国同盟（1718 年 8 月在伦敦签署）迫使菲利普五世解除阿尔维罗尼首相之职，并使其屈服。后又缔结《海牙条约》（1720 年 2 月 17 日），依约，查理六世放弃对西班牙和西属殖民地的任何要求；菲利普五世放弃对意大利和荷兰的企求；奥地利取得不断抗议的西西里，而不是已割让给萨沃依的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的撒丁岛，而阿梅代奥二世曾妄图用其换取托斯卡纳。西班牙的波旁人也有所得：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在法尔内塞和美第奇两家族消亡后，被转给菲利普五世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唐·卡洛斯——既没同

各君主也没同有关的人民商讨。这种安排为随后的诸条约所确认。

1731年1月，法尔内塞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安东尼奥去世；随后公国为打着唐·卡洛斯旗号的帝国军队所据有，教廷提出抗议，但属徒劳，因为谁也不考虑教廷所要求的君权。在托斯卡纳，继承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是其子科西莫三世（1670—1723年），在他治下，美第奇政权沦为懒惰固执的暴政。其子吉安·加斯托内（1723—1737年在位）颇有天分，可是当他上台执政时，已疲倦多病，又因他的生活习惯（同性恋）而声名狼藉，终身无子。他不得不屈服于1731年9月的条约，承认各大国为其国家所做的安排，同意西班牙驻军托斯卡纳（1731年12月），接受唐·卡洛斯本人为继承人，并作为他的未成年的保护人。

十八世纪上半叶，继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欧洲又爆发了另两起王位继承战争，给意大利的版图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第一次战争（1733—1738年）是争夺波兰王位（选举）。波兰民族党的候选人是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他得到法国的支持，其对手是奥、俄支持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后者获胜。法国不甘心被保护者的失败，一心伺机报复奥地利。为得到西班牙的支持，许诺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让给唐·卡洛斯，将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割与其弟唐·菲利普；又为得到撒丁国王查理·伊曼纽尔三世（1730—1773年，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之子）的支持，许诺将伦巴第割让给他。在意大利，法国-皮埃蒙特军队在老元帅维拉尔和查理·伊曼纽尔的指挥下，开进米兰（1733年11月3日），占领伦巴第，查理·伊曼纽尔自封为米兰公爵。次年，帝国军队企图发动进攻，但在帕尔马（1734年6月29日）和瓜斯塔拉（9月19日）被法国-皮埃蒙特军队击败，并被迫龟缩于曼图瓦。与此同时，一支西班牙军队于1733年底在托斯卡纳登陆，经拉齐奥进入帝国军队防守薄弱的那不勒斯王国。1734年5月10日，唐·卡洛斯庄严地进入那不勒斯，受到市民的欢迎，他们高兴重又有了自己的国王；5月25日，蒙特马尔将军在比通托大败奥地利军队。年底，整个那不勒斯地区和西西里全部

落入唐·卡洛斯之手。1738 年 11 月 18 日维也纳和约承认唐·卡洛斯拥有这两地（包括普雷西迪）。根据该条约，承认奥古斯特为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保留国王头衔，取得洛林地区，他死后，转让给法国；1736 年与玛丽亚·特雷萨结婚的洛林公爵弗兰西斯·斯特凡在吉安·加斯托内死后（1737 年 7 月 9 日）取得托斯卡纳大公国；指定给查理·伊曼纽尔三世的，不是伦巴第，而仅仅是诺瓦拉、托尔托纳和朗格地区的一些帝国封地；奥地利保有米兰和曼图瓦两地区，并获得帕尔马和皮亚琴察。

1738 年《维也纳条约》重申承认先前已由各强国承认过的国事诏书，即王朝继承法，根据该法，查理六世将其哈布斯堡不可分割的领土传给其直系后裔，即使是女嗣，也可承继给女儿玛丽亚·特雷萨。可是当他于 1740 年 10 月去世时，一系列竞争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全部的或部分继承权，其中首推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贝托，他甚至提出自己作为皇帝的候选人以对抗玛丽亚·特雷萨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西斯·斯特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霍亨索伦家族于 1701 年取得了这一尊严）加入玛丽亚·特雷萨的敌人行列，他企图占据西里西亚，并首先由他采取战争行动占领西里西亚（1740 年 12 月）。法国同巴伐利亚、普鲁士和西班牙（西班牙这时企图为堂卡洛斯之兄弟堂菲利普谋求伦巴第）结盟，只有英国支持玛丽亚·特雷萨。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贝托当选为皇帝（1742 年 1 月），称查理七世。

在意大利，查理·伊曼纽尔三世起初站在反玛丽亚·特雷萨联盟的一边，后因西班牙人和那不勒斯人准备进犯米兰，他又同玛丽亚·特雷萨结盟（1742 年 2 月），以免被封锁在波旁领地之中；《沃尔姆斯条约》（1743 年 9 月）重申了这一联盟。大部分意大利国家宣布中立；那不勒斯国王和莫德纳公爵宣布支持西班牙。所以奥地利-撒丁和法国-西班牙之间在意大利展开了斗争。奥地利一支军队企图侵犯那不勒斯王国；奥军最初获胜，后被国王查理三世在韦莱特里所击败（1744 年 8 月 11 日）。在意大利北方，战争犬牙交错，先是奥地利-撒丁军队占

领帕尔马和莫德纳，其后法国-西班牙军队侵入皮埃蒙特，在塔那罗河畔的巴西尼亚纳重创奥-撒军队（1745 年 9 月 27 日），攻陷托尔托纳、阿斯蒂、卡萨莱，占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1745 年 12 月 19 日，唐·菲利普胜利进入米兰。查理·伊曼纽尔开始同法国商谈，要求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归唐·菲利普，米兰交萨沃依家族；后来谈判破裂。皮埃蒙特很快从高卢-西班牙人手中被解放出来，法、西在皮亚琴察城下又遭惨败（1746 年 6 月 16 日），丢失伦巴第，被迫撤到阿尔卑斯山一带。热那亚出身的奥地利将军博塔·阿多尔诺在英国舰队的支持下攻占热那亚（9 月 6 日），因热那亚支持高卢-西班牙，特别反对萨沃依对菲纳莱侯爵封地的企图。四个月来，城市备受胜利者的凌辱和强权，终于在奥地利士兵多次挑衅下，全体民众揭竿而起——巴利拉起义——，五天苦斗之后，奥地利人被逐（1746 年 12 月 5—10 日）。奥地利-撒丁军队包围城市，当法国人准备进攻皮埃蒙特的消息传来时，查理·伊曼纽尔召回其军队，阻敌入侵。法国人通过热内夫尔山口进入多拉·里帕里亚山谷，但在阿西埃塔山口又被打退，损失极其惨重（1747 年 7 月 19 日）。

法国虽在荷兰有所得，但补偿不了其在意大利的失败；查理七世去世后——洛林的弗兰西斯·斯特凡被选为继承人（1745 年），称弗兰西斯一世，于是开始了哈布斯堡-洛林序列——巴伐利亚和仍握有西里西亚的普鲁士退出斗争；最后俄国从中干预，支持玛丽亚·特雷萨，这一切导致《阿奎斯格拉纳和约》（1748 年 10 月 18 日）。德国确认国事诏书，弗兰西斯一世被承认为皇帝；普鲁士国王保留西里西亚。在意大利，查理·伊曼纽尔三世取得沃格拉·维杰瓦诺和北诺瓦拉，把其国家的东部边界扩大到提契诺河；波旁的唐·菲利普成为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公爵；莫德纳公爵重新据有其国家；热那亚保证被奥地利卖给热那亚的菲纳莱侯爵封地的独立。

拿 1748 年意大利的地图同其 1559 年的地图相比较，会发现外国统治已缩小到米兰和曼图瓦西部地区。出现了波旁家族西班牙支系统治下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独立王国，这一波旁支系迅速意大利化，甚

至那不勒斯化。萨沃依公国已变为王国并极大地扩大了版图。这段时间内，意大利一些大国吞并了较小的公国和帝国封地：萨卢佐、蒙费拉托、兰格封地落入萨沃依手里；被帝国吞并的曼图瓦并入米兰公国；菲纳莱侯爵封地割与热那亚；米兰多拉和孔科尔迪亚（十八世纪初叶）并入莫德纳公国，由于埃尔科莱·里纳尔多·德斯泰和马拉斯皮纳-西博后嗣联姻，马萨和卡拉拉公国也准备同莫德纳合并；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上半叶，托斯卡纳大公国吞并了皮蒂利亚诺（属奥尔西尼家族）和圣菲奥拉（属斯福尔扎家族）的伯爵封地；教皇国吞并费拉拉、乌尔比诺、卡斯特罗。

这种疆土的集中并不一定意味着被吞并的土地上的繁荣昌盛；在某些十分重要的地方（曼图瓦、费拉拉、乌尔比诺）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对于其他的领土变化，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相反。萨沃依国土得失基本持平，还获得了一些偏远的领土，但其最大政治目标——夺取伦巴第——未能达到。伦巴第落入另一外国统治之手，这个统治比西班牙的更好、更巩固；帝国把米兰、曼图瓦作为封地吞并后，事实上重新确立了其对帕尔马、皮亚琴察和托斯卡纳的最高权力，一般来说，甚至对整个意大利事务的最高权力；皇帝本人甚至亲自管理托斯卡纳，尽管那里存在一个单独的政府，并将由其一个儿子继承其事业。如今，威尼斯共和国在意大利事务中已无任何影响，也无任何愿望和能力反对和抗衡外国势力；甚至它的土地遭受交战国的无情践踏，也只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更有甚者，这种命运也轮到教皇国，它连最后的一点政治重要性也丧失殆尽。在那不勒斯王国（正如在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新王朝因王朝血缘关系而与西班牙结盟，唯西班牙之命是听。最后，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意大利格局的变迁，除一小部分外，均非土著力量的功绩：半岛的命运再一次取决于外国势力，它们把意大利变成自己的战场。

100　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化

总的来说，十八世纪标志着意大利民族真正的显著的觉醒时期，

但这不是因为领土和王朝的变迁，而应归因于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十八世纪，意大利精神生活猛烈的觉醒，返回欧洲精神生活的圈子里。由于欧洲精神生活同时也在独立于意大利而发展，意大利必然受其影响；因此意大利精神觉醒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外国文化的广泛渗透，从而产生了与欧洲生活更紧密联结的新的民族生活。

十八世纪的文化变革首先是在互相紧密联系的科学和哲学方面，文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十八世纪的科学思想使十七世纪的遗产开花结果，最终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即立足于对事实做积极的观察和实验，依据这些事实推理，排除先验的和超然的解释。经验主义和数学胜利地结合。在数学领域里，都灵人路易吉·拉格朗日（1735—1813 年）的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萨沃依境外，在普鲁士和法国，找到了适当的环境，出版了《分析力学》一书（1788 年），书中摒弃任何形而上学，使力学中数学方法的运用达到了顶峰。法国数学家继牛顿的宇宙学，完善了宇宙力学概念：他们同让·达朗贝尔（1717—1783 年）一起建立了分析力学。天文方面，英国人走到前列（布雷德利，他为地球运行做了决定性的试验；赫歇耳——定居在英国的德国人——改进了天文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是一位星云理论家）。

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直到革命前，意大利对此没有多少建树。在这个世纪里，发明了温度计、避雷针、蒸汽机（瓦特，1765 年）。化学进步是最有决定性的，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是法国人安托万·拉瓦西埃（1743—1794 年）。

自然科学主要对文艺复兴后完成的工作进行整理和系统化。在这种综合工作中，首推法国人乔治·比丰（1707—1788 年），他发表了《自然史》一书；法国人阿维（1743—1822 年）创始了晶体学。英国人尼达姆（1713—1781 年）发现了纤毛虫；意大利伟大的自然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扎尼（1729—1799 年）也曾研究过纤毛虫，他对循环、呼吸、消化的研究也卓有成效。日内瓦人瑟讷比埃（1742—1809 年）建立了植物呼吸说；对淋巴的研究已经完成；植物的性别特别是由于

瑞典伟大的植物学家、双名法创立者林奈（1707—1778 年）而被认识。医学终于克服了经验主义，力求更合理、更充实。东方接种实践传播到英国，导致詹纳（1796 年）发现牛痘疫苗。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种科学的融会贯通：天文学家一般也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物理学和生物学也紧密相关。这种融合和这个时期科学活动的综合和归纳的性质，可用“哲学家”这一术语表达，因而科学家被公认为是“哲学家”。

这种科学哲学化倾向，对十八世纪的哲学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时期内哲学冲出专家垄断的狭窄的、与世隔绝的圈子，走向知识界，关心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问题。其目的不再是确定抽象的、理论上的真理，而是传播科学研究取得的知识，从中引出实际的结果。因此，哲学涉及风俗习惯、法律、社会的信仰，成为政治和社会演变的直接工具。这个运动称为启蒙哲学，或者称为百科全书派（来自法国的百科全书），或者称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一词含义模糊，必须抛弃，代之以“理性主义”，因为其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上理性主宰一切。这一运动得到共济会的有效推动，尽管很少有人能明确说清楚。共济会是一秘密社团，兴起于十八世纪初，是从英国传到大陆的。

如果用几笔来总结这一运动的特点，可以说，它就在于企图在各个方面根据理性所确定的原则来改革一切思想和基本原理，反对迄今承认的权威，反对传统和传统感情，反对历史偶然性。在哲学方面，这一运动通过英国人约翰·洛克（1632—1704 年）维护了经验论，认为我们的各种知识来自通过感觉达到的经验，通过对感觉掌握的资料进行反思达到的经验，排除先天的观念和与生俱来的思想。在宗教方面，它或多或少公开地反对基督教条、任何宗教启示形式和教会组织，支持自然神论，即基本寓于各种人性中的宗教。所谓自然神论，它承认上帝的存在，灵魂不灭，拒绝神秘、奇迹等，总之，拒绝违背理性的任何事物。然而，启蒙哲学允许积极宗教和教会的存在，也允许国家教会的存在，认为这是必要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但坚持要求宗教

上的宽容。在伦理学方面，支持自然和理性道德，实际上是社会功利主义。在政治方面，主张消灭中世纪的任何残余，即消灭封建特权、等级差别等，主张资产阶级和贵族平等，支持集权力于国家之手，反对中世纪式的权力分割，要求有文化的阶级参加政府，为集体利益管理公共事务，一句话，主张一种开明的政府。

启蒙哲学发祥于英国，流派众多，其渊源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洛克可以认为是启蒙哲学之父，也是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和宗教方面应用这一哲学的先导。他认为基督教的真谛在于其同理性的和谐，而不在于教义；而自然神论者，自称为自由思想者，突出的有托兰（1670—1722 年）和廷德尔（1656—1733 年），则恰恰相反。大卫·休谟（1711—1776 年）摆脱了自然神论，得出了更激进的结论，他运用比洛克更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关于上帝和灵魂不灭，理性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原始宗教不是理性宗教，是由人的感情创造的，人首先害怕自然的力量，于是按其想象来理解自然，产生了多神论。这些激进的流派没能在英国占优势，也没有较大的影响。

在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激进倾向广泛流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法国的启蒙哲学思想取之于英国的自然神论和经验主义，然而它本身又更清楚地倾向于大力宣传采取实际行动，赋予英国思想以典型的反教权的和反天主教的性质。这一运动可概括成三个名字：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卢梭。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戴·伏尔泰（1694—1778 年），在其漫长而多产的作家生涯中，绝对左右着——由于其知识的渊博新颖，由于其风格的机敏酣畅又便于传播（除了法语的普及外），由于思想的热情开放富于人道主义，还由于其善辩——欧洲文化世界。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深入地在大陆传播英国思想（牛顿的科学、洛克的哲学、自然神论、宗教的宽容、议会的自由），尤其是出版了《英国书简》（1734 年）一书，此书被法国政府烧毁。谁也比不上他那样全力地传播启蒙哲学，特别是他所著的《哲学词典》（1764 年）。他的浩瀚的文学著作都服务于新思想的宣传。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他最重

要的著作之一，是法国最大的一部史书，书中伏尔泰指出他倍加赞颂的那个辉煌时代的唯一污点是，路易十四采取天主教的不宽容的政策。对理性、人道和文明的崇拜，对教义和教会的憎恶，是促成他写出著名的《风俗论》（1753—1758年）一书的主要动机，该书是一本通史哲学提纲，它标志着现代史学的一个里程碑，它以文化和思想史替代纯政治-军事史。他统治着法国戏剧的悲剧作品同样贯穿着这些思想。其他一些小集子、短文、小说、对话体小说等，亦主要用于宣传。

伏尔泰否定所有积极宗教的合法性，在他看来，这些宗教的基础是神甫的谎言和平民的轻信。他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由理性启示的伦理秩序的存在；但是，他否定神意，至少否定神的万能。实际上，他不打算消除宗教，相反，他认为宗教对人民来说是必要的，但要求宗教宽容。这是他最坚持的一点。正因为如此，他对公众舆论很有影响力。政治上，他主张君主和上层社会的（“正直人的”）为公共利益谋福利的开明政府，这个政府尊重自然法则，尊重个人、财产、思想、宗教、出版等自由，这一切均高于任何国家利益。他具有作家和普及家的卓越天赋，对其时代具有特殊的影响，他为了使欧洲的思想摆脱宗教、权力和传统的束缚所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提出新政治思想的，除伏尔泰外还有夏尔·孟德斯鸠（1689—1755年）。他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尖刻地抨击了暴政，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中，目光犀利地研究了罗马强盛及衰败的原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用对比的方法研究各国人民的立法，立法在伦理和自然环境中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则。他是英国政体的欣赏者，主张——现代立宪政体的基本思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从技术意义上说）是艾蒂安·德孔狄亚克（1715—1780年），他认为，精神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活动（注意、判断、观念）来自于感觉，把这种感觉理解为精神从外部世界被动地接受的印象。孔狄亚克的感觉论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但是，孔狄亚克承认，精神有别于物质；可是有人更进一步，把物质看成唯一的

现实。唯物主义把霍尔巴赫（1723—1789 年）——住在巴黎的德国人——的《自然体系》一书看成是自己的“圣经”。

德尼·狄德罗（1713—1784 年），与伏尔泰、卢梭一起，同为法国启蒙哲学的最重要作家。在这三人中，他的学识更渊博雄厚，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在那些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清楚阐述了他最大胆的思想。他的名字和他的影响首先是同《百科全书》（1751—1772 年）联系在一起的，他同达朗贝尔一起，是该书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其合作者还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比丰等。这本按字母顺序编纂的三十五卷巨著，是人类知识的综合。编写过程中，合作者之间也存在过矛盾和各执一端，而终能加以实际调节。该书成为支持启蒙哲学反对过去旧思想的有力宣言书。

日内瓦人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年）与百科全书派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在许多方面反对他们。他全部著作的基本观念是自然同社会的对立：自然使人善良、自由、幸福；而社会却让人变得邪恶，变成奴隶，饱受悲惨之苦。在《论科学和艺术》（1750 年）一书中，他否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改善了风俗；在《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1755 年）一书中，他认为社会生活会导致需要的成倍增加，会导致自私自利的争斗和灾难，并会产生出不平等和个人所有制的基本弊端。回复到原始国家是不可能的；某些方面，文明人超过原始人，但是能够和必须在我们中恢复人们所固有的仁爱和幸福。恢复工程是这样来完成的：每个人要受教育，让他按其本性自由地发展（《爱弥儿》1762 年）；每个家庭，要建立在夫妻和子女相爱的基础上（《新爱洛漪丝》1761 年）；最后，每个社会，要重建由社会契约制约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契约论》1762 年）。即是说，卢梭设想只有当每个人舍弃个人的意志，以便服从谋求全体人民利益的全体人民的意志，社会和社会权威才能产生；所以国家权力来自集体，国家权力必须以人人平等为前提，必须维护大家的利益；反之，其合法性就归于乌有，契约被解除，个人重又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卢梭的许多思想与宗教思想是有联系的，在宗教思想中有其基础。

上帝创造天性善良的人；上帝能以其亲切的支持使人重新变成善良。《萨沃依代理的宗教声明》（《爱弥儿》一书中）认为存在着上帝，存在着天意，灵魂不灭。实质上，这是自然神论者的观念；然而，对于卢梭来说，它不是抽象的断言和纯理论的推理，而是感情的内心生活的产物。卢梭感到上帝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生命的基础，对他来说，道德实质上也是基于宗教感情之上的。

伏尔泰左右路易十五时代；卢梭准备了革命。可以说，革命的福音书就是他的《社会契约论》。

在法国，不仅仅是哲学家宣扬新思想和主张大胆的改革，经济学家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主要是所谓的重农主义者。重农派形成于1750—1770年之间，提出与启蒙哲学相类似的哲学原则。该原则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切自然法则的个人之间签订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的目的，是限制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的权利不相容。国家的干预应简化成这样一种职能，国家应给予所有权、工作、商业充分的自由；没有任何垄断、没有任何特权。因此，重农主义者反对所谓的重商主义，即反对在上一个时代就已生机蓬勃的工业保护主义。他们认为，工业、贸易、流通货币不能构成真正的财富；财富仅由自然给予，即土地、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最好手段才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

重农主义者的理论不只对理论界，而且对各国政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人亚当·斯密（1723—1790年）反对他们过于排除财富的观念，他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使他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他阐明了经济财富的真正生产者是劳动，深刻分析了劳动、价格、资本的概念以及供求的规律，重申了自由竞争的原则。

101　意大利文化的革新

意大利是受启蒙哲学（特别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卢梭的影响较小）影响的国家之一——不过是在一个相当狭窄的知识界里。本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对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是在哲学-

宗教的思辨和辩论方面，而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在经济方面，意大利人部分走在重农主义者前面，部分又受其影响。例如，詹巴蒂斯塔·瓦斯科（1733—1796年），他反对行会，赞成贸易自由；吉安·里纳尔多·卡利（1720—1795年），尤其是安东尼奥·杰诺韦西（1713—1769年），他讲授贸易学，宣布谷物自由流通；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1728—1787年），他批评重农主义者，支持执行一种视情况而异的经济政策。米兰贵族彼得罗·韦里（1728—1797年）——《咖啡馆》报的主编——从自由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角度来研究经济，但不像那一学派那样夸张；他从事确定货币概念的研究，他极为关心米兰地区的行政和政治情况，赞成按当时政治思想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改革。在最后几年内，也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他颇为欣赏立宪机构。他对刑法也感兴趣，撰文反对严刑拷打。这方面，米兰人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年）的著作《犯罪与刑法》（1764年）更为著名，他主张对刑法和诉讼程序做激进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是：刑罚不应具有报复性质，应具有单纯的社会安全性质，因此，主张起诉合法性，减轻刑罚，终止滥用刑罚（私下起诉、任意监禁、秘密审讯），取消严刑拷打，取消死刑。贝卡里亚还研究农业和经济，在劳动评价上，先于斯密。继他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加埃塔诺·菲兰杰里（1757—1788年），他在极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巨篇《立法之科学》一书，全书基于哲学原则支配一切事物的原则思想之上。

十八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土生土长的思想家是詹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年），他不是去批评当时的思想和体制，制订改革计划，而是着力于对历史事实的纯理论研究和客观探索其内在属性。在他的《新科学》（1725年、1730年、1744年）一书中，他企图勾画出人类历史的大体轮廓，他从语言、诗歌、神话、法律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他识广而杂，评论多不完备，但具有尖锐的直观力），进而将人类划分为三个时期——众神时期、英雄时期、人类时期。按照其循环再循环的理论，这三个时期在人类社会中相继周而复始。在某些方面，维科已走在十九世纪哲学和历史道路上，对其时代的倾向和必要作壁上

观，因此，他对其时代的影响无几。

在历史方面，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写出了鸿篇巨著。按时代积极的方针，收集和评点史实及文献方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利（1672—1750 年），其著述有：《意大利史料集》，即有关中世纪意大利史料的书；《意大利中世纪文物研究》，汇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论文，在详细分析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再现了意大利中世纪生活的许多方面；《意大利编年史》，该书收集了他用编年史的形式从中世纪一直叙述到 1749 年的研究成果，语言简练流畅、生动，全书贯穿着进步的人道精神。能与其著作媲美的是阿波斯托洛·泽诺，尤其是杰罗拉莫·蒂拉波斯基（1731—1794 年）的意大利文学史，后者写了《意大利文学史》一书。路易吉·兰齐（1731—1810 年）用其《意大利绘画史》开辟了艺术史之先河。彼得罗·詹农（1676—1748 年）阐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和道德观的历史观。他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历史》一书中，按照反教会和王权主义的论点描绘了政治和宗教体制的演变，创立了当时的一种政治主要倾向。他的《教皇三重冕》一书甚至超过了王权主义，该书对《圣经》和基督教史做了大胆的评注，充满了唯理主义和自然神论，可是这种评注至今仍未发表。

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报纸。它诞生于十六世纪中叶，起初刊登手写的通告，十七世纪得到了发展。除刊登政治消息的报纸外，还出现了知识性和学术性报纸，登载原始回忆录以及意大利和外国新作品的梗概和评介。《意大利文学报》就是这种类型的报纸，泽诺任该报主编好几年。十八世纪模仿英国的一种新型报纸，报上的知识性消息由面向广大读者论述和讨论各种思想及各种问题所取代。《咖啡馆》（1764—1766 年）就是这种类型的报纸，在米兰发行，主要由彼特罗·韦里编辑，带有唯理和改良色彩的倾向。该报也用很大的篇幅报道文学评论，反对古典主义和传统的迂腐派，支持轻快活泼，但语言不免失之于粗糙的新文学。那时，文学批评之风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塞佩·巴雷蒂的《文学鞭子》（1763—1764 年），他反对阿卡迪亚学

派，主张以观察人类现实为基础的、有益于生活的、包罗万象的文学，赞成轻松的、好读易懂的现代散文体，同时注重语言的纯洁性。第三家定期报纸是加斯帕雷·戈齐的《威尼托观察家报》（1761—1762年），报纸更注重精神描写，但也不乏和善而友好的讽刺。

十八世纪，在意大利真正的文学有了很大的演变：深刻地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在十七世纪已僵化了的浮夸修辞传统，创造了适合表达时代感情和需要的、同生活密切关联的新形式。

“阿卡迪亚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意大利诗歌从十七世纪过渡到十八世纪，是罗马阿卡迪亚学院促进的一种文学运动，旨在结束十七世纪文艺风格。此外，“阿卡迪亚学派”创立于1690年，当时马里诺诗派（一种极端矫饰的文体）已日薄西山。它的纲领是振兴意大利诗歌，以田园式的朴实无华和真实自然来反对十七世纪的文艺夸张，然而，正如人们很容易理解的，这是用新的矫饰替代老的矫饰。阿卡迪亚学派最喜爱的是短诗；保罗·罗利（1687—1765年）和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所写的短诗，浓淡得体，玲珑剔透。然而，另一位阿卡迪亚诗人卡洛·因诺琴佐·弗鲁戈尼（1692—1768年），偏爱浮夸华丽的形式，热衷于把散文诗写成抒情诗。总之，在本世纪的上半叶，意大利抒情诗没有出现真正的新生命；与此同时，以尼科洛·福尔泰圭里（1674—1735年）的《里恰尔德托》为标志，出现了骑士诗《在逗人发笑中死去》，他的诗篇里把骑士诗的旧题材写得分外滑稽可笑。

情节剧和喜剧生机勃勃。前者在十七世纪时其地位相当低下，成为戏剧和音乐的各种古怪的服务性工具。由于阿波斯托洛·泽诺（1668—1750年）的努力，它上升为堂而皇之的艺术；到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年）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著有下列剧作：《被遗弃的狄多》、《卡托在乌蒂卡》、《蒂托的仁慈》、《特米斯托克莱》和《阿蒂里奥·雷哥洛》。他以古代典型的事实和传统为题材，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时代的口味和特点，从而写出的剧本充满爱恋的情节，柔情蜜意的诗句，浓厚的文字韵味形式，同时又完全适合配以音乐。可以说，他的情节剧实质上是时代的感情和风俗的

代表。

同时期最生动、最多样化、最直接的代表是威尼斯人卡洛·哥尔多尼（1707—1793 年）。他逐渐以正规的文学喜剧代替即兴剧，然而，它不同于十六世纪的文学喜剧，不是较自由地模仿古典喜剧，而是直接表达日常的现实，首先是表达威尼斯的生活；表达其生活特点、风土人情，并采用善意的讽刺手法。我们提及他的下列作品：《咖啡馆》、《女店主》、《说谎者》、《莫测之事》。哥尔多尼用其著作描绘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给毫无生气的意大利文学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生命之风。然而，他实质上属于随着革命的到来注定要沉坠的十八世纪世界，尽管他的作品对新的时代已有某些预感。实际上，是帕里尼和阿尔菲耶里的作品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朱塞佩·帕里尼（1729—1799 年），布里安扎地区的博西西奥人，是一位具有甚高自由感情的司铎。开始时，他是阿卡迪亚学派的，但能驾驭其上，表达真诚的个人意念和感情，表达文明和道德的高尚理想的《颂歌》革新了意大利抒情诗。他的《颂歌》，文体朝气蓬勃，韵律千变万化，同时结构严谨有力。然而帕里尼的杰作是《一天》，他以非凡的令人惊叹的艺术写出销魂融魄的诗句，以卓绝的讽刺，描画了当时大部分贵族所过的游手好闲的无益的生活，以一位诗人教导一位“年轻的绅士”的形式刻画了贵族如何打发一天的时光，这与劳苦人民和穷苦大众的生活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天》分为四个部分（早晨、中午、黄昏和夜晚），第一部分发表于 1763 年，这本书的出现，真正开始了意大利现代文学。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达斯蒂（1749—1803 年）第一个给意大利创造了伟大的悲剧和戏剧，他的悲剧明显受法国悲剧的影响，但也是一种强有力个性的作品。他创作了下列作品：《菲利普》、《阿加梅诺内》、《俄瑞斯忒》、《维尔吉尼娅》、《弥拉》、《扫罗》、《疯人的谋叛》。这些悲剧因其刚劲辛辣的文体（这是对阿卡迪亚最有力的反对），结构严密的剧情，人物性格的突出而著名；其自由和反暴政的政治理想，主要表现于散文作品（《论君王和文学》、《论暴政》）中。

无论是悲剧还是散文，比起帕里尼的作品，达斯蒂的作品更加使人感到法国革命的气息，激起人们爱国的高尚情感，从而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在艺术上，十八世纪，更确切地说，在摄政时期和在路易十五王朝的上半期，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意大利之外，继巴罗克王国的是“洛可可”王国。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风格，它以独特轻快的涡旋线纵横交错的轮廓、花冠、垂花、贝壳的装饰，取代干脆有力的线条；以玫瑰色和柔淡色取代果断的风格和阴暗的色调。

洛可可风格首先时行于家具的装饰，称之为路易十五风格。随后，作为装饰艺术风靡欧洲。瓷器的加工有助于、适宜于这种风格的推广，其材料早就从中国引入，十六世纪在意大利试图生产，现在终于制造成功。法国塞夫尔瓷器享有盛誉（从 1756 年往后）。然而新风格对这一伟大艺术也有影响：十八世纪法国各“公馆”中也深受波及。

这时，意大利已将艺术进化的领导权让与了法国，因其过去最高艺术流派仍在意大利。建筑最忠实地保留十七世纪艺术风格，仍创造出极高价值的作品，例如尼科洛·萨尔维（1699—1751 年）的特雷维喷泉，斯佩基和德桑克蒂斯的三圣山石阶（1721—1724 年，洛可可的天才例子），亚历山德罗·加利莱伊（1691—1737 年）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的正面墙和费尔迪南多·富加（1699—1780 年）的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面。最朴素的建筑师是菲利普·尤瓦拉（1676—1736 年），苏佩尔加寺庙的作者；而路易吉·万维泰利（1700—1773 年）建造了卡塞尔塔王宫，引入了法国宫殿的豪华宏伟的正面。

意大利的绘画界出现了威尼斯的天才艺术家詹巴蒂斯塔·蒂埃波罗（1696—1770 年），他继承了威尼斯派的传统，又有其独特的风格：奔放的动势和精湛的装饰。在他之后，仍是威尼斯的两个卡纳莱托（安东尼奥·卡纳莱，1697—1768 年；贝尔纳迪诺·贝洛托，1720—1780 年），他们绘制了大量的威尼斯美丽的风景画；弗朗切斯科·瓜尔迪（1712—1793 年），画的类似的风光画达到了独特性和现代性的顶巅。相反，罗马的蓬佩奥·巴托尼（1708—1787 年）的绘画又退回

到意大利古典艺术的风格。

瓦托、布歇、弗拉戈纳尔的浮华风气在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中大行其道。针对这一风气，出现了以德国人温克尔曼（1716—1768 年）——在意大利研究和写作——为代表的复兴对考古和古典艺术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古代艺术史》（1764 年）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德国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促进了对古代的全面爱好和欣赏。1755 年，庞培城和埃尔科拉诺的首批重要发现以及卓越雕刻家罗马人安东尼奥·皮拉内西（1720—1778 年）制作的无数罗马古迹景色版画，都推动了这种尚古的倾向。古代风味首先占领了装饰艺术，形成了所谓的帝国风格，实际上它早于拿破仑时代。路易·大卫（1748—1825 年）使这种风格在绘画中取得成功，他被古代思想道德和美德激起了巨大热情，是一位仿古的极端的拥护者。他 1784 年所作的画《贺拉提乌斯三兄弟的宣誓》就已成功地确立了这一新方向。

在意大利，新古典主义开始是通过米兰斯卡拉剧院的设计者朱塞佩·皮耶尔马里尼（1734—1808 年）在建筑方面表现出来的，是通过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 年）在雕刻上取得成功的。他以令人愉悦的学院风格，倾其全部活动于按希腊体型和比例的复制工作，然而，他的作品毋宁说是属于后一个时代的。

早在十七世纪，尤其是十八世纪，音乐艺术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因素。情节剧的起源应归功于佛罗伦萨派（见第 96 节）。同时期还产生了清唱剧（埃米利奥·德卡瓦列里，重要作品为《灵与肉》，1600 年）。蒙泰韦尔迪和卡瓦利之后，情节剧通过那不勒斯派的创始人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59—1725 年），杜兰特和波尔波拉的努力，有了自己的特殊形式。那不勒斯派完全使用旋律（咏叹调）取代宣叙调的优势，但咏叹调不仅使诗人，甚至使音乐家本人受到极大压抑，却成全歌唱家大显神通。十八世纪与严肃剧比肩而立的是滑稽剧，达到顶峰的有詹巴蒂斯塔·佩尔戈莱西（1710—1737 年），其著作有《女佣做主妇》、《圣母悼歌》；焦万尼·帕伊西埃洛（1741—1816 年），其著作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多梅尼科·

奇马罗萨（1749—1801 年），其著作有《秘婚记》。佛罗伦萨人詹巴蒂斯塔·吕里（1632—1687 年）在巴黎创立了法国歌剧，剧中合唱和舞蹈占有重要地位，旋律更朴素，更加附和歌词。按这一方向做出决定性改革的却是德国人克里斯托夫·格鲁克（1714—1787 年），其著作有《奥菲欧》、《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他把下列原则作为情节剧的根本：音乐应表达诗歌的内容，因此音乐应从属于诗歌。

现在，德国在同意大利争夺音乐领先的地位，并已统治着圣乐和交响乐。在圣乐方面，十六世纪时意大利就产生了伟大的音乐家皮耶尔·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1525—1594 年），随后还有其他杰出大师（例如，十八世纪的贝内代托·马尔切洛），尽管圣乐被舞台音乐挤到次要的位置。在德国，圣乐发展的起点是在改革的推动下蓬勃开展的合唱歌曲。在合唱音乐方面（清唱剧、歌曲、弥撒），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 年）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雄踞乐坛。与他同时的，还有乔治·弗里德里希·汉德尔（1685—1759 年），他的清唱剧展示了戏剧的魅力。然而，在德国达到顶峰的音乐形式是器乐。器乐也诞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器乐曲、协奏曲、四重奏、交响乐等形式。这时，约瑟夫·海顿（1732—1809 年）给予交响乐以古典形式；步其后尘的，是早熟的多方面的天才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1756—1791 年），他不仅在交响乐，而且在歌剧和喜歌剧（《唐·乔瓦尼》、《魔笛》）方面也独树一帜，把德国的表现形式亲切糅进意大利曲调的优雅之中。

102　欧洲的改革运动　改革时期的意大利

在十八世纪这一时期内，在上层阶级有相当影响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政治-社会体制和欧洲各国现行的体制之间已出现了深刻的对立。在这些国家里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只有阶级和个人特权；也没有个人思想和信仰自由的保障。税收全落在不富有的人的头上，而贵族、上层阶级和有特权的教士免除税务，他们也不像先前那样履行社会责任。除国家的沉重赋税外，绅士老爷们还向市民勒索苛税，因封建权力仍

然有效力，尽管在整个欧洲各国程度不尽相同。改革思想就是在这种理论和实际、理想和现实间的对立中应运而生的。

正如人们早就看出的，这些思想的起源地就是法国，从而传遍整个欧洲。哲学家们倾向于国家权力，服务于不可战胜的理论，因此他们求助于君主们，希望他们能实现盼望已久的改革，尽管他们中已广为传播英国式的立宪体制。由于所有君主打算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来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力，建立一个强而集权的政府，因而在改革的启蒙哲学派和君主专制派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开明君主的王国，哲学家做部长的政府。当时存在着某种倾向，认为法令是全能的，一种立法规定就能一下子改变社会。杰出的改革派君主，约瑟夫二世皇帝就说过："我把哲学作为我的帝国的立法机构；逻辑地应用哲学将改变奥地利。"

无论是巩固王室专权，还是实施改革思想（尤其是人民平等，宗教宽容、思想自由），第一个障碍是教会，它利用其地位和传统原则来加以阻碍。国家用战争来反对教会，限制其司法权和特权，减少其收益，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附属于自己（国家干预教会论）。这是哲学家们攻击教会的理论，君主们打击教会的机构。

教会无能力做出有效的抵抗，因为它被内部纷争弄得衰弱不堪。教会被詹森主义搅得天翻地覆。詹森主义是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比利时主教詹森的一本书引起的神学争论而产生的一种宗教运动。自称为圣奥古斯丁分子的詹森派赞扬万能的天主恩惠，反对独断专行，主张极严格的道德，反对耶稣会。他们被罗马教会判处，并受法国的迫害，因而他们具有政治-宗教的反对派性质。他们的思想在十八世纪中传布到意大利，加强了各政府中的反对教会的斗争。

教廷的集权和最高地位在"高卢主义"问题上受到了最直接的打击，"高卢主义"问题就是法国教会的某些原则和特殊体制的问题。1682 年法国教士会议宣布"高卢主义四条"，庄严地重申了这些原则和体制，并在君主政体完全支持下成为法国教会占统治地位的信条。高卢主义思想在德国传布甚广，同德国民族对罗马教廷政权的旧怨一

拍即合。特里尔的助理主教冯·霍恩泰因，用化名弗布朗尼乌斯发表了著名的作品《论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权力》（1763 年），书中不仅宣称大公会议和万国教会高于教皇，而且也否认教皇对各主教有裁决权。教士选帝侯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草拟出德国教会自主于罗马的（《埃姆斯阿条约》1786 年）改革计划。教廷最后在形式上取得了反对这些反叛的满意结果，然而这些思想和倾向实际上并未被扑灭。

这些潮流当然有利于各国反教会斗争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取消作为罗马教廷哨兵的耶稣会。

耶稣会士所获得的权力必然引起他人的反击，且能轻易获胜，因耶稣会士早已淹没在世俗事务之中，从而失去当初的热忱。对他们的第一个打击是来自葡萄牙首相约瑟夫一世蓬巴尔侯爵，他指责耶稣会士在巴拉圭谋叛，唆使人谋刺国王，因而籍没了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驱逐出王国（1759 年）。法国立即仿效之。耶稣会士在马尔蒂尼克岛建立的一个大商业企业的破产引起了一系列起诉，致使法国法官审查了其会章和工作，其中一些法官要求颁布法令取缔耶稣会（1762 年）；1764 年，路易十五颁布了一敕令，旨谕该社团不能再存在于法国，其成员可以作为特殊情况留居于王国。1766 年 4 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突然指令逮捕他们，把他们遣送到教皇国的沿海岸一带；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和帕尔马的波旁公爵斐迪南紧接着把他们轰出国土。教皇克力门十三世提出抗议，同教会属地帕尔马公爵发生冲突。其他波旁人，因家族关系，一起站在公爵一边，法国国王占据了阿维尼翁和维那西诺郊区；那不勒斯国王攻占了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克力门十三世去世，接替他的克力门十四世经过同波旁宫廷的艰苦谈判后，以简单的通谕解散了耶稣会（1773 年 7 月 21 日），重新获得了被占领土。

如果说君主们通过他们的改革行动加强了绝对权力，那么也不能否认——尽管公民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极为有限——他们是在努力改善行政，使之趋于一致；改善司法，使之更迅速、更人道；改善经济情况，支持工商业；废除某些赋税，取消某些对劳动自由的束缚；

促进和传播文化。但是，归根到底，他们没有解决启蒙哲学派明确提出的根本问题，或者说也没有解决启蒙哲学派提出的必要前提：公民平等、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恢复立宪政体、公民参加政府。

在意大利，一些古老的国家和王朝，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萨沃依王室和埃斯特家族，对新思想漠然处之，或取敌视态度，反对革新。处于极度没落的威尼斯共和国，以怀疑和警惕的心态维护其愈益僵化愈益失去生命力的寡头政体。安杰洛·奎里尼（1761 年）、乔治·皮萨尼和卡洛·孔塔里尼（1779—1780 年）的政体改革企图归于失败，他们被监禁于古堡中。在《帕萨罗维茨条约》后（见第 98 节），这个老共和国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闭关自守；不仅陆军，海军也日渐衰弱；英勇的安杰洛·埃莫对突尼斯贝伊的远征（1784—1786 年），因采用不相适应的手段，最终按政府的意愿而中途停止，使威尼斯和野蛮首领的关系无任何变化。十八世纪的唯一伟大事业是穆拉齐的建设。这个光荣的城市变成其乐融融的娱乐场所，那里人们沉湎于狂欢纵饮，狂欢节长达半年之久，被允许长期使用假面具，赌博成风，且纵容不禁，节日既频繁又声势浩大辉煌，笼罩着妩媚妖艳和伤风败俗。商业和工业凋零，经济日渐恶化。虽说税收不那么沉重，但教士为数甚众，家富万贯的神职人员多达近四万五千，年收益多达四百多万杜卡托①。为限制他们权力的改革不见成效。由于财政压力的增加，管理不善和滥用职权，并保持着封建苛捐杂税的混乱的多种多样的体制以及地方结党营私，凌辱欺压，陆上各省在统治集团中越来越没有政治权利，其不满情绪日甚一日。

热那亚的处境也不妙，其贵族政体虽未曾触动，但被科西嘉岛的骚乱弄得焦头烂额。1735 年，岛上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反叛，一位冒险的德国人特奥多尔·冯·诺伊霍夫被岛民拥立为王（1736 年）。可他不能在岛上长期待下去，然而该岛继续反叛热那亚。当时热那亚要求法国进行军事干预（1737 年），几年后，起义终于被镇压。在奥地利

① 意大利当时的货币。——译者

王位继承战争中，查理·伊曼纽尔三世曾远征该岛，他试图与撒丁岛联合，但未成功。现在法国人又成了热那亚的援军，但当他们撤离该岛时（1750 年），爆发了新的起义，帕斯夸莱·保利为起事首领，并被拥为终身领袖（1755 年）。他得到英国的援助，组织和领导着岛上的政府，但未能将热那亚人逐出占据的某些要塞。热那亚人求助于法国人，最后他们保持名义上的主权，实际上通过 1768 年 5 月 15 日的《凡尔赛条约》，将该岛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人。保利又坚持了一年，但最终被击败，不得不流亡他乡，避难英国，于是科西嘉沦为法国的一个省份。

萨沃依的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被迫把西西里换成撒丁岛，并同要求享有该岛主权的教皇发生冲突，最后教皇承认阿梅代奥二世为该岛国王。他很少过问这个本已陷入窘境的岛屿，全力以赴关心大陆上的领地。削减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将王国的各种法律合并成一种法律，公之于众（1729 年），这样用一种立法统一国家的各个部分；促进工业和农业；支持研究和学习，给都灵大学相称的校址，创立省公学（即今天的卡洛·阿尔贝托公学）；美化都城，巩固都城在当时城市建设上的领先地位；加强边界，加高费内斯特雷莱要塞；整顿军纪，使之时刻处于临战状态。1730 年，他传位于其子查理·伊曼纽尔三世，自己则携新婚燕尔的斯皮尼奥伯爵夫人隐退尚贝里城。次年，来到蒙卡利埃里，大约受其夫人的挑唆，想重新执掌权柄。其子受顾问和妻子所逼将他逮捕，发配到里窝利软禁起来。后获准回到蒙卡利埃里，1732 年去世。

查理·伊曼纽尔三世为撒丁岛做了一些事情：设法改善其经济状况，使居民人数从三十万增加到四十五万，创建卡利亚里大学（1764 年）和萨萨里大学（1769 年）。在大陆各国做了些行政性的改革工作；由查理·伊曼纽尔三世和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同教廷签订的条约相当有利于教会，也即是说，它与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的教会政策相去甚远。为了笼络教廷，查理·伊曼纽尔三世设下圈套囚禁詹农（见第 101 节），把他一直囚禁到死。查理·伊曼纽尔三世之子，维克托·阿

梅代奥三世（1773—1796年）不仅不实行新的改革，甚至由其前辈开始的那些改革也半途而止；他一心只抓军队，以普鲁士式整顿和武装军队（同普鲁士他开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因此，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很少关心教育，很少重视文化和人才；像巴雷蒂（见第101节）那样的作家和科学家，史学家德尼纳和拉格朗日（见第100节），化学家贝托莱，杰出的印刷家博多尼，只有流落他乡寻求对其工作的重视。

在莫德纳和雷焦公国，事情就更糟。因为埃斯特的弗朗切斯科三世公爵被任命为米兰总督，将其寓所迁往米兰，很少关心本国事务。政府的唯一伟业是颁布了立宪法典（1771年）。其继任者埃尔科莱·里纳尔多三世（1780—1796年）娶马萨和卡拉拉帝国封地继承人玛丽亚·泰雷萨·奇博为妻。他性情温敦，却吝啬，能量有限，在同罗马的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独生女和继承人贝娅特丽克丝嫁给哈布斯堡-洛林的斐迪南大公（1771年）。

在教皇国，博学而开明的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兰贝蒂尼，1740—1758年在位）也没有给其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在克力门十三世（雷佐尼科，1758—1769年在位）和克力门十四世（甘加内利，1769—1774年在位）的时代进行了一场前面业已提及的反对耶稣会的斗争。克力门十三世捍卫耶稣会，而克力门十四世迫于波旁王室的压力，取消了耶稣会，除了各省中央权力有所加强外，没有实行任何改革：行政管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糟，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神职人员，没有商业，没有工业，农田荒废，灾难重重。庇护六世（布拉斯基，1775—1799年在位）采取了某些有益的措施，然而他在捍卫在各天主教国受到威胁的教会地位的斗争中，尤其在反对皇帝约瑟夫二世进行的教会改革的斗争中，也被弄得顾此失彼，晕头转向。他试图改良蓬蒂内沼泽地，扩建梵蒂冈博物馆（庇护-克力门博物馆）。由于这些工程和裙带之风，给本已枯竭的国家财政带来新的重负。

在奥地利、洛林和波旁各君主的属国里，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良好的改革。伦巴第，尤其在玛丽亚·拉雷萨执政后，参与了在考尼茨领

导下的奥地利君主政体的改革事业。改组行政、进行人口普查、公平分配赋税、改善司法程序、鼓励农业和工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极大地缩减或废除了封建权力；取消宗教裁判所，取缔教会审查权和放逐权；建立慈善机构、开办学校、建造剧院和图书馆；特别关心的是帕维亚大学。约瑟夫二世在母亲去世后（1780年）执行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封闭许多修道院，允许商业自由，取消职业行会。

在最后几个美第奇统治下已衰败不堪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玛丽亚·特雷萨的丈夫，洛林的弗朗切斯科开始了改革；更确切地说是批准受新思想影响的托斯卡纳政府人士制订的计划。他的幼子彼得罗·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利奥波德二世1765—1790年），比他走得更远。利奥波德二世得益于贤臣蓬佩奥·内里、朱利奥·鲁切拉伊、弗朗切斯科·詹尼。他千方百计灭绝在托斯卡纳尚存的各种中世纪残迹。他改组行政管理，建立地方司法机关，改革税收体制，使全体市民在赋税面前一律平等；公布国家支出，在不增加新税的情况下，改善国库储备，以应付开垦基亚纳谷地和由他开始的马雷马谷地的巨额费用。随着取消经济和司法（委托遗赠）的束缚，分解大庄园，增加小所有者，取消封建奴役，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农业得到了引人瞩目的发展。由于取消行会，自由贸易原则也应用于工业；但并不能补救其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落。利奥波德二世在司法管理上的改革是异常大胆的，在欧洲各君主中，他第一个取消死刑、酷刑和籍没罪犯财产，使所有的案件简便公正。他发展文化，改革比萨和锡耶纳大学，开办学校、建立科学院、设博物馆。在宗教方面，不仅取消了宗教裁判所，驱逐了耶稣会士，关闭了一些修道院，而且还想按照皮斯托亚主教希皮奥内·德里奇的詹森主义思想，改革教会纪律和礼拜仪式。1786年在皮斯托亚召开教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教会改革，确定了关于恩惠（按照詹森主义的意思），关于普世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的权力，关于圣教等级来自信徒，关于教会无强制权等原则，这一切均与罗马天主教理论相悖。于是引起了同教皇的冲突，爆发了受到侮辱的虔诚民众骚乱，某些改革因故未付之实行。他还领导制定一

个真正的宪法草案，美国的《人权宣言》对其也有影响。但后来由于各种不利环境，首先是维也纳的反对，而被束之高阁。1790年，利奥波德，意大利改革派君主中首屈一指者，登上了帝国的宝座，其幼子斐迪南三世（1790—1801年在位）继任托斯卡纳大公，其政府因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而一蹶不振。

在帕尔马和那不勒斯执政的波旁另两个支系也坚决走上改革之路。在帕尔马公国，波旁的唐·菲利普（1748—1765年）得力于贤明大臣法国人纪尧姆·迪蒂诺的治理，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给国家的境况带来了繁荣和兴旺，使帕尔马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意大利的雅典；在宗教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限制了教士的特权和权力，最终导致了一场同教会的严重冲突。迪蒂诺在斐迪南公爵（1765—1802年）年幼时继续他的事业；但后来斐迪南娶玛丽亚·特雷萨之女玛丽亚·阿玛利娅为妻，他不得不半途隐退（1771年），因为她仇视任何新生事物。年轻的君主生性无能，虔诚而又腐败，在一个时期内将国事拱手交给妻子处理，取消了许多已实现的改革，并于1786年又恢复了宗教裁判所。

那不勒斯王国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国事相当可悲，而奥地利在那儿的统治为时太短，不可能产生有益的成效，但在波旁查理（1734—1759年在位）的治理下，开始振兴起来。波旁查理得助于能干的大臣托斯卡纳人贝尔纳多·塔努奇的工作，他力图整顿政府，统一立法，废除贵族和教士的许多特权。他特别关注那不勒斯城，建立圣卡洛剧院和卡波·迪蒙泰大厦；开始挖掘庞培城和埃尔科拉诺；开始修建卡塞塔王宫。这儿最大的改革也是教会方面的，但由于贵族，改革进程却相当慢。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唐·查理登上西班牙王位后，将政府留给年幼的幼子斐迪南四世（1759—1825年）时进行的，其时，政府托付给一个摄政委员会，塔努奇为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塔努奇虽为狂热信徒，但思想进步（与查理三世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当时取消了什一税，停办了许多修道院，废除了教会的民事和刑事法庭，奏请国王授予委任主教权，控制土生教士同教廷的关系，拒绝向

教皇赠马[①]，驱逐耶稣会士，自始至终参加四个波旁家族的君主对教会的斗争。可是，当国王长大成人后，完全受控于妻子玛丽亚·卡罗琳，她是玛丽亚·特雷萨的另一个女儿。她长得如花似玉，专权，野心勃勃，她想使王国摆脱西班牙的影响，置于奥地利的控制之下，塔努奇只好隐退（1776 年）。政府的治理操纵在王后之手。稍后，她提拔一名心腹，出身于爱尔兰的海军大将阿克顿执政，她对陆军和海军极为关注，却没有取得显著结果。世俗和教会的改革无人过问。然而通过一些杰出作家，如安东尼奥·杰诺韦西，加埃塔诺·菲兰杰里和法学家、哲学家马里奥·帕加诺，新思想在那不勒斯已广为传播。西西里总督卡拉乔洛·多梅尼科（1781—1786 年在位）渴望在西西里进行政治-社会变革，但他的尝试受到岛上贵族群起反对，中央政府也不加以支持，结果成效甚微。

① 一种古仪式，表示那不勒斯王国臣服教皇。——译者

第十七章　从革命到复辟

103　反动分子和雅各宾分子　在意大利的法国人和意大利各共和国

大约 1790 年，意大利青年（即进行过这些活动的人）的改革和进步活动完全被遏制住了，而反动派崭露头角。这归因于各王朝的君主和大臣的更替，也归因于在民众中（正如我们在托斯卡纳看到的）遇到的抵抗，还归因于欧洲新的局势出现。法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1789 年全国三级会议转变为立宪代表大会，攻占巴士底狱，废除封建制度；1791 年国王路易十六逃跑和停职；1792 年废黜国王，九月大屠杀，宣布共和；1793 年处死路易十六和开始恐怖时代——吓坏了各国政府，使它们下决心采取依靠反法联盟新的反动方针。

然而，进步和改革的思想在意大利仍有其信仰者，因此法国革命在少数人的心灵里仍有相当的影响；而特权阶层和平民阶层憎恨革命，视其为渎神的和破坏性的东西。在意大利到处都出现了“雅各宾分子”小组。在托斯卡纳，1790 年，菲利普·布奥纳罗蒂图谋搞了一次暴动，事败被逮捕，受驱逐，但他继续在法国进行革命活动。在那不勒斯，1792 年 12 月法国舰队抵达后，建立了一个爱国社团，出现了“雅各宾谋反”。继而是大型的政治审判，结果三人遭正法。其中普利

亚人埃马努埃莱·德德奥，于1794年10月17日被吊死。同年5月，一些都灵爱国者俱乐部暴露。弗朗切斯科·瑞诺和焦万尼·夏泰尔被吊死。在比耶拉，弗朗切斯科·德斯特凡尼斯也为争取共和密谋反叛，于1794年5月24日被绞死。1794年11月，赞博尼在波洛尼亚谋乱，这次谋乱似乎更具有地方性质。起事人路易吉·赞博尼被杀；皮埃蒙特人詹巴蒂斯塔·德罗兰迪斯于1796年4月23日在波洛尼亚被绞死。1795年3月，在巴勒莫一次谋叛败露，其首领可能是卡塔尼亚人弗朗切斯科·保罗·迪布拉西法官，他是贵族，于1795年5月20日被砍头；其余三个平民被绞死。

意大利各政府在完全依恋旧制度和仇恨新法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积极实施反法政策方面，步调却不一致。1791年，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路易十六的两个兄弟，普罗旺斯和阿图瓦伯爵，已侨居国外，也即后来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向意大利其他政府提议建立一个有共同国会的永久性的邦联，这一努力完全徒劳；托斯卡纳提出中立联盟的计划，也告失败。在皮埃蒙特，以前就渴望发生欧洲危机来解除法-奥联盟对萨沃依扩张政策所造成的瘫痪。可是，1792年4月还是君主体制的法国政府提议在萨沃依和米兰相换的基础上结成反奥联盟，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恰恰拒绝这一发扬意大利萨沃依政策的良机，并出于仇视和害怕这一革命，于9月同奥地利结成联盟。于是法国军队很快占领了萨沃依和尼斯地区，而没有遇到萨沃依军队的认真抵抗。10月，由占领者召开了“阿洛布罗克斯人”民族代表大会，宣布萨沃依并入法国，并于11月27日经法国国民公会批准。1793年1月31日，尼斯并入法国。这两个地区的并入符合法国国民公会制定的法国“自然边界”（雷诺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理论。然而，两地很快对法国新政府的革命政策表示不满。法国舰队也进攻过撒丁岛，但未获成功。

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也同英国结盟（1793年4月），尽管奥地利人极少援助他，仍于1793年企图夺回失地，但未能如愿以偿。因此，战争拖延得很久，在西阿尔卑斯山一带（法国人在许多点上越过

了山坡）和西利古里亚取得了一些胜利。维克托国王在签订《奥-撒瓦伦谢讷条约》（1794 年 5 月 29 日）——条约规定将诺瓦拉地区交还奥地利以换取在法国的所获，条约直接违背萨沃依国家的政策——后，从奥地利获得了很大的援助。1795 年，为达成萨沃依、尼斯与伦巴第相换的议定书，他同法国进行新的接触中断。

在意大利其他国家中，热那亚和威尼斯保持中立，同法国维持正常的关系。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三世亦想如法炮制；可是 1793 年 10 月，英国舰队的威胁迫使他宣布结盟；然而他并未积极参与斗争。1795 年 2 月，他是同盟者中第一个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的。由于立宪会议的教会法律（籍没教会财产法和教士的《国民法典》）和教皇反革命的言论，教皇国和法国早在共和国前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在罗马平民杀害法国外交官巴斯维尔（1793 年 1 月）后，同共和国的冲突更趋恶化，然而庇护六世没有参加反法联盟。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斐迪南和玛丽亚·卡罗琳极其憎恨革命（卡罗琳是路易十六之妻玛丽亚·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并因儿女们的婚姻同哈布斯堡联结在一起。起初，由于害怕 1792 年年底在那不勒斯海域出现的法国分舰队而迟迟不表态；到 1793 年 7 月才同英国结盟，那不勒斯终于参与了反法行动。

在科西嘉拥护和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斗争正酣时，科西嘉正式并入法国是革命政府所为，尽管热那亚提出抗议。帕斯夸莱·保利同立宪的法国和解后，回到了岛上，可是立刻又同雅各宾分子发生了冲突，于是形成了两个派系和两个政府。法国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出身于科西嘉岛（1769 年 8 月 15 日诞生于阿雅克肖）——支持雅各宾派和反保利派的政府，他也参加过反对撒丁岛的失败尝试。当时保利在科西嘉国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英国乔治三世为科西嘉国王。但是，1795 年 10 月，保利放弃该岛回到了英国（1807 年死于英国）；1796 年 10 月，科西嘉再度被法国军队攻占。

那个年轻的科西嘉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几经军事生涯和政治命运的变迁后，终于在 1796 年 3 月登上由他招募的意大利方面军指挥官

的宝座。在这几天以前，他和巴拉斯的情妇博河尔内的孀妇约瑟芬·塔谢·德拉帕热里结了婚（就是由巴拉斯促成的）。按照法国督政府的新计划，波拿巴在意大利作战，而莫罗和儒尔当指挥的另外两方面军必须在雷诺河和多瑙河一带攻击奥地利人。三方面军的矛头共同指向维也纳。波拿巴在越过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段后，在蒙泰诺泰、德戈和米勒西莫（分别是1796年4月12日、13日和14日）击败博利厄指挥的奥军，并把他们同科利将军的皮埃蒙特人分隔开，转而攻击科利。科利在切瓦、圣米凯莱和比科卡·迪圣贾科莫（4月16日、19日）成功地顶住了敌人的攻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蒙多维撤退，并被击败（4月20日—21日）。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于是决定签署《凯拉斯科停战协定》（4月28日），随后签订《巴黎和约》（5月15日），根据和约，他让出尼斯和萨沃依，并被迫放任法国军队自由通行。国王无意同法国结盟。此时，波拿巴在皮亚琴察渡过波河，威胁博利厄的后方，迫使他向阿达河退却，并在洛迪桥（5月10日）将他击败，进入米兰，而博利厄闭守曼图瓦。波拿巴围困曼图瓦，占领佩斯基耶拉和威尼斯，践踏威尼托的中立；奥地利军队也有过类似的践踏。被占领省份在法国人的抢掠和践踏下民不聊生，激起了居民的起义，其中帕维亚的起义遭严厉镇压（5月25日）。莫德纳和帕尔马公爵被迫以重大代价媾和；马萨、卡拉拉、里窝那和罗马涅的一部分被占；教皇不得不让出被法国人占领的地盘，捐赠钱财和艺术品；那不勒斯国王要求并获准了停战，随之而来的是十月的和约。

同时，奥地利人又在意大利发起进攻，一支由武尔姆塞尔率领的七万大军挥戈而下，去解救曼图瓦。然而波拿巴在其行军途中，攻其不备，在洛纳托和卡斯蒂利奥内（7月30日—8月5日）使其败北，在罗维雷托又击败他的代理长官达维多维茨，攻陷特兰托（9月5日）。然后，于普里莫拉诺和巴萨诺（9月7日、8日）再次打败武尔姆塞尔，他难于招架，躲进曼图瓦，闭城不出。

就在法军军事行动节节胜利的同时，在法占区或其交界地区出现了政治骚动。一个爱国的革新党（“雅各宾派”）在意大利上层人士中

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波拿巴建立的临时行政委员会管理下的米兰，成了这一运动的中心。爱国者从意大利四面八方会聚于此，其中有许多知识界的杰出人士，如诗人蒙蒂和福斯科洛，未来的史学家博塔。还出现了一些期刊，宣传自由平等的新思想，讨论有关新意大利政体的问题。伦巴第行政委员会在1796年9月举行了一次就“哪一种自由政府能更好地赐予意大利以幸福”为题的竞赛；在回答这一问题的五十二名作家中，皮亚琴察人梅尔基奥雷·焦亚独占鳌头，他认为是统一的自由民主共和国。统一思想传播极广，甚至米兰的街头巷尾的歌谣小曲中也在唱着。8月，雷焦·艾米利亚胜利地反叛公爵，波拿巴支持骚乱，于10月6日占领莫德纳。10月，由他在莫德纳召集的有莫德纳、雷焦、波洛尼亚和费拉拉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决定建立“波河南共和国”，组成两个志愿兵团：“伦巴第”兵团和“波河南”兵团；打出白-红-绿三色旗帜，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旗子。12月30日在雷焦的代表大会上终于成立了波河南共和国；1797年1月7日，三色旗正式作为意大利国旗。这一运动得到波拿巴本人的支持。

然而，奥地利并未放弃这一场竞争。11月，一支由阿尔温恰指挥的新军直下意大利，迫使法国人撤退到维罗纳。但经阿尔科莱三天的酷战（11月15日、16日、17日），波拿巴逼迫阿尔温恰向维琴察退却。冬季，奥地利将军企图再作苦斗；可是在里窝利一仗彻底败北（1797年1月14日—16日）。2月2日曼图瓦投降。

教皇先是中断停战，后在波拿巴的一次胜利快速进军的逼迫下，签订了《托伦蒂诺条约》（2月19日），依约，教皇放弃阿维尼翁、瓦纳西诺伯爵领地、费拉拉以及波洛尼亚和拉文纳的教皇特使职位；于是，波拿巴决定向维也纳进军。因此，他转而攻击来接任意大利军队指挥权的查理大公，相继突破皮亚维河、塔里亚门托河和伊松佐河的各条战线，进入德拉瓦河谷，一直突进到克拉根福以外。但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清楚地看到只有开始和平谈判，才能把他的准则强加给巴黎政府。于是签订了《莱奥本和约》草案（4月18日），督政府不情愿地加以批准。根据草案，将直至奥利奥的威尼斯陆地领土以

及威尼斯的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割给奥地利以换取比利时和伦巴第。这样，奥地利加强和扩展了其在意大利的地位。为了牺牲威尼斯国家和颠覆其旧的执政团政府，他利用了复活节星期一在维罗纳爆发的血腥的反法叛乱。这次叛乱是由于法国人的强权和教士的激愤引起的，但没有几天就被镇压下去（“维罗纳复活节”，4 月 17—23 日）。在波拿巴的威胁下，威尼斯最后的一个执政官卢多维科·曼宁同执政团一起放弃政权，大议会投票通过将威尼斯改变为民主共和国（5 月 12 日），威尼斯平民奋起反抗，高呼“圣马可万岁！”但一切均属徒劳。

这样，由于波拿巴个人的政策逆于督政府的政策——按照后者，意大利只能作为抵押品，用来交换雷诺河左岸和普遍和平——法国在意大利的力量和意大利的政治变革越来越扩大。在皮埃蒙特，查理·伊曼纽尔四世（1796 年 10 月继承父位）于 1797 年 4 月 5 日同法国签署了联盟条约（规定撒丁岛与半岛上相应的领土交换）。这并没有防止皮埃蒙特发生革命暴动（6—7 日），然而这些暴动都遭极其残酷的镇压（九十多人被斩首）。与此同时，皮埃蒙特政府按照新方针做了某些改革。热那亚的旧贵族共和国不得不在 1797 年 6 月改变为民主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前米兰公国、阿达河和奥利奥河之间的威尼斯土地和波河南共和国在 1797 年 7 月组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设一个五人执政团和两院制立法机构（大议会提出法律草案，参议院或予以通过或予以驳回）。7 月 9 日的宪法，是波拿巴一手完成的，执政团和立法机构的成员也由他选派的，而不是由市民选出；他支持温和的而不是民主的方针。10 月，由于瓦尔泰利纳革命暴动，该地脱离格劳宾登，加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1797 年 10 月 18 日夜，波拿巴在靠近乌迪内的巴塞里亚诺同奥地利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根据条约，阿尔卑斯山南-奥地利边界从奥利奥河移到加尔达湖和阿迪杰，但奥地利仍拥有威尼斯。威尼斯大陆上的爱国者要求并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动乱和威尼斯爱国者因拯救独立而举行的暴动都徒劳无益。在一番浩劫之后（还搬走了圣马可广场正西的铜制四马两轮车），法国人放弃了威尼斯，1798 年 1

月 18 日，奥地利人进入该城。

1797 年 11 月，波拿巴返回法国（次年离开法国远征埃及），由贝尔蒂埃接替。他离开之后，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酿成了意大利立宪机构和法国军事指挥部之间的冲突。后者借助强大物力，迫使立法机构通过负担沉重的结盟条约（1798 年 3 月），同时占领者的劫掠行为仍在继续。然而引入了一系列有益的改革；可是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使人民的负担特别重的是新的义务兵役制。1798 年 6 月，考虑到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政治关系，法国执政团派出文职特派员替换军人特派员，迫于他们的压力，对宪法做了限制性的修改，并采取了反对最激进的爱国者的措施。

法兰西-山南共和国的势力早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扩张到了罗马。由于当地人民和法国人的冲突，一名法国将军被杀，于是城市被贝尔蒂埃占领，并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2 月 15 日），设立元老院议员、护民官和执政官（“残酷而野蛮的讽刺”，据当时一个爱国者的话说），庇护六世先被流放到托斯卡纳，后送法国。罗马城内强征勒索，偷盗行为空前严重，而附和新秩序的仅是一个比伦巴第要狭窄得多的阶层。

在皮埃蒙特，共和国人马的入侵受到王家军队从各个方面阻击之后（随后又发生了上百次入侵），同利古里亚民主共和国也发生了武装冲突，法国越来越多地介入（1798 年 7 月要求交出都灵城），因此查理·伊曼纽尔四世于 1798 年 12 月被迫退位，要求臣民听命于新政府。之后，离开皮埃蒙特，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撤到撒丁岛（1799 年 2 月），收回退位成令，建立临时政府，引入自由平等改革法律，同时也引入占领者的压迫和掠夺。于是同意请求并入法国。

1799 年 1 月，法国人进入卢卡；2 月，废除寡头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继而在 3 月占领托斯卡纳，其大公呼吁臣民勿加抵抗，自己避难维也纳。

波旁王国与陆地上的萨沃依王国同时垮台，不过，波旁王国是对法国人做了一番抵抗之后才被推翻的。波拿巴远征埃及时，法国舰队

在阿布吉尔被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所摧毁（1798 年 8 月）。波旁宫廷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当土耳其、英国和俄国结成反法同盟时，那不勒斯同奥地利一同加入，并开始军事行动，调拨一支军队向罗马进军。军队占领了罗马，可是随后就被法国将军尚皮奥内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打败，并击溃（1798 年 12 月 5 日），于是将军移兵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逃到西西里。但那不勒斯城反叛四起，人们高呼："教廷万岁，圣真纳罗万岁，雅各宾分子罪该万死"，城里贫民"拉扎里"（这一词追溯到 1647 年的革命）向占据圣艾尔莫城堡的法国人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分子"作殊死的斗争。斗争持续了三天（1799 年 1 月 21—23 日），在宗教得到尊重后，拉扎里宣布投降，尚皮奥内进城，宣布成立"帕特诺珀共和国"。共和国的首脑是一群选举出来的知识分子；马里奥·帕加诺（见第 102 节）为共和国制定了希腊-罗马式宪法，设立执政官、监察官和行政长官；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可是人民对类似的新秩序很少赞成。新秩序的鼓吹者中有一些教士团的杰出人物，他们曾经是拥王派，反罗马派，现在宣杨民主与福音完全吻合。

这些新政权的存在和巩固首先取决于共和国法国和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的命运。意大利的法国军队（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所组织的"意大利兵团"属于这支军队）先后在阿迪杰河畔（3—4 月）、阿达河上的卡萨诺（4 月 2 日）、特雷比亚河滨（6 月 17—19 日）和诺维（8 月 15 日）被奥-俄军队击败；自此以后，只有热那亚尚留在法国人手里。在意大利爆发了强大的反法运动，运动在南方，在托斯卡纳，在皮埃蒙特，迅速蔓延。狂热的平民拿起武器，跑来捍卫"神圣的信仰"。红衣主教鲁福穿过西西里，召集武装的群众——其中有许多匪盗，米凯莱·佩扎恶名昭彰，人称魔鬼大哥——制伏卡拉布里亚和巴西利卡塔，向那不勒斯迫进（该城早被法国人疏散一空），逼迫该城投降，答应保全共和国政府首脑和拥护者的安全（1799 年 6 月）。可是，纳尔逊司令突至，投降条约遭践踏，成千上万的市民遭逮捕，成百人被处死，其中有马里奥·帕加诺、医生和大学教授多梅尼科·齐

里洛、法学家弗朗切斯科·孔福尔蒂、温琴佐·鲁索、勇敢的上校加布里埃蒂莱·曼托内、舰队司令弗朗切斯科·卡拉乔洛（被纳尔逊吊死在他船上的斜桁上）、埃莱奥诺拉·丰塞卡·皮门泰尔（一位聪颖智慧的女人，以记者的身份支持共和国的事业）。在托斯卡纳和皮埃蒙特，神圣信仰分子的人马也因其过火行为而惹人注目，而奥-俄把夺取的伦巴第搞成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奥地利人又切望获取亚历山德里亚。同时，在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中，要求完全独立于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愿望正在加强，其代表是波洛尼亚的秘密社团“光线”；一个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意大利共和国的纲领又重新提出，它有助于来自意大利各方的流亡者会聚在一起。

在德国，法国人的处境也不妙；然而他们在瑞士和荷兰却凯歌高奏。沙皇保罗一世退出联盟，也于他们有利。在军事行动间歇期间，法国发生了雾月18—19日的政变（1799年11月9—10日），成立“执政府”，拿破仑·波拿巴任第一执政。他为政府制定了一条绥靖和保守的方针，旨在争取前保皇派分子和教士的支持。

104　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

拿破仑在初步整顿了法国内部事务后，在绝密状态下装备了一支新部队——其中有一支由反动的流亡分子组成的“意大利兵团”——于1800年5月经圣贝纳迪诺山口直下意大利，6月2日进驻米兰。米拉斯指挥的奥地利人，在热那亚投降（6月5日）后，立即转而迎战不期而至的敌人。在蒙泰贝洛第一次交锋，法国人小胜，然后两支军队又在离亚历山德里亚不远的马伦戈平原上展开较量（6月14日）。奥地利人本已胜利在望，可是德塞将军突至（拿破仑曾让他中途转向诺维，当他听到大炮轰隆时，旋即退回），法国人重新摆开阵势，结果大败米拉斯。德塞阵亡换取了胜利，胜利者占领了皮埃蒙特、利古里亚、伦巴第，米拉斯被迫签订《亚历山德里亚停战协定》，将其部队撤至明秋河和波河左岸。

拿破仑回到法国后，战火重燃。从拿破仑手里接过指挥大权的布

律纳强渡明秋河，占领维罗纳，压迫贝勒加德元帅退到巴基利奥内和布伦塔以外，迫使他签订《特雷维索停战协定》（1801 年 1 月 16 日）。那不勒斯人也在意大利中部被击败，被迫停战。在德国，约翰大公在霍恩林登攻击莫罗，却惨遭失败（1800 年 12 月 3 日）。奥地利求和，于吕内维尔签订和约（1801 年 2 月 9 日）。弗兰茨二世，不仅作为奥地利君主，而且也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署，他承认雷诺河为法德边界，放弃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内的米兰地区，同意将托斯卡纳交给帕尔马的波旁人。按照法西之间缔结的《马德里条约》（3 月 21 日），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普雷西迪国，除已并入法国的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外，建立一王国；娶西班牙公主的帕尔马王子为埃特鲁里亚国王，号卢多维科一世。教皇除管区外保留其所有属国。3 月 26 日法国同那不勒斯国王签订了《佛罗伦萨条约》，根据条约，那不勒斯退出联盟，与法国结盟，法国在奥特朗托、塔兰托和布林迪西派驻守军。

波拿巴同英国也签订了《亚眠和约》（1802 年 3 月 2 日），和约的条件之一是把马耳他归还给耶路撒冷骑士团，那是波拿巴在远征埃及时占领的，后又被英国人所夺走。由于英法之间不久出现龃龉，没按约归还。

战无不胜的绥靖者波拿巴，在缔结《亚眠和约》后，其威望已达到极点，遂着手整顿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800 年 9 月诺瓦拉地区也并入该共和国。1801 年 12 月，在里昂召开了共和国四百五十名社会名流参加的大会（里昂咨询会），会议通过了由拿破仑指使起草的宪法。总统为政府首脑，有权任命副总统和各部部长，提出法律和签订条约；八人组成的国家参政院特别研究对外事务和颁布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措施；二十一名成员组成的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六十五名成员组成的立法机构对法律进行表决；土地所有者、学者和商人组成的三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各有二百名成员）至少每两年在不同的城市召开一次会议以选举上述机构的成员。这种政体形式的目的是使人民尽量少参与政府行政管理。里昂咨询会必须违心选举波拿巴本人为总统，作为补偿，波拿巴选择米兰人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为副总统。

共和国定名为“意大利共和国”，它受到里昂大会震耳欲聋的欢呼。

1月26日的宪法第一条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早在1800年6月返回米兰后，波拿巴就表示有意捍卫“我们的宗教”，依靠教士，并称米兰本堂神甫为“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他代表法国同庇护七世签订了1801年7月15日的协定，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保障宗教活动，发给教士俸禄，主教之任命权交给国家元首，教皇给主教以教律指令。1803年9月16日，意大利共和国也缔结了同样的协定；像法国协定签订后一样，波拿巴单方面地补充了“组织条例”，极大地缩小了教会的权力，扩大了国家权力。梅尔齐于1804年1月26日也如法炮制了“组织法令”。

在法国建立帝国后，接着意大利共和国也同样转变为意大利王国；1805年3月17日，依据国家咨询会法令，拿破仑在巴黎宣布为意大利国王，王冠将由拿破仑让给其私生子或养子，从那时起，这顶王冠将不再同法国王冠合二而一。拿破仑来到米兰，5月26日在米兰大教堂以铁王冠为自己加冕，并宣称：“上帝赐给了我这顶王冠，谁要是碰它一下，谁将倒霉。”随后颁布另条法令（类似的法令被称作“宪章”），仿照法国模式改组王国：设置一位总督、一系列大臣和国家参政院。国家咨询会并入国家参政院；随后（1807—1808年），重又分开，改名为参议院。总督不再是梅尔齐或其他意大利人，而是拿破仑妻子前夫的儿子欧仁·博阿内尔。他唯拿破仑之命是听，拿破仑训示他要认识到全面服从法国的利益（也即服从拿破仑的个人政策）便是王国的利益所在。立法机构擅自于1805年7月对巴黎发来的法律草案中的一则法律提出修正。于是被停止活动，尽管立法机构已准备俯首听命，最后还是被撤销。从法律上而言，存在着出版自由，但事实上已被取消；通信秘密也不复被尊重。拿破仑的理想是建成警察国家。在财政部长诺瓦拉人普里纳领导下的财政管理机关是个榜样组织，可是在纳税者看来，它却是一个苛刻的欺压人的组织，何况部分收入都流入法国。然而一大部分收入用之于意大利军队（极不受欢迎的义务征兵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意大利军队的建立和战火考验是一个

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另一部分收入用之于许许多多浩大的军事和经济工程（辛普朗和蒙塞尼西奥公路，伦巴第平原上的水渠，威尼托诸河上的疏浚等）。这些工程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引用法国法典——即拿破仑民法、刑法和商法——，立法取得统一、规范化和现代化。

在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后不久，由于拿破仑对英、奥、俄新联盟的战争，意大利王国的版图有了极大的扩展。在博阿尔内和马斯纳率领下的意大利王国军队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卡尔迪埃罗（1805 年 10 月 30 日）战胜了奥大公查理。在拿破仑取得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12 月 2 日），奥地利不得不缔结《普雷斯堡和约》（12 月 26 日）。根据和约，奥地利割让在坎帕福尔米奥拥有的威尼托领土，后被拿破仑一世并入意大利王国；特伦蒂诺划给巴伐利亚。次年（1806 年 8 月 6 日）弗兰茨二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只留下奥皇弗兰茨一世称号，那是他于 1804 年 8 月起用的头衔，以对抗拿破仑帝国。

那不勒斯国王在 1805 年违反中立，拿破仑派军队去废黜他，于是国王在英国舰队的保护（1806 年 2 月）下逃到西西里。拿破仑将王国赐予长兄约瑟夫，但因他已登上西班牙王位，故又将王国赐给堂兄若阿香·缪拉（1808 年 6 月）。具有一定土匪性的波旁团队，常常骚扰卡拉布里亚、普利亚、阿布鲁佐，后以极残酷的方式勉强将其制伏。那不勒斯王国按照统一和平等的现代原则进行大力改组：废除封建权利，实行拿破仑法典，发展文化，建设公共工程。

除意大利和那不勒斯两个臣属王国外，半岛其余地方逐渐陷入帝国之手。从 1802 年 9 月起，皮埃蒙特并入法国。费尔迪南多公爵于 1802 年 10 月去世后，帕尔马公国也被法国人所占；按“地缘政治”逻辑，人们期待它统一于意大利王国，可是在 1808 年却被并入帝国。1805 年 6 月，以通常使用的派驻代表机构的办法，把热那亚并入帝国。1805 年，卢卡变为依附于帝国的一个公国，受拿破仑之妹埃莉沙·巴乔基治理；1807 年 12 月，埃特鲁里亚王后孀妇玛丽·路易贾、其子卡

洛·卢多维科的摄政，告退。托斯卡纳（尽管一个代表机构投票赞成搞自主的王国）统一于帝国，在此之前拿破仑曾宣布他希望托斯卡纳并入意大利王国。庇护七世不赞成拿破仑的战争政策，拿破仑和庇护七世之间发生冲突，教皇国和罗马被占（1807—1808 年）；1807 年，马尔凯合并于意大利王国，1809 年 5 月，下令废除世俗权力，同时罗马、拉齐奥、翁布里亚并入帝国。7 月，庇护七世对占领者处以不指名的绝罚，随后即被流放，先是流放到萨沃纳，后被流放到枫丹白露。教皇和拿破仑之间的长期对立（不仅是为了世俗权力，更多的是为了教会的组织，皇帝想减少教皇的权力，而通过恢复法国天主教会的自主运动来加强他自己的权力）在意大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部分教士站在教皇一边，蒙受严厉的惩罚，一部分或受上面的强制或受法国天主教会自主运动和詹森派思想的影响，赞成帝国的愿望。

一次新的战争击败了奥地利（意大利士兵也大量参加），于 1809 年 10 月 14 日签订了《维也纳条约》，意大利王国取得了从特伦蒂诺到博尔扎诺的土地，然而却丧失了伊斯特里亚和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这两地和奥地利让出的其他领土一起，被拿破仑并入“伊利里业行省”（一种帝国的中世纪式的“边境省”），王国领土的划分是极其专横的，其边界的任何一方都向法国敞开大门。拿破仑在王国行政管理上的专断独行越来越严重；在经济方面这种专断也非常明显，他从 1807 年开始搞了个大陆经济封锁，封闭大陆对英国的贸易，这种封锁日甚一日。本世纪初，文化生活有过灿烂的时期；那是两个伟大诗人的时代：维琴佐·蒙蒂（1754—1828 年）和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 年）。他俩和帕里尼所扶持的古典主义达到了顶峰，但不是没有很好地吸取来自当代外国文学、特别是英国和德国文学的精华。除了趋时的颂诗和爱情诗外，蒙蒂依据当时的事件写出的纪事小诗中尤其才华横溢，特别是在《巴塞维尔之死》（主角是乌戈·巴塞维尔之精灵）和在《马斯凯罗尼之死》表现得极其突出；此外，他还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把原作的精神优雅地表达出来。福斯科洛的杰作是诗歌《塚》，诗中饱含高度的情感，爱国之热忱，强烈的历史回

顾在壮丽的无韵体诗句中得到充分表达，那是意大利文学中的精品。新文学参加当代政治-精神生活；他们在帕维亚教授文学课程中，也极力表明这一点。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时期，历史-政治文学在米兰开出绚丽之花；南方政治避难者维琴佐·库奥科于1801年在米兰发表了《那不勒斯革命史论》，书中深刻探讨了帕特诺珀共和国；接着，梅尔基奥雷·焦亚继我们已熟悉的作品后（见第103节）又写出了其他一些政治小册子。随着拿破仑专断的加重，这种写作活动减少了；在意大利王国的最后几年内，文化生活已逐渐枯萎。

105 拿破仑统治的崩溃 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

灾难性的远征俄国，标志着拿破仑在意大利统治道义上的死亡。意大利投入两个王国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无益的人员牺牲；意大利王国的军队在马洛雅罗斯·拉文斯基的退却战役（1812年10月24日）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支拥有二万七千人的军队，生还者不足千人。这还不算在西班牙和在其他遥远战场上牺牲的人，这种重大的牺牲和死亡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无任何利益可言。1813年，结成的欧洲大联盟取得莱比锡战役的胜利（10月），就是利用了这一精神状态。欧仁总督极力保卫德拉瓦河和萨沃依战线，并呼吁缪拉的援助，然而徒劳，被迫先向伊松佐河，然后向阿迪杰河退却。他拒绝了其岳父巴伐利亚国王要其脱离拿破仑的要求，准备抵抗，并于1813年10月呼吁意大利人为独立而战。相反，缪拉向其妹夫提出扩大领土的要求（波河以下的意大利），遭拒绝，转而同奥地利结盟。他占领中意大利；但对欧仁举棋不定，态度含糊，极力避免开战。1814年2月，奥地利将军贝勒加德和努根特分别在阿迪杰河和波河下游对总督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们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在其宣言中宣称，他们是来解放半岛，摆脱外国桎梏和给她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之权的。英国人本廷克勋爵于3月率领一支英国—西西里联军在里窝那登岸，同奥地利人编为一队，他劝说意大利人与英国人合作，以恢复民族独立。在此之前，他已向西西里国王斐迪南提出1812年的宪法（该岛旧

宪法之修正)，设立类似英国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与总督卡斯泰尔诺沃一致同意实施自由改革。受奥地利人所迫，博阿尔内不得不向明秋退却。在罗韦尔贝拉（2月8日)，他大败奥地利人，可是到3月初，推进到艾米利亚的缪拉，尽管在同他举行秘密谈判，决心向他进攻。4月1日谈判中断，战火又燃，那不勒斯人已越过塔罗，而奥地利人又向明秋压了过来。

拿破仑逊位的消息传到意大利，欧仁总督于4月16日在曼图瓦附近的斯基亚里诺-里齐诺同所有的敌人缔结停战协定。他企图将意大利王国据为己有，可是支持他的一派只在军队中有强大的势力，在米兰与反法派相比却处于完全的少数，而反法分子一部分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另些人倾向于奥地利。4月20日，米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动乱，反对欧仁的候选人资格，捉拿了世人憎恶的大臣普里纳，将他折磨致死。在曼图瓦的总督得知这一情形后，于23日同奥地利缔结了新的条约，把整个王国割给他们，并于27日动身前往巴伐利亚的慕尼黑。4月26日至28日之间，米兰为奥地利人占领。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重返皮埃蒙特（他于1802年继承退位的兄长查理·伊曼纽尔四世)，5月20日，他隆重进入都灵。庇护七世也于5月24日重返罗马（拿破仑已在3月份给了他自由)。

拿破仑的总督中只剩下缪拉仍占据着那不勒斯；但是斐迪南四世不放弃收回那不勒斯。1814年11月召开改组欧洲的维也纳会议，会上讨论了缪拉的命运。英国，还有法国想尽办法反对他，支持恢复波旁统治。缪拉获悉这一阴谋后，乘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即去投奔他，并向奥开战。从马尔凯进入罗马涅后，于1815年3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里米尼号召书，号召意大利人紧紧团结在他身边，结成坚固的联盟，争取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在帕纳罗打败奥地利人（4月4日）后，面对强敌，他被迫后撤，在托伦蒂诺（5月3日）大败，被赶至王国边境。他在佩斯卡拉颁布一部开放性的宪法，但已无济于事。5月20日，其手下的将领同奥地利和英国的代表制定了《卡萨·兰扎（卡普亚）协定》，确定在那不勒斯恢复波旁统治。缪拉出走，斐迪南

四世于6月3日返回那不勒斯。避难于科西嘉岛的缪拉，听到人民不满波旁的消息后，即制订在王国登陆的大胆计划，并在少数几个同伴的陪同下抵达卡拉普里亚的皮佐（1815年10月8日）。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却遭皇家军队逮捕，并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于10月13日枪决。

1815年6月9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惨败的前几天，随后是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签署了汇集一切专门条约的维也纳大会最后文件。根据文件，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建立奥地利治理下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撒丁王国扩大到利古里亚，但失掉了萨沃依的某些地方（夏布莱和福西尼），这些地方在法国的赞同下中立。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企图获取伦巴第的外交活动，劳而无功。莫德纳公国与马萨及卡拉拉一起重归埃斯泰-洛林家族（弗朗切斯科四世）；帕尔马公国，在拿破仑妻子玛丽·路易活着时由她管理，死后应归还波旁（查理·路易），同时，卢卡也让与他。洛林人（斐迪南三世）回到托斯卡纳大公国，并把疆土扩大到普雷西迪和皮翁比诺诸国。红衣主教厄尔科莱·孔萨尔维在维也纳力排众议，讨还了罗马涅、马尔凯、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教会国得以破镜重圆：奥地利只保留驻防费拉拉和科马基奥的权利。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同样也完整无缺地重又落入波旁之手（斐迪南四世）。

维也纳会议是迄今为止为调整欧洲政局所做的最浩大最完整的尝试。它体现了一个文明原则，即各强国一致协议和平地平衡地有比例地协调相互的利益，以求一个稳定的欧洲格局，一切特殊的目的和愿望均须服从于这一最高准则。这一最高目标理论上是确定了，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真诚地指望达到这一最高目标，但它没有形成左右大会决定的唯一力量。每个强国总是企图尽可能地突出自己的利益；战胜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分别捞到了波兰、莱茵和萨克森诸省、伦巴第-威尼托，而法国又回到老边界之内。此外，指导签字国的理想原则并非是合理对待新的倾向。简而言之，这些原则为两个：欧洲平衡和正统性。第一个原则是衡量一下——我们权且这

么说——分给每个强国的土地和人民的比例，求得瓜分均匀：土地和人民好似占有的物质。第二个原则认为王国是上帝赐予君主的不可分割的财产：于是每一个君主都要重新占有他所有的，不能再被夺走。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原则也在会上遭受一系列的践踏。众所周知，盟国均扩大了版图，而法国无所得，也没有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合法性的原则也未曾得到尊重：波兰被一些国家瓜分，一大群德国君主被剥夺了权力，萨克森一分为二，神圣罗马帝国销声匿迹，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诸共和国未予重建。无论如何，实施这些原则意味着回到1789年的欧洲，回到旧制度，而1789年到1815年这段历史如同不存在似的。事实上，这是与会者的最后期望，他们不允许人民和个人有安排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允许有民族性和自由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国王才有权力为其属民的福利操劳，在决定和实行这种福利方面属民无须过问，总督们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有君王才能直接从上帝那儿获得其权力。为了巩固君主们被革命强烈动摇了的神权，君主专制政府认为必须依靠教会，于是务须反对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少谈国家干预教会的理论，或称“约瑟夫主义”，同教廷缔结各种条约或类似的协定，整顿各国的教会。在此种情况下，庇护七世才于1814年8月重建耶稣会，而没有遭到各国政府的抗议。重建的耶稣会大力开展争取王权和教权，反对自由思想的斗争。

可是，历史是不会消灭的，任何人也无法让近三十年的思想和事件完全消失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旧体制，尤其是封建的、更普遍的、旧的阶级不平等的以及极严格的教会体制，就是大会的主宰们也认为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允许立宪机构的存在。总的来说，他们部分接受的新秩序并没有超越十八世纪开明的专制主义的界限。然而，有三种思想已渗透到即便不是全体人民的意识中，至少已渗透到造成舆论和领导各事件的阶级的意识中。这三种思想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等）；国家仰仗于集体的支持，集体应设法左右国家的方向；最后，各国有在自由独立的生活

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值得指出的是，在反拿破仑的运动中，这三种思想牢牢地融合在一起，激起了对拿破仑的独裁和掠夺政策的强烈反对；这些思想也被反拿破仑同盟所利用，终于战而胜之。

然而，如果认为维也纳大会所组织的，并由各个国家继续的反动行动完完全全依靠实力和专断，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反动行动同各国人民的厌倦，同革命的过火行为，以及同拿破仑的专制和野心在他们中引起的反感结合在一起。正统性、国家绝对权威和君王的神权这一类思想——复辟者正是利用这些思想——确实符合许多人的信念；另外，这些思想被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当局承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又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力量，因为教会在经历了革命的暴风雨的打击之后，又燃起了热忱的宗教信仰，其威望甚至显得比先前更高。革命思想没有完全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只成为少数上层阶级分子的遗产；面临着传统的政治和宗教思思，这些人中的革命思想也出现了停滞不前和解体的危机。这些相互对立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做了长时间的较量，它将毁掉维也纳会议的成果，从中产生出一个现代欧洲，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统一的意大利。

欧洲国家都倾向于维持根据传统的旧专制政治同上面提到的宗教狂热的影响相结合的原则而确立的秩序，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著名的“神圣同盟”条约。其条文是由极靠近神秘主义思想的沙皇亚历山大在巴黎起草，于1815年9月26日签字，1816年公之于众的。

俄、奥、普三君主在条约中宣称，他们深信各国的政治基础应该是“救世主上帝永恒的宗教教诲给我们的崇高的真理”，他们宣告“决心以这一神圣宗教的教诲：正义、博爱、和平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因此，从今以后，“依照《圣经》的话语”，他们“将以真正的不可分割的兄弟情谊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互相支援和同心协力”；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受天命派来管理同一家族的三个分支的”，路易十八和一些较小的君主表示赞成，而英国不随声附和，尽管摄政王从思想上表示了好感。条约本身纯粹是原则言明，毫无实际价值，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却利用这一条约作为其旨

在以一切代价维持各国传统体制、反对一切革命思想的政治工具。除这一条约外，他还利用1815年11月20日由四个反法盟国达成的一个更为具体的协定，以便召开一些会议，确定欧洲福利和和平所必要的措施。这样奠定了干涉政策的基础——梅特涅是这一政策的灵魂——一种旨在保护维也纳大会和复辟这一大厦的政策，这一政策特别在意大利得到贯彻。

106 复辟和自由党人的动乱

也许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意大利那样大力复辟旧秩序。

在皮埃蒙特，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企图单纯地退回到二十年前，就像这期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废除拿破仑法典和几乎所有的法国法律，恢复古老的复杂而又不统一的立法。通过这一立法，恢复封建特权、长子权、委托遗赠、特别法庭、宗教法庭、军事法庭等；恢复古老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鞭打、吊打）；对非天主教的信仰不宽容。此外，军队、法院、官府，一切恢复到革命以前的老样子，甚至按照1798年的宫廷旧年鉴来确定每一个人的职务。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拿破仑手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将官、校官的军衔降了下来，在早已脱离军队的旧人的指挥下。公共教育委托于教士进行或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但并吞热那亚扩大国家疆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热那亚人民痛惜失去独立，内心对皮埃蒙特怀着强烈的仇视。

但是，维克托·伊曼纽尔对奥地利采取断然态度，他使奥地利想据有上诺瓦拉和迟迟不从皮埃蒙特撤军的企图落了空。他也拒绝奥地利关于参与意大利联盟，进而执联盟之牛耳，以及同它签订结盟条约的提议。皮埃蒙特领导人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是在维也纳大会上没有得到满足的吞并伦巴第的愿望，他们甚至提出（1818年向亚历山大皇帝递交一份备忘录）支持建立北意大利王国。普罗斯佩罗·巴尔博（1819年）登台执政标志着内部改善的开始，他领导政府走向进步，进行有益改革，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遭到顽固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帕尔马-皮亚琴察和莫德纳两公国有着不同的制度。在帕尔马-皮

亚琴察，玛丽·路易在奥地利人奈佩尔格的辅佐下——拿破仑死后，他成了她的贵贱相殊的丈夫——治理国家没有采取任何反动的过火行动，保持着大部分法国的法律和机构。帕尔马的法学家们珍贵作品——《民法》于1820年公布。市民获得比意大利其他地方大得多的自由；公共教育、文学和科学得到大力推动。

莫德纳公爵，哈布斯堡-洛林的弗兰茨四世的气质却大相径庭，他并非是一个无领导政府力量和能力的人，他关心臣民的福利，极力为他们减轻税负重荷，为他们提供殷切的正义，在需要的时候，他也非常宽宏大量。但是，他极端仇视自由思想，仇视可能有助于自由思想的一切，其统治的基础是扼杀自由思想，支持教士和贵族这些特权阶级。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表现出领土野心，特别企图获取撒丁岛，因而他想娶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之女为妻。

形势变化不大、政府治理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在斐迪南三世和其大臣科尔西尼和福松布罗尼领导下的托斯卡纳。一部分法国体制得到保留，拿破仑法典被废除，重新取代拿破仑法典的利奥波德法典是一部自由和开明的作品。教会法庭未恢复，只将籍没的部分财产归还给各修会，不允许恢复耶稣会。可是政府缺少能量，拿朱斯蒂的话说，致使人民弄得精疲力竭。对外关系上隶属于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并同它签订了同盟协定；然而，大公善于随机应变，维持了某种程度的自主。1824年6月，斐迪南三世去世，其子利奥波德二世（1824—1859年）继位，方针不变。

托斯卡纳向维也纳大会提出吞并卢卡的要求，未成；卢卡划给了波旁的玛丽·路易贾，它只取得帕尔马。女公爵治国温顺善良，然而不无严厉的几乎是顽固的天主教派性，也不实行1805年的宪法（按照《维也纳条约》，她必须执行之）。她于1824年去世，其子查理·路易继承。其人不算坏，但无主见，倾向于自由主义，1832年入新教，十年后暂绝。

起初，高级教士里瓦罗拉治理教皇国不当，红衣主教孔萨尔维从维也纳大会回来后，诸事渐好。他不仅十分关心臣民昌盛和敏于国事，

而且十分重视建立一个强固的高度集权的政府，感到必须“使教会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这是1816年7月6日的教皇通谕中所用的话。该通谕按照单一体制规定了各省市的行政，改组了司法，取消了大部分封建权利。然而，教皇国制度上的痼疾依然存在：立法繁复、混乱，由罗马法、教会法典、教皇通谕、司法官的法学混杂而成；教会法庭权限极大地扩大（宗教裁判所连那些纯宗教性的错误亦加以惩罚，例如不遵守节日、斋日吃荤等）。因此人民受国家、主教和宗教法庭的三重监视；在俗教徒均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教会财产被归还。红衣主教为更广泛的改革和支持教育的努力归于徒劳。教育大部分为复辟的耶稣会士所垄断。至于对外政策，孔萨尔维拒绝同奥地利结盟，对奥持相当不信任的态度。

波旁的斐迪南四世重登那不勒斯王位后，保证平民自由，遵守出售国家财产，维持原先的军民行政。他按照法国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组织整顿省市行政；颁布两西西里的“斐迪南”法典，取代法国法典，但保留其总的特点，将已籍没的财产归还给移民；长子继承权部分恢复；同教廷签订的条约（1818年）不再提及教廷对那不勒斯的最高统治，但同意教会当局有权监督教育，检查新闻，裁决婚姻诉讼。此外，斐迪南于1816年12月8日发布法令，终止西西里的自主权，将该岛统一于那不勒斯，废除旧宪法和1812年宪法，取消西西里军队和旗帜。在有关两地联合的法令中，斐迪南四世自封为两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同奥地利结盟的条约确定，王国不允许实行不符合旧君主体制、不符合由皇帝为其意大利各行省内部制度制定的原则的任何变革。

在伦巴第和威尼斯，奥地利已开始废除全部拿破仑机构，答应采用一种考虑民族权利的政体。1815年4月7日颁布法令，建立“伦巴第-威尼托王国”，总督为元首，设置两个“中央议会”（一个为伦巴第而设，一个为威尼托而设），以及两个省议会；市政行政交给以行政长官为首的市议会；除总督外，全部机构大都由当地贵族组成。中央议会的任务无非是分摊早已由奥地利政府确定好的税收以及向政府

“乞求”无政治性的普通投票。王国实施奥地利法典，不允许公开审讯，不允许被告辩护，在紧急情况下允许采用即时审讯，采用死刑和苦监。高级职位全由德国人占据。意大利军队被解散，意大利警卫被派到帝国的各行省，而将德国的、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警卫召到意大利（最令人憎恨的是克罗地亚人）。警察及其对新闻的审查有无限的权力。相当沉重的赋税占帝国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奥地利对伦巴第-威尼托实行货真价实的剥削。政府对教士阶级部分保持约瑟夫和拿破仑的传统，保持籍没财产的永久管业权，也不允许建立教会法庭。奥地利行政和司法，当不涉及国家利益时，也有其组织上的、谨慎的、不偏不倚的优点。1814 年，皇帝在巴黎向伦巴第议员宣布政府的基本原则：“伦巴第人必须忘掉自己是意大利人，服从我的意志将是意大利各省联结我的国家的其余部分的纽带。”为实现这一计划，必须使用中央集权，就是奥地利各地方当局权力也有限。总而言之，在伦巴第-威尼托，无论是在自由或是在民族性方面明显地恶化，远不如恢复旧制度。

于是，在意大利两个最大和最重要的地区里建立起了十足的外国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必将继续下去。奥地利抓住这两个地区，实际上统治着整个半岛，其强度使意大利各君主自叹弗如。那些幻想独立的国家也必然要与奥联结在一起，因为奥地利才是它们反对可能发生的内部反叛的支柱，再说其中的三个君王还是来自奥地利家族。这种联结又被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特殊条约所巩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意大利一小部分杰出的人物希望达到民族统一、独立、自由、进步的理想，当时离实现理想还异常遥远。然而，认为半岛上自那时起就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不满情绪，普遍希望进行彻底的变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首先，意大利诸政府中没有一个，包括奥地利政府在内，人们可以按字面意义称之为独裁的政府；如果要以一个特殊的词汇来确定其性质的话，可以说，它们是介乎于家长式和“开明式”之间的专制政府。因此所有的政府对其臣民关心入微，旨在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日常的福利水平，而觉悟不成熟的人民对

此却予以极大的重视。还有人民的厌倦、和平的愿望——动荡的拿破仑时代把这一愿望早已丢到脑后——宗教的保守势力、每一个政府在自己周围织出的利益网，世代以来意大利各部分之间的四分五裂、文化很少传播交流；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便易于理解意大利大部分人民何以满足于这种复辟。

然而，意大利不是“死人的土地”，或者至少可以说那些死亡的人是为这片土地生机勃勃做出贡献的人。意大利存在着一个民族传统、一个文学、一个历史和一个意大利民族。意大利绝不像梅特涅亲王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地理概念”。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回忆，地方自治传统，十八世纪的各种理论和改革，最新的革命熏陶，这些都有助于发展自由思想；民族感情，曾经开创古罗马的意大利人种的骄傲，现时外国的压迫，这一切又使人们渴望独立，切望“复兴”：这是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名词和概念，原本含有文学-文化的意义，可是自阿尔菲耶里以后，才含有伦理-政治的意义。国家统一是最后出现的思想，而且是那么怯生生，那么不果断，可是民族统一为这一思想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意大利王国为它钦定了名字，开始了为之实现的道路，痛苦的经验又必将使这种思想臻于成熟。这些思想，这些感情，只是活跃在少数人的心灵中；除了伦巴第的贵族外，其余的贵族实质上对这些思想和感情无动于衷，几乎所有的教士仇视之，农民阶级对此一无所知。可是资产阶级——一个最活跃最有作为的阶级——对这些东西易于接受，十分敏锐，何况这个阶级深受复辟体制的折磨。事实上，这种复辟造成了贵族、主教或外国人的官僚机构；它竖起了各种关税壁垒，缺乏统一的度量衡，采取疑神疑鬼的防范措施和繁杂的欺压规定，行政和司法体制又机能不全，因而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总而言之，妨碍了在意大利已开始上升的资产阶级应参与其中的一切活动。为数众多的大学（有些已相当发展）在这个阶级中煽起了对现存制度不堪忍受的情绪，培育了对祖国和自由的理想。

人数甚少的意大利爱国者和自由主义者受到阻碍任何运动的各国

当局的严密监视，他们必然按照外国的做法，结成秘密会社，共谋大计。这些组织的起源、组成、纲领仍然摸不清。其共同的起源可能是革命-拿破仑时代在意大利传播极广的共济会。

在这些秘密会社中，主要的是“烧炭党”。烧炭党最后吸收了其他的组织，例如在伦巴第和罗马涅的“归尔甫分子”，他们是意大利独立和各国联盟的创导者，其主席可能是教皇，烧炭党其名，自有其象征意义，炭者，黑也，燃烧时升起明亮的火焰。烧炭党没有分会，类似于共济会，烧炭党有一整套暗号、仪式和誓约。他们信奉基督教和某种神秘主义；他们认为，基督是暴君的第一个牺牲者。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真正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当然，他们希望立宪和意大利独立；他们之中有一些共和分子，可是烧炭党在其行动中从不支持共和思想和统一思想。他们的理论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主义和从让-雅克·卢梭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的奇怪混合物”。烧炭党是在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王国时期在南部意大利形成的，其特点是坚决反对法国政府。所以它受到斐迪南国王的支持；但当看到国王不颁布宪法时，就与之为敌。它从南部意大利发展到教皇国和北方；在皮埃蒙特，同“阿德尔菲分子”合并，结成“同盟会”，其纲领主张在萨沃依王朝统治下建立北意大利王国和意大利邦联；在伦巴第，皮耶罗·马龙切利在米兰成立了烧炭党“分会”，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参见第 111 节）和伯爵波罗加入了该会，伦巴第“同盟会”的头子费代里科·孔法洛涅里伯爵同他们达成协议，其第一个目标是驱赶奥地利人，而同皮埃蒙特联合的思想只不过才露出一点微弱的光亮。

孔法洛涅里、波罗及其团体的其他人，那时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行动，只不过搞些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引进汽船、机械纺线等；促进初级教育；支持浪漫主义运动，反对受奥地利支持的古典主义分子，“他们维护拉丁语，维护权威原理，维护教皇国”；创办期刊《调解者》，设在波罗家中的该报编辑部被政府认为是大逆不道，《调解者》仅维持一年，即被查禁（1819 年）。

与烧炭党和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秘密会社诞生的同时，还出

现了另外一些依靠合法体制的会社，其奋斗目标是支持反动派。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枢机会议派”，该派得到莫德纳公爵的支持。他们热切希望意大利同教皇和教士重修旧好，将奥地利人从意大利驱逐出去（由于他们的“约瑟夫主义”，不受教皇党的赏识）。教皇国的“神圣信仰主义派”具有纯粹的教权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特点。可是人们对这些派别知道得甚少，甚至怀疑其存在。在那不勒斯王国，无疑存在着“神圣信仰主义者”的一个支系，称“加尔德拉里”，他们受到斐迪南国王的大臣卡诺萨大公的支持，国王在奥地利的催迫下不得不解除卡诺萨的职务，解散这个团体。

烧炭党的第一次起事是在1817年6月在教皇国的马切拉塔；然而意义极小。法庭判处许多阴谋者以死刑（后改判为终身流放）和永久或临时流放。

在复辟的头十五年内，意大利民族运动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与欧洲，尤其与法国类似的运动紧紧相连。大家都热烈回忆着拿破仑时代的革命。被神圣同盟废除和流放后，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外国似乎成了自由的象征，他本人仍在圣赫勒拿岛上工作着，撰写回忆录，以便创造一个拿破仑神话，自吹力图创建一个进步的、同时有着良好秩序和有效治理的欧洲。军队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床。欧洲因而出现了共同的舆论和思想情绪，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



第十八章　复兴运动

107　1820—1821年的意大利革命

从1820—1821年的意大利革命中可以看到，意大利运动和欧洲运动是紧密相连的，而这场革命就是西班牙1820年1月革命的反响。西班牙革命始于军队，其纲领是1812年由议会在反拿破仑斗争中颁布的，后很快被复辟的波旁国王斐迪南七世废除的西班牙宪法。该宪法宣布国家主权和政权分离的原则；规定立法统一、法官不得罢免、个人自由、新闻自由；废除酷刑和籍没财产；将行政权交与由七位大臣和国务院辅佐的国王，立法权交给议会（每两年分三级选出）。天主教宣布为国教，禁止任何其他信仰，取缔宗教裁判所，取而代之的是保护信仰法庭。

西班牙革命于1820年3月以国王的屈服而胜利告终。那不勒斯革命的胜利更易，军队打先锋，烧炭党人广泛深入军中。1820年7月2日，两名骑兵军官莫雷利和西尔瓦蒂率轻骑离开诺拉，直奔阿韦利诺，一路高呼“国王、宪法”。短短几天，运动迅速波及泰拉·迪拉沃罗、卡皮塔纳塔、巴西利卡塔、普利亚。缪拉分子前将军古列尔莫·佩佩成为起义的领袖，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军队核心。国王看到军队已完全倒向运动，于7月6日发表公告，宣布接受宪法，成立由缪

拉分子组成的新内阁，并任命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弗朗切斯科为摄政。此人在烧炭党的压力下，于7月7日宣布执行1812年西班牙宪法，国王于13日手按《福音书》宣誓效忠宪法。可是被召到政府中去的缪拉分子（温和的立宪分子）和革命的烧炭党人之间意见相左，时有冲突，新秩序因而大为削弱。

在巴勒莫，起初对那不勒斯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后很快形成了由贵族们鼓动的旨在争取自主和执行1812年西西里宪法的运动；运动波及整个岛，出现了一些骚乱和抢劫。那不勒斯的自由主义分子对此极为愤慨，古列尔莫的兄弟弗洛雷斯塔诺·佩佩带领七千人进驻西西里，他同巴勒莫地方政府就大赦和召开议会确定联合还是自主取得了一致意见（9月22日）。不满的平民举行暴动，佩佩从陆上和海上举兵攻击起义者。10月5日，续签协定，附加条款规定，西西里必须接受那不勒斯国王的治理，接受西班牙宪法。同时，在那不勒斯举行议会（10月1日），议会中，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占大多数。面对议会国王重新宣誓效忠宪法。议会不批准同西西里达成的协定，派遣彼得罗·科莱塔将军去严加镇压。

在特罗保召开的五强会议（1820年10—11月）上，法国、英国不赞成为废除那不勒斯的宪法而进行干预，神圣同盟列强却支持干预方针，它们重申对那些搞非法变革的国家有权干预，因而邀请那不勒斯国王前往参加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新的会议。按照西班牙宪法，国王必须请求议会批准他走出王国；他保证将在会上支持宪法事业后，方获准出国。抵达卢布尔雅那后，国王表现得比神圣同盟更为专制，极其勉强地赞成改良计划。议会收到了国王请求屈从于列强意志的通知，并获悉奥地利的干预已成定局，于是决定抵抗，并宣布逮捕国王。摄政宣称忠于宪法。可是他不知道做认真的准备以抵御奥地利。征召来的四五万人中，半数是各省的民军，他们被分为两队，一支由卡拉斯科萨率领驻守加里利亚诺，另一支由古列尔莫·佩佩率领驻守阿布鲁佐。佩佩越过边境，在里埃蒂附近与从伦巴第-威尼托下来的奥军相遇（3月7日），遭受阻击，被迫率军后撤，民军四散溃逃；卡拉斯科

萨的军队停止不动，军内逃跑严重，以至于奥军于 3 月 23 日未遇抵抗，轻易开进了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革命完结时，皮埃蒙特又爆发了另一场革命。这里，烧炭党在军队中业已扎根；它成了那些因个人或思想原因对复辟不满的人们的聚集点。运动是保皇性的，有利于萨沃依王朝的；它要求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颁布宪法，向奥地利进军，重温萨沃依家族渴望将伦巴第统一于皮埃蒙特的旧梦。运动的首领是国王的副官卡洛·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上校、卡里尼亚诺亲王侍从贾钦托·迪科莱尼奥少校、圣托雷·迪圣罗萨少校、雷吉斯上校。他们同伦巴第的忠实分子，同罗马涅及马尔凯的烧炭党人暗中串通。王室的查理·阿尔贝特亲王（属萨沃依-加里尼亚诺旁系，托马索亲王后裔，鉴于维克托·伊曼纽尔和其兄弟查理·费利切均无子，他遂作为假定的王位继承人）同烧炭党人颇有联系，抱有同情。爆发了西班牙和那不勒斯革命，人心大振，出现了某些运动的迹象，例如都灵大学生和警察之间的冲突（1821 年 1 月 12 日）；可是没有什么分量，以至于奥地利军队能长驱直入那不勒斯地区，没遇到任何抵抗。3 月初，烧炭党人终于决定行动，他们希望同加里尼亚诺亲王达成协议。据圣罗萨后来讲，亲王始而赞成运动，继而自食其言，后又表示赞成。3 月 10 日，亚历山德里亚城高呼西班牙宪法，建立政府委员会。委员会的宣言中谈到西班牙宪法，意大利之独立和联邦，维克托·伊曼纽尔作为意大利未来的国王。竖起意大利三色旗。两天后，都灵也重演上述事件；国王退位，任命加里尼亚诺亲王为摄政，维持到仍在莫德纳的查理·费利切的到来。在起义者的威胁性压力之下，亲王同意西班牙宪法，除了国家代表机构和国王即将对宪法做出的修改外（3 月 13 日）。接着他任命一届新内阁和政府委员会。但他又给许多总督写信，认为只要国王还没表示其愿望时，任何让步均无效。他与奥地利驻都灵公使馆做反革命的接触，在诺瓦拉征召保皇兵团。查理·费利切从莫德纳发出敕令，宣布退位和摄政无效，全体参与宪法运动者均为反叛；同时，命令查理·阿尔贝托到诺瓦拉的德拉图尔将军处听候调动。查理·阿尔贝托

没公布敕令，在一则声明中声称，国王的回答只让人相信他不甚了解局势，因而需要向他说明情况；21 日，任命圣罗萨为国防部长。可是当日半夜，他率领能集拢的军队从都灵逃到诺瓦拉，然后受查理·费利切的命令，又从那儿经由米兰和莫德纳（国王不愿在那儿见他）去佛罗伦萨拜见其岳父托斯卡纳大公。

于是，立宪分子被迫举事。亚历山德里亚政府委员会坚守岗位，圣托雷·迪圣罗萨准备抵抗和沿提契诺河进兵伦巴第；但是孔法洛涅里从米兰阻止了这一行动。俄国调停失败，在布布纳指挥下的奥地利人渡过提契诺河，在诺瓦拉附近立宪分子一击即溃（4 月 8 日）。与此同时，要求立宪而起事的热那亚人亦放弃任何抵抗。

这两种意大利革命就这样失败了。它们之间表明缺乏任何协作，而西西里事实再次表明，民族统一思想仍微弱且不明确。不仅人民没有真正投身于运动之中，连中等阶级也未发动起来；实质上，造反的只是军官和贵族。起事的首领怀抱着过于空幻的，同时又过于宏伟的思想，他们希冀从专制制度一下子转到西班牙宪法，而又不真正了解这种宪法。运动缺乏统一的目标，缺乏组织性、可行性和连贯性。这些是运动初期不可避免的缺陷。意大利不能一下子进行变革和崛起；必须施以更深入的教育，必须具有更广泛的经验，必须各阶级更广泛地参加运动。还必须等待国际局势的改变：只要欧洲仍停留在卢布尔雅那会议时的欧洲，意大利的复兴就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同时，那些动乱表明，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思想开始注入于民众之中，在大多数国民中没有遇到过多的反对；还表明没有奥地利的支持，各君王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些思想的胜利。

108　反动时期　伦巴第-威尼托审讯和施皮尔贝格

在那不勒斯王国，斐迪南国王返回后，宣布了对立宪分子极严厉的判决。莫雷利和西尔瓦蒂被判绞刑，其他许多人被投入监狱，混同为普通的罪犯，受到相当苛刻的待遇。其他秘密结社或搞暴动者均被判刑，其中许多人为死刑；在科森察对秘密社团“欧洲改良分子骑士

团”分子的判决之残酷，实在耸人听闻，其中三人被判以死刑。古列尔莫·佩佩和其他人移居国外，开始长期的流放生活，在复兴期间他们将意大利的声音和抱怨带到了整个欧洲。在军队中、行政机关中、教士中，对自由分子进行了广泛的清洗。对新闻界采取了镇压措施，直至焚毁一本教理问答手册，因书中在列举的诸多义务中有热爱祖国一条。宗教习俗受到监视；教育几乎完全交给世俗教士和修会教士，其中包括耶稣会士；禁止成立种植桑树和煤气照明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开导人民，传播自由思想”。于是，王国的境况江河日下；法庭和行政机关中，受贿和腐化成风；公共债台高筑；奥地利的占领又使国家财政严重亏空，至 1827 年初，耗掉了三亿多里拉。面对这一切，按照卢布尔雅那规定的义务进行的行政改革（主要是建立国家咨询会）就算不了什么了。

1825 年 1 月 4 日，国王斐迪南猝逝，于是结束了以塔努奇改革开始的长达六十五年的统治。儿子弗兰西斯一世（1825—1830 年在位）继承王位，在他的治理下，政府继续沿着同一条道路行进。各秘密社团，特别是在奇伦托的裴拉代尔裴分子仍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弗洛雷斯塔诺·佩佩仍与奇伦托保持联系。1828 年 6 月，博斯科（萨勒诺）市镇的居民在八十岁老翁德卢卡司铎的煽动下举行起义，宣布实施法国宪法。运动扩及到邻近的市镇，很快遭到德尔·卡雷托上校的镇压，他围剿焚烧了博斯科镇：二十六人被判酷刑，其中就有德卢卡。

在皮埃蒙特，判处死刑的人也为数甚众，但都为缺席审判，只有两人（拉内里和加雷利）被执行判决。许多流亡者在外，为西班牙和希腊的革命战斗着，其中就有圣罗萨，“斯人长眠于斯法克特里亚”。参加起义的团队被解散；对学校的大学生也采取了严防措施，宗教活动也被严密监视。这儿的教育也交给教士，首先是耶稣会士，或者置于他们的监护之下。

前面已提及，伦巴第的烧炭党人，尤其是孔法洛涅里，与皮埃蒙特的烧炭党人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的，但没有搞任何具体的积极行动；因此，奥警察一无所知。然而，1820 年 10 月，马龙切利被捕。随之

又逮捕了其他一些人，其中有声名卓著的法学家詹多梅尼科·罗马尼奥西。罗马尼奥西后被释；可是马龙切利和佩利科作为烧炭党人被判死刑（1821 年 12 月 6 日）。皇帝后改判马龙切利服二十年苦监，将佩利科改判十五年苦监；两人都被徙往摩拉维亚的施皮尔贝格。与此同时，警察风闻伦巴第烧炭党与皮埃蒙特的骚乱有共谋。1821 年 12 月 13 日，孔法洛涅里被捕；在他被捕前后又捕捉了帕拉维奇诺·博尔谢里和其他人。提审频繁，诘问狡诈；延续几个小时，甚至半夜三更突然过堂，加之恶劣的待遇和饥饿，使某些罪犯忍受不住，被迫招供。提审最狡诈、最醉心于此道的是特兰托人萨尔沃蒂。1823 年，审讯仍在扩展。指控的内容有建立联邦会社，准备在伦巴第起事以配合皮埃蒙特入侵，策划暗杀布布纳将军（他认为有人想这么干）。最后，1823 年，宣判孔法洛涅里、博尔谢里、帕拉维奇诺和其他十三人以死刑，其中九人缺席审判。除了一些人的死刑改判为在施皮尔贝格服苦监外，孔法洛涅里改判终身坐监，博尔谢里和帕拉维奇诺监禁二十年。其他死刑犯也在 1824 年被改判。孔法洛涅里的亲戚和妻子泰雷萨跑到维也纳皇帝跟前为他求情，费了很大劲才获准减刑。在米兰，这些宣判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全城笼罩在一片凄哀之中。

在威尼托对烧炭党人和归尔甫派也大肆逮捕和开庭审判（弗拉塔审判），1821 年 12 月做出终裁；十三个被判死刑的人也被减刑，押到施皮尔贝格和卢布尔雅那坐苦牢。

于是，伦巴第和威尼托的犯人充斥施皮尔贝格。他们被关押在狭窄的、肮脏的、光线极差的囚室里，一条长凳当床，带着沉重的镣铐，衣衫褴褛，每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少得可怜的食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缺乏书籍，除劈劈柴和编织袜子外，无任何事情可做，长年累月过着煎熬般的日子，但令人惊异的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导致所有的人发疯和死亡。终于在 1830 年西尔维约·佩利科和马龙切利被恩赦，博尔谢里在 1835 年，孔法洛涅里在 1836 年先后获释。

1820 年和 1821 年，烧炭党分子虽在马尔凯，尤其在罗马涅，为数甚众（人们怀疑奥地利因对教皇管区有野心而支持他们），但无任

何动作。然而，仍有骚动和疑惧，也照样有审判和判处。1821 年，罗马涅开始出现政治暗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该地区的特点；教皇警察无力阻止暗杀，无力侦破凶手。1821 年 9 月 13 日的教皇谕旨对烧炭党人和知情不报者处以绝罚。

1823 年 8 月 20 日，庇护七世死。反孔萨尔维派的候选人安尼巴莱·德拉真加在教皇选举中获胜，取名利奥十二世（1823—1829 年在位）。孔萨尔维的国务卿之职被撤销（次年 1 月病逝），其事业被一笔勾销。利奥十二世是个性格强悍、严厉，几近于独断专行的人，他极端仇视自由思想，全面维护教皇神权政治。他首要关心的是用宗教裁判的监督，让人严格遵守天主教的道德和信仰；改组教育，完全交给教士去办；对孔萨尔维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做退步性的改革，维护贵族和教士特权；尽力镇压南部拉齐奥地区的盗匪活动。在罗马涅，反动分子和自由分子之间的敌对行动已非常尖锐，发生了流血事件，于是红衣主教里瓦罗拉被派去处理此事；他大搞秘密审讯。1825 年 8 月 31 日宣判七人以死刑——除两名缺席审判外，其余均改为二十五年的监禁——上百人判服苦役或有期或终身牢监。在罗马，两名烧炭党人塔尔吉尼和蒙塔纳里于 1825 年 11 月 23 日在人民广场被吊死。在罗马涅，一次谋杀红衣主教里瓦罗拉未遂后，又有人被判刑。

庇护八世（卡斯蒂廖尼，1829—1830 年在位）继利奥十二世为教皇，他是作为“狂热分子”唯一候选人当选的；那以后不久的一次新的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卡马尔多利人毛罗·卡佩拉里东山再起，取名格列高利十六世（1831—1846 年在位）。

109 1831 年中部意大利的革命

神圣同盟委派法国去完成镇压西班牙革命的任务。查理·阿尔贝托·迪卡里尼亚诺意欲在查理·费利切和各专制政府面前恢复自己的形象，于是以极大的热情志愿加入法国远征队，参加围困加的斯，攻陷托洛卡德罗要塞（1823 年）。加的斯的失陷（10 月 1 日）决定了西班牙革命的命运。

波旁法国虽然废弃了西班牙宪法，但保存了由路易十八在1814年复辟时颁布的宪章。自由立宪运动在议会内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宪章所允许的自由，同时背着议会酝酿充满缅怀拿破仑革命的、要求共和的行动。拉丁美洲反对西班牙和希腊反对土耳其的独立战争有助于唤起法国和欧洲的自由和革命的思想。在查理十世——1824年继其兄路易十八在法国登位——统治下，波旁政权的反对势力日益强大起来。1830年7月26日，国王发动政变，颁布四条反宪法命令。其后，在巴黎爆发了“三天”起义（7月27—29日），结果废除了查理十世，宣布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一世（1830—1848年在位）——波旁旁系——为“法国人的国王”，对宪法做了许多修改。

七月革命震动整个欧洲，但最重大的效果是在比利时、波兰、意大利。一伙意大利烧炭党人在巴黎建立起了“解放意大利会社”，佩佩、波罗，以及从施皮尔贝格释放后的马龙切利都加入了这一团体。这个团体同法国共和分子有联系，这样，法国的和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发生了接触。据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在七月革命的前几天和在奥尔良君主政体的初期，整个行动计划均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策划，并得到路易·菲利普本人的支持。路易同莫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四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公爵继续执行反动统治的方针，残酷迫害烧炭党人，在鲁比埃拉审讯中将神甫安德烈奥利推上绞首架（1822年），但他仍存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拉斐特派遣公爵在法国的代理人埃里克·米斯莱，向公爵提议组成一个伦巴第、帕尔马、托斯卡纳立宪王国，以换取他不再用他的巨额财富支持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自由分子。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当罗曼蒂克的，甚至很可能是完全虚幻的。由此可见，在公爵和烧炭党人米斯莱之间存在着政治关系，米斯莱或许是搞两面派，他又是弗朗切斯科四世的政治密友，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或许怀着希望拉公爵参与革命计划。奇罗·门诺蒂与公爵也有关系，可能曾临时代替米斯莱。此人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1820年被捕，这时在公国内外密谋策划。

但是，对于意大利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以拉斐特为首脑的法国

新政府所宣布的不干涉的原则，这一原则使意大利革命者认为在奥攻击时他们会受到保护。在选出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秘密会议期间（见第108节），有拿破仑一世的孙子、前荷兰国王路易之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参加的一伙谋反分子，企图在罗马起事（1830年12月），但遭到彻底失败。现又准备在波洛尼亚和莫德纳发动起义。公爵察觉行动在即，在1831年2月4日深夜，派人围住门诺蒂住宅。逮捕他和其他会集于此的谋反分子。可是次日，在波洛尼亚和公国爆发了起义；公爵拖着门诺蒂一同逃往曼图瓦。玛丽·路易贾也从帕尔马逃往驻扎着奥地利卫队的皮亚琴察；革命扩展到罗马涅、马尔凯和翁布里亚。在教皇国（除拉齐奥），在各公国（除皮亚琴察），不到十五天内，自由分子轻易地掌握了政权。在波洛尼亚建立起临时政府，政府首脑焦万尼·维奇尼召开教皇国起义各省的代表大会。大会于26日举行，宣布教皇俗权终止，宣布以“意大利各省联合”的名义建立解放的各省联盟，宣布成立临时立宪会议。但他们缺乏勇气攻打罗马，因那里也爆发了运动，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他们又完全信赖不干预政策，因此没有组织力量抵御奥地利。

相反，梅特涅很明确地向法国宣告不放弃干预，并在俄国外交上的全力支持下准备入侵。拉斐特打算全力阻止这种入侵，包括诉诸战争；但路易·菲利普却不愿这样做，他唯一思考的是在欧洲各君主政体内巩固其宝座。他起用佩里埃替代拉斐特（3月13日），把不干预原则变为纯粹的外交辞令，声称：“法国人的血只为法国流淌。”3月9日，奥地利人送公爵返回莫德纳，13日进入帕尔马。祖基将军指挥下的少数武装的莫德纳人撤退至波洛尼亚，临时政府仍迷恋于不干预原则，缴了他们的械。最后，奥地利人迫近，祖基本人出任莫德纳和波洛尼亚军队长官，以武装极差、毫无纪律的五千之军迎击一万五千奥地利人。奥地利人3月21日进入波洛尼亚，25日击退祖基的武装力量，祖基奉令引退。临时政府从波洛尼亚迁至安科纳，同教皇的特使本韦努蒂红衣主教（被囚禁，现已获大赦）签了投降书。但格列高利十六世拒绝承认投降；从安科纳乘船出逃的起义首领被奥舰队司令

邦迪耶拉逮捕，在威尼斯囚禁九个月后，被转移到奇维塔韦基亚，后获释，流放在外。

弗朗切斯科四世返回后第一个受害者是奇罗·门诺蒂。5 月 26 日，他与也参加革命的温琴佐·博雷利一起被处以极刑。除此之外，没有再判处死刑，可是许多人被判处苦役，随后的年代里苦役犯更是层出不穷。政府仍一意孤行，独裁专政，反动透顶，尽管也不乏某些关于文化、建筑、道路的措施。1846 年 1 月，公爵死，子弗朗切斯科五世继位。

教皇国对参与 1831 年事件者颁布大赦，但不包括三十多个要犯，给予其以存活之享。欧洲列强一致相信得随势而变。1831 年 5 月 21 日，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英国和撒丁岛提出一份集体备忘录，提议改革司法和行政：录用俗人担任公职，组织市政和省议会，建立审计部和国家咨询院。7 月 5 日的教皇通谕只接受部分提议，通谕确定各省省长应由教皇特使（红衣主教）或者宗座代表（一般高级教士）担任，辅之以君主任命的政府机构；建立由老者组成的、以最高行政长官和堂区主任司铎为首的市政议会。

尤其是在教皇辖地，这些改革措施并不令人满足。奥军刚一撤离，那里便重新发生骚乱和暴动，建立了许多自主政府。国务卿、红衣主教贝尔内蒂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抓住时机派出教廷军队干预，以免奥军重新占领。教廷军队击溃一些志愿兵团后，于 1832 年 1 月 20 日占领了切塞纳，大肆抢掠和屠杀手无寸铁者。21 日，在福尔利，人民和士兵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奥军冲破抵抗，卷土重来，民众更欢迎他们，而不喜欢教廷士兵，因为奥军较守纪律。为了对抗奥军的占领，法国派遣士兵登陆安科纳（2 月 22 日）。混战和暗杀继续骚扰马尔凯和教廷辖地；为了镇压起义分子，贝尔纳蒂组织一支土著志愿兵团“百夫团”，这些人的残酷并不亚于要镇压的那些人。终于局势开始平静下来。1838 年，奥地利人和法国人撤出，格列高利十六世在经过起初几年的左右摇摆后，同国务卿兰布鲁斯基尼制定了完全后退的政策。

110 朱塞佩·马志尼和“青年意大利”

由烧炭党发起和领导的1820—1821年和1831年的意大利革命，是西班牙和法国发生的那几起革命的反响。1831年的那场革命企图主要依靠法国政府的政策来取得成功。两场革命只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并没有解决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意大利问题。其精神动力主要仍是重演革命-拿破仑时期的事业。

1831年革命的失败，也标志着烧炭党的完结；自那以后，可以说它是在苟延残喘，在罗马涅和马尔凯延续的时间长一些。纲领不明确，组织不充分，领导人心胸狭窄，加之身处逆境，这一切都导致其失败。意大利的情况仍是那么的艰难，以至于全国性的政治行动大部分只能秘密进行；然而，继烧炭党和其他小派别的是另一个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它与前者很不相同。再也不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纲领各异、毫无有机联系的会社，而是一个卓越的团体，其首领朱塞佩·马志尼能量非凡，不知疲倦，他所制定的纲领明确、成熟。

朱塞佩·马志尼于1805年6月22日出生于热那亚，在一个有着共和传统、对萨沃依王朝少有忠诚的环境里长大。1821年，他还是少年时，就被所见到的皮埃蒙特政治犯上船流亡国外的情景所深深打动。1827年加入烧炭党，1830年被捕，关在萨沃纳城堡里；就是在那儿，他的政治思想开始成熟，后流亡马赛，同1831年的流亡者发生接触。运动进行的方式及其失败使他确信烧炭党的缺陷颇多。他认为，意大利之复兴运动，不能只限于少数个人或狭隘社会阶层凭经验进行的政治行动，而应是在精神上，首先在宗教和道义方面进行革新的一种广泛而深刻的潮流，这种潮流基于对上帝、对掌握着进步的神明法则的人类的坚实而深厚的信念，因而必然能打动人心，动员全体人民。拯救复兴运动，不应期待君主们，要靠自己；政治解放必然要产生社会解放。意大利革命必须为意大利执行一个旨在改造整个人类的纲领，可概括为“上帝和人民”的纲领，在拯救人类的这一事业中，应由意大利来扮演发动者和捍卫者的角色，使她的事业成为全体人类的事业，

使她的事业发挥全面的作用和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意大利的罗马必将承继帝国罗马，必将承继教皇之罗马，并且在精神上远远胜过它们。在意大利的指引下，联合起来的反政府的各族人民必将建立自由的团结的民族社会，这种社会的合作（根据各自的能力和专长）必将产生一个按民族和民族集团组成的新欧洲，同新欧洲一起必将产生一个联合的、解放了的人类，它们一起向着无限的神的理想化境界的道路上迈进。

在这些思想的鼓舞下，马志尼于1831年在马赛创立了“青年意大利”。他阐明这一组织的纲领：“‘青年意大利’是相信进步和义务的法则的意大利人的兄弟会，他们相信意大利会被称作一个国家，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这个国家……相信力量的秘诀在于团结，在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团结一致将其思想和行动奉献于将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国家，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的这一伟大信念之中。”“‘青年意大利’是共和国的、统一的。之所以是共和国的，因为全民族所有的人按照上帝和人类的法则都是自由的、平等的，都是兄弟。只有共和国体制才能保证这一未来；之所以是统一的，是因为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被联合一致的嫉妒成性的列强所包围的意大利，首先需要的是力量。”“国家是在一个公约中亲如兄弟的，在共同法律之下生活的意大利人的总体。”

复辟时期，政治纲领上主要的新内容是意大利统一的思想，这时仅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含糊的幻景，而且可以说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以如此明确、如此决断的形式提出过。马志尼以发自内心的热情和体现其思想之崇高愿望来捍卫这一理想，成为新意大利的关键人物之一；同时，他将政治纲领和思想革新行动及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宗教思想极好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提到一个极其崇高的高度，没有东西比这更能赋予它以普遍的价值。

马志尼很快着手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出现了一些“青年意大利”的支部，在热那亚有雅各布和焦万尼·鲁菲尼，在托斯卡纳有圭拉齐和比尼，在罗马涅有路易吉·卡洛·法里尼，在翁布里亚有弗朗

切斯科·瓜尔达巴西，几乎遍及意大利；也吸引了余下的烧炭党分子。从1832年起，开始发行与“青年意大利”同名的期刊，直至1834年，并将期刊秘密运至意大利半岛散发。马志尼在杂志上撰稿，后又在其他的期刊和小册子上继续撰文，还书写大量的信件，这一写作活动使他在意大利政治、思想、宗教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与烧炭党暴动有牵连的1821年的摄政亲王萨沃依-卡里尼亚诺的查理·阿尔贝特接替萨沃依最后一个直系的查理·费利切，登上撒丁王位的宝座（1831年4月）。1821年的事件后，查理·费利切曾提出排除卡里尼亚诺亲王的问题，他想用其子维克托·伊曼纽尔（1820年生）替代查理·阿尔贝特。奥地利反对这一意图，这一计划只好放弃；但是他迫使亲王在1823年12月签署一项声明，承诺在没有得到显贵议会的投票赞成时，不能对国家的基本法律做任何改动。这恰恰符合现已变成自由主义死对头的亲王新的感情。因此他一登上王位，便同奥地利签订了正式联盟条约。

然而，他的上台又激起了许多希望。就连马志尼本人，尽管他提出了共和纲领，也上书国王（信于1831年发表于马赛），盼望他大展宏图，以成为意大利的国君，新国王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来回答这一呼吁。1832年年底，马志尼声明不再信任他，并在萨沃依国加紧进行革命宣传。1833年4月，在军队中的革命宣传活动败露，遭到了严酷的镇压，二十七人被判死刑，十二人被执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着爱国情操和高贵心灵的安德烈亚·沃基埃里，被枪决于亚历山德里亚城，查理·阿尔贝特还专门授予该城总督加拉泰里将军圣母领报勋章，以嘉奖其残暴和卑劣），许多人被判以各种徒刑和流放；在流放犯中，有维琴佐·焦贝蒂司铎。马志尼的最崇拜者雅各布·鲁菲尼在热那亚的狱中被处死。

查理·阿尔贝特对远非1821年、1831年事件可比的极轻微的事件，也严加镇压；因此，毫不奇怪，查理·阿尔贝特为自由分子，首先为马志尼及其朋友们所深恶痛绝，他们策划谋杀国王，在萨沃依组织起义。萨沃依受到由一千多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流亡分子组成的队伍

的攻击；杰罗拉莫·拉莫里诺为波兰人战斗后刚刚返回，由他率领的这次讨伐只经过一场小小的战斗（1834 年 2 月）便溃不成军。与此同时，在热那亚应该爆发另一场起义，其领导人之一是尼斯人朱塞佩·加里波第（生于 1807 年 7 月 4 日）。可是他最后只剩孤身一人，被迫逃亡，与其同伴一起被缺席判以死刑。1833 年的审判以及征讨萨沃依后，马志尼也被判死刑。

马志尼丝毫不因此而停止其活动，反而扩大了活动范围，使其变为国际性的，并在伯尔尼建立“青年欧洲”（1834 年），有多少个国家的革命者参加，就建立多少个支部。它象征一种思想，而不代表一种真正的政治行动；即使如此，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法国政府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于是马志尼不得不离开瑞士，前往英国（1837 年），从而中断了好几年的革命活动。

在伦巴第，“青年意大利”也有不少成员。警察发觉马志尼的宣传活动后，进行了一系列逮捕活动（1833 年）；1835 年 9 月审判结束，缺席判处十九人死刑。这一年的 3 月，弗兰茨一世死，斐迪南一世（1835—1848 年）接位，他是个智力不全的人。大赦、释放全部在押政治犯，其中一部分被流放。1838 年，新皇帝到米兰加冕（9 月 6 日），群众举行盛大庆祝，其后又是一次大赦。可是，当时和其后，为反对政府行政过于集中所做的努力毫无结果，短暂的牧歌很快就唱完了。即使存在一个由达官贵人和高级僧侣形成的、出于利益和眷恋平静的生活而亲奥地利的党，但中产阶级已满怀仇恨，充满民族激情：下面谈及的文学和政论文章启示了他们，鼓舞了他们。

大约 1840 年，马志尼在伦敦恢复了“青年意大利”的活动，并在巴黎设立组织和宣传中心。最适宜活动的场所在罗马涅，那儿的革命者开始重新组成，并行动起来。1843 年企图在波洛尼亚起事，随后又是大量逮捕和判决，其中七人被处死（1844 年）。1845 年在里米尼爆发了另一场起义：起义者要求实现改革纲领，可是行动的后果无非仍是一长串的审讯。这时，教皇国的所有监狱关满了政治犯。但在罗马涅，对政府的敌对情绪已趋燎原之势。

在那不勒斯，二十岁的斐迪南二世登上王位，其父统治时间短暂。他年轻有力，个性强，政治才干出类拔萃。从任何方面来说，他和1820年及其随后年代的冤案和反动都无牵连，因此人们对他，对意大利国土最广、军事势力最强的国君寄予厚望。在他进入那不勒斯城，人们向他高呼“意大利国王万岁”。可是他的心灵已被潜藏内心深处的那不勒斯人的懒散弄得十分低沉，又为近于迷信和虔诚的宗教狂热所遏制，因而他无法升华到这样伟大理想的境界。另一方面，他意欲成为一个专制君王，尽管他也偏爱独立。开初几年，在奥法之间他更倾向于法国，他亦赞成改善行政管理。失望的烧炭党人在1832年两次密谋反叛，一次图谋刺杀国王，另一次只是简单地要求宣布宪法。这两次谋叛都被揭露，受到惩罚，但很轻微。据说，波洛尼亚的自由分子欣赏国王节制有度，派人向他献上意大利王冠，国王拒绝接受，“因为不知道教皇会说什么”。确实，教皇的统治对任何扩大那不勒斯王国版图是一种直接障碍，而皮埃蒙特却没有这种障碍。1837年在阿布鲁齐的佩内，在科森察，1841年在阿奎拉爆发了真正的起义，随后是判处死刑。1837年在西西里的墨西拿、叙拉古、卡塔尼亚爆发了相当严重的动乱。引起这场动乱的原因，是人们认为遍及岛上造成大批死亡的霍乱是政府散放的有毒粉末所致。但是运动不乏立宪和自主的性质，遭到警察总长德尔卡雷托的惨无人道的镇压。自那以后，波旁人和西西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尽管有了1812年推翻封建的导致产生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法律，但岛上的经济-社会情况实质上仍原封不动。与此同时，“青年意大利”和其他秘密团体在王国广为发展：贝内代托·穆索利诺、路易吉·塞滕布里尼、朱塞佩·马萨里都参加过其活动；可是大部分那不勒斯的自由分子的想法与马志尼的纲领不一样。以卡洛·波埃里奥为首的那不勒斯立宪委员会同马志尼分子保持着关系。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准备在1844年3月发动一场总起义。可是只在科森察爆发，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这一切完结时，奥舰队司令两个儿子、海军逃兵马志尼分子阿蒂利奥和埃米利奥·班迪耶拉与威尼斯的多梅尼科·莫罗、弗罗西诺内的尼科拉·里奇奥蒂、佩鲁贾

的多梅尼科、卢帕泰利以及其他几个人一起，于6月16日在卡拉布里亚的科特罗内附近登陆。马志尼极力阻止他们，但徒劳无益。他们相信，为了震醒意大利人，做出表率是必要的。他们游荡了几天后，被王军拿获，关进牢房，据说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个科西嘉人博凯钱佩的叛变。在1844年7月11日枪决科森察暴动的五个犯人的罗维托深谷，班迪耶拉兄弟和七位同伴于7月25日也被枪决，临刑时他们高呼“意大利万岁，自由万岁，祖国万岁”。他们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意大利的事业不无裨益。

马志尼的事业，直接的结果虽然甚微，但作为宣传思想，却富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一事业真正唤起了民族意识，在欧洲舆论界宣传了意大利问题；而接连不断的起义运动和司法判处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111　稳健的政党　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文化

显然，不断的起义和反复的失败，对当时的条件和各种力量的对比进行冷静的思考，导致许多人相信必须走另条路。意大利的爱国者开始认为意大利不可能独自消灭旧世界，必须利用这个世界的各种进步因素来建立新意大利。于是继革命派后又出现了改良派。一大批作家、历史学家、文化人士和哲学家成了这一倾向的发起者和代表。

第一部著作也是初期改良主义的福音书，是维琴佐·焦贝蒂的《意大利人道德文明的优势》（1843年）。焦贝蒂从马志尼的思想演变成一些更加温和的思想。他在其著作中宣称，世界仍给意大利保留着优越的地位和领导的使命，这是因为她的人民天资杰出，她的光荣的过去，特别是因为她同必将在欧洲再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教皇罗马的关系。为履行其世界使命，意大利必须政治上复兴，获得独立，组成以教皇为首的邦联。实现邦联的起点，是罗马和皮埃蒙特联合。于是诞生了“新归尔甫”派，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要意大利尊重教皇的俗权，甚至期待意大利君主教皇，以其包容着意大利的伟大和光荣传统的普世性，来拯救国家。切萨雷·巴尔博（普罗斯佩罗之子）在比

《优势》一书出版稍晚的《意大利的希望》（1843年）一书中也赞成同教皇建立邦联。然而，他认为意大利复兴的主要角色是萨沃依王朝。要争取的第一件事是独立，然而他并不期待通过战争获得独立，而是期待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这将把奥地利吸引到东方。另一个重要的出版物是阿泽利奥的小册子《罗马涅最后的机会》（1846年），是在里米尼事件之后问世的，尽管他在书中揭露了教皇的劣政，但也非难了起义运动，阐述了改良运动的纲领。这样就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温和派，它希望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立足于现存的国家，至少依靠其中某个国家。

某些期刊也有助于形成全国温和的改良的舆论。在缺乏全国性的政治报刊的情况下，这几年在米兰出现了经济和科学技术性的读物，重要的期刊有：《万国统计年鉴》，为其撰稿的有梅尔基奥雷·焦亚（见第103节）和彼得罗·库斯托迪（十八世纪《意大利政治经济名著》汇编的作者），主编为罗马尼奥西（见第108节）；由卡洛·卡塔内奥（1801—1869年）创立和领导的《工科》；与上述刊物齐名的有文学性刊物《欧洲杂志》（佛罗伦萨的期刊）。这些期刊宗旨是：促进伦巴第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促进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意大利经济文化和欧洲的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经济文化重新联结起来；消除或降低半岛上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通过已开始设计和建设的铁路把半岛各国以及同外部联结起来；促进生产活动和正在思考和实施的精神自由化和现代化。从1839年起在半岛各首府举行的意大利科学家集会为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意大利各国的知名人士聚集一起，为共同的民族生活协调意见。

为了更好地理解意大利这种出版事业的效果，应从本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学总的范围里去认识，而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文学几乎全都具有爱国性质，至少在精神上和文明上，也即是说，总能震醒和教育人民。这种文学体现了拿破仑时代诞生于德国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效果。它是一种总的艺术倾向，不仅表现在文学方面，而且也表现在造型艺术和音乐上，实质上是一种从经典模式，一般来说从各种因袭的

规则中挣脱出来，其目的在于更自由地、更内在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浪漫主义者反对模仿经典著作，反对悲剧中时空统一的规则，一般来说，反对文学过于严格的分类，反对滥用神话，即一般反对古老的题材；他们希望文学更贴近生活；现代世界是基督世界而不是异教世界，因而他们极力从基督教义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全盛时期——寻找其灵感的源泉，他们标榜是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精神的反动。他们尊崇像莎士比亚、卡尔德隆等某些现代作家，反对过分欣赏古典作家。在地理上、精神上更接近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极大的广泛性，对历史和政治文学起着不小的影响，因它坚持中世纪的重要性和渊源性，因而也是坚持基督教的和各民族往昔的重要性和渊源性。

在意大利，浪漫学派的宣言书是贝尔凯特（1783—1851 年）的《格里索斯托莫半开玩笑的通讯》（1816 年）和存时很短的期刊《调解者》。在这之前，已开始出版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 年）的《圣歌》，随后不久，又有抒情诗《五月五日》，悲剧《阿德尔齐》和《卡马尼奥拉伯爵》，小说《约婚夫妇》问世，所有这些著作洋溢着崇高的人道美德和狂热的基督精神。曼佐尼对浪漫主义理论也有深入研究，在他身上，意大利浪漫主义达到最高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他的浪漫主义从其结构的平衡和形式的完美来看是古典式的，但从成为其杰作的小说中充满辛辣讽刺的现实主义来看又是极其现代的。

文学就是爱国主义事业，早在颂歌《1821 年 3 月》的作者曼佐尼身上就有所体现，但在意大利浪漫主义学派的其他作家身上表现更为突出。令人怀念的贝尔凯特写下了不少对复兴运动充满洋溢热情的抒情诗，这些诗篇对爱国者来说是战歌，因此他被称为意大利的提尔泰奥斯[1]。他之后不久，是加布里埃莱·罗塞蒂（1783—1854 年），1820 年那不勒斯革命的流放者。1848 年前夕，戈弗雷多·马梅利（1827—

[1] 希腊哀歌诗人，写军事题材诗篇的作者。——译者

1849年）又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写出了著名的歌曲《意大利弟兄们》[①]，然后，为保卫罗马献出了生命。往后有路易吉·梅尔坎蒂尼（1821—1872年），加里波第之歌“打开坟墓，抬起死者”的作者；更多产更亲切的诗人焦万尼·普拉蒂（1815—1884年）在1848年的前几年便开始了长期的文学生涯，使他成了所谓“第二浪漫主义”的首领，他的诗篇也洋溢着民族情感。更加倾向于“纯”艺术和古典主义的是路易吉·卡雷尔（1801—1850年）。朱塞佩·朱斯蒂（1809—1850年）的讽刺诗文充满了政治和爱国热情，到处传抄，极受青睐；从这些讽刺作品中，不时出现充满人情味的抒情高音符（《圣安布罗焦》）。焦阿基诺·贝利（1791—1863年），是杰出的罗马诗人，虽不属于爱国运动，但由于他讽刺罗马教皇国，其诗篇同该运功也有类似之处。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年）在坐牢（见第108节）之前写出的悲剧《弗朗切斯科·达里米尼》给戏剧注入了爱国的色彩。詹巴蒂斯塔·尼科利尼（1782—1861年）的诗篇充满了民族精神，他从古典悲剧过渡到浪漫戏剧（《焦万尼·达普罗奇达》、《阿尔纳多·达布雷西亚》），但形式上仍保存着古典特色。仿效曼佐尼（和沃尔特·司科特）而涌现出的历史小说多半是艺术或艺术——道德性质的作品，如托马索·格罗西的《马尔科·维斯孔蒂》和切撒雷·坎图的《玛格丽特·普斯泰尔拉》，这两篇作品选择的历史题材也颇具民族和浪漫的特征。相反，马西莫·达泽利奥（1798—1866年）的《威吓者菲拉莫斯卡》和《尼科洛·德拉皮》，多产而又糊涂的作家、1848年民主运动首领之一的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奎拉齐（1804—1873年）所写《围困佛罗伦萨》均直接描绘了过去的伟大和祖国的不幸。

历史研究之革新对唤起和激发民族意识也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切萨雷·坎图（1804—1895年）是一本极幸运的《世界史》（1838—1846年第一版）的作者，在这一方面成绩卓著；他主要致力于辑录工作，但思想较表面且反动，因而革新的功劳应归功于卡洛·特罗亚

① 意大利国歌。——译者

（1784—1858 年）（中世纪文献的伟大收集者、中世纪历史的深入研究者，著有《但丁的寓意猎狗》、《中世纪的意大利》），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切萨雷·巴尔博（1789—1853 年）（著有《意大利简史》，通篇充满了民族独立思想）。真正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是爱国者和流放者西西里人米凯莱·阿马里（1806—1889 年），他在其著作《西西里韦斯普罗战争史》中要求人民恢复那次著名起义的首创精神。稍后，他又写了《西西里穆斯林史》（1854—1872 年），至今仍是一本十分重要的历史书。一些集体机构，像卡洛·阿尔贝托在都灵创立的“祖国历史委员会”和醉心学术研究的自由主义者詹彼得罗·维厄瑟（1779—1863 年）个人在佛罗伦萨创立的“意大利历史档案馆”（1842 年）有助于对历史的热心研究和讨论，同时又有助于思想的精化和解放、民族意识的觉醒。早先詹彼得罗·维厄瑟创建和领导（1821—1833 年）的一种英国类型的文学杂志《文选》，在托斯卡纳政府没有取消它之前，它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新文化中心。在这一事业中，他的主要助手有佛罗伦萨作家和历史学家吉诺·卡波尼（1792—1876 年）。

两位古典作家卡洛·博塔（1766—1837 年）和彼得罗·科莱塔（1775—1831 年），虽站在这一编纂历史运动之外，但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是重要的人物。前者写出了《从 1789 年到 1814 年的意大利历史》，后者著有《那不勒斯王国史》，这是一部反波旁的宣言书。

达尔马提亚人尼科洛·托马塞奥（1802—1874 年）积极参与《文选》工作，是维厄瑟和卡波尼的朋友，他多年过着流亡生活，著作极丰，风格辛辣，他也论述民族问题，写抒情诗和小说，对意大利语言做过辛勤的研究，富有成果。这一研究旨在用语言的纯洁性来反对十八世纪的法国语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价值。语言纯洁主义的典范要数安东尼奥·切萨里（1760—1828 年）和巴西利奥·普奥蒂；后者在那不勒斯开创的学派（1825—1847 年）成为贵族精神的灶龛，其中还有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彼得罗·焦尔达尼（1774—1848 年），非常巧妙地将民族和自由精神融合在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纯洁主义之中，他的许多论文和大量书信极为生动。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年）同当时的文学-爱国运动疏而远之，他孤寂自处，因而他的伟大鲜为人知。开初，他也唱出爱国主义的音符（歌曲《致意大利》），可是，很快抛弃了它，而倾心于在《赞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的悲观主义，但其独创性和完善性无可匹及，整个诗歌充满了古典精神；他在创造这些意大利诗歌中，表现了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我们甚至可以说达到浪漫的程度。可他疏远两个学派，不和当代诗人结交，但他是最伟大的。他的哲学-道德思想在《道德小品集》中以更富有推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对意大利自由主义运动表示悲观失望，哀叹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遭到遗弃，切望人们间的兄弟情谊，反对互相仇视。

这一时期，意大利哲学与莱奥帕尔迪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本世纪上半叶，哲学也有革新，主要人物有：帕斯夸莱·加卢皮（1770—1846年）、安东尼奥·罗斯米尼-塞尔巴蒂（1797—1855年）、前面已提到的维琴佐·焦贝蒂（1801—1852年）、泰伦齐奥·马米亚尼（1799—1885年），他也是爱国者和流亡者。哲学走出了十八世纪的感觉论，某种程度上，吸取了德国的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提出了新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论（罗斯米尼的意识心理论、焦贝蒂的本体主义）。意大利这一新哲学的特点是倾向于将哲学思想和教会教义调和起来（在政治上是类似于新归尔甫主义）。此外，焦贝蒂在其有生之年未曾发表的著述中将教义演化成极端自由的思想。

在复兴时代，无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政治社会学观点看，艺术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拿破仑时期，新古典主义（与政治气氛相适应）统治一时，未遇任何抵抗。在雕刻中，安东尼奥·卡诺瓦（见第101节）名噪一时，影响遍及欧洲；在绘画中，有安德烈亚·阿皮亚尼（1754—1817年）。在复辟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冷色的学院派一统天下；主要代表有：绘画方面，是温琴佐·卡穆奇尼（1775—1844年），同他一起的有彼得罗·本韦努蒂（1769—1844年）和路易吉·萨巴泰利（1772—1850年）；雕刻方面，有罗马籍丹麦人阿尔贝特·托瓦尔森（1770—1844年），其学生彼得罗·泰内拉尼（1789—1869年）。

本世纪中叶，雕刻家洛伦佐·巴尔托利尼（1777—1850年）猛烈攻击学院派，主张回到真实中，可是在实际上，他本人又大搞学院派，可以说，其他雕刻家卡洛·马罗凯蒂（1805—1868年）和温琴佐·韦拉（1822—1891年）也是如此，他们追随他，却不如他；而焦万尼·杜普雷（1817—1882年）也追随他，但更自由、更独特。后两人在随后时期，在本世纪后半叶的活动更频繁，范围更广。在绘画方面，弗朗切斯科·海斯（1791—1882年）以伤感的浪漫主义替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但流于矫揉造作；与他一起的，还有马西莫·达泽利奥（但不及他），他以很难实现的反学院派意向作风景画。浪漫绘画偏爱历史画，与文学中的历史小说相呼应。简言之，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艺术成绩平庸，对发生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演变作局外观。

意大利的音乐在这一时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可只限于歌剧方面。通过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年）的《塞维尔的理发师》，意大利的喜歌剧在复辟之初（1816年）就结出了甜美的果实。拿破仑时代，大歌剧在法国蓬勃发展；意大利的艺术家如路易吉·凯鲁比尼（1760—1842年）和加斯帕雷·斯蓬蒂尼（1774—1851年）的剧作采取了宽广而细腻的形式。罗西尼的最后一个歌剧《威廉·退尔》（1829年）也属于这一范畴，但天才地超过所有的前辈。在浪漫时代，意大利歌剧的曲调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温琴佐·贝利尼（1801—1835年）的《梦游女》、《诺尔玛》和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8—1848年）的《宠儿》、《拉美莫尔的露契亚》这样一类的情节剧中，后者也是另外两部脍炙人口的喜歌剧《爱的甘醇》和《唐·帕斯夸莱》的作者。本世纪上半叶，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年）就已成名，他长时间从事这一活动（《纳布科》、《游吟诗人》、《茶花女》、《弄臣》等），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再谈及他。

112　查理·阿尔贝特和庇护九世　民族运动

政治和改良运动，从理论到实际，至少需要意大利君主中的某一个君主。大部分由皮埃蒙特人构成的稳健派自然将眼睛盯住查理·阿

尔贝特，其人目前似乎着手实施新的方针。

1835 年，查理·阿尔贝特撤销了反动部长莱斯卡雷纳之职，赶走了警察头子帕卡主教，一个形迹可疑的、专事制造假谋叛的老手；可是他也任命伯爵索拉罗·德拉马加里塔，一个专断横行的家伙为外交大臣，从传统上说，该职在政府中历来是较重要之职。在民事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诸如取消撒丁岛的封建司法权，颁布民法（1837 年）——类似拿破仑法典，其主要功绩是结束了层出不穷的混乱的立法，确定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和刑法（1839 年），也确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节制惩罚。继而在刑事诉讼中做了改革，并同教廷达成协定（1841 年），部分允许国家对教士实行刑法权。然而，所有这些，无非是重复了十八世纪专制主义的衣钵，甚至不及，尤其在独立于教会方面。在对外政策上，查理·阿尔贝特不仅与奥结盟，而且一味附和梅特涅，突出拥护正统王权的反动方针，反对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立宪国家；他狂热地拥护西班牙的查理主义。然而，在 1840 年的欧洲危机中，他在埃及问题上既不站在奥地利一边，也不倒向法国，但仍保持（在战争时期及战后）同一方或另一方结盟。

1842 年 4 月，萨沃依大公王储维克托·伊曼纽尔同伦巴第-威尼托总督拉尼埃大公之女、哈布斯堡-洛林的玛丽·阿德累德联姻，他似乎重申了同奥的联盟。可是另些事实又表明查理·阿尔贝特的政策有新的变动。1842 年，他允许建立整个皮埃蒙特的农业协会，以此打破反对给予市民以集会和交流意见的某种机会的专制传统：协会实际上成了政治生活的中心。1844 年，允许和鼓励兴办幼儿园和师范学校，从而减少了耶稣会士在教育中的独霸地位。在 1843 年致索拉罗的信中，宣布了意大利独立纲领；1844 年，铸造奖章，颁发给向他赠送作品的人，奖章一面饰以拔着鹰的羽毛的萨沃依狮子，另一面饰以但丁、克里斯托福罗·哥伦布、拉斐尔、伽利略的肖像，环以阿梅代奥六世的格言“我期待我的星星”。另一些不太反动的人被召进政府和教育部门。普雷达里创办了《意大利文选》，合作者有巴尔博、焦贝蒂、达泽利奥、法里尼。1845 年，达泽利奥从罗马涅归来，国王对他说：

“请告诉那些先生们，让他们安静下来，别乱走乱动，眼下还没有什么可干的，但应确信机会会有的，那时，我的生命，我孩子们的生命，我的武器，我的金钱财富，我的军队，一切的一切，都将贡献给意大利事业。”1846 年 4 月，由于海关问题，同奥地利发生外交冲突，这件事由官方报纸《皮埃蒙特报》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公之于众。在内阁会上，查理·阿尔贝特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失去奥地利，我们会得到意大利，那么，意大利就会自行其是。”

然而，无意识地推动了改良-革命运动的意大利君主，并非萨沃依君王，而是新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于 1846 年 6 月 1 日病故。在 14 日召开的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实际上分成两派，即拥护或反对前国务卿兰布鲁斯基尼，斗争的结果，选出了（6 月 16 日）西尼加利亚人焦万尼·马斯塔伊-费雷蒂，取名庇护九世（1846—1878 年在位）。新教皇登上宝座时，享有某种自由者的美名；事实上，他表现得温和，不像任斯波莱托和伊莫拉主教时那样强硬，而实质上，他是一位反对格列高利政策者。他对奥地利没有好感，但真诚地热爱意大利。他说过“教皇最高权力”，对其中赋予罗马教皇的使命并不遗憾。他智慧不算广博，乐善好施，但又相当顽固，好冲动，因为从年轻时起就得了折磨他的癫痫症。一则（不可靠的）谣传使他深得民心，谣传说，奥地利委派米兰大主教盖斯鲁克红衣主教否决他的当选，可他到达时秘密会议已开完。

7 月 16 日，新教皇颁布政治大赦令，这次的大赦比之其前任在类似的场合下颁布大赦的范围更广，但不包括所有的罪犯，而且获大赦的人必须声明忠于教皇。这一行动时机适宜，引起很大的热情，公众舆论把庇护九世当成所期待的解放者，整个意大利欢呼他；拥护他的游行有助于自由主义者确立其地位；在教皇国发行报纸，出版小册子，组织政治团体；总之，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充满勃勃生气。

新教皇的某些行动揭开了人们所主张和渴望的改革时期：1847 年 3 月，他公布了相当自由的新闻法（新闻检查权授予一个非宗教人士占多数的委员会）；4 月，批准成立国家咨询会；6 月，成立部长会

议；7月5日，公布关于建立公民卫队的命令。他的榜样开始迫使其他各国君主行动。5月，利奥波德二世也允许新闻比较自由；9月，批准成立公民卫队。在卢卡公国，人们要求查理·卢多维科实行宪法，为了避开难题，他提前把国家交给利奥波德二世。在皮埃蒙特，查理·阿尔贝特解除了德拉马加里塔外交大臣之职，颁布了一系列重大行政改革措施（1847年10月）。罗马、佛罗伦萨和都灵之间正在商谈关税联盟，这一消息传遍意大利，激起了热情和期望。

在伦巴第-威尼托，在颂扬庇护九世或其他借口下举行民族的反奥游行；奥地利企图向改良主义派施加外交压力，但无效，于是开始采取防范措施，占领了费拉拉城（8月13日）。这一举措更大地激奋了自由主义分子，引起了教皇的抗议，这样，迫使奥地利于9月将军队撤至按照《维也纳条约》它有权驻守的城堡里；但奥又向帕尔马公国——那里玛丽·路易死后（12月17日），查理·卢多维科以查理二世之名登位——和莫德纳公国派兵，同这两公国国君签订专门条约。在奥地利和教皇冲突中，查理·阿尔贝特盼望一次独立战争，他将领头支持“归尔甫事业”。

1848年1月3日，在米兰爆发了自由党人以戒烟为名组织的反奥游行，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巴勒莫，1月12日开始了真正反波旁起义；皇家军队不得不在几天内撤离整个西西里（除墨西拿城堡外）；宣布施行1812年西西里宪法。在那不勒斯地区，发生了真正的动乱。奇伦托起义声势浩大，在那不勒斯城，各条街道上都是示威的人群（1月27日），要求颁布宪法；于是，斐迪南二世（求奥支持失败）决定走在其他国君前头，率先实施宪法：1月29日宣布宪法，2月10日正式颁布之。同一天，庇护九世发表宣言，其中一句话是“伟大的上帝，赐福意大利吧！”这句话脱离原文，单独变成一句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箴言。那不勒斯宣布宪章后，查理·阿尔贝特仍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声称这对民族独立事业有害；然而在广大民众和内阁的一再要求下，他最终还是同意了。2月8日宣布宪章基础，3月4日颁布宪法；16日，切萨雷·巴尔博组成第一个立宪部。2月11日，托斯卡纳

大公也同意实施宪法，并于17日颁布之。最后，3月14日，庇护九世也颁布宪法，但出于神权政府的需要，加进了一些限制。意大利的这些宪法，均以1830年法国宪法为模式，设两院——参院，由国君任命，另一院在小范围选举产生——和主管部长，国王不对议会负责，宣布公民自由、平等、出版自由，建立公民卫队。

113　1848年革命和对奥战争

迄今为止，意大利的动乱具有地方性质，它引起了外部的关注和同情（英国政府通过其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表示公开支持），提高了意大利民族的威望。奥地利成了主要障碍，它不仅封锁了民族独立之路，而且妨碍了改良事业的成功。意大利由于动乱很难自身去攻击奥地利。恰好在这时，发生了始于法国的欧洲大动荡。

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见第109节）越来越失信于进步分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保守王朝。在王朝初年，共和反对派起义失败后，仍以合法的形式持续存在，同时又出现了立宪自由党；以及以王位觊觎者路易·拿破仑——拿破仑兄弟之子，路易——为首的波拿巴主义派，曾两次妄图突袭；最后，社会党，它要求无产者有劳动的权利，要求不仅仅政治上的，而且经济上的平等制度；共产党，它要求取消私有制。各反对党的共同要求是普选，至少是扩大选举权。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爆发起义，君主政体企图成立新政府，吸收反对党人士参加，未成。路易·菲利普24日逊位并出逃，25日宣布共和。革命大有燎原之势，3月13日维也纳爆发革命，梅特涅提出辞呈，接着同意出版自由，成立公民卫队，召集立宪会议。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其余地方，革命动乱威胁各君主，终于在法兰克福召开立宪会议以讨论德国的新组织形式。

1848年3月7日，维也纳起义的消息传到米兰，18日晨，张贴了皇帝的敕令，允许召开帝国各国的会议和出版自由（相反，减掉了维也纳已允许的公民卫队）。以切萨雷·科伦蒂、恩里科·切尔努斯基和其他著名市民为首的一支真正的队伍（城市最高长官加布里奥·卡

萨蒂几乎是不情愿地被推到这支队伍的前面）浩浩荡荡开到副总督奥唐奈尔的宫邸，他立即答应解散警察，成立公民卫队。可是一小队士兵和队伍之间发生了冲突，酿成起义，很快波及整个城市。在起义中，卡洛·卡塔内奥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于是，在六个小时的顽强抵抗后，拉德茨基元帅占领了布罗莱托（市政大厅），逮捕了百十人，作为人质被关在城堡里。可是，夜间筑起了几百人的街垒，早上有好几百手持枪支的市民凭借街垒抵御奥地利人，男人、女人、孩子们从旁襄助，向奥军投掷瓦砾、石头子，泼洒滚烫的油，警钟敲得当当响，以应和奥地利大炮的轰隆声。

拉德茨基的军队，尽管得到增援，兵力达到两万人，但仍节节败退。20 日，放弃主教堂；22 日，他们手里只有城堡和城墙。而且，就在这一天城堡和城门在从外部攻击的志愿兵的帮助下，也被占领。在托萨门下的战斗十分酷烈，卢恰诺·马纳拉战斗出众。从那天起，托萨门改称为——1859 年最后定名——凯旋门。最后，拉德茨基放弃城堡，穿过伦巴第，撤至四城防御区（佩斯基埃拉、曼图瓦、维罗纳、莱尼亚戈四城）。

与此同时，17 日，当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到威尼斯时，威尼斯也爆发了起义。人民解救出了作家尼科洛·托马塞奥和卓越的律师、威尼斯爱国者丹尼尔·曼宁，他们是早几天被捕的。18 日，丹尼尔·曼宁组织公民卫队，22 日占领兵工厂，没遇到什么抵抗。入夜，奥守卫部队撤离。以曼宁为首的临时政府宣布共和。起义从米兰和威尼斯开始，然后遍及整个伦巴第-威尼托，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的地盘只剩下四城防御区；地域虽狭小，军事地位却险要。奥军撤离的各公国纷纷起义，迫使查理·卢多维科和弗朗切斯科五世退却。整个意大利，首先是伦巴第-威尼托，成立了诸多志愿兵团：马纳拉的狙击兵团、各城市的“十字军”、贝尔加莫的卡莫齐纵队、从狱中释放出来的祖基率领的乌迪内兵团。

在皮埃蒙特，人们早就群情激昂，急不可待，米兰起事的消息一传来，更是火上添油，一触即发。起义者要求查理援助，米兰的温和

分子也等待援助拯救共和国，最后人们终于战胜了查理·阿尔贝特的最后几次抵抗。3月23日，国王向伦巴第和威尼斯的人民宣告他的部队将伸出“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的援助之手”，相信上帝“给意大利派来了庇护九世”，并“使意大利有能力自行其是”；为表示意大利统一的感情，他的军队将头带三色旗的萨沃依盾形徽章。与此同时，皮埃蒙特政府从外交途径为干预的必要性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预防共和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已从两个方面露出了苗头。没有一个大国赞成战争，俄国坚决反对，中断同查理·阿尔贝特的关系。25日，皮埃蒙特的军队开始渡过提契诺河；4月10日左右，在戈伊托、蒙赞巴诺和瓦莱焦同奥军后卫交锋胜利后，渡过明秋河。但没有采取迅速行动，配以地方起义，压垮撤退中的奥军，防止奥军在四城防御区内重整人马。

4月7日，马志尼从流亡归来，到达米兰。为了不干扰战争的和谐，他放弃共和的宣传，表明接受萨沃依君主政体，只要后者公开采纳意大利统一的纲领。相反，卡塔内奥的共和立场坚定不移，他同另一位米兰人朱塞佩·费拉里（1811—1876年）——光辉的、敏锐的、芜杂的历史、政治、哲学作家，这次暂时从法国返回——主张联邦共和国。

在托斯卡纳，出于人民热情的压力，政府宣布战争，向伦巴第派遣少数正规军和较多的志愿兵，尤其是大学的学生。在教皇国，内阁召募志愿兵，在波洛尼亚组织一个正规作战部队，由焦万尼·杜兰多指挥；人民和杜兰多本人认为一切都应用于对奥战争。但庇护九世却意在用之于防卫，由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主持的内阁却不知所措。杜兰多率军渡过边界；这时教皇甚为担心其教会首脑的地位，担心针对他对德国天主教界的态度而开始发展起来的不无某种反罗马的分裂主义性质的抗议运动，于是，他在4月29日召开的枢机会议上明确宣称，他无意参战，他必须“以同样的父爱”拥抱“所有的人民和各民族”。这样，就开始澄清了新归尔甫运动的暧昧态度；民族运动的团结开始出现了缺口。5月1日教皇又发布一宣言，声称他无法阻止一部分属

民的民族热情（这一宣言确也减轻了一些前次讲话的后果）。由马米亚尼组成的新内阁准备把教皇的正规军和志愿兵置于查理·阿尔贝特的保护下，以便保证其作战的质量。

意大利其他君主亦甚担心查理·阿尔贝特会把他们吞掉或至少成为其霸主；这种担心又因如何同皮埃蒙特进行民族联盟的谈判而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在伦巴第的战争中发现查理·阿尔贝特在扩大地盘，而他毫无所获。他已向意大利北部派遣军队，由古列尔莫·佩佩统率；可是5月15日（见第114节），他又召回军队，只有佩佩率领的一小股人马到达威尼斯。

实际上，这些正规军和志愿兵给查理·阿尔贝特的增援很有限，而皮埃蒙特的指挥部也并不热心使用和加强这些志愿大军（其中，有一支是刚从南美回国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这支队伍为美洲各共和国战斗，受到极好的考验）。查理·阿尔贝特渡过明秋河后，原想挥军直进，可是高级指挥官反对（他们不理解伦巴第之外的目标），而军队无论是物资上还是精神上，都远远没做好临战的准备。于是，延误战机，使拉德茨基得以重整军队。拉德茨基也得到自由的奥地利的支持。德国的革命没有同其他各国人民相呼应，哈布斯堡王朝大部分是从各民族（意大利的、德国的、匈牙利的、斯拉夫的）运动的冲突中得以自救。渡过明秋河后，国王猛攻佩斯基埃拉，但二十天过去了，不见对方有什么动静；只是在4月20日，奥军在一次激战中被赶出帕斯特伦戈，于是，佩斯基埃拉同维罗纳分隔开。在圣卢恰向维罗纳方向发动的进攻没有进行到底，一无所获（5月6日）。努根特将军前来增援拉德茨基，在科尔努达打退了威尼托和罗马的军队（5月9日），接着佯攻维琴察，扫清通往维罗纳之路，22日到达维罗纳。于是，拉德茨基用急行军速度从维罗纳向佩斯基埃拉运动，一路顺利，在库尔塔托内和蒙塔纳拉攻击由五千托斯卡纳人组成的皮埃蒙特右翼。五千之众受到三万五千奥军的攻击，抵抗了六个小时（5月29日）。最后攻陷库尔塔托内，次日，奥军攻击查理·阿尔贝特集结于戈伊托的主力，但反被击败。当夜有消息传到战场上，说佩斯基埃拉投降，奥援

军失利，军队高呼查理·阿尔贝特为意大利国王。

事实上，查理·阿尔贝特似乎已成为至少是北部意大利的国王。5月29日，公民投票（违背许下的一切政治整顿待胜利后再说的诺言），表决将伦巴第、帕尔马、皮亚琴察和莫德纳同皮埃蒙特合并；6月4日，威尼托各省也举行同样的投票，尽管曼宁反对；所有的表决结果都是绝大多数赞成。可是战事并不符合这些表决。拉德茨基在戈伊托之后未受到皮埃蒙特人的攻击，他却猛攻维琴察，以确保可能向蒂罗尔退却。未得到援军的杜兰多，面对两倍于己的兵力，只得投降（6月11日）。其他奥军首先夺取了卡多雷的皮埃维，后夺取了卡多雷，尽管皮埃·福尔图纳托·卡尔维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样，整个威尼斯的大陆部分陷落。王家军队无所行动，一方面由于指挥官不果断，也由于很难攻击困守在四城防御区内的拉德茨基，于是开始引起人们不恰当地指责查理·阿尔贝特的背叛。

从4月起，奥地利指望利用英国的调解，提出伦巴第-威尼托自治，或者让出伦巴第。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支持成立一个在查理·阿尔贝特统治下的北意大利王国；参与调停的法国政府则左右摇摆，一种倾向反对成立毗邻的北意大利王国，另一种倾向要求成立传统的尼斯和萨沃依王国（皮埃蒙特断然反对）；庇护九世在5月派遣红衣主教莫里基尼朝见皇帝，以民族独立原则的名义请求他和平撤离意大利。查理·阿尔贝特倾向于以阿迪杰河为界；可是巴尔博内阁和接替他的卡萨蒂内阁不表赞成。于是，重开战事，拉德茨基得到奥的援军，因奥国内情况大为改善。他移兵维罗纳，攻击皮埃蒙特军队。经过三天的战斗（7月23—25日），皮埃蒙特人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虽然作战英勇，但仍被赶出库斯托扎高地，被迫向戈伊托撤退。

奥军占领沃尔塔之后，皮埃蒙特军队向奥里奥河退却，随后很快又撤到阿达河；可是，这第二条防线由于一位下级将领主动撤离至皮亚琴察，也被放弃。查理·阿尔贝特出于精神和政治原因随主力部队撤向米兰（害怕共和派在伦巴第首府占上风）。在后卫部队同猝至的拉德茨基发生不利的战斗后（8月4日），他屈服了，被迫重新渡过提

契诺河（8月5日）。米兰人认为国王背叛了自己，因国王曾宣布要在米兰进行抵抗，于是群起进攻国王所在的格雷皮宫，国王被一颗枪弹擦破了皮。深夜，他随部队撤离了城市。萨拉斯科将军于8月9日重新穿过边界，在维杰瓦诺签署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皮埃蒙特被迫放弃各公国和威尼斯。伦巴第-威尼托志愿军被解散。朱塞佩·加里波第同其志愿军一直在科马斯科抵抗到8月底，然后，在莫拉佐内冲突后（8月26日），避难于卢加诺。

库斯托扎战斗后，皮埃蒙特 伦巴第方面为寻求法国援助进行频繁的接触，而英法又提出调停计划，意欲只割让伦巴第；可是这时奥地利希望得到其全部占领地。沙皇尼古拉的支持和哈布斯堡政府于10月以武力征服维也纳城而得到巩固，都加强了它的地位。忠于王朝的克罗地亚人又打击了起义的匈牙利人。1848年12月，十八岁的侄子弗兰西斯·约瑟夫（1848—1916年在位）接替逊位的斐迪南一世。

114 内部危机和国外战争 诺瓦拉 围困罗马和威尼斯 奥地利和反动派的胜利

意大利诸国的内部形势极不稳定。温和分子、民主分子、共和分子吵成一团；地方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主张统一者不断发生冲突。反动分子在下面又四处活动，并得到农村各阶层的支持。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又迫使资产阶级向后倒退。在那不勒斯，自由分子希望对宪法做更民主的修改，一部分选出的议员不愿信守维持现存宪法的誓言；终于在1848年5月14日，更先进的自由分子开始筑街垒。可是翌日王国军队驱散闹事者，造成重大的流血事件。北方意大利军队被召回，议会被解散，指示举行新的选举。7月召开新议会，后又延期举行。西西里坚持其分裂主义立场，7月11日将王冠奉献给热那亚公爵查理·阿尔贝特之子斐迪南，但他不接受。

在罗马，教皇和自由分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误解，前者不要战争，要拥有对一切最高的领导权，后者要战争，要真正的立宪政府。马米亚尼内阁（曾于6月召开议会）和法布里内阁之后，看

来教皇已物色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佩莱格里诺·罗西为其内阁大臣，他曾任奥尔良君主政体的罗马代表，一个相当强有力的人物。他认为对奥战争是不可能的，因而拒绝签订皮埃蒙特要求的军事条约；尽管希望同其他国家达成协定，但因害怕皮埃蒙特而反对建立意大利邦联。11 月 15 日，在他前去参加议会开幕式时，在大臣官邸的大楼梯上遇刺。16 日，在奎里纳莱宫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同部队发生了冲突。教皇被迫召唤两名思想激进的人斯泰尔比尼和加莱蒂进入政权；可是 11 月 24 日，他化装从罗马逃至加埃塔，任命一个政府委员会以取代内阁，并延期召开议会。然而议会也任命了一个政府委员会，主持选举立宪会议。选举（庇护九世宣布为无效）产生了共和国议会，议会于 1849 年 2 月 9 日宣布“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废除教皇的一切俗权，宣布罗马共和国成立，但又宣布教皇在精神权利的独立性方面享有一切必要的保障。议会在其内部选出一个由阿尔梅利尼、萨利切蒂和蒙泰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托斯卡纳也发生了某些类似事件：随着温和分子逐渐丧失对局势的控制，民主分子必然势力大增。1848 年 10 月 27 日，民主分子步入政权，组成蒙塔内利-圭拉齐内阁，并想向罗马立宪会议派遣代表，把它变为意大利的立宪会议。这时大公放弃佛罗伦萨，从圣斯特法诺乘船前往加埃塔（2 月 21 日）。于是圭拉齐、蒙塔内利和曼佐尼三人联盟的临时政府成立。

在皮埃蒙特，继巴尔博后，是卡萨蒂和雷韦尔的为期极短而又极其脆弱的内阁，然后入主内阁的是由民主动乱所支持的焦贝蒂（1848 年 12 月）。可是他日益疏远民主派，一心一意加强其政府权力。他计划远征托斯卡纳，辅佐大公，疏远奥地利。可是他被同僚和国王抛弃，不得不辞职（1849 年 2 月）。其留在政府中的同僚——其中乌尔巴诺·拉塔齐代表左倾——决定重开战事，废除停战协定（3 月 12 日）。由于奥地利的极力阻挠和强硬态度，英法调停终被搁置。

王家将军屡遭失败后，军队首脑委任给一位外国人，波兰人阿尔贝特·赫扎努夫斯基，但他的战绩并不比其前任好。皮埃蒙特人有十

二万之众，但大部分是新兵和纪律松弛的志愿兵，军官又极其厌战，布防于马焦雷湖到波河的漫长战线。拉德茨基调动其集结于帕维亚附近的善战的十万部队迎击之。3 月 20 日，拉德茨基渡过提契诺河到达拉卡瓦，该地因 1834 年的革命者拉莫里诺将军违命而未予占领。21 日早上，一支奥部队在斯福尔泽斯卡被击退，可是下午另一支部队占领了莫尔塔拉。3 月 23 日，集结于诺瓦拉的五万皮埃蒙特人于比科卡受到奥地利人阿斯普雷以劣势军力的攻击，他四次得而复失比科卡。萨沃依公爵和热那亚公爵使他陷于困境，并准备作最后的攻击。但他们没有得到赫扎努夫斯基支援。奥地利人得到重兵援助后，下午一举击退皮埃蒙特人，晚上占领了整个阵地。

查理·阿尔贝特决心作一死战，却无济于事，于是，要求停战；可是拉德茨基提出令他难以接受的要求，当晚他逊位，以支持萨沃依公爵，次日离开皮埃蒙特前往葡萄牙的波尔图，7 月 28 日死于该地。萨沃依公爵接替王位，取名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之后缔结了《维尼亚莱停战协定》，规定他应使军队处于和平状态，解散志愿兵，允许一支两万人的奥地利兵团占据领土的一部分，直到缔结和约。

诺瓦拉战役在托斯卡纳立即引起了反响，温和分子为了防止奥地利的干预，4 月 12 日，推翻了圭拉齐（自 3 月 28 日起的独裁者），建立政府委员会（里卡索利、卡波尼），委员会邀请大公重新执政。可是阿斯普雷并未止步，先占领卢卡，后战胜里窝那的抵抗（5 月 10 日—11 日），25 日进入佛罗伦萨。

诺瓦拉后，国王斐迪南也决心平息西西里的起义。自 1840 年 9 月起再度占领墨西拿的波旁军队，于卡塔尼亚击败了西西里的抵抗（4 月），5 月 11 日迫使巴勒莫投诚。

在罗马，共和国除了受到奥地利胜利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外，也受到法国干预的威胁，因而任命了由阿尔梅利尼、萨菲和马志尼组成的拥有绝对权力的三头执政（3 月 29 日）。庇护九世从加埃塔求助天主教列强，他的大臣安东内利红衣主教建议奥地利、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法国集体占领教皇国。前面三大强国一口答应；而法国立宪议会分

成两派，一派仇视奥地利（路易·拿破仑就靠此于1848年普选中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他要求对奥宣战），一派支持受相当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欢迎的教皇俗权，拿破仑本人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实现其野心。最后含含糊糊地授权政府占领意大利的某些地点。于是，政府决定占领奇维塔韦基亚，1849年4月25日由乌迪诺将军率领远征队在该地登陆。不管怎么说，这是对奥地利的一种牵制，就像路易·菲利普占领安科纳一样。

为了保卫罗马，意大利各地方的志愿军，首先是由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的意大利兵团聚集罗马。莫拉佐内战斗后，他前往利古里亚，即进入了教皇国，又组织了新的志愿兵团。4月30日，法国人从贾尼科洛方面攻城，遭到抵抗，经过一天的激战，大败，加里波第是这次战斗的主要英雄。随之而来的是停战和和谈。与此同时，一支那不勒斯的军队向共和国领土推进，在韦莱特里（5月19日）也遭加里波第的打击。其时，奥地利人占领了波洛尼亚（5月16日）。稍后，经过二十七天的抵抗，安科纳被攻陷（6月10日）。5月31日，法国外交官戴·莱塞普斯同共和国政府签订协定，但乌迪诺声称他不批准，扬言6月4日将向要塞发起新的进攻。可是6月3日黎明，乌迪诺突然向贾尼科洛各阵地发动进攻，借口这些阵地处在要塞之外。尽管向优势的敌人作了顽强的抵抗，科尔西尼村还是被占领了（6月4日）；瓦谢洛村则不然，攻击者只能作正规的包围和炮轰。最后，6月29日，美第奇被迫撤离化为废墟的瓦谢洛村；30日，斯帕达村也被占领。经过短兵相接的搏斗后，卢恰诺·马纳拉及其伦巴第的志愿军全部战死，再也不能抵抗了。7月4日，法国人占领了罗马城市。自7月2日起，加里波第率领一部分志愿军开始了一次难忘的撤退，躲开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一直撤到圣马力诺。他解散了他的兵团，经过传奇式的波折——在拉文纳松林妻子阿尼塔病故，她是在美洲同他结婚的，伴随他出生入死，完成了一系列英雄业绩——终于到达利古里亚，摆脱了危险。

在布雷西亚和威尼斯，意大利人民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查

理·阿尔贝特和奥地利人间重开战事期间起事的布雷西亚坚持抵抗了十天之久，抗击了努根特和海瑙的部队（9月23日—4月1日），海瑙被迫进行巷战，从这次绝望的斗争中布雷西亚得了个“意大利狮城”的名字。5月初，轮到了威尼斯，抵抗的策动者是独裁者曼宁（4月2日）。经过二十二天的苦战后，极为重要的阵地，陆地上的马尔盖拉要塞被迫放弃，变成了一片废墟（5月4—26日）。然而威尼斯仍在抗击轰炸、饥饿、瘟疫，直到8月23日，才签订投降书，被允许守卫部队带着武器光荣出城和全面大赦，只有四十来个市民被流放，其中有曼宁、托马塞奥、古列尔莫·佩佩。

在维尼亚莱停战的基础上，皮埃蒙特和奥地利之间签订了《米兰和约》（1849年8月6日），根据和约，皮埃蒙特赔款七千五百万。和平条约提交议会后，遭到前不久才选出来的众议院的强烈反对。国王按照首相马西莫·达泽利奥的建议决定解散议会，并向全国发表了蒙卡利埃里公告（11月20日），威胁进行政变。1850年1月9日，新议会通过了条约。

第十九章　统一国家的形成

115　1849—1859 年的意大利

表面上，除了皮埃蒙特外，意大利又回复到 1848 年前的状态。奥地利借助俄国的帮助于 1849 年扑灭了匈牙利的革命；1850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又完全恢复了其霸权地位；看起来它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然而，新精神在意大利未被窒息：马志尼先在瑞士，后在伦敦又不知疲倦地从事宣传活动；在皮埃蒙特，各立宪机构发挥着作用，三色旗又高高地飘扬起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在那里住下的流亡爱国者形成了促进自由和民族希望的强大核心。

诺瓦拉战役后，伦巴第-威尼托仍受军政总督拉德茨基的独裁统治。革命组织并未因此而在该地区绝迹，为首的是马志尼同萨菲、蒙泰基等人在伦敦建立的意大利民族委员会，一开始这个革命组织就具有广泛的集中性。审讯和判处司空见惯，尤其针对反奥印刷品和由伦敦委员会发行的旨在为革命活动收集基金的民族借贷卡的握有者。正是由于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借贷卡，才开始了对曼图瓦革命委员会主席唐·恩里科·塔佐利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曼图瓦审讯，结果有九人在贝尔菲奥雷的要塞前被处以极刑（1852 年 12 月至 1853 年 3 月，殉难者中有塔佐利、布雷西亚十天保卫战的英雄蒂托·斯佩里、总司铎格

拉齐奥利)。马志尼在米兰的革命尝试于1853年2月6日全面失败;皮耶·福尔图纳托·卡尔维(见第113节)在威尼托搞的起义活动,其结局也不妙;卡尔维被捕后,于1855年7月4日在曼图瓦被吊死。

各公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附属于奥地利——重新签订战争前夕同奥签订的协定,缔结关税联盟——,但在内部却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的或马志尼的反对派核心。在帕尔马,公爵查理三世(1849—1854年在位)继承逊位的父亲查理二世,但他个人行为古怪不端,使臣民大为不悦,结果被人刺死,刺杀动机究竟是出于政治仇恨,抑或私人报复,尚不清楚。年幼的罗伯托继承父位,母亲贝里的路易莎·玛丽娅(法国波旁王位的觊觎者,尚博尔伯爵的姐妹)摄政。在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六世因奥地利人一直逗留到1855年,终于疏远温和分子,致使其宝座在民众中失去牢固的基础。宪法被中止,最后(1852年5月)被取消。与教廷签订协定(1851年4月),标志着放弃利奥波德传统,甚至走到应罗马的要求停止印刷穆拉托里作品的地步。

庇护九世只是在1850年4月才返回罗马。早先(1849年9月),在波蒂奇他发布了自动诏书,允诺成立国家咨询院、省和市政议会,改革法典,可是并未付诸实行。路易·拿破仑曾建议做重大改革,然而法国新立法议会的保守派多数是不支持的,他也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革在神权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国占领罗马,奥地利占领罗马涅,都引起人民的仇恨。国务卿安东内利极力在两个强权间巧施手腕,机灵从事,他不太相信法国。

在那不勒斯,斐迪南二世事实上废止了宪法,实行更全面的独裁统治。对"意大利统一"协会会员和5月15日事件搞了两起大审讯,1851年1月和1852年10月宣布判决:卡洛·波埃里奥、路易吉·塞滕布里尼、西尔维奥·斯帕文塔被判处终身或有期徒刑。波旁的恶劣统治引起了英国杰出人士威廉·格莱斯顿的愤怒,就此,他发表了著名的两封信,揭露那不勒斯政府是"对上帝的否定"。

在皮埃蒙特,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49－1878年在位)是一位强有力和倾向于个人统治(他受过严格的独裁教育,反对政治-立宪

观念）的君主，经过起初的犹豫不决后，着手其意大利独立自由事业，如今这一事业就成了这个王朝的命运所系。那时，自然不能设想同奥开战，最好是采取适当的内部改革来振兴国家。第一批改革的目标是教会。1850 年 4 月的《西卡尔迪法》（该法来自司法大臣其名）取消了教会法庭和庇护权，这引起了梵蒂冈的抗议。随后，同都灵大主教弗朗佐尼发生冲突，大主教被捕和放逐。在讨论该法时，议员卡米洛·本索·加富尔伯爵（生于 1810 年）阐述了政府的新原则，这一原则表明立宪机构具有进步性，能吸引最进步的分子到其轨道上来。稍后，他被达泽利奥召到内阁，任农业大臣。他能力非凡，成绩斐然，遂被任命为财政大臣（1850—1852 年）。他同法国和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其目的在于同这两个国家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他愈益倾向于自由左派。后退出达泽利奥内阁（1852 年 5 月），达泽利奥引退，他被召请组阁，在中左派乌尔巴诺·拉塔齐的支持下，组成新内阁（1852 年 11 月 4 日，联合内阁）。一段时间后，乌尔巴诺担任司法大臣，后为内政大臣。有时，加富尔也兼任财政和外交大臣。从这时起，他开始频繁的活动和不知疲倦的努力，追求实现其广泛的政治计划。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思想敏锐，头脑清醒，处事公允；他见机行事，灵活多变，足智多谋，成竹在胸，善于利用一切机缘，善于应付任何环境；他坚定不移信守自由和议会体制。

在内政方面，他全力以赴推行他当议员时阐述的政策。通过 1855 年 5 月法，宣布取消（也即取消修会的法人资格）所有不传教、不教育和不援助病人的修会，并取消一部分缔约条款和采邑，用征用来的钱物建立“教会基金会”。这一法律引起了天主教徒和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十分虔诚于传统宗教信仰的国王本人，对此心中不悦，欲撤加富尔之职。教皇谴责该法，对负有责任的人处以绝罚，肇皮埃蒙特和罗马宫廷冲突之端。

关于意大利人的企望，加富尔慎重而机警地相机行事。他让自由分子知道，必须将其希望寄托于皮埃蒙特，但同时，又避免惊动奥地利。他保卫移民，但也将那些牵连很重而又爱捣蛋的人驱赶出去。可

是1853年2月6日事件后，奥地利政府籍没移民的财产，也抄没那些已经变为撒丁臣民的人的财产，对此，加富尔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议会赞成拨出一部分经费援救这些移民。冲突的结果，是断绝外交关系。法国和英国表示支持皮埃蒙特。

加富尔深知，皮埃蒙特单枪匹马不可能战胜奥地利；他用尖锐而冷静的眼光看到民主和人民起义仍有困难和危险。于是，他力求让皮埃蒙特来领导这场意大利的民族运动，至少达到建立北部意大利王国。而且，他明白，这场运动的主动权只有掌握在政府手里，才能保存君主的政体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在他看来，意大利的统一是一种超出目前现实的设想。他的政策和马志尼的政策之间的冲突日深。就在2月6日后，马志尼仍在搞他的宣传，激起了卢尼贾纳那场失败的动乱。这两人之间也存在着私怨。

他们之间不和的焦点是，加富尔主要依赖外国独裁君主路易·拿破仑的友谊。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宣布新的极权宪法，一年后，恢复有利于他的拿破仑帝国，自称拿破仑三世。新君主从年轻时起，一直对意大利民族事业抱有同情，他按照拿破仑传统特别反对奥地利和《维也纳条约》。

为了实现加富尔和拿破仑的企望，必须改变国际局势，打破北方三大强国的专制集团。1854年3月以俄国为一方，法英与土耳其的结盟为另一方，就东方问题所爆发的战争，打开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通路。战争称为“克里米亚战争”，因为西方强国是在黑海的这个半岛上进行这场战争的。它们寻求奥地利的支援。奥对俄国已采取敌对态度，占领多瑙河的一些公国，可并不参战。为了促使奥参战，法英认为必须保证奥在意大利侧翼的安全，因此向皮埃蒙特施加压力，逼它参战。意大利绝大多数的爱国舆论不理解，为什么要到远方去为一场非意大利事业搏斗，为一条亲奥政策而战。马志尼对皮埃蒙特的参战最为仇视。相反，加富尔从中看到皮埃蒙特有可能进入欧洲政治角逐并与西方大国结盟，因而极力顺从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的乐意派兵远征以重振皮埃蒙特军威的心愿，从而避免自己被右翼政府所替代。1855年

1月26日缔结了联盟条约后，向克里米亚派遣了一万五千士兵；8月16日，这支部队在切尔纳亚战斗中表现出色。9月，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于是奥地利更公开地仇视俄国。次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年3月接替其父尼古拉一世）打算议和，1856年2月底在巴黎召开大会以确定和约内容。

由加富尔代表的皮埃蒙特——尽管奥地利反对——同各大国一起参加了巴黎大会。加富尔利用一切机会谈及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处境，就是这些处境造成持续不断革命的危险，而皮埃蒙特的情况极为不同；他赢得了俄国的支持，俄国对忘恩负义的奥地利怨恨颇多。4月8日，法国代表瓦莱夫斯基总结大会工作时，提及意大利的境况，激起了奥地利的抗议，得到了英国的赞同。后来，加富尔提交给英法代表一项备忘录，不久以后，这两个大国向那不勒斯国王就其治理方式提出严重警告，由于国王驳回这种干预，英法断绝了同那不勒斯的外交关系（1856年10月）。事实是，意大利问题首次提交欧洲，从而提高了撒丁王国及其内阁的威望和争取了民心，尽管没有产生立刻的实际效果。在随后几年的大会上，首先是由于巴尔干国家的对立，英国有些疏远巴黎和都灵，靠近奥地利；然而法国、皮埃蒙特和俄国（决意报复奥的忘恩负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自由分子如今越来越会聚在萨沃依王朝，其中有许多与朱塞佩·马志尼不和的共和分子。马志尼却更怀疑加富尔的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对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十分危险。他的眼睛盯住那不勒斯王国，那儿正形成一个支持若阿香·缪拉的运动，当然这个运动指望拿破仑的支援。1857年马志尼来到热那亚，隐蔽起来，准备对王国发动一次由那不勒斯爱国者卡洛·皮萨卡内领导的征伐。为了保证征伐有一个基地，他在热那亚搞了一次起义（6月29日），起义以失败告终。皮萨卡内的远征队在萨普里附近的萨勒诺海岸登陆，被波旁人和当地居民摧毁（6—7月）。皮萨卡内被击败，自杀身死。咒骂马志尼的声浪四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其中数加富尔的怨声最响亮，因为他承受着拿破仑政府抱怨的巨大压力；他扬言要在热那亚的阿夸索拉

广场绞死这个发难者（现在广场上仍竖立着他的纪念碑）。然而，皮萨卡内的牺牲震动了缪拉运动，加强了运动的团结，马志尼的坚持不懈的行动刺痛了加富尔，也为拿破仑三世决定支持意大利事业起了不少作用。在持不同见解的共和分子中，首先是、主要是丹尼尔·曼宁，他在1857年8月1日建立了“民族联盟”，制定了萨沃依王朝下的统一君主政体纲领。一个月后，他去世。这一联盟十分幸运，加里波第担任副主席，联盟得到迅速发展。秘书、西西里流亡者朱塞佩·拉法里纳对该组织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在1856年9月曾与加富尔做过极其机密的谈话。从此，加富尔私下支持这一联盟的计划，公开表明他个人忠诚于以罗马作为首都的意大利统一。所以他保护民族联盟，同其有着秘密接触。联邦主义的共和分子（费拉里、卡塔内奥）袖手旁观，他们既反对马志尼的统一主义，也反对君主政体，坚持在地区自治基础上重建意大利。

116　1859年战争及吞并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

拿破仑三世的决定是在共和分子费利切·奥尔西尼（那时与马志尼已破裂）谋刺（1858年1月14日）失败后做出的。皇帝大发雷霆，指责皮埃蒙特无力阻止马志尼的阴谋；皮埃蒙特政府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尽量做一些赔礼道歉。同时，拿破仑三世允许奥尔西尼的辩护律师向法庭宣读奥尔西尼敦促皇帝解放意大利的信。皇帝邀请加富尔伯爵参加普隆比埃尔召开的秘密会议（1858年7月20—21日）。会上确定，一旦皮埃蒙特受到奥地利的攻击，法国将支持皮埃蒙特；应想方设法挑起奥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将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建立一个在维克托·伊曼纽尔治理下的北方意大利王国（至伊松佐河，包括各公国和罗马涅）。另一方面，法国将得到梦寐以求的尼斯和萨沃依两地。然后建立由教皇主持的三王国邦联，而拉齐奥仍留在教皇手中。总之，拿破仑打算建立北部意大利王国以削弱奥地利，进而建立一个邦联，他指望通过它来确立他的权势，并为法国谋取领土好处。此外，拿破仑三世还为其堂弟杰罗拉莫·波拿巴向维克托·伊曼纽尔之女克

洛蒂尔德公主求婚。

很快，一场动乱在意大利开始蔓延。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元旦招待会上对奥地利大使说："我很痛心我们和你们政府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良好。"这句话使动乱更为高涨。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在议会开幕式上（1月10日）的话（配合拿破仑三世）使动乱更为炽热，他说："我们是遵守条约的，但我们对来自意大利四面八方的痛苦呼喊不能无动于衷。"1月底，签订法国和皮埃蒙特联盟条约；同时，杰罗拉莫·拿破仑与萨沃依的克洛蒂尔德举行婚典（1月30日）。这时，志愿兵加入正规军，稍后任命加里波第为撒丁军队将军并为组建阿尔卑斯山轻骑兵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德比-迪斯累里保守党内阁害怕奥地利失败使法俄壮大，因而提出调停建议，但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拒绝调停，要求召开大会。可是奥地利企图排斥皮埃蒙特，逼它立即裁军。英国希望以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建议普遍裁军；加富尔不得不接受（4月21日）。但谈判遇到各种阻碍，终于，奥地利向皮埃蒙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单方面裁军（4月23日）。最后通牒遭拒绝（4月26日）。终于酿成战争。

基乌莱指挥的奥军渡过提契诺河（4月29日），企图在法国援军到来之前一举压垮皮埃蒙特；但奥军行动迟缓，战线拉得过长而延误了时日。这时，拿破仑三世亲率十万法国大军赶到，他宣称（5月3日）打算解放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并由他亲自担任联军统帅。法-撒丁军队于蒙泰贝洛（5月20日）和帕莱斯特罗（5月30—31日）大败仍在阻击伪装向皮亚琴察运动之敌的奥军，同时联军主力却在更北的地方渡过提契诺河。基乌莱终于发现敌人的迂回战术，于是拒敌于马真塔（6月4日），展开了一场大战；麦克马洪的到来决定了联军的胜利。这样扫清了通往米兰的道路。两位君主于6月8日在人民的欢呼中进入米兰。奥军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有秩序地向四城防御区撤退。这支后卫部队在梅莱尼亚诺的一场血战中被击垮。与此同时，加里波第率领阿尔卑斯山轻骑兵在联军左翼作战，重创乌尔班元帅，将他赶出瓦雷塞和圣费尔莫（5月26日和27日），从而占领科莫、马真

塔、贝尔加莫和布雷西亚。

战争和联军的节节胜利使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政府相继倒台。在托斯卡纳，大公（拒绝加富尔提出的结盟）对于敌对性的爱国游行示威未做任何抗拒，于4月27日放弃佛罗伦萨和大公国。临时政府成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同意给托斯卡纳以保护，任命内阁，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是贝蒂诺·里卡索利。他不遗余力地坚决反对复辟阴谋或建立在杰洛拉莫统治下的自主王国的阴谋。杰洛拉莫已于5月23日率法国的一支军队在里窝那登陆。4月27日，马萨和卡拉拉先后揭竿而起；马真塔失陷后，弗朗切斯科五世逃至曼图瓦。一个临时政府宣布莫德纳并入皮埃蒙特，维克托·伊曼纽尔接受这一合并，废黜派兵援助奥地利的君王。稍后，任命路易吉·卡洛·法里尼为其总督。也由于马真塔的胜利，帕尔马女公爵决定出走，公国宣布并入皮埃蒙特。奥地利人撤出皮亚琴察和罗马涅；6月12日，波洛尼亚的民族联邦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迫使特使红衣主教米莱西离开城市。一个政府委员会成立，并将绝对统治权献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但他当时未做明确的回答。6月14日，佩鲁贾也建立了临时政府，可是20日城市又被教皇的瑞士卫队夺回，城市遭洗劫，手无寸铁的居民遭屠杀。加富尔和自由党人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激起人民仇视教皇政府，而拿破仑三世却宣布反对翁布里亚和马尔凯的反教皇动乱。翁布里亚和马尔凯的其他动乱也遭镇压。

意大利中部这些运动的命运自然取决于那场战争的命运。奥军于四城防卫区重振旗鼓，弗兰西斯·约瑟夫亲任司令，赫斯将军任总参谋长。奥军重渡明秋河，占领索尔费里诺和圣马尔蒂诺高地。法-皮埃蒙特军队进而攻击之；经过一场血战，法国人占领了索尔费里诺这个奥军关键阵地，皮埃蒙特人占领了圣马尔蒂诺（6月24日）。至此，因种种原因，拿破仑滞留不前；这场战争在法国广大舆论中（尤其是天主教舆论中）不得人心，普鲁士和德意志邦联反对，俄国对中部意大利革命不支持。拿破仑向弗兰西斯·约瑟夫提议停战，两个皇帝签订维拉弗兰卡预备性条款（7月11日）。根据条款，伦巴第割让给拿

破仑三世，他又将它转给撒丁国王；威尼斯连同曼图瓦和佩斯基埃拉仍属奥地利，通过这片领土，奥地利将参加教皇主持下的意大利各国邦联；托斯卡纳和莫德纳君主将恢复职位，然而没有谈到如何恢复。

维拉弗兰卡预备性条款在意大利激起了一股愤怒的风暴，摧毁了拿破仑三世所取得的大部分有利条件，重又提高了马志尼的威信。他早就预言要签订新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这时，他来到意大利中部，全力开展统一行动。加富尔在一段时间内同意马志尼的看法：他放弃政府职权，保持活动自由，使有关中部意大利的协定全部失效。皮埃蒙特特派员离开公国、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同皮埃蒙特的实际协定仍有效，各临时政府的首脑（法里尼担任公国首脑，莱奥内托·奇普里亚尼担任罗马涅首脑，里卡索利担任托斯卡纳首脑）召集立宪会议，投票通过并入维克托·伊曼纽尔王国（8、9月）。托斯卡纳、罗马涅、莫德纳和帕尔马建立军事联盟，曼弗雷多·范蒂为军队司令，加里波第在其手下任将领。11月10日签订《苏黎世和约》，确认《维拉弗兰卡条约》，关于被废黜的君主之权力将由大会做最后决定。皮埃蒙特既未在保留条款上签字，也没有在关于召开大会条款上签字，故大会告吹。罗马涅合并于法里尼绝对统治下的公国。皮埃蒙特政府虽然不接受四个议会做出的有关欧金尼奥·迪卡里尼亚诺亲王为摄政的任命，但仍以他的名义派遣卡洛·邦孔帕尼担负近乎代理长官之职。拿破仑三世信守他的使奥瘫痪的非武装干预的政策。现在，英国的立场有利于意大利事业，因以帕麦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人替代了保守党人（1859年6月）。外交大臣罗索奉行亲意方针，这也是为了使意大利摆脱法国的保护。然而，这时，法英之间又重新接近。1860年1月21日，加富尔重握权柄，从而能着手解决中部意大利问题。在拿破仑三世的同意下，各省（包括托斯卡纳，迄今为止皇帝仍坚持托斯卡纳与皮埃蒙特分开）举行公民投票，一种亲皇帝的表示——其权力形式上来源于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差不多一致赞成统一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及其王室后裔的立宪君主政体（3月11日和12日）。作为补

偿，皮埃蒙特将萨沃依和尼斯——维拉弗兰卡后再没有提起它们，因为拿破仑不遵守《普隆比埃尔条约》——割让给法国（3月24日），然而这一割让是在4月15日举行公民投票后才生效的。同时，这一割让却搅乱了法英协议。教皇对那些占据其领土的侵犯者以绝罚，并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军队，法国正统王权拥护者纷纷加入这支队伍，12月2日的流亡者拉莫西埃将军为该军司令。

117 千人团出征和意大利王国的建立

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在伦巴第战争时去世（1859年5月22日），其子弗兰西斯二世继承王位，他是个软弱而毫无经验的青年。加富尔邀请他参加对奥战争，然后利用他的否定的回答使他在自由分子中间声名扫地。西西里举行起义：第一次起义于4月4日在巴勒莫的甘奇亚修道院爆发，两天后在墨西拿又发生了一次；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然后，以罗萨利诺·皮洛为核心形成了一些武装集团。在热那亚，西西里流亡者，主要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在民族联盟的帮助下，着手准备一次远征以支持和扩大起义。这一远征的前后，马志尼总是在做着不疲倦的活动。国王和加富尔听之任之。由加里波第指挥的一千多名志愿兵远征队于5月6日黎明从热那亚附近的夸尔托礁出发，分乘鲁巴蒂诺公司的“伦巴第”号和“皮埃蒙特”号两艘汽船。5月11日，在马尔萨拉登陆，加里波第率军向内地进发；14日，攻下萨莱米，任独裁官，呼出“意大利-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口号；15日，于卡拉塔菲米战胜波旁人。他的队伍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西西里志愿兵“小伙子”加入进来，热情高涨，声望日增。他佯装向科尔莱奥内运动，摆脱波旁人，实际向巴勒莫挺进。27日，经过一番酷战，开进该城。城市很快布满路障，被击败的皇家军队，在切断了其同那不勒斯的联系后，30日，要求停战二十四小时，后又加以延长，6月6日终于签订停战条约，兰扎将军被迫撤离城市和西西里岛。加里波第为政府建立了一个国务处，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克里斯皮；他又征募新的“小伙子”，从意大利北方又调来新的远征军，实力大为

扩大。他占领了除墨西拿外的整个岛屿。7月20日于米拉佐再次大败波旁人。最后，波旁人也从墨西拿（除城堡之外）撤出。

在那不勒斯，弗兰西斯二世决定宣布宪章（6月25日），同意皮埃蒙特的要求，在拿破仑三世的建议下接受同皮埃蒙特谈判。加富尔故意拖延谈判的时间，却继续监视加里波第，同时设法让那不勒斯在他抵达之前起义，限制他的影响，扩大撒丁国家的影响。然而，加富尔未能如愿。8月20日，加里波第渡过海峡，开始向大陆胜利进军，人民夹道相迎，欢欣鼓舞，波旁军队士气低落，闻风丧胆，军官同情革命事业，不做抵抗便四散溃逃或缴械投降。内政大臣利博里奥·罗马诺说服弗兰西斯二世撤到加埃塔，邀请加里波第进入首都，这发生在9月7日。英国劝告拿破仑三世不要干预加里波第离开西西里征讨大陆。

独裁官尽管仍忠实于统一王国的理想，但宣称他想在罗马坎皮多利奥市政厅宣布之，并把合并推迟到那时。他起用安东尼奥·莫尔迪尼为西西里副独裁官，替换赞成立即合并的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为控制加里波第运动，加富尔制订了一年前由马志尼设计和支持的计划：即通过翁布里亚和马尔凯向那不勒斯地区征伐。他向拿破仑表明必须阻止加里波第向罗马进军逼迫拿破仑许诺容忍既成事实，并做出尽快行事的建议。在这些地区的各城市所出现的混乱便成了进行干预的外交理由。维克托·伊曼纽尔在致远征军的一项公告中声称要恢复意大利秩序和拯救欧洲于革命的危险中，重申尊重“教廷”，准备“与盟国和友国配合一致”来保障教廷的独立。晓谕教皇政府解散拉莫西埃的军队；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前，由凡蒂最高司令部统率的德拉罗卡将军和恰尔迪尼将军的两个军已于9月11日越过边境，分别占领翁布里亚和马尔凯。在奥西莫和洛雷托之间的卡斯泰菲达尔多，恰尔迪尼大败拉莫西埃率领的大半由外国人组成的教皇军队（9月18日）。14日，佩鲁贾被占，29日，在佩尔萨诺指挥的撒丁舰队炮轰下，安科纳投降。随后举行关于与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立宪君主政体合并的公民投票。

这时，波旁军队孤注一掷，在沃尔土诺河畔袭击加里波第军队，一场酷战后，被击败（10 月 1 日）。之后不久，维克托·伊曼纽尔就向那不勒斯地区挺进；行动之前他先发表了一个公告，重申希望恢复秩序，结束意大利的革命时代（10 月 9 日）。10 月 21 日，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两地举行公民投票。26 日，加里波第在泰亚诺晋谒维克托·伊曼纽尔，向意大利国王致意，11 月 7 日陪同他进驻那不勒斯，9 日乘船去卡普雷拉。马志尼（他也来到那不勒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来决定意大利新的组织形式的思想，因没有得到加里波第的支持而失败。王国军队攻陷加埃塔（1861 年 2 月 13 日）后战争结束，弗兰西斯二世撤到罗马。

除直接有关的君主外，还有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法国纷纷抗议皮埃蒙特的所作所为。可是加富尔的政策是有远见的，也是有点大胆的；他熟悉国际局势。奥地利本想攻击皮埃蒙特；可是沙皇不保证取中立政策，在华沙会议上（1860 年 10 月）劝止了弗兰西斯·约瑟夫采取行动，此外，弗兰西斯·约瑟夫还要处理匈牙利问题。英国的帕麦斯顿-罗索政府在一篇著名的外交通报中声称各国人民有自决权利，劝告拿破仑三世将阻碍封锁加埃塔的法国分舰队撤走。

2 月 18 日，在都灵召开新议会，可以说是真正的意大利议会。制定了只有一条条文的法律："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为自己、为其后裔领取意大利国王之头衔。"2 月 28 日，此法律为参议院通过，3 月 14 日众议院通过，17 日国王批准，他自称"上帝和民族意愿之光的意大利国王"，这样他把君主政体传统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融为一体。为了表明君主立宪政体的继续，他仍称呼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而不是一世，而许多人希望他改用一世，因他这时是代表民族意愿的意大利国王，而不再是按王朝家系排列的萨沃依国王。加富尔利用议会辩论重申意大利真正的首都：是罗马，为了取得罗马，必须说服法国撤走其军队，说服教皇和整个天主教界接受除俗权外的其他保证，保证其内阁行动自由。3 月 27 日，辩论结束，投票同意"罗马，全国舆论呼唤的首都，意大利联合起来吧"的议案。

为达此目的，加富尔忘我地工作，一方面力求法国撤军，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同教皇商讨。同教皇政府的谈判尝试是由帕萨利亚神父和潘塔莱奥尼代表加富尔进行的。加富尔的计划是，教皇放弃俗权，根据“自由国家自由教会”的原则，教会在教会事务上获得充分自由。根据这一原则他也期待着天主教社会的革新。谈判搁浅，国务卿安东内利甚至试图挑起天主教大国的干预以支持教皇的俗权。这时，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溘然长逝（6月6日），时年尚轻，他的死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重大损失。

118　威尼斯和罗马

里卡索利入主的新内阁面临着一大堆乱如麻的难题。必须从根本上治理新国家，扭转财政局面，研究罗马和威尼斯问题，扼制“行动党”的急躁情绪——他们也想在政府之外采取行动——，同时，又要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然而，里卡索利及其继承人几乎完全属于加富尔派右翼（即属于从“政治联合”中产生的、并联合并入地区的自由-保皇分子领导人而扩大自己实力的那一派），他们准备大胆地采取行动，并坚韧不拔地继续下去。内政大臣明盖蒂早在加富尔时代就提出地区适当分权的行政计划；然而计划全部落空，从那时起集权倾向抬头。南方问题与分权问题有联系，因为许多南方人认为，为皮埃蒙特和北部意大利制定的法律不适合于南方，他们希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地区自治。不满情绪的结果扩大了由波旁军队的游卒剩勇（军队解散）组成的并同匪徒结合在一起而壮大的匪帮队伍。这些南方的盗匪活动曾受到弗兰西斯二世的鼓励，在边境上也受到教皇政府的容忍，尽管意大利的将军们采用了各种极其严厉的手段，但要扫除干净，尚需若干年。国家收支赤字逾三亿里拉，同时又不得不拿出巨款应付必需的花费。法国和后来其他列强（奥地利除外）承认意大利王国有助于改善财政，重开外债。

里卡索利由于其严厉的立场，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击，也不为国王所喜欢，1862年3月被众议院议长拉塔齐所取代。拉塔齐好像十分

容忍行动党和加里波第在罗马和威尼斯所挑起的动乱，以至于在特伦蒂诺边境开始组织对奥征伐队；后来，他矛头一转，在萨尔尼科和帕拉佐洛逮捕了首批志愿兵核心（5月）。随之而来的是示威游行和加里波第的狂怒抗议，他跑到西西里开始召集志愿兵。虽然国王以8月3日的公告斥退了他，但他仍转战卡拉布里亚，并向罗马挺进。在阿斯普罗蒙泰与帕拉维奇尼上校的军队遭遇，一阵短促交火（8月29日）。加里波第脚髁骨受伤，后被囚禁于拉斯佩齐亚附近的瓦里尼亚诺。一次大赦，他及其朋友获得自由。拉塔齐内阁于12月辞职，取而代之的是法里尼内阁（法里尼随即染病），1863年3月明盖蒂入主内阁。

当时，加里波第和行动党（起初，其组织机构是许多委员会和协会，其后是解放会社，现在是统一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人利用在俄国、波兰发生起义之机同匈牙利和波兰就反奥起义事宜谈判。内阁和国王不甘落后；国王也同马志尼就反奥行动进行联系，但毫无结果。相反，同法国政府的谈判结果是签订"九月协定"（1864年9月15日），根据协定，意大利承诺不进犯教皇国，也不让别人进犯教皇国，而法国随着教皇国组建起自己的军队而撤出其军队，最长期限为两年。还有一项秘密条款，规定要实现协定，意大利应将首都从都灵迁移到佛罗伦萨。事件真相暴露后，9月21日和22日在都灵爆发了抗议性的游行示威，但遭到血腥镇压，因而国王撤换了明盖蒂内阁。拉马尔莫拉将军组成新内阁，焦万尼·兰扎任内政大臣，财政大臣是曾在拉塔齐内阁任职的昆蒂诺·塞拉；他打算大力改善意大利财政。新内阁要求议会通过协定，并于1865年6月迁都。

"九月协定"一点也没有改善同教皇的关系。庇护九世这几年不断地在加强教皇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权力，打击任何一种不那么正统的、不那么赞成完全服从教皇的倾向；他变得越来越僵化，抗击当代一切思潮和倾向。最能说明这种态度的是教皇通谕"重大职责"（1864年12月8日），通谕谴责各国宗教的中立原则、舆论和出版自由原则、人民绝对主权原则、国家对教会握有最高裁判权的原则。通

谕附以“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列举教皇在以前的文件中抨击过的八十条谬论。此外，还指摘宗教自由原则和“罗马宗座能够和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现代文明相容和协调”的见解。汇编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看成是对一切现代思想的诅咒。维克托·伊曼纽尔和拿破仑三世禁止发行这一通谕。在汇编中还指摘一种说法，即认为俗权的垮台有利于教会。事实上，庇护九世在要求俗权上是坚定不移的。

汇编加深了教皇和意大利国家之间的不和。国王和教皇之间为填补许多空缺的主教位子举行的直接谈判告吹。罗马问题只不过是暂时中断而已；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争夺德国的霸权地位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威尼托的这个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在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在德国采用皮埃蒙特在意大利采用的政策，然而比皮埃蒙特走得更远，极力避开同革命发生接触，而主要依靠极权体制——那里国王和议会长期争论不休——和武装力量。为了对奥战争，俾斯麦同意大利订立了条约（1866 年 4 月 8 日），根据条约，一旦普鲁士对奥开战，意大利有责任攻击奥（但意大利并无相应的好处）。奥提出无条件地将威尼托交回意大利；可是意大利拒绝了，为了不违背承担的义务。6 月中旬，战争爆发。普鲁士人捷报频传，连克连胜，大败与奥结盟的德意志国家，在波希米亚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7 月 3 日）的大战役里又战胜奥军，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

在意大利，战局截然不同。意大利的军队和舰队大大超过奥地利。国王亲任统帅，拉马尔莫拉任总参谋长，里卡索利出任议长之职（6 月 20 日）。拉马尔莫拉应向明秋河运动，恰尔迪尼应顺波河右岸而下，插入波莱西内，从侧翼攻击敌军。奥军司令阿尔贝特大公挥师突然在库斯托扎奇袭展开在一条漫长战线上的拉马尔莫拉的兵力，各个击破，其中于维拉弗兰卡攻击王储翁贝托之师，王储受到排成方阵的第四十九步兵团的奥枪骑兵的猛烈冲击。曾在拿破仑军队服过役的英勇善战的将军皮亚内尔顶住了敌军的冲击，敌军终于退却（6 月 24 日）。这本不是一次举足轻重的交火，不足以改变整个战局，但最高统帅部却

把它说成是一次重大挫败，互相敌对的拉马尔莫拉和恰尔迪尼迟迟不能就再度发起攻击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候，在萨多瓦吃败仗的奥地利通过拿破仑意欲交出威尼托（7月4日）；但遭拒绝。加里波第率一支志愿军在得到美第奇将军正规军的支持下，活动于特伦蒂诺一带。7月4日，在蒙泰苏埃洛获胜，19日占领安波拉要塞，21日在贝泽卡又获大胜，于是直指特兰托；在瓦尔苏加纳镇获胜的美第奇也对准特兰托。意军主力挺进威尼托，奥军迅速撤退。

在亚德里亚海，佩尔萨诺舰队司令的舰队面对数量少、现代化差的特格特霍夫舰队长期无所作为、止步不前；后来才攻击设防的利萨岛。于是特格特霍夫向意大利舰队靠拢。意大利舰队三路排开，互不支援，特格特霍夫就能攻击孤立的舰只，击沉旗舰“意大利国王号”——佩尔萨诺离开该舰，登上“沉船者号”，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击中“巴勒斯特罗”号，此舰立刻着火爆炸。两舰舰长法亚·迪布鲁诺和卡佩利尼，同舰共存亡，一同沉入海里，水兵大部伤亡。随后，特格特霍夫带领几乎完整无损的舰队顺利从萨运河撤退，佩尔萨诺回到安科纳（7月20日）。

7月22日，普鲁士同奥地利实现停火，24日，意大利也仿效。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尼科尔斯堡预备性条款（7月26日），孤立无援的意大利只得放弃军事行动，签订《科尔蒙斯停战协定》（8月12日）；加里波第被从特伦蒂诺召回，临回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服从”。通过8月23日《布拉格和约》，奥地利让出德国，普鲁士称霸其上，在其领导下组成北部德意志邦联，许多德国国家相合并。10月3日，奥意签订《维也纳和约》，和约裁定通过拿破仑三世将威尼托交还意大利。意应放弃特伦蒂诺和威尼斯朱利亚，而这两地不仅是民族渴望的，而且对求得一个良好边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是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出现了一种反常状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0月21日和22日的公民投票几乎一致要求威尼托和曼图瓦并入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立宪君主政体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王国。

不顺利的战役和不利的和约激起了普遍不满，终于在被地方自治

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的西西里爆发了极其严重的巴勒莫动乱，但遭到严厉的镇压（9月）。

威尼托问题解决后，现在只剩下罗马问题。1866年7月的法律规定全面取消宗教团体，籍没其财产，以充实代替“教会基金会”的“信仰基金会”；将几乎所有其他教会团体（教会堂区除外）的不动产转为公共财产。相反，这一法律又加重了同教皇谈判的困难。为填补空缺的主教位置而举行新的谈判，部分地取得成功。里卡索利制定了一个实质上使教会同国家分离的大胆的方案。可是1867年3月的选举结果不利于他的政策；4月，他被拉塔齐取代。拉塔齐是一个介于左派和右派间的中间派首领，他不仅受到国王的欢喜，在左派中也有好感。拉塔齐着手抄没修会的财产，整顿和减少主教和主教参议会的薪俸，听任加里波第准备一场对罗马的袭击，指望（在国王同意下）能够在拉齐奥重演对马尔凯和翁布里亚的远征，并得到拿破仑三世的默许。但是，法国威胁性的姿态导致他改变态度，逮捕加里波第于西纳龙加（9月24日），把他解往卡普雷拉。大约一个月后，10月20日，加里波第躲过警戒，登陆托斯卡纳，向罗马边界前进。10月初，一支志愿军早就越过了这条边界。拉塔齐原指望王家的干预，以便解开罗马问题的症结：起初似乎受到国王的鼓励，后来又被抛弃了，19日，他提出辞职。在随后的严重内阁危机中，恩里科和焦万尼·卡伊罗利兄弟于10月20日率领七十六名同伴从特尔尼向罗马运动；按照预定的协议，罗马应爆发一场起义。实际上只不过爆炸了一颗地雷，掀翻了塞里斯托里兵营的一部分，以及在圣保罗门发生了小小的冲突。于是他们滞留在台伯河旁的帕里奥利山区的维拉格洛利，23日，受到教皇人马的袭击。在冲突中，恩里科阵亡，焦万尼受重伤。25日，自由分子和教廷警察在罗马的基亚里毛纺厂激战，因毛纺厂里存放着炸弹和武器。起事组织者阿尔夸蒂的妻子朱迪塔·塔瓦尼在混战中牺牲。加里波第从科雷塞山口越过边境，26日夺取蒙泰罗通多，29日，逼近蓬泰诺门塔诺。由于罗马起义未成，只得退却。10月27日（恰尔迪尼企图组织一个左派内阁失败后），国王随从副官梅纳布雷亚将军，同宫廷

其他成员组成新的保守内阁；国王发布公告，完全否认志愿军。这并无助于阻止拿破仑三世（尽管受到周围的压力）派遣远征队登陆奇维塔韦基亚。10月30日，远征队开始到达罗马。11月3日，撤退中的加里波第在门塔纳与教皇军队和法国人接火（据法国人说，他们的“夏塞波特步枪”干得很出色），大败而走。4日，在科雷塞山口加里波第残部举枪投降，加里波第被俘，被投入瓦里尼亚诺牢监，然后被解送到卡普雷拉。意大利政府在致列强的通报里重申意大利对罗马的权利，而在巴黎，鲁埃大臣在立法团全体一致的掌声中宣布，意大利“已经、已经”不会主宰罗马。法军仍留在罗马。

意大利随后是灰心丧气的动乱的三年。这期间，马志尼煽起的共和运动已恢复实力，同君主政体彻底破裂，社会动乱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王室政府认为，如果不与拿破仑三世达成协议，罗马问题难以解决，而拿破仑也内外交困，坐立不安。普鲁士日益壮大——它通过条约，把南部日耳曼国家牢牢控制在手——拿破仑三世对此甚为担忧，想同奥达成协定。自萨多瓦后，奥地利大变，接受立宪原则和体制。同匈牙利达成妥协（1867年12月），建成奥匈二元君主国，一直延续到世界大战。奥匈政府并不愿意同法国达成反普鲁士条约；而且，如果奥在意大利方面不安全，奥不能出兵，于是在1868年和1869年三方举行谈判。意大利提出罗马作为筹码，奥首相博伊斯特表示接受；拿破仑三世则不然，他害怕法国的天主教徒。连1870年头几个月建立的自由和议会新帝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庇护九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决不让步。1868年6月，他召开会议为来年在梵蒂冈举行世界圣公会议做准备，天主教国家破天荒第一次没被邀请向大会派出大使。大公会议不顾一小批、但相当具有威信的主教——由于他们颇有名望和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天主教界——的反对（部分是原则上的反对，部分是召开会议是否适宜），于1869年12月开幕。1870年7月18日，在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收回反对言论后，会议获五百三十五票中的五百三十三票赞成，发表声明：教皇在宗座发表有关信德和道德的理论是永无谬误的，是救世主赐予教会的；在任何教区，他拥有全面和普遍

的权力。

次日，法国由于同普鲁士就普鲁士亲王候选西班牙王位发生冲突而宣战。日耳曼各国都站在普鲁士一边，法国大败，丢城失地，帝国崩溃（1870 年 9 月 4 日），巴黎投降（1871 年 1 月 28 日），2 月 26 日签订和约预备性条款，后为《法兰克福和约》批准（5 月 10 日）。根据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

战争的失败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决定了罗马的命运。1870 年 8 月，法国卫队从罗马召回。战争开始时，拿破仑三世求援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二世有些倾向于给予援助；但 1869 年 12 月继承梅纳布雷亚内阁的兰扎内阁，尤其是塞拉，阻止意大利参战。杰洛拉莫·拿破仑来到佛罗伦萨（8 月 24 日）也未能改变现状，相反，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开始准备一次对罗马的征战，由拉法埃莱·卡多纳将军率领。9 月 16 日（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两天），废除“九月协定”，向列强表明必须占领罗马。各国政府宣布不干预，博伊斯特甚至促进意大利政府。

维克托·伊曼纽尔致教皇的信毫无结果，卡多纳挥师越过边界，9 月 18 日兵临罗马城下。庇护九世命令抵抗，但只抵抗到足以证实是暴力为止；教廷军队指挥官康茨勒尔没有完全遵守命令。20 日早上，战斗短促，庇护门被突破，意大利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城里。卡多纳和康茨勒尔签订协定，后者同意投降。教廷军队被解散，在教皇的邀请下，意大利军队占领利奥城，因投降书中没有包括该城。临时罗马政府成立，准备公民投票，以确定是否统一于将于 10 月成立的意大利立宪王国。投票结果以四万零七百八十五票赞成，四十六票反对通过。1871 年 7 月 1 日，王国首都郑重庄严地迁往罗马。

教皇地位按保障法（1871 年 5 月 13 日）规定处理，该法保证教皇享有君主地位，梵蒂冈拉特兰宫和冈多尔福堡的夏宫享有司法豁免权（治外法权），给教皇高额年俸，保障其神职内阁充分自由。国家不干预教会生活，只对教会财产的使用和大小教区的俸禄（主教区、堂区等）保留认可和批准权。这样，意大利政府安排了教皇的地位，

安抚了各列强，同时避免了其干预，这对于意大利国家来说是关系重大的。然而，教皇自以为“生存于敌对统治下”，深藏梵蒂冈不出，他认为俗权对于其内阁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其他态度都可以视作赞成既成事实，因而有损其在天主教界里的独立性，会使他好像变为意大利政府的一个属民。

第二十章　1870 年后的意大利

119　统一的意大利国家

意大利王国于 1861 年建立，在 1866 年和 1870 年间完成，是意大利第一个国家——至少就“国家”一词的现代意义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时人们解释说（见第 8 节），为什么所谓的罗马-古意大利邦联不配这个名字，不能把她说成是一个意大利国家。还指出（见第 12 节）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并未导致——由于政治生活的职能实质上仍是的——整个意大利民众平等地、统一地、有效地参加国家生活。古意大利市政自治和罗马中央政权之间不存在有机的、立宪的联系。随着帝国的建立及其演变（一方面皇帝的权力日益趋于独裁，另一方面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意大利和各行省是平等的），建立意大利国家的机会受到阻碍，由市民国家过渡到帝国。直到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就其整体而言仍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最后阶段附属于君士坦丁堡），后一分为二：帝国意大利和伦巴第意大利。在两个部分中，意大利人民都不参加政治领导，正如人们所说的，他们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继伦巴第王国的意大利王国从属于新的西方帝国，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从不包括整个意大利；就其政治社会结构而言，几个世纪里它并不代表一个意大利国家，而是高踞

于意大利人民之上的外国封建主政府的总称。

意大利人民有过自己的政府是在城市国家时期，然而这些城市国家是在当时帝国-王国范围内采用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形式出现的，它们之间缺乏国家间的联系。城市国家在其顶峰时期也未超越中部意大利；南部王国尽管在政治活动上有着联系，但与城市国家截然不同。在南部王国，一系列外国王朝交替更迭，并同外部维持着王朝-政治和国家的联系（第一个王朝除外）。十五世纪，在某些大国，曾有过最确切的意大利政治制度，尽管形式上是属国（米兰公国是帝国的封地，那不勒斯王国是教会的采邑等），但它们事实上是独立的。这些国家互相间完全自主，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小国。从十六世纪初叶起，一直是外国统治。外国统治向半岛逐渐扩大，并对其余部分享有最高权势，但未完全扼杀先前意大利各国的个性。随着意大利王国的建立和完成，外国统治彻底完结。因此，意大利王国虽然吸取了许多历史成分，但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形式。

人们理解，为了保障独立和统一的重大成果，必须给予新国家以强大的集权组织。这就是君主政体战胜共和国政体的原因——且不谈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原因——，其结果是，以皮埃蒙特为中心的凝聚力以及王朝——君主政体的吸引力成了中央集权制度成功的新的动力。地方自主的拥护者们——尽管他们在复兴时期有重要的代表，并有历史传统作依靠——不管以封建主义的极端形式出现，还是以区、省、市最温和的自治形式出现，均都彻底失败。

从 1859 年到 1871 年间新国家的政治行政组织接近拿破仑法国以来的组织形式。全国划分为一定数目的省（省以上没有按历史地域或按其他准则设立一些行政区划），每个省受中央政府通过的一个名为“行政长官”的官员（像在法国一样）直接领导。各省还设立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省委员会和省议会），但权力有限。每个省划分为几个区，设行政次官（已取消），区又划分为市镇。市镇行政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管理，从市议会内部产生一个“市政府”，市长为市政府首脑，长期以来由政府任命。同时，市长又是中央政权的官员，委

以履行中央政权交付的任务和命令。在地方行政方面，市长、市政府和市议会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可以不合规范为由取消市镇的决定，可解散市镇议会，委派一专员主持临时政府。市镇行政职权不能超越地方行政事宜。

中央政府是按西欧的立宪-议会类型建立的，是由国王任命的内阁或部长会议组成的，其中一位由国王委任主持部长会议，一般来说，就是国王委以组阁的那一位。从法律上讲，国王对提名和撤销大臣的权力是无限的；可是从阿尔贝托宪章起，这一权力成了一种不变的宪法惯例，国王对议院在委任组阁的人选、在批准内阁名单、在保持或撤换在任内阁等问题上表示的意见，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得加以尊重。议会明确的不信任票或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反对票就会引起政府的辞职，然而国王仍有权（实际上也在行使这种权力）拒绝辞职，将政府退回议会，并有权解散议会，在法定的时间里召集新议会。

120 政党 右翼政府

尽管国王经常尊重议会的任命，但是在意大利王国没有十足英国类型的两党制的议会制政府，因为意大利的政党或议会党团的组成相当复杂，不够明确；因而君主有较大的主动性，可能受宪法规定外的顾问，如王室事务大臣的影响。然而，在罗马统一于意大利的头十年内，左右派的划分对政府的形成起着明显的作用。这两派的分庭抗礼要追溯到那些人的政见：一部分人要意大利密切配合和依靠君主政体及其内阁；另一部分人，即行动党，要求人民有主动权。1870 年后，这种差异随着事物的发展而消失，但两派间仍留有另一个矛盾，它与前一个矛盾有着逻辑的历史的联系。右翼实际上继承了加富尔的政府组成形式。这种政府形式是通过狭义选举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寡头政治或“小宗派”倾向，它对民主和人民群众持有一定的怀疑，它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尊重法律和个人自由。左翼是反对加富尔及其继承人的各种派别的联合或混合，他们仍主张君主立宪，但同极端分子或共和分子有接触，一般说来，他

们表现出更接近民众，具有更民主的倾向，主张扩大选举范围，企图给予即便不合乎宪法的政治倾向以更大的自由。此外，他们还主张缓解财政压力。最后，关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他们采取明确的反教会态度。在这一立宪左派（1870 年后，由拉塔齐领导一直到其 1873 年去世，后由德普雷蒂斯领导）中活动着的是一些激进分子——共和主义者或共和分子，行动党的中坚。加里波第是这些人中的杰出者，然而这一类人中的议员却聚集在贝尔塔尼周围。纯粹的共和分子或马志尼分子未进入议会。朱塞佩·马志尼（一直活到 1872 年 3 月 10 日）断然否定新的君主政体国家实现了复兴运动的理想，批驳其合法性的说法，认为它不是产生于立宪议会。但是，最年轻的共和分子有迹象要离开马志尼，认为他在社会和宗教方面太保守。他们深受社会主义鼓动和工人国际的影响。工人国际是卡尔·马克思于 1864 年创立的；可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意大利尤为普及。加里波第（1882 年 6 月 2 日卒）也声称是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然而，他对这一运动没有清楚的概念，也缺乏为之行动的真实愿望。

兰扎内阁（1869—1873 年）和明盖蒂内阁（1873—1876 年）最担心的问题是国家收支平衡，那时赤字已达一亿三千万，当时来说，这一数字非同小可。在兰扎内阁中任财政大臣的塞拉实施“厉行节约”政策；他立的颇有成效的间接税是磨面税，但遭到人民的反对。在其内阁垮台前夕，亲自主持财政的明盖蒂宣布收支平衡。在这几届内阁治下，国防大臣里科蒂完成了组织新的国民军的重要工作：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分三种（常备部队、机动部队和地方部队，只有常备部队服役期为三年），建立了十个军团，共三十五万人。出于财政的原因，军费严加控制，限定在左翼所希望的数字左右。铁路建设突飞猛进，于 1871 年弗雷瑞斯隧道打通。当年的人口统计为：二千六百八十万人。

兰扎内阁是由反对最落后的、搞“宗派的”右派而形成的较进步的右派和中间派联盟产生的，后来却明显右转；这种性质，明盖蒂内阁（1873 年 7 月）表现更为突出。右翼政府受到左派越来越猛烈的攻

击。1874年8月，明盖蒂在里米尼的鲁福别墅和其他地方逮捕了许多“共和联盟”（萨菲、福尔蒂斯）和国际意大利支部（科斯塔）的要人。倒阁斗争日益炽烈。明盖蒂在1874年11月的选举中仍赢得多数，相当微弱的多数。

两届右翼政府沉着地对付庇护九世开展的反意大利国家的斗争。他态度极端强硬，发表措辞异常猛烈的讲话，呼吁信仰天主教的民众支持教廷。取消（1873年6月的法律）在罗马的各种修会（总会院例外），废除神职人员免服兵役法（1875年），引起教皇更为激烈的抗议。教皇的强硬态度扩展到主教，他们拒绝向国王要求入主教区的许可书，因此1875年有三十多位主教被逐出主教区。1870年后的头几年内，罗马问题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中心。意大利政府主要担心的是不使任何大国鼓励教皇的敌意，不使任何大国把教皇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出。具体地说，最害怕的是法国。法国国民议会里，神职人员势力相当强大，意大利统一被说成是不仅有害于教士界，也有害于教士界以外的法国——以“国家最高利益”为由的陈旧偏见。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在1873年5月让位给麦克马洪将军（一位教权保皇分子）后，危险增加了。然而，法国政府清楚在实施其侵略计划时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德国，因而顶住了神职人员的压力。1874年10月，法国奥雷诺克舰从奇维塔韦基亚水域召回，该舰从1870年起曾驻扎在那儿，以便接应教皇可能出逃。

同罗马教廷的冲突，害怕法国亲教皇反意大利的政策，构成了意德友谊的自然基础。俾斯麦在德国也致力于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然而，意大利政府十分警惕，不被首相拖进反教会的斗争中，并采取平衡路线来对付俾斯麦的不满。这时期任外交大臣的维斯孔蒂-韦诺斯塔也不搞反法政策，仅取防御姿态并极力维持同法国的友好关系。这期间，意大利同奥地利的关系之好远远胜过同德国的关系，以至于在某些时候引起了柏林的不安。1873年9月，维克托·伊曼纽尔在明盖蒂和维斯孔蒂-韦诺斯塔的陪同下，前往维也纳和柏林，在这些王室访问中没有承担任何国际义务。弗兰西斯·约瑟夫于1875年4月回访威

尼斯，老威廉一世于10月回访米兰。

121　左派执政和“多数派变化论”　突尼斯和三国同盟

1876年3月18日——那时正面临着铁路问题，明盖蒂声明赞成由国家经营，左派和托斯卡纳中派反对——政府在一次有关程序的投票中被击败（二百四十二票对一百八十一票），因而提出信任问题。国王委任反对派领袖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组阁，25日组成清一色的左派内阁：尼科泰拉出任内政大臣，梅莱加里（1831年的马志尼分子，几十年前就转为主张君主政体）主持外交，曼奇尼管司法，扎纳尔代利管公共工程。11月举行选举（这之前是“调换行政长官”），新政府得到了绝大多数的支持；维斯孔蒂-韦诺斯塔、斯帕文塔、邦吉落选。然而多数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分成各种或多或少带有进步性的政治派别，人员组合错综复杂。除入阁人士外，还有贝内代托·卡伊罗利、克里斯皮（担任新众议院议长之职）、巴卡里尼等名人。部分实现了左派改革纲领：通过（1877年）科皮诺关于免费普及初级教育法，并规定宗教课非强制性，由家长决定；取消磨面法（1880年通过，1884年1月1日充分有效）；只是在1882年才扩大选举范围，采用名单投票（1892年取消，恢复用决选投票的一候选人一选区制），选举权从二十五岁提前到二十一岁、纳税要求从四十里拉降到十九里拉、文化条件为小学二年级程度。选民从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最先进的民主派反复要求实行普选和选举章程改革。国家所有的铁路按1885年铁路协定交私人经营。新政府更世俗化的倾向表现于：从1876年6月起取消在法庭上的宗教宣誓，尤其是反对教士滥用职权的法律草案，引起了庇护九世的强烈抗议，促进了国际天主教骚乱，这个法律草案由众议院通过后，为参议院所拒绝（1877年）。新政府成员对君主政体的忠诚是无可非议的：1877年镇压了卡菲埃罗的国际主义动乱。军事开支增加；1882年，十个军增加到十二个。海军方面继续完成由前内阁开始的工作，大型战列舰（杜伊利奥号、丹多洛号、意大利号等）下水，是那个时代的无畏战舰，因此，意大利海军处于领先

地位。

1877年12月因侵犯电报秘密（实质上是无罪的），尼科泰拉在众议院被击败，德普雷蒂斯二次组阁，克里斯皮任内政大臣。从那时起，虽左派政府尚存，但危机频仍。克里斯皮被指控犯有重婚罪而提出辞职。1878年3月，卡伊罗利接替德普雷蒂斯内阁。在德普雷蒂斯第二届内阁期间，维克托·伊曼纽尔（1878年1月9日）和庇护九世（2月7日）相继去世。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短而平静，选出焦阿基诺·佩奇，称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他非最强硬分子的候选人，然而仍支持俗权要求，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政治选举，但也渴望几年内得到和解。翁贝托国王即位对君主政体没有任何震动，就是在共和分子方面，由于他人品出众，一般也备受好感。

头两届德普雷蒂斯内阁（在第二届时，兼任外相）和卡伊罗利第一届内阁（科尔蒂任外相）面临东方危机，导致土耳其-俄国战争（1877—1878年），最后由柏林会议（1878年6—7月）解决危机。从国王、政府到克里斯皮都切望在1877年底同德国达成协议，遏制法国（麦克马洪已于5月政变，支持右派）和奥地利；希望从奥地利夺回特伦蒂诺，交换条件是意大利赞成波斯尼亚统一于帝国，或者甚至诉诸战争以废除1866年的协定。可是，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无此想法，而意大利又没有利用时机，提出其他交换条件，会议结束时“两手空空”。英国却占领塞浦路斯；法国在英国，尤其是德国的赞成下，秘密地把宝押在突尼斯身上。当时收复领土运动有了第一次迅猛的发展，主张将奥地利霸占的意大利领土统一于意大利国家。这一运动主要是由极端分子挑起的，具有广泛的反君主政体的性质。1880年前后同奥地利的关系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意大利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因为德国和奥地利在1879年10月缔结同盟，俄国同中欧两帝国达成1881年条约（“三帝同盟”，性质极其保守），俾斯麦又奉行公开支持法国的政策。在第三届德普雷蒂斯内阁（1878年12月—1879年6月）和从1879年11月起同德普雷蒂斯（任内政大臣）联合的卡伊罗利两任新内阁期间，突尼斯变成了意大利的主要问题。意大利在突尼斯有

着重要的精神和经济利益，害怕法国军事占领所造成的重大后果。意大利企图在形式上维持政治现状的同时，最大可能地扩大意大利的影响；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法国的行动，1881年5月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步棋导致卡伊罗利倒台。塞拉企图组成混合内阁告吹，德普雷蒂斯重返内阁，几经改组，他执掌政府直到谢世（1887年7月29日）。在他的倡导和明盖蒂的附和下，"多数派变化论"问世，即两个老党的成员接近和联合，组成议会的多数派和内阁，左派仍领导内阁，占有多数席位。但一部分左派（特别是卡伊罗利、尼科泰拉、克里斯皮、扎纳尔代利、巴卡里尼的"五头政治"）参加反对派，反对他们的老领导。

意大利的孤立处境对领导层来说是危险的，这远非简单地出于对外政策的原因，而是害怕可能得到法国支持的共和主义，而法国又和一直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寻求支持其俗权政策的利奥十三世勾结一起（在1881年7月13日夜里运走庇护九世遗体时出现的可悲的喧闹后，教皇变得更敌对更惊恐，反复思虑放弃罗马）。于是，国王翁贝托出访维也纳（1881年10月），同奥、德缔结三国同盟（1881年5月20日）；曼奇尼出任外交大臣（1881年到1885年）。据约，意大利和德国应互相支援，抗击法国的入侵；如法国入侵，奥地利也承担支援意大利。此外，如两个或更多的大国攻击一个盟国，就联合抗敌；如攻击来自一个国家，允许保持中立。关于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利益，条约没有涉及；鉴于缔约时的形势，这亦非易事。不久以后，出现一个对外行动的机会：英国要求意大利合作于1882年夏占领埃及。这一要求未被接受，因为曼奇尼坚持其以欧洲合作替代法英统治埃及的思想。这一思想未能实现，原因是俾斯麦政策暧昧以及害怕同法国合伙有损自己的形象；更不谈意大利公众舆论强烈反对英国的这一行动，认为有害埃及民族独立以及怀疑这一行动可能为他人尽职效劳。1884年三帝国同盟续订和德法进一步接近后，意大利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于1885年初（2月5日）采取一个被视为勇敢的行动，一举占领马萨瓦。这一行动得到英国的同意，

英国害怕法国涉足那儿。曼奇尼希望这次占领是意、英在埃及和苏丹合作的开始（他想驻军喀土穆），因那儿正发生伊斯兰教德尔维希派起义。可是，喀土穆失陷后，英国放弃任何行动，曼奇尼希望全落空。

左派执政的头几年内，财政状况相当不错，收支出现盈余。由于新国家的自然发展和选民的强大压力，大项开支政策导致1882年起再次出现赤字，到1888年，赤字甚至达到二亿五千万里拉。这时期，财政部几乎一直由马利亚尼领导，他极其巧妙地在预算上做手脚，掩盖事情的真相。经济状况最糟的要数南方。由于落后，南方感到统一的好处比北方少得多。南方资产阶级的不满首先有助于左派战胜右派；可是新政府并没有创造它所希望的奇迹，情况的改善取决于相当复杂的诸因素。农业条件尤为糟糕，1877年由亚奇尼主持的议会农业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为此拟定开办学校和设农业站，还开设瓦隆布罗萨森林研究所，解决造林技术问题。1880年前后移民逐增，成为解决农村贫穷的一条出路。但纵观全局，意大利的经济是在不断发展的。1880年后，工业稳步发展；为了支持新生的工业，在1878年和1887年，进行海关改革，采取保护性措施。铁路从1876年的七千四百公里增长到1885年的一万公里；1882年开通了圣哥达隧道。1881年建立“意大利航运总公司”，1885年设立航运奖，实行保护主义，扶持在外国竞争下濒临垮台的商船队。从1872年的五亿里拉储蓄发展到1882年的十亿里拉，对外贸易从1862年的十亿里拉上升到1882年的二十二亿零五千万里拉。1870年前，为数不少的互助会继续增多，在路易吉·卢扎蒂的促进下，民间银行蓬勃发展。188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二千八百万人。

经济条件的不足，同时文明意识的提高，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无政府倾向开始退出舞台，代之以有机的、合法的运动，导致1882年成立“独立工人党”；1886年该党被德普雷蒂斯解散。同年6月，宣布召开工人协会大会，发表声明反对德普雷蒂斯政府。在反对初生的社会主义中，左派和右派是一致的；为对付保守派和纯自由贸易主义者，左、右派中的一些人（明盖蒂、德普雷

蒂斯以及他们中间的“中派”领袖西德尼·桑尼诺）也不谋而合，一致同意推行改善工人状况、防止阶级冲突的社会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做了一些事：建立全国工伤事故银行（自愿参加）（1883 年），通过妇女和儿童劳动法，企业主对工伤事故责任法（1886 年）。罢工自由仍被否定：罢工自由法在 1886 年被众议院否决。从 1882 年起，皮埃蒙特和新议员焦万尼·焦利蒂呼吁要极端重视社会问题，坚决反对马利亚尼的财政政策。

122　本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文化

在复兴运动后期和随后的时期（即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文化，总的来说较前一个时期要差，好像是一种止步不前、一潭死水的生命运动；虽然如此，但也不乏有一些符合时代新要求的方面。在文学方面，政治和爱国主题已不占绝对统治，最显著的证明是爱国人士路易吉·塞滕布里尼（1813—1877 年）的《意大利文学课程》；文学作品更多地注意艺术性，广泛地注意人们普遍的兴趣和日常生活的现实，直接地接受欧洲文学流派的影响。在诗歌方面，第二次浪漫主义（见第 111 节）仍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流派的领袖是普拉蒂；另外还有：阿莱阿尔多·阿莱阿尔迪（1812—1878 年），在其和谐的软弱的无韵诗（不止一个历史主题）中，这种浪漫主义感情表露无遗；朱塞佩·雷加尔迪（1809—1883 年），一般来说，他注意描写性的和训世性的诗章。随后是“第三次浪漫主义”，其中心在米兰，由一批抒情诗人组成，为首的是埃米利奥·普拉加（1839—1875 年），还有焦万尼·卡梅拉纳（1845—1905 年，自杀而亡），阿里戈·博伊托（1842—1918 年），他们的诗作从形式上和情感上有独到之处，可艺术上缺乏平衡，不够完整。贾科莫·扎内拉神甫（1820—1888 年）代表新古典主义，它注重形式上的严谨庄重，崇尚高贵的道德情操，可是诗情不隽永，干巴乏味。

本世纪后半叶初，在小说方面出现了两位作家，尽管他们继承了前一时期的题材和主题，但从观察的广泛性和艺术表现的客观性来说，

他们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变革，可以说写历史小说已过渡到写心理和社会的小说。其中一个是朱塞佩·罗瓦尼（1818—1874年），他在一组小说《百年纪事》中广泛地重现了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社会，尽管力不从心。较之他更伟大的作家是伊波利托·涅沃（1831—1861年），加里波第手下的一志愿兵，他在《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里概述了威尼托十八世纪奄奄一息的社会，其非凡之处是在忧郁惆怅上淡淡地涂上了一层生活情趣；故事一直延续到1848年，但效果较小。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没有创造一种传统，同随后的意大利小说没有联系。彼得罗·科萨（1830—1881年）在戏剧方面能和他们相提并论，他写的罗马、文艺复兴和当代题材的历史剧已超过了阿尔菲耶里的写作方法，他的剧作具有广泛的人情味，采用不同的自由表现手法。

本世纪最后三十年，可称之为翁贝托时期。这期间缺乏有成就的人物，但同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有着广泛的沟通。在小说方面，吸收了法国的现实主义，稍后，又受俄国小说的影响。可提及的作家有杰罗拉莫·罗韦塔（1851—1910年）和马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年）。而焦万尼·维尔加（1840—1922年）的《马拉沃利亚一家》和《唐·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长篇小说一反前期的浪漫主义，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具有真实效果的现实主义。安东尼奥·福加扎罗（1842—1911年）受曼佐尼传统的影响，尤其在其优秀作品《小小的旧世界》中表现最明显；但也可感受到外国现代心理小说的影响。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1908年）将现代游记文学、教育文学和社会观察文学引入意大利，写出了不少短篇小说和历史小品。最成功的一部教育著作是《爱的教育》，这些作品将伤感的浪漫主义和温和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戏剧方面，贾钦托·加利纳（1852—1897年）是哥尔多尼的最后一个继承者；而保罗·费拉里，剧作极丰，他也从哥尔多尼开始，发展到写法国类型的“主题”悲喜剧（小仲马）。埃米利奥之子马尔科·普拉加（1862—1929年）的作品与法国戏剧，尤其与贝克的戏剧更为相似——其典型作品之一《理想的妻子》，由艺术大

师埃莱奥诺拉·杜丝扮演，她是由她所代表的意大利演员中最成功、最深刻的变革者。同普拉加同时期的还有前面已提到的杰罗拉莫·罗维塔。朱塞佩·贾科萨（1847—1906年）起初用浪漫型诗句写戏剧《一局棋赛》，后也发展到写法国类型的现代喜悲剧《悲哀的爱情》。

法国的小说和戏剧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体，而意大利没有出现等同之物。像往常一样，意大利只有伟大的但又孤立的个人，如诗人焦苏埃·卡尔杜奇（1835—1907年）。卡尔杜奇吸取了意大利文学的全部传统，又极熟悉外国文学；其作品的形式和观念是古典主义的，但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感情和现代色彩；题材十分广泛，有古老的回忆，意大利中世纪史，法国革命史及当时的政治，还有自然景象以及个人的情谊和爱情。

卡尔杜奇的名望和影响是逐渐成熟的。阿尔弗雷多·奥里亚尼（1852—1909年），小说家、史学家、剧作家、记者，他生前没有被人了解，死后又被歪曲地过分高估了，他既没有达到前者的名威，也没有具备前者的影响；他个性极其复杂，其写作意图超出了写作能力。他的较大作品是《意大利的政治斗争》（1892年），作品对意大利历史做了过分修饰和夸张，尤其对复兴运动的解释采用马志尼的理想主义和无偏见的批判，但并不否认君主政体的作用。

焦苏埃·卡尔杜奇的太阳偏西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1863—1938年）的喷薄朝霞，从时序上刚好互相续递。作为诗人、小说家，稍后作为剧作家，邓南遮获得美名。在他的身上，意大利文学传统，尤其是高超的表现形式附丽在来自外国文学和当代生活的内容之上，具有明显的自我中心的追求，这使他完全独立于先人强有力的道德生活，而且也赋予他极大代表性的价值（有时也是我们时代的某些流派的先驱）。他是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常在《星期日凡夫拉》、《文学星期天》、《拜占庭编年史》等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前两份杂志由多才多艺的幽默俏皮的法国型文人费尔迪南多·马丁尼（1841—1928年）主持，他也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政治活动家。切萨雷·帕斯卡雷拉（1858—1940年）也属于这个世界，他继承贝利用罗马方言写的诗篇，

在《格罗利别墅》(1885 年)、《美洲的发现》(1893 年)这两部诗作里,达到了史诗的高度。

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1818—1883 年)是另一个孤立的作家,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见第 111 节)。他的作品涉及整个意大利文学,几乎全是在本世纪下半叶完成的。他精于对历史-美学文艺做评论,力求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作家的艺术美感和内心生活的表现,将其同整个当代世界做比较。在德桑克蒂斯一生中(也是议员和左派部长),其影响不是在增加,而在逐步缩小,因为他倾向于实证主义,追求博学和外表的细节。这一倾向对条理派,对资料收集和分类也有好处,取这一倾向的也不乏有价值的作品,如阿道夫·巴尔托利(1833—1894 年)和亚历山德罗·丹科纳(1835—1914 年)。

在史学方面,这一倾向独占上风。大量的珍贵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和特殊的调查,各地区的祖国历史委员会及其出版的期刊和意大利历史研究所是这一工作的工具;然而对历史事件的全面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无人过问或无能为力的倾向。尽管如此,帕斯夸莱·维拉里(1827—1917 年)也写了关于萨沃纳罗拉和马基雅维利两篇很有价值的专题论述;同他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朱塞佩·德莱瓦(1821—1893 年),一部有关查理五世作品的作者。

在哲学方面,实证主义符合文学历史研究的博学方针。实证主义占优势是针对罗斯米尼和焦贝蒂的追随者和黑格尔学派(贝特朗、斯帕文塔、菲奥伦蒂诺、塔里、德尔科莱)而言的。费拉里为实证主义做了思想准备,而卡塔内奥(见第 111 节)又进了一步。罗伯托·阿尔迪戈(1828—1920 年)是实证主义的最大旗手,他致力于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新形而上学。安东尼奥·拉布廖拉(1843—1903 年)的敏锐天才,不能归入实证体系。他特别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可以称之为新康德主义的一批学者(坎托尼、马希、巴尔泽洛蒂、基亚佩利)与实证派也有明显的区别。

翁贝托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总的来说比文学更落后更逊色，尽管可以说人们尽了一切努力设法使艺术赶上当代欧洲。费代里科·法鲁菲尼（1831—1869年）和斯特凡诺·乌西（1822—1901年）继续采用浪漫主义画历史题材的绘画；特兰奎洛·克雷莫纳（1837—1878年）的画风虽仍具浪漫主义的伤感情调，但却独具一格，染上一层轻而薄的色彩。这一类绘画的名家还有多梅尼科（1815—1878年）和杰罗拉莫（1827—1890年）。因杜诺兄弟和贾科莫·法夫雷托（1849—1887年）。法夫雷托将威尼斯绘画的某些传统特点也糅合进来。南方人菲利普·帕利齐（1818—1899年）、多梅尼科·莫雷利（1826—1901年）、弗朗切斯科·保罗·米凯蒂（1851—1929年）的绘画受现代自然主义的影响。托斯卡纳的"点画派"（这一名词来自其技术的构成成分彩色的点子）有着更大的艺术独创性，与当代伟大的法国绘画的精神更为酷似；西尔韦斯特罗·莱加（1826—1895年）、泰莱马科·西尼奥里尼（1835—1901年）和最伟大的焦万尼·法托里（1825—1908年）都属于这一派。安东尼奥·丰塔内西（1818—1882年）和焦万尼·塞甘蒂尼（1858—1899年）是新颖的现代派风景画家。

在音乐方面，朱塞佩·威尔第无可置辩地在本世纪下半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暮年，他又有惊人的创新，写出了《奥赛罗》和更晚些时的《福斯泰夫》。在此之前，阿里戈·博伊托受外国的影响，尤其受瓦格拉的影响，在意大利歌剧音乐上有所成就，写了《梅菲斯特费勒斯》（1868年第一次上演，1875年第二次上演）；同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弗雷多·卡塔拉尼（1854—1893年），他极力探索符合意大利旋律的现代音乐特色。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意大利歌剧流派，它仍立足于旋律，但形式畅快，并吸收一些外国现代剧情发展的进程：最伟大的两个名字是贾科莫·普奇尼（1858—1924年）和彼得罗·马斯卡尼（1863—1945年），他们分别是两个极知名的（它们之间差异又极大）歌剧的作者：《绣花女》（1896年）和《乡村骑士》（1890年）。现在不乏努力把国外广泛发

展的交响音乐移植到意大利（朱塞佩·马尔图奇，1856—1909年；焦万尼·斯甘巴蒂，1841—1914年），但当时仍未能创造出一种连绵不断的潮流。

123 克里斯皮时期

罗比兰特将军在曼奇尼短暂空缺后入主外交（1885年10月），利用巴尔干新的复杂形势（保加利亚问题）、奥俄愈益尖锐的不和以及德法紧张关系，以便提高意大利在欧洲棋局中的分量。于是，他在德普雷蒂斯最后第二届内阁任期内缔结了三国同盟的第二个条约（1887年2月20日），签字国不变，补充进了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双边条约。条约规定，德国在意同法国就改变地中海现状而发生冲突时，有义务支持意大利；奥地利就其在巴尔干为长期或短期占领按补偿原则采取行动问题上有义务与意达成预防性协议。他还同英国政府就地中海达成协议，奥地利也参加，协议条文于1887年底完成，然而没有多大效力。

克里斯皮加强三国同盟政策，但未取得积极成果。1887年4月，克里斯皮进入最后一届德普雷蒂斯内阁，担任内政大臣；随后在他死后入主内阁（8月）。克里斯皮和俾斯麦在腓特烈斯鲁庄园会晤（1887年10月），强调意-德条约；法国甚为震惊和恼怒，开始推行报复政策，首先在经济方面撕毁一切贸易协定，制造关税战。意大利南方尤其深受其苦，它的酒找不到销售市场。法国本希望通过经济战将意大利拖出三国同盟，但白费力气。在第一届克里斯皮内阁期间，两国的紧张关系几乎继续不断，他的激动情绪和法国对他反常的厌恶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紧张状态表现在地中海的战争警报（例如1889年7月的警报，是由克里斯皮得到的一份假消息所致），也出现在殖民地上（马萨瓦的冲突、意大利在突尼斯的利益、比塞尔塔防御工事、担心法国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德国和英国对克里斯皮不断的呼吁回答极其勉强，尤其是在德国卡普里维接替俾斯麦（1890年3月）之后。克里斯皮的三国同盟政策在意大利遭到某些右派分子和主张反君主政

体、亲法和领土收复主义的极左派的反对。克里斯皮指责他们同法国和梵蒂冈同谋。同梵蒂冈的关系在1887年5月出现过和解的迹象，现斗争更烈。在罗马，为焦尔达诺·布鲁诺竖立的纪念碑剪彩（1889年6月）标志着这一斗争达到顶点。利奥十三世和他的新国务卿拉姆波拉（从1887年6月起）渴望通过接近法国和俄国以及同这二者达成的协议来满足其俗权的要求。克里斯皮大力推动殖民政策，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结果。在多加利大败后（1887年1月），派遣一支由圣马尔扎诺将军率领的远征队攻击阿比西尼亚，占领萨堤。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在反对伊斯兰德尔维希教团战斗中阵亡。意大利政府积极支持绍阿国王孟尼里克继承皇位，与其签订《马西利利条约》（1889年5月2日），认为已获得他对意大利保护国身份的承认。以简单的国王法令，把红海海滨的领地建成"厄立特里亚殖民地"（1890年1月）。印度洋畔的奥比亚和米朱蒂亚苏丹接受意大利保护国，形成了意大利的索马里。于是阿比西尼亚不仅受到北方，也受到东南方的攻击。

在内政方面，克里斯皮首相（1887—1891年）——以加强个人政府来继续推行"多数派变化论"——大力推动行政和司法改革：制定市政和省的新法律（1888年），较大市政的市长和省委员会主席由选举产生；通过扎纳尔代利刑法典（1889年），取消死刑；改革宗教活动；制定卫生法；在国外发展意大利学校。在财政方面，本届内阁面临巨大赤字，但新的国库大臣焦利蒂（1889年3月）为消灭赤字做了初步努力。国民经济境况在预算上反映得一清二楚；法国的冲突、罗马建筑业危机、银行的破产都加重了国民经济的窘态。在安东尼奥·迪鲁迪尼内阁（1891—1892年）——右翼新首领，任命尼科泰拉为内政大臣——和焦利蒂清一色左派内阁（1892—1893年）时期，财政经济状况并未有所改善。主管外交的鲁迪尼第二次续订三国同盟（1891年5月6日），合并了1887年的三个条约，缓和了同法国的尖锐矛盾，然而，由于法国反三国同盟的偏见，这一举动无助于消除对立。法国开始向俄国寻求结盟，于1893年底缔结盟约。在焦利蒂统治下，因艾格莫尔特发生大肆屠杀意大利工人惨案（1893年8月），意法关系进

一步恶化。在他任期内，也爆发了罗马银行大丑闻，犯有搞非法流通罪。银行被查封，采取有效措施改组货币发行机构。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揭发一些政界人士负有严重责任，于是引发了党派和个人之间的争斗。焦利蒂内阁辞职（1893 年 11 月），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磋商后，克里斯皮于 12 月重返舞台。

克里斯皮第二届内阁同民主主义和工人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工人运动在增强。1891 年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创刊了《社会批判》杂志（菲利普·屠拉蒂主持），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在 1892 年 8 月，在热那亚召开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同反法制的无政府主义工人代表彻底分裂，前者于 1893 年在雷焦艾米利亚成立"意大利劳动者社会党"。在西西里，特别由于硫磺工业的危机，经济状况极其恶劣，出现了一些劳动者政治团体，人数极多，由社会主义组织者（德费利切）领导，可是没有真正的革命精神。克里斯皮认为国家到了严重时期，甚至相信西西里的社会主义者同法、俄勾结，于是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卢尼贾纳发生的另一起暴乱也遭严厉镇压。在恢复秩序的同时，第二届克里斯皮内阁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治理预算，国库大臣桑尼诺通过振兴经济和加重税收终于恢复了预算平衡。预算平衡与非洲事业的需要发生了冲突。因而在非洲实行扩张政策没有合理计划，又缺乏相适应的手段。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里克借口对《乌西利利条约》存在一个解释的问题，拒绝承认保护国，并从法国和俄国获得同情和某些物资支持。正当同他的关系愈益不稳时，巴拉蒂耶里将军占领提格雷，攻击德尔维希人和卡萨拉。孟尼里克进行干预，其人数极多的军队在安巴·阿拉基（1895 年 12 月）击溃托塞利部队，猛攻马卡莱要塞；加利亚诺抵抗无数倍之敌达四天之久，然后撤至阿杜瓦盆地。巴拉蒂耶里采纳毫无远见的建议，发动进攻，在阿杜瓦和阿巴·加里马战役中（1896 年 3 月 1 日），由于敌我众寡悬殊，意大利各队之间缺乏联系，尽管英勇作战，但意大利这支小部队还是被击溃。埃塞俄比亚皇帝方面也遭受重大的损失，撤回了队伍。

由于议会和国内存在着克里斯皮的反对派，非洲政策就和反对独

裁内政以及“道德问题”搅和在一起。由卡瓦洛蒂掀起的这个道德问题首先涉及克里斯皮同罗马银行的某些关系。这是由焦利蒂曝的光，但他又被指责在1893年偷窃了上述银行的文件，遭克里斯皮政府的攻击。1895年，这些政治—个人的斗争变得异常尖锐，无疑加速了克里斯皮的倒台，但仍维持到在阿巴·加里马惨败之后。

124 反动派和开明制度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在鲁迪尼第二届内阁（1896—1898年）时期，关于非洲问题，和平派压倒了雪耻派。和平是极端派和右派的反殖民主义者推动的，尤其是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和对这一举动兴趣索然所致。1896年10月，缔结和约，放弃保护国和提格雷，可仍保留马列卜-贝勒萨-穆纳防线。次年，以临时名义占领的卡萨拉归还英国。费尔迪南多·马尔蒂尼总督在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做了微小的但又适当的整顿。在内政方面，经济原因而引起的民众不满情绪（尽管受“颠覆性”宣传的利用）和在北方意大利上层阶层中普遍存在的反动幻想之间的冲突弄得鲁迪尼内阁——起初曾受到极端派的一定支持以反对克里斯皮——焦头烂额，狼狈不堪。1898年4—5月间，在意大利各个地区发生了人民动乱，5月6—9日的米兰动乱最为严重。军事当局（巴瓦·贝加里斯）宣布戒严，动员全部力量加以戡乱。取缔报纸；解散政治团体；逮捕无数社会党人（屠拉蒂、安娜·库利肖夫、拉扎里），共和党人（罗穆西、德安德列斯）和天主教徒（唐·戴维·阿尔贝塔里奥），军事法庭对他们加以重判，几年后才被赦免。所有这一切使极端党派更加深得人心，在资产阶级内部再次激起自由运动。随后佩卢将军继承鲁迪尼（1898—1900年），提出一系列反对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规定；议会中的极端左派采取故意阻碍议案通过的手段，在扎纳尔代利和焦利蒂领导下的立宪左派和某些右派分子也站在反内阁一边。佩卢力图以政令（1899年6月）来强行通过这些规定，而最高法院声称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议会中的反对派和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日增。议会解散，1900年6月举行选举，结果加强了极端左派。佩卢辞职，组成萨拉科

新的过渡性内阁（1900—1901年），议会和全国趋于平静。1900年7月29日，国王翁贝托在蒙扎死于谋杀（布雷希）。

萨拉科在解散热那亚工会问题上遭议会否决后辞职，新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召扎纳尔代利组阁。他组成“掺有”右派的左派内阁（1901年3月），焦利蒂任内政大臣，普里内蒂（右派）任外交大臣。这届内阁开始了意大利王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是王国成立迄今最繁荣的时期。内政上，新政府采取朴实的开明态度——议会中得到极端派的支持——尤其在对工人组织上，更是如此。工人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组织和行动的充分自由，政府在劳资争端中维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再反对罢工自由；工业部门罢工次数大增（从1899—1900年的六百四十二起增加到1901—1902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二起）；农业罢工上升比例更大（从三十六起到八百五十六起），因为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常常不足以温饱。

罢工的蔓延——激起了保守分子的猛烈咒骂和胆战心惊——总的来说是自然和有益之事。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当务之急，由于经济急剧增长，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大面积私人垦植、精耕细作、生产更专业更有效益，这一切使农业欣欣向荣。农业收入从王国初年的近三十亿金里拉提高到1900年后的八十亿金里拉，占国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钢铁工业（受到高度保护，这一政策在经济界有严重的争议）、机械工业（托西、布雷达、菲亚特）、橡胶工业（皮雷利）、丝绸纺织业（从1882年的二万七千织机到1902年的七万八千织机）、制糖业、化肥工业等都在增长；工业电气化受到极大的推动，尽管同时需要大量进口原煤，每月竟达一百万吨之多。股份公司的资本从1898年的八亿四千六百万里拉上升到1903年的十五亿里拉。对外贸易从1890年和1900年之间的二三十亿里拉上升到本世纪头十年的六十亿里拉。外贸收支逆差，但侨汇五亿里拉和外国人消费五亿里拉弥补了这一赤字。储备大幅度增多；商业银行一跃变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金融机构，意大利信贷银行名列第二。移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长，但大部分是临时的，（正如人们所看见的）他们带回了大量的金钱；

其中许多人，尤其南方意大利人，回归祖国，用其积蓄购置土地。从1897—1898年起，国家预算开始有盈余，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世界大战；1900—1901年，盈余已达到六千八百万里拉，新世纪后不断超过一亿。公债行情上涨，超过平均数，1906年折换率从百分之四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中间阶段为百分之三点七五）；意大利纸币硬于黄金。

在这种自由和繁荣的环境里，政治斗争持续不断，在一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然而斗争的尖锐不妥协性和个人特点却减少了。继历史上的左右派解体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和萧条之后，正在形成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对立，但轮廓还不那么分明。极端政党（激进党、共和党、社会党）常结成人民党派联盟，夺取市政行政权，以便适应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立宪生活。他们不时在议会中支持政府，激进党人——理论上认为君主政体是可能的，事实上已变为保皇派——甚至多次参与政府。相反，屠拉蒂的社会党人于1903年和比索拉蒂于1911年不接受焦利蒂的邀请，认为工人群众不会承认他们是政府中的工人代表。社会党人数大大增加，1906年在都灵成立劳工联合会，该会是工人力量的总组织，其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党的实力。联合会抱有改良主义的方针，屠拉蒂和比索拉蒂的改良派从总体上说，在党内占优势。但是革命派以工团主义倾向对抗联合会，并发动了一些有声有色的工人动乱（艾米利亚农业罢工）。革命派的主要表现是1904年9月的总罢工，几天后便告结束。总罢工的结果只能是极端派在11月的普选中遭某些失利。共和主义派由于社会斗争的吸引力和政府的自由化而一退再退，以至于每况愈下，几致销声匿迹，结果是君主政体明显加强（甚至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君主政体”）。

在这个时期内，天主教徒第一次迈入国家政治生活。由于梵蒂冈的命令（不应参与），迄今为止他们是不参与政事的（只限于参加行政管理）。利奥十三世于1903年7月去世，庇护十世（萨尔托，1903—1914年在位）把支持教皇俗权的抗议变为一纸空文，徒具其形；使教会当局和世俗当局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在许多地方取消“不应参与”的命令，1904年的普选中支持温和分子反对极端派分子，在

1913年的大选中，这种参与更为扩大（在这次大选中，某些自由分子和神职人员之间达成协定，被叫做《真蒂洛尼条约》）。于是，一定数量的“议员天主教徒”（不是天主教议员，因为他们尚未组成一个政党）进入议会。天主教徒也参加某些社会运动，以利奥十三世的新通谕（1891年）作为其纲领；他们中有一股保守势力，深受庇护十世治下的梵蒂冈的支持，庇护粉碎了“现代派”，一种致力于变革天主教文化和神学的大胆运动，但缺乏社会基础；还有一股民主力量，在唐·罗莫洛·穆里（后来退出神职）领导下，公开与罗马不和，不久便被迅速肃清。

二十世纪初，或者战前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一部分继续先前的文化，一部分在发生变革。在文学中，占绝对统治的人物是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他的三行韵法颂歌（阿尔奇思尼）把其抒情诗推向顶峰，极尽表达恐惧心理的性爱，传扬了欧洲文学的长音。《约里奥的女儿》是他的一部著名剧作。他逐渐向民族主义艺术发展（《船》），和先前相比，性感内容并不见少，而且更加虚浮华丽，与其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毋宁说是更具政治影响。继他之后是焦万尼·帕斯科利（1855—1912年），他也满载声誉，虽然成名较晚些。他表达了一种大自然的、精神的新声，但表现形式还不完美，和邓南遮根本不同，他对人类充满了同情怜悯，对世界迷惘不解，而且在感情世界中他内心对朦胧意识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在另一位新颖诗人圭多·戈扎诺（1883—1916年）身上也可找到，他是“黄昏派诗”首领。戏剧（除了邓南遮戏剧外）沿着原方向前进，大部分还是那些老剧作家，新增加的人名是罗伯托·布拉科（1861—1943年）。塞姆·贝内利（1877—1949年）企图复活历史剧，只赶上邓南遮的那种新形式，但文字上流于粗劣。在小说创作上，产量蔚为可观，然而既无创新之作，也无水平的提高（甚至走下坡路）。在小说界，作者大部分仍是旧人。

在绘画上，现代现实主义所向披靡，然而它宁愿成为仿效法国印象派的外国模仿者，而不愿按其古典画家的灵感来重新创作。作品极丰。知名的有埃米利奥·戈拉（1852—1923年）、古列尔莫·恰尔迪

(1842—1917年)、埃托雷·蒂托(1859—1941年)——后两人都属于威尼斯传统派、加埃塔诺·普雷维亚蒂(1852—1920年，也以他自己的“新印象派”手法作画)、安东尼奥·曼奇尼(1852—1931年，喜欢浓墨重彩)、阿里斯蒂德、萨尔托里奥(1860—1932年，倾向于学院式的宏大气魄)。“未来主义”运动(战后仍在继续)企图搞一次革命，却无明显的结果。意大利印象派最可观的成果应归因于阿尔曼多·斯帕迪(1883—1925年)，他的大部分作品创作于战后。另一些意大利人物在这里不予提及，因他们移居国外，属于外国学派之列。雕刻仍保持着传统的学院风气，有朱丽奥·蒙泰韦尔德(1837—1917年)、达维德·卡兰特拉(1856—1915年)、彼得罗·卡诺尼卡(1869年出生)；莱昂纳多·比斯托尔菲(1859—1933年)倾其全力于个人的表现；梅达尔多·罗索(1858—1928年)则是极尽独创的雕刻印象主义。其他的雕刻家(达齐、马丁尼、维尔特)主要是在战后成名。

在音乐方面，意大利新歌剧学派仍在继续发展，与普奇尼和马斯卡尼同名的，还有一些较次要的名字(焦尔达诺、赞多纳伊)。人们重又致力于创作现代交响乐，且成绩斐然；战后这种努力仍在继续，并声势日增(卡塞拉、雷斯皮吉、卡斯泰尔诺沃·泰代斯科)。

如果说有什么巨大的变化的话，那就是在哲学和哲学-历史-文学方面。这一变化是以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年)的紧张而复杂的工作为标志的(他一生精力充沛而多产，直到生命终止)。他是新唯心主义的拥护者，非常自然地又回归到黑格尔(因此也就回归到复兴时期的那不勒斯的唯心主义：斯帕文塔)。这种新唯心主义的主要丰碑是四卷《精神哲学》，它把哲学作为认识在各项活动中的精神生活的方法论。在美学和文学评论上，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有时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克罗齐的新唯心主义——焦万尼·真梯莱(1875—1944年)在战前也致力于这一活动，尽管他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念“现实的唯心主义”的维护者——旨在反对在哲学领域和在历史及政治-伦理领域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在历史领域，也同经济领域一样，实证主义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见第122节)的猛烈抨击

——萨尔维米尼、沃尔佩、巴尔巴加洛——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受到天主教的“现代主义”影响，又有另一方面的发展，促进了历史-宗教的研究（米诺基、布奥纳尤蒂）。在古代历史领域里，意大利历史作品对欧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杰出者有：埃托雷·帕伊斯（1856—1939 年），他对原发的罗马时期做了精深渊博的批评；加埃塔诺·德桑克蒂斯（1870—1957 年），《古罗马史》的作者，书未完成，他具有史学家的卓越气质。古列尔莫·费雷罗（1871—1942 年），在古罗马史的研究中，某种程度上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代表作是《罗马的兴衰》，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美名。他写的（在战后继续写出的）有关历史-政治-社会问题的评论，是以社会学者，更以理论学家的眼光来撰写的。在政治-伦理方面，克罗齐的反实证主义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想上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的思潮向意大利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观念发起的进攻相汇合（尽管渊源上和效果上有相当的差异）。

125　焦利蒂时期　的黎波里

从扎纳尔代利在 1903 年 10 月退出政府到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政府几乎总是由焦万尼·焦利蒂（1842—1928 年）主持的（不由他主持，也受其控制）。1903—1905 年、1906—1909 年、1911—1914 年这几个时期内他一直出任政府首脑；在他下野期间，政府多数派新的临时首脑福尔蒂斯和卢扎蒂及反对派领袖桑尼诺——因议会中无基础，他在 1906 年和 1909—1910 年两届内阁仅百日——替代他。由 1904 年和 1909 年大选产生的焦利蒂多数派是由保守分子、自由分子、激进分子组成的，人们称其为“新多数派变化论”。焦利蒂政府的方针尽管带有精明的灵活的经验主义，仍是相当自由开明的；支持右派和拥护君主政体的左派间的对抗，企图把社会党改良派置于政府宪法轨道上，然而没有获得组织上的成功（屠拉蒂在 1903 年拒绝进入政府，比索拉蒂在 1911 年也拒绝）。他非常愿意在没有特殊协定的情况下接纳“议

员天主教徒”（非“天主教议员”），欢迎天主教徒普遍参加投票，接受意大利罗马的现状。然而他不主张建立政党联合的有机形式，这招致群起而攻之（实质上是无道理的），批评他赞成贬低议会和扩大个人极权。

繁重的日常政治-行政事务改善了国家状况，某些预算的增加（从1900 年到 1907 年年间）说明了这一点：教育预算从四千九百万里拉增加到八千五百万里拉；公共工程预算从七千九百万里拉增加到一亿一千七百万里拉；农业预算从一千三百万里拉增加到二千七百万里拉。国家在不可抗拒的推动下日益扩大其职能：1906 年，国家直接经营铁路（已改善和增加）；1910 年直接管理小学。通过一系列特别法，采取各种措施以支持南方和中部意大利，即支持那些更需要国家支援以达到其他地区生活水平的地区。社会立法涉及诸多方面；公共卫生、慈善事业、平民经济住宅、合作和农业团体、工伤事故、残疾和老年人救济金、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夜班和节日休息、劳工斡旋。与此同时，大量增加军费加强国防，因此，军事开支急增，战争预算从二亿八千一百万里拉增加到三亿七千六百万里拉，海军预算从一亿三千五百万里拉增至一亿六千七百万里拉。

在对外政策方面，1900 年以后意大利进行了更紧张的活动，改变了方针。不再是纯粹的三国同盟政策和与法国搞紧张关系，而是维持三国同盟作为简单的防卫工具（特别是对于盟国奥地利来说）和友谊的象征，同时对法国也采取友好政策。在 1904 年 4 月法英协议后，一反前一段时期的对抗政策，对英国也采取传统友谊的政策。政策改变是有充分准备的：1898 年 11 月签订意法通商新条约，结束贸易战状态；1900 年 12 月缔结地中海协定（该协定是由 1896 年复任外交大臣的维斯孔蒂-韦诺斯塔谈判的），根据协定，法国无意于的黎波里，意大利放弃摩洛哥。普里内蒂在 1902 年（6 月 28 日）续订了三国同盟，内容不变，同时与法国大使巴雷尔签订条约，完善地中海协定，并规定法意在一国受到侵略时互相保持中立（这一条款没有影响意大利在1914 年采取中立）。因此，在 1905—1906 年以及 1911 年的摩洛哥危

机中，意大利完全没有支持德国对法国的入侵。同奥地利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领土收复主义抬头——是由在奥开设一所意大利大学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以及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在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朱利亚的斗争促成的，以及在巴尔干国家，特别在阿尔巴尼亚的争夺。意奥边境上双方都在加强武装力量，在意大利，人们担心奥的入侵，事实上奥参谋部（康拉德）一直在跃跃欲试。1908 年 10 月，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一事，在意大利引起了强烈不满，因为在意大利有一种想法（没有外交基础），认为特伦蒂诺没有归还之前，是不应该有此之举的。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意俄协议——在此之前已有 1908 年 8 月的英俄协定——并在拉康尼兹具体地就巴尔干人民的独立签订了各项协定（1909 年 10 月）。在协定中俄国方面还承认意大利对的黎波里的愿望；法国和英国早已承认（1902 年）。

意大利这个愿望有其理由，必须不放弃地中海南部海岸，不把其交给别人手里；这个愿望是在庆祝意大利王国五十周年后不久通过意土战争实现的，由于过去和现在所做的外交工作而没有遭到列强的反对。1911 年 9 月 29 日，意方宣战，战争以《洛桑条约》（1912 年 10 月 18 日）结束，根据条约，土耳其放弃在的黎波里的主权，随后各大国相继承认利比亚并入意大利。战争中，还占据了罗迪和爱琴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尽管外交上遇到一些麻烦，但占领在当时是临时性的，因欧战爆发才成为长期性的。

利比亚战争是在焦利蒂第四任内阁（圣朱利亚诺任外长）期间发生的。焦利蒂在准备和领导殖民事业时，内政上还企图维持自由-民主的进程。通过了人寿保险国有化和几乎近于普选的选举改革（1912 年）。这项改革规定，除具备 1882 年法律规定的资格者外，凡服过义务兵役，或年满三十岁的人，也有选举权。选民从三百五十万一下上升到八百万。然而，焦利蒂没能避免，也许没有完全觉察到政党内部和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政治斗争加剧，反自由倾向抬头。一部分社会党人又采取好斗的、革命的方针，其首领是 1912 年起担任《前进报》主编的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 年）。这种倾

向在 1912 年雷焦艾米利亚党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引起了最坚决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分裂，在比索拉蒂的领导下，组成改良主义社会党。此外，出现了带有帝国主义和独裁倾向的国家主义运动，它既反对传统自由主义，又是激进党派的对头，但它同天主教的某些人结盟。

1913 年 10—11 月的选举采用新选举法，结果一个人数大增的——社会党人增加了一倍——更加好斗的极左派进入了议会。激进党内也出现了反内阁倾向。焦利蒂辞职，由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桑尼诺派人，现参加焦利蒂派）组成新内阁（1914 年 3 月），激进党人没有参加。安东尼奥必须应付 6 月在罗马涅和马尔凯举行的、得到革命社会党人支持的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动乱（“红色星期”）。极右派和极左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日趋激烈。

第二十一章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126　欧洲战争

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内部环境中，欧洲战争加速了旧政党的大变动和政治社会情况的大混乱。继1912—1913年的利比亚战争之后的两次巴尔干战事，造成巴尔干国家瓜分了几乎整个土耳其欧洲部分（阿尔巴尼亚独立，但处于奥意之间很难平衡的霸权之下），导致大塞尔维亚的形成，它对奥匈帝国下的南斯拉夫人具有领土收复主义的诱惑。奥匈帝国利用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者刺杀皇储弗兰茨·斐迪南（1914年6月28日）之机，向塞尔维亚发动了“防御战争”。俄国出面干预，支持塞尔维亚，于是爆发了“三协约国”（法国、俄国、英国）对两中欧帝国的战争（稍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参加帝国一边，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鉴于战争是由其盟国的进攻所引起的，意大利从法律上说理所当然不予干预，而且它的利益被奥地利在巴尔干国家的霸权企图所损害；于是宣布中立。欧洲战争及意大利中立的头几个月后，在意大利关于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爆发了激烈的辩论。针对主要由社会党和教士阶层鼓动的、在保守-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中有广泛影响的维护和平倾向（中立主义），形成了坚决支持意大利进行干预，反对中欧帝国集团。国家主义分子、民主分子，还有社会党人和工团

分子纷纷会集于此，一起向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贝尼托·墨索里尼因社会党采取中立主义而退出该党，积极投身于干预运动，站在最前列。意大利政府很快确信干预是必要的，但须做军事和外交的必要准备。军事上，由总参谋长路易吉·卡多纳筹划；外交上，由外长迪·圣朱利亚诺（1914 年 10 月去世）和桑尼诺疏通。桑尼诺为向奥地利说明情况，开始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第七条（在奥地利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情况下应给予意大利一定的补偿）同奥举行谈判。奥地利拒绝接受让出其意大利领土的原则，于是开始同三协约国的谈判。最后，正当奥方迟迟才决定做某些领土让步时——大大少于意方的要求并且希望推迟到战争结束时归还——意政府同协约国签订了《伦敦协定》（1915 年 4 月 26 日），并宣布废除《三国同盟条约》（5 月 3 日）。这一切都是在外交上秘密进行的。这时中立派因焦利蒂的态度有所加强——焦利蒂仍得到议会多数派的支持——，他倾向于考虑奥地利提出的进一步让步（《伦敦协定》已告知了他，但是作为内阁的而不是国家的义务），于是萨兰德拉内阁辞职（5 月 13 日）；马肯森攻击俄国人取得初步重大胜利，军事形势起了变化，这也许对他辞职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示威游行（五月事变），要求参战，反对所谓焦利蒂的叛变；国王拒绝萨兰德拉辞职（5 月 16 日），议会授予他参战的全权代表。5 月 23 日，对奥宣战——是在国内矛盾尖锐，国王或政府又都未出面平息和解决的情况下宣战的——，24 日起开战（随后向土耳其和德国宣战）；继萨兰德拉内阁之后，博塞利（1916—1917 年在位）和奥兰多（1917—1918 年在位）组成联合政府，继续推进战争。

尽管意军人数大大超过要对付几方面敌人的奥军，但意大利仍处境艰难，一方面由于从 1866 年遗留下来的军事边境极坏，另一方面没有俄国和塞尔维亚的支援。从斯泰尔维奥山口到亚得里亚海的漫长战线上，存在着被突破的严重危险。面对凭借阿尔卑斯山和卡尔索山口强大工事的敌手，意军只能缓慢推进。正如在法国一样，这里也打着一场壕堑战，而且条件更为严峻，再加上意方装备本来就低劣。意军

还是沿着卡尔索山脊缓慢前进，吸引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奥军。由于1917年3月和11月的革命，俄国战线放弃了对中欧帝国的抵抗，意军的作用就成为举足轻重的了。遗憾的是，这时国内军内士气低落，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巴因西扎高原被攻陷（1917年8月），的里雅斯特形势危急，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干预，同奥地利最高指挥部一起于1917年10月24日在北伊松佐河上游发动了卡波雷托攻势，矛头直指不幸的意大利阵线，因大炮无法发挥威力，攻势效果不大。由于防卫卡尔索一线的第三军团背后防线被突破，加之还没有准备好一条不太纵深的防线，整个意军必须于11月初撤到皮亚韦河畔的格拉帕高原防线。在这里，尽管损失惨重，但意军牢固地守住了新的阵地，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攻击，取得全胜。法国和英国几个师的援军（正如后来向法国派出几个意大利师一样）这时尚未赶到，只好留在后面，以备援助之需，后来也不需要他们参战。阿芒多·迪亚兹将军在新阶段接任高级指挥之职，他比卡多纳更善于博取士兵的欢心，提高他们的士气。直到那个时候，在整个意大利一直处于犹豫不决、争吵不休的公众情绪，此时变得坚定了，充满了抵抗和必胜的愿望。1918年6月（15—22日），奥地利在皮亚韦发动的一次强大的攻势被彻底粉碎。10月底，尤其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动了一次总攻击，总攻于24日开始，突破了阿尔卑斯山和皮亚韦接合部上的奥阵线，粉碎了被内部动乱弄得焦头烂额的奥地利阵线，包围了两股人数和辎重甚众的残部，于10月底和11月初收复全部失地，重新攻占特伦蒂诺。奥高级指挥部要求停战，11月3日在帕多瓦附近的朱斯蒂别墅签字，4日后生效。由于停战条约，德国南部侧翼暴露。早在10月中旬之前，在后方爆发奥匈帝国内非德意志人和非匈牙利人民的不可遏止的起义，导致奥匈帝国的瓦解；在军队中也有反应。查理皇帝徒劳地宣布（10月16日）把帝国变成联邦；捷克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还有德意志人及匈牙利人着手建立各自的国家。的里雅斯特宣布并入意大利。

早在突破奥阵线之前，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阵线已崩溃，而德国阵线，在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美国被德国潜艇的肆意行动所激

怒，于1917年参战）的压迫下，从7月下旬起节节后撤，毫无夺回阵地的希望。德国政府开始同美国谈判后，在德国爆发了革命（11月9日）。德国君主纷纷逃遁，临时政府于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主要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规定了和平条件，并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同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签订《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9月10日）和《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6月4日）。根据和约，建立“国际联盟”，后来战败国也逐渐加入联盟。

战争成果的处理对意大利尤其困难。两个因素使局势变得复杂：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新国家（后来的南斯拉夫）——或多或少受到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反对执行《伦敦条约》；阜姆问题，按照《伦敦条约》，阜姆该归入克罗地亚，而该城要求并入意大利，这正是由奥兰多-桑尼诺政府和全国多数舆论所提出的要求。正当外交家们翻来覆去讨论这一问题时，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力主参战的领头人之一，作为飞行员参加战争，功绩赫赫——率领一伙志愿兵占据阜姆城（1919年9月12日）并担任该城政府首脑之职。同时，民族主义派又提出达尔马提亚问题。最后，经过长期而又复杂的谈判，由最后一届焦利蒂内阁（外长斯福尔扎）同南斯拉夫缔结了《拉巴洛条约》(1920年11月12日)，承认东阿尔卑斯山边界连同整个伊斯特拉全部为意大利所有，布伦纳罗边界按同奥地利的条约所承认的那样。《伦敦条约》规定给意大利的达尔马提亚地区让与南斯拉夫，除意大利的主要城镇扎拉之外；阜姆及其领土变成一个同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接壤的自由邦。还需战胜邓南遮短时间的无力的抵抗并将其逐出阜姆城。1923年，同南斯拉夫签订新条约（1924年1月27日），阜姆城并入意大利，其农村并入南斯拉夫。

127　法西斯主义

战争引起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巨大混乱，大部分欧洲仍能感受到其影响。财富巨大转换；货币贬值；一些人发财致富，另些人贫困潦

倒；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历尽艰难；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常和前者对立）的社会动乱；感情和意识的大变革。战争刚结束，新成立的苏俄共产主义共和国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对欧洲工人群众深具影响，无产阶级运动在其推动下到处走向极端主义；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第三国际，开始时在欧洲及其他地方都有广泛的成功。这个时期是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时期。1920年夏，俄国在波兰战争中遭失败，几乎同时，人们开始看到新俄国的经济状况十分悲惨，政府专断独行，其威望一落千丈。

战后意大利尤为动荡不定。由于弗朗切斯科·尼蒂政府（1919—1920年）的软弱，由于极端分子在社会党内占上风，而另一方变得更具战斗性，由于有关战争结果的争论，又由于议会生活的种种困难，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混乱和骚动，在这里就显得更敏感更显著。1919年11月，按比例代表制进行的普选后——根据战时议会在解散前通过的新规定——社会党和人民党（也即天主教党）这两大党在议会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而其余席位分散于许多派别和小团体中。实际上，社会党无力搞成革命，它自禁于强政之中，拒绝与政府合作；人民党同政府合作并参加政权，但其内部有各种教派准则，意见分歧。工人罢工和动乱接连不断，甚至暂时占领工厂（1920年9月）；其中还有再次燃起的中立主义分子的激情和积怨，并引起了一些进攻性事件，但多出于公民纪律，而不是出于爱国感情。占领工厂事件迅速和平解决后，布尔什维克倾向在无产阶级内部渐弱；在1921年初，它分裂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后者为大多数）。在最后一届焦利蒂内阁（1920年6月至1921年6月）治理下，政府工作无论在维持秩序上，还是在恢复财政上，都有明显改善。新大选后，焦利蒂辞职。大选没有带来根本的变化，后继者博诺米和法克塔既不能控制议会局势，也不能平息国内的冲突。

在这种气氛下，由贝尼托·墨索里尼（见第125节）创建和领导的法西斯运动（1919年3月23日于米兰）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墨索里尼在煽动和组织“群众”方面有着非凡的禀赋。各种思想倾向都向

他这个运动会合，所有的派别都受他左右；由关于战争结果的争论所加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特别在农业艾米利亚地区与社会主义专权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被战争精神所弄得晕头转向的小资产阶级的冀望和不安。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广泛的组织良好的“法西斯行动队”向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地施行暴力。“法西斯行动队”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是利用了政府当局的软弱和默许。特别是在1922年8月1日社会党企图发动总罢工之际，它大打出手，奠定了暴力行动的基础，从而站稳了脚跟。焦利蒂因不了解法西斯的性质及其危险，对法西斯——尽管一点也不支持暴力行动——袖手旁观，希望用宪法秩序引导之，反对暴力镇压，担心引起内战。

1922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部署了法西斯分子总动员，于28日开始“向罗马进军”。实际上，那只是一种迷惑人的炫耀。已经辞职的法克塔第二届内阁打算宣布紧急状态；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因害怕运动发展成反君主政体，有利于亲法西斯的奥斯塔公爵，也许还由于怀疑军队的忠诚——予以拒绝，企图组成萨兰德拉-墨索里尼内阁。萨兰德拉拒绝后，他召唤墨索里尼主政。墨索里尼立即组织新政府，也把旧党的一些人拉进政府，但不同那些党谈判（他本想把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成员也收罗进去，但因其同党的反对，遂打消了这一念头）。随后开始了国家逐步地，并掩饰得极好地向法西斯转化的过程；开头的措施是，除已有的“法西斯行动队”外，再成立法西斯民兵（国家安全自愿民兵）。1924年4月，根据新选举法并在法西斯的压制下选出了新议会，形成一个支持政府的绝大多数派，当然其中的议员不全是法西斯分子。在选举斗争中各自为战的反对党少数派（一个民主主义者小组，人民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大部分）放弃了反法西斯的联合，而且墨索里尼事先禁止这种联合。在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遭劫持和暗杀（6月）后，纷纷退出议会（所谓的阿文蒂诺分裂），但没有在全国作深入的斗争，只等待国王的干预。焦利蒂在议会中领导的一个小小的反对派小组——迄那时为止他一直支持政府——在议会中孤军奋战，萨兰德拉和奥兰多也加入了这一派别。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向阿文蒂诺反对派挑战，宣布自由-立宪政权最终向法西斯政权过渡。在1925年和1926年之间，法西斯主义政权大量使用政府和党的力量，击溃了反对党，解散了除法西斯党外的所有政党，成立了特别法庭，大量流放，新闻出版全部法西斯化，把工人紧紧地禁锢在法西斯工会组织里（解散了社会党和天主教联合会）。这样，在未遇到国王抵制的情况下，墨索里尼实现了法西斯国家对自由-宪法国家的替代。

墨索里尼称法西斯主义为“独裁民主主义”，更正确地说是“极权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体，在这政体下，政府就是君主，权力由上而下贯彻，政府自认为能代表人民的愿望并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它要通过有组织的、严格控制的定期公民投票或人民“集会”，接受公民的认可，但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政治斗争自由。政府尽可能地领导和完全控制整个国民生活。国家法西斯党在法西斯政府和人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并不代表同其他的政治派别斗争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不允许有其他派别），而是一个服务于法西斯国家的组织，向国家输送官员的组织，国家元首依然是国王，国家还是君主政体形式，萨沃依王朝也被法西斯所接受。国王任命的政府首脑应是法西斯党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是正式指定的领袖。政府首脑对整个政府活动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将几个极富重要性的政府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将其他的职责分配给其余部长，这些部长都是国王按照他的旨意任命的，是从该党的队伍中调出来的，他有时甚至亲自担任几个部的要职。事实上，他拥有绝对权力，从上到下没遇到任何阻力。然而，党极大地干预日常行政管理，腐败、堕落现象极为严重。在他身边有一个1923年1月成立的磋商机构——法西斯大议会，后来进一步完善了其职权。大议会由部长及党的要员组成。政府除行政权外，在许多情况下行使立法权，颁布无数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然后再由法西斯化了的议会通过批准。

直到1938年，普通立法权形式上仍由参众两院行使。参议院没有形式上的改变；但渐渐地充满了忠于政权的分子；几乎所有的“旧

人”都归入参议院，支持政权（阿尔贝蒂尼、克罗齐、弗拉萨蒂和鲁菲尼极其例外）。在王家参议院，君主政体和法西斯之间的密切联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众议院于1929年裁减议员（四百人）并改革机构。工会组织和其他全国性协会指定许多候选人小组，由大议会做最后的选择，随后在“极权”环境内按全意大利唯一一张候选人名单举行公民选举。这就开始了以政府直接任命的法西斯党和劳资组合的众议院替代代表制的众议院。相反，立即着手地方行政管理的根本改革：解散省市议会，废除选举产生的议长，代之以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和协商机构。

法西斯国家也取名为“组合”国家。“劳动法”（1927年4月21日）宣布作为社会义务的劳动为公民的基本活动。劳动者和雇主组成各法西斯工会，各法西斯工会又成立联合会，这些组织均为国家机构，受政府领导。这种工会组织——其中雇主组织有着和工人组织完全不同的权力和分量——主管劳动集体合同，一切行业必须普遍地签订这种集体合同。罢工和夜生活被禁止，劳资纠纷由专门的劳动司法部门加以调解。社会政策有重要发展，诸如工人退休、四十小时周劳动时、工余活动等。同时工会组织着手权威地调解在生产中互相竞争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为了从国家总利益的观点出发调节生产，从1933年12月起创立了劳资组合，各生产行业的代表按大的生产部门加入劳资组合。这些组合产生了官僚垄断机构。其目标是“调节经济”。在最后一段时期内，“自给自足”的倾向越发显著，在国内旨在尽可能多地生产各类主要产品，以满足经济生活，尤其是满足国家战争机器的需求；货币、兑换、银行、对外贸易均由政府控制。

推行实施重大公共工程的政策（有些过火和炫耀）旨在增加国家生产和经济设备。开展“小麦战役”，企图在全国土地上种植小麦，全部或几乎全部满足消费的需要，从而牺牲效益高的种植业。颁布“全面改良土壤”法，全面规划对未耕地和沼泽地的整治和开发。这一事业在逢蒂内沼泽地特有成效，在那儿建立了许多新的居民区，成立了一个新省——利托里亚省。与大力发展农业相关的是国家人口的

增长。人口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因为意大利已经人满为患）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种种的后患。虽然如此，“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还是值得一提的，应给予好评。许多城市按城镇规划大兴土木（常常是十分难看）；在罗马进行工程浩大的考古发掘，清理出帝国广场，取名“帝国古道”。由于肆意拆毁和滥建，损坏了城市的面貌。

法西斯政权倾其全力同天主教搞好关系，企图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支柱。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同教皇庇护十一世（拉蒂，于1922年选为教皇，继任1914年当选的本尼狄克十五世德拉基埃萨）签订的《拉特兰条约》。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明确表示其支持和钦佩之情。通过条约解决了罗马问题；教廷对“梵蒂冈城”享有充分的主权，教廷承认意大利主权。同时还签订一协议解决了国家和教会在意大利的关系，其中规定：除小学外，中学也设宗教课；宗教婚礼同世俗婚礼同样有效，宗教法庭有婚姻裁判权；以及其他有利于教会和教士的措施。尽管还出现一些临时摩擦，但两个权力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联盟关系。

法西斯政权最关注的是国家的军事力量，极力更新军事工业的设备，创立庞大的空军，发展全民的体育和军训。为此，在国家教育部的领导下，建立“少年先锋队”，后改为“意大利利托里奥青年团”，直属于党；参加该组织的青年，年届十八岁时，以“法西斯青年”的名义转为法西斯党员。后来实践证明这种军事增长是相当表面的，实际上不那么强大；而由于法西斯化，军队吃了大亏。

在国际事务上，法西斯政权的活动极为频繁。越来越突出的方向是“修正论”。它反对和平条约，反对目前国际力量的布局，倾向于扩张主义。但意大利参加了《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16日），同英国一起保证德、法、比利时之间关于互相尊重领土完整所承担的义务。又在巴黎签署了《凯洛格公约》（1928年8月27日），根据条约，世界上所有国家宣布放弃作为国策工具的战争：庄严的宣言，却没有切实的制裁措施。法西斯政府积极参加部分在国际联盟范围里进行的裁军谈判。通过《华盛顿条约》（1922年）、《伦敦条约》（1930年）

以及随后的其他条约，确定了海军大国之间海军装备的限额规定。但1932 年 2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却没有什么结果。关键的障碍是德国武装的新规定，德国不愿再遵守凡尔赛条款。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大规模地扩军，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3 年 10 月），重建空军（1935 年 3 月）和实行义务兵役制，谴责《洛迦诺公约》（1936 年 3 月 7 日），重新军事占领由《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莱茵河区。1935 年初，意大利和英、法有过一段紧密协议时期。其主要表现为：墨索里尼和法国外长赖伐尔于罗马（1935 年 1 月 7 日）缔结意法协定，其意图在意法团结一致对抗德国的扩张，保护奥地利的独立，促进多瑙河沿岸各欧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试图解决法意间各种悬而未决的殖民问题）；意、英、法斯特雷萨会议（1935 年 4 月），会上就欧洲政治的根本问题，特别关于德国重整军备问题，制定了共同的方针。

“斯特雷萨政策”被埃塞俄比亚问题所搅乱。1935 年，为了意大利跻身于大殖民帝国行列，为炫耀其武力以雪阿杜瓦之耻，墨索里尼决定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国际联盟——埃塞俄比亚于 1923 年参加了该组织——反对意大利的行动，宣布其为侵略行径，决定予以经济制裁；但制裁是有限的，大部分流于形式，它未能阻止意大利的战争行动，甚至使用瓦斯。从 1935 年 10 月初起，战事从提格雷和索马里两条战线展开，在巴多利奥元帅的指挥下，占领亚的斯亚贝巴，于1936 年 5 月 5 日战事结束。5 月 9 日，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称埃塞俄比亚皇帝，墨索里尼欢庆帝国重返罗马城。7 月，国际联盟撤销制裁，但不承认新的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政府先后予以承认。法西斯政府不参与国际联盟的工作，越来越坚定地同希特勒的德国结成紧密伙伴（“罗马-柏林轴心”）。1937 年 11 月 6 日，意同德国、日本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所谓的《反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日益暴露出一副反英美战争机器的面孔。12 月 11 日，意大利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时国际局势大变，罗马和斯特雷萨协定已失效（《洛迦诺公约》亦然），1938 年 3 月，奥地利被武力并入德国（墨索里尼

先前把这种并吞比作是意大利的战争失利）。

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精诚团结表现在——除了墨索里尼访问德国（1937 年 9 月）和希特勒访问意大利（1938 年 5 月）——这两个大国从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佛朗哥于 1936 年 7 月举事反对“人民阵线”的共和国政府，于 1939 年 3 月上台成了国家的唯一主人（“领袖”），企图建立类似于法西斯和纳粹的政权。成千上万的“兵团将士”，所谓的“志愿军”，大部从意大利出发，踏上西班牙国土，他们对佛朗哥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意大利支持佛朗哥的行动旨在反击由苏俄和各国际左派党，尤其是法国各党对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支持行动，然而后者的行动效力不大。在某个时候，好像欧洲和平受到西班牙问题的威胁；但是，由于大国间的“不干预”协定正式出笼，危险得到避免。这是法英面对法西斯的干预在被动状态下签署的。

另一次更严重的国际危机是 1938 年 9 月出现的，是由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德国人问题引起的。德国援引人民自决原则，要求并入帝国。法国宣布有意支援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可能的进攻；英国表示倾向于同法国并肩一起介入；法西斯政府则声称，一旦爆发欧洲战争，它将站在德国一边。然而西方两大强国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服，接受让出领土的原则；就在德国出兵进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前夕，四强政府的首脑（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会议上（9 月 29—30 日）最终敲定了割让原则。不久（11 月），意、英在 4 月达成的一项重要协定正式生效；相反，意大利政府宣布（12 月）1935 年 1 月同法国签订的协定无效，以 11 月 30 日向众议院一次示威行动开始向法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却无明确目标的领土收复运动。

法西斯政府继续与纳粹政策同流合污，于 1938 年秋以保卫意大利人种为由颁布了排犹的激烈措施，凡是战后移居意大利的外国犹太人一律驱逐出境，而那些意大利犹太人实质上大大缩小了他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意大利法西斯比纳粹分子较为温和，尤其是不搞希特勒式

的暴力活动和大屠杀）。最后，1938 年 12 月，用法西斯党和劳资组合来代替议会的迹象，这时已成法律，且由政府直接颁布。由于宪法的这一改变，自由民主选举制的最后一个剩余物也随之消失了，独裁-极权国家的大厦也随之竣工，国王彻头彻尾背叛了他效忠宪法的誓言。

1939 年 5 月 22 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正式结盟，只要一方卷入战争，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对另一方均有效。最新的事件——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 月），墨索里尼占领阿尔巴尼亚（4 月）；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提出领土要求——使战争迫在眉睫。1939 年 9 月 1 日，波兰和德国爆发战争（德向波兰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随后（9 月 3 日），英法向德宣战。经过一段“非交战状态”后，1940 年 6 月 10 日墨索里尼决定意大利和德国一起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记

墨索里尼参战之日，法国已被德军节节胜利的推进（1940 年 5 月 9 日开始，穿过比利时和荷兰）逼得无喘息之机。6 月 13 日巴黎失陷。6 月 22 日，法国贝当新政府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五分之三的国土已被占领）；24 日，在意大利于西线发起短促攻势后，意法签订停战协议，意大利得到少量的土地，而把全面领土要求留待战争结束后解决。

意大利战争是针对英国，在地中海（马耳他）、利比亚（埃及）和东非与英国作战。在东非占领了卡萨拉（7 月 5 日）和英属索马里；格拉齐亚尼将军从昔兰尼加向埃及推进（8—9 月），随后又被英国的猛烈反攻逐回（12 月），英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昔兰尼加（在塔兰托，11 月 12 日英国的鱼雷轰炸机狂轰滥炸意军舰，造成重大损失）。在德-英空战战线上，英国的空军完全阻止了德国的攻击（1940 年 9 月）。对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轰炸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并未动摇英国首相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抵抗运动。德国不敢贸然入侵英国。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后者从 1937 年起发动对华战争，同盎格鲁-撒克逊诸强关系紧张）缔结《三国同盟条约》（1940 年 9 月 27 日），从政治上讲，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态。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在法国，贝当和赖伐尔建立了亲德的极权政权。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一个法国抵抗的核心在英国

形成。

意大利法西斯战争最不幸的事件是在 1940 年 10 月底以极少的部队进攻希腊（人们认为希腊要崩溃）。希腊人殊死抵抗，胜利反击，深入到阿尔巴尼亚南部。

1941 年 3 月，贝尔格莱德发生政变，尚未成年的彼得二世上台执政，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刚加入的《三国同盟条约》。接着，德国在意大利的配合下进攻南斯拉夫（4 月）。一个星期内，南斯拉夫军队被击得粉碎，国家被肢解。塞尔维亚被德国占领，在贝尔格莱德扶植起一个“傀儡政府”，同时在克罗地亚建立了一个在安特·巴韦利奇统治下的新国家，与轴心国结盟（克罗地亚的王冠保留给斯波莱托的艾莫内公爵，但仍在期待之中），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和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并入意大利。德军穿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希腊战线全线崩溃；希腊也为轴心国所占（4 月 27 日雅典失守）。

在欧战前夕，希特勒德国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8 月 23 日），波兰被攻克之后，两国瓜分了波兰领土。两国的良好关系使人回想起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的联盟，但战争一年后关系开始恶化。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在宣战的同时大举入侵俄国。德军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参战。不过俄国战线没有溃散。列宁格勒顶住了德军的攻击，挫败了德军的锐气。晚秋时德军向莫斯科发起的攻势宣告失败。当时俄国同英国和波兰结盟。

在非洲，意德在 1941 年 4 月大举反攻，夺回昔兰尼加；年底，英国又发动新的攻势，一直推进到班加西（12 月），随后，意德在 1942 年 1—2 月份发起反击，一直打到德尔纳。1941 年 3 月，英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势不可挡。总督奥斯塔公爵于 5 月 19 日在安巴·阿拉吉投降。意属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也被占。

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参战。罗斯福总统早就赞成参战，但“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根深蒂固。罗斯福还是执行了一条越来越强烈支持英国的政策。1941 年 8 月 14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声明的

《大西洋宪章》宣布两国的政治团结一致。日本针对美国反对其掠夺中国的行径，〔于1941年12月7日〕未经宣战悍然袭击珍珠港，重创美国舰队。这一行动更促进了美国的决心。美国、英国及英联邦自治领、荷兰对日宣战，德意对美宣战；拉丁美洲在不同程度上声援美国。这样战争真正变为世界性战争。

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入侵暹罗、婆罗洲、菲律宾。12月25日，香港失陷；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失守；2月5日，新加坡被占；3月9日荷兰军队在爪哇投降。日本的入侵，东北达到阿留申群岛，西南延至缅甸，南部深入新几内亚。然而，1942年中，美国海、空军力量已经崛起（珊瑚岛之役）；年底，英美地面部队实力大增（在新几内亚）。

可是，真正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在北非和苏联南部。意-德春季新攻势一直打到离亚历山大几百公里的阿拉曼（7月）。10月25日，英军开始反攻，给轴心国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被德军抛弃的意军伤亡更是巨大。年底，英国人已挺进锡尔特——马尔马里卡的入口。同时，美国在英国的协同和帮助下，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1942年11月），受到当地法国人的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政府设在北非。轴心国以占领突尼斯来反击。英国于1943年1月未遇抵抗，顺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以美、英、法为一方，意、德为另一方在突尼斯展开斗争。1943年5月11—13日，战斗结束，轴心国军队投降。

1942年11月，苏联在南线开始推进，并扩大到其他战线，势不可当，一直攻到柏林。第一个伟大事件是收复斯大林格勒，全歼德国兵团（1943年2月）。冬季，又收复大部分乌克兰领土，北部列宁格勒之围被解（1月），在进军斯摩棱斯克的路上攻陷瓦兹玛（3月）。

在整个的1942年，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轰炸愈趋减弱，英国（和英、美）对德、意的轰炸反而日趋加强，轰炸令人恐怖，残酷无情（尤其对德国的轰炸）。轴心国的潜艇活动极其频繁，盎格鲁-撒克逊诸国损失惨重；而后，盟国几乎全部粉碎了这种活动。

轴心国丢失突尼斯——“联合国”（称呼那些从1942年1月1日起反对三轴心国的国家）完全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是进犯意大利的先兆。1943年7月13日，美、英登陆西西里，月底控制了整个西西里岛。

意大利人民衷心拥护意大利开始时抱的中立态度，后来又厌恶战争。接二连三的失败、飞机的狂轰滥炸、经济混乱、对实行真正占领意大利的德国人的反感，这一切使战争日益不得人心，从未熄灭的反法西斯运动越发蓬勃发展，迅速获得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反法西斯民主政党，从共产党到天主教民主党，纷纷组织起来，结成联盟。1943年春，意大利已潜伏着反纳粹法西斯和反轴心国战争的抵抗运动。1943年3月，北部意大利爆发工业大罢工就是有力的征兆，罢工持续了将近二十天，打破了工人阶级强制的沉默。法西斯政党内部也四分五裂，酝酿着对“元首”的反叛。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利用7月25日晚上法西斯大议会投票反对墨索里尼之机，将他辞退，并加以逮捕。国王召请巴多利奥元帅组织不问政治倾向的内阁。但新政府宣布继续进行战争。同国王的计划相反，国内民众立即团结一致要求反对法西斯（或者反对纳粹法西斯），反对战争，政府被迫解散法西斯党，开始秘密同盟国谈判，这时盟国正在加紧轰炸意大利。

谈判导致9月3日同英美签订秘密停战（短期停战），29日达成“长期停战”，全面投降。9月8日公布停战协定后，德国人——7月25日加强对意的占领，王国政府对此无反应——到处调转枪口进攻意大利军队（大部分部署在巴尔干半岛）。由于意军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指示——国王和巴多利奥撤离罗马时没有对军队发出任何指示——，由于幸存的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德军彻底打垮了意大利军队。经过孤军奋战后，罗马于9月10日投降。在北部意大利，墨索里尼组成一个法西斯新政府（墨索里尼由德军救出），建立“社会共和国”，首都选在萨洛（布雷西亚）。

9月3日，英、美军队登陆卡拉布里亚，11日攻入萨莱诺。在布

林迪西重组巴多利奥政府后，意大利于10月13日向德国宣战。意大利被盟国承认为“参战国”。少量的正规军（盟国不给更多的装备）为解放意大利英勇地参加反德战争。广大的游击队战士活跃在后方和北部意大利，勇敢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游击战。

盟军极其缓慢地从半岛的一端向另一端推进，狂轰滥炸为其开路。1943年10月1日占领那不勒斯；1944年6月4日才夺下罗马；8月4日攻下佛罗伦萨。继而长时间滞留在“哥特防线”。只是在1945年4月下旬，防线崩溃；同时爱国者于4月25日起义，占领北部意大利诸城。4月29日，在意大利的德国指挥部在卡塞塔签字投降。墨索里尼被爱国者捉获，于4月28日被枪决。

意大利投降几天后，德国投降。俄国人在1943年夏和1944年夏之间除解放本土外，还向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推进。1945年冬春之际，俄国人占领了整个东部德国，猛攻柏林。与此同时，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西部战线”。西线的英、美军队——戴高乐政府的法国正规军也参战，并得到爱国者的配合——在那一年内解放了整个法国。1945年3月，军队穿过雷诺河；发动钳形攻势，东西两路大军会师，5月7日迫使德国投降。希特勒失踪，传言自杀身亡。

随后，在盟军海空压倒优势（还有原子弹）的攻击下，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9月2日签字。

9月8日后，反法西斯政党，抵抗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发展其组织（在德占意大利区处于地下），联合组成民族解放委员会，在罗马和米兰设立两个中心。这时形成了一股主张共和制的强大势力，反法西斯力量和“抵抗运动”的大多数认为萨沃依王朝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负有主要的责任。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六个政党中，第一个和最热衷于以共和制为先决条件的是“行动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也表示赞同共和制，而劳工民主党、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党意见分歧。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君主政权间发生冲突，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也受到盟国的压力）必须与之达成协议：1944年4月，他宣称“彻底”引退，从

解放罗马之日起生效，将王国交与皮埃蒙特亲王翁贝托摄政；体制问题的解决等战争结束后由人民裁定。“老”共和分子不接受妥协，因而留在政府之外。

1944年6月9日，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伊瓦诺埃·博诺米在上述基础上组成六党联合政府；12月，在一次政府危机后，又组成了第二届政府，行动党和社会党没有参加。意大利北部解放后，于1945年6月组成帕里内阁（民族解放委员会内有代表的六个党都参加），帕里是北部意大利游击队领袖；继帕里之后，天主教民主党党魁德加斯佩里于12月重组六党联合政府。这几届内阁度日维艰，百废待兴，要解决国民生活的物质需求，要开始重建，要整顿乱哄哄的公共秩序，要进行政治上的舌剑唇枪，要尽一切努力参加不大受盟国支持的战争。尽管如此，它成功地站稳脚跟，开动了国家机器，挽救了民族于饥饿困死之中，保护了经济活动的复苏，有效地组织了交通运输，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各政党同舟共济，携手合作。首先由于私人企业的活动，经济重建工作得以迅速有力地进行。

自法西斯上台后，第一次真正自由选举的最后准备工作就落在德加斯佩里内阁身上。第一届波诺米内阁初期，确定召开立宪会议，为新的立宪机构做出决定；后来，这一决定被修改（按国家咨询会议支持的意见）。首先由公民投票决定实行“君主制或共和制”，同时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其任务是制定和通过新宪法。

在指定的双重投票之日（6月2日）前，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于5月9日逊位，由翁贝托二世继位：左派组织对这一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认为摄政政权仅代表选举之前双方接受的过渡形式。1946年6月2日，公民投票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根据最高法院6月18日公布的最后官方数字，共和制获12 717 923票，君主制得10 719 284票。国王翁贝托早在13日就离开了意大利，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从未明确认可人民的这一裁决（有违于他曾庄严地反复地承担的义务）。

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天民党得票领先，获八百万票和二百零七

个席位，无产阶级联合社会党得四百七十万票和一百一十五个席位，共产党得四百三十万票和一百零四席位。排在其后的是其他形式的左翼、右翼政党，其中意大利共和党（前面提到过的“老”共和分子）得票近一百万票和二十三个席位。立宪会议于 6 月 25 日召开，28 日恩里科·德尼古拉以极大多数票当选为国家临时总统。他委任德加斯佩里组织新阁。他于 1946 年 7 月 12 日组成共和国第一届政府，一个由三大党和“老”共和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立宪会议致力于制定和讨论新宪法。1947 年 12 月 27 日德尼古拉签署新宪法，1948 年 1 月 1 日宪法生效。新宪法规定：意大利是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共和国总统由两院（有地方代表参加）选出，任期七年；政府由总统提名，其任免由两院投票决定；立法权属于两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举行公民投票。国家行政组织划分为区，区在宪法范围里有广泛的自主权和立法权。然而，直到今天，新机构仍未实施其职能，除某些偏远区外（瓦莱·达奥斯塔、特伦蒂诺-阿尔托阿迪杰、西西里、撒丁岛）。宪法中还有一条款，批准《拉特兰条约》，规定教会和国家均是独立和主权国家，并宣布宗教自由。

1947 年 2 月 1 日，在没有意大利参加的情况下（只是简单地听取了她的意见）在巴黎签订了意大利和联合国之间的和约。根据和约，意大利在西部失去蒙塞尼西奥、布里加和坦达高地（割给法国）；东部威尼斯朱利亚的大部让给南斯拉夫；设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由联合国监管。此外，意大利让出多德卡尼斯群岛（交给希腊），其殖民地留待战胜国决定。意大利应减少海陆空力量，向某些战胜国偿付一定的战争赔款。1947 年 7 月 31 日，立宪会议批准条约。条约批准后，同意意大利进入联合国（按照条约精神），也即进入 1945 年 6 月在旧金山成立的这一世界性组织；苏联希望同时接纳美国不同意的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苏联的提案多次被否决。通过各种双边谈判，就条约中对意大利最有压迫性、最有害的条款（除领土外）做了物质上和道义上的修改。

1948 年 3 月，西方三强——美、英、法——考虑到的里雅斯特自

由区无法行使职能，向苏联提议把它归还意大利。苏联不接受建议，坚持设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意大利声称它随时准备以三国声明为基础直接同南斯拉夫缔结协定，按照人种标准修正边界；南斯拉夫不接受这一谈判基础，在它管辖的的里雅斯特自由区（B区）内开展一系列非民族化和并入南斯拉夫国家的活动。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还出现意南剑拔弩张的时候，终于（1954年10月5日），意、南、美国和英国在伦敦签订《意向备忘录》，备忘录确定意大利接管A区（除一小条边割让给B区），B区仍留在南斯拉夫手里，期限未定。苏联同意协定。10月26日，的里雅斯特真正回到意大利。

关于意大利前殖民地，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1月通过决议，规定利比亚应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已实现）；索马里在十年内建成独立国家，这期间由联合国托管，意大利行使行政权。厄立特里亚稍后并入埃塞俄比亚，但享有某些自治权。

关于意大利新共和国的国际生活，值得一书的大事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1947年和1948年之间，参加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达成一个经济合作协议，美国给这些国家五年的财政援助（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没有参加）。1949年3月6日，意法两国外长签署海关联合计划，但未获批准，实际上被废除。签订《大西洋公约》（1949年4月4日），据约，美国、加拿大和一系列欧洲国家承诺互相支持、反对侵略、进行经济和文化合作。参加“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由部长委员会和议会组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8月在总部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召开。

意大利对东西两大集团的立场在1948年4月18日举行的意大利第一届议会（参众两院）的选举斗争中起着明显的作用。斗争是在“人民民主阵线”（社会党、共产党、独立人士）和政府三党（天主教民主党、共和党和意大利劳工社会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之间展开的。自由党、保皇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也参加了选举斗争。选举极其平静，选民广泛参加（百分之九十二）。天主教民主党获百分之四十九左右的选票，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席位

（三百零七席）；人民民主阵线占一百八十二席位，获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在参议院天主教民主党亦占绝对多数（一百三十对二百三十七）；根据宪法过渡性规定还安排了一些法定参议员进入参议院，这一绝对多数就成了相对多数。5 月 11 日，参众两院联合选出路易吉·伊诺第为共和国总统。德加斯佩里仍为政府首脑，主持天主教民主党多数内阁，并有自由党、共和党和意大利劳工社会党（后改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参加。

自那时起，意大利国内政治局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53 年 6 月 7 日新的政治选举（参议院提前解散，与众议院同时选举，并取消法定参议员）表明社会党、共产党票数增加，而“民主中间派”的四党选票减少，天主教民主党得票稍有减少，三个小党（或像人们常说的“世俗党”）大幅度减少。除临时的，或短暂的事件外，政府一直在四党协议的基础上组成。还要提一下德加斯佩里，他于 1954 年 8 月 19 日去世；在他之前，1952 年 9 月 4 日斯福尔扎去世。在中间派发生变化后，特别同“自由党”（毋宁说是保守党人）发生争执后，天主教民主党组成了几届清一色内阁——最后一届是坦布罗尼内阁，它引起了不小的宪法危机。之后，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共和党、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社会党之间非常艰难地达成新的中左联盟，组成 1962 年 1 月的第三届范范尼内阁。随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也总是相当艰苦地达成统一，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党（1966 年 10 月）。1967 年 5 月的大选肯定了中左联盟，然而，各党间合作困难重重，各党内部“派别活动”十分严重。

酝酿成熟的经济危机使中左联盟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但经济危机很快度过，意大利经济生活开始迅速发展，走上繁荣。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采用了“计划性”的指导方针。

中外人名对照表

A

阿伯拉尔多,彼得(Abelardo,Pietro)

阿达尔贝托(Adalberto)(依夫雷亚侯爵)

阿达尔贝托(Adalberto)(意大利国王)

阿达尔贝托·迪托斯卡纳(Adalberto di Toscana)

阿达洛阿尔多(Adaloaldo)(伦巴第人国王)

阿代尔基(Adelchi)(贝内文托大公)

阿代尔基(Adelchi)(伦巴第人国王)

阿代拉西亚(Adelasia)

阿代马洛·德皮(Ademaro di Puy)

阿道夫·德纳索(Adolfo di Nassau)(德意志王)

阿德莱德(Adelaide)(皇后)

阿德莱德·迪勃艮第(Adelaide di Borgogna)(都灵侯爵)

阿德里安一世(Adriano Ⅰ)(教皇)

阿德里安四世(Adriano Ⅳ)(教皇)

阿德里安六世(Adriano Ⅵ)(教皇)

阿多尔诺,安东尼奥托(Adorno,Antoniotto)

阿尔巴尼,弗朗切斯科(Albani,Francesco)

阿尔贝蒂,利昂·巴蒂斯塔(Alberti,Leon Battista)

阿尔贝蒂尼,路易吉(Albertini,Luigi)

阿尔贝里科一世·迪斯波莱托(Alberico Ⅰ di Spoleto)

阿尔贝里科二世·迪斯波莱托(Alberico Ⅱ di Spoleto)

阿尔贝塔里奥·迪布雷西亚(Albertario di Brescia)

阿尔贝塔里奥,戴维,唐(Albertario,Davide,don)

阿尔贝特(哈布斯堡的)(Alberto d'Absburgo)(德意志王)

阿尔比诺斯(Albino)

阿尔比齐,里纳尔多·德利(Albizzi,Rinaldo degli)

阿尔博诺茨,埃吉迪奥(Albornoz,Egidio)(红衣主教)

阿尔博英(Alboino)(伦巴第人国王)

阿尔布雷,爱洛特·德(Albret,Carlotta d')

阿尔迪戈,罗伯托(Ardigò,Roberto)

阿尔蒂基耶罗·德维罗纳(Altichiero di Verona)

阿尔多布兰迪尼,彼得罗(Aldobrandini,Pietro)(红衣主教)

阿尔杜伊诺·迪伊夫雷亚(Arduino d'Ivrea)

阿尔菲耶里,维托里奥(Alfieri,Vittorio)

阿尔科斯(Arcos)(公爵)

阿萨拉里克(Atalarico)(东哥特人国王)
阿斯普雷,康斯坦丁(Aspre,Konstantin)
阿斯托尔福(Astolfo)(伦巴第人国王)
阿提拉(Attila)(匈奴国王)
阿维,勒内-朱斯特(Haüy,René-Just)
阿维森纳(艾布·阿里·伊本·西拿)(Avicenna)(Abu Alì Ibn Sina)
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卡洛(Asinari di San Marzano,Carlo)
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亚历山德罗(Asinari di San Marzano,Alessandro)
阿泽利奥,马西莫(Azeglio,Massimo d')
阿佐内(Azzone)
埃庇卡摩斯(Epicarmo)
埃德里西(Edrisi)
埃尔科莱一世·德斯泰(Ercole Ⅰ d'Este)
埃尔科莱三世·德斯泰(埃尔科莱·里纳尔多)(Ercole Ⅲ d'Este,Ercole Rinaldo)
埃尔伦巴尔多(Erlembaldo)
埃尔门加达(德西德拉塔)(Ermengarda,detto Desiderata)(查理大帝之妻)
埃尔门加达(Ermengarda)(伊夫雷亚侯爵)
埃克哈特,约翰内斯(又名:迈斯特尔,埃克哈特)(Eckhart,Johannes)
埃莱奥诺拉·迪托莱多(Eleonora di Toledo)
埃利亚·达科尔托纳(Elia da Cortona)
埃莫,安杰洛(Emo,Angelo)
埃涅阿斯(Enea)
埃斯泰(Este)
艾萨克(Isacco)
艾萨克二世·安基卢斯(Isacco Ⅱ Angelo)
安布罗焦(Ambrogio)
安德烈亚(匈牙利的)(Andrea d'Ungheria)(那不勒斯国王)
安德烈奥利·朱塞佩(Andreoli,Giuseppe)
安德洛奈卡二世·帕里奥洛加斯(Andronico Ⅱ Paleologo)(拜占庭皇帝)
安东内利,贾科莫(Antonelli,Giacomo)(红衣主教)
安东内洛·达墨西拿(Antonello da Messina)
安东尼,马可(Antonio,Marco)
安东尼奥,达帕多瓦(Antonio da Padova)
安东尼奥·法尔内塞(Antonio,Farnese)(帕尔马公爵)
安东尼努斯,皮乌斯(Antonino Pio)(罗马皇帝)
安焦烈里,切科(Angiolieri,Cecco)
安杰利科(Angelico)(焦万尼·达菲耶索勒,又叫贝亚托,Giovanni da Fiesole, detto il Beato)
安娜·斯图尔特(Anna Stuart)(英国女王)
安内塞,真纳罗(Annese,Gennaro)
安塞尔莫·达奥斯塔(Anselmo d'Aosta)
安塞尔莫(Anselmo)(卢卡主教,后成教皇亚历山大二世)
安斯佩尔托(Ansperto)
安泰拉米,贝内代托(Antelami,Benedetto)
昂儒(Angiò)
昂儒,贝雅特里齐(Angiò,Beatrice)
昂儒,查理(Angiò,Carlo d')(卡拉布里亚公爵)
昂儒查理一世(Carlo Ⅰ d'Angio)(西西里国王)
昂儒查理二世(跛子)(Carlo Ⅱ d'Angiò)(西西里国王)
昂儒,菲利普(Angiò,Filippo)
昂儒,约翰(Angiò,Giovanni d')
奥戴拉菲,弗朗切斯科(Ordelaffi,Francesco)
奥迪龙(Odilone)
奥多阿尔多·法尔内塞(Odoardo Farnese)
奥多弗雷多·迪波洛尼亚(Odofrrdo di Bologna)
奥多内·迪萨沃依(Oddone di Savoia)
奥多亚克(Odoacre)
奥尔德拉多(Oldrado)
奥尔贾蒂,杰罗拉莫(Olgiati,Gerolamo)
奥尔卡尼亚(Orcagna)
奥尔良,路易一世(Orlèans,Luigi Ⅰ)(公爵)
奥尔塞奥洛,彼得罗二世(Orseolo,Pietro Ⅱ)
奥尔西尼,保罗(Orsini,Paolo)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Felice)
奥尔西尼,弗朗切斯科(Orsini,Francesco)

Fiorenzo)
巴韦利奇,安特(Pavelic,Ante)
巴亚尔,皮埃尔·迪泰拉(Baiardo,Pierre du Terrail)
巴兹尔一世(Basilio Ⅰ)(拜占庭皇帝)
拜巴尔斯(Baibars)(埃及苏丹)
班戴洛,马泰奥(Bandello,Matteo)
班迪耶拉,阿蒂利奥(Bandiera,Attilio)
班迪耶拉,埃米利奥(Bandiera,Emilio)
班迪耶拉,弗兰茨(Bandiera,Francesco)
邦菲利,贝内代托(Bonfigli,Benedetto)
邦吉,鲁杰罗(Bonghi,Ruggero)
邦孔帕尼,卡洛(Boncompagni,Carlo)
邦孔帕尼,雅各布(Boncompagni,Jacopo)
保利,帕斯夸莱(Paoli,Pasquale)
保利,温琴佐·德(Paoli,Vincenzo de)
保利诺·迪诺拉(Paolino di Nola)
保利诺·达奎莱亚(Paolino d'Aquileia)
保罗一世(Paolo Ⅰ)(教皇)
保罗二世(Paolo Ⅱ)
保罗三世(Paolo Ⅲ)
保罗四世(Paolo Ⅳ)
保罗五世(Paolo Ⅴ)
保罗一世(Paolo Ⅰ)(俄国沙皇)
保罗(Paolo)
保罗·迪孔(Paolo Diacono)
鲍德温一世·迪佛兰德(Baldovino Ⅰ di Fiandra)(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
鲍德温二世·迪佛兰德(Baldovino Ⅱ di Fiandra)
鲍姆加登,阿尼基诺·迪(Baumgarten,Anichino di)
贝当,亨利-菲利普(Pétain,Henri-Philippe)
贝尔蒂埃,亚历山大(Berthier,Alexandre)
贝尔戈尼奥内(Bergognone)
贝尔卡里,费奥(Belcari,Feo)
贝尔凯特,焦万尼(Berchet,Giovanni)
贝尔纳多(Bernardo)(意大利国王)
贝尔纳·德克莱沃(Bernardo di Chiaravalle)
贝尔纳多内,彼得罗(Bernardone,Pietro)
贝尔内蒂,托马索(Bernetti,Tommaso)
贝尔尼,弗朗切斯科(Berni,Francesco)
贝尔尼尼,吉安·洛伦佐(Bernini,Gian Lorenzo)
贝尔塔尼,阿戈斯蒂诺(Bertani,Agostino)
贝卡里亚,切萨雷(Beccaria,Cesare)
贝克,亨利(Becque,Henri)
贝拉基一世(Pelagio Ⅰ)(教皇)
贝勒加德,亨利·约瑟夫(Bellegarde,Heinrich Joseph)
贝勒明,罗贝尔(Bellarmino,Roberto)
贝利,焦阿基诺(Belli,Gioacchino)
贝利尼,焦万尼(Bellini,Giovanni)
贝利尼,温琴佐(Bellini,Vincenzo)
贝利尼,真蒂莱(Bellini,Gentile)
贝利萨里乌斯(Belisario)
贝伦加尔一世(Berengario Ⅰ)(意大利国王)
贝伦加尔二世(Berengario Ⅱ)(意大利国王)
贝洛托,贝尔纳迪诺(Belotto,Bernardino)
贝内代托·达马亚诺(Benedetto da Maiano)
贝内利,塞姆(Benelli,Sem)
贝萨里翁,约翰(Bessarione,Giovanni)
贝特朗·德尔·波杰托(Bertrando del Poggetto)
贝托莱,克洛德-路易(Berthollet,Claude-Louis)
贝娅特丽克丝·德滕达(Beatrice di Tenda)
贝娅特丽克丝·迪勃艮第(Beatrice di Borgogna)
贝娅特丽克丝·迪普罗旺斯(Beatrice di Provenza)
本博,彼得罗(Bembo,Pietro)
本蒂沃利奥,焦万尼一世(Bentivoglio,Giovanni Ⅰ)
本蒂沃利奥,焦万尼二世(Bentivoglio,Giovanni Ⅱ)
本蒂沃利奥,圭多(Bentivoglio,Guido)
本尼狄克五世(Benedetto Ⅴ)(教皇)
本尼狄克八世(Benedetto Ⅷ)
本尼狄克九世(Benedetto Ⅸ)

博尔吉亚,切塞雷(Borgia,Cesare)
博尔吉亚,约弗雷(Borgia,Jofré)
博尔索·德斯特(Borso d'Este)
博尔谢里,彼得罗(Borsieri,Pietro)
博卡利尼,特拉亚诺(Boccalini,Traiano)
博卡内拉,古列尔莫(Boccanegra,Guglielmo)
博卡内拉,西莫内(Boccanegra,Simone)
博凯钱佩,彼得罗(Boccheciampe,Pietro)
博雷利,温琴佐(Borelli,Vincenzo)
博利厄,让-皮埃尔(Beaulieu,Jean-Pierre)
博罗米尼,弗朗切斯科(Borromini,Francesco)
博娜·迪萨伏依(Bona di Savoia)
博纳科尔索(Bonaccorso)
博纳科尔西,皮纳蒙泰·德(Bonaccolsi,Pinamonte de')
博纳罗蒂,米开朗琪罗(Buonarroti,Michelangelo)
博纳尤蒂,埃内斯托(Buonaiuti,Ernesto)
博内洛(Bonello)
博尼法乔·迪蒙费拉托(Bonifacio di Monferrato)
博诺米,伊瓦诺埃(Bonomi,Ivanoe)
博塞利,保罗(Boselli,Paolo)
博斯坎,胡安(Boscàn,Juan)
博索·迪多瓦拉(Buoso di Dovara)
博塔·阿多尔诺,安托尼奥托(Botta Adorno,Antoniotto)
博塔,卡洛(Botta,Carlo)
博泰罗,焦万尼(Botero,Giovanni)
博提乌斯,阿尼奇乌斯·塞维里努斯(Boezio,M. T. Anicio Severino)
博瓦迪拉,弗朗切斯科·德(Bobadilla,Francesco de)
博希蒙德·德欧特维尔(Boemondo d'Altavilla)
博絮埃,贝尼涅(Bossuet,Bénigne)
博亚尔多,马泰奥·马里亚(Boiardo,Matteo Maria)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Beust,Friedrich Ferdinand von)
博伊托,阿里戈(Boito,Arrigo)
薄伽丘,焦万尼(Boccaccio,Giovanni)
柏拉图(Platone)
卜尼法八世(Bonifacio Ⅷ)(教皇)
卜尼法九世(Bonifacio Ⅸ)
卜尼法(Bonifacio)
布奥纳罗蒂,菲利普(Buonarroti,Filippo)
布布纳,费迪南·安东·冯·利蒂茨(Bubna,Ferdinand Anton von Littitz)
布蒂利诺(Butilino)
布蒂洛,弗朗切斯科(Butillo,Francesco)
布尔贡迪奥,迪比萨(Burgundio di Pisa)
布尔基耶洛(Burchiello)
布尔加罗(Bulgaro)
布尔拉马基,弗朗切斯科(Burlamacchi,Francesco)
布拉加迪尼,马尔坎托尼奥(Bragadino,Marcantonio)
布拉科,罗伯托(Bracco,Roberto)
布拉曼特,多纳托(Bramante,Donato)
布拉乔·达蒙托内(Braccio da Montone)
布拉乔利尼,波焦(Bracciolini,Poggio)
布拉西,弗朗切斯科·保罗·迪(Blasi,Francesco Paolo di)
布兰卡莱奥内(Brancaleone)
布雷德利,詹姆斯(Bradley,James)
布雷尼奥,安德烈亚(Bregno,Andrea)
布雷希,加埃塔诺(Bresci,Gaetano)
布里安,加尔蒂埃·德(Brienne,Gualtieri di)
布里安,加尔蒂埃·德(Brienne,Gualtieri di)(雅典公爵)
布廖内,戈弗雷多·迪(Buglione,Goffredo di)
布鲁内莱斯基,菲利普(Brunelleschi,Filippo)
布鲁尼,莱奥纳尔多(Bruni,Leonardo)
布鲁诺,焦尔达诺(Bruno,Giordano)
布鲁图斯,马库斯·尤利乌斯(Bruto,Marco Giulio)
布律纳,纪尧姆(Brune,Guillaume)
布斯凯托(Buschetto)
布索拉里,雅各布(Bussolari,Jacopo)

C

D

德拉卡萨,焦万尼(Della Casa,Giovanni)
德拉罗比亚,卢卡(Delta Robbia,Luca)
德拉罗卡,恩利科·莫罗佐(Delta Rocca,Enrico Morozzo)
德拉罗韦雷(Della Rovere)
德拉罗韦雷,焦万尼(Della Rovere,Giovanni)
德拉罗韦雷,朱利亚诺(Della Rovere,Giuliano)(见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德拉斯卡拉,阿尔贝托一世(Della Scala,Alberto Ⅰ)
德拉斯卡拉,阿尔贝托二世(Della Scala,Alberto Ⅱ)
德拉斯卡拉,阿尔博伊诺(Della Scala,Alboino)
德拉斯卡拉,巴尔托洛梅奥(Delta Scala,Bartolomeo)
德拉斯卡拉,坎格兰德(Delta Scala,Cangrande)
德拉斯卡拉,坎西尼奥雷(Delta Scala,Cansignore)
德拉斯卡拉,马斯蒂诺一世(Della Scala,Mastino Ⅰ)
德拉斯卡拉,马斯蒂诺二世(Delta Scala,Mastino Ⅱ)
德拉托雷,菲利普(Della Torre,Filippo)
德拉托雷,圭多(Della Torre,Guido)
德拉托雷,拉法埃莱(Delta Torre,Raffaele)
德拉托雷,马蒂诺(Della Torre,Martino)
德拉托雷,纳波莱奥内(Della Torre,Napoleone)
德拉托雷,帕加诺(Della Torre,Pagano)
德拉托雷,帕加诺(Della Torre,Pagano)(阿奎莱亚牧首)
德莱瓦,朱塞佩(De Leva,Giuseppe)
德卢卡,安东尼奥(De Luca,Antonio)
德鲁苏斯,马可·李维乌斯(Druso,Marco Livio)
德罗戈内(Drogone)
德罗兰迪斯,詹巴蒂斯塔(De Rolandis,Giambattista)
德尼古拉,恩里科(De Nicola,Enrico)
德尼纳,卡洛(Denina,Carlo)
德普雷蒂斯,阿戈斯蒂诺(Depretis,Agostino)
德塞,路易·夏尔(Desaix,Louis Charles)
德桑克蒂斯,弗朗切斯科(De Sanctis,Francesco)
德桑克蒂斯,弗朗切斯科(De Sanctis,Francesco)(建筑师)
德桑克蒂斯,加埃塔诺(De Sanctis,Gaetano)
德斯泰,阿佐(Este,Azzo d')
德斯泰,奥比佐二世(Este,Obizzo Ⅱ d')
德斯泰,奥比佐三世(Este,Obizzo Ⅲ d')
德斯泰,贝亚特里切(Este,Beatrice d')
德斯泰,尼科洛(Este,Nicolò d')
德斯特凡尼斯,弗朗切斯科(De Stefanis,Francesco)
德乌斯,贝特朗·德(Deux,Bertrand de)(红衣主教)
德亚米契斯,埃德蒙多(De Amicis,Edmondo)
邓南遮,加布里埃莱(D'Annunzio,Gabriele)
迪贝莱,若阿基姆(Du Bellay,Joachim)
迪波尔多·达切拉(Dipoldo d'Acerra)
迪蒂洛,纪尧姆(Du Tillot,Guillaume)
迪斯累里,本杰明(Disraeli,Benjamin)
迪亚兹,阿芒多(Diaz,Armando)
迪亚兹,巴托洛米奥(Diaz,Bartolomeo)
笛卡儿,若内(Descartes,René)
狄奥多琳达(Teodolinda)
狄奥多西一世(Teodosio Ⅰ)(罗马皇帝)
狄奥凡(Teofano)(皇后)
狄奥克莱斯(Diocle)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狄赛德里奥(Desiderio)(伦巴第人国王)
狄赛德里奥·达塞蒂尼亚诺(Desiderio da Settignano)
狄翁尼西乌斯(大)(Dionisio Ⅰ il vecchio)(叙拉古僭主)
狄翁尼西乌斯(小)(Dionisio Ⅱ il Giovane)
狄乌迪弟(Deusdedit)(红衣主教)
蒂埃波罗,詹巴蒂斯塔(Tiepolo,Giambattista)
蒂拉博斯基,杰罗拉莫(Tiraboschi,Gerolamo)

E

F

菲利普(施瓦本的)(Filippo di Svevia)
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米兰公爵)
菲洛劳斯(Filolao)
菲亚马,加尔瓦内奥(Fiamma,Galvaneo)
菲耶斯基,吉安·路易吉(Fieschi,Gian Luigi)
腓特烈一世(施瓦本的)(红胡子)(Federico Ⅰ di Svevia)(皇帝)
腓特烈二世(施瓦本的)(Federico Ⅱ di Svevia)(西西里国王和罗马皇帝)
腓特烈三世(哈布斯堡的)(Federico Ⅲ d'Absburgo)(皇帝)
腓特烈(哈布斯堡的)(Federico d'Absburgo)(奥地利公爵)
腓特烈一世(阿拉贡的)(Federico Ⅰ d'Aragone)(那不勒斯国王)
腓特烈二世(阿拉贡的)(Federico Ⅱ d'Aragona)(西西里国王)
腓特烈三世(阿拉贡的)(Federico Ⅲ d'Aragona)(西西里国王)
腓特烈二世(霍亨索伦的)(Federico Ⅱ di Hobenzollern)(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Federico)(鲁吉人的国王)
斐迪南一世(哈布斯堡的)(Ferdinando Ⅰ d'Absburgo)(皇帝)
斐迪南一世(哈布斯堡-洛林的)(Ferdinando Ⅰ d'Absburgo-Lorena)(奥地利皇帝)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Ⅰ)(西西里和阿拉贡国王)
斐迪南一世(费兰特)(Ferdinando Ⅰ)(Ferrante)(那不勒斯国王)
斐迪南二世(费兰迪诺)(Ferdinando Ⅱ)(Ferrandino)(那不勒斯国王)
斐迪南(天主教徒)(Ferdinando il Cattolico)
斐迪南一世(波旁的)(Ferdinando Ⅰ di Borbone)(帕尔马公爵)
斐迪南一世(波旁的)(Ferdinando Ⅰ di Borbone)(两西西里王国国王)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Ⅱ)(两西西里王国国王)
斐迪南七世(波旁的)(Ferdinando Ⅶ di Borbone)(西班牙国王)
斐迪南三世(洛林的)(Ferdinando Ⅲ di Lorena)(托斯卡纳大公)
费边·皮克托(Fabio Pittore)
费尔迪南多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Ⅰ de'Medici)(托斯卡纳大公)
费尔迪南多二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Ⅱ de'Medici)
费尔迪南多·贡扎加(Ferdinando Gonzaga)(曼托瓦公爵)
费尔迪南多·卡洛·贡扎加(Ferdinando Carlo Gonzaga)(曼托瓦公爵)
费拉里,保罗(Ferrari,Paolo)
费拉里,朱塞佩(Ferrari,Giuseppe)
费雷罗,古列尔莫(Ferrero,Guglielmo)
费雷托·达维琴扎(Ferreto da Vicenza)
费鲁奇,弗朗切斯科(Ferrucci,Francesco)
费内隆,弗朗索瓦·德拉莫特(Fénelon,Français de la Mothe)
费奇诺,马尔西利奥(Ficino,Marsilio)
丰塞卡·皮门泰尔,埃莱奥诺拉·德(Fonseca Pimentel,Eleonora de)
丰塔纳,多梅尼科(Fontana,Domenico)
丰塔内西,安东尼奥(Fantanesi,Antonio)
福尔蒂斯,利昂纳(Fortis,Leone)
福尔摩苏斯(Formoso)
福尔泰布拉奇奥·布拉奇奥(Fortebraccio,Braccio)
福尔泰布拉奇奥,尼科洛(Fortebraccio,Nicolò)
福尔泰圭里,尼科洛(Forteguerri,Nicolò)
福加扎罗,安东尼奥(Fogazzaro,Antonio)
福帕,维琴佐(Foppa,Vincenzo)
福斯卡里,弗朗切斯科(Foscari,Francesco)
福斯科洛,乌戈(Foscolo,Ugo)
福松布罗尼,维多利亚(Fossombroni,Vittorio)
福瓦,加斯东(Foix,Gaston)
伏尔泰(Voltaire)
弗拉戈纳尔,让-奥诺雷(Fragonard,Jean-

G

戈拉，埃米利奥（Gola，Emilio）
戈齐，加斯帕雷（Gozzi，Gaspare）
戈扎诺，圭多（Gozzano，Guido）
戈佐利，贝诺佐（Gozzoli，Bernozzo）
格拉蒂安（Graziano）（修士）
格拉古，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Gracco，Gaio Sempronio）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森普罗尼乌斯（Gracco，Tiberio Sempronio）
格拉齐奥利，巴尔托洛梅奥（Grazioli，Bartolomeo）
格拉齐亚尼，鲁道夫（Graziani，Rodolfo）
格拉提安（Graziano）（罗马皇帝）
格拉西乌斯一世（Gelasio Ⅰ）（教皇）
格莱斯顿，威廉（Gladstone，William）
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o）（贝内文托大公）
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o）（伦巴第人国王）
格列高利一世（Gregorio Ⅰ Magno）（教皇）
格列高利二世（Gregorio Ⅱ）
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o Ⅲ）
格列高利五世（Gregorio Ⅴ）
格列高利六世（Gregorio Ⅵ）
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得布兰德）（Gregorio Ⅶ）
格列高利九世（乌戈利诺）（Gregorio Ⅸ）（红衣主教）
格列高利十世（Gregorio Ⅹ）
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io Ⅺ）
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io Ⅻ）
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o XIII）
格列高利十六世（Gregorio XVI）
格列高利·达里米尼（Gregorio da Rimini）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Gluck，Christoph）
格罗西，托马索（Grossi，Tommaso）
贡戈拉-阿尔戈特，路易·德（Gòngora Y Argote，Luis de）
贡扎加（Gonzaga）
贡扎加，费尔特里诺（Gonzaga，Feltrino）
贡扎加，费兰特（Gonzaga，Ferrante）（米兰总督）
贡扎加，费兰特（Gonzaga，Ferrante）（瓜斯塔拉亲王）
贡扎加，路易吉一世（Gonzaga，Luigi Ⅰ）
贡扎加，朱莉娅（Gonzaga，Giulia）
古登堡，约翰（Gutenberg，Johann）
古列尔莫七世（Guglielmo Ⅶ）（蒙费拉托侯爵）
古列尔莫·达西西（Guglielmo d'Assisi）
古列尔莫·迪布雷西亚（Guglielmo di Brescia）
瓜尔贝托，焦万尼（圣）（Gualberto，Giovanni）
瓜尔达巴西，弗朗切斯科（Guardabassi，Francesco）
瓜尔迪，弗朗切斯科（Guardi，Francesco）
瓜尔科，尼科洛·迪（Guarco，Nicolò di）
瓜里恩托·迪帕多瓦（Guariento di Padova）
瓜里尼，巴蒂斯塔（Guarini，Battista）
瓜伊马罗四世（Guaimaro Ⅳ）（萨莱诺大公）
圭迪奇奥尼，焦万尼（Guidiccioni，Giovanni）
圭多（Guido）（米兰大主教）
圭多（Guido）（托斯卡纳侯爵）
圭多·迪斯帕莱托（Guido di Spoleto）（皇帝）
圭尔福六世（Guelfo Ⅵ）（托斯卡纳侯爵，斯帕莱托公爵）
圭拉齐，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Guerrazzi，Francesco Domenico）
圭尼泽利，圭多（Guinizelli，Guido）
圭奇阿尔狄尼，弗朗切斯科（Guicciardini，Francesco）
圭托内·达雷佐（Guittone d'Arezzo）

H

哈布斯堡（Absburgo）
哈布斯堡，阿尔贝特（Absburgo，Alberto）（大公爵）
哈布斯堡，利奥波德（Absburgo，Leopoldo d'）（奥地利公爵）
哈布斯堡-洛林，查理（Absburgo Lorena，Carlo）（大公爵）
哈布斯堡-洛林，斐迪南（Absburgo Lorena，Ferdinando）（大公爵）
哈布斯堡-洛林，弗兰茨·斐迪南（Absburgo

J

K

na)
卡特琳·德美第奇(Caterina de' Medici)
卡图卢斯,盖尤斯·瓦勒里乌斯(Catullo, Gaio Valerio)
卡瓦尔卡,多梅尼科(Cavalca,Domenico)
卡瓦尔坎蒂,圭多(Cavalcanti,Guido)
卡瓦利,弗朗切斯科(Cavalli,Francesco)
卡瓦利尼,彼得罗(Cavallini,Pietro)
卡瓦列里,埃米利奥·德(Cavalieri,Emilio de')
卡瓦洛蒂,弗利切(Cavallotti,Felice)
卡西奥多鲁斯,弗拉维乌斯·马格努斯·奥雷利乌斯(Cassiodoro, Flavio Magno Aurelio)
卡西乌斯·隆吉努斯(Cassio Longino)
卡伊罗利,贝内代托(Cairoli,Benedetto)
卡伊罗利,恩里科(Cairoli,Enrico)
卡伊罗利,焦万尼(Cairoli,Giovanni)
凯鲁比尼,路易吉(Cherubini,Luigi)
恺撒,盖乌斯·尤利乌斯(Cesare,Gaio Giulio)
恺撒,卢西乌斯·尤利乌斯(Cesare,Lucio Giulio)
凯瑟琳(哈布斯堡的)(Caterina d'Absburgo)
坎帕内拉,托马索(Campanella,Tommaso)
坎图,切萨雷(Cantu,Cesare)
坎托尼,卡洛(Cantoni,Carlo)
康茨勒尔,鲁道夫(Kanzler,Rodolfo)
康德,伊曼纽尔(Kant,Emmanuel)
康拉德二世(撒利克法兰克人)(Corrado Ⅱ, il Salico)(皇帝)
康拉德三世(Corrado Ⅲ)(皇帝)
康拉德四世(Corrado Ⅳ)(德意志国王)
康拉德五世(Corrado Ⅴ)
康拉德(Corrado)(亨利四世之子)
康拉德·迪斯波莱托(Corrado di Spoleto)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弗兰茨(Conrad von Hötzendorff,Franz)
康茂德,马库斯·奥雷利乌斯(Commodo, Marco Aurelio)(罗马皇帝)
康斯坦斯(霍恩施陶芬的)(Costanza di Hohenstaufen)(阿拉贡王后)
考尼茨,温策尔·安东(Kaunitz,Wenzel Anton)
科尔蒂,路易吉(Corti,Luigi)
科尔多瓦,冈萨洛·费尔南德斯·德(Cordova,Gonzalo Femàndez de)
科尔内耶,皮埃尔(Corneille,Pierre)
科尔西尼,内里(Corsini,Neri)
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
科莱奥尼,巴尔托洛梅奥(Colleoni,Bartolomeo)
科莱尼奥,贾钦托·普罗瓦纳,迪(Collegno, Giacinto Provana di)
科莱塔,彼得罗(Colletta,Pietro)
科雷焦(安东尼奥·阿莱格里)(Correggio)
科利,路易吉(Colli,Luigi)
科隆纳,彼得罗(Colonna,Pietro)
科隆纳,法布里齐奥(Colonna,Fabrizio)
科隆纳,贾科莫(Colonna,Giacomo)(红衣主教)
科隆纳,马尔坎托尼奥(Colonna, Marcantonio)
科隆纳,普罗斯佩罗(Colonna,Prospero)
科隆纳,斯特凡诺(Colonna,Stefano)
科隆纳,维多利亚(Colonna,Vittoria)
科隆纳,夏拉(Colonna Sciarra)
科伦蒂,切塞雷(Correnti,Cesare)
科明尼斯,菲利普·德(Commynes,Philippe de)
科皮诺,米凯莱(Coppino,Michele)
科萨,彼得罗(Cossa,Pietro)
科萨,弗朗切斯科·德尔(Cossa,Francesco del)
科萨,胡安·德拉(Cosa,Juan de la)
科斯塔,安德烈亚(Costa,Andrea)
科斯坦扎·达尔塔维拉(Costanza d'Altavilla)
科塔,焦万尼(Cotta,Giovanni)
科特斯,费尔南多(Cortez,Fernando)
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Cosimo Ⅰ de' Medici)
科西莫二世(Cosimo Ⅱ)
科西莫三世(Cosimo Ⅲ)
克罗齐,贝内德托(Croce,Benedetto)
克拉雷·达西西(Chiara d'Assisi)
克拉苏,马库斯·利基尼乌斯(Crasso, Marco

L

Battista)
拉努乔二世·法尔内塞(Ranuccio Ⅱ Farnese)
拉斯卡(又名:安东弗朗切斯科·格拉齐尼)(Lasca)(Antonfrancesco Grazzini)
拉斯卡里斯,君士坦丁(Lascaris,Costantino)
拉塔齐,乌尔巴诺(Rattazzi,Urbano)
拉图尔,维托里奥·萨利埃尔·德(La Tour,Vittorio Sallier de)
拉辛,让(Racine,Jean)
拉瓦莱特,让·帕里松·德(La Valette,Jean Parisot de)
拉瓦西埃,安托万-洛朗(Lavoisier,Antoine-Laurent)
拉伊纳尔多(Rainaldo)
拉伊诺尔福·达韦尔萨(Rainolfo d'Aversa)
拉扎里,科斯坦蒂诺(Lazzari,Costantino)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莱奥帕尔迪,贾科莫(Leopoldi,Giacomo)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莱加,西尔韦斯特罗(Lega,Silvestro)
莱塞普斯,费迪南·德(Lesseps,Ferdinand de)
莱斯卡雷纳(Lescarena)
赖伐尔,皮埃尔(Laval,Pierre)
兰贝托·迪托斯卡纳(Lamberto di Toscana)
兰伯特·达斯波莱托(Lamberto da Spoleto)
兰布鲁斯基尼,路易吉(Lambruschini,Luigi)(红衣主教)
兰道(Lando)
兰多尔福(Landolfo)
兰弗兰科(Lanfranco)(建筑师)
兰普尼亚尼,吉安·安德烈亚(Lampugnani,Gian Andrea)
兰齐,路易吉(Lanzi,Luigi)
兰恰,曼弗雷多(Lancia,Manfredo)
兰扎,费尔迪南多(Lanza,Ferdinando)
兰扎,焦万尼(Lanza,Giovanni)
兰佐内(Lanzone)
劳拉纳,卢恰诺(Laurana,Luciano)
劳里亚,鲁杰罗·迪(Lauria,Ruggero di)
劳伦提乌斯(Lorenzo)(敌对教皇)
勒内(昂儒的)(Renato d'Angiò)
雷阿尔夫人(Madama Reale)(见 Cristina di Franeia)
雷必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Lepido,Marco Emilio)
雷迪,弗朗切斯科(Redi,Francesco)
雷吉斯,米凯莱(Regis,Michele)
雷加尔迪,朱塞佩(Regaldi,Giuseppe)
雷尼,圭多(Reni,Guido)
雷斯皮吉,奥托里诺(Respighi,Ottorino)
雷塔利(Leutari)
雷亚尔多·科隆博,马泰奥(Realdo Colombo,Matteo)
黎世留,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Richelieu,Armand-Jean du Plessis de)(红衣主教)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Livio Andronico)
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o Druso)
李维乌斯,提图斯(Livio,Tito)
里基默尔(Ricimero)
里卡尔多·达韦尔萨(Riccardo d'Aversa)
里卡索利,贝蒂诺(Ricasoli,Bettino)
里科蒂,切萨雷(Ricotti,Cesare)
里努奇尼,奥塔维奥(Rinuccini,Ottavio)
里奇,希皮奥内(Ricci,Scipione de')
里奇奥蒂,尼科拉(Ricciotti,Nicola)
里瓦罗拉,阿戈斯蒂诺(Rivarola,Agostino)
里亚里奥,彼得罗(Riario,Pietro)
里亚里奥,杰罗拉莫(Riario,Gerolamo)
里佐,安东尼奥(Rizzo,Antonio)
理查一世(狮心王)(Riccardo Ⅰ,Cuor di Leone)
利奥一世(Leone Ⅰ Magno)(教皇)
利奥三世(Leone Ⅲ)
利奥四世(Leone Ⅳ)
利奥八世(Leone Ⅷ)
利奥九世(Leone Ⅸ)

利奥十世(Leone X)
利奥十二世(Leone XII)
利奥十三世(Leone XIII)
利奥三世(伊索里亚王朝的)(Leone III, l'Isaurico)(拜占庭皇帝)
利奥波德一世(哈布斯堡的)(Leopoldo I d'Absburgo)(皇帝)
利奥波德二世(哈布斯堡-洛林的)(Leopoldo II d'Absburgo-Lorena)(皇帝)
利奥波德二世(洛林的)(Leopoldo II di Lorena)(托斯卡纳大公)
利贝利乌斯(Liberio)
利比,菲利普(Lippi, Filippo)
利比,菲利皮诺(Lippi, Filippino)
利利,约翰(Lyly, John)
利乌多尔夫(Liudolfo)
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o)(克雷莫纳主教)
列宁,尼古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Lenin, Nikolaj Vladimir Il'i c Ul'janov)
林奈(卡尔,冯·林奈)(Linneo, detto Karl von Linné)
隆盖纳,巴尔达萨雷(Longhena, Baldassare)
龙萨,皮埃尔·德(Ronsard, Pierre de)
卢彻莱,焦万尼(Rucellai, Giovanni)
卢多维科一世(Ludovico I)(埃特鲁里亚国王)
卢多维科九世(Ludovico IX)(萨沃依公爵)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又名:摩尔人)(Ludovico Sforza)(米兰公爵)
卢坎,姆·安奈乌斯(Lucano, M. Anneo)
卢克莱修·卡鲁斯,提图斯(Lucrezio Caro, Tito)
卢帕泰利,多梅尼科(Lupatelli, Domenico)
卢齐利乌斯,盖尤斯(Lucilio, Gaio)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卢乌特普兰德(Liutprando)(伦巴第人国王)
卢修斯二世(Lucio II)(教皇)
卢伊尼,贝尔纳迪诺(Luini, Bernardino)
卢扎蒂,路易吉(Luzzatti, Luigi)
鲁埃,欧仁(Rouher, Eugène)
鲁道夫(Rodolfo)(上勃艮第国王,皇帝)
鲁道夫一世(哈布斯堡的)(Rodolfo I d'Absburgo)(德意志国王)
鲁道夫(施瓦本的)(Rodolfo di Svevia)
鲁迪尼,安东尼奥·斯塔拉巴·迪(Rudini, Antonio Starabba di)
鲁菲尼,弗朗切斯科(Ruffini, Francesco)
鲁菲尼,焦万尼(Ruffini, Giovanni)
鲁菲尼,雅各布(Ruffini, Jacopo)
鲁福,法布里齐奥(Ruffo, Fabrizio)
鲁切拉伊,朱利奥(Rucellai, Giulio)
鲁索,维琴佐(Russo, Vincenzo)
路德,马丁(Lutero, Martino)
路西南,雅克蒙·德(Lusignano, Giacomo di)
路易一世(虔诚者)(Ludovico I il Pio)(法兰克人国王,皇帝)
路易二世(Ludovico II)(意大利国王,皇帝)
路易四世(巴伐利亚人)(Ludovico IV il Bavaro)(皇帝)
路易三世(Ludovico III)(普罗旺斯国王,皇帝)
路易(日耳曼人)(Ludovico il Germanico)(东法兰克人国王)
路易七世(Luigi VII)(法国国王)
路易九世(Luigi IX)
路易十一(Luigi XI)
路易十二(Luigi XII)
路易十三(Luigi XIII)
路易十四(Luigi XIV)
路易十五(Luigi XV)
路易十六(Luigi XVI)
路易十八(Luigi XVIII)
路易(阿拉贡的)(Luigi d'Aragona)(西西里国王)
路易(昂儒-塔兰托的)(Luigi d'Angiò-Taranto)
路易一世(昂儒的)(Luigi I d'Angiò)(匈牙利国王)
路易一世(昂儒的)(Luigi, I d'Angiò)(有西西里国王称号)

路易二世(昂儒的)(Luigi Ⅱ d'Angiò)(有西西里国王称号)
路易三世(昂儒的)(Luigi Ⅲ d'Angiò)(有西西里国王称号)
路易-菲利普(奥尔良的)(Luigi Filippo d'Orléans)(法国国王)
路易莎·玛丽娅(波旁的)(Luisa Maria di Borbone)(帕尔马女公爵)
路易丝(萨沃依的)(Luisa di Savoia)(昂古莱姆女公爵,法国摄政王)
吕里,让·巴蒂斯特(Lulli,Giovanni Battista)
罗贝蒂,埃尔科莱·德(Roberti,Ercole de')
罗贝尔二世(虔诚者)(Roberto Ⅱ il Pio)(法国国王)
罗比兰特,卡洛·费利切·尼科拉斯·德(Robilant,Carlo Felice Nicolis di)
罗伯特(Roberto)(巴拉丁选侯)(罗马人国王)
罗伯特(昂儒的)(Roberto d'Angiò)(那不勒斯国王)
罗伯托(狡猾者)(Roberto il Guiscardo)
罗伯托(Roberto)(卡普亚大公)
罗伯托(波旁的)(Roberto di Borbone)(帕尔马公爵)
罗杰(欧特维尔的)(Ruggero d'Altavilla)(威廉一世之子)
罗杰一世(欧特维尔的)(Ruggero Ⅰ d'Altavilla)(西西里伯爵)
罗杰二世(欧特维尔的)(Ruggero Ⅱ d'Altavilla)(西西里国王)
罗兰迪诺·达帕多瓦(Rolandino da Padova)
罗利,保罗(Rolli,Paolo)
罗马尼奥西,詹多梅尼科(Romagnosi,Giandomenico)
罗马诺,埃吉迪奥(Romano,Egidio)
罗马诺,埃泽利诺二世·达(Romano,Ezzelino Ⅱ da)
罗马诺,埃泽利诺三世·达(Romano,Ezzelino Ⅲ da)
罗马诺,利博里奥(Romano,Liborio)
罗慕洛·奥古斯都(Romolo Augustolo)
罗穆埃尔德(Romualdo)
罗穆埃尔德二世(Romualdo Ⅱ)(萨勒诺主教)
罗穆西,卡洛(Romussi,Carlo)
罗萨,萨尔瓦托雷(Rosa,Saivatore)
罗塞蒂,加布里埃莱(Rossetti,Gabriele)
罗塞利诺,安东尼奥(Rossellino,Antonio)
罗塞利诺,贝尔纳多(Rossellino,Bernardo)
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Roosevelt,Franklin Delano)
罗斯米尼-塞尔巴蒂,安东尼奥(Rosminiserbati,Antonio)
罗索,梅达尔多(Rosso,Medardo)
罗索,约翰(Russell,John)
罗特尔(Rotari)(伦巴第人国王)
罗退尔(Lotario)
罗退尔一世(Lotario Ⅰ)(皇帝)
罗退尔二世(苏普林堡的)(Lotario Ⅱ di Suplinburgo)(皇帝)
罗退尔二世(Lotario Ⅱ)(洛泰林基亚国王)
罗瓦尼,朱塞佩(Rovani,Giuseppe)
罗韦塔,杰罗拉莫(Rovetta,Gerolamo)
罗西,佩莱格里诺(Rossi,Pellegrino)
罗西尼,焦阿基诺(Rossini,Gioacchino)
洛克,约翰(Locke,John)
洛雷纳,雷纳托·迪(Lorena,Renato di)
洛伦泽蒂,安布罗焦(Lorenzetti,Ambrogio)
洛伦泽蒂,彼得罗(Lorenzetti,Pietro)
洛佩·德维加,菲利克斯(Lope de Vega,Felix)
洛特雷克,奥代·德(Lautrec,Odet de)
洛托,洛伦佐(Lotto,Lorenzo)
洛朱迪切,安东尼奥(Lo Giudice,Antonio)

M

马比荣,让(Mabillon,Jean)
马德尔纳,卡洛(Maderna,Carlo)
马丁一世(小)(Martino Ⅰ il Giovane)(西西里国王)
马丁一世(老)(Martino Ⅰ il Vecchio)(阿拉贡国王)

N

Adam Albrecht)

内波斯,尤利乌斯(Nepote,Giulio)(罗马皇帝)

内里,菲利波(Neri,Filippo)

内里,蓬佩奥(Neri,Pompeo)

内维乌斯,格纳乌斯(Nevio,Gneo)

尼达姆,约翰(Needham,John)

尼蒂,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Nitti,Francesco Saverio)

尼古拉一世(Nicolò Ⅰ)(教皇)

尼古拉二世(Nicolò Ⅱ)

尼古拉三世(Nicotò Ⅲ)

尼古拉四世(Nicolò Ⅳ)

尼古拉五世(Nicolò Ⅴ)

尼古拉五世(Nicolò Ⅴ)(敌对教皇)

尼古拉一世(Nicolò Ⅰ)(俄国沙皇)

尼科利尼,焦万尼·巴蒂斯塔(Niccolini,Giovanni Battista)

尼科洛(Nicolò)(雕刻家)

尼科洛·迪詹西拉(Nicolò di Jamsilla)

尼科泰拉·焦万尼(Nicotera,Giovanni)

尼禄(Nerone)(罗马皇帝)

尼洛(Nilo)

尼斯福鲁斯一世(Niceforo I)(拜占庭皇帝)

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Niceforo Ⅱ Foca)

涅尔瓦,马尔库斯·科克乌斯(Nerva,Marco Cocceio)

涅沃,伊波利托(Nievo,Ippolito)

牛顿,以撒(Newton,Isaac)

努根特,拉瓦尔(Nugent,Laval)

诺加雷,纪尧姆·德(Nogaret,Guillaume de)

诺伊霍夫,特奥多尔·冯(Neuhoff,Teodoro di)

O

欧蒂基奥(Eutichio)

欧费米奥·迪墨西拿(Eufemio di Messina)

欧几里得(Euclide)

欧里科(Eurico)

欧塔里科(Eutarico)

P

帕尔马,雅各布(老)(Palma,Jacopo,il Vecchio)

帕加诺,马里奥(Pagano,Mario)

帕卡(Pacca)

帕拉迪奥,安德烈亚(Palladio,Andrea)

帕拉切尔苏斯(又名:特奥弗拉斯特·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Paracelso,detto Theophrast Bombast von Hohenheim)

帕拉维奇尼,埃米利奥(Pallavicini,Emilio)

帕拉维奇诺,乔治(Pallavicino,Giorgio)

帕拉维奇诺,斯福尔扎(Pallavicino,Sforza)

帕莱斯特里纳,焦万尼·皮耶尔·路易吉达(Palestrina,Giovanni Pier Luigi da)

帕莱亚里奥,奥尼奥(Paleario,Aonio)

帕里,费鲁乔(Parri,Ferruccio)

帕里尼,朱塞佩(Parini,Giuseppe)

帕里西奥,迪切雷塔(Parisio di Cereta)

帕利齐,菲利普(Palizzi,Filippo)

帕鲁塔,保罗(Paruta,Paolo)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

帕诺尔米塔(又名:安东尼奥·贝卡代利)(Panormita,detto Antonio Beccadelli)

帕皮里乌斯·卡波,盖尤斯(Papirio Carbone,Gaio)

帕萨杰里,罗兰迪诺·德伊(Passaggeri,Rolandino dei)

帕萨利亚,卡洛(Passaglia,Carlo)

帕萨万蒂,雅各布(Passavanti,Jacopo)

帕斯加尔一世(Pasquale Ⅰ)(教皇)

帕斯加尔二世(Pasquale Ⅱ)

帕斯加尔三世(Pasquale Ⅲ)(敌对教皇)

帕斯卡雷拉,切萨雷(Pascarella,Cesare)

帕斯科利,焦万尼(Pascoli,Giovanni)

帕伊斯,埃托雷(Pais,Ettore)

帕伊西埃洛,焦万尼(Paisiello,Giovanni)

潘多尔福(铁头)(Pandolfo Testa di Ferro)

潘多尔福四世·迪卡普亚(Pandolfo Ⅳ di

普洛佩提乌斯,塞克斯都·奥勒利安(Properzio,Sesto Aurelio)
普洛塔戈拉(Protàgora)
普奇,奥拉齐奥(Pucci,Orazio)
普奇尼,贾科莫(Puccini,Giacomo)
普斯泰尔拉,弗朗切斯科(Pusterla,Francesco)

Q

奇博,弗兰切斯凯托(Cibo,Franceschetto)
奇博,玛丽亚·泰雷萨(Cybo,Maria Teresa)
奇里洛,多梅尼科(Cirillo,Domenico)
奇马·达科内利亚诺(Cima da Conegliano)
奇马布埃(Cimabue)
奇马罗萨,多梅尼科(Cimarosa,Domenico)
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
奇普里亚尼,莱奥内托(Cipriani,Leonetto)
恰尔迪,古列尔莫(Ciardi,Guglielmo)
恰尔迪尼,恩里科(Ciatdini,Enrico)
乔安娜一世(昂儒的)(Giovanna Ⅰ d'Angiò)(那不勒斯国王)
乔安娜二世(昂儒的)(Giovanna Ⅱ d'Angiò)
乔安娜·拉·帕扎(Giovanna la Pazza)(卡斯蒂里亚王后)
乔尔乔涅(又名:乔治·巴尔巴雷利)(Giorgione)
乔叟,杰弗里(Chaucer,Geoffrey)
乔托(Giotto)
乔治三世(Giorgio Ⅲ)(英国国王)
切尔努斯基,恩里科(Cernuschi,Enrico)
切基,詹马里亚(Cecchi,Gianmaria)
切科·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
切莱斯蒂三世(Celestino Ⅲ)(教皇)
切莱斯蒂四世(Celestino Ⅳ)
切莱斯蒂五世(Celestino Ⅴ)
切萨雷·德斯特(Cesare d'Este)
切萨里,安东尼奥(Cesari,Antonio)
秦纳,科尔内利(Cinna,Cornelio)
琴奇,贝亚特里切(Cenci,Beatrice)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l,Winston)

R

让·迪冉丹(Giovanni di Jaudun)
热尔贝·德奥里亚克(见西尔维斯特二世)(Gerberto d'Aurillac)(教皇)
儒尔当,让-巴蒂斯特(Jourdan,Jean-Baptiste)
瑞诺,弗朗切斯科(Junod,Francesco)

S

萨巴泰利,路易吉(Sabatelli,Luigi)
萨多莱托,雅各布(Sadoleto,Jacopo)
萨尔皮,保罗(Sarpi,Paolo)
萨尔托,安德烈亚·德尔(Sarto,Andrea del)
萨尔托里奥,朱利奥·阿里斯蒂德(Sartorio,Giulio Aristide)
萨尔维,尼科洛(Salvi,Nicolò)
萨尔维亚蒂,弗朗切斯科(Sarviati,Francesco)
萨尔韦米尼,加埃塔诺(Salvemini,Gaetano)
萨尔沃蒂,安东尼奥(Salvotti,Antonio)
萨菲,奥雷利奥(Saffi,Aurelio)
萨凯蒂,佛朗哥(Sacchetti,Franco)
萨科尼,拉涅罗(Sacconi,Raniero)
萨拉科,朱塞佩(Saracco,Giuseppe)
萨拉斯科,卡洛·卡内拉·迪(Salasco,Carlo Canera di)
萨兰德拉,安东尼奥(Salandra,Antonio)
萨里,亨利·哈华(Surrey,Henry Haward)(伯爵)
萨利切蒂,奥雷利奥(Saliceti,Aurelio)
萨利切蒂,戈利尔莫(Saliceti,Guglielmo)
萨林贝内·达帕尔马(Salimbene da Parma)
萨林圭拉(Salinguerra)
萨卢塔蒂,科卢乔(Salutati,Coluccio)
萨罗斯提乌斯,盖尤斯·克里斯普斯(Sallustio,Gaio Crispo)
萨图尔尼努斯,阿普勒乌斯(Saturnino,Apuleio)
萨维奥佐(又名:西莫内·塞尔迪尼)(Saviozzo)(Simone Serdini,detto il)
萨沃纳罗拉,杰罗拉莫(Savonarola,Gerolamo)

斯特拉博,庞培(Strabone,Pompeo)
斯特罗齐,菲利普(Strozzi,Filippo)
斯特罗齐,皮埃罗(Strozzi,Piero)
斯特西科罗斯(Stesicoro)
司科特,沃尔特(Scott,Walter)
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奎罗斯,盖尤斯(Svetonio Tranquillo,Gaio)
苏拉,卢西乌斯·科尔内留斯(Silla. Lucio Cornelio)
苏莱曼(高贵者)(Solimano il Magnifico)(奥斯曼苏丹)
索代里尼,尼科洛(Soderini,Nicolò)
索代里尼,皮耶尔(Soderini,Piero)
索福罗尼乌斯(Sofrone)
索拉罗·德拉马加里塔,克莱门特(Solaro della Margarita,Clemente)
索奇诺,福斯托(Socino,Fausto)
索奇诺,莱利奥(Socino,Lelio)

T

塔尔吉尼,安杰洛(Targhini,Angelo)
塔尔昆(高傲者)(Tarquinio il Superbo)
塔尔昆·普里斯库斯(Tarquinio Prisco)
塔尔塔利亚,尼科洛(Tartaglia,Nicolo)
塔里,安东尼奥(Tari,Antonio)
塔伦蒂,弗朗切斯科(Talenti,Francesco)
塔努奇,贝尔纳多(Tanucci,Bernardo)
塔索,贝尔纳多(Tasso,Bernardo)
塔索,托尔夸托(Tasso,Torquato)
塔索尼,亚历山德罗(Tassoni,Alessandro)
塔瓦尼,朱迪塔(Tavani,Giuditta)
塔西佗,普布柳斯·科尔涅利乌斯(Tacito,Publio Cornelio)
塔佐利,恩里科(Tazzoli,Enrico)
泰奥多罗·帕莱奥洛戈(Teodoro Paleologo)
泰巴尔代奥,安东尼奥(Tebaldeo,Antonio)
泰巴尔代斯基,弗朗切斯科(Tebaldeschi,Francesco)
泰尔佐,奥托博诺(Terzo,Ottobuono)
泰内拉尼,彼得罗(Tenerani,Pietro)
泰斯蒂,富尔维奥(Testi,Fulvio)
泰亚斯(Teia)(东哥特人国王)
坦布罗尼·阿尔马罗利,费尔南多(Tambroni Armaroli,Fernando)
坦克雷迪(欧特维尔的)(Tancredi d'Altavilla)
坦克雷迪(Tancredi)(西西里国王)
坦西洛,路易吉(Tansillo,Luigi)
唐·约翰(奥地利的)(Austria,don Giovanni d')(卡尔五世之子)
唐·约翰(奥地利的)(Austria,don Giovanni d')(腓利普四世之子)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Donizetti,Gaetano)
特格特霍夫,威廉·冯(Tegetthoff,Wilhelm von)
特拉萨蒙特(Trasamondo)
特勒肖,贝尔纳迪诺(Telesio,Bernardino)
特里波尼安(Triboniano)
特里翁福,阿戈斯蒂诺(Trionfo,Agostino)
特里武尔齐奥,吉安·贾科莫(Trivulzio,Gian Giacomo)
特里西诺,吉安·乔治(Trissino,Gian Giorgio)
特伦提乌斯·阿弗罗(或译:非洲的),普布柳斯(Terenzio Afro,Publio)
特罗亚,卡洛(Troya,Carlo)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提布卢斯,阿尔比乌斯(Tibullo,Albio)
提摩勒翁(Timoleone)
提图斯(Tito)(罗马皇帝)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ecellio)
廷德尔,马修(Tindal,Matthew)
廷托雷托(又名:雅各布·罗布斯蒂)(Tintoretto)(Jacopo Robusti,detto il)
屠拉蒂,菲利普(Turati,Filippo)
图拉,卡斯梅(Tura,Cosmè)
图拉真,马尔库斯·乌尔比安(Traiano,Marco Ulpio)(罗马皇帝)
图密善,提丢斯·弗拉维安(Domiziano,Tito Flavio)(罗马皇帝)
托兰,约翰(Toland,John)
托里切利,埃万杰利斯塔(Torricelli,Evangelista)

W

维克托二世(Vittore Ⅱ)(教皇)
维克托四世(Vittore Ⅳ)(敌对教皇)
维克托·阿梅代奥一世(Vittorio Amedeo Ⅰ)(萨沃依公爵)
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Vittorio Amedeo Ⅱ)(萨沃依公爵,西西里国王,撒丁岛国王)
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Vittorio Amedeo Ⅲ)(撒丁岛国王)
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一世(Vittorio Emanuele Ⅰ)(撒丁岛国王)
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Ⅱ)(萨沃依公爵,撒丁岛国王,意大利国王)
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 Ⅲ)(意大利国王)
维拉尔,路易-埃克托尔(Villars,Louis-Hector)
维拉里,帕斯夸莱(Villari,Pasquale)
维拉尼,菲利普(Villani,Filippo)
维拉尼,焦万尼(Villani,Giovanni)
维拉尼,马泰奥(Villani,Matteo)
维勒鲁瓦,弗朗索瓦(Villeroi,Francois)(公爵)
维利杰尔莫(Viligelmo)
维尼奥拉(Vignola)(又名:雅各布·巴罗方)(Jacopo Barozzi,detto il)
维奇尼,焦万尼(Vicini,Giovanni)
维萨里,安德烈亚斯(Vesalio,Andrea)
维斯孔蒂(Visconti)
维斯孔蒂,阿佐内(Visconti,Azzone)
维斯孔蒂,奥托内(Visconti,Ottone)
维斯孔蒂,贝内纳博(Visconti,Bernabò)
维斯孔蒂,比安卡(Visconti,Bianca)
维斯孔蒂·迪奥莱焦,焦万尼(Visconti di Oleggio,Giovanni)
维斯孔蒂,加布里埃莱(Visconti,Gabriele)
维斯孔蒂,加莱亚佐一世(Visconti,Galeazzo Ⅰ)
维斯孔蒂,加莱亚佐二世(Visconti,Galeazzo Ⅱ)
维斯孔蒂,焦万尼(Visconti,Giovanni)
维斯孔蒂,卡洛(Visconti,Carlo)
维斯孔蒂,卡泰里纳(Visconti,Caterina)
维斯孔蒂,卢基诺(Visconti,Luchino)
维斯孔蒂,洛特里西奥(Visconti,Lodrisio)
维斯孔蒂,马尔科(Visconti,Marco)
维斯孔蒂,马泰奥一世(Visconti,Matteo Ⅰ)
维斯孔蒂,马泰奥二世(Visconti,Matteo Ⅱ)
维斯孔蒂,瓦伦蒂纳(Visconti,Valentina)
维斯孔蒂-韦诺斯塔,埃米利奥(Visconti-Venosta,Emilio)
维泰莱斯基,焦万尼(Vitelleschi,Giovanni)
维泰利,维泰洛佐(Vitelli,Vitellozzo)
维托雷(Vittore)
维瓦里尼(Vivarini)
伪狄翁尼西乌斯(阿雷奥帕古斯的)(Pseudo-Dionigi l'Areopagita)
伪伊西多尔(又名:伊西多尔·墨卡托)(Pseudo-Isidoro,detto Isidorus Mercator)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温琴佐二世·贡扎加(Vincenzo Ⅱ Gonzaga)(曼托瓦公爵)
文策斯劳斯(卢森堡的)(Venceslao di Lussemburgo)(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
翁贝托一世(Umberto Ⅰ)(意大利国王)
翁贝托二世(Umberto Ⅱ)(意大利国王)
翁弗雷多(欧特维尔的)(Umfredo d'Altavilla)
沃尔佩,焦阿基诺(Volpe,Gioacchino)
沃尔维尼奥(Volvinio)
沃基埃里,安德烈亚(Vochieri,Andrea)
乌巴尔迪,巴尔多·德利(Ubaldi,Baldo degli)
乌巴尔迪尼,鲁杰罗·德利(Ubaldini,Ruggero degli)
乌贝蒂,法齐奥·德利(Uberti,Fazio degli)
乌迪诺,尼古拉-夏尔-维克托(Oudinot,Nicolas-Charles-Victor)
乌尔班,卡尔(Urban,Karl)
乌尔班二世(Urbano Ⅱ)(教皇)
乌尔班三世(Urbano Ⅲ)
乌尔班六世(Urbano Ⅵ)
乌尔班八世(Urbano Ⅷ)
乌尔斯辛根,瓜尔涅里·迪(Urslingen,Gu-

X

Y

亚历山大一世(Alessandro Ⅰ)(俄国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Alessandro Ⅱ)(俄国沙皇)
亚历山大·莫罗索斯(Alessandro il Molosso)
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佛罗伦萨公爵)
亚列克塞一世·康尼努斯(Alessio Ⅰ Comneno)(拜古庭皇帝)
亚列克塞四世·安基卢斯(Alessio Ⅳ Angelo)
亚列克塞五世·杜卡斯(Alessio Ⅴ Ducas)
亚奇尼,斯特凡诺(Jacini,Stefano)
扬·范·鲁伊斯布鲁克(Giovanni di Ruysbroeck)
扬·索别斯基(Giovanni Sobieski)(波兰国王)
耶隆(Gelone)
依纳爵(罗耀拉的)(Ignazio di Loyola)
伊巴·迪埃泽萨(Iba di Edessa)
伊尔内里乌斯(Imerio)
伊拉斯莫(鹿特丹的)(Erasmo da Rotterdam)
伊皮凡尼乌斯(Epifanio)
伊丽萨白·法尔内塞(Elisabetta Farnese)(西班牙王后)
伊诺第,路易吉(Einaudi,Luigi)
伊曼纽尔·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萨沃依公爵)
伊萨贝拉(阿拉贡的)(Isabella d'Aragona)
伊萨贝拉(天主教徒)(Isabella la Cattolica)
伊沃(Ivo)
因杜诺,多梅尼科(Induno,Domenico)
因杜诺,杰罗拉莫(Induno,Gerolamo)
英诺森二世(Innocenzo Ⅱ)(教皇)
英诺森三世(Innocenzo Ⅲ)
英诺森四世(Innocenzo Ⅳ)
英诺森六世(Innocenzo Ⅵ)
英诺森七世(Innocenzo Ⅶ)
英诺森八世(Innocenzo Ⅷ)
英诺森十世(Innocenzo Ⅹ)
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zo Ⅺ)
尤金尼厄斯三世(Eugenio Ⅲ)(教皇)
尤金尼厄斯四世(Eugenio Ⅳ)
尤利乌斯二世(Giulio Ⅱ)(教皇)
尤利乌斯三世(Giulio Ⅲ)
尤瓦拉,菲利普(Juvara,Filippo)
约翰一世(Giovanni Ⅰ)(教皇)
约翰三世(Giovanni Ⅲ)
约翰八世(Giovanni Ⅷ)
约翰十世(Giovanni Ⅹ)
约翰十一世(Giovanni Ⅺ)
约翰十二世(Giovanni Ⅻ)
约翰十三世(Giovanni XIII)
约翰十九世(Giovanni XIX)
约翰二十二世(Giovanni XXII)
约翰二十三世(Giovanni XXIII)
约翰十六世(Giovanni XVI)(敌对教皇)
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Giovanni Ⅰ Zimisce)(拜占庭皇帝)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加斯(Giovanni Ⅴ Paleologo)(拜占庭皇帝)
约翰(卢森堡的)(Giovanni di Lussemburgo)(波希米亚国王)
约翰一世(Giovanni Ⅰ)(蒙费拉托侯爵)
约翰二世(Giovanni Ⅱ)(蒙费拉托侯爵)
约翰(Giovanni)(埃塞俄比亚皇帝)
约翰·克里索斯托莫(Giovanni Crisostomo)
约翰(大马士革的)(Giovanni Damasceno)
约瑟芬(Giuseppina)(法国皇后)
约瑟夫一世(Giuseppe Ⅰ)(皇帝)
约瑟夫二世(Giuseppe Ⅱ)
约瑟夫一世(Giuseppe Ⅰ)(葡萄牙国王)

Z

扎迦利(Zaccaria)(教皇)
扎琉科斯(Zaleuco)
扎纳尔代利,朱塞佩(Zanardelli,Giuseppe)
扎内拉,贾科莫(Zanella,Giacomo)
赞博尼,路易吉(Zamboni,Luigi)
赞多纳伊,里卡尔多(Zandonai,Riccardo)
赞基,杰罗拉莫(Zanchi,Gerolamo)
泽诺,阿波斯托洛(Zeno,Apostolo)
泽诺,卡洛(Zeno,Carlo)(舰队司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
作者=作者:（意）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
页数=554
SS号=13346364
出版日期=2013.07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